环喜马拉雅文丛

巴基斯坦
北部地区史

[巴基斯坦]艾哈默德·哈桑·达尼 著
杨柳 黄丽莎 译
陆水林 审订

中国藏学出版社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史

[巴基斯坦]艾哈默德·哈桑·达尼 著
杨柳 黄丽莎 译
陆水林 审订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史/(巴基)达尼著;杨柳,黄丽莎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7
(环喜马拉雅文丛)
ISBN 978-7-80253-602-9

Ⅰ.①巴… Ⅱ.①达… ②杨… ③黄… Ⅲ.①巴基斯坦—历史 Ⅳ.①K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4821 号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史

[巴基斯坦]艾哈默德·哈桑·达尼 著
杨柳 黄丽莎 译 陆水林 审校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2.75
字　　数	602 千字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3-602-9/K·353
定　　价	62.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010-64892902

汉译本序

陆水林

本书为巴基斯坦著名学者艾哈默德·哈桑·达尼教授所著，初版于1989年，2000年出版了第三版，汉译本是据第三版译出的。

本书研究的地区，主要是巴基斯坦原联邦直辖北部地区，但也涉及原西北边境省的奇特拉尔专区。本书是试图构建这一地区历史的唯一一部专著。需要说明的是，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已更名为“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西北边境省”也改称“开伯尔—普什图省”了。本书汉译本照原样翻译，不作更动。

本书涉及的地区，与我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同我国山水相连，同我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很古的时代。它包括在我国古代“西域”的范围之内，我国古代史籍提到的难兜、乌秅、县度（悬度）、波沦、波路（钵仑、不仑等）、不流沙、阿钩羌、钵卢勒、赊弥（俱位）、钵露罗、勃律、大勃律、小勃律、钵露、布露、布路沙、布路州、陀历、达丽罗、贺菩劳、巴勒提、坎巨提、博洛尔等诸多地名，以及藏文史籍中的 Bru-sha（Bru-za）、Kog-yul 等等，都在它的地域范围之内。

这一地区处在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西部的重山峻岭之间，多雪山冰川，少平地沃壤，交通不便，气候严酷，人类的生存至为艰难。但这一地区又是联结南亚次大陆和中亚直至中国的枢纽之地，在古代民族的迁徙和宗教、文化的传播上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地区在我国古代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是不言而喻。从我国经陆路前往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以至更远的地方，这一地区是必经之地。我国古代史籍中的“罽宾道”、“陀历道”，以及吐蕃王朝通往中亚的“勃律道”，都从这一地区经过。

我国是最早记述这一地区的国家之一，我国古籍中的许多记载，至今仍焕发着绚丽的光彩，为各国学者所津津乐道。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自近代以来，随着我国封建主义王朝的衰落和西方列强的侵入，我们对这一地区的了解大大落后了。相对于西方学者和巴基斯坦学者（包括该地区学者）不断深入的研究，我们显得十分无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在巴基斯坦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的合作下，历时十数年，修建了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喀喇昆仑公路，将天堑变为通途。在筑路过程中，中方员工牺牲 168 人，伤残 201 人，巴方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喀喇昆仑公路建成通车后，中巴两国的陆路交往大为发展，各国游客和学者纷至沓来。交通的便利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巴基斯坦和各国学者的考察、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遗憾的是，在人数众多的学者群中，却罕有中国学者的身影。不仅如此，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的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译介艾哈默德·哈桑·达尼先生的有关著作，便成了笔者多年的心愿。

本书是达尼教授有关这一地区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著述本书之前，达尼教授于 1983 年出版了重要考古著作——《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迪亚玛尔）之城》，对在吉拉斯地区进行的长达五年的考古活动作了总结。达尼教授还对罕萨灵岩的古代岩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一系列开拓性研究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本书的著述。鉴于本书内容涉及范围既广且深，达尼教授特邀杰勒德·富斯曼教授和卡尔·耶特马尔教授分别撰写了二、三两章。在本书第三版中，又增补了“达尔德文化的起源——在北巴基斯坦的新发现”和“北部地区（1986—2000）”两篇附录。

虽然达尼教授称本书只是他个人对历史的重新建构，但本书仍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但包蕴丰富的

世界”，有很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2001年8月，应笔者之请，达尼教授慷慨转让了本书和另外数部著作汉译的版权，允许笔者安排这几部著作的汉译事宜，这给本书汉译本的出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艾哈默德·哈桑·达尼教授于1920年6月20日出生于印度赖普尔（Raipur）县巴斯纳（Basna）村的一个穆斯林家庭。他的祖先原居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附近的阿南特纳格（Anantnag），在信奉伊斯兰教之前属婆罗门种姓，其族姓称瓦因（克什米尔语 Wien，梵文为 Wani），指精通、熟记并传授吠陀之人。“达尼”（Dani）是后来英国人给予的称号，意为“赠予者”。

从达尼教授的曾祖父一代起，其家族先后移居阿姆利则和赖普尔，以经商为生。由于姑父的关注，小达尼得以同姑父之子一起去马哈萨蒙德（Mahasmund）上学，在那里读完了8年级。随后，他又前往赖普尔城和那格浦尔（Nagpur）继续求学。在那格浦尔，先后就读于美国教会办的一所高级中学和莫里斯学院（Morris College）。在那格浦尔的求学，可以说奠定了达尼先生一生事业的基础，因为他在那里学习了梵文。在那个时代，穆斯林青年大多学习波斯文或阿拉伯文，学梵文的可说是绝无仅有。后来，在老师的建议下，他又进入贝那勒斯印度教大学（Banaras Hindu University）攻读梵文和历史硕士学位，成为该校唯一的穆斯林学生，并以优异的成绩打破了该校25年的纪录。按照该大学的传统，名列第一的学生理所当然地可以留校任教，但该大学的另一个传统是从来不聘任穆斯林为教师。于是，艾哈默德·哈桑·达尼先生离开了大学，来到德里，在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主持的印度考古局谋得一份工作，参加了考古发掘和有关古建筑的管理工作。

1947年印、巴分治后，艾哈默德·哈桑·达尼先生来到巴基斯坦。他先在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拉杰沙希（Rajshahi）的文物局任职，1950年进达卡大学历史系任教。其间，他还远赴英国，在伦敦大学读取了博士学位。1962年，因阿尤布·汗总统的关注，他受聘到西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大学任教并创办了考古系。从此，达尼教授的事业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1971 年，达尼先生受聘到伊斯兰堡的伟大领袖大学（Quaid-i-Azam University）任教，成为该校终身教授，并先后担任中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塔克西拉亚洲文明研究所所长等多项职务。

达尼教授是巴基斯坦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他精通梵文和南亚次大陆多种语言，治学严谨，不畏艰苦，成就卓著，为巴基斯坦的考古与历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达尼教授参加和领导了巴基斯坦大量考古发掘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报告和专著，如：《散高洞穴的发现》、《沙汗泰里的发掘——对希腊人兴建的布色羯逻伐底第二城的研究》、《迪玛尔格尔与犍陀罗墓葬文化》、《杰格德拉堡与犍陀罗艺术》、《戈马尔河谷的发掘》、《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迪亚玛尔）之城》，等等。达尼教授的重要著作，还有《历史之城塔克西拉》、《喀喇昆仑公路沿线人类文明遗迹》、《伊斯兰建筑：特达》、《边境历史之城——白沙瓦》，等等，达数十种之多。他还参与了四卷本《巴基斯坦简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及《人类科学与文化史》等多种著作的编撰工作。在 80 多岁高龄的时候，他还忙于《巴基斯坦史——巴基斯坦过去的时代》的著述和回忆录的撰写。《巴基斯坦史——巴基斯坦过去的时代》已于 2008 年出版。

据达尼教授自述，在他数十年的学术活动中，最重要的工作当属以下三项：（一）散高洞穴的发掘，这是在巴、印次大陆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洞穴；（二）首次在迪玛尔格尔发现并发掘了雅利安人墓葬和居住地；（三）对吉拉斯大量古代岩刻的研究。

数十年来，除繁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外，达尼教授还担任了大量兼职，参加和组织了许多国内、国际的学术活动，编辑或主编了多种学术刊物，从而为巴基斯坦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发展，为推动巴基斯坦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合作，为在国际上宣传巴基斯坦光辉的历史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表彰达尼教授对国家的贡献，巴基斯坦政府授予他卓越星章（1969 年）、杰出勋章（1992 年）和卓越新月勋章（2000 年）。

达尼教授还是一位推动学术领域国际交流的活动家，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盛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孟加拉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塔吉克斯坦、土耳其等多国学术机构曾多次向他颁奖。

达尼教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非常友好的感情。上世纪 80 年代，他曾数次访华，在北京作过有关喀喇昆仑文化和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学术报告。他还领导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丝绸之路考察工作，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历史与考古学界的老朋友。

笔者于上世纪 80 年代与达尼教授相识，曾数次采访达尼教授的访华观感和对丝绸之路的考察活动。20 世纪 80 年代末与 90 年代前半期，笔者赴巴基斯坦访问及在巴工作期间，曾获达尼教授多方帮助。2001 年 8 月底至 2002 年 3 月，为研究巴尔蒂斯坦的历史与文化，笔者又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达尼教授的研究所研修了半年，更是得到了达尼教授的许多指点。2003 年，中国—巴基斯坦友好论坛成立，笔者有幸与达尼教授同为论坛成员，在一起开会，讨论发展中巴友好的事业。2005 年春，笔者应邀参加了巴方举办的“犍陀罗周”的活动，又见到了达尼教授，听到了他的演讲。不久，达尼教授《历史之城塔克西拉》一书的汉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托同事捎去了样书，达尼教授很是高兴。2009 年 1 月，正当达尼教授《喀喇昆仑公路沿线人类文明遗迹》一书汉译稿进入定稿阶段并由我们在伊斯兰堡工作的同事向达尼教授请教某些疑难问题的时候，传来了达尼教授因病住院的消息，1 月 26 日晚，又传来了达尼教授于当天早晨不幸辞世的消息，这使北京认识他的朋友们都深感悲痛。

2011 年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 60 周年，也是中巴友好年，继《喀喇昆仑公路沿线人类文明遗迹》一书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之后，我们谨以本书奉献给这个吉祥的年份和广大读者，并以此来纪念和感谢达尼教授。

最后，笔者就本书的翻译工作略作说明。本书的翻译工作始于 2003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巫新华先生的关心和联络下，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黄丽莎小姐和杨柳小姐愿意承担这一工作。译事

开始之时，恰逢“非典”肆虐，我们只能通过互联网联系。杨柳小姐负责翻译本书前半部分（从开头至第六章），黄丽莎小姐负责翻译后半部分。笔者则先将原著索引的名词译出，供她们参考，以保持译名统一。杨、黄两位译出初稿后，由笔者在电脑上改了两遍，后来还审读过一遍校样。但是，由于出版遇到困难，事情便拖了下来。两位姑娘获得博士学位后便忙于自己的工作，除杨柳读过前六章的校样外，不再有时间过问此事，书稿便一直压在笔者手里。这些年里，笔者对这一未竟之事，时刻未敢忘怀，并不时对译稿作一些加工。期间，笔者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葛维钧研究员和与笔者一起工作的巴基斯坦专家的帮助。在此，笔者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笔者衷心感谢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有益于中巴两国学术的交流，盼望中国学者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笔者也要感谢杨柳、黄丽莎小姐翻译本书，由此，笔者有幸成为本书汉译本的第一读者，并有机会就译稿提出意见，从而使笔者能对21世纪中巴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对达尼教授的友情有所回报。

由于译者特别是笔者水平的限制，加之本书内容极其丰富而复杂，又涉及多种语言，特别是古代语言，还涉及多门学科的知识和术语，翻译中的错误和欠妥之处一定不少，望读者不吝指教。汉译本中的译注，均系笔者所加，不当和错误之处，均应由笔者负责。本书有大量专有名词，我们尽可能地括注了原文，以方便读者。本书的黑白图片和彩色照片，原著均置于全书末尾。汉译本将黑白图片改排在正文中间，但图片编号未作更动。个别质量欠佳的图片，改用了笔者自拍的照片。彩色照片仍单独排成图版，放在附录之后。为方便读者，笔者草绘了一幅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略图，示意而已，仅供参考。

2013年5月

附　言

本书第三版出版时增加了关于达尔德文化起源的一些全新的材料，这些材料是近两年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各个不同地方对坟墓作考古发掘时发现的，由巴基斯坦政府考古学部的官员穆罕默德·纳齐尔·汗先生搜集。他的发现是值得嘉许的。这批材料现存于塔克西拉博物馆文物库，还没有被整理过，但那一定是最新的。

艾哈默德·哈桑·达尼

2000 年 8 月 1 日

前　言

这是第一部完整的（从最早时期至1985年12月）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史。巴基斯坦政府所使用的“北部地区”① 这一新的官方名称，指的是跨喜马拉雅山脉的大部分地区，也就是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知的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地区。历史上，奇特拉尔一直与这一地区联系在一起，直到1895年英国出于管理上的需要才将其分离出去。人们通常认为，这个地区历史上一直附属于克什米尔。本书将详细阐明这一观点，明确说明这一地区在政治、文化、语言、社会、经济、人种，以及艺术和建筑等方面如何取得了自己独立的历史发展。本书将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尽力论述主要的政治史。关于语言的一章和关于人种的一章分别由这两个领域的两位优秀的专家撰写，他们对此作出了最为简明的概述。其他关于宗教、文化、社会、贸易及商业的细节问题，在各章节中亦有简要叙述。为保证本书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本书没有涉及文化史的内容，这一部分历史需要单独的一部书来说明。

自1979年至1985年，我一直在这个地区工作，从田野研究中搜集所需的资料。我的研究项目是由巴基斯坦政府教育部发起的，是巴基斯坦—德国人种学研究组课题的一部分。课题组的其他研究成果已分别发表。1984年，我受国家历史文化研究所之托，撰写这部历史专著。研究所提供了十万卢比的经费，以聘用两名研究助手，进一步搜集田

① 现已改称“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译者

野资料、查找图书和进行采访。在这项工作中，吉尔吉特的退休助理警察总监阿卜杜尔·哈米德·哈瓦尔先生以他对该地区地理、民族和历史的深刻了解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不幸的是，这项工作尚在进行中的时候，他便逝世了。其后，我又得到了纳格尔的赛义德·阿克巴·侯赛因先生的帮助。为获取波斯文的资料，我得到了阿迪古尔·拉赫姆教授的协助，1985 年我们整整合作了一年。蒙吉尔吉特的罗阇[①]穆姆塔兹的好意，我得以从罗阇纳西尔处获得他父亲（罗阇沙·拉伊斯·汗）所著的《吉尔吉特史》，这对于我写作中古时期的历史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为写作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我查阅了印度政府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的资料。我十分感激不列颠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给我在伦敦的短暂驻留提供的支持。为写作“为自由而战”一章，我有幸对数位吉尔吉特人士进行了采访，他们中有些人的名字我在书中提到了，有些则没有提及，在这里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所有人给我提供材料和信息。（退役）中校古拉姆·海达尔将他的私人日记供我任意使用，使我受益匪浅。同样，已故的哈桑·汗上校和（退役）空军上校沙·汗未经发表的手稿也具有极高的价值。为写作这一时期的历史，吉尔吉特的副警察总监赫希默杜拉·汗向我提供了一些原始材料。而最为重要的是，吉尔吉特、吉拉斯和巴尔蒂斯坦的专员和助理专员们向我提供了他们负责的部门所能得到的所有相关材料，让我自由使用。我要特别地提到罕萨的米尔，尊贵的迦曾弗尔·阿里·汗，他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他所掌握的原始资料在许多问题上给了我不少启示。纳格尔罗阇非常友好地邀请我去了他的王宫，向我展示他所收藏的资料。已故的哈伯罗罗阇法塔赫·阿里·汗也曾邀请我去他的王宫，与我就他的领地的历史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各位伊斯兰圣贤的后人及伊斯兰教圣者陵墓和清真寺的管理人和守护者都对我敞开了大门，向我提供了他们所保存的材料。

我要感谢 G. 富斯曼教授和卡尔·耶特马尔教授，他们为本书各撰写了一章。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从原始材料中收集资料，尽可

---

① 印度斯坦语 Raja 的音译，意为“王公”。土邦王公制度取消后，人们仍以此尊称之。——译者

能客观地再现这一地区的历史，然而这依然只是我个人对历史的重新建构。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感谢北部地区所有从各个方面给过我帮助的人们，当我在那里搜集资料时，他们在没有任何酬劳的情况下给了我无私的帮助，使我的工作获得许多方便，任何感激之词都不足以回报他们的深情，我想，最好的报答就是我为他们献上的这部书吧。

艾哈默德·哈桑·达尼

1989年10月1日于伊斯兰堡

目录

第一章　历史地理

第二章　作为历史资料的语言

杰勒德·富斯曼教授　撰

第三章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人种学概观

卡尔·耶特马尔教授　撰

第四章　从史前史到历史

第五章 早期历史

第六章 中世纪史

第七章　现代史

第八章　为自由而战

第九章 结束语

第一章　历史地理

导　言

处在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西段之间的是一片遥远而神秘的土地，现称为巴基斯坦北部地区[1]。那里至今还存留着与山林神话[2]相联系的古老的人类传统。当人和动物随着突然的冰崩而消失，寒风、骤雪和泥石流淹灭了面前的一切，当地人想起来的往往是神话传说而非民间故事，它们在人们的脑海中历久弥新。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种自然现象始终是个谜。直到后来，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深入到这个地区，才帮他们揭开了山川河流和湖泊形成的奥秘。新近建成的喀喇昆仑高速公路[3]为对外交流和联系提供了便利。以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为背景，人们在一块块孤立的谷地中繁衍生息。他们与世隔绝，在危机四伏的崇山峻岭间谋求生活，只敢偶尔冒险在夏季时闯过高高的山口，去看一眼外面的世界，偷享片刻的奢华，借此舒缓一下他们悲惨的生活——这就是这个小世界的令人沮丧的生活图景。这个小世界躲藏在南部的克什米尔和北部的旧时的突厥斯坦之间。突厥斯坦现在已分为中国的新疆和苏联的吉尔吉斯（Khirgizia），后者又被狭窄的楔状的瓦罕所隔开。瓦罕紧靠帕米尔南坡，正式归属阿富汗。这个小世界的故事

鲜为人知，但却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与一块对人类历史至关重要的土地相联系的。用 E. F. 奈特（E. F. Knight）的话来说，这里是“三个帝国的会合之处”，[4] 而现在有五个国家在这里接壤，它们是阿富汗、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苏联。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周边的世界影响了这个神秘的地方，并给影响所及的人们和他们的难以到达的栖息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已消失的多种语言、文化和文明。正是通过重新发现这些已经消逝的人类的线索，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打开了一条通往历史的新路径。这是一个世界，毫无疑问，是一个鲜为人知但包蕴丰富的世界。

在地质学家看来，这个地区是“相撞的大陆”[5] 交接的地带。印—巴次大陆板块上浮，与欧亚大陆北部相整合，形成了位于北部兴都库什山脉和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科希斯坦岛”（Kohistan island）。[6] 结果，这种地质变化导致了世界高峰的形成和蒂锡斯海（Tethys sea）的填塞，并在交接线上留下了两处“纰漏”，从而使河流得以形成——宽阔的印度河及其支流滔滔流过喜马拉雅和兴都库什—喀喇昆仑山脉之间的无数峡谷，还有希约克（Shayok）河从喀喇昆仑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流过。这一地区呈现出高山与低谷交错的山区地形，以下便是汗·塔希尔·海利博士（Dr. R. A. Khan Tahir Kheli）对此所作的精彩描述。

地质史

汗·塔希尔·海利博士写道：“中亚最重要的三条山脉，即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喀喇昆仑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在此相会。在这三条山脉之中，喀喇昆仑山脉的大部分在巴基斯坦境内，形成了分别连接东边的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西边的兴都库什和西北边的帕米尔的链条。帕米尔山结在中亚的山系中占有特殊地位。在这个地区的地理形成中，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都发端于北面的帕米尔，中亚的多数山脉都是从帕米尔向东或向西分叉出去的，其中

比较重要的山脉有昆仑山脉、阿赖山脉和天山山脉，这些山脉又向东在中国的南部和中部，向西在阿富汗和伊朗的北部和中部分出许许多多的支脉。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和青藏高原一样，不直接与帕米尔相连。而慕士塔格山、昆仑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从帕米尔分出来后，呈东南走向与东边的喜马拉雅山脉和西藏高原相连。从地质学上来说，喜马拉雅山脉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北部边线是由主要的地幔冲断层划出的，从地理学上讲是由科希斯坦板块划出的——这被认为是在巴基斯坦北部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地理、地质单位。喜马拉雅山脉的这一部分形成了巴基斯坦北部的山峰，也形成了克什米尔和哈扎拉（Hazara）的山脉，还包括印度河对面的斯瓦特（Swat）和白沙瓦河谷东部延伸部分的山峰。外喜马拉雅在这个地带的南面，它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主要部分位于波特瓦尔（Potohar）高原和莫里（Murree）山地的基础之上……南迦帕尔巴特—哈尔毛希（Nanga Parbat-Harmosh）山脉呈环形向南延伸，在吉拉斯（Chilas）西部上方被印度河的大弯截断，形成了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在巴基斯坦境内西北走向的延伸。向南，它连接起克什米尔和哈扎拉的亚喜马拉雅山脉。向北和西北，它与拉达克山脉、次喀喇昆仑山脉相连，形成大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主山脉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世界第三高峰，南迦帕尔巴特峰海拔 8190 米，①使得大喜马拉雅的这一部分显得尤为显眼。”[7] 汗·塔希尔·海利博士认为，索尔拉斯布尔（Sor Laspur）—马斯图季（Mastuj）—博罗吉尔（Borogil）的侧面划出了喀喇昆仑山脉的西部界线，他举出吉泽尔河（Ghizar，属喀喇昆仑）与亚尔亨/马斯图季河（Yarkum/ Mastuj river，属兴都库什）的分流来支持这种观点。除世界第二高峰 K2（即乔戈里峰——译者）外，喀喇昆仑山脉的三十多座山峰中还有 12 座海拔超过 7500 米，其中最著名的有迦雪布鲁姆（Gasherbrum）、玛谢尔布鲁姆（Masherbrum）、巴尔托洛（Baltoro）和拉卡波希（Rakaposhi）峰群。喀喇昆仑山脉还有一些除极地冰川之外最大的冰川，如：62 公里长的比亚福（Biafo）冰川，61 公里长的希斯帕尔（Hispar）冰川，58 公里

① 原文如此，据查应为 8125 米。——译者

长的巴尔托洛冰川，38 公里长的迦雪布鲁姆冰川，38 公里长的乔戈隆玛（Chogo Lungma）冰川，72 公里长的锡亚琴（Siachen）冰川，58 公里长的巴托拉（Batura）冰川，等等。如果要比较山脉的冰川覆盖率，那喀喇昆仑山脉的冰川覆盖率是 23% ~25%，喜马拉雅山脉是 8% ~10%，阿尔卑斯山只有 2. 2%。兴都库什山系发源于帕米尔西侧，向西南穿过奇特拉尔（Chitrar）和迪尔（Dir）。德兰萨拉依（Transalai）山脉划定了兴都库什的西部边界，而均处在印度河以西的马拉坎德（Malakand）、斯瓦比（Swabi）和阿托克—吉拉特（Attock-Chirat）山脉在亚喜马拉雅和兴都库什之间划出了一条尚不确定的界线。位于奇特拉尔的海拔 8736 米①的蒂里奇米尔峰（Tirich Mir）是兴都库什山系的最高峰。[8]

一种新的理论对这一地区的地质史作了很好的概述，它在全球构造的背景下提供了科希斯坦及与之相联系的缝合地带的一种新的构造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存在着两条表现为巨横推断层的缝合地带：一条沿科希斯坦岛的北部边界延伸，即马切罗—格舒巴—希尼—杰尔特—亚辛—德罗希（Machelu-Kashupa-Hini-Chalt-Yasin-Drosh）；另一条新近被人分辨出来，是围绕科希斯坦南部边缘，与印度地台相接的主要地幔冲断层……继印度—巴基斯坦和欧亚大陆板块之间的科希斯坦弧形列岛的演化之后，第一次重大的地质构造事件发生在大约 6000 ~7000 万年前，印度—巴基斯坦板块潜没于科希斯坦弧形列岛之下。而后来的一次地质演变则完全填没了这一地区的蒂锡斯海，将同样在欧亚大陆之下的科希斯坦岛夹在中间。相撞导致的缝合在南北地表留下了两处突出的烙印，它们标示出了科希斯坦分别在何处与两块大陆相接。根据莫尔纳（Molnar）和塔朋尼尔（Tapponnier）的理论，印度板块融合进欧亚板块之后，应力在推力之下将印度板块从原来的欧亚板块以下 600 公里推进到了 700 公里，从而形成了喜马拉雅、西藏和中国南部地区垂直厚度达数千米的岩层，而且这种变形还在以每年 4 厘米的速度继续。[9]用地理学术语来说，科希斯坦位于东经 71°—76°、北纬

① 原文如此，应为海拔 7487 米。——译者

34°30′—36°30′之间。哈扎拉、迪亚玛尔（Diamar）、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分别围绕在它的南面、东面、北面和西面。[10]从地质学的角度说，在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兴都库什的岩石连接的顺序方面，科希斯坦是一个独特的区域。厚厚的钙—碱性套层，在构造上取代了变质沉积层、酸性物质和其间的岩浆，它的南北两面被两条缝合带包围，使得这一地带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地质区域。[11]

地理构成

在地理、气候和生态方面，北部地区主要表现出横跨喜马拉雅地区的特征，它不具有喜马拉雅坡面的气候特点，几乎完全没有季风雨和平原的季节。它的主要部分在喜马拉雅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的分水线内，惟有更为邻近克什米尔的南面在喜马拉雅山系之中。这一片土地就在海拔300 英尺到28750 英尺不等的高耸入云的山脉、白雪皑皑的冰峰和狭窄的河谷之中。在这个地区的主要城市吉尔吉特方圆60 英里的范围内，就有二十多座海拔18000 ~ 26000 英尺的高峰。这里的气候是冬天极为寒冷，夏天则比较温和。北部地区不同于喜马拉雅地区的其他部分，因为它位于通往中国、印度、中亚和西方国家的最便捷的通道上，因此它具有重要的地理、政治意义。而这一地区又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它自身又分成了许多更小的部分，分布于不同的山谷、高地、高原和山脉顶部。从学术上讲，如果没有这些地理特征使它与某一地区成为一统，那它就是一个孤立的地方。也许印度河曾一度是交流和统一的大干线，但大山的障碍还是使人们难以沿河而居。除斯卡杜（Skardu）和吉拉斯等极少数几个地方之外，沿印度河岸栖居显得困难重重。人们坚守在较小的山谷和山坡地带，因为这些地方比较容易得到融化的雪水来饮用和灌溉。由于可居住和可耕种的土地极为稀少，人们的生活更多地依赖于林间放牧、果树栽培、狩猎和四处劫掠，因此人们在这里的生存成了一场充满危险的游戏，适者生存是正常不过的规则。这里的人们十分坚韧、粗犷，倾向于在

严峻的气候条件中保持独立的品性。他们在山上筑起堡垒保护自己，建造自足的山中家园。村社是封闭的，为了生存，村社之间经常发生公开的对抗。而相邻区域之间的亲密关系给这个地区的政治地理留下了深刻影响。人们普遍认为邦国的成立是一桩关乎社区管理的事情。尽管西部山谷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保留着这些特征，但周边的政治势力还是引入了由入侵的外来统治王朝控制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这些入侵的统治王朝力图通过双边战争和操纵周边更大国家的势力来扩张自己的统治。正是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特殊作用，才使得这片土地在亚洲政治的国际游戏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它的历史地理超出了跨喜马拉雅地区的范围。

地理位置

北部地区面积约27188平方英里，据1981年的人口普查，当地人口约573724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21人。它位于东经71°—75°、北纬32°—37°之间。现在整个地区由驻吉尔吉特的一名专员管理，他直接受控于巴基斯坦政府克什米尔事务和北部地区部。出于行政目的，这一地区划分成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和迪亚玛尔三个县（District），分别由一位副专员掌管。1972年，所有老的自治土邦和政治管区（Political District）全部合并到这三个新成立的县之内。三个县的首府分别为吉尔吉特、斯卡杜和吉拉斯。在这次合并前，已经有了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两个特区（Agency）。吉尔吉特特区包括罕萨（Hunza）、纳格尔（Nagar）两个自治土邦，伊希戈曼（Ishkoman）、亚辛（Yasin）、布尼亚尔（Punial）和戈赫—吉泽尔（Koh-i-Ghizar[①]）三个政治管区，吉拉斯分区（Subdivision），以及达丽罗（Darel）和丹吉

① 按波斯语词法结构，意为“吉泽尔山”，但本书名词索引及书内还有Koh Ghizar、Koh-Ghizar、Kuh-Gizar等多种拼法，本书地图标为Koh Ghizar，本书第三章又将Kuh和Ghizar分称两处，另奥雷尔·斯坦因著《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亦将其分指两处，现将两者并列之处译为“戈赫—吉泽尔”。——译者

尔（Tangir）部落区。吉拉斯分区从阿斯托尔（Astor）河与印度河的交汇处一直延续到印度河右岸的塞奥（Seo）和左岸的贾尔戈德（Jalkot）。今天，吉拉斯的西部边界限定在印度河上的夏迪亚尔（Shatial）桥，界限以外的地域并入了西北边境省的科希斯坦县（Kohistan District）。科希斯坦实际上就是英国殖民时期的亚吉斯坦（Yaghistan①），那里几乎感受不到英国统治的存在。吉尔吉特县在西部与现在西北边境省的奇特拉尔县交界，东面与中国在星峡尔（Shimshal）山口和红其拉甫（Khunjerab）山口处接壤，北面与阿富汗的瓦罕省毗邻，而北部边界的最高点明铁盖山口（4715 米）则是阿富汗、苏联、中国和巴基斯坦四国的交会处。巴尔蒂斯坦（Baltistan）被穆斯林称为小西藏（Tibet-i-Khord，见下文）。起先，它由七个区域组成，即隆多（Rondu）、斯卡杜、希格尔（Shigar）、基里斯（Kiris）、哈伯罗（Khaplu）、图尔迪（Tolti）和克尔门（Kharmang），它们各自有着半自主的罗阇（Raja）或自治的统治者。1947 年，格尔吉尔（Kargil）和拉达克两个区（Tehsil）也划入了巴尔蒂斯坦，但根据 1948 年与印度签订的停火协议，它们又脱离了巴尔蒂斯坦的控制。巴尔蒂斯坦特区，由原先拉达克县的斯卡杜区、格尔吉尔区的 34 个村庄和古雷兹小区（Gurez Sub-tehsil）组成。1948 年 11 月，巴基斯坦政府接管了巴尔蒂斯坦的行政管理，在斯卡杜派驻了一名附属政治代表（Additional Political Agent），由吉尔吉特政治代表全权控制。从 1961 年起，斯卡杜的附属政治代表开始直接负责当地事务。1964 年 1 月，巴尔蒂斯坦附属特区（Additional Agency）正式升级为完全的特区，由一名政治代表领导。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 1972 年巴尔蒂斯坦成为由一位副专员管理的一个县（District）为止。[12]

---

① Yaghi 为波斯语词，意为“叛逆者”，Yaghistan 即“叛逆者之邦”，指无人能够管辖的地区。——译者

现在边界的形成

从历史与文化上来看，人们一直认为科希斯坦县的大部分属于北部地区。直至20世纪初，大概在英国殖民者的纵容之下，斯瓦特的统治者向印度河西岸发动突袭，甚至向甘迪亚（Kandia）河谷挺进，企图在该地区建立其统治。但即使在当时，印度河东岸也仍然是一个Yaghistan（无人管理的地区）。这一点可以在下文所引的1913年第381号信[13]中得到证实，这是驻克什米尔的特别代表（Resident）S. M. 弗雷泽（S. M. Fraser）写给白沙瓦的首席专员、中校乔治·鲁斯·凯佩尔（George Roose-Keppel）爵士的，所署日期为1913年2月24日。

> ……如你所知，贾尔戈德人是一个科希斯坦部落，他们占据着印度河上的一个峡谷，这个峡谷位于吉拉斯西南，哈扎拉县卡甘（Kaghan）的西面。他们的领土是独立的，但其政治关系，自这种关系存在以来，主要是归属于吉尔吉特特区的……而且，既然从地理位置、种族、语言和对外交流等方面，贾尔戈德都可以很自然地归入吉尔吉特特区的范围，那么它归属吉拉斯当局在政治上就是有利的。我想，这将会得到大家的认同。

这种状况在另一封信件[14] No. Y 103/27 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是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于1928年1月12日写给印度边界问题调查局局长C. P. 冈特（C. P. Gunter）上校的，他在信中写道：

> 属于吉尔吉特特区管辖范围的领土可分为三类，即：

1. 克什米尔土邦的领土，也就是吉尔吉特瓦扎拉特（Wazarat①），包括吉尔吉特区（含本吉，Bunji）及阿斯托尔的尼阿巴特（Niabat）；

2. 政治管区（Political District），也就是罕萨、纳格尔、布尼亚尔、亚辛、戈赫—吉泽尔、伊希戈曼和吉拉斯共和国（Republic of Chilas）；

3. 未被管辖的区域，即达丽罗、丹吉尔、甘迪亚或基里（Killi）、贯尔戈德、沙津（Sazin）、夏迪亚尔和哈尔班（Harban）。

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47年，甚至到1950年科希斯坦县成立，这个地区才从吉尔吉特特区分离出去。直到今天，中国人在印度河上修建的塔科特大桥仍是通往喀喇昆仑高速公路的一道大门。

至于沿吉泽尔河直至奇特拉尔的边界，这些亚兴都库什地区之间一向都有着历史与文化的联系。而另一方面，又如 H. C. 汤姆森（H. C. Thomsen）[15]所说，“巴乔尔（Bajaur）人和受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Mehtar②）控制的部落之间没有共同之处，他们在种族、情操和个性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历史将奇特拉尔和吉尔吉特联系在一起。G. 罗伯逊（G. Robertson）很好地概括了上世纪的状况，“当他（Amanul Mulk，阿曼乌尔·穆尔克，奇特拉尔的大迈赫塔尔）1892年去世的时候，他已经从下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的小儿子，成为拥有整个山中王国的迈赫塔尔，他的王国沿着兴都库什的南面，起自吉尔吉特边界，到库纳尔（Kunar）河谷的卡菲里斯坦（Kafiristan），直至阿斯玛尔（Asmar）边境，他还实际掌管着达丽罗、丹吉尔和卡菲里斯坦东部”。[16]随后的章节[17]将会谈到奇特拉尔的格多尔（Kator）家族和亚

① 阿拉伯语/乌尔都语词，本意指大臣（部长）之职位，现多用于指政府之“部”，但此处系行政区划单位的名称，相当于县。Wazarat 的长官的职位，本书作 Wazir Wazarat 或 Wazir-i-Wazarat，汉译作“瓦齐尔瓦扎拉特”，或作“瓦扎拉特的瓦齐尔”，相当于县长。——译者

② 波斯语/乌尔都语词，有族长、长者、伟人之意，此处为当地统治者之称号。——译者

辛的胡什瓦格特（Khushvakat）家族之间关系的全部历史，也会谈及克什米尔摩诃罗阇是如何介入他们的事务的。后来，英国出于其边境政策和想要划出一条边界的考虑，干预了奇特拉尔的地方政治。[18]印度政府外交部于1892年10月19日写给印度国务秘书的信中[19]很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意图。另一封第161号信中又建议，“现在可以很顺利地将奇特拉尔直到欣杜尔（Shandur）山口和达尔科特（Darkot）山口的管理权从吉尔吉特特区分离出去”。随着马拉坎德特区的成立，这个提议得以实现，奇特拉尔的事务最终交由马拉坎德特区管理。从那时起，奇特拉尔就与边疆连接起来了，戈赫—吉泽尔直到欣杜尔山口成了吉尔吉特特区在这边的边界。

19世纪，英俄为争夺在帕米尔以南兴都库什地区的势力范围进行了对抗，北部边界就是这次对抗的结果。它的形成有赖于一条普遍的政策，罗伯逊说得好：“坚持建立缓冲国的念头深深扎根在英国外交部门的心中，不管是伦敦的外交机构还是驻印度的外交部均是如此，而印度边界当局却根深蒂固地想要通过建立次一级的缓冲邦来改进这个备受重视的体制。”[20]因为英、俄垂涎于此地，而中国、阿富汗在该地区的势力日趋衰落，该地区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英、俄两大势力都试图直接对付阿富汗。英俄之间为争夺对喀布尔的艾米尔（Amir①）朝廷的控制而爆发了第一次战争（1838—1842年）。这次战争以该地区英军的第一次挫败而告终。但是，作为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爵士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东印度公司的约翰·伍德（John Wood），在1836至1838年间就曾率先考察了帕米尔地区，其目的是探寻乌浒河的起源。正是这一次旅程，第一次带回了有关该地区地理与政治状况的真实信息。[21]它导致了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发现。古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和阿富汗、帕米尔南部、奇特拉尔北部地区的一条小小的走廊，这一狭窄地带后来被称作瓦罕（Wakhan），那里居住着吉尔吉斯游牧民族。后来的考察表明，巴达克山（Badakhshan）、罕萨和奇特拉尔的米尔（Mir②）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说，罕萨和奇特拉

① 阿拉伯语，对统治者或国君的称号。亦用于指宗教首领。——译者

② Amir的缩写形式，此处亦为当地统治者的称号。——译者

尔的米尔要向巴达克山的统治者进贡。瓦罕世袭的酋长，米尔法塔赫·阿里·沙（Fatteh Ali Shah）也效忠于巴达克山的统治者。[22]后来，阿富汗的艾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Abdur Rahman）征服了巴达克山和它的阿姆河属地锡格楠（Shignan）和达尔瓦兹（Darwaz），还控制了瓦罕。瓦罕的统治者阿里·马尔丹·沙（Ali Mardan Shah）逃亡到了奇特拉尔。艾米尔直接向帕米尔高原挺进，一直抵达亚什克湖（Yashik Kul）。[23]英俄委员会最终划定了俄国、阿富汗、英属印度帝国和中国的边界。瓦罕走廊和帕米尔高原阿富汗境内部分被划为“中立地区”，或是世界三大强国之间的缓冲地带。瓦罕的一个狭窄地区归阿富汗的艾米尔统治，[24]这个地区包括帕米尔和乌浒河南面的地带，那是汗杜德（Khandud）、班加堡（Qila-i-Panja），博扎伊贡巴兹（Buza-i-Gumbaz）村庄所在的地方——所有这些村庄都在大帕米尔和小帕米尔的范围之内，由萨尔哈德（Sarhad）河与瓦赫吉尔（Wakhjir）河将其连接。历史上，博罗吉尔山口是主要的通道（Dar①），它打开了一条通往亚辛和更南的地区的通道。东端是明铁盖山口。

然而，这种分法并没有确定好罕萨的米尔的权力范围，他依然控制着塔什库尔干地区明铁盖以外的地方，A. H. 麦克马洪（A. H. MacMahon）[25]对他的实际掌控范围描述如下：

“从塔克墩巴什（Tagdumbas）到帕米尔的北部分水线，从瓦赫吉尔（Wakhijir）山口经过帕依克峰（Payik）到达夫达尔（Dafdar）以上一英里的伊里吉尔加（Ilijilga），从那里穿过河流到达赞甘河（Zankan nullah），再经过麻扎（Mazar②），翻过山脉到达乌罗克（Urok），乌罗克是西卜贾伊达（Sibjaida）和伊塔克杜罗格（Itakturuk）之间的叶尔羌（Yarkand）河上的一点。然后，再沿热斯喀木（Raskam）河谷的北部分水线到达巴扎尔达拉河（Bazar Dara）与叶尔羌河的交汇处。从那里再向南，越过高山，离开罕萨境内的阿吉尔大坂（Aghil Dewan）和阿吉尔山口（Aghil Pass），到达穆斯塔格（Mustagh）河。”

---

① 波斯语，意为门、山口。——译者

② 阿拉伯语，意为“圣地”、“圣徒墓”，主要指伊斯兰教显贵和著名传教士的陵墓，亦常成为地名。——译者

他们这位权威还描述了罕萨的这些权利的起源：……他们首次与中国打交道是在罕萨首领沙·萨利姆·汗（Shah Salim Khan）一世时期，沙·萨利姆·汗一世是阿叶舒（Ayesho）之子（现任首领是阿叶舒的第八世孙），阿叶舒曾打败过塔克墩巴什的吉尔吉斯人，并将他们一直追到了塔什库尔干。为庆祝这次胜利，沙·萨利姆·汗在达夫达尔立了一个纪念石碑，并将战利品——吉尔吉斯首领的头颅送往中国，以此表明，罕萨的疆域从此拓展到了达夫达尔。作为回应，中国也回赠了礼物，而罕萨又以金砂作为答谢——互赠年礼的习俗由此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从那时起，坎巨提（Kanjut，即罕萨——译者）人每年都向塔克墩巴什和热斯喀木的吉尔吉斯人征收实物税，只有1865年—1878年间阿古柏伯克统治突厥斯坦时期例外。多年前，在现任米尔之父米尔·迦曾·汗（Mir Ghazan Khan）时期（据我所知约在1885年），塔什库尔干的萨里科尔人拒绝向罕萨缴纳贡税，并争辩说塔什库尔干不在他的统治范围之内。汉人道台，也即当时的喀什噶尔道台亲自平息了这场纷争。他规定，罕萨的势力范围遍布塔克墩巴什和红其拉甫帕米尔，直至达夫达尔，这份合约是由他本人和萨里科尔的头人签订生效的。这份文件声称，罕萨的北部边界曾被记录作西里迦塔希（Sirightash），这是靠近伊里吉尔加（Ilijilga）的一道干涸的河床，这条边界及其他的边界在历史上都有适时的记载。

1914年1025号信件，[26]是吉尔吉特的政治代表、陆军少校A. D. 麦克弗森（A. D. Macpherson）于该年4月10日写给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的，信中提到，经过与米尔的数年谈判之后，中国人，即喀什噶尔的道台和叶尔羌的安班终于承认了罕萨对热斯喀木的占有权。叶尔羌安班拟订了一份正式协议，将热斯喀木的某些特定的地方留给米尔，协议中提出的最重要的交换条件是：米尔每年要向中国交纳贡银，并承认中国政府对其臣民的管辖权。协议还禁止坎巨提人建造任何形式的防御工事。租借给米尔的范围具体划定如下：

“热斯喀木河西岸的奥伊图格拉克（Oitughrak）、古克塔什（Kuktash）、吾甫浪（Ophrang）、乌鲁克罗克（Uruklok）、伊里克苏（Iliksue），以及东岸的阿兹迦尔（Azghar）和乌尔苏尔（Ursur）。”

甚至在1891年罕萨遭到英国的铁蹄践踏之后，这种状况依然不曾改变。英国对于罕萨和中国之间互赠礼物愤恨不已，他们提出归还土地给罕萨人，条件是罕萨不再与中国互赠礼物。作为回应，1937年4月5日，罕萨的米尔穆罕默德·纳齐姆·汗（Muhammad Nazim Khan）爵士致信[27]吉尔吉特政治代表：

> 我满怀欣喜地承诺，我将终止与中国交换年礼，并将放弃所有既得的权利，比如在基拉克（Kilak①）和明铁盖以外地区的放牧权，在塔克墩巴什的放牧税收权，以及在热斯喀木的耕种权……
>
> 作为罕萨的米尔，我的年津贴增加了3000卢比，对此我深表谢意。贵国允诺，只要印度政府和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摩诃罗阇殿下在关于吉尔吉特分区的关系上达成的协议继续有效，还允许在布格洛特（Bugrot）河划出一块封地（Jagir），对此我也深表感激。

I. 穆勒·斯特里奇（I. Muller Stellrecht）博士[28]对罕萨与中国的全部关系作了全面彻底的调查，她将两者之间的关系称为“纳贡的关系”，这种关系贯穿始终。她总结道：“直到1946年，情况一直如此，只在东突厥斯坦发生政治危机时才有过中断。1963年巴基斯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中国才最终放弃其宗主权。中国放弃所有在巴基斯坦境内的领土权，巴基斯坦也同样放弃从英国手中继承过来的在中国边境的领土权。”

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这一协定于1963年3月2日签订，包括以下条款：②

“双方确定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之间相接壤的全部边界线走向如下：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基里克（Kilik）。——译者

② 译文参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双边关系重要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6—17页。——译者。

“（1）自西北端的5630米高地（参考坐标大约为东经74°34′、北纬37°03′的一个山峰）起，边界线严格沿流入塔里木河水系的塔什科老干河[①]诸支流为一方、流入印度河水系的洪札河诸支流为另一方的大分水岭，大体向东转东南行，穿过基里克达坂（Daban / Dawan）、明铁盖达坂（山口），卡前乃达坂（Kharchanai Daban，仅中方图上有此名），并且穿过木子吉里阿达坂（Mutsjilga Daban，仅中方图上有此名）、帕尔皮克山口（Parpik Pass，仅巴方图上有此名），直到红其拉甫（尤特尔，Yutr）达坂（山口）。

“（2）边界线穿过红其拉甫（尤特尔）达坂（山口）之后，沿上述大分水岭大体南行，直到该达坂（山口）以南的一个峰顶；然后离开大分水岭，转沿一条大体东南向的山脊而行；该山脊系以阿克吉勒尕河（Akjilga River，巴方图上的一条相当的无名小河）为一方、塔克墩巴什河（吾甫浪河）和克里满河（吾甫浪吉勒尕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根据中方图，边界线到此山脊东南端后，系沿克里满河（Keliman Su）的一小段河床中心线而行，然后到该河与克勒青（Kelechin）河汇合处；根据巴方图，边界线离此山脊东南端后，即连接什克斯干（Shaksgam）河或穆斯塔格河的锐角弯曲处。

“（3）从上述地点起，边界线溯克勒青河（什克斯干河或穆斯塔格河）的河床中心线而上，至其与肖尔布拉克代牙（Shorbulak Daria，星峡尔河或布拉尔杜河）的汇合处（参考坐标大约为东经76°02′、北纬36°26′）。

“（4）从上述两河的汇合处起，根据中方图，边界线升上一条支脉的山脊，顺山脊而行，在一个峰顶（参考坐标大约为东经75°54′、北纬36°15′）接喀喇昆仑山脉大分水岭，该图标明此峰顶属肖尔布拉克山；根据巴方图，边界线从上述两河的汇合处起，升上相应的支脉，沿其山脊穿过6520米（21390英尺）高地，直到约东经75°57′、北纬36°03′接喀喇昆仑山脉大分水岭。

“（5）自此，边界线严格沿划分塔里木河水系和印度河水系的喀喇

① 今译塔什库尔干河，下文“洪札河”即罕萨河。——译者

昆仑山脉大分水岭大体先向南后向东行，穿过东木斯塔山口（东穆斯塔山口）、乔戈里峰（K2）的峰顶、布洛阿特峰（Broad Peak）的峰顶、迦舒尔布鲁木山（8068）的山顶、因地拉科里山口（Indirakoli Pass，仅中方图上有此名）和特拉木坎力峰（Teram Kangri Peak）的峰顶，至东南端终点喀喇昆仑山口。”

地理特点

从边疆到内地，这片土地都呈现出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在近代地理史上保持稳定。正是这种固有的自然特性决定了人类的文化构造。因为人类历史是人类对固有自然条件的反映，而正是这些自然条件决定了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人类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谱写了自己的奋斗史。因此，理解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将为理解人类的历史铺平道路。

南部的通道和山口

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一是自外界通往这个神秘的地方的通道和山口；二是其内部分为小小的山谷、高原和被群山围绕的亚地带，它们给小型社区、部落和土邦提供食物给养，且有利于改进当地人的行为模式，培养他们更强的交流意识与合作意识。人类的相互关系要达到这样比较高级的阶段，从来都不能依赖简单地对当地难以克服的自然条件被动地作出反应。换言之，这种高度制度化的人际关系一旦建立，它就必定是人类联合组织起来，突破自然条件的障碍和阻力，通过史无前例的活动来奋力开拓人类合作之路的结果。如喀喇昆仑高速公路的建成，就为未来人类的合作交流开创了光明的前景。同样，如果将来印度河的水力能被用来造福于当地人民，那这一地区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主要风景不仅有印度河及其支流，还有连绵不断的山峦。起伏的山峦划出了这片土地与天相接的优美曲线。整个

北部地区主要是跨克什米尔高地，在那里，巍巍群山和幽幽深谷交错相连，只有1948年划定的停火线处例外。两个传统的山口打开了从克什米尔到北部地区的通道，一个是西北方的德拉格巴尔（Tragbal）山口，它通往经阿斯托尔至吉尔吉特的吉尔吉特运输大道；另一个是德拉斯（Dras）山口，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它的拉达克语名称：祖吉山口（Zoji-La），它打开了通向格尔吉尔和斯卡杜的通道。吉尔吉特运输大道起自现属印占克什米尔的古雷兹，到现属巴基斯坦的卡姆里（Kamri）山口，再到拉多（Rattu）及其以外的阿斯托尔。从拉多，人们也可以直接经过雄塔尔（Shuntar）山口到达盖尔（Kel）和自由克什米尔的沙尔迪（Shardi）。在东北边，德拉斯和格尔吉尔都在印度占领的范围之内。控制线在巴基斯坦这边延伸到了古尔德里（Gultari）和奥尔丁（Olding）以外的地方。苏罗（Suru）河与印度河交汇处的重要的马罗尔（Marol）桥在巴基斯坦的控制中。

在这两条通道之间的是自南迦帕尔巴特绵延至拉达克的嫩贡山（Nunkun）的主山脉。弗雷德里克·德鲁（Frederic Drew）[29]对它作了很好的描述：

“从一大片山地（南迦帕尔巴特或迪亚米尔是其中的一部分）开始，我们发现了山脉和尖坡（Spur），其中有许多山峰的海拔高度超过了20000英尺，最高峰（它有名字）高达26629英尺。它并非处在印度河与杰卢姆（Jhelum）河的分水线上，而是分隔阿斯托尔河与吉拉斯河的支系山脉的一部分，阿斯托尔河和吉拉斯河在相距不远的地方注入印度河。这个突出的高峰属于一条极高的山脉，这条山脉有10英里长的地方海拔高度超过22000英尺，它的东面和南面形成一堵巨大的悬崖或绝壁，高度从6000英尺到10000英尺不等，大部分都被冰雪覆盖。这条山脉有许多这样的悬崖。从最高点开始，呈放射状地分布着巨大的支撑山峰。巨大的冰川从这里发源……南迦帕尔巴特山脉的南部成为印度河与杰卢姆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将流入阿斯托尔河的水与注入吉申甘加（Kishanganga）河的水分隔开来。南迦帕尔巴特山脉的这一部分海拔20000英尺，两面都有冰川。从这里开始，这条山脉大致呈东南走向，笔直地绵延约120英里。这条山脉有好几个可以

通过的隘口。人们常走的两条连接吉申甘加河和阿斯托尔河的道路，越过海拔13200和13500英尺的山口，其中更东端的山口是从以前的河谷通往德拉斯河流域的……此外，还有一个不太险要的隘口，将吉申甘加峡谷的蒂莱尔（Tilel）支谷和德拉斯直接连起来。这个隘口以南数英里，是一大片群山的支系山脉，它构成了克什米尔的北部边界。再向东南数英里，又有一峡谷，那是印度河与奇纳布（Chenab）河和杰卢姆河流域之间的最低的通道，从奇纳布河的东部源头到杰卢姆河的卡甘（Khaghan）支流的源头，绵延300英里。西藏人和拉达克人称之为Zoji-La（祖吉山口），其他人则普遍地称其为德拉斯山口。”

德沃萨依高原

在以上所说的从克什米尔到北部地区的两条路线之间，有一个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带，即德沃萨依（Deosai）高原，这是“一片高地，更高的山峦从四周环绕着它。其中心距斯卡杜25英里，而最近的边界离此处仅10英里。山上流下来的水汇成的河流大致呈环形围绕着这片土地。其直径，从一个山顶到另一个山顶的距离大约是25英里。四周的山峦高16000到17000英尺不等，形成了一道参差起伏的锯齿状屏障，守护着这块平坦的（虽说不是完全平坦的）土地。这块土地大部分是高原，间有低于四周数百英尺的平坦的峡谷。”这个地区的流水都汇集到中央地带，所有的溪流都交汇在一起，经由一条名叫希格尔（Shigar①）的溪流通过东南山角的一个口子流向外面。这条小河流入德拉斯河，最后汇入印度河。山谷中充满了从山上淌下的溪水及其沉积物，当肃杀的季节来临，就会形成冰川，这时，连接山谷和中间的平地的峡谷就会被冰川阻隔，这片土地便被封闭起来了。[30]克什米尔与斯卡杜之间最繁忙的路线就在这片高原上，1889年，杜兰（Durand）曾走过这条路线。他写道：“德沃萨依高原是一个宽约40英里的巨大的盆地，平均高度为12000英尺，周围是一圈比它高3000至4000英尺

---

① 与下文的希格尔河谷同名，德沃萨依的希格尔河往往与欣库（Shangu）河合称希格尔欣库或欣库希格尔。——译者

的雪山。它被从主山脉向许多宽阔而平浅的峡谷延伸的起伏的尖坡截断，峡谷中流淌着湍急的溪水。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尚早，虽说这儿一丛、那儿一簇地长出了青草，鲜花也星星点点地盛开了，但整个草场还没有完全长好，景色显得有些荒凉。数英里之内，一片荒芜，赤裸裸的平地上见不到树木，只有这里那里的一小丛稀稀拉拉的矮小的刺柏。后来，当青草茂盛起来，那里又成为了人们喜爱的牧场……生活在那里的动物只有旱獭。"[31]今天，穿越德沃萨依高原通往斯卡杜的路线是：自阿斯托尔山口出发，经过古达伊（Gudai）、吉里姆（Chilim），查克诺克（Chacnok）山口、巴拉巴尼（Barapani），阿尔马立克（Al Malik）山口，抵达邻近斯卡杜的萨德巴拉（Satpara）湖。从阿斯托尔还有另外两条路线通往斯卡杜。阿斯托尔的对面是洛斯（Los），然后是巴里希恩（Parishin）。从巴里希恩有两条路线通往斯卡杜，一条经过谢迦尔特姆（Shegartham），另一条途经泰拉罗（Theraro）。

阿斯托尔

阿斯托尔是吉拉斯县（District）的一个区（Tehsil）的首府。那里有一个大巴扎①，位于老罗阇的古老而残破的堡垒旁边，该堡垒后来被锡克人占领。在这个巴扎中有一个大清真寺，它新近被扩建了。在靠近清真寺的地方，在它的西北面，是一个名叫苏丹·巴巴的老皮尔（Pir②）的麻扎。现在这里是一派凋敝的景象。阿斯托尔因出产孜然、杏仁、胡桃、苹果、松子和草药而闻名。从阿斯托尔通往戈尔戈德（Gorkot）的公路向南6英里，过河便是巴古里达斯（Pakuridas）村，有两条河流在这里汇合，一条是来自重要的布尔济尔（Burzil）山口的布尔济尔河，另一条是来自拉多的拉多河。阿斯托尔河即由它们汇合而成。德鲁[32]对此描述道：

"阿斯托尔村坐落在山谷的西边，成为连接从南迦帕尔巴特山脉下

---

① 波斯语 Bazar 的音译，意即"市场"。——译者

② 波斯语词，原意为"长者"，对伊斯兰教苏菲派宗教导师的尊称。——译者

来的一条支系山谷的枢纽。它在一个冲积高原的残余部分上，高于主河道约500英尺。这个地方过去是一位达尔德罗阇的邸宅，现在成了摩诃罗阇军队的驻地，是吉尔吉特旅的总兵站……阿斯托尔及其方圆数英里之内的山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谷底非常狭窄，河流恰好夹在从两边的崇山峻岭延伸下来的大尖坡的终端之间。该地耕地很少，且多在高于谷底数百英尺的地方。两边都是山，有的地方是悬崖峭壁，有的地方表面平坦，上面杂草丛生，还零星地长着一丛丛的铅笔柏（Pencil Cedar）。背阴处还有一小簇一小簇的乔松（*pinus excelsa*），形成了一层薄薄的植被。再往上，一般是高高的岩石和雪峰。”

阿斯托尔的不远处是美丽的罗摩（Rama）湖，从那里，人们可以欣赏到南迦帕尔巴特的优美景色。当杜兰[33]越过阿斯托尔山谷前往吉尔吉特的时候，所走的路线就是沿着险峻的高山向上攀登。现在，整条线路都已改变。从阿斯托尔通往哈尔久（Harcho）的公路在一处较低的路段已经被拓宽了，今后将继续被拓宽。下一个地方是吉格达斯（Chikdas），达什金（Dashkin）这个古老的村庄就坐落在它的顶部，人们认为这里有着古迹遗留。在吉格达斯，人们可以通过一座桥来跨越阿斯托尔河，也可以步行前往隆多。这条路从吉格达斯出发，通往穆什金（Mushkin），然后抵达多依央（Doian）。穆什金的顶部有一大片森林。从多依央有一道斜坡通往印度河河谷。杜兰对此作了精彩的描述：

“我们来到了约11000英尺高的营地，在那里见到了极佳的景色。营地位于一个尖坡上，这个尖坡是印度河与阿斯托尔河的分水岭，一整圈平均高度约20000英尺的雪峰环绕着它。从山顶放眼望去，最美的景色处在高于我们营地几千英尺的地方，我想这在兴都库什范围内绝对是最美的，也许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屈指可数的。向下，正在我们脚下9000英尺处的峡谷中，印度河在哗哗地流淌。这种深度和比例在山区地貌中是极为罕见的。在南边，从我们的立足点延伸出来的坡地上隆起一大片山地，荒凉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大的南迦帕尔巴特山脉和13000英尺高的雪地和冰川；东边，雄伟的山峰连绵不断，一座高过一座，直到与兴都库什的主脉相连，在我们眼前拉开了一条不曾

中断的线；而西边，兴都拉杰（Hindu Raj）耸立于印度河上，它的后面是奇特拉尔和帕坦科希斯坦（Pathan Kohistan）的雪峰。”

再往前，就向下来到了海拔6000英尺的哈杜皮尔（Hattu Pir），它距罗摩卡特（Ramghat）桥或谢丹（Shaitan）河约5英里。罗摩卡特在当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方，它是联系吉尔吉特和阿斯托尔的早期交通线。但现在的路线沿阿斯托尔河右岸上行至本吉。数年前，连接本吉和吉尔吉特的是普拉塔普（Pratap）桥，但现在已经修建了一座新桥来连接本吉和贾格劳特（Jaglot），然后再通往吉尔吉特。

本吉

今天的本吉平原是一片开阔而荒芜的地方，它从南面的山地向印度河倾斜。杜兰[33]这样描述该地所遭受的一次突如其来的灾难：

“据说，这个平原以北10英里的地方曾是肥沃的耕地，在19世纪初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它被部分地毁坏了，而1841年的滔天洪水更使它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这次灾难的起因可能是地震之后的巨大山崩。朝向印度河的整个山坡正在莱久尔（Lechur）河之上，从距河面4000英尺的地方开始，突然塌向下面的峡谷，并撞向对岸，导致了第二次山崩。河流被绵延数千英尺、高数百英尺的巨坝完全截断，该处的水位较它现在的水位至少高出1000英尺。本吉平原被完全淹没，成为一个巨大的湖泊，而在其上6英里处注入印度河的吉尔吉特河也被堵塞了30英里，一直堵到现在的吉尔吉特堡垒之下。通常情况下都是这样的：河流被堵塞数月之久，慢慢地，堵塞物开始崩坍，河流在某一天又开始汩汩流淌，最终以不可阻挡之势将它前面的一切席卷而去……滔滔洪水沿印度河河谷奔腾而下，冲毁村庄和田地，留下厚厚的淤泥——洪水的暴虐由此可见一斑。穿过一英里或更长的巨坝，亦即一堆乱七八糟的山石，来到印度河左岸的通往吉拉斯的公路上，人们在一两年前还可以见到一大堆残存的随洪水漂流下来的木头，在半个世纪的光阴中，这些木头给每一位途经此地的旅行者、牧羊人、猎人或侵入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燃料。”

巴尔蒂斯坦

现在，沿着来自德拉斯的第二条路线，人们可以到达巴尔蒂斯坦的斯卡杜。从拉达克出发，沿印度河河岸也可以直接抵达那里。沿途要经过伯尔戈达（Parkuta）、图尔迪、克尔门和奥尔丁。德鲁[34]解释道："拉达克人称这块土地为 Balti，称土著人为 Balti-pa，而克什米尔人及其他相邻地方的人们则把 Balti 当作形容词，并按波斯语的形式称这个地方为 Baltistan（巴尔蒂斯坦），即巴尔蒂人之地。"

关于它的地理特征，德鲁写道："巴尔蒂斯坦由巨大的山——山脉或山堆构成，因而只有仔细研究地图，才能在那里辨明方向。那里的山峰高耸入云，海拔 18000 至 20000 英尺的高山随处可见。东北部的一些山峰高达 25000 至 26000 英尺，有一座甚至超过了 28000 英尺。于是，该地区就形成了除北极地带以外的最大的冰川。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峡谷有印度河河谷，与印度河河谷相连的希约克河谷，以及希格尔河谷。希格尔河在斯卡杜汇入希约克河与印度河汇合而成的谷地。水流汇合之处，河谷变宽了。在这段由 1 英里拓宽至 5 英里的河谷，其左边有一条山脉，在这条峡谷最宽的地段，两边各有一座高约 1000 英尺的孤立的山，印度河从它们中间流过。斯卡杜自身突起在这块平地之上，它海拔 7440 英尺，刚好位于两块孤立的岩石之下。那两块岩石在其上 1000 英尺处俯临着它。"[35]

斯卡杜谷地

在很久远的年代，斯卡杜谷地是一个冰湖的湖床。在吉尔吉特公路分岔的地方，巨大的冰碛堵塞了这个湖泊。今天，人们还可以在萨德巴拉和格久拉（Kachura）看到这个湖泊的残迹。从格久拉到斯卡杜的道路沿这个峡谷的下部而行，这使路人能全景式地看到这个曾是湖床的峡谷的开阔景象。在上个世纪，斯卡杜还只是一个小村庄，如今它已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了。它起自东南面一个佛教寺院的废墟，止于克尔福久（Kharpochu）堡，沿主干道有一条长长的商业街，一直通到副专员的官邸，甚至沿哈伯罗公路再向前延伸。另一条公路向东分

岔到萨德巴拉湖，还有一条支道通往一个古老的地方，那里如今新建了斯卡杜罗阇的宫殿。大清真寺是这个城市的中心，它旁边是一块旧墓地，老辈的穆智台希德（Mujtahid①）就安葬在那里。西南较远处是格姆巴斯斯卡杜（Gambas Skardu）的遗址，古老的修道院（Jamat khana）依然耸立在那里，随着时光的磨蚀，它已是一片破败。城市的最高处是克尔福久堡，它高高地耸立于一座山丘的边缘，萨德巴拉湖的水经由一条石块垒成的渠道输送到那里。正如杜兰[36]所看到的："斯卡杜，巴尔蒂斯坦或小西藏的首府，风景如画，它是一个农耕的村庄，在其上方是修筑在一块巨石之上的古堡，它静静地立在印度河畔。峡谷宽数英里，主要是大片的沙丘和石堆，也零星地分布有小块的耕地。光秃秃的大山将这个峡谷封闭起来。巨大的峭壁和几近垂直的、遍布小圆石的山坡将峡谷的两端封得严严实实，人在其中，仿佛置身于一个没有任何出口的盆地之中。我们发现，这里的气候十分严酷：白天十分炎热，晚间则刮起大风，一阵阵风暴将一团团细沙吹到谷底。据说这里经常刮风，而且冬天非常寒冷。"

对于通往拉达克来说，斯卡杜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拉达克在印度人的手中，过了喀喇昆仑山口就是中国境内的叶尔羌河谷了。沿印度河向上走，人们可以来到印巴边界。这里除奥尔丁和甘加尼（Gangani）之外，就是庞大的沙丘，据说这些沙丘在古代曾被淘金者发掘过。[37]另外的两条河谷构成了巴尔蒂斯坦的主要风景：一条是沿希格尔河的历史上著名的希格尔河谷，它打开了两条路线：一条经希斯帕尔冰川抵达纳格尔，另一条越过巴拉尔杜通往叶尔羌；另一条峡谷是沿希约克河的希约克河谷，希约克河在离基里斯不远处汇入印度河。如果沿河的右岸走，我们就能到达卡拉克（Karak）、道加尼（Dogani），然后转向萨林格（Saling）、马切罗（Machelo）和霍斯巴依（Hospai），或是转向塔里奇（Thalich）、巴拉贡德（Balagund）、哈尔迪（Haldi）、特迦斯（Thagas），然后到达位于通往叶尔羌路上的萨尔杜莱/萨尔托洛（Salture / Saltoro）。若是沿希约克河左岸走，我们能

① 阿拉伯语词，原意为"勤奋者"，指伊斯兰教公认的权威学者。——译者

到达哈伯罗的重要中心，再往前是西格夏（Siksha）、法拉诺（Farno）和西玛里（Simari），那是巴基斯坦境内的最后一站。希约克河谷的上部包括在拉达克的努布拉（Nobra）区之内，在印度手里。这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界线是著名的锡亚琴冰川，登山者曾经从巴基斯坦这边登上这座冰川，但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行刑队仍在边界问题上争论不休。

希格尔河谷

希格尔河由巴夏（Basha）河和巴拉尔杜河汇合而成，它发自西北，在斯卡杜汇入印度河。希格尔河流经一块块沙质荒地，穿越一座座低矮山头，河谷沿途，美丽风光尽收眼底。德鲁[38]这样描述这个河谷："希格尔河谷从与之同名的村庄起，向上绵延24英里，河谷宽约3英里，两旁是陡峭的石壁，突兀的山峰的相对高度约为7000英尺，它们后面还有层层叠叠的更高的山峰。山谷本身一般高8000英尺，河谷中，部分是沙石河床，部分是从两边坍落下来的冲积物。河谷两边与每一个深而狭窄的山谷谷口相对的地方都有耕地，因为这些地方可以汲取支渠的水来灌溉作物。希格尔村是左岸的一长溜耕地，这块土地向着山的底部平缓倾斜。这里种着品种丰富的农作物，有小麦、大麦、黍及其他谷物，每一块耕地四周都栽有茂密的杏树，它们同样使用支渠里的水浇灌。这里出产的杏，其品质优于其他地方或邻近地区。在我看来，这是整个巴尔蒂斯坦最令人愉快的地方。"

沿巴夏河河谷向上走，人烟逐渐稀少。河谷的尽头是阿兰杜（Arandu）村，它靠近填满这个河谷的巨大冰川的末端。通往纳格尔的道路不在大冰川的峡谷之中，而是沿着自阿兰杜向北的一条又深又窄的山谷向上延伸。巴拉尔杜峡谷的顶点是35英里长的巴尔托洛（Baltoro）冰川，它的北部山脊高达28265英尺，这座山峰叫做K2①。通往叶尔羌的道路经过一段很长的距离后到达巴尔托洛冰川，然后跨过穆斯塔格山脉。新的冰层变化已经打开了著名的穆斯塔格山口。

---

① 即乔戈里峰。——译者

哈伯罗

哈伯罗（Khaplu）是长长的希约克河河谷的分区（Sub-division）的首府。霍谢（Hoshay）河和希约克河在离它不远的地方汇合成更宽广的河流。哈伯罗对面便是萨林格和玛切罗。一条长长的巴扎一直通到这个地方的老叶护罗阇的宫殿，这里还有许多古老的修道院和清真寺。居民区很有限，只在一个山坡之上，但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哈伯罗到斯卡杜，要经过有着岩刻和铭文的戈尔（Gol），然后是尤戈（Yugo），那里也有佛教岩刻。

隆多

在距斯卡杜约25英里处的格久拉有一大一小两个天然湖泊，湖泊四周的景色极为优美。如果我们沿着河流的右岸向上走，就能到达戈瓦尔杜（Kuwardo）。顺河而下，河谷变得越来越狭窄。较低的河谷的最低部分就叫做隆多，这里有依赖于斯卡杜罗阇的当地老罗阇的府邸。德鲁[38a]描述道："海拔6700英尺的隆多村的地理位置比较奇特，它在岩石上只占有很小的地盘。从山脉南部下来的一道深而窄的峡谷在这里变得更窄了，变成了一道宽仅30英尺的深沟，沟的两边是几乎垂直的石壁，水流沿着这些峭壁经由各种木制的水槽从较高处引下来，然后分流到遍布全村的小水渠中，流遍整个地方。"

纳格尔（Nagar，或Nager，或Nagir）

如前所说，从希格尔出发，人们可以经过希斯帕尔冰川抵达纳格尔。毕达尔夫（Biddulph）[39]写道："纳格尔统治者的称号叫做马格洛特（Maghlote），他们是两兄弟中首先命名的那一个的后裔，现在的特姆（Thum，该地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是贾法尔·扎希德·汗（Jaffer Zahid Khan）。尽管纳格尔是两个土邦中较小的一个，但它却因有更多的耕地而拥有众多的人口——现有人口约10000。这里的耕地十分肥沃，农作物硕果累累，小河里有着丰富的黄金资源。这里还因盛

产杏而闻名，当地的人们将杏风干，大量出口到旁遮普。邻近纳格尔，与罕萨相对的地方是宽阔的麦特西尔（Myetsil）河，它与自西南而来的主河道相汇合。海拔8000英尺的纳格尔堡和特姆的邸宅就在这条河的南边，离两河交汇处3英里。麦特西尔河谷两岸都属于纳格尔，它构成了这个土邦的东部边界。河谷的顶端是翻越希斯帕尔山口进入希格尔河河谷的一条艰险的道路。”

在关于纳格尔（Nagar，或更好地拼作Nagir）的问题上，杜兰[40]持与毕达尔夫相同的观点，他进一步补充道：“实际上，除沿河而下抵达吉尔吉特之外，纳格尔没有其他的出口。它的东边被不可能翻越的大山阻挡，南边有拉卡波希（Rakaposhi）大山脉，抵达巴尔蒂斯坦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通过希斯帕尔山口。从前，人们走的都是这条道路。”纳格尔分区现在的疆域横跨罕萨河左边的纳格尔河，一直到新建的分区首府西甘达尔阿巴德（Sikandarabad），然后延伸到杰尔特（Chalt）的罕萨河右岸。

罕萨

罕萨也是吉尔吉特县（District）下面的一个分区，现在主要包括格里姆阿巴德（Karimabad）和阿里阿巴德（Aliabad）两个地方。巴尔迪特（Baltit）和阿尔迪特（Altit）两个旧堡垒现已被废弃。格奈希（Ganesh）这个古老的村庄依然坐落在格里姆阿巴德的底部。杜兰[41]对这个地方的历史地理作了简要的描述：“罕萨土邦是两个土邦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因为通往帕米尔高原和河谷的十分重要的山口都在它境内，这就使得它有机会，用漂亮的波斯语说，来‘拦路打劫’，即抢劫行进在突厥斯坦与印度之间的商队。罕萨的统治者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地位，他们的名字对于路经此地的商人和生性温厚的吉尔吉斯人来说无异于一个噩梦。而他们所谓的成功就是：某些道路被旅行者完全放弃；山口以北的一些地方人口剧减；而罕萨也成了奴隶交易中心，巴达克山的商人们定期到这里来进货。罕萨的统治者比纳格尔的统治者要富裕，对于设在山中的堡垒，他们可谓是高枕无忧。他们朝中国和克什米尔打着‘椢子’，带着他们的一丝不苟的‘公

正'，抢劫北边的商队，绑架南边的奴隶。作为职业土匪，他们似乎将自己的地盘经营得很好：在他们的命令和安排之下，大量富于耐力的劳动力勤勤恳恳地劳作在水渠边和梯田间——一切都是那么井井有条，似乎表明这些土匪是配享有好运的。这块土地长约一百英里：从杰尔特到罕萨，约25英里长的地方均在罕萨河右岸；罕萨以上，直到兴都库什诸山口，则分布在河流两岸。兴都库什山脉从北面和东面包围着它，将它同帕米尔高原和叶尔羌河河谷分隔开来；西边也有一条山脉，将它与卡罗姆巴尔（Karumbar）或伊希戈曼河谷分隔；南边则是罕萨河，将它与纳格尔分隔。这一地区的总人口数约为10000。它可以根据人种分布的情况而分为古恰尔（Gujhal）和坎巨提两部分：古恰尔始于罕萨以上18英里处一个名叫古尔米特（Gulmit）的村庄，一直延伸到诸山口，那里居住着从瓦罕来的移民，这些人至今仍操着他们原来的方言；余下的便是坎巨提或罕萨本土，这里的居民属雅希昆（Yashkun）种姓的一个达尔德种族，操Burishki语①。"

北部操瓦希语（Wakhi）的地区十分特别，毕达尔夫补充道："一条高大的山脉将这个国家从东南到西北一分为二，在它的北部是一层一层的绵延起伏的草地，牧民们在这里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大群的野羊悠闲地漫步。这个地带被称作小古恰尔，以区别于兴都库什南面的瓦罕，即古恰尔本土。"[42]

A. H. 达尼论罕萨本土

关于罕萨本土，A. H. 达尼写道："罕萨不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而是一个地区的名字。N. P. 查克拉瓦尔迪（N. P. Chakravarti）博士将它等同于哈诺萨拉毗沙耶（Hanosara Vishaya②）或哈奈萨拉毗沙耶（Hanesara Vishaya），这是不对的。罕萨和匈奴人也没有什么关系。过去的罕萨是一个古老的米尔王室统治下的一个土邦，现在则是吉尔吉特县内的一个区。它沿罕萨河一直延伸到该河的源头红其拉甫山口。

① 原文如此，应为布鲁沙斯基语。——译者

② Vishaya，古代印度行政单位，意译作"县"或"地区"。——译者

喀喇昆仑高速公路即从这个山口开始，沿河岸到达罕萨河与吉尔吉特河的交汇处丹古尔（Dangor）。罕萨过去的统治者拥有阿尔迪特和巴尔迪特两个古老的堡垒，两者都被乌尔杜尔（Ultur）河环绕着，乌尔杜尔河发源于巴苏（Passu）冰川的乌尔杜尔峰，与罕萨河交汇于阿尔迪特。这两个堡垒所在的位置都比较高，阿尔迪特邻近罕萨河右岸，巴尔迪特在乌尔杜尔河西边，乌尔杜尔冰川脚下。位于这两个堡垒之间的是古代称作苏尔亚斯（Suryas，即太阳）的一块荒地，现在那里是米尔家族成员的墓地。苏尔亚斯这个名称非常重要，据《世界境域志》的作者所说，Bolor 统治王朝曾将自己的起源追溯到 Aftab（即太阳）。米尔现在的府邸占据了靠近这块荒地的一个高地的一角。今天这一整个的居民区都被称作格里姆阿巴德。从这个高地放眼望去，能看到拓宽了的居民区和开阔的格里姆阿巴德田野的美丽景色（春夏两季景色尤佳）——整个地方看上去像一个半圆形的竞技场，绿色的田野、果树林和杨树林，层层叠叠，呈阶梯状排列，从河边一直延伸到后面的山上；对面的拉卡波希冰川终年不化，景色十分壮观，给罕萨地区平添了一道激动人心的风景。冰川的底部是古老的格奈希村，它距阿里阿巴德大约 5 英里，村庄的名字颇具意味，容易让人回想起信仰湿婆的人们的最后时日——这些事情在石刻铭文中亦有记载。格奈希村离罕萨河和纳格尔河的交汇处（这两条河流实际交汇于沙梅兹［Shamez］）不远，它曾几次被洪水冲走。"[43]

吉尔吉特

今天的吉尔吉特是一个专区（Division）的首府，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它包括三个部分：机场以西的军营区，专员府邸周围的居民区，以及有着众多巴扎和私人住宅的城市的主要部分。离机场不远处有许多旅馆和饭店。吉尔吉特河边是梧桐园（Chinarbagh①），独立纪念碑就耸立在那里。马球场在城市的中心，它附近是一个古旧的堡垒，如今只残留着一座孤零零的方塔。现在这个城市已经拓展到了吉尔吉

① Chinar 即三球悬铃木，又称法国梧桐，bagh 即"园"。——译者

特河的左岸，学位学院就在那里。离学院不远处，是罕萨河和吉尔吉特河的交汇口古努达斯（Kunodas）。在公元头几个世纪，这里还是一块旧坟地，至今人们还可以在这里看到岩刻铭文。河的正对面是丹尤尔(Danyor)郊区,那里比该地区五大圣地之一的圣者沙·苏丹·阿里夫·沙的陵墓（Dargah）的尖顶还要高。向北约7英里处是卡尔加（Kargah）峡谷，现正开发利用它来提供水和电力。在它附近有一耸立在高处的石刻佛像，佛像俯视着一块名叫瑙布拉（Naupura）的高地，高地上曾有过一些佛教窣堵波，但后来这个地方被统治者用作防御。跨过吉尔吉特河后，喀喇昆仑高速公路在丹尤尔转向罕萨。这样，从严格意义上说，它没有经过吉尔吉特城，该城距高速公路与吉尔吉特河的交叉处还有8公里。斯卡杜公路也要经过一座新修的阿拉姆（Alam）桥，这座桥是以第一任巴基斯坦政治代表萨达尔·穆罕默德·阿拉姆·汗（Sardar Mohammad Alam Khan）的名字命名的。它距离吉尔吉特城约20英里。在它附近是斯卡杜公路阿拉姆桥的著名的岩刻。在另一边的喀喇昆仑高速公路上，也有一些岩刻。贾格劳特（Jaglot）尚在5英里以外，它的对面是本吉。旧的普拉塔普（Pratap）桥现已被废弃，连接贾格劳特与本吉的是一座新桥。

在贾格劳特与吉尔吉特之间是克什米尔的摩诃罗阇修建的山嘴洋房（Pari Bangla），它正在河流拐弯处，一座小山，即具有历史意义的“普布·辛格的山嘴”（Bhoop-singh-ki-Pari）的脚下。从贾格劳特这边出发，在抵达萨依（Sai）河桥之前，人们可以见到南迦帕尔巴特（迪亚玛尔）的美丽景色。沿着肥沃的萨依河河谷，人们也可以向下径直到达吉尔吉特河河谷。

吉尔吉特在19世纪的面貌与现在大不相同，德鲁[44]描述道：

“吉尔吉特区（District）由一条流向印度河的支流的河谷的较低部分组成，这条支流发源于围绕着巴达克山和奇特拉尔的大山，流向东南，在巴万吉（Bawanji，即本吉）稍上处汇入大河。吉尔吉特河全长120英里，它分为以下几段：60英里长的亚辛、25英里长的布尼亚尔和35英里长的吉尔吉特。亚辛不受克什米尔摩诃罗阇的控制，布尼亚尔则不同，它由一位仰仗于摩诃罗阇权力的罗阇来统治，而吉尔吉特

则直接受制于摩诃罗阇的官员。这个河谷较低的部位宽1~3英里，四面都是陡峭的岩石大山。河谷中还有多石的冲积高地，大部分地方都很干涸、贫瘠，只在每一道深而狭的支谷之前有一块块耕地，支渠里的水灌溉着它，上面建有大片的房屋。这些深而狭的支谷常常将这条河谷西南面的山脉拦腰截断。东北面的山峦十分雄伟高大，站在分隔萨依（Se/Sai）河谷和吉尔吉特河谷的山脊上，人们可以很好地看到它们的全貌。岩石的山脊向后延伸到极高的雪峰，其中一座雪峰高达25000英尺。

"吉尔吉特村在河流右岸的一块灌溉地上，这里的耕地不在支渠的灌溉范围之内，而在河流的冲积平原之上。河流的冲积形成了高出水面30至40英尺的梯田。从河岸到山脚，耕地所占面积约为1平方英里。灌溉用水取自距离最近的支渠。这里的房屋都是平顶的，三三两两掩映于果树林中。在接连不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战争中，这些房屋都曾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后来又依样重建了。但是，这个村庄要想恢复到原先果树成荫的面貌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日。

"吉尔吉特堡（图42）是摩诃罗阇对达尔德斯坦主要的强有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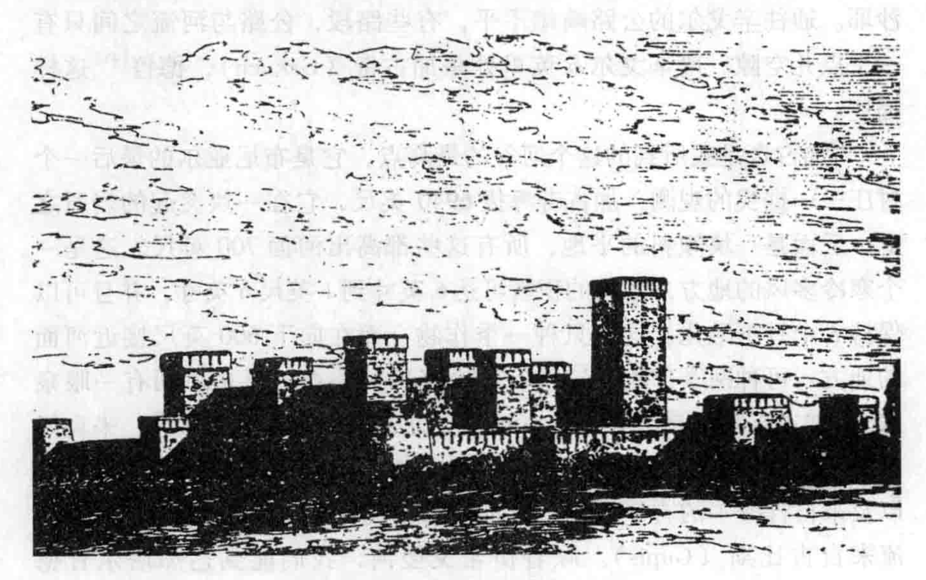


图42 吉尔吉特堡

控制点。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它不断被修建、破坏、又重建，间或添加和改变一点什么。1870 年我在那里的时候，从西南方向所见的它的形象就如下文所描绘的那样。有着一些高塔的中心部分（其中一座塔比其他的塔高）是戈尔·拉赫曼（Gaur Rahman，正确地拼写应为 Gauhar Aman）第二次统治吉尔吉特时修建的。有一段时期，它曾被人从摩诃罗阇古拉伯·辛格的军队的手中夺走。它是一座达尔德风格的建筑，木头框架的墙壁，中间填以石头。它是这个地区一个坚固的防御工事。但自从我见到那个地方，描下这张草图以来，那里又发生了许多变化。1871 年春天，一场严重的地震摧毁了这个堡垒的大部分。到现在，我想，它一定已经重修得更好了。”

吉尔吉特北部，沿吉尔吉特河，是著名的水果产地布尼亚尔河谷。谢尔堡（Sher Qila）是当地罗阇古老的设防的首府。现在的分区（Sub-division）首府是距吉尔吉特 40 英里的辛戈尔（Singol）。罕泽尔（Hanzel）距吉尔吉特 13 英里，一座佛教窣堵波依然伫立在那里。也许这个地方就是哈屯（Hatun）岩刻铭文提及的哈诺萨拉（Hanosara）。如果这种猜想不错的话，布尼亚尔河谷的旧名称就应该是哈奈萨拉毗沙耶。通往辛戈尔的公路崎岖不平，有些路段，公路与河流之间只有一丁点儿空隙。离辛戈尔 6 英里处是加古奇（Gakuch），德鲁[45]这样描述：

“加古奇是我所到的这个河谷的最高点，它是布尼亚尔的最后一个村庄……据我的观测，加古奇海拔 6940 英尺，它在一块突起的岩石之上，后面是一块倾斜的平地，所有这些都高出河面 700 英尺。这是一个寒冷多风的地方，冬天的积雪可达 6 英寸到 1 英尺 6 英寸，并且可以保持 3 个月不融化。这里只种一季作物，而在向下 600 英尺接近河面的地方，可种两季作物。这里有一个坚固的堡垒，堡垒里面有一眼泉水。”加古奇脚下是由好几条小河汇流而成的一片宽阔的水域：来自伊希戈曼河谷的伊希戈曼河，来自哈屯的哈屯河，来自亚辛的亚辛河，以及来自吉泽尔的吉泽尔河，共同汇成了宽广的吉尔吉特河。这条河流来自古比斯（Gupis）。顺着伊希戈曼河，我们能到达杰塔尔甘德（Chatarkand），这是一座很重要的穆斯林圣者陵墓，离它不远的地方是

一处旧的防御阵地。过了杰塔尔甘德就是通往瓦罕路上的伊米特（Emit/Imit）。从亚辛河与吉泽尔河的交汇处古比斯出发，人们可以顺着亚辛河来到亚辛。亚辛是一片开阔之地，过去曾是古代国王的重要活动中心。再过去就是达尔科特山口，它通向瓦罕的大门博罗吉尔山口。从古比斯出发，人们还可以顺着吉泽尔河来到芬达尔（Fundar）湖和欣杜尔山口。在京格罗特（Jingrut）前一英里处，吉泽尔河被从南面流过来的泥沙堵塞了，于是这条河变作了一个长约2.5英里的大湖。这条路十分糟糕，路面很狭窄，直到杰希（Chashi），道路才变得宽阔起来，那里有着大量的遗迹等待考古发掘。在芬达尔有一条分水岭，杜兰[46]记录道：

"在杰希，峡谷变得开阔起来，三条小河在此汇合：北边的一条自亚辛而来，南边的一条来自丹吉尔以上的大山，它们在这里与主河谷相连接。往高处走，会来到一座开阔的低低的小山，那里似乎是一条死路（Cul-de-sac）。峡谷西部的一片冰川的末端冰碛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这座小山的上方是潘杜尔（Pandur）湖，在它下方，是被很好地开垦过的谷地，峡谷的前部是低低的岩石小山，圆形的山顶和光滑发亮的岩石都告诉人们，这里曾有过冰川活动。从吉泽尔河的这一边，人们可以通过狭窄的通道直接去往丹吉尔河谷和达丽罗河谷。这里还有一些从奇特拉尔来的军队和从博罗吉尔山口来的入侵者都曾走过的传统的路线。"

吉拉斯[47]

吉拉斯位于吉尔吉特的南面，但连接两地的公路不是直线而是呈半圆形的弧线。因此，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须走90英里的路程。这是因为，兴都拉杰山脉延伸到了印度河右岸，而南迦帕尔巴特又高耸于本吉平原之上。要到达吉拉斯，人们必须绕南迦帕尔巴特而行。绕行线路开始的地方叫做马利吉（Malichi）或哈利吉（Khalichi），与印度河交叉的地方是拉伊戈德（Raikot），在它附近有一些温泉，这些温泉源自南部的黏土质悬崖上的硫黄沉积物。从拉伊戈德到南迦帕尔巴特，要经过一个名叫"美丽的草地"的地方，那里的景色十分优美。

南迦帕尔巴特在拉伊戈德这边有贾里布尔（Jalipur）、格奈罗（Ganello）和布尔久尔（Burchul）三座山峰，真正的帕尔巴特（Parbat，即山）从塔格（Tak）向布纳尔（Bonar）村绵延40英里。印度河畔第一个开阔的平原叫做“达朗格的达斯”（The Das of Darang），第一个村庄在河流右岸，然后就是分布于印度河两岸的戈尔（Gor）或戈赫尔阿巴德（Gauharabad）。

越过“达朗格达斯”平原，我们会来到因出产水果而闻名的巴尔金（Bargin）河谷。过了欣格（Shing）河，便到了位于一个宽宽的“达斯”（Das）上的格斯巴拉（Gas Bala，即上格斯），再过去就是格斯巴因（Gas Payin，即下格斯），印度河上有一座木桥可以通往这两个村庄。然后就是一系列平行的山脉，它们与位于印度河右岸和凯纳尔（Khinnar）河左岸的特尔班（Thalpan）村相接。印度河左岸的“达朗格达斯”延伸到贾里布尔（Jalipur）河，贾里布尔又通往一处叫京格洛（Janglo）的森林地带。贾里布尔之前是广阔而干旱的“基努达斯”（Kinudas）平原，它始于较高处的一堆硫黄沉积物，止于犍德罗（Gandlo）。然后我们会来到戈纳尔（Gonar）河，戈纳尔村坐落在一个同名的“达斯”的顶部。接下去便是“布纳尔达斯”，其顶部是布纳尔村。过去，吉拉斯人正是通过布纳尔河谷这条路线在吉尔吉特—阿斯托尔公路上打劫来自克什米尔的人。这条路线的旁边就是南迦帕尔巴特。然后依次是亚舒哈尔（Yashukhal）、吉尼（Gini）河和多隆格（Dorong）河。塔格山脉在这里与印度河相交。塔格是一条较大的溪流，它源于巴布萨尔（Babusar）山口，在贾尔（Jal）与尼阿特（Niat）河汇合。

今天的尼阿特和塔格高地被浓密的森林覆盖着。从塔格河可以去往哈扎拉、克什米尔和吉拉斯三地交界处巴布萨尔的顶部。喀喇昆仑高速公路未建成之前，巴布萨尔山口是从曼塞赫拉（Mansehra）到吉拉斯和吉尔吉特的陆地交通枢纽。过了尼阿特是通往巴拉伊（Barai）山口、盖尔（Kel）和自由克什米尔的法萨特（Fasat）山口。从巴布萨尔出发，人们可以去往卡甘河谷，或者去往自由克什米尔的加莫特（Gamot）和沙尔迪（Shardi）。朝着塔格小溪的口子向下走，我们发现

了一个开阔的平原，也许就叫做塔格达斯（Thak Das）。通向山上的吉尼村的一条古道就横越过这个平原。这一平原一直通向古老的布多加赫（Butogah）村，那里如今是吉拉斯城镇的郊区。贾亚金德（Jayachand）山脉耸立在印度河畔，修建喀喇昆仑高速公路时，曾将该山脉打通。

塔格达斯景色十分优美。凯纳尔河谷这一条古老的通往吉尔吉特的路线现已被一个山口取代。凯纳尔河的右岸是一个开阔的沙质平原，这是在1841年的洪水中被冲毁的一个古老村庄的遗址。从这个沙质平原开始，一条古老的朝圣之路沿印度河右岸一直通向霍杜尔（Hodur）村。吉拉斯镇在布多加赫小河的西岸，占据了向印度河倾斜的哈尔班达斯的一部分，城镇就在这块倾斜的平地上层层铺开，绿色的田野也一层层铺到居民区的边缘。吉拉斯镇在高高的哈尔班山的庇护之下。这个古城原来在较低的位置上，但随着用水的日趋方便，城市也逐渐向高处发展。城市的正前方是一个古老的堡垒，20世纪初曾被重新修缮过。

过了哈尔班达斯就是吉奇（Chchi）河，它通向一片山林地带。霍杜尔河谷在印度河右岸，受控于一个古老而残破的堡垒，这一河谷也通向一个去往吉尔吉特的山口。顺着右河岸，我们能抵达开阔的托尔（Thor），托尔河也发源于巴布萨尔山口。从这个山口，人们可以向下来到去往贾尔戈德的路上的萨巴特（Sapat）平原，它邻近现代的达苏（Dassu）。这是达尔德人从科希斯坦到吉拉斯所走的老路。从托尔，人们可以去往夏迪亚尔和沙津（Sazin），在途中还可见到在汗贝里（Khanberi）河之前的巴夏（Basha）的峡谷。有人曾经提出在印度河上建一座拦河坝的新计划，所选择的筑坝地点正是巴夏。然后我们会来到哈尔班河，它通向哈尔班河谷和巴布萨尔。从汗贝里河谷，人们可以去往肥沃的达丽罗河谷，从夏迪亚尔桥也可以到达这里。接下来是丹吉尔河谷，这些河谷都有道路通往奇特拉尔。再往西便是甘迪亚河谷，它可以通往斯瓦特，但现在人们多选择经过卡拉姆（Kalam）的那条路线。达丽罗、丹吉尔和甘迪亚是最后的三条河谷，这三条河谷有着自己传统的历史文化，且与科希斯坦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崇山

峻岭的阻碍，从沙津到达苏，沿印度河，几乎没有一条直接的路线。今天，为修建喀喇昆仑高速公路，已将石山凿穿了。旧的路线要穿过内部的河谷到达贾尔戈德、帕罗斯（Palus）和库卢（Kolu），再往前到达科希斯坦地区的主要居民区巴坦（Pattan）。人们可以顺着达丽罗、丹吉尔和甘迪亚河谷抵达斯瓦特。而今，喀喇昆仑高速公路的开通，改变了这一地区复杂的地理状况，印度河上新修的几座大桥也使这些小河谷敞开了与外界交往的大门，这都为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历史地名

历史上，整个北部地区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原因很简单，纵观整个历史进程，这一地区从未达成政治上的统一。因此，学者们只好根据它的某些地理特征来给它命名，称它为“兴都库什”、“喀喇昆仑”或是“跨喜马拉雅”。但没有哪个地理名称能涵盖整个北部地区。喀喇昆仑公路在促使整个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走向统一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为整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一统提供了新的契机。

达尔德斯坦（Dardistan）和达拉德代萨（Daraddes'a）

雷特奈尔（Leitner）博士[48]创造了“达尔德斯坦”这个词，用来指操达尔德语的人所聚居的地方。毕达尔夫博士对此作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他说：“雷特奈尔的大胆冒险使他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个错误，这便是：他错误地认为被他划到达尔德名下的所有部落都属于同一个种族，他用这一建立在错误观念之上的名词来指称实际上有好几个种族居住的地域，完全不顾这些不同种族的人们操着不同的语言，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49]

“达拉德代萨”（Daraddes'a）一词最早见于卡兰纳的《诸王流派》。[50]奥雷尔·斯坦因（Aural stein）爵士进一步补充道：“如我们所

见，在萨尔迪（Sardi）之上，吉申甘加河谷突然转向一条幽深狭窄的、荒无人烟的峡谷，那条峡谷的另一端就是达尔德人的领土。他们在吉申甘加上部及其支系山谷的居住地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在编年史（Chronicle）中，一般称之为Daraddes'a。这个小王国的统治者有着印度人的名字，他们不止一次地试图侵入克什米尔。他们所住的Daratpuri，即'达尔德人的城镇'，也许就在现在的古雷兹。今天的古雷兹是这条河谷最重要的地方。"[51]杰勒德·富斯曼（Gerard Fussman）教授[52]在阿拉姆桥上发现了一位Daraddraya（King of Daradas，意即"达尔德人的国王"）的佉卢文铭刻，他鉴定其年代大概是公元4世纪末（另一种说法见本书第五章"大贵霜时代"一节，亦见本章下节）。他还从佛教作品《大事记》（Mahavastu）和《拉里塔维斯塔拉》（Lalitavistara）中发现了Darada-lipi（Darada手迹）。

博洛尔（Bolor，或Bolur，或Boluristan）

从汉文记述中，我们第一次知道了Po-lu-lo（钵露罗）这个地方。[53]玄奘写道："钵露罗国周四千余里，在大雪山间，东西长，南北狭。多麦豆，出金银，资金之利，国用富饶。时唯寒烈，人性犷暴，薄于仁义，无闻礼节。形貌麁弊，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语言异于诸国。"[54]查文奈斯（Chavennes）又补充了从汉文资料中引用的其他文字来更详细地描述这个地方。[55]另一位朝鲜朝圣者慧超在提到大勃律时将它大致等同于巴尔蒂斯坦，又将小勃律等同于吉尔吉特河谷。[56]

谈及博塔（Bhutta）即西藏的疆土，奥雷尔·斯坦因爵士记录道："要注意的是，斯利瓦拉（Srivara）知道'大、小博塔'（Suksma-Brihad-bhuttadesa）这一说法，它们指的是巴尔蒂斯坦（斯卡杜）和拉达克，即今天被称做小西藏和大西藏（Little and Great Tibet）的地方，或被克什米尔人称做Lukh Butun和Bud Butun的地方。事实上，这些名称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在中国的史籍中，早就有大、小勃律（Poliu）的称呼了。"[57]

奥雷尔·斯坦因爵士将一些汉文证据补充到了所引的梵语资料中，在对这些汉文资料的解释上，学界似乎没有什么异议。我们在下面将

会看到，穆斯林资料中清清楚楚地称巴尔蒂斯坦为 Tibet-i-Khurd，即“小西藏”。但根据同一条汉文资料，耶特马尔教授却认为，大钵露罗（Great Bolor）相当于巴尔蒂斯坦，而小西藏和小钵露罗（Little Bolor）相当于吉尔吉特河谷。

然而，穆斯林的资料在这个问题上有很清晰的表述。最早的资料见于阿巴斯王朝哈里发艾尔·马蒙（al-Mamun）时期（公元 813 年—833 年）。在公元 814 年—815 年下台的喀布尔·沙（Kabul Shah）的御座上有两处铭文，其中一处记载着以下内容：[58]

> 伊玛目①（愿真主提高他的品级）通过 Dhu al - Riyasatain②之手，使绿色的旗帜达到了克什米尔和 Tibet 边地，真主使他在 Bukhan 和 Bolor 地区（Balad-i-Bolor）获得了胜利，战胜了 Khaqan 山地和 Tibet 山地的统治者。

这里清晰地提到了 Balad-i-Bolor。

《世界境域志》[59]的作者认为，在世界各地区之中，“博洛尔（Bolor 或 Bulur）是一个大国，有一国王，自称是太阳之子（ma farzand-i-aftab-im），他在太阳升起前绝不起床，理由是儿子不能比父母先起。他被称作博洛尔·沙（Bulurian Shah）。其国无盐，要从克什米尔输入。”

阿尔·比鲁尼（Alberuni）说得更为详细：“印度河（Sindh）发源于突厥境内的乌南格（Unang）山区，人们可以通过以下路线到达那里：从去往克什米尔的深而狭的山谷出发，进入高原地区，再走上两天多的路程，左边是博洛尔（Bolor）和沙米兰（Shamilan）山地，那里住着名叫帕塔瓦尔央（Bhattavaryan）的突厥部族，他们的首领被冠之以‘帕塔·沙’（Bhatta Shah）的头衔。他们的主要城镇有吉尔吉特、阿斯维拉（Aswira）和希尔塔斯（Shiltas），所使用的语言是突厥语。他们经常袭击克什米尔，使其备受摧残。沿着河流左岸向前走，

---

① 指马蒙。——译者

② 阿拉伯语，意为“两国之主”，系马蒙的大臣法扎尔·本·赛赫尔的封号。——译者

经过一片耕地之后，便来到该地的首府。从河流右岸走，则会经过首府南面的一片紧紧相邻的村庄，到达古拉尔杰克（Kularjak）山。这座山像穹顶一样，山顶比较浑圆，山上的积雪终年不化。从塔盖夏尔（Takeshar）和劳哈瓦尔（Lauhawar）地区通常可以看得见它。这座山峰与克什米尔高原相隔2法尔萨赫（Farsakh①）路程，它的南边是罗阇吉里（Rajagiri）堡，西边是拉胡尔（Lahur）堡，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坚固的两座堡垒。罗阇瓦里城（Rajawari）距这座山峰3法尔萨赫。这是我们的商队去过的最远的地方。这里是印度的北部边界。”[60]古拉尔杰克山可能就是今天的南迦帕尔巴特。

公元1528年，米尔扎·穆罕默德·海达尔·杜迦拉特（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at）[61]与拉希德·苏丹（Rashid Sultan）一道侵入博罗尔（Bolor或Balur）。我们找到了一则很好的材料：“博罗尔是一个异教徒国家（Kafiristan），大部分居民都是山民。那里的人既没有宗教信仰，也不禁忌任何污秽事物。而只是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该地东界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北邻巴达克山，西边是喀布尔和兰汗（Lumghan），南边与克什米尔的属地接壤。绕着它走一圈需要四个月的时间。整个地区都是大山、河谷和隘路，甚至可以说整个博罗尔斯坦地区连1法尔萨赫的平地也没有。这里人口众多，村落之间从来不能和睦相处，经常互相敌对，战争接连不断。他们的战斗大多是这样进行的：妇女从事家务和田间的劳动，男人则专事战斗。主妇们在家里准备饭菜，丈夫们却在战场拼杀。饭菜准备好了，主妇们就来到战场，告诉丈夫们该吃饭了，他们就停止战斗，各自回家吃饭。饭后，他们又重新回到战场，继续战斗，直到下午晡礼②的时候。这时，主妇们再次来到战场，让双方中止战斗。这一次的和平能持续到第二天日出时分。但有时战争却无法顺利地平息，这时人们就需加紧防御，保持最高的警惕，通宵达旦地守护自己的家。他们终生都是在这样的周而复始之中度过的。

“由于这里的草原和牧场面积极小，人们只能牧养很少的牲畜。他

---

① 1Farsakh合6.24公里。——译者

② 伊斯兰教每日五次礼拜的第三次礼拜。——译者

们养了少量的绵羊和山羊，借以剪毛为衣；还养了一些奶牛，以获取牛奶和黄油。此外，他们再没有以群养的方式牧养别的牲畜。居住在不同河谷中的部落所操的语言各不相同，一个部落不懂得另一个部落的语言。因为当地人总在不停地四处征战，以至于有的人对异地村庄的了解胜过对自己村庄的了解。博罗尔有美丽的花园和丰富的水果。那里的石榴品质好，数量多。还有一种石榴是博罗尔斯坦独有的，籽呈白色而透明，味道甘美，其香无比。这里还出产大量的蜂蜜。”

在这里，博罗尔（或博罗尔斯坦）的疆界划得很清楚。丹尼森·罗斯（Denison Roos）爵士在脚注中很正确地指出，那时候的博罗尔还不包括巴尔蒂斯坦，因为它是被单独提到的。卡尔·耶特马尔（Karl Jettmar）教授曾详细讨论过整个 Bolor（或 Bolur）的地理变迁的问题。

阿尔·比鲁尼的证据似乎是结合了两方面的材料：一是来自印度的材料，据此，他用帕塔瓦尔央来指突厥部落，用“帕塔·沙”作为统治者的头衔；另一种也许是汉文中谈及的钵露罗的资料。第一条资料对于西藏（严格说是小西藏）统治者是有利的，第二条材料很正确地描述了突厥部落时期的情景，突厥部落好像曾与阿拉伯人有过联系，因此它们也可以是研究 Bakhan（应为 Wakhan，即瓦罕）和 Bolor 的参考材料。从阿拉伯文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们与喀布尔·沙和东边相邻的、一直到西藏的山区国家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这些资料中根本没有给出 Bolor 的当地统治者的名字。另一方面，我们也几乎完全不知道 Bolor 这个词的含义。耶特马尔教授指出，当地人从未使用过 Bolor 这个词，这是很正确的。从达莫特（Damot，即吉尔吉特）的阿卜杜尔·哈米德·哈瓦尔（Abdul Hamid Khawar）先生那里，我了解到当地人普遍地将 Bolor 理解为巴尔蒂斯坦。

汉文中用钵露罗（Po-lu-lo）来指代 Bolor，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的材料大概在公元 7 世纪就有了，它主要与吉尔吉特的一个统治王朝联系在一起，人们在这个地区发现了这些统治者的婆罗谜（Brahmi）文岩刻，在铭文中，他们的头衔就是“巴托拉沙希”（Patola-Shahi）。[62]很显然，Po-lu-lo 这个词与 Patola-Shahi 有着某种关系。我们不妨试想，Po-lu-lo 这一国家的名称即源自于 Patola-Shahi 统治王朝的名

称，也就是说，Po-lu-lo 的词源就建立在 Patola 的基础之上。这种想法未必没有道理。也许正因如此，希努贝尔（Hinuber）教授从霍杜尔的一处铭文中发现了这个单词的拼写变体，这个单词实际读作 Palola。因此，汉文词 Po-lu-lo 起初是一个政治名词而非地理名词。换言之，这个国家的名称源于那个统治王朝的名称。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阿拉伯人率先与这个统治王朝建立了某种联系，于是他们开始用 Bolor 这个词来指称这个地区。在后来的穆斯林和汉文的材料中，Bolor 都成了指称这一地区的一个普通的地理名词。甚至当地人也这样使用这个词语，他们已全然忘记关于 Patola-Shahi 的历史了。

然而，Bolor，或 Patola，或 Palola，这个名字听起来却有些古怪，难道这个词还有别的“前身”？富斯曼教授在阅读采自阿拉姆桥（吉尔吉特）的婆罗谜文铭文时，在四个地方找到了以下的名称。

1. Sri Palalo（jo）Hastibhro

即：Sri Palalo 的后裔，Hastibhra.。

2. Palolajai Bhiksu ihagato

即：僧侣 Palolajai 到过此地。

3. （Sr）i Palala（bh）i（Ksu）

即：Sri Palala，僧侣。

4. Palolajo Bhiksu igada

即：僧侣 Palolajo 到过此地。

富斯曼教授认为 Palalo 或 Palala 或 Palola 是正确的名称，这个名称与我们从霍杜尔的铭文中看到的 Palola 一词非常接近。经鉴定，所有这些铭文都刻于公元 4 世纪—5 世纪，但如果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来考虑，它们的年代还可以稍稍往后推。若将这些名称联系起来看，还可以看出 Palola 或 Patola 这一名称的更早期的形态。它们后来在阿拉伯文资料中变成了 Bolor，因为阿拉伯文字中没有 Pa。这样，《拉失德史》中提到的 Bolor 或 Baluristan 一词就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它意味着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一个大的行政区域的形成，中国人和阿拉伯人都与这一区域有过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正如耶特马尔教授所说，Bolor 一词不见于藏文史料，很大可能是因为西藏人征服并结束了这个统治王

朝，在那里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统治并将这种统治维持了若干年。此后，他们用不同的地理名词来称呼这一地区。（见下文）

勃律（Bruza）或布鲁沙尔（Bru-shal）

耶特马尔教授[64]将这一证据总结如下：

“认为布鲁舒人（Burusho）和西藏人之间有直接联系的观点所依据的的最重要的事实是：西藏人很特别地将‘小 Bolor’称作‘Bru-za’（勃律）。事实上，劳费尔（Laufer）认为，古代藏文文献中多次出现像 Bru-za、Bruza、Gru-za、Gru-sa、Brusal、S Bru-sal 等表述，指一种语言或一个国家，这很可能与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和操布鲁沙斯基语的人们所在的地方有关。根据霍夫曼（Hoffman）的看法，公元 7 世纪芒松芒赞（Man-Slon-man-brtsan）国王与一位勃律公主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这个国家。但在后来的国王的统治下，双方就少有和平了。在赤德祖赞（K'ri-lde-gtsug- brstan）统治下，Bru-za 的统治者于 737 年被迫表示效忠，并于三年后娶了一位吐蕃的公主。然而，赤松德赞（K'ri-sron-ide-brstan，755 年—797 年）不得不再次征服西边的 S Bal-ti 和 S Bru-sal 等国家，甚至赤祖德赞（K'ri-gtsug-Ide-brtsan，815 年—838 年）也不得不再一次去征服这个难以控制的地区。这一地区在宗教、文化方面的重要性被反复强调，佛教徒和苯波（Bon-po）将那里当作精神的圣地，他们希望能从那里获得神灵的启示。在关于莲花生的传奇故事中，勃律（Bru-za）的语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尽管西藏与吉尔吉特地区许多世纪以来都有着交往和联系，但藏文文献中却没有用另外的名字来称呼这一地区。显然，S Bal-ti 指的是巴尔蒂斯坦，即从前的大 Bolor，而 Bru-za 应该就是‘小 Bolor’。吐蕃人似乎将这一地区的官方名称改作了当地人所用的名称……托勒密（Ptolemy）已经知道了这一名称（Byltai）。托马斯（Thomas）认为生活在‘女国’（Stri-rayya）或叫做‘黄金国’（Suvarna-gotra）的人属于同一个种族。霍夫曼甚至认为著名的象雄（Zan-zun）也属于同一个原始藏人构成的群体。确实有线索表明，在吐蕃帝国的冲击来临之前，在高原西部就存在着原始藏人的一个阶层。也许，Bru-za 这一名称就

源于这一复合体，只是后来被转移给了吉尔吉特河谷中一个被征服了的部落。如果我们假设，在吐蕃时期（公元7世纪—9世纪），吉尔吉特河谷事实上在布鲁舒人掌握之中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后来布鲁舒人又被操希纳语（Shina）、并属于同一种族的达尔德人所征服、击溃，并取代了。”

我们是从移居到拉达克地区的达尔德人的布诺纳（Bonona）节的歌谣[65]中知道布鲁沙尔（Bru-shal）这个名字的：

然后在布鲁沙尔和吉尔吉特，
一百个青年男子走出来了，
在肥沃的 sathsill 村庄里，
一百个年轻姑娘走出来了，
他们在吉尔吉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会。
吉尔吉特的狮子王出现在舞蹈队伍的前头，
当你们所有的姑娘们为爱而扭动着手，
你们大家都为爱挥手，
为爱欢呼，喂。
在 Ambir 山口，那里是 targhey 大叔，
拿出箭，拿出弓，再拿出箭杆，
噢，大叔，这个活动就要善于躲藏。
现在让我们带上北山羊的角，
让我们左手拿箭、弓和其他的猎具，
让我们带上北山羊的皮，噢，大叔，
走到跳舞队伍的前头，噢，大叔，
跳完这支舞之后，让我们向东去，噢，大叔。
然后他们去到 Rong churgyud，噢，大叔，
在 Rong churgyud，有爱赐予你，哦，众神。
难道这不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哦，众神。
在 Gusur 有醋栗树，
在 Goarto Kumar 也有爱给你，哦，众神，

难道这不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哦，众神。
Skardogod 在柳树旁，给你爱，哦，众神，
难道这不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哦，众神。
Kyeris 在 Chumghog 附近，哦，众神，
而 Ghashing manthro-Khar 在砾石旁边，给你爱，哦，众神，
Pakudda 在天空下，给你爱，哦，众神，
Gabis 在铅笔柏附近，给你爱，哦，众神，
Ganogse 在神圣的柳树旁，给你爱，哦，众神，
Kyshur 靠近神灵的绿洲，给你爱，哦，神，
Hanu 靠近 Handragmir，给你爱，哦，众神，
Sanid 是开始的地方，
Kyshur 和 Handrangmir 这两个地方的年轻人十分快乐。
哦，我们崇拜 Mandede mande mandeshin（众神），
哦，mandede mandeshin，
让我们在这儿舞蹈。

这段长长的引文讲述操希纳语的人们从布鲁沙尔和吉尔吉特迁徙到不同地方的故事，歌词中提到了他们移居地方的名称。耶特马尔教授这样评价这首歌：

“从歌词来看，似乎这些地方相隔并不太远。我怀疑罕萨河谷的较低部分是否能安顿下如此密集的人口。这就意味着，布鲁沙尔是吉尔吉特河谷的一部分，它至今仍被布鲁舒人占领着。”[66]

约翰·毕达尔夫评价道：“罕萨人和纳格尔人属于被欣人称作雅希昆的种姓，但他们内部都称为博里希（Boorish）。”[67]

A. 杜兰[68]考察了这些人在北部地区的分布情况，他说：“从地图和主要种姓在这个国家所占据的比例来看，后来的来自旁遮普平原的达尔德人入侵浪潮一波一波地抵达了印度河河谷，高潮时甚至渗入到了支谷中，或是将土著居民完全淹没，或是将他们连同先来的达尔德人一起驱逐到大山深处。最早的一波应该是雅希昆人，其次是欣人

(Shin)。达尔德斯坦有不下于11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这些语言和方言的分布状况证实了以上的观点。不管其他8种方言，而只讨论这个国家的北半部，你会发现奇特拉尔普遍操科瓦尔(Khowar)语，雅希昆人的布鲁沙斯基语分布在难以企及的罕萨、纳格尔和亚辛河谷中，欣人的希纳语分布在吉尔吉特、阿斯托尔、布尼亚尔和吉泽尔河谷中。大致说来，欣人所占的比例由在印度河河谷较低位置处的库里(Koli)的95%，降至吉尔吉特的35%，在纳格尔约占20%；在罕萨占5%。雅希昆人所占比例的状况则相反，在亚辛，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雅希昆人；雅希昆人在罕萨占80%，在纳格尔占60%；在阿斯托尔和萨依的支谷中，雅希昆人分别占78%和65%。他们被入侵的欣人赶到了峡谷之中，随着印度河河谷的下降，雅希昆人的比例亦大致呈下降的趋势。到库里，你会发现大概只有4%的居民是雅希昆人。而奇特拉尔则既没有欣人，也没有雅希昆人——入侵的浪潮止于杰玛尔坎德(Chamarkand)山口和欣杜尔山口。”

杜兰对该地区不同民族的分布状况的评估表明：过去的布鲁沙尔地域更为宽广。因此，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操希纳语的移民进入拉达克后声称布鲁沙尔和吉尔吉特是他们的发源地了。

坎巨提

“罕萨”(Hunza)一词的来源不甚清楚，除非假设它与Bruza或Bru-shal有某种联系，那它指的就是操布鲁沙斯基语的人们所在的地区。然而，今天的罕萨是一个限定了的地方。19世纪英国政府用坎巨提这个词来指罕萨的人们，这个词的来源亦不甚清晰(见第五章“公元5世纪—6世纪的匈奴霸权”一节)。然而，哈屯[69]的岩刻有如下内容：

Śrī-Shāhideva-pada-bhakta-kanchudiya-mahāgajapati-mahāmāttyavara-Mahāsāmantādhipati-Giligiṭṭa-Saramgha-Makara Simghena，意即“由Makarasimha，伟大的大象之主，首席大臣，诸藩臣(Feudatories)的伟大的主，Giligitta军队的领袖，他属于Kanchudi家族，经常向伟大的沙希之主进行供奉。”

正如查克拉瓦尔迪博士所指出的："就像奥雷尔·斯坦因爵士向我指出的，Kanjudi 这个词肯定与 Kanjuti 这个种族有关，它用来指罕萨人，附近的人则称将它称作 Kanjut。"

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那么 Kanjudi 就是这个民族的一个部落的名称。但是，毕达尔夫又指出："在瓦罕、萨里库尔（Sirikol）和亚尔亨，Kunjoot 这个名字用来指罕萨，尽管当地居民并不使用这个名称，兴都库什以南的人也不用这个名字。更确切地说，这个名字是 Hunzoo，在古代，它被称作贾拉杰布尔杜姆（Challaj Bultum），现在这个名字已被废弃了。"[70]

吉尔吉特

约翰·毕达尔夫[71]写道："这个地方在古代叫萨尔金（Sargin），后来改为吉里特（Gilit），后来又被锡克和道格拉征服者改作吉尔吉特（Gilgit），但当地人仍习惯称它为吉里特或萨尔金—吉里特。"如果毕达尔夫考证出来的这一名字的传统是正确的话，那么对于以上所引的哈屯岩刻中所出现的 Giligitta-Saramgha 这个词就要作不同的解释。但是，查克尔瓦尔迪博士指出："首先，出现了 Giligitta 这个词来指吉尔吉特，我们现在仍然不能确定这个名称的来源，但它显然不是梵语。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 1200 多年以来，这个名词的发音一直保持不变，这就证明了一些学者所持的观点，即认为该名称是最近才有的，是站不住脚的。"更早些时候，我们还见过阿尔·比鲁尼所给出的相同的吉尔吉特的形式，它实际上应该拼作 Klkt。在公元 10 世纪古老的于阗语文字里，[72]这个城市的名字拼作 Gidagitti。关于 Saramgha，查克拉瓦尔迪博士写道："它也不是来源于梵文，它显然与中期和新的波斯语 Sar-hang 相关，意为'集合的军队之首'，它的来源应该追溯至伊朗语的 Sar，即'首'（印度—雅利安语中为 Siras），以及波斯语 hang（梵文 Samagha），即'集会'之意。直至今天，还可以在 Sareng 这个词中找到这个词印度化了的形式，Sareng 意为 head of the crew of a steamer，即'一艘汽船的船员首领'。Sargin 和 Saramgha 这两个词是否有什么关联，这很难说，若真有关联，则政府应该在 Gilgit -Saramgha 派有官员。"

吉拉斯

位于印度河上的吉拉斯给锡克人、道格拉人和英国都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有好几种文献资料都提到了它。吉拉斯的人民被称作Chilasi，他们在19世纪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阿尔·比鲁尼则将这个地方称作希尔塔斯（Shiltas）。在于阗塞种人的旅行记中，[72]它是这样被提及的：

“从这里向南是沿金河(Golden River)通往印度国的道路,接下来河岸上是一个叫西拉塔萨(Silathasa)的大城市。因而,……河流构成了市区的一部分。沿岸是石榴树,然后有一座桥连接河的两岸,从西拉塔萨到这座桥需要8天的陆路路程。沿河向南有……(tharkye?), banave树,还有雪松,那里是猴子的居所。这座桥叫做Mangala Cakra……这是前往克什米尔所经过的第一个印度城市，它位于一座山上。”达尼[73]教授对铭文证据作了总结，他说：“古时候，这是毗沙耶（区）的名称，阿尔·比鲁尼称之为希尔塔斯，在吉拉斯本地发现的公元6世纪的岩刻上，它被拼作Silavata。在梵语中，Sila意为‘岩石’或‘石头’，而在当地希纳语中，Vata也是‘石头’之意。在同一岩刻中，该城市的名字还被拼作索摩纳格拉（Somonagara），即‘月亮之城’，在特尔班桥发现的一块公元5世纪的石刻上，也刻有这个名字。”

阿斯托尔

在上述阿尔·比鲁尼的引文中，这个城市被称作阿斯维尔（Aswir），在波斯文的描述中，它被称做哈索拉（Hasora）。这个城市因为地处吉尔吉特至克什米尔的主干道上而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阿斯托尔和吉拉斯这两个城市分别位于南迦帕尔巴特（迪亚玛尔）的东部和西部。

达丽罗（Darel）

Darel等同于玄奘[74]的达丽罗（Ta-li-lo）和法显[75]的陀历（To-

li），这个鉴定是坎宁安[76]作出的。玄奘认为，乌仗那（U-Chang-na）即Udyan（斯瓦特）的首府就在这里。据两位中国朝圣者称，阿罗汉末阐提（Arhat Madhyantika）造的高约100英尺的弥勒像就矗立在这里。作为通往吉泽尔河谷，再向前通往中国的路线之一，达丽罗河谷保存有好几处考古遗迹。

希格尔

在新发现的一处婆罗谜文铭文（尚未发表）中提到了孙迪毗沙耶（Sundi Vishaya），佛像就是在那里制造的。这个孙迪毗沙耶大概可以等同于希格尔河谷。

格尔吉尔

据赫希默杜拉[77]的观点，历史上，现在的格尔吉尔区（Tehsil）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被称作波里格（Poryag），当这个地方变成区首府之后，它就改名为格尔吉尔。

小西藏

也拼作Tibat-i-khurd，[78]在《拉失德史》中，[79]小西藏被当作巴尔蒂。在莫卧儿文献中，[80]从阿克巴时代起，小西藏，即巴尔蒂斯坦就与大西藏（Great Tibet）区别开来了。1589年，分别向小西藏和大西藏派出了特使，它们与这个国家的关系大致是通过克什米尔总督来进行的。

注　释

[1] 1947年，包括巴尔蒂斯坦的整个地区，被称为吉尔吉特特区（Gilgit Agency）。1950年，一位特别政治代表（Political Resident）派驻到了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他充当自由克什米尔的首席顾问。1952年，克什米尔事务局的联合秘书兼管北部地区，并兼任自由克什

米尔的首席顾问。1967 年，北部地区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特别代表的位置，其总部设在吉尔吉特。最后，1972 年，特别代表改为北部地区专员。见《北部地区委员会的报告》，1971 年 12 月，第 4—5 页。也可参见第九章。

[2] I. 穆勒·斯特勒奇特编：《关于达尔德斯坦（巴基斯坦）的人种学材料——来自 D. L. R. 洛里默的遗作笔记：传说Ⅱ，吉尔吉特；传说Ⅲ，奇特拉尔和亚辛》，格拉茨，1980 年，第 191 页。

[3] 这条高速公路是由巴基斯坦和中国工程师共同建造的，1978 年投入使用。

[4] 实际上这是书名，1980 年卡拉奇再版。

[5] 基斯·米勒尔：《相撞的大陆》，1982 年。

[6] R. A. 汗·塔希尔·海利：《巴基斯坦境内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和兴都库什的地质概况》，1982 年，第 1 页和第 23 页。

[7] 同上，第 1 页。

[8] 同上，第 2 页。

[9] R. A. 汗·塔希尔·海利：《科希斯坦地壳构造的演变》，见 R. A. 汗·塔希尔·海利和 M. 卡西姆·江编：《科希斯坦地质概况》，白沙瓦，1979 年，第 126 页。

[10] 同上，第 2 页。

[11] R. A. 汗·塔希尔·海利：《巴基斯坦境内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和兴都库什的地质概况》，第 23 页。

[12]《北部地区委员会的报告》，1971 年 12 月。

[13] I. O. R. R/2（1080/262）。

[14] I. O. R. R/2（1067/93）。

[15] H. C. 汤姆森：《奇特拉尔、斯瓦特和巴乔尔大事记》，拉合尔再版，1981 年，第 26 页。

[16] 乔治·罗伯逊：《奇特拉尔：一次小规模围攻》，牛津再版，卡拉奇，1977 年，第 22 页。

[17] 见第六章。

[18] 乔治·罗伯逊对这个故事的描述更为精彩，见上引书。

[19] I. O. R. R/2/1079/247。

[20] 乔治·罗伯逊：同上引书，第16—17页。

[21] M. 纳齐夫·穆海布·莎哈拉尼：《阿富汗的吉尔吉斯语和瓦希语》，西雅图，1979年，第28—30页。

[22] 同上，第31—32页。

[23] 同上，第36页。

[24] 同上，第37页。

[25] 933号信件，1898年驻吉尔吉特政治代表A. H. 麦克马洪致克什米尔特别代表，《印度官方图书记录》，参见I. O. R. R/2（1079/253）。42号文件，1880—1898年。

[26] I. O. R. R/2（1080/265），整个故事由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S. M.弗雷泽转述给印度政府外交秘书A. H. 格兰特，见其72号信件，1914年2月24日。R/2（1081/263）。

[27] I. O. R. R/2（1085/296）。

[28] J. C. A，第7卷，第1期，1984年7月，第125—132页。

[29] F. 德鲁：《查谟与克什米尔地区》，卡拉奇再版，1980年，第194—202页。

[30] 同上，第376—379页。

[31] A. 杜兰：《边界的形成》，卡拉奇再版，1977年，第126页。

[32] F. 德鲁：同上引书，第402—404页。

[33] A. 杜兰：同上引书，第28—26页。（原文如此——译者）

[34] F. 德鲁：同上引书，第27—28页。

[35] F. 德鲁：同上引书，第360—362页。

[36] A. 杜兰：同上引书，第127页。

[37] 阿瑟·尼夫少校：《克什米尔、拉达克、斯卡杜旅行指南》，第18版，拉合尔，第113页。

[38] F. 德鲁：同上引书，第365—366页。

[38a] F. 德鲁：同上引书，第375页。

[39] 约翰·毕达尔夫：《兴都库什的部落》，卡拉奇再版，1977

年，第20页。

［40］A. 杜兰：同上引书，第142—145页。拼写有变化——Nagar、Nager或Nagir，但它们都来自印度—雅利安语的Nagar，意为“城市”。

［41］同上，第139—140页。

［42］约翰·毕达尔夫：同上引书，第25页。也见G. 巴德勒斯（G. Buddruss）：《吉尔吉特和罕萨的语言研究》，J. C. A，1985年7月，第28页。

［43］A. H. 达尼：《罕萨灵岩》，J. C. A，1985年12月，第1—2页。

［44］F. 德鲁：《印度的北部屏障》，伦敦，1877年，第156—159页。

［45］F. 德鲁：《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卡拉奇再版，1980年，第412—412页。

［46］A. 杜兰：同上引书，第54—55页。

［47］A. 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伊斯兰堡，1983年，第5章。

［48］G. W. 雷特奈尔博士：《1866年、1886年和1893年的达尔德斯坦》，新德里再版，1978年。

［49］约翰·毕达尔夫：同前引书，第8—9页。

［50］奥雷尔·斯坦因：《卡兰纳的诸王流派》，德里再版，1979年，第7章，第911联。

［51］同上，第2卷，第435页；奥雷尔·斯坦因：《克什米尔古代地理》，加尔各答再版，1977年，第131页。

［52］G. 富斯曼：《吉尔吉特的铭文》，B E F. E. O，LXV分册，巴黎，1978年，第18—19页。

［53］详细内容见卡尔·耶特马尔：《钵露罗——北巴基斯坦对政治和种族地理的贡献》，J. C. A，1979年7月第2卷第1期，第39—79页。

［54］塞缪尔·比尔：《西域记——西方世界的佛教记载》，德里，1969，第135页。（此书即《大唐西域记》英译本——译者）

[55] E. 查文奈斯：《关于西方的突厥人的材料》，圣彼得堡，1903 年，第 152—153 页。

[56] W. 富克斯：Huei Ch ‘ao ‘s Pilgerreise durch Nordwestindien und zentra-lsien um 726（即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德译本——译者），S. I-47，柏林，1938 年。

[57] 奥雷尔 · 斯坦因：《克什米尔古代地理》，加尔各答，1977 年，第 131—132 页。

[58] M. A. 迦夫尔：《与阿拉伯征服喀布尔和西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相关的两处亡佚铭文》，A. P. 白沙瓦，1965—1966 年，第 2 卷，第 4—12 页。

[59] V. 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卡拉奇再版，1980 年，第 121 页。

[60] E. C. 萨乔：《阿尔 · 比鲁尼的印度》，伦敦，1910 年，第 1 卷，第 207—208 页。

[61] E. 丹尼森 · 罗斯译：《拉失德史》（《中亚莫卧儿史》），伦敦，1972 年，第 142 页，第 384—385 页。

[62] D.V. 希努贝尔："北巴基斯坦的王家铭刻"，J. C. A，第 8 卷，第 1 期，1985 年 7 月，第 59—67 页。

[63] 同上引书，第 39 页，no. 22. 3；第 50 页，no. 26. 3 及 no. 27. 2；第 51 页，no 27. 6。

[64] 卡尔 · 耶特马尔：同上引书，第 55、57 页。

[65] A. H. 弗兰克：《十八首布诺纳节日歌谣》，I. A，1905 年。

[66] 卡尔 · 耶特马尔：同上引书，第 55 页。

[67] 约翰 · 毕达尔夫：同上引书，第 30 页。

[68] A. H. 杜兰：同上引书，第 200—202 页。

[69] N. P. 查克拉瓦尔迪：同上引书，第 230 页。

[70] 约翰 · 毕达尔夫：同上引书，第 26—27 页。

[71] 同上，第 20 页。

[72] H. W. 贝利：《于阗塞语旅行记》（An Itinerary in Khotanese Saka），A. O，第 14 卷，1936 年，第 262 页。（此即于阗文《克什米尔

行程》——译者）

［72］同上书，第 262 页。

［73］A. 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1983 年，第 2 页。

［74］塞缪尔·比尔：《西域记——西方世界的佛教记载》，第 133—135 页。

［75］同上，第 XXIX 页。

［76］A. 坎宁安：《印度古代地理》，第 82 页。

［77］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二版，1968 年，拉合尔，第 599 页。

［78］S. 马格布尔·艾哈默德及拉贾·巴努：《克什米尔和新德里的历史地理》，1984 年，第 195—196 页。

［79］E. 丹尼森·罗斯：同前引书，导论，第 82、83、136 页。

［80］H. 贝弗里奇英译：《阿克巴本纪》，第 3 卷，拉合尔再版，第 838、921 页。

第二章　作为历史资料的语言

杰勒德·富斯曼教授　撰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1]的语言模式是整个国家中最复杂的。每一道山谷中，都能发现操着巴基斯坦的主要语种如乌尔都语、旁遮普语或普什图语的人们，他们大多是新来的（官员、士兵、旅游者），也有为了谋生（充当售货员、教师、警察等）而不得不在母语之外再学习这些语言中的一种的土著人。这里还有同样是外来者的古贾尔（Gujar）牧人，他们操着自己的古杰里语（Gujari）。北部地区的土著操其他方言：奇特拉尔的土著主要讲科瓦尔语（Khowar）或凯拉夏语（Kalasha），还有希纳语（Shina）的分支——帕罗拉语（Phalura）；在亚辛和伊希戈曼，有希纳语、科瓦尔语、布鲁沙斯基语和瓦希语；吉尔吉特主要操希纳语，某些地方也有布鲁沙斯基语；罕萨主要是布鲁沙斯基语，亦有道玛基语（Domaaki），峡谷的上部则操瓦希语（Wakhi）；巴尔蒂斯坦的居民说巴尔蒂语（Balti）；在吉拉斯，人们使用希纳语；吉拉斯之下的印度河河谷，操的是希纳语和所谓的科希斯坦语（Kohistani），包括玛依央语（Maiyan）、吉里斯语（Chiliss）、戈罗语（Gauro），等等。

在一个主攻历史语言学的语言学家看来，这些语言的起源大不相同：瓦希语是一种伊朗语，巴尔蒂语是藏语，布鲁沙斯基语是单独的语种，科瓦尔语、凯拉夏语、希纳语、科希斯坦语、克什米尔语及附

近的阿富汗人所操的方言一起构成了达尔德语的分支，道玛基语是带有浓厚的达尔德语和布鲁沙斯基语要素的印度—雅利安语。这些术语的运用严格限定在语言学领域内，伊朗语、藏语、印度—雅利安语、达尔德语这些术语仅仅用来指语言，而非指国家或民族。例如，瓦希语是一种伊朗语，而瓦希人却不是伊朗人，也不是从今天的伊朗发展起来的，他们长期居住在帕米尔诸河谷（瓦罕）中。伊朗语仅指4000年前的一些群体所操的语言，据我们所知，这种语言与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的语言相关，与瓦希语却有很大差别，它经历了数十个世纪的演变，成了今天的瓦希语。因为语言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和演进，因此，今天说本族语的波斯人，如一个设拉子人，也绝不可能读懂大流士的古老铭文，铭文所用的语言已演化为现代波斯语或瓦希语，或普什图语和俾路支语等其他伊朗语。

我们确实知道4000年前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说的是哪些语言，但我们却无法指出何种现代巴基斯坦语与公元前三千纪或二千纪时的哈拉巴人（Harappans）所操的一种或几种方言有关系。事实上，埃尔芬拜因（Elfenbein）教授已经提出了许多证据，表明今天俾路支斯坦的布拉灰语（Brahui）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已经消亡的哈拉巴语的遗存，而可能是在穆斯林征服印度北部之后从印度中部引进过来的。今天的大多数巴基斯坦语都是从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入侵者带来的口语形式的语言发展而来的。这些入侵者从西北方向穿越兴都库什山脉的重重关隘而来，他们所说的语言与后来所证实的古希腊语、古拉丁语（后演进为现代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等），古德语（后演进为今天的德语、英语等），古斯拉夫语、古巴尔蒂语（Old Baltic）等等关系久远。这就是为什么自19世纪开始，语言学家们就习惯于将这些语言统称为“印欧语”了。它只是说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些语言一直使用于从欧洲至印度的广大地区，甚至，后来还发现它们流传到了远东地区。它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些说着不同而又相关的语言的人们究竟属于哪一个种族，这就好比读过一本用英文写的书之后，我们不能判定它的作者是英国人，还是芝加哥的美国人，是生于德国、长于美国的犹太人，还是巴基斯坦人，或者是某个英国大

城市的黑人市长。

公元前1500年定居于旁遮普的操印欧语的入侵者称他们自己为"阿利雅"（Arya），即"高贵的"，并据此给他们的语言起了一个很现代、很学究气的名字：Aryan（雅利安）。一部分阿利雅人留在后面的伊朗和中亚，许多部落则翻越兴都库什山脉，最终定居于印度河平原和恒河平原，将先前在那里的居民赶走，或将其吸收、融合。伊朗和印度两个地方关系密切，"印度—伊朗"这个词即由此而来，它是Aryan的同义词。最早用印度—伊朗语言写的文献（《梨俱吠陀》、《阿维斯陀》、古波斯的阿黑门尼德铭文）表明，尽管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印度地区的雅利安入侵者和伊朗、中亚的雅利安殖民者仍然能懂得对方的语言，但他们各自的语言却是在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这样，"七"在伊朗语（Avestic，阿维斯陀语）中是hapta，印度语中则为sapta；"河流"在伊朗语（阿维斯陀语）中是hindu，在印度语中为sindhu，并由此演变为今天的Hind、Indus和Sindh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伊朗的雅利安语或伊朗—雅利安语（Irano-Aryan）和印度的雅利安语或印度—雅利安语（Indo-Aryan）加以区别的原因。为简洁起见，我们通常用伊朗语（Iranian）来代替伊朗—雅利安语（Irano-Aryan），因为在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到来之前，伊朗的每一种语言都是伊朗—雅利安语。但是，"印度—雅利安语"这个长长的名字我们还得继续使用，因为许多的印度语都是非雅利安语（如泰米尔语、马拉亚拉姆语、泰卢固语，等等）。

巴基斯坦的诸伊朗语，俾路支语、普什图语和瓦希语是由后来的入侵者或移民带过来的。今天，大多数操瓦希语的人依然是阿富汗和苏联的侨民。巴基斯坦现存的其他印欧语（即除布鲁沙斯基语、巴尔蒂语和前面提到的属于伊朗语诸语言之外的所有语言），如乌尔都语、旁遮普语、信德语、印德科语（Hindko）等，和印地语、马拉地语、孟加拉语等一样，属于印度—雅利安语族。每个人都知道，今天的国界从操旁遮普语的地域中穿过，而一个拉合尔人可以毫无困难地与德

---

① 这三者都是印度河的名字。——译者

里或阿拉哈巴德的说印地语的人交流。现存的最古老的印度—雅利安语是（梨俱吠陀的）梵语，所有现代的印度—雅利安语诸语言都与之密切相关。因为语言内部的自然变化，这些印度—雅利安语方言之间有着许多差别，以致有时候只有训练有素的语言学家才能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例如，克什米尔语的 sihaith，信德语的 chahathi，旁遮普语的 cheaith，尼泊尔语的 Chiyasath，印地语的 Chiyasath，马拉地语的 sasat，都源于梵语的 sat-sasti，意为“六十六”。隔绝于遥远的山谷中的达尔德语比主要语种印度—雅利安语进化得慢一些：它们在音韵和词汇方面都显得更为古老。这里有一个例子，古印度—雅利安语汇中的“狗”一词，即梵语的 svan-，suna-，在许多达尔德语中至今仍可找到（如克什米尔语中的 hunu，凯拉希语的 sura)，而在许多印度—雅利安语方言中却已经消失了（旁遮普语和印地语均称 kutta)。

通过研究语言演变的轨迹，语言学家有时能发现不同语言之间的联系。对此可以进行不同的解释。两种语言（设为 A 和 B）从前或者是同一种语言（设为 X，X > A 和 B)，或者这两种语言分布在毗连的地区，如果 A 和 B 语言区现在被几种插入的语言（设为 M、N、O）分割开，那么我们可以推断，或者是 M、N、O 在后来侵入到了这个特定地区；或者是一个操 X 语的人群（或后来的操 A/V 语的群体）从它先前的所在地移居到了现在这个地方。而借自相近或相距较远的语言的词语也包含着许多信息。外来语可能随一种新的宗教而进入（如伊斯兰国家有许多阿拉伯语词汇)，也可能随一种先进的文化而引入（如乌尔都语中的波斯语和突厥语词汇)。它们还可能随移民的进入而进入，这些移民带来了异国文化，并且通常在政治、经济上都占有统治地位（印度诸语言中的波斯语词汇和英语词汇即是一例)。贸易也会将外来语随外来产品一并带来，因此你可以在英国人或法国人从未去过的地方找到英语或法语词汇。有时，要弄明白一个词汇是如何被借用过去的，还真非易事。例如，达尔德诸语言中有许多阿拉伯语词汇，其中一部分（极少的一部分）是通过毛拉诵读《古兰经》直接引入的，其他的则是通过波斯语诗歌和波斯行政管理语言而来（直至 1950 年，罕萨和奇特拉尔等地还在教授这种波斯语诗歌和行政语言)；还有一些阿

拉伯语词汇是19世纪末从克什米尔语借用过来的，而克什米尔语中的阿拉伯语词汇又转引自波斯语；还有一部分则是从乌尔都语借用过来的。乌尔都语过去是通过波斯语借用阿拉伯语词汇，现在则直接从阿拉伯语中汲取。

必须再三重申的是，语言学能告诉我们关于一个地区的文化历史的许多东西，作为种族史研究的一种资源，它留下了许多可供开发的空间。让我们举三个印度语的例子来论证这个观点，这种例子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在印度的大部分英国人都是苏格兰人（Scots）或爱尔兰人，他们自己的语言对英—印语（Anglo-Indian）和印度诸语言都毫无影响。就算语言学能将今天的旁遮普语与早期吠陀时期居民的语言联系起来，并且从印地语和波斯语中找出早期或后来的外来语的话，它也不能帮助我们确定1985年的一位操旁遮普语的农民的语言中的哈拉巴语、雅利安语、伊朗语、塞语、贵霜语等等的成分，也不能分辨出他身上所融合的匈奴、阿拉伯、波斯、阿富汗、突厥甚至英国或法国语言所占的比例。现在，许多巴基斯坦人所使用的主要语言是乌尔都语，但其中有多少人是来自乌尔都语的摇篮——德里—阿利加尔地区的呢？我们要永远记住，个人和整个民族都可能被迫或自觉地使用另外一种语言，从而使得他们原来的语言可能在数代之后完全消亡。如果没有文字记载的话，这种消亡甚至是不留痕迹的。因此，语言的名称从来就不是种族的名称。在本章中，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肯定地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今天的达尔德诸语言就是从前的达尔德人所操语言的分支。根据保存于自希罗多德至克什米尔编年史之中的大量早期证据，我们知道，达尔德人居住在印度河上游河谷以及克什米尔谷地北部的山区中，达尔德语（Dardic）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名词，它不具备人种、种族或历史的意义，也没有什么隐藏的含义。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达尔德诸语言

科瓦尔语

科瓦尔语是奇特拉尔的主要语种，约有 10 万奇特拉尔人操科瓦尔语。此外，亚辛亦有人说科瓦尔语。通过婚姻的联系，远在吉尔吉特的许多家庭也懂科瓦尔语。奇特拉尔盛行寄养之风，奇特拉尔贵族之子也由养父母带大成人，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语言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自 1917 年，尤其是自 70 年代以来，一些科瓦尔语的教科书开始使用阿拉伯文字。

精选书目（略）

凯拉夏语

在奇特拉尔下部的一些山谷里，大约有 3000 人仍操凯拉夏语，其中一部人还是异教徒。凯拉夏语包括多种方言，但最主要的是凯拉夏的乌尔德孙（Urtsun）方言和分布在更北面的拉姆布尔（Runbur）、勃姆布列特（Bumboret）和比利尔（Birir）山谷中的方言。

精选书目（略）

希纳语

希纳语是吉尔吉特特区所使用的主要语言，它分布于吉尔吉特河谷，以及印度河上游从帕拉斯（Palas）至印度河与吉尔吉特河汇合处的地段。北部的伊希戈曼河谷和罕萨，东部的巴尔蒂斯坦（德拉斯、达赫—赫努）也可以找到说希纳语的人，而整个阿斯托尔河谷都属于希纳语区。希纳移民将他们的语言带到了（在两个世纪以前?）奇特拉尔东南部的帕罗拉（Phalura）和库纳尔河谷，即今阿富汗东部（Savi，萨维）。卡尔·耶特马尔在《兴都库什的宗教信仰》（Religionen des

Hindukusch，斯图加特，1975 年，第 187—189 页）一书中对希纳语的分布范围作出了最好的报告。操希纳语的科希斯坦部落居住在被群山阻隔的小山谷中，部落与部落之间战争不断，这就难怪希纳语分成了许多方言区，而且各方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以至于一个地方的操希纳语的人听不懂一个来自远方的人所说的希纳语。在某些时候，这种差别极大，以致这些方言可以自成一体，如帕罗拉和萨维等希纳语方言就直接称作帕罗拉语和萨维语。人们了解最多的希纳语方言是吉尔吉特地区的方言，以及帕罗拉方言和萨维方言。一些优秀的学者也研究过丹吉尔和帕拉斯等希纳语方言。在这方面还有太多问题需要研究。现在德国学者 G. 巴德勒斯（G. Buddruss）正在研究关于吉尔吉特的希纳语的一个课题。自 1974 年以来，希纳语文学作品（小说和诗歌）已采用阿拉伯文字来写作。

精选书目（略，仅存方言条目）

a）吉尔吉特方言

b）帕拉斯方言

c）丹吉尔方言

d）帕罗拉话

e）萨维话

f）克什米尔语与希纳语的关系

玛依央语

玛依央语是所有达尔德语中最鲜为人知的一种，它是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的多种语言之一，因而也被称作科希斯坦语。玛依央语主要分布于印度河右岸的杜贝尔（Duber）和甘迪亚河谷中。玛依央语和它的假定的方言之间的关系不甚明了。它的假定的方言更鲜为人知，如吉里斯语和戈罗（Gowro[①]）方言等，它们分布于印度河左岸，被希纳语区团团包围。玛依央语包括两种主要的方言：玛尼话（Mani），分布于塞奥/巴坦和本格尔（Bankar）；曼扎里话（Manzari），分布于甘迪亚

① 原文如此，上文拼为 Gauro。——译者

和杜贝尔。如果 G. 巴德勒斯所公布的抽样调查属于玛尼次方言的话，那么近年来，人们只对玛尼话作过研究，抽样的玛依央语分布于一个孤立于操希纳语的丹吉尔山谷中的极小的村庄里。在印度河左岸的巴代拉（Batera）周围，人们说着一种新近被发现的方言巴代尔维（Batervi），它的抽样标本尚未公布，有人怀疑它是否与玛依央语有关，因为它似乎与希纳语没有关系。

精选书目（略）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非达尔德语言

在这个地区（阿里阿巴德、吉尔吉特、吉拉斯、斯卡杜）的主要巴扎和官员、士兵驻守的地方，你可以听到乌尔都语、旁遮普语和些微的普什图语，这里还有少数人懂得波斯语。只有新来者才将其中的某种语言当作自己的母语，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却不完全懂得它们，只把它们当作自己的第二或第三语言。当地人当作母语来使用的非达尔德语只有布鲁沙斯基语、道玛基语、瓦希语和巴尔蒂语。

布鲁沙斯基语

布鲁沙斯基语是罕萨河谷的主要语言，分布于罕萨河中游两岸，右岸（罕萨本土）和左岸（纳格尔）共有两万多居民使用这种语言。在亚辛和吉尔吉特河谷中也有部分人操罕萨语。主要的方言差异存在于亚辛的更为古老的叫作“韦尔吉格瓦尔”（Werchikwar）的方言和罕萨—布鲁沙斯基语之间，纳格尔方言与罕萨方言没有太大的不同。布鲁沙斯基语没有文字，只有欧洲学者用罗马语音文字记载的故事。著名的苏菲诗人纳西尔·乌丁·罕萨伊（Nazir Uddin Hunzayi）用带着浓浓的波斯语风味的方言来写作，他认为这是最适合诗歌的语言。据我所知，他的作品至今没有在巴基斯坦出版。

尽管布鲁沙斯基语是一种十分古老且与其他语种没有什么关系的语言，但从 19 世纪中期以来，仍有大批优秀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许

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德国海德堡的 H. 伯杰（H. Berger）教授正准备编写一本新的罕萨和纳格尔方言的语法和词典，这将是学术界的一桩大事。

精选书目（略）

道玛基语

道玛基语是定居于罕萨的约 500 人的道玛人（Doma）或贝里久人（Bericho）所操的语言，在吉尔吉特和罕萨河谷较低部分一些操希纳语的村庄中也有一些操道玛基语的家庭。欧洲人称道玛人为吉卜赛人，而在印度工作的人种学家称之为下等种姓，他们主要是音乐艺人和金属品工匠，他们生活在说布鲁沙斯基语和希纳语的社群之中，因而不得不学会他们的主顾的语言。他们会说两种甚至三种语言，以至于他们自己的道玛基语在语音和词汇方面都受到了布鲁沙斯基语的深刻影响，还在较小程度上受到了希纳语的影响，不过，道玛基语的核心显然还是印度—雅利安语。

道玛基语是一种正在死亡的语言，德国的美因茨大学的 G. 巴德勒斯教授正在修订和增补 D. L. R. 洛里默发表于 50 年前的关于道玛基语的开山之作。迄今为止，他才发表了一些初步的注解，但这些注解极为重要，以至于如果不先读它们，便无法利用洛里默的著作。

精选书目（略）

瓦希语

奇特拉尔（上亚尔亨河谷）、上伊希戈曼河谷和上罕萨河谷（古尔米特以上）有 3000 多人操瓦希语。瓦希语属伊朗语的帕米尔分支。实际上，大多数说瓦希语的人生活在乌浒河河谷上部，以及今阿富汗（瓦罕）和苏联的部分地方。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操瓦希语的群体（于 100 多年前?）从原先所在的乌浒河上部出发，经过连接瓦罕、亚尔亨、伊希戈曼和贾帕尔桑（Chapursan）诸河谷的伊尔沙德（Irshad）山口来到那里。罕萨的瓦希语与阿富汗和苏联的瓦希语没有太大的差别，它稍为陈旧一些，尤其在词汇方面。

精选书目（略）

巴尔蒂语

以斯卡杜为中心的巴尔蒂斯坦西部地区的居民操巴尔蒂语，这是一种藏语方言，接近于拉达克话，巴尔蒂人和拉达克人能听懂彼此的语言。

北部地区语言变化概述

历史永远都不会重复，同样的发展变化不会发生两次，因而我们在用现代的证据来重新建构历史时必须小心谨慎，而历史也会警示人们不能仓促地作出结论。对于打算重建这个地区从前的语言分布图，即想要追寻由种族变化（移民、征服、同化、分裂，等等）而引起的语言变化的学者而言，近两个世纪以来奇特拉尔、吉尔吉特、罕萨和印度河科希斯坦的政治历史是值得研究的。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直到19世纪末（对印度河科希斯坦的某些部分而言则是到20世纪60年代），北部地区在自然地理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没有经历太多的变化：没有道路，没有现代桥梁，没有现代的国家机器、警察、海关，也没有自动火炮、汽车、直升机；剑客们仍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夙仇仍在继续；因为不能大量输入谷物，各村庄不得不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贸易活动仅在小贩之间展开；通道和关隘在冬季因为冰雪而被封闭，在夏季时也会经常因为激烈的战争、复仇和打劫而关闭。我们可以推测，在过去的若干世纪中，那里的状况没有什么变化。不管怎样，那里从未有过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来维持法律和秩序，我们甚至可以怀疑是否存在过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它至多只能维持主要干道的畅通无阻，给旅行者和使节提供相对的安全保障。

现在我们从这里的近代历史中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教训。

整个的语言可以消逝得无影无踪（见吉里斯语，戈罗语），迄今为止还有一些语言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如巴代尔维语），这意味着许多证

据就此永远亡佚。在未来的年代里，罕萨的多姆人（Dom）也许就将忘记他们现在的语言。在未来的几代人中，他们也许将忘记自己的外来血统。希纳语地区也许就发生过同样的变化，那里的一些操希纳语的种姓或许就是外来者，尽管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证实这一点。

在整个河谷地区，人口可能因为传染病的蔓延、战争或饥饿而减少。为了逃避危险，或为了到更好的地方定居，整个群体确曾迁离原来的居住地。有时候，他们选定的新居所是荒无人烟的地方；有时，那里有富余的空间，可以给这些新来者提供地方；有时候，他们须将原来在那里的居民逐走，或将其灭绝，或将其同化。所有这些过程都在现代的印度河科希斯坦得到了证实。

通过这种方式演进而来的居住模式十分复杂。你会发现有时候是一个群体孤立于说别种语言的村庄中，并与它自己的语言之根相隔绝（例如，丹吉尔的希纳语区的操玛依央语的小村庄和吉尔吉特河谷中一些操布鲁沙斯基语的定居者），甚至有些家庭分散于不同的村庄中，而这些村庄中的居民也是从其他地方迁移过来的外来者（如在操布鲁沙斯基语的村庄中的多姆人）。喀喇昆仑南部的语言区是不同语言区的紧密联系的集合体，而不是一个个连续的、同类的语言区。

我们知道，这个地区至少有四个种族群体操着前所未知的语言，这些群体是近些年搬迁到吉尔吉特河谷的，两个群体（多姆人、古贾尔人）从印度平原穿越克什米尔或巴尔蒂斯坦而来，另两个群体（瓦希人、吉尔吉斯人）来自阿富汗帕米尔高原。最后到的那个群体经由拉赫曼古尔（Rahman Gul）而来，他们离开了在阿富汗帕米尔高原的牧场（他们也是新近搬迁到那里的），部分定居在伊希戈曼河谷，部分定居于吉尔吉特本土。几个月之后，他们又迁徙到土耳其（Turkey），重新定居于凡湖（Van Lake）附近、先前的亚美尼亚居住者腾出的地盘上。如果这件事发生在30年前，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北部地区的语言“马赛克拼图”上再加上另一个语言群体：一个操突厥语的部落，这个部落数年前从苏联的吉尔吉斯分离出来，在阿富汗帕米尔居住了多年之后又移居到吉尔吉特和印度河河谷。现在，我们可以很精确地说，塞种部落是在公元前1世纪离开他们原先在帕米尔高原的牧场，进入

伊希戈曼河谷，从那里向下抵达吉拉斯和犍陀罗的。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证据来了解这次持续了整整十年的移民活动，这些证据包括中国官方历史学家的记载、巴基斯坦的考古发现、苏联帕米尔高原的墓葬发掘，以及刻在吉尔吉特和印度河沿岸的岩石上的名字的模糊证据，等等。这次移民没有给该地区的语言分布造成任何影响，因而我们无法在北部地区的已知语言中追寻它的踪迹。

如果没有人种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记载，古贾尔牧人来过北部地区这一事实将无人知晓，因为通过分析这一地区的主要语言并不能发现这一事实。人们将古杰里语（Gujri）视作地位卑微的游牧民群体的语言，而这个群体的成员又没有同当地人融合，因此在达尔德语或布鲁沙斯基语中都找不到来自古杰里语的词汇。古贾尔人离开后，没有给北部地区社会留下任何影响。地位较高的旅行者、专业的手艺人、修士和朝圣者的语言也曾有过同样的情况，这些人到这里来谋生，住上数月或数年，然后返回故乡，或是去往更远的地方。粟特语（Sogdian）即是一例，操粟特语的旅行者的名字留在了罕萨和夏迪亚尔的岩石上，许多佛教信徒所操的中国话也是如此，同样情况的可能还有吉尔吉特佛教寺庙里的外国僧侣所操的中印度语和于阗的塞种方言。

道玛基语告诉我们的是与欧洲吉卜赛人（或 Romani，罗马人）的语言的历史十分相似的另一个故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至公元 17 世纪或 18 世纪，一个很小的职业群体如何能够从印度平原移民过来（不知途中经过多少次停留），并在一个遥远的、欧洲人认为是完全不让外来者进入的闭塞的山谷里定居下来。他们在那个社会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只要他们祖祖辈辈待在那儿，不与自己群体以外的人通婚，他们就能保存他们自己的语言。因为要进行多语言交流，他们逐渐从他们的顾客和保护者的语言中借用了大量的语汇，甚至道玛基语的音位系统也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但其语言核心仍然是印度—雅利安语，这就使得语言学家能够追溯出它先前的所在地。只要道路一开通，社会禁令不再那么严格，多姆人能够进入政府部门，不再承受那么严重的歧视，他们就会放弃那种低下的语言，年轻人就会倾向于仅仅使用他们的顾客的语言。数代之后，正宗的道玛基语就会完全消失，而且不

会在邻近的布鲁沙斯基语和希纳语中留下任何可觉察得到的痕迹。然后，人们也就会忘记多姆人的外来血统。

瓦希语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灭绝的危险，它的社会分布也截然不同：尽管操瓦希语的群体的地理区域在语言分布图上显得比较孤立，但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分布于边界两边的相连的语言区域，操瓦希语的人也没有被迫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别的语言。他们现在的所在地（今苏联和阿富汗）受历史和经济变化的影响较少，因而他们的语言必然会保存许多古语。迫于一种与之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即塔吉克波斯语的压力，这些古语已经从苏联的瓦希语中消失了。

玛依央语不尽为人所知，因为它的历史形态在某种程度上被重构了。这样，我们只剩下了三种达尔德语（凯拉夏语、科瓦尔语和希纳语）和布鲁沙斯基语。作为一种没有任何语言联系的古老的语言，若干世纪以来，布鲁沙斯基语似乎是本土的语言。但我们不知道第一批操布鲁沙斯基语的人来自何方，就像拉赫曼古尔的吉尔吉斯人或多姆人给我们的提示一样，他们可能来自非常遥远的国度，或来自亚洲内地，或来自印度，他们的迁徙也许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因为在今天的布鲁沙斯基语中没有突厥语词，也找不出太多的印度—雅利安语词。在阿拉姆桥和印度河河谷上部的岩刻中有一些人们看不懂的文字，和一些中印度方言文字，其间还夹杂着一些不明来源也不知意义的词语(公元6世纪—7世纪)，这种未知的、而又显然不是雅利安语的文字可能就是布鲁沙斯基语的一种原始形态。因为有一段岩刻文字提到了Daradaraja，因此很有可能在公元第一千纪及其后渗入克什米尔河谷的历史性的达尔德人中有一些操布鲁沙斯基语的人群，这就意味着从前布鲁沙斯基语分布到了比它今天的位置更低的南面。实际上，如果假设过去布鲁沙斯基语也分布到了吉尔吉特河谷和巴尔蒂斯坦西部，那今天的语言分布图就能得到最佳的解释。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听起来令人信服的假说却无法得到证实。但不管怎样，读者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尽管布鲁沙斯基语区是非常连贯的，几乎没有什么方言的差别，但罕萨人（Hunzakuts）还是吸收并同化了许多移民，这些移民不仅包括令人讨厌的多姆人，也包括王室、贵族和毛拉，他们在数

世纪前从巴达克山而来，从此不再说他们的母语——波斯语。

在许多世纪中，所有的达尔德语言都是土生土长的，这里有一个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阿育王（公元前3世纪）及其后的岩刻表明曾经存在一个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称之为犍陀罗语（Gandhari）的西北方言群，即犍陀罗（Gandhara）从前的语言（现在那里是一个普什图语区）。从总体上讲，这些方言比当代中印度方言或俗语（Prakrits）要更古老一些，在今天的达尔德诸语言中还可以找到这些古老方言的只鳞片爪，但这些古语古词并不能充当决定性的证据，因为人们可以将它们追溯到所有印度—雅利安语方言的共同起源，它们并不能证明现代的达尔德诸语言曾经历过一个犍陀罗语时期。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是两者所共有的特别的变革：如果能证明犍陀罗语和达尔德诸语言均表现出其他印度—雅利安语所没有的变化，那么，我们就有相当大的把握说达尔德语承续了从前的犍陀罗语或是它的一个分支。现在我们至少发现了一个这样的特有的变化：古印度—雅利安语中的*ks*,[①] 到中期印度—雅利安语中变作*KKh*，而在犍陀罗语中为*cch*，写作*ks*。这样，我们就有梵语中的*aksi*，"眼睛"，巴希格里克（Bashkarik）语中的*ec*，吉里斯语中为*ace*，戈罗语中为*ac*（读作*ace*，ac?）克什米尔语中的*achi*，凯拉夏语的*ec*，玛依央语的*ache*、*achi*，希纳语和帕罗拉语中为*achi*，它们不同于拉亨达语（Lahnda）和旁遮普语中的*akkh*，印地语中的*akh*，等等。梵语中的*ksetra*，"田野"，在凯拉夏语中是*chetr*，科瓦尔语中为*chetur*，帕罗拉语中为*Chitru*，希纳语中为*cec*，但在拉亨达语中为*Khetru*，旁遮普语和印地语中为*Khet*，等等。从这一情况及其他证据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命题：现在的达尔德诸方言与犍陀罗语是有关联的。在白沙瓦地区，没有遗留下任何承续了这种古老的犍陀罗语的印度方言。最后消失的是蒂拉希语（Tirahi），若干年前阿富汗贾拉拉巴德（Jalalabad）附近地区还在使用这种语言，操这种语言的是19世纪时在阿夫里迪（Afridi）人的驱逐下离开蒂拉赫（Tirah）

---

① 这里以及本段下文中有关词语的转写，部分字母在本书第一版中带有各种手工添加的符号，有的难以辨认。在本书第三版中，有关符号已被省略。故译文亦从简，不再添加有关符号。——译者

的移民的后代。现在，这种语言肯定已经完全消亡了。在西北边境省，只能找到后来的移民所带来的现代伊朗语（俾路支语、普什图语），或由最高政治努力带来的语言（乌尔都语、旁遮普语），或由印度教商人带来的语言（印德科语）。

现在我们可以证明，希纳语与蒂拉希语有着某种联系，这意味着原始蒂拉希语和原始希纳语曾有过密切的关系（或有 X > A + B，或 A 和 B 分布在毗邻的地区，见前文）。这样我们必须假设原始希纳语曾经分布到了印度河河谷南部更低的地方，也许远及塔贝拉（Tarbela）。当帕坦部落征服了这些地区，同化了那里的人民，强行推行普什图语的时候，蒂拉希语和希纳语只得让步，它们就在这时相互分离了。在此过程中，达尔德语区南部分裂了：人群移居到不同的山谷中，在那里开始自己的生活，其结果便导致了现在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语言分布的混杂状况。在这一过程中，很可能希纳语将布鲁沙斯基语推向了更北的地方，并在吉尔吉特地区的许多地方取代了它。但是应该提出的是，吉尔吉特河谷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语言，我们有证据表明，在公元第一千纪，那里至少有三种语言，塞语、印度—雅利安语和（原始布鲁沙斯基语?），还应加上藏语，尽管藏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①，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已知的历史事实（在好几个世纪中，吉尔吉特都是臣服于吐蕃的）推知它的存在。

G. 巴德勒斯最近的研究指出：吉尔吉特的希纳语和布鲁沙斯基语的音位系统极为相似，两种语言有着共同的语法结构以及大量相互借用的词语。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这两种似乎是毫不相干的语言有过很多年或很多世纪（但未必是上千年）的联系。一种新近进入的道玛基语也有着与希纳语和布鲁沙斯基语类似的特点。而特别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去考查希纳语的分支，如帕罗拉语和萨维语，或遥远的方言如帕拉西语（Palasi）或古雷兹语（Gurezi），看看它们是否在这些方面接近于吉尔吉特语，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至少帕罗拉语和萨维语并不与吉尔吉特语相近。这就表明，吉尔吉特的希纳语和布鲁沙斯基语之

① 这种痕迹是存在的。在巴尔蒂斯坦、罕萨和亚辛河谷达尔科特山口下方，都发现了藏文岩刻。——译者

间的深入交流是局部的、相当迟的现象。

科瓦尔语和凯拉夏语属于最古老的印度—雅利安语，两者都与犍陀罗语相关，并且拥有一些相同的非常有特点的古语（如：古印度—雅利安语中的 *-t-*，已经从其他的印度—雅利安语中消失了，但却以 *-l/r-* 保留在凯拉夏语和科瓦尔语中）。但是，尽管它们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它们的地理起源却完全不同：凯拉夏语来自南面，从今天阿富汗而来，那里的瓦依加尔（Waigal）河谷至今仍叫做凯拉舒姆（Kalashum）。操凯拉夏语的人们似乎是在数世纪以前被努里斯坦人部落（Nuristani tribes）驱逐而离开了那个地方，他们推进到奇特拉尔的下部，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完全占据了那个地方，直至后来被操科瓦尔语的奇特拉尔人或科人（Kho）赶到他们今天的所在地，而这些操科瓦尔语的奇特拉尔人或科人的老家显然是在奇特拉尔北部。

科瓦尔语在语形学上与其邻近的伊朗语有许多共同点，它从伊朗语中借用了大量词汇。我们知道奇特拉尔总是开放地接受伊朗的巴达克山的影响，可以证实有许多外来词是通过伊斯兰教和波斯语的文学作品传播过来的。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一方的原始蒙吉语（Munji）、原始伊德迦语（Yidgha）、原始瓦希语等从古时代起就和另一方的原始科瓦尔语有过联系，那么许多事情就好解释得多了。尽管那表明原始科瓦尔语在很早的时候就分布在奇特拉尔北部它原来的地方了，但从它与犍陀罗语的关系，我们还是可以知道，也许在公元前第一千纪时，它不得不从更南的地方穿越斯瓦特和迪尔而来。

一切都表明现在北部地区的语言分布是较近的时候形成的，许多方言土语都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许多群体迁移了，许多群体不得不采用征服了自己的胜利者或是主顾的语言。达尔德诸语言就是幸存的一个很大的语言区，这个大语言区遭到普什图语和旁遮普语（现在则是乌尔都语）连续不断的侵犯，这种侵犯至今仍在继续，普什图语和乌尔都语很明显地侵占了越来越多的地盘。在早期，这些变化通常都是被强加给这些地区的人民的，现在这种语言变化的潮流已经平和多了，但政府还是经常地被提醒说，将任何语言强加于一个少数人的群体是有害的，也是没有用的，而如果他们明白自己并不是被迫学习另

一种语言，并且认识到这种语言是有用的，那么他们就会自觉地学习而没有任何怨言。

精选书目（略）

注释

［1］在这里我们不涉及斯瓦特河谷的语言。自公元15世纪以来，斯瓦特人使用的便是普什图语，尽管在河谷上部，靠近卡拉姆的地方仍有人以巴希格里克语（Bashkarik，亦称Garwi）或托尔瓦里语（Torwali）为母语。巴希格里克语和托尔瓦里语都是达尔德语。

第三章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人种学概观

卡尔·耶特马尔教授 撰

"北部地区"，也可称作"巴基斯坦的跨喜马拉雅地区"。它的南部边界由大喜马拉雅主山脉西部的大部分构成；它的北部边界相当于兴都库什最东端以及喀喇昆仑的西部；从奇特拉尔起，它们被近来称为兴都拉杰（Hinduraj）[1]的山脉分隔开来；东部以巴尔蒂斯坦与波里格的分界线为界限，大致相当于巴基斯坦与印控领土之间的停火线。这道停火线穿过印度河河谷和希约克河河谷，沿德沃萨依高原的东部边界山脉延伸。

北部地区内部的主要分隔是被地质学家称为"南迦帕尔巴特—赫拉毛希尖坡"（Nanga Parbat-Haramosh spur）的山系。这道屏障在北部受惠于流经隆多峡谷的印度河，在南边受惠于在南迦帕尔巴特东部灌溉并形成了一个扇形山谷的阿斯托尔河。

北部地区现在的政治和行政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地理位置相符的。隆多峡谷的东面是有着两个分区（Sub-division）的巴尔蒂斯坦县（District），据报告，1972 年斯卡杜分区有 89000 人，哈伯罗有 78000 人。

西部地区包括两个县（District）：吉尔吉特山脉的北部和南部。北部县——吉尔吉特本土——包括吉尔吉特河灌溉的河谷，以及沿印度河、欣果斯（Shengus）山口和本吉盆地之间的陆地，欣果斯山口过去

横亘在穿越隆多峡谷的路径当中。南部县——迪亚玛尔——其中心在吉拉斯，始于丹吉尔/达丽罗（印度河的另一边属于印度河科希斯坦，一直到巴夏河谷的谷口），向东一直延伸到阿斯托尔，即南迦帕尔巴特—赫拉毛希尖坡的东部。据1972年人口普查，吉尔吉特县的人口数为158000人，其中吉尔吉特分区51000人，罕萨/纳格尔52000人，“政治管区”（Political Districts）55000人。迪亚玛尔县的人口为90000人，其中吉拉斯29000人，达丽罗/丹吉尔25000人，阿斯托尔36000人。

这意味着1972年北部地区的总人口约为415000人。1962年以来，许多分区的人口增长率约为30%。人口过度增长所带来的后果将会很快得到讨论。

这样一些零散的河谷却能在很多方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要归功于这个地区近年来的数次改革。尤其是公立学校的建立，这些公立学校通用乌尔都语，将它当成一种混合语，然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却是道路的建设，不仅喀喇昆仑高速公路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穿越隆多峡谷、连接吉尔吉特和斯卡杜的道路亦显得十分重要。从前不可跨越的河流上现在架起了许多桥梁，而可容吉普车通行的公路已经通到了遥远的支谷，还有一些道路正在修建之中。连接吉尔吉特、斯卡杜与伊斯兰堡的航线也很重要。如著名的充气的牛羊皮的“皮筏”一样，传统的由细桦木树皮（或柳条）编织的绳索搭成的吊桥也已经完全消失了。

富斯曼教授已经对语言的状况进行了描述（见第二章），他将奇特拉尔和印度河科希斯坦纳入了他的考察范围，但却忽视了巴尔蒂语方面的情况，而巴尔蒂斯坦有不下于150000的居民仍然操这种古老的藏语。在罕萨和亚辛约有40000人以布鲁沙斯基语为母语。我现在无法说出操科瓦尔语、古杰里语、瓦希语和道玛基语的确切人数，也无法说出到这一地区来从事服务、经商等行业的人们所说的语言的数量。许多淘金者和其他最初来到这一地区的手艺人和奴隶操的是科希斯坦语（Kohistani）。

几乎有一半的人操希纳语。希纳语有许多方言，其中一些方言保存了似乎是另一种语言的基础，那也许是一种没有记载的达尔德语。

希纳语肯定是由最近一批从南部来的移民带来的，也许传入后就服务于一个中央政治势力，后来，直到拉达克的许多殖民地的殖民者将其传到了更远的东部。

环境和经济：一般特征

我们可以将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一些总括性的描述。

北部地区在大喜马拉雅山脉的后面，因此，这里的降雨量比南部，如印度河科希斯坦要少，这是北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最主要的特征是峡谷中雨水稀少，降水几乎全部发生在海拔较高的地方，从而形成雪地和冰川。因此，这个地区实际上没有一块地方可以依靠直接降水来耕种。在河谷的谷底，如印度河沿岸，空气极为干燥，太阳下山之后好长一段时间，热气仍然源源不断地从光秃秃的岩石发散出来。因此，这里的每块地都需要浇灌。而另一方面，这又使得这里能够种两季作物，有时这里的年单产量比地势较低的地带还要高。

河流的河床深深地切入了岩石和沉积物之中，河流的流量变化很大，夏季的最大流量和 10 月至 4 月间的最小流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20∶1 的比例十分常见。这就意味着，人们不可能修建渠道来引主河道的水流，河岸的土地也不能耕作，只有来自支谷的溪水可以利用。

然而支谷的出口是堆满沙砾卵石的扇形冲积面，有时，突然的降雨会导致严重的洪水。因此，人们最好是用渠道将水输送到冲积扇边缘保护得较好的地带，并在那里建造家园。

这只是这一地区的自然局限之一，另一个自然条件的缺陷是缺少粪肥。粪肥的最佳来源是牲畜，但由于所有低洼地带（以及支谷及其谷口）的适合的土地都用作了耕地，而较高处的草场离这些耕地又有相当的距离。因此，人们必须收集人粪和渠道中被来自冰川的水冲积而沉积下来的污泥当作肥料。在罕萨和巴尔蒂斯坦都可见到这种做法，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能完全取代牛粪来充当肥料。

为牲畜储备冬季饲料是一件非常费劲的事，但人们可以将大批山

羊放养在吉尔吉特山脉以南的常绿圣栎树（*Quercus ilex*）林带。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人工肥料输入以前，没有牧养牲畜的地方的土地都不肥沃。因此，人们有必要将农牧资源结合成一个平衡的有机的整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移民过来的牧人或其他专职人员的群体都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获取属于自己的土地，否则在春季时他们就要被农民敲诈，甚至是勒索。在第一次收割之前经常会发生粮食紧缺,也没有分支市场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在人们心目中,一些职业人员——古贾尔人、多姆人、玛罗特人（Marut，即淘金者）比农民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他们要在该地区安稳地生存，就必须有与政治中心的直接联系，或有一种 Jajmani 制度[①]的保障。Jajmani 制度是一种与农民结成私人关系的制度，但没有在印度教地区见到的那种等级关系的宗教内涵。

这一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大麦、黍、荞麦和豆类，现在又加上了玉米和土豆，这两种作物还部分地取代了前面提到的作物。同等重要的还有水果，杏和葡萄种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地势较低的地方种的是桑葚，它们可以被储存起来（大多数时候被风干），成为重要的过冬物资。

因此我们在一些地方发现有大量剩余物资，但只有极少的物品用来出口，如酥油、杏干，或动物。这也许可以解释从前的一种到处可见的现象，即出卖奴隶以换取一些进口的奢侈品。金砂也被用作同样的目的，有些地方用金砂来购买农奴。

伊斯兰教的多种形式

自从印度教徒，即与道格拉人一起来的士兵、办事员和小商人在分治之后离开这里，这里的人口就全是穆斯林了。但是，伊斯兰教是

① Jajmani 为印地语词，源于 Jajman，据《乌尔都语大词典》，Jajman 指让理发师等下等人为自己服务并付给报酬之人，并有主人、雇主、领主之义。此处 Jajmani 制度当是指古贾尔人、多姆人、玛罗特人等取得农民即土地所有者雇佣的制度。——译者

逐渐地从不同的地方引进的（见第六章），因此，这里有三个，或更确切地说是四个分立的宗教派别。

奇特拉尔的历史上曾有一个被称作是塔杰·莫卧儿（Taj Moghal）的王子，他来自西部的巴达克山，他征服了直到布尼亚尔、亚辛和罕萨的整个地区。在这个入侵者的强势力量下，连吉尔吉特的统治者也不得不表示服从。这场征服战争的严肃目的却在于将伊斯玛仪信仰传播到整个山谷地区。为着同样的目的，后来又爆发了一场战争，但不如这次成功。

现在我们还不能判定这位入侵者是历史记载上的哪位人物，但这个故事与我们从其他材料获得的信息是一致的。蒙古人在巴达克山与当地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那里的情况与伊朗西部大不相同。忽必烈·汗（公元1260年—1294年）时期，巴达克山的马立克（Malik[①]）帕赫尔万（Pahlvan），在当地的伊朗人中占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位置，也许Taj这个词是汉文头衔“太师”（Taishi）的讹称，本指蒙古统治集团中官阶分明的强大的封建主。

这与赫希默杜拉·汗（Hashmatullah Khan）所写的《查谟与克什米尔史》[②]一书中的信息是一致的，他说，在多尔·汗（Tor Khan，公元1290年—1335年）统治时期，吉尔吉特遭受了“塔杰·莫卧儿”的攻击，当地人民被迫皈依伊斯玛仪信仰。多尔·汗开始信奉这种教义，并致力于它的推广和传播。因此，当地的伊斯玛仪派信徒被称作Mughli，后被称作毛拉伊（Maulai）——看来这是当时一个很流行的词源。

据说，吉尔吉特西面的大部分地区（不仅包括奇特拉尔北部，还包括戈赫［Kuh］和吉泽尔、亚辛、布尼亚尔，甚至罕萨）仍保持着对这个教派的忠诚信仰。直至今天，在这些地方还可以找到他们的皮尔和哈里发。而另一方面，毛拉伊信仰被引入罕萨，还要归功于特姆（Tham[③]）西罗姆·汗三世（Silum/Salim Khan Ⅲ），他曾作为政治流亡

---

① 阿拉伯语词，原意为“掌权者”，此处为巴达克山统治者的称号。——译者

② 原文如此，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所著为《查谟史》。——译者

③ 罕萨统治者的称号之一。——译者

者在巴达克山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里遇见了重要的宗教领袖沙·阿尔达比尔（Shah Ardabil），这意味着至迟在上世纪初，伊斯玛仪派就被引入或再次引入到了罕萨，因为西罗姆·汗三世在1824—1826年间就已经去世了。

即使在其他地区，这种连续性也有着某些矛盾，我们以后将会看到这一点。

也许塔杰·莫卧儿在吉尔吉特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因为在更早的时候那里就已经有过伊斯兰教的布道。根据当地传统的说法，在公元12世纪上半叶的阿扎尔（Azar）或沙姆谢尔（Shamsher）时期，伊斯兰教的传播曾受到六名德高望重的人物的影响，佛教由此宣告结束。

当地的历史学者坚信，通过这场皈依的浪潮，王朝开始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他们的精神和政治上的顾问（和审判官）也来自于中亚的大逊尼派中心。

只是在巴尔蒂斯坦（在那里，默格本统治者在阿里·谢尔·汗·恩金领导下达到了他们权力的顶峰）的强势影响下，才有一位吉尔吉特王公米尔扎·汗（Mirza Khah）接受了什叶派信仰，这是当地人宗教分歧的开端。这种分歧带来的麻烦一直延续到今天。了解了这一状况之后，我们就要将注意力转移到巴尔蒂斯坦。

在巴尔蒂斯坦传播伊斯兰教的宗教界的杰出人物全部来自克什米尔，或从伊朗经过克什米尔而来。

巴尔蒂传说中的伊斯兰教的传播者大艾米尔（Amir Kabir[①]）赛义德·阿里·哈姆达尼（Syed Ali Hamdani）是否真的在巴尔蒂斯坦生活过，或者，我们是否不得不接受他的门徒和代表所制造的虔诚的传说，这是值得怀疑的。（见第六章）

大艾米尔赛义德·阿里·哈姆达尼的儿子哈兹拉特（Hazrat[②]）赛义德·穆罕默德·努尔·巴赫希（Syed Mohammad Nur Bakhsh，死于公元1464年）曾代理他，不仅成功地将这种信仰传播到了斯卡杜，还传到了希格尔和基里斯/哈伯罗。

---

① 阿拉伯语词，这是特指赛义德·阿里·哈姆达尼的尊称。——译者

② 阿拉伯语词，对伊斯兰教先贤的尊称。——译者

据赫希默杜拉·汗所说，哈兹拉特努尔·巴赫希本人坚信什叶派的主要教旨，但后来，其他的传教士，如米尔·希姆斯·乌丁·伊拉基（Mir Shamsuddin Iraqi），借用了他的名义和声望去传播他们自己多少有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实践。

因此，在巴尔蒂斯坦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以及波里格（Purig，即Poryag或格尔吉尔），有一个叫做努尔巴赫希（Nur Bakhshi）的宗教群体，它与盛行于巴尔蒂斯坦中部、南部和西部的什叶派略有差异。

由于上述事件，什叶派教区还包括隆多峡谷西部的一些地区，即赫拉毛希（Haramosh）、巴格劳特、吉尔吉特的一些区域和纳格尔。显然，罕萨也曾有一段时间受到了什叶派的影响，但今天只有格奈希村仍是什叶派的“飞地”。这些盛行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别更强化了兄弟土邦罕萨和纳格尔之间一直以来的对立。

如上所述，许多世纪以前，在吉尔吉特，还有丹吉尔和达丽罗就已经有着小股的逊尼派群体了。

政治体系的出现是建立在伊斯兰教逊尼派的“普什东”（pashtun①）人的解释基础上的。

主要的冲击来自南面，当尤素夫扎依（Yusufazi②）和其他的普赫东（Pakhtun）部落向布奈尔、斯瓦特较低处，以及潘奇科腊（Ponjkora）河谷推进的时候，他们在圣徒似的坚韧不拔的人士的领导下，严格地信奉逊尼派教义，在进行正常传教的同时加入了一种我们所说的社会和政治宣传的成分。在新征服的地方，他们引进了一种叫做“韦什”（Wesh）的土地再分配制度。直到今天，在一些边远的地方仍部分地保留着这一制度。

挪威人种史研究者弗雷德里克·巴思（Fredrik Barth）描述了“韦什”的分配制度，现引如下：[2]

“世袭群体共同拥有土地权，问题在于如何达到成员之间的平均分配，由于没有哪两块土地是真正相等的，因此暂时的土地分配从来不可能令人完全满意。相反，根据后裔群体不同的组成部分，将土地分

---

① 与下文之普赫东（Pakhtun）均指普什图人。——译者

② 帕坦人（普什图人）的一个部落分支。——译者

割成小块，每个部分占据一块，然后相互轮换。这样，一个轮回之后，各部分就对每块土地都占用过相同的时间，这样就保证了完全的公平。在每一个组成部分内部，又根据家庭的规模将土地分成小块，或者，像在帕坦人之间一样，根据成年男性在总体中传统的份额来分配。这样，一个人拥有的不是特定的土地，而是世系氏族共有土地中的指定份额。在每一个固定时期结束的时候，他随其部落迁往分配给该氏族的新地方。在那里，他又根据在总体中的份额分得土地，在这一次轮回中再使用这块土地。同样的，作为遗产而由父亲传给儿子的不是土地，而是共有土地中的指定份额。”

在实际操作中来考察这个制度，我们看到，根据特定的环境条件，也根据社会秩序的一些不太容易改变的特点，当地在采取这种制度的时候都作出了一些调整。

像斯瓦特这样的地方有着大面积的相连的耕地。而像普赫东人这样的血缘关系制度还有着高度的灵活性，这给政策操作提供了许多机会。主要的问题在于使再分配的土地块之间的分界固定下来，通过将缓冲地带交给圣徒家庭，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在达尔德部落居住的山区中，新近被他们的邻居征服的峡谷十分稀少：我们发现早期的居民和后来的入侵者生活在一起。这里的可耕地不必按照一个血缘群体生存的需要来分配，因此全体人民被分成一个个叫做“达拉”（Dala）的较大部分和称为“塔尔”（Tal）的较小部分，每一个“塔尔”的核心通常都是一个世袭的群体，即 Zat[①]，但每一个“塔尔”总是与其他“塔尔”相联合，从而将相等的势力聚积起来。每一个成年男子都得到属于自己的份额，甚至每一个女孩也能得到一个“塔戈”（Tago）的部分，她们在结婚后被允许将这一部分带入到她们的新家庭中。土地不能交换，人们也不能重新定居到另外的地方。基层小社区（及位于河谷较高处的另外一些房屋）保持着稳定。这样，这里就明显地表现出大量与斯瓦特的普赫东模式不同的地方。

基层小社区集中在有防御设施的村庄里，村庄中有一片开阔的空

① Zat，一般被译作“种姓”，但此处仅指一群体。——译者

地，即一个“比亚格”（Biyak），人们在那里举行会议，讨论并最终接受政治决定。在较小的山谷里，这样的中心仅有一个，并组成一个镇。

这样的系统既不需要，实际上也不允许有一个永久的统治者，而只需要一群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和官员来执行管理工作。这种社会保持了民主，我们可以比较恰当地称它们为共和政体，印度河科希斯坦当然也属于这种政体——它与从奇特拉尔到巴尔蒂斯坦甚至更远地方的北部地带完全相反。在那些地方，毫无例外地都采用了君主集权的统治方式。

今天归属于迪亚玛尔县（District）的地方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过渡或摇摆的地带，这里也实行君主制，当外来统治者获得有限的控制权时，这种中央集权的政府只能维持一段时间，随后就会一如既往地回复到共和自主状态。

政治和社会体系

我们知道北部存在君主制，但君主制又有不同的类型；村级及村以下的社会组织很明显的是与整个管理体制融为一体的。

中央集权政体地带内的吉尔吉特

在吉尔吉特，塔拉汗（Trakhan）王朝统治了好几个世纪，关于这一王朝统治的起始年代，学术界有很大的分歧（在公元12世纪[3]—14世纪[4]之间）。但就像在塞种旅行记（Saka Itinerary）、波斯文地理书《世界境域志》和比鲁尼的著名作品中所提到的一样，可以肯定，在公元10世纪，甚至在9世纪时，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有着同样地理中心的邦国。前朝的国王就几乎可以等同于《诸王流派》中提到的“达尔德沙希”（Darada Shahi）。

吉尔吉特的人民被划分为四个社会等级：欣人（Shin）、雅希昆人（Yashkun）、格敏人（Kamin），以及多姆人（Dom）——这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了，或许是依据了相邻地区的模式，那里仍旧盛行印

度教。

但是与这些阶层相联系的价值与符号体系仍与印度教的等级体系有些不同。欣人认为他们自己比其他等级的人在仪式上要清洁一些，他们将山羊作为他们特定的圣物，而对牛却十分憎恶。我们从富斯曼的文稿中了解到，盛行于吉尔吉特土邦统治下的差不多所有区域的希纳语与蒂拉希语有着“某种关系”，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它是一种南部达尔德语的一个分支。这一事实支撑了当地的传统说法，也支撑了从欣人种姓在这些峡谷中的实际传播得出的结论。它表明，欣人来自南部，即巴克里（Pakhli）或乌尔萨（Ursa，即哈扎拉）。在那里，山区的边缘地区有大量家养的山羊。冬天，这些山羊就靠寻找常绿圣栎树的树叶来维持生存。这样，欣人对这种动物的偏爱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也许欣人和古贾尔人一样是向北移民而来的，但当也是外来者（来自东部的巴尔蒂斯坦）的塔拉汗人需要他们充当军队护卫时，他们就变得强大了。

大多数多姆人充当统治者或村社的游吟诗人，他们肯定是后来从南部迁来的。在一个边缘的地区，他们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

因此，雅希昆人（土地占有者）和格敏人（从前的工匠，现在大多数是更为贫苦的农民）也许是土著人的后裔，由于在旁遮普也出现了有着类似名称的职业群体，因此格敏人或“格拉敏”（Krammin，陶工）也许还包含有外来的成分。

在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中，有一些父系异族结婚的世系，它们倾向于娶较低社会地位的妇女为妻，但几乎不考虑遭人蔑视的多姆人妇女。在村委会中，这种世系由“朱希代罗”（Jushtero）或年长者来代表，任命了管理员来协调和规范农业事务并充当村庄警察，在印度河科希斯坦，这个群体的名称——“柴杜”（Zeitu）——用作村级地方法庭法官的官方名称。

这个社会基本的生活单位是扩张了的家庭，在家庭内部，兄弟们再实行分工（如将耕地的任务交给最强壮的人）。至少有一部分地区实行一妻多夫制，一个家庭中如果没有男性后代，那么其中的一个女儿就可以继承房产和土地，她的丈夫须加入到她所在的世系。

除这些常规的社会等级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社会等级的家族群体：如地位较高的“罗诺”（Rono，产生 Wazir 即大臣的外来家族）和“赛义德”（Saiyid[①]），以及社会地位低下的古贾尔人、科希斯坦人或克什米尔人。

不同等级的家庭之间的密切联系是通过“寄养”，即一种抚养关系而建立的，较高社会阶层家庭中的孩子在他未来的臣民的家庭中养大，这种安排对双方家庭都是有利的，对于地位较高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通过这样一种关系，他们就得到了一些绝对忠诚、但没有亲缘关系的亲戚。

国王通过两种方式与他的人民进行联系。

一方面，他有一个正规的管理系统，从毕达尔夫的报告中，我们必定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这个管理系统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一个陈旧的、不规范的、不太有效的制度来给叫做“拉”（Ra）的统治者及他的大臣提供给养和劳力。由于那里没有货币，因而收税不收现金。人们主要用一定数量的金砂来与外界进行交换。

官员们有权存留一部分以“拉”的名义征集的东西，他们也有权解除一些人的公共事务或军务，而用他们为私人事务服务。

用来指称不同统治阶层及其帮办们的头衔表现出了不同时期对于不同地区的语言的借用（包括伊朗、突厥和印度的行政头衔），但至今还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系统分析。

从另外的资料，我们得知由“瓦齐尔”（Wazir）统治的各省要轮流给中央输送一定数量的劳力。从这些资料中，还可以找到一些为宫廷服务的传统的家庭——有时，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从前异教徒的朝代。

其他村民充当农业劳力，为国家耕种属于统治者的土地。

在这个统治系统中，没有常备军，但在战争时期，不在免服兵役之列的每一个自由的男人都要出征打仗，村庄就由村民来防御和守护。

在这个系统中，“拉”不是总司令，当我们考察他在半宗教性节日

① 阿拉伯语词，专用于称呼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与阿里传下的后裔，被认为是“圣族”。——译者

中的作用时，他的办事处的存在目的就变得清晰可见了。这种所谓半宗教性的节日，如毕达尔夫描述的那样，尽管经历了伊斯兰教的冲击，但仍然保存下来了。它们大多与农业相关。但在毕达尔夫的年代，在英国于吉尔吉特建立统治之前发生的一场恶战（很大一部分当地人被消灭）之后，这种传统就被打破了。

我们在这里不方便引用毕达尔夫的注释，但实际上，“拉”是保证谷物、果树、牛群，甚至人类高产多产的守护神，他与体现在大战鼓上的女神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位原始时代的国王，希里·巴格尔·特姆（Shiri Bager Tham）随后亦被认为是超自然的神灵，他被等同于圣洁的辣椒树（*Juniperus excelsa*）。祭祀这些神灵的仪式要在祭坛上进行，而所谓祭坛就是村口附近的一块岩石。按照欣人的祭祀方式，在这种迷信活动中，供奉山羊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与这些活动相关的神授的能力使得统治者能在谋杀或叛逆等案件中充当调停者和判决者这样的角色。

毫无疑问，统治者与官方的伊斯兰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其他不属于严格的正统的风俗习惯得以保存下来。一些几乎是西伯利亚类型的萨满（Shaman）代表了公众的心声，他吸入刺柏属树木燃烧的烟来使阴魂附身。女巫们骑在木箱子上，而不像他们的欧洲姐妹那样骑在扫帚上，人们认为他们在黑暗中吞食了邻居甚至是自己儿子的灵魂。在这种秘密聚会中，他们的一个心腹假装自愿地来帮助他们，他要屠杀作为祭品的自我的替身，即一头羊。而另一方面，女巫自身又被另一种类型的神灵缠附，这些神灵会偶尔成功地挽救危难之中的人，否则这些人数天后就会死去。

而这些非主流的风俗习惯之所以能保持下来，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们处在伊斯兰教传教士不会经常光临的地方。因此，它们受外来观念的约束就不会那么早。

在这一地区，狩猎知识至关重要，因为北山羊生活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它们藏身于石坡之下，赤手空拳或只有原始猎枪的猎人很难捕获猎物。捻角山羊生活在较低的地方。人们认为，这两种动物像它们藏身之地的芬芳的树木和鲜花、闪亮晶莹的冰川和清净的水一样地清

洁和神圣，有“拉奇”（Rachi）或仙女（Peri）一样的超自然力量呵护着它们。这样，北山羊和捻角山羊就成了最高贵的猎物，它们一起被称为“马亚洛”（Mayaro）。

出门打猎之前，有经验的猎人总要净身并独宿。这样，他的保护神“拉奇”就会带着礼物出现在梦中，向人预示此次打猎一定会成功。出身高贵的人以及一个优秀的官员、攀登者和飞行员，对于做一个好的穆斯林感到很骄傲，但如果没有自己的守护神“拉奇”的夜间光临，他们将射不中目标——他们就是这样对我说的。

将猎物捕杀之后，人们须以极为虔诚的心情来处理动物的肉体，他们将动物的肝扔掉，算是献给了仙女。

根据当地的信仰，“马亚洛”只有在被它们的超自然的物主——仙女们杀死之后，人们才可以捕杀它。据说，超自然的物主一起将马亚洛吃了之后，骨头就被精灵收集起来重新组装，造成二度化身，而这种二度化身是没有精神实质的——只有这种“再生动物”方可任人处理。

这里所说到的风俗和信仰出自一个很短的文集，[5]它们大都植根于亚洲的精神传统，其中一些输入的年代肯定在相当晚的伊斯兰教时期，而通过语源学调查，历史专家会告诉我们其中一部分思想的可能的起源。

观察人类想象力是如何经由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和山区的铺张的戏台而形成，这实在是一桩很有吸引力的事情。因此猎人和牧人的经历、情绪和思考，将不相同的思想糅合成了一个有机结合的世界观。人们将人所不能企及的最高的山顶看作是洁净的神灵（多为女性神灵）的居所，他们还认为在迪亚玛尔（南迦帕尔巴特）、赫拉毛希、杜巴尼（Dubani）和拉卡波希的峰顶有着神灵的城堡。

据说，欧洲人与这些神灵有着某种联系。因此，欧洲人渴望前往这些高地——但他们经常为他们的这种愚勇的努力而遭受雪崩和暴风雪的惩罚。

在冰川围绕的高山之下，是峭壁和石坡地带，“马亚洛”即栖身于此。猎人们经常光顾这里，有时，他们能在这里遇见他们的“拉奇”。

往下一点是草地，牧人在这里牧放羊群。农耕地带大约在中间位置，再向下靠近河口的地带十分凶险，那里有着危险的、无形的男女恶魔。肮脏的母牛群被限制在中间和较低的地带，就像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一样。

但是最终的灵性分层模式并没有将所有的不同观念涵括进去。吉尔吉特政治办公室的首席文书、坐在“贞洁之椅”① 和“仲裁席”上的古拉姆·穆罕默德（Ghulam Muhammad）搜集的材料就不能完全与这个固定的框架相调和，但它却是准确的，后来进一步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他的“婚姻”、“预兆”、“日（月）食”、“世界的创造”等章节也同样是正确的。但还有许多东西仍然是个谜，比如，我们最近才发现，一种将斧头当作新郎标志的特别类型的仪式，在当时当地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必须假设：从前，这一地区在性方面存在着较大程度的自由，还存在一种通过竞相展示奢华的财富来解决矛盾的倾向（即“庆功宴”）。村内禁止屠杀，在某些特定的统治区域也禁止民族（或家族）之间的相互仇杀。

而非伊斯兰教的葬礼风俗也熟为人知，一些地区实行火葬，骨灰放在木盒或陶罐中埋葬。

塔拉汗王朝前属地的特别传统

1955 年[6] 和 1958 年[7]，人类学家考察了赫拉毛希峡谷，它隐藏在印度河和一条山脉之间，在庞大的山岳的西面，一个与之同名的山口穿过这个山谷。很明显，女巫的活动构成了这里的所作所为的精神背景：人的灵魂可以化身为北山羊在高处游荡，并以这种形式被恶魔所追逐，如果恶魔成功地将动物杀死，那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将有人死亡。相反，真正的北山羊却被假想为在活着的人身上有一个灵魂的“副本”或“替身”。

除此之外，我还听说村子里的女人们曾经为了祭祀一个女神而举

---

① 指其终身未婚。——译者

行集会，在集会上，一位男祭师——女性群中唯一的男性，屠宰了一头山羊。这位被祭祀的女神就是兼有保护萨满（Shaman）和猎人之责的中亚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Artemis）。这样一来，我们就可更明显地看出：从前，一个世系的分支需要有一种崇拜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树立纪念石碑，并将它作为祭祀地点的象征标识而遗留下来。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赫拉毛希曾属于巴尔蒂斯坦，但它位于不完全归中央集权控制的欣古斯山口之外，因而也不完全受中央集权的控制，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那里还保留着一些古老的信仰。

关于巴格劳特（Bagrot），我们有斯诺伊（Snoy）[8]对当地的建筑、遗迹、习俗和信仰所作的出色描述，这些都肯定了古拉姆·穆罕默德早期的记录。应该注意的是巴格劳特的民族是什叶派，而招募到这个峡谷的部队形成了当地军队的主力，吉尔吉特的统治者可以调遣他们。因此，在19世纪，戈赫尔·阿曼消灭了这里很大一部分人口，许多巴格劳特人被杀，幸存者则被卖为奴隶。从这次大摧毁以来，这一地区又经历了许多次破坏，现存的古老的社会和宗教系统一定经历了多次恢复和重建。

然而，巴格劳特又成为了萨满们的中心，有时我们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在巴格劳特的传统中，过去悲剧性的记忆已经被彻底地消除了。现在那里正发生着广泛的社会变化，格罗茨巴赫（Grotzbach）[9]对此进行了研究。同时，重新定居于巴格劳特的人们发现了这一地区自然条件的局限性，因而人们普遍地迁移到较低的地带，而且这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在许多世纪中，短短的、但很艰险的罕萨河谷被用作通往穿越东突厥斯坦的分水岭的山口的通道。在河谷两岸及支谷中分布有一些绿洲，操着三种不同语言的人们定居在那里。

北部叫做古恰尔（Gujhal）的地方是瓦罕人的故乡，他们是在距现在相当近的时候从阿富汗东北部的瓦罕走廊迁来的移民，但因为他们与从南部来的人一起居住在主河谷中，因此在他们之间就发生了一种相互的文化适应和文化渗透。他们在罕萨统治者的势力之下，承受着沉重的赋税，而更重的负担来自于统治者及其随从每年的来访——他

们的吃喝玩乐使当地老百姓苦不堪言，这与奇特拉尔的传统体制多少有些相似。

操布鲁沙斯基语的人们居住于下一个地带，这一地带分为两个竞争的区域：罕萨和纳格尔，前者拥有更多的通往北方的通道，后者则有着重要的通往巴尔蒂斯坦的希格尔河谷的路线。由于纳格尔民众是什叶派的热烈追随者，他们的异教徒的历史遗留就不如罕萨保存得好。但这不足以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人种学感兴趣的来访者忽略纳格尔民间传说的理由，直到最近才由于尔根·弗伦布根（J. Frembgen）做了一次集中的调查研究。他的第一次打印出来的报告[10]就已经揭示出了许多未知的事实，我们从中了解到重要的血缘关系群体是和王朝的先祖一起移民过来的，而这位先祖是塔拉汗的后裔。显然，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希纳语，转而使用当地的布鲁沙斯基语。同时，在他们所操的布鲁沙斯基语中又保存了大量的希纳语语汇，反映出两种文化之间在精神和社会政治层面的借用。早期的移民者甚至宣称，他们来自南部地区，如戈尔（Gor），那时候也许在吉尔吉特山脉的南部，人们还操着布鲁沙斯基语。

当罕萨还是一个封闭的、极富于侵略性的社会的时候，纳格尔统治者却已引入了一个系统的制度来扩张他们的耕地。但如此广泛地开拓殖民地，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广泛地暴露在罕萨的打击面前。因此在18世纪，每逢冬季河流结冰可以越过的时候，纳格尔人就被命令待在设防的首府里。

尽管冲突和交锋已经成为纳格尔与罕萨之间的习惯，但这从未妨碍这两个兄弟般的土邦的上层家族之间互通婚姻。实际上，他们的英雄的祖先被人们认为是自娘胎里就开始打架的双胞胎。

从一开始，罕萨就成功地唤起了欧洲来访者的兴趣与向往，因此他们对这个地方的描述比对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要好。许多书籍中都有一张张夸张的经过修饰和美化的“特别健康”的居民的图片，他们的生活图、长寿图，画面上的罕萨人从外貌到行为都像是欧洲人。

事实上，还在不久以前，罕萨人民就集中居住在三个设防的村庄里。那里气候宜人，但却没有足够的水田，粮食供给有限，因而妇女

们被训练得特别节俭。为了在远及萨里科尔和叶尔羌河谷的掠夺突袭中渡过难关，这里的年轻人要经受这样的训练：穿越结冰的河流，有时候还要在冰层下游几个来回；露宿，即便冬季也是如此；背负沉重的货物（即掠夺来的财物）经由最艰险的道路回家。

这一地区统治者的任务和特权要视来自吉尔吉特的报告而定。他是太阳神的化身，因此必须要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王后亦须完成一些仪式。这些思想与比他们早1000年的Bolor的统治者的思想有着某种联系，问题仅仅在于它们是何时被带到罕萨的。罕萨的行政管理也在好些方面背离了吉尔吉特的体系，在罕萨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对个人政治关系的重视取代了其早期对仪式性政权的强调。

Ⅰ. 斯特里奇（I. Stellrecht）的集中研究已经清晰地表明：罕萨人民没有等级体系，他们似乎比欣人更强调区分仪式的洁净度，这种区分的依据是高度，即从山顶向下一直到阴暗的河谷。像萨满教和巫术之类的观念就包含在了这种仪式性的纲要之中。

这种世界观几乎不能适应依靠农业而生存的人们的基本需要——它仅仅为新兴的贵族（即紧密地熔为一炉的事务总管、英雄、王室心腹）所用，他们采取这种世界观的目的在于：不仅使自己区别于低贱的贝里久人（Bericho）——相当于多姆人——而且也在自己与不得不承载重荷的世袭地所有者之间划清界线。等级制度在不同血缘的家族之间划分界限，大多数家族是实行异族通婚的，即正式规定必须与本群体以外的人通婚。其中一部分家族可能依据的是积极的婚姻规则，互通婚姻的家族居住在同一个村庄的不同区域。

对纯洁的崇拜、传统的训练和节俭一起为罕萨人提供了一个通往现代世界的便利渠道。人们将一种芬芳的气味当成仪式洁净的最佳证明，因此人们认为有必要经常沐浴、更衣、清洁屋子，而这正是外来旅游者所向往的，他们很高兴在罕萨人的土地上找到那么多经营得很好的旅馆。

但最终我们还得承认，这个系统并不能涵括罕萨的一切精神性遗产的要素。罕萨人还把自然力量理解为或男或女的神灵，他们从雷雨之中听到的是属于“胡大莫”（Khuda-mo）的公牛的角撕裂的声音，

Khuda-mo 是一位有着伊朗语名字（及一个藏语后缀）的女性神灵，这个名字从有神论信仰中的一千年（Millennium）以来就在使用——但使用这个名字的不仅仅是罕萨人。

人们对罕萨河谷较低处的操希纳语的居民所知甚少。杰尔特—恰伯罗特（Chalt-Chaprot）这个地方因其众多天才的萨满或巫师而闻名，有时候这些萨满被邀请到罕萨，那里盛行萨满教，而当地却没有这种职业人士。有时候，有些人会在入定状态时说希纳语，甚至是不熟悉这种语言的人在此时也操这种语言，但其中仍有一个本土的词语：bitan。杰尔特—恰伯罗特是纳格尔在河流右岸（罕萨）的一块飞地。

据说，在罕萨的布鲁沙斯基语核心地正南的一个村庄印地（Hindi = Hini）村里，在春天打开盛满新酿的大酒桶的时候，一种模拟战斗就在不同的设防的居民点的男性之间展开，每天的战斗严格地限定在一天中的某个时间，以便受伤不太重的战斗者能在战后回去吃饭，以及——从酒桶中狂饮一通，重振旗鼓之后，能回家和妻子睡觉。

这条消息一定有着一个现实的背景，因为米尔扎·海达尔在1526或是1527年对博洛尔卡菲里斯坦（Balur Kafiritan）的异教徒的圣战中报告了类似的模拟战争的故事，而这场圣战的地点正离这条消息所说的地点不远。

再往西走，我们发现，卡罗姆巴尔（Karumbar）河谷居住着各种不同血统的人，有瓦希人、科瓦尔人——和操希纳语的、没落的贵族的后裔。一位精力充沛又聪明智慧的赛义德接管了重整这块从前是一片荒芜的土地的任务，因此，他的后代成了大地主，他们把女儿嫁给王侯家族。在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许多古老的、表面上看来非伊斯兰教的坟墓都毁坏了，这里的许多旧堡垒也遭到了破坏。

只在一条宽大的伊希戈曼支谷中发现有一群操希纳语的人，他们集中在村庄的一个大堡垒中。而据说不久前吉拉斯人也曾发现这一地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外来入侵者消灭了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这个入侵者也许是米尔扎·海达尔，也许是他的一位先人（因为不是所有的莫卧儿将军都能用这般流畅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行为，即做事情如此爽利）。当冰川融化的时候，自北方而来的道路对于

外来的冒险者是一个危险的召唤。

卡罗姆巴尔河谷南面——在谷口正西的一个狭窄的隘路和东部的戈拉布尔（Golapur）之间——沿吉尔吉特河中段是肥沃的布尼亚尔地带，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听到来自吉尔吉特的、来自南部的，尤其是来自达丽罗的殖民者在这里进行的残酷的破坏和重建的故事。一个达丽罗人，即肖多（Shoto），作为农民君主统治了那里一段时间。在许多世纪中，这个地区都是统治奇特拉尔北部地区的沙·拉伊斯（Shah Rais）及吉尔吉特的塔拉汗家族之间争夺不休的一块骨头。

也许沙·拉伊斯宣扬一种奇怪的埋葬方式：将尸体埋在地下室里，直至分解腐烂，然后，将骨架储存在按性别而分的房间的壁龛里，头骨则被置于前面的一条矮凳上。在埋藏遗骨的洞穴（Ossuary）的顶部有一个建筑，通常一个世系有一个这样的建筑。当世系中的一个成员将要离开人世时，人们就可以听到来自坟墓的游吟的音乐，这是那里的先祖正为迎接他的到来而举行欢迎盛会。·

A. 弗里德里克（A. Friedrich）和我都在布布尔（Bubur）附近见过这样的墓群。在谢尔堡（Sher Qila）附近——现在的中心和从前沙·拉伊斯居民的所在地发现有另一个这样的墓群。土地分给了这个圣殿的守护者们，沙·拉伊斯肯定是穆斯林，但很显然，他们保留了这种前伊斯兰的伊朗的传统，将尸体陈列在地下室，再将所有尸体埋葬于同一个王室的坟墓中。

当地人除修建村里的堡垒之外，也建造这种坟墓。一定数量的氏族的联合势在必行，因此，我们可以考虑有一个规范的通婚体制，如罕萨就有这种体制。

沙·拉伊斯之后是胡什瓦格特（Khushwaqt），最后是他们的一个支系布鲁谢（Burushe）建立了在这里的统治。直到英国统治之下，这里才重新建立起行政体制，一个当地的王子成了统治者。所有统治者都有众多子孙，其数目多得令人吃惊，因此布尼亚尔成为地位卑微的古希布尔人（Gushpur）——社会地位低下的母亲所生的王子们——的领地。1972 年的重组将布尼亚尔和伊希戈曼合为一个分区（Subdivision），其中心在辛戈尔。

但我们应当强调这块土地有着富足的收成和其他一些令人愉快的特征，当地的伊斯玛仪派信徒都酷爱喝酒，而官方也没有太多的禁令，不像阿迦·汗最终甚至禁止了老牌厂家的生产。人们告诉我说，从前这里甚至曾禁止喝水——当酒酿成的时候，女人们也被邀请去参加庆祝，这或许稍带些不真实的夸张的成分。

另一方面，布尼亚尔从前也常有女巫出入，有一位罗阇十分渴望学习掌握她们的秘术，常邀请她们去参加茶会。

亚辛，我们已经知道在一个时期中，甚至布尼亚尔也是由奇特拉尔上部的拉伊斯统治者来统治的，当他们被一个新王朝取代，后来又分裂成格多莱（Katore①）和胡什瓦格特两部分的时候，欣杜尔山口东部地区就由这些新来者控制。沙·拉伊斯要恢复他的王国的企图并没有影响到这个外围地带，但在双方争夺权力的艰难斗争中，胡什瓦格特掌握了包括位于西边的丹吉尔和东边的本吉之间印度河河谷的很大一片地区，为他们在亚辛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就是吉尔吉特河北部的大山洞（mountain chamber）。他们在这里占据了极佳的战略位置。这里的官方行政管理体系类似于奇特拉尔的管理体系，统治者将自己的孩子交给很重要的家庭来抚养的习俗也是一样的。但结果却不一样：在一个限定的、从某些特定的地方几乎可以一览无余的区域里，养父母的家庭之间不会发生公开的冲突，然后利用王子来作人质——这与面积更大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的奇特拉尔恰好相反。

在亚辛，王权建立在大众授权的基础上，这体现在这样一条规则中：重大仪式不在王宫中，而是在一个宽敞而坚固的农民家中举行。当地人是伊斯玛仪派信徒，他们操布鲁沙斯基语，而统治者是逊尼教派的，操科瓦尔语。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妨碍统治者（他们带来了最优秀的战士）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共处。在这个基于相互忍让和共同反对吉尔吉特（那里什叶派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之上的政治和解的环境下，人们就可以解释古老的节日及其歌谣（带有浓厚的性爱意味）是如何保存下来的。也许我们在这里能发现与吉尔吉特王朝早期形态相关的

① 应是格多尔（Kator）的另一种拼写。——译者

传统习俗。

由于亚辛的统治者之一戈赫尔·阿曼特别敌视什叶派，且又成功地打击了道格拉人，后者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后将这个峡谷中的大部分人消灭了，只有较低等级的多姆人幸免于难。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们几乎是唯一熟悉这一地区历史的群体。

戈赫和吉泽尔是吉尔吉特河两岸位于布尼亚尔边界和欣杜尔（事实上，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山口，而是一个有着美丽湖泊的高原）之间的地带的名称。一直到杰希（Chashi），该地区的大部分人都操希纳语，杰希以外的地方则流行科瓦尔语。

在这个相当开阔的地方，没有稳定的政治中心来抵抗永远存在的外来侵犯的威胁。只有拥有善于管理的官员的英国统治带来了一些经济利益，这些利益体现在修建更好的公路上，从此化作了永恒和不朽。

但仍有许多工作留给了人类学家，在现在的首府古比斯附近，是一位被人们认为是保佑母亲和新生儿的女神的领地，我还听说罗欣（Roshan）附近有几个敬奉过去的圣人的地方，一位圣人专管某一种不幸，如疾病、收成不好，等等。

共和政体：通往印度河科希斯坦的过渡地带

向南，吉尔吉特山脉以外，是重要的丹吉尔和达丽罗河谷。如前所说，这是一个通往有着不同政治体制的地区的过渡地带。然而，吉尔吉特的统治者在这里也有很强的势力：据说，吉尔吉特主水渠就是达丽罗人修建的，作为回报，著名的达迪·久瓦里（Dadi Juvari）王后送给他们一件最珍贵的礼物——汗贝里河谷。

后来，这两个河谷就在相当衰弱的胡什瓦格特王室的霸权统治之下。丹吉尔人和达丽罗人加入了胜利的统治者的武装部队中，以期分得战利品——当海罗拉（Khairullah）的军队从阿富汗卡菲里斯坦/巴希格尔（Kafiristan/Bashgal）回来时因遭遇雪崩而全军覆没时，他们全部丢了性命。

一位胡什瓦格特王子普赫东·瓦利·汗（Pakhtun Wali Khan）继承了先辈的传统，利用通过养子习俗而建立的老关系，凭着自己的能

力和聪明的外交手腕在这里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在1917年被谋杀之前，他将其统治从丹吉尔扩张到了达丽罗和沙津。在以下关于历史的章节中将会详细谈及此事。

需要补充的是，在此前后，还有人作出了进一步的努力来安抚和开发这两个有着天然的广阔森林的山谷（伐木者直接将木材经印度河漂流而下），但所有的努力通常都以妄求者的灭亡而结束——因为这里的人民都变成了充满热情的自由主义战士，这个地区是亚吉斯坦（Yaghistan）的一部分，它是一块“自由的土地”或“反抗的土地”。

普赫东·瓦利·汗因为一些很好的理由而展开了他在丹吉尔的职业生涯。这里有一些外国飞地：赛义德、普什图人及科希斯坦人，都宣称自己是伊斯兰教先知的后裔。曾经是这个地区标志的一个设防的大村庄已经不存在了。达丽罗解体的过程刚刚开始，但社区内部关系还有些紧张。伊斯兰传教士引进的改革措施几乎不能与这一地区固有的等级体系相适应。

既没有机会铲除暴君，又没有机会侵袭其他河谷，亚吉斯坦人只好和他们邻居的老婆沉溺于浪漫的越轨行为之中——同时他们又总要看住自己的妻子免受类似的引诱，于是事情便复杂化了，其结果便是无数的谋杀案及随之而来的世仇。死者的坟墓是塔形的，由死者在村庄中的竞争对手的家族群体修建，有时这些坟墓形成塔群，将圣吉米纳诺（San Gimignano）[①] 的野蛮形象呈现给不知所措的参观者。

在这种情形下，狩猎就不仅是一项运动，它还是精神释放的出口，一种进入更纯净、（情感上）更加高处不胜寒的境地的途径。因此，如前所说，在这一地区，狩猎的习俗和信仰保存得很完善——实际上它是单独存留下来的前伊斯兰遗产之一。

玉米取代了其他作物之后，农业总产量就大大提高了。如果可利用的粪肥都施加到玉米地中的话，那么这些可种两季的地区只种一季便足够了。根据从前所得的一项权利，人们可以使用吉尔吉特山脉北边的草地，因此，那里有大量的牧群。人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使用汗贝

---

① 意大利托斯卡纳区的一座小镇，中世纪时曾建有72座高塔。该地已入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译者

里，但后来，人们将它出租给了古贾尔人，他们至今仍在纳税。

在邻里之间炫耀私人财富，以此给他人留下印象，这会被认为是一种挑衅。因此，人们的收入常用来购买性能极佳的枪支，或者自科希斯坦买来 Dehqan，即合伙农夫和佃户。因此，当夏季村子里的气候很不舒服的时候，地主们能够在地势较高的草场上度过一段很长的时日。

1952 年，这些山谷同意直接地、自愿地归属巴基斯坦之后，这个多事的土邦已经管理得很好了。随后，所有的世仇都通过相互妥协而达成了和解。但新的仇恨又生成了，因为佃农们过于轻率地采用了政治言辞，宣称土地应该仅仅属于劳作于其上的人，因此，他们的领主事先获得的现代武器终于成了一项很好的投资，它们站在领主利益的角度来进行决断。

甚至在人民与土邦政府的矛盾中，尚武好斗的精神总能获得成功。现在，那些死者的纪念塔又重建了，搞得像“胡杰拉”（Hujra，即男人们聚会的公房），位置更低，也更宽敞了。

当土邦政府同意将出售木材所得用于修建桥梁和吉普路的时候，古老的“韦什”（Wesh）制度（由于大河谷分作了数个区域，后又分成了一个个村庄，它变得复杂多了）再一次变得重要起来。只有“韦什”制度的老成员从这些新契约中获得了一定的回报。

下一个势力很大的共和政体是戈尔（Gor）。在这个扇形盆地中，有三个设防的、被田野环绕的村庄。每个村庄都经过严格的规范，清清楚楚地划作了几个区域，村边的防卫塔交给年轻的勇士来守护。对于喂养山羊来说相当重要的圣栎林，被分作了一块块，轮流使用。

人们把一片小树林献给社区一位古老的保护神“台班”（Taiban），在其庇护下，野兽都被杀死了，而四周的树木却保存完好。不干净的牛不能进入这个圣洁的领地，邻边的田野只能用山羊粪作肥料。在两个主要村庄之间有一座穆斯林圣女的坟墓——它也许取代了一位女神的圣地。

这里严格规定，所有婚礼都须在一年中的一个公共节日期间举行。

戈尔与吉尔吉特的统治者关系很好。吉尔吉特的统治者遭遇政治

问题困扰时，可以到戈尔的一座房子中避难。但戈尔与其他共和政体的关系并不这样令人愉快，它与达丽罗曾为争夺位于它们领土之间的许多峡谷的统治权进行过长期的斗争。最终，它们请吉拉斯来参与这件事的决断，吉拉斯确实帮它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将这块争议中的土地据为己有。这就可以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当锡克人、道格拉人和英国的特遣队进入印度河河谷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戈尔人站在了入侵者的一边。由于他们的合作，戈尔人建起了新的居民点。在一个时期内，他们还要遵守每年集中举行婚礼的制度，因此他们还得为那个节日准备物资。

与此同时，用作保护基本的环境资源，如圣栎林的严格规范化的农业活动系统已经被破坏了，这是社会政治中自由的个人主义带来的结果。今天，它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日益明显，令人痛惜不已。

有一段时间，吉拉斯与附近的河谷一起组成了一个共同体：东边的塔格（Thak），中间的吉奇（Gichi）和托尔（Thor），也许还有西侧的哈尔班（Harban），都属于同一个政治区域，这个政治区域与印度河科希斯坦的操希纳语的河谷有着外交联系。

吉拉斯村的防御工作特别坚固，在其墙内有两个水箱，而且这个村庄是印度河河谷本土部分唯一的大的中心。戈尔人曾将一支英国军队引诱到刚好与吉拉斯相对的特尔班，于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不可避免。最终，英国于1892年占领了这个地方，而这支军队就被改编成了一支卫戍部队，它抵抗了科希斯坦的同盟成员的一次突然进攻。这个同盟成员集结了一支约2000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因规模过大而难以坚持长时间的围攻。这次战役之后，甚至邻近山谷里的当地堡垒也被摧毁了，山谷中的居民被驱逐到了支谷之中，并被限定只能待在那里。

吉拉斯历史上一段很吸引人的时期就这样结束了。吉拉斯曾经是许多次突袭行动的组织中心和始发点，这些突袭行动将来自“亚吉斯坦”的人们带往东边，直至阿斯托尔和更远的地方。为达到这个目的，人们需要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即游泳渡过激流，这种能力通过强度很大的训练而一代代传承下来。

英国人堡垒四周的田地被移民们重新占领，分治之后逃跑的印度

教徒重新建立了市场。但外来农民仍留在那里——这正是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当木材承包商开发森林时，土著人根据“韦什”制度（这样它又获得了新的重要性）获取他们的份额，其他享受不到这种利益的人就更加勤劳地工作。现在，他们得到了仍受到歧视的淘金者的增援，近来也意识到了他们的产品的真正价值。这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阶层现在也开始获取枪支，这对于未来的冲突肯定是一种威胁。未来的冲突同样将发生在政治层面。

和南部地带其他地方一样，阿斯托尔地区也操希纳语，这个河谷一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联系古雷兹（曾为驻吉尔吉特的统治者的一个主要前哨基地）的纽带。后来，它被包括在被阿里·谢尔·恩金征服、由默格本王朝的一个分支统治的一片很大的领土之中。

在英国统治时期，它不再像从前那样遭受吉拉斯人的令人烦扰不堪的攻击。随着沿吉尔吉特大道的交通运输的增加，喂养马匹和骡子作为运输工具成了这个地区高利润的工作。以前战争中被毁坏的村庄重建起来了，并且进行了许多内部的修整。

在一些遥远的角落里，一些古老的传统仍然保存完好，在古拉姆·穆罕默德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A. 纳叶尔（A. Nayyar）最近也搜集了一些更为有趣的材料。

在饲养山羊方面，有一些非常古老的特点。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在清洁的等级制度内，雄性雪豹被认为太纯洁而不能有性接触，这就使得雌性雪豹不得不下到河边去寻求配偶（lutra lutra）。

同时，我们从其他操希纳语的地区也听说了这样的事情，它表现了这样一个主题：清洁的动物需要一个来自下贱的、凶恶的阶层的配偶来繁衍后代。

其他的流行信仰表现出它们受到了来自巴尔蒂斯坦的影响。从邻近哈杜皮尔（Hatu-Pir）的达什金村（Dashkin，吉尔吉特公路在这里突然地向下通到印度河河谷）搜集到的材料提到了一些关于历法的细节问题，并记载了与一位叫做黑拉帝（Herati）的女魔——她肯定与诃里帝（Hariti）——一位早期佛教女神——有着某种关系，但现在我们

还不清楚这是本地的传统，还是由一些来到被毁坏了的村庄里定居的新来者带进来的。

塔拉汗家族的土邦之外的领土：巴尔蒂斯坦

不同于所有其他地区，巴尔蒂斯坦的主要语言与藏语关系密切（通常被认作是藏语的一种古老方言）。在历史上，这里有过政治社会体系相似的三个王朝的并立共存。

在印度河河谷，有默格本人，他们的中心在斯卡杜盆地，边界在隆多、阿斯托尔（上文已提及）、图尔迪和格尔德赫夏（Kartakhsha）。默格本（Maqpon）在藏语中意为“边境区的指挥官”，表现出巴尔蒂斯坦所受东方的影响较吉尔吉特更强大、更深远。

广阔而肥沃的希格尔河谷的第二个统治王朝与纳格尔的首领有着某种关系。据说，这个王朝是由一个穿过希斯帕尔冰川而来的逃亡者建立的。

第三个王朝统辖着希约克河谷，它自称源于北方，它的众所周知的名称叶护（Yabgu），肯定是突厥人所使用的。关于这个传统的说法的可能的历史根源暂不在这里考察（见关于历史的章节）。

这里有许多肥沃的土地，但都在海拔很高的地方。草场很远，并且一到冬天就被厚厚的冰雪覆盖。因此，必须用大粪作肥料。因为缺水，斯卡杜大盆地中只有一部分耕地可以开垦、耕作。在中心地带，我们发现了一个有着沙丘的沙漠，让人不禁想起中国的塔里木盆地。隆多有一些地势较高而又平坦的峡谷，从阿斯托尔更容易进入其中，因此，那里的居民都是从那边进来的。位于峡谷深处的村庄的情况亦是如此。因为要到达那样的地方是十分危险的事，故那里从不征税。

与盛行于吉尔吉特及其从前的属地的社会政治体系相比，巴尔蒂斯坦社会政治体系的地方性特点就很明显了：

在西部吉尔吉特地区，以前，血亲群体是重要的单位，世系或家族之间实行异族通婚；群体中的长者通常积极地卷入纷争的政治之中，但大多数仍持同统治者及其统治合作的态度；世系中的官员是根据他们所承袭的地位与阶层而选出来的。因此，我们会谈及这一地区“分

割的土邦”（Segmenntary states）。在这里，通过一条集中的政策，血亲群体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巴尔蒂斯坦则不同，巴尔蒂人口的基本单位不是血亲群体，而是居家的群体：邻里，是在节日和日常生活的仪式中，以清真寺为核心，通过少量的经济和仪式而组成的单位。尽管以伊斯兰教为基础，但很明显，这些仪式性的社区与拉达克的氏族（phaspun-ships）有几分相似（清真寺取代了公共的石堆祭坛［Lho-tho］），它很可能是由佛教时期的公共机构演变而来的。相应地，巴尔蒂斯坦的管理体制更加等级化，尤其在它的世袭官职的等级方面。近来，R. M. 埃默森（R. M. Emerson，他幸运地有哈伯罗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叶护法塔赫·阿里·汗向他提供信息）对此作出了一个全面的概述，我在参考时稍稍做了一点修改：[12]

除王家血统的母亲所生的继承者（及其兄弟）外，还有一大群由地位卑贱的母亲所生的王子及其后代，他们被培养成骑手、战士（及马球球员），统治者的“卡久”（kha-cho①）兄弟。他们之中部分是“常备军”，部分是指挥阶层，即在战争中负责指挥由农民（从每户农家征召一人）组成的军队。显然，名为“克本”（Kharpon）的堡垒指挥官即出身于这种没落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由称作 cho-pi-tsa 的类似封地（Jagir）的王家土地来保障，这些土地是由佃农或合伙的种植者在艰苦的条件下来经营的。

下一个阶层就是世袭的职官，以瓦齐尔或“帕久”（pha-cho②）为最高掌权者。德鲁听说瓦齐尔阶层实行内部通婚，这意味着，在整个地区的各个地方——甚至在对立的王国中，他们都会有亲戚。

另一方面，他们的妻子又是王子的奶妈，因此，“帕久”们能够控制王位的继承，而谁将成为在位统治者的主要大臣也就清楚了，这就是他的奶兄。这样，他们就成了王家政策的主要策划者，但他们都不必为出错的问题承担责任。

---

① 统治者的王族兄弟。——译者

② 疑即巴尔蒂语中之 Pa-chongas，据有关巴尔蒂斯坦的研究著作，Pa-chongas 系指古代巴尔蒂王国中大臣的家族，共有 12 家。——译者

在这里，寄养关系所带来的结果与奇特拉尔的情况大不相同：王子们被送往强大的、敌对的家族抚养，这些家族能给被保护人提供一个武装卫士。一旦养子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失败，这些家族便有丧失自己领地的危险，而一旦养子争夺王位成功，那他们——而不是统治者，就能夺得失败者的土地。

罕萨人则采用了一种较聪明的方式来解决这种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王子们被送到不同的家族去抚养，下一届国王由各家族的族长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事后，没有中选的王子就被投入河中——倘若他们不能及时逃离的话。

这样，巴尔蒂斯坦的瓦齐尔就完全控制了行政管理。他们以低层官员和下至各村庄的头人为辅佐，这些头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阶层。

在统治者宫殿的各个地方，还有许多世世代代从事更卑下的工作的群体：打柴的、在厨房工作的、打扫卫生的、看门的，还有卫士和随从，等等。

哈伯罗的统治者从克什米尔引进了手艺专家。克什米尔人一次又一次地被外地的地主镇压和剥削，他们当中出了些技巧高明的艺术家，这个地区的清真寺里的精美雕刻，均出自他们之手。但是，为了给这些外来的艺术家提供宅地和耕地，好几个本地小村庄的居民不得不迁往别处。

除了这种当地民族的行政改组之外，中央集权的政府加在农村人口身上的负担也很重。从不享有特权的“帕久”家族的土地上，政府要征收（农业或牧业）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每个家庭每年都要派一个男丁服四十天的劳役。

而在公共防御体系（这是赋税的合法性基础）中，防御的战略重点不是设防的村庄，而是统治者的主要堡垒。每一个王室都在峡谷中建了自己的宫室（有时这些宫殿是以巨石为基础的），以及在宫室附近高峻的山崖上建立的堡垒。这种地方的防守者自己无法取水，但他们可以依靠筑在堡垒里的大水池供水，由一支并不情愿的村民组成的队伍用肩膀将水背上来，储满那个水池。当道格拉人进攻的时候，这种秩序显然被打乱了，在短暂的、断绝水源的围攻之后，这些堡垒就齐

刷刷地垮掉了。

在一次成功的战役中，阿里·谢尔·汗·恩金（Ali Sher Khan Anchan，1580年—1624年）从对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的战争，以及对阿斯托尔的战争中带回了许多战俘。

大多数战俘来自吉拉斯周边地区，那里曾是破坏巴尔蒂人正常的宁静、使当地人民饱受苦难的多次突袭的指挥中心。然而，这些战俘在一个伟大的将军手里变成了有纪律的、高效率的士兵。起先，这些囚犯被用作苦力修筑大坝和水渠，但最终他们被安排到了峡谷的最高地带，那里通向德沃萨依高原，这就是说，他们正处在外来侵略者随时可能到来的路线上。因此，布鲁克巴人（Brokpa，即高地的居民）便被敌方用作警卫和哨兵，让他们对付自己的亲人。在如此高的连树木都不生长的地带，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只能靠那些最顽强的作物，如大麦和各种荞麦来填饱肚子。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布鲁克巴人仍然设法保持了自己的习俗，仍然组成传统的血亲群体，他们的萨满得到了高度的赞美——因为巴尔蒂人没有这种宗教行业，这些萨满就经常被统治者当作圣人请去决断外交政策，其中有一个萨满还被送给克什米尔的摩诃罗阇，在那里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说是为了他的家长式国家的利益。

直至今天，布鲁克巴人还保存了他们的语言——希纳语，但他们接受了他们领主的什叶派信仰。他们的领主是早期达尔德移民的后代，现在操巴尔蒂语，但他们的西方血统仍很清晰地写在他们的脸上。

也许是对僵化的公共管理框架的回应，在这里，人们的私生活显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轻松、舒适。在不久的过去，什叶派社会还允许“临时婚姻”（Muta），即在一定时期间内缔结合法婚姻。在巴尔蒂斯坦，不仅临时来访者，例如商人是这样做的，甚至村庄里的未婚者在缔结永久婚姻时也是这样做的。事先，他们要十分密切地和自己的伴侣交往，以熟悉对方——但在这样一次试验后，他们就要做出决定，唯一的、永远的决定。

巴尔蒂斯坦在接受外来者进入社会高层这一点上是宽松自由的，即便是布鲁克巴人也有可能升到瓦齐尔的位置。

这个地方可为其文化遗产而自豪，行吟诗人（他们在别的地方是要遭受鄙弃的）保存了许多古老的歌谣；年轻的王子不仅要学习打马球（马球被认为是国球，也许正起源于此地），还要学习诗歌。一种别处不知的骑士精神丰富了中亚著名的史诗《格萨尔》（Kesar），所有想要成为贵族的人都背诵过这一史诗。

现代发展

我的总的看法始于喜马拉雅最西端的后面的地区的生态学，以当地人经济活动的共同特点为重点，以发展过程中正在发生的一些最为相关的人类学变化为结束，以此表明：这个地区已日益有机地融入到了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国家之中。

分治之后，由英国封建领主执行的管理以一种非常谨慎、谦逊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所有加在土地产品上的赋税均被免除，传统土地结算报告（Land-settlement）也被废弃（这种报告从未覆盖全地区）。这是一个巨大的解放，尤其对于至今仍要服劳役的巴尔蒂斯坦的村民而言。

因为具备了适当的条件，交通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英国政府修建的小马路和吊桥能容吉普车通过，甚至最陡的坡道也可以通车。因此，这里不再需要小马和搬运工人了。吉尔吉特路现已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新开通的经过巴布萨尔山口的交通路线，这条线路可以在5月中旬到9月末的时间内通行。

因此，在一条能在所有季节通行的、穿过印度河河谷的道路建成之前（这条道路后来拓展为喀喇昆仑高速公路），这里已经有了一些可供大量机动车辆通行的线路。这些新的基础设施当然限制了这个地区的养马业，人们的骄傲是拥有一辆吉普车，而不再是拥有一匹好马。

对于当地民众来说，建立一个拥有一群新官员的现代政府也是一项有效的、普遍的经济补贴。旅游事业给旅馆业带来了更强大的动力，在很多时候，有魄力的当地人把这些项目经营得很好。通过进口化肥

和高产作物，以及利用水力向小型工厂提供动力等措施，给北部地区的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当时，许多这样的措施都有机地集中在阿迦·汗基金会的手中，他们有着一支庞大而有智慧的工作队伍，能给投资提供巨额资助。

然而，这种有意义的、可能是积极的措施，一方面通过提高医疗保健和控制疾病，另一方面通过防止内部战争（19 世纪时这种战争的破坏力极强），直接导致了一个基本问题的产生，这便是：人口密度已超过了所有预期的界限。

从人类学的角度，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许多传统的调节人口增长的管理机制已经被取消了。从前，人们认为在延长的哺乳期内怀孕对母子都是危险的，在许多地方，年轻夫妇在新婚的数年中，性活动要秘密地进行。现在，人们倾向于认为这种根据家族群体的经济资源来调节人口生产的传统是非伊斯兰教的迷信。

因此，如果没有外来的粮食供应，那里的人民就要遭受饥荒。有一段时间，当地人都分到了口粮，运输费以实物支付。

在许多河谷中，当地生产的粮食在一年中只能维持大约九至十个月，剩下的几个月就要依靠进口粮食。由于进口粮食很便宜，所以人们没有感觉到开拓耕地是一个很有必要的、紧迫的问题。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当然是促成巴基斯坦社会内部进一步团结的一个因素。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用从外面挣得的钱来支付生活必需品的进口费用，男人们离开山区的家，在巴基斯坦低地从事季节性的、流动的劳动，或是长期在海湾国家工作，只是偶尔回家看看。因此，北方的“侨民”出现在巴基斯坦低地的许多商业和工业中心，尤其以卡拉奇居多。流动劳力所得机会不均等，那些过去为生计而辛勤劳作过的人现在有更多干活挣钱的机会。在许多地方，尤其在罕萨，你都能痛心地感觉到这些工人为了他们首要的生存所承受的压榨。家中年老的男子和妇女必须再一次地承担起繁重的农业和牧业劳动。

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中还有其他一些不太明显的问题——但一些有远见的人会很好地意识到，而且人类学家也应将它们提出来：未来人们面临的问题将不仅仅是食物短缺。在家庭中，人们习惯用木头作

为主要燃料，随着这种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随着山顶上的军队对木材消耗的增加），木材在冬天变得非常昂贵，以至于在巴尔蒂斯坦，连果树都遭到普遍的砍伐——从长远来看，这几乎是无利可图的举动。

现在，这里又风行建造现代房屋，主要使用石头和混凝土。从前，当地家居建筑的形式是（奇特拉尔之外的地区还没有很好地研究过）：在每一座房子的中央都有一个被隔离开来的壁炉，现在每一个农民都想要一座现代的“英式房屋”，有通向露台的门和窗，里面有很好的烟囱。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木材来取暖。

在南边，大河的支谷中有茂盛的上好森林，若干世纪以来一直保存完好。普赫东·瓦利·汗开始进行商业采伐。当丹吉尔和达丽罗加入到巴基斯坦后，伐木工人又回来了。但让砍伐下来的树干随印度河漂流而下的运输方式往往会造成重大损失。现在，喀喇昆仑高速公路为运送原木提供了便捷的条件，而吉普车也可以开到支谷之中。因此，出口利润比原来大多了——而巴基斯坦对木材的需求几乎比对其他任何原材料的需求都大。

当地人确实分得了一份较高的出售木材的利润——这份利润是根据古老的“韦什”制度分配得来的。人们习惯性地认为草场和森林是公共财产，个人不能对某块特定的森林负责或胜任它的管理工作。因此，当承包人不按合约条款中允许的那样选择残次的树木来砍伐，而是毁坏整片的上等森林的时候，就没有人会站出来保护森林。这导致森林锐减，从而带来了与喜马拉雅中部相同的负面效应。这种损失甚至连农耕面积的相同幅度的扩大也不能弥补，因为这里的山坡非常陡峭，人们不可能在这里耕种，否则土壤就会永远流失。事实上，当人们作为“韦什”的参与者，在木材业的稳定收入还有保障的时候，便不再那么卖力地从事农业生产了。

当地学校的扩展令人赞叹，这些学校有着强大的师资队伍（部分来自外地），他们将乌尔都语当作一种混合语来传播。但与此同时，为实现文化的互补，有些人提出了要根据当地语言创建一种新的字母表的看法。我们发现到处都有希望创作本土文学的人，以宗教书籍和诗歌作为它的第一形式。因为语言环境的限定，这显然不是一件轻松的

事情。科瓦尔语已经有了小小的但已成形的文学传统，现在，布鲁沙斯基语、希纳语和巴尔蒂语也在作着这种尝试。曾遭道格拉政府镇压的巴尔蒂人如今正引领着这次文化复兴的潮流。

政府应该尊重并支持这些种族融合的趋向。有一个时期，北部地区不允许成立政党，因此，人民内部的隔阂和矛盾也就主要通过结成宗教团体来表现，甚至过去不存在这种分裂感觉的地区也如此。将建立在种族一致性基础上的新的忠诚带到这个竞争中将大有好处。

追寻人种学意义上的自我也就意味着去寻找与邻里之间的友谊和联系的古老的纽带，也意味着去认识他们之间共同拥有的光荣的传承。当低地被入侵者控制的时候，山区人民能坚守自己的传统，并在敌人入侵之后不久又重新获得自由。侵略者若没有现代武器及一位伟大英明国王的组织领导，便不可能征服他们。甚至当地统治者在获得英国势力的支持之前，也不得不十分谨慎地实施其统治。因此，北部地区有着很长历史的自由传统，现在也同样要求现代政府尊重这种传统。

注　释

[1] 卡尔·拉思詹斯：《关于兴都库什高原体系水平与垂直地貌划分的问题》，威思巴登。

[2] 弗雷德里克·巴思：《印度河和斯瓦特科希斯坦：一次人种学考察》，奥斯陆，1857 年—1957 年，第 2 卷。

[3] 赫希默杜拉·汗：《查谟简史》（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西藏地区的简要历史），第 4 部分，第 6 部分，勒克瑙，1939 年，第 758 页。（原文如此，应即《查谟史》——译者）

[4] 约翰·毕达尔夫：《兴都库什的部落》，格拉茨再版，1971 年，第 134 页。

[5] 详细内容见卡尔·耶特马尔：《兴都库什的信仰》（英译本），付印中。

[6] 彼得·斯诺伊：《巴格劳特，一个喀喇昆仑的达尔德山谷》，格拉茨，1975。

［7］卡尔·耶特马尔：《达尔德斯坦的人种学研究，1958 年首次报告》，P. A. P. S，费城，105/1/79-77，1961 年。

［8］彼得·斯诺伊：同上引书。

［9］格罗茨巴赫·欧文：《巴格劳特——坚持与转变，喀喇昆仑的一个边远山谷》，第 115 页，第 305—321 页。

［10］见 J. C. A，第 7 卷，第 2 期，1984 年 12 月，第 29—38 页。

［11］拉伊斯（Rais）是塞尔柱克（Seljuk）行政机关一种高级官员的头衔，这种职位通常由非突厥人担任。

［12］M. 理查德·埃默森：《神授王权：对巴尔蒂斯坦的土邦、构成和权力的考察》，J. C. A，第 7 卷，第 95—133 页。

第四章　从史前史到历史

引　言

现有的考古学证据不足以对这个地区的史前人类文化作出完整的描述，已经发现的一点点材料是与晚期史前史相关的，展现的是一个狩猎和采集食物的时期，这种生活有点像原始生活，但却不是最古老的生活方式。迄今为止我们搜集的所有材料仅限于岩画。我们可以将这些证据置于当地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研究，此外，我们还可以将它们放在更广阔的岩画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因为在跨帕米尔的周边地区，如新疆、拉达克、克什米尔和斯瓦特等地，都发现有这种岩石雕刻。有两个事实是很明显的：第一，散布于这个广阔的很长的地带的各个地方的岩画是有着内在联系的；第二，这些岩画之间有着延续性，其年代从早期延续到历史时期，用文化连续性的话语说，是从史前到历史。当我们更接近有纪年的历史时期时，这种证据就更多了，社会和动物的生活扩张了，象征物的数量增加了，宗教意味更清晰，也更具确定性了。同时，以石雕、石环和整块岩石的形式遗留下来的新型纪念物也反映了新的人、新的品味、新的联系和新的社会经济行为方式的体系。迄今为止，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定居于此的原始游牧和农耕群体举行聚会的场所。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朦朦胧胧地想象出一

个政治秩序的形成。在这个秩序中，某个特定的文明化了的部落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人口，并在达尔德的名义下，确立了它的历史特性，就像我们在西方古典文学作品[1]中所读到的那样。

岩刻

Y. A. 谢尔（Y. A. Sher）[2]发表了关于横贯帕米尔地区、苏联的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岩石雕刻的详细研究成果，详细讨论了这些艺术的不同形式，并追溯了它们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有历史纪年的年代的纪年史。这些岩刻与帕米尔[3]和帕米尔—阿赖山脉[4]地区发现的岩刻极为相似，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岩石雕刻当作于距今更久远的年代。而新疆也报告发现有这种岩刻，但它们均为游牧猎人所作。穆舜英教授写道：[5]

> 早期考古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天山和阿尔金山南部和北部地区所发现的岩刻。这是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遗物，它们主要发现于高山牧场，中、低部山地，以及游牧民族迁往一个新的草场时经过的路线上。另外，一些河谷也发现有这种岩刻。它们一般都刻于绿色或黑色的岩石上，如表面光滑的黑硬的砂岩、花岗岩及板岩等，这些岩刻的表面大都朝向东方，岩刻的线条雕刻于石块的表面。阿尔泰地区岩刻的主要主题有：首先是狩猎（常见的是猎人手持弓箭，或正瞄准一头野羊、鹿、野牛、马、骆驼和狼，等等）；其次是牧放牲口（哈巴河地区发现的一幅岩画表现的是两个牧人在放牧大群的羊、鹿和骆驼）；其三是各种混杂的主题，如：打架、舞蹈、肖像、神灵等。岩画是古代游牧民族的一种艺术形式。从我们所有的材料来看，这个艺术时期延续的时间很长，一些岩刻实际上作于14世纪后，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岩刻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比较，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肯定，一定有

一些岩刻是属于原始文化的。

这段长长的引文说明了整个地区的岩刻的主要特征，在我们这个地区也可以看到许多相似点。

A. H. 弗兰克（A. H. Francke）[6]已经对拉达克的岩刻进行了描述，这些岩刻发现于艾尔吉（Alchi）、东加（Dongga）和卡拉策（Khalatse）。弗兰克写道：

> 10月6日这一天，我们从格尔吉尔来到了希姆夏克尔布（Shimsha Kharbu）。在达尔德区格尔吉尔和贾尼贡德（Chanigund）之间的一块岩石上有好几幅雕刻，刻有一个室伐斯蒂卡（svastika①），一个尤尼（yoni②）和几头北山羊，它们让我想起了西藏西部的前佛教信仰。稍后，我们又在贾尼贡德的岩刻中发现了一个太阳的象征图案。从贾尼贡德通往希姆夏克尔布的公路上，有一个叫做东加的地方，那里有一块岩石上刻满了岩画。

卡拉策有更多的艺术石刻，弗兰克认为它们均为操达尔德语的人所作，见于拉达克诸遗址的岩刻的年代肯定要晚一些，它们与发现于我们这个地区的岩刻的年代一致。

从克什米尔的布尔扎霍姆（Burzahom）[7]发现了两块有新石器时代晚期水平岩刻的厚石板，其中一块刻有狩猎的场景，表现的是一头牡鹿被两个猎人用一支长矛从背后刺穿，又被一支箭从前面射中。画面上还刻有一只狗和两个太阳的象征图案。另外一块石板上刻的是一幅不完整的两侧下斜的图案，因为当地没有这个时期的石刻遗留，这些石头显然是在离现在很久远的年代搬运至此的。因此，它们的创作年代至少在公元前三千纪的中期。这些岩刻表现的情景与我们地区的岩刻几乎没有可比性，但是其雕刻技巧与吉拉斯地区的岩刻还是大致相

① 即卍、卐符号，亦译为万字纹。——译者

② 女阴的象征图像。——译者

像的。

斯瓦特的戈格达拉（Gogdara）[8]和哈梯亚诺甘道（Hathiano Kandao）[9]也发现有岩刻。这两个地方出现的大量岩刻与我们地区出现的中古时代的岩刻有些相似，尽管两个地区的动物并不一样。在戈格达拉还发现一块岩石上刻有一辆双轮战车，其年代当在公元前二千纪。

我们应该将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岩刻置于上文所描述的自然地理条件的背景下来进行理解。同样的背景能提供一张粗略的纪年表。纪年序列之中最晚近的是拉达克的岩刻，它表现的是早期历史时期的艺术风格。在这里，占优势（数量最多）的形象是马和骑士，以及圆圈或太阳的象征图案。较早的有斯瓦特的双轮战车图案和那个地区的一些类似的岩刻。克什米尔的岩刻显然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狩猎的图景，还有家养的狗的形象。最古老的岩刻在跨帕米尔、西伯利亚和新疆等地区，那里的石刻属于旧石器时代。北部地区的岩刻也不外乎这四个历史时期。

更早见到这些岩刻的是一些地质学家，杜兰[10]和毕达尔夫[11]，但没有人正确地对它们作过研究，并将它们置于真正有意义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卡尔·耶特马尔教授[12]对其中一些石刻作出了说明，A. H. 达尼教授[13]首次将这些图像置于史前的框架之中，后来又在其关于"史前的吉拉斯"[14]的章节中对它们进行了描述。这些岩刻主要集中在：沿喀喇昆仑高速公路从夏迪亚尔到吉拉斯的印度河两岸，然后是吉尔吉特河与印度河的交汇处、吉尔吉特河与罕萨河的交汇处、罕萨灵岩、罕萨河上的巴苏和苏斯特（Sust）、沿穿过吉泽尔河谷的吉尔吉特—奇特拉尔通道，从亚辛到欣杜尔山口的所有地方、香格里拉饭店（Sangrila Hotel）的圆石上，以及巴尔蒂斯坦的斯卡杜附近靠近萨德巴拉湖的门特尔（Manthal）等地。

最晚近的岩刻作于有纪年的历史时代的早期，雕刻的内容包括窣堵波、寺庙、象征男性生殖器的形象、圆形和方块，以及骑马的骑手，它们属于公元一千纪，且一直延续到现代。第二组包括罕萨灵岩上的前贵霜的岩刻、吉拉斯附近的西徐亚（Scythian）时期的石刻，以及这个地区第一个窣堵波和人形肖像的岩刻。第三组岩石雕刻的形象包括

半人半神的形象，以及饲养牲畜和放养牧群的群体。这些群体似乎是过着游牧生活的牧民。岩刻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二千纪和公元前一千纪。最早的一组岩刻表现的全是猎人和采食者，他们使用石器工具和磨尖的石箭，有时是个人单独打猎，有时则是群体狩猎。它们广泛地分布于北部从吉拉斯到亚辛的地区，以及南部的斯卡杜等地，年代可能在公元前二千纪以前，也许可以上溯至公元前六千纪或五千纪。这四组石刻可以按年代的顺序，从早期到晚期，以A、B、C、D来标示。这一章我们只详细讨论年代最早的两组，即A、B两组的内容。

亚辛、斯卡杜和吉泽尔

在亚辛，当我们沿纳兹巴尔（Nazbar）河东岸而下的时候，正在其边上的费蒂达斯（Fitidas）有一块突起于岸边的大石头，它被埋在沙砾之中。这里也许还有许多这样的圆石。这块大石头上有痕迹轻微的石刻，大多数雕刻可能属于A类，这些岩刻上只刻有人和动物，身体内部也被雕凿出来了。因为这个地点离帕米尔不远，这些岩刻显然与跨帕米尔的岩刻有着文化上的联系。另一方面，在离格久拉（Kachura）湖不远处的斯卡杜的香格里拉饭店里面，有一些高高耸立的大石头，上有史前石刻，刻着人和动物的图像。所有的形象都只勾勒出了轮廓，其雕刻技艺是原始的，但画面中没有任何迹象可以反映其创作的具体年代。从风格上判断，它们不会比B类岩刻的年代更晚。在离斯卡杜不远的萨德巴拉湖附近的门特尔，有一块有佛教雕刻的巨石，其西边有一块孤立的石头，上有不同时期的雕刻，其中年代最早的岩画处在后来的骑马者的图像之下。现在，这些早期的岩刻已经剥蚀了。其他见于通往欣杜尔山口和奇特拉尔的路上的古比斯和芬达尔（Funder）湖之间的众多巨石雕刻，年代肯定要晚一些，因为画面表现了骑马的骑手、圆圈或太阳的象征，以及里面有点的方块。我们还在这里发现了手掌印。要指出的是，这些形象也见于帕米尔地区的岩刻。因此，这一类型的岩刻应该也更有可能与跨帕米尔地区的绘画有某些

联系，因为这两个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比较接近。这些岩刻的内容包括：骑手手持弓箭站在马背上，瞄准动物，北山羊的身体被箭射穿，角被折弯，有时候马匹的身体凹进去了，等等。这些艺术作品很可能表现了游牧者的生活，这些牧民也许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迁徙到了这个地方。

吉拉斯地区

吉拉斯地区通过几条路线，如凯纳尔（Khinar）河谷、霍杜尔河谷、汗贝里、达丽罗河谷和丹吉尔河谷，与亚辛和吉泽尔相连系。正是沿着这些路线，人们从北向南迁移，并在沿途的石头和岩石上留下了他们的雕刻作品。沿印度河，在吉拉斯、霍杜尔、托尔和米纳尔加赫（Minargah），直至夏迪亚尔和吉拉斯以西差不多40英里的最后一个地方，都可见到这种岩刻。在吉拉斯，岩刻始于东边的塔格河河口，间断地沿印度河南岸延伸，一直到吉拉斯西部约7公里处的吉奇（Gichi）。在印度河北岸，岩刻始于凯纳尔河东岸的特尔班村西部，一直到霍杜尔，然后有一个中断，再到托尔，我们在那里又发现了一处很大的岩刻群。

在特尔班村以西约两英里处，印度河北岸西部诸圣墓（Ziarat[①]）附近的塔戈特（Thakot）平原上发现有史前岩刻，在霍杜尔和托尔，人们又发现了与后期岩刻混杂在一起的史前雕刻，其中一些后期岩刻刻在它们顶上。在南岸，吉拉斯以西约两公里处的德瓦（Deva）也发现有史前岩刻。此外，它们还见于吉拉斯以西20公里处的米纳尔加赫，在夏迪亚尔也有一些。

这些岩刻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风格。第一种，人和动物的整个躯体都表现出来了，其技巧是用一块尖石头凿出印痕，将整个躯体填满，但没有试图用任何规则的线条来勾画躯体的轮廓。正是在这种风格中，

① 指当地著名伊斯兰教传教士的陵墓。——译者

动物中的双三角形被清晰地表现出来了。这种形象的雕刻应归为A类。在第二个时期，躯体的轮廓用规则的线条清晰地勾勒出来，而躯体内部保留空白。在这种风格中，我们通常见到的是狩猎的场景。它们应该被归为早期的B类，其中一些还可归为晚期的A类。在第三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其他的形象，它们首先是用规则的线条勾勒出轮廓，然后凿出躯体的内部。这种石刻肯定属于B类，有些属于这一类中的晚期作品。

在离吉拉斯不远的德瓦，有一块大石头，上面除了有晚期的雕刻外，两面都刻有狩猎的场景。在朝东的一面，在后来的刻印之下，有一幅猎取北山羊和捻角山羊的场景，画面中一个猎人持弓，另一个猎人手中举着石头，中间有一条狗也加入了狩猎的队伍。还有两只鹰，张开了宽大的翅膀，好像正在向地面俯冲。动物们都只勾勒出了轮廓。另一面刻有许多北山羊和捻角山羊。在画面底部，动物的身体都是通体凿刻的双三角形。一只狗正在帮助一个带着弓箭的猎人。在右手边的角上，有另一个狩猎的场面，画面中，一个猎人正用弓箭射击，也有猎狗在帮他的忙。这些岩刻的年代可根据两个特征来判断，其一是对于动物身体构成的双三角形的强调；其二是刻画动物时对凿的技巧的运用。另外，与这个地点相关的其他两个方面也值得注意：第一个方面与该地的岩刻延续到历史时期的整个历史相关，表明一个特别的人群一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第二个方面是利用高大的石头进行雕刻，它的底部有一个填了小卵石的平台，这表明这些岩石实际上是包括在某种宗教仪式中的。不难想象，岩石崇拜是当地流行的宗教的一部分，甚至在稍晚的时期也发现有这种现象。

吉拉斯的另一处岩刻也采用了同样的技术形式，该地编号为吉拉斯Ⅳb，①[16]它位于通往印度河的一条干涸的小河的入口处。巨大的石头是从顶上被冲下来的，过去这条小河的冲力很大，以至于冲破了一块小的岩面，这块岩面曾是印度河河岸的最上一层，冲过这个旧的河岸，印度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落差很大的瀑布。在这个河岸上，有许

① 这是对吉拉斯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给予不同岩刻群的编号，如吉拉斯Ⅰ、吉拉斯Ⅱ、吉拉斯Ⅲ……，等等。——译者

多平躺的砾石和几块表面更光滑的石头，史前人类选择了这些石块来留下他们的雕刻作品。在这里，岩刻总数接近50处。如果“小型贫困家庭”一词能用来指设法在这里靠狩猎而生存的群体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些岩画一起构成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史前的小型贫困家庭的生活场景。在小河的一块陡峭的岩石的底部，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狩猎的场景，画面中一头壮实的北山羊正向右边跑去，两名手中只有石头的猎人正在追赶它，画中的人都是男性，他们的男性器官被清晰地表现出来。从画面上看，他们似乎在河边发现了这头北山羊，于是这两个猎人发挥合作精神，联合起来，组织了这场狩猎。在它上面一点，靠左边的地方是另一幅重要的图景，岩画中有两个并立的人像，右边的人正在跑步，而左边的那位似乎正要开始追赶。他们的身体同样是通过凿的技巧来完成的。他们左边有一网状图形，可能代表一道栅栏，标示出了人的居所。在另一行中刻有一个典型的人体，躯体是长长的通体凿刻的长方形，顶上有一个圆圆的头，双手下垂，五指叉开，两腿蜷曲，双脚撇向两边，双腿之间有一条加长的线，也许是用来强调男性器官的。人像头部两边各有一点，不知道代表什么。在他左边有更多同样形式的人像。右边的人的下面是一个左脚脚印的轮廓，这个脚印似乎有着某种仪式上的意义。然后是特殊的一对夫妻的图像，人像一大一小，都是平坐的姿势，尽管他们的位置是并列的，但他们的性器官似乎被一条长长的曲线连接在一起了。这幅图像的左边是另一个网状图形，其风格形状与前面描述的那个相同。附近另一块大石头上，刻着两个并立的人像，左边的个子较高，其身体呈双三角形，右边的个子较小，身体上部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第二个人像身体两边各有一个点。在以上两个例子中，人的性器官根本没有标示出来。但如果将右边个子较小的人像与早期画像中的矮个子人像作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里要表现的是一位女性，如果这种猜想可以成立，那么，人像上的点代表的可能是乳房。这些人像表现的是从事不同劳动的夫妻的群体。另一块石头上刻有一对脚印，中线是合用的，稍远处，刻有两个人，手拉手在高兴地漫步。另一块石头上还刻有另一个典型的场景，一个人的脚被蛇咬了。还有两块砾石上刻有站立的人像，他们的

加长的长方形的躯体是通体凿刻的，头是圆的。另一块圆石上刻的似乎是一种梯子，其用途尚不清楚。再往前，我们又见到了两个脚印和一个右手的手印，手印是通体凿刻的。

所有这些岩刻都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史前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他们以狩猎为生，狩猎是通过社会合作完成的，他们的生活也已经达到可以称为群居生活的阶段。在社群当中，男人和女人分工合作。他们普遍地生活在有防范的地区。手印和脚印增加了宗教和仪式的意味。这种艺术是原始的，但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定义，他们不均衡的比例，他们各自的作用却是已经确定了的。在技术上，人类还处在使用砍削成片状的石头工具的阶段。动物的体形很大，身体通体凿刻的表现技巧反映出所有这些栩栩如生的艺术所属的纪年范围。所有石刻都位于印度河河岸的高处，这表明，这些石刻的年代应当早于现在变得更深的印度河河床形成的年代。用地质学术语来说，现在的河床还是近代的。因此，上层河岸的生活应该归于全新世，那时，小河中还有奔腾的流水。

因为没有刻下除狗以外的其他家养动物的形象，似乎表明这个人群还生活在前游牧生活的阶段。另一方面，这种描绘社会生活的方式也表明人类生活已经变得有选择性了，并且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合作，而不是只靠个人的一时兴致。尽管男性似乎在这些场景中占有主导作用，但妇女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这些人类已经有了防护的意识，设了防的地区似乎给他们提供了更舒适、更安全的生活条件。总之，这是界于旧石器时代纯粹的狩猎时期和早期农业时代的生产食物时期之间的一个时段，这也可能是原始狩猎群体在吉拉斯这个孤立地带最后的遗留。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上述狩猎群体的场景。这从印度河右岸获得的材料来看就很明显了，这些材料来自位于现塔戈特村的坡上的两座穆斯林圣墓之间的遗址附近。这个村庄依赖于当地一处至今仍喷涌不息的泉水。该村庄形成于 19 世纪印度河的大洪水之后，更确切地说，是 19 世纪中期锡克人入侵之后。那两座圣墓就属于这次事件中的两位殉难者。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几块大小不一的变黑了的砾石，

它们从高山的北部滚落下来，埋在了印度河边上的一块土地里。在这里，印度河突然地侵入了它现在的陡峭的河床。这块平地渐渐地呈坡形延伸，形成了直到山脚下的一道宽宽的河岸。几条现已干涸的小河将这段河岸拦腰切断。刻有岩画的砾石全都在这片开阔的平地上，这些岩画的年代一定在这些砾石到达它们现在的位置很久之后。在小河中没有发现刻有岩画的砾石，因此，我们有理由假设，它们在岩画作家留下岩画之前就在这里了。这里的这种史前艺术是一种持续的过程，表现出了不同时期的绘画特征。

最古老的雕刻图画见于第二号圣墓（Ziarat Ⅱ）附近。在那里，画面的形象、主题更为丰富，且表现出两方面的技巧，即以凿出印痕和用线条勾勒来构成躯体形象。有时候，这两种技巧是一起运用的。在一块很大的砾石上的晚期佛教雕刻之下，有几个用凿印技巧刻画的人像和脚印。在最左端，我们看见一个人举起一个小孩，并提醒另外一个人提防蛇。中间有两个手拉手的人。右边有更多正在狩猎的人。在他们下面，可以看见一头捻角山羊，再往下是一个肥胖的人，他的右边是一个正要射出一支箭的弓箭手，底部是两只脚印，还有许多不同的象征符号。总之，史前人类的图画提供的信息非常丰富：开心地和他人在一起的人、被蛇咬的人、带小孩的人，大型的狩猎场面，如围猎捻角山羊，以及最后的象征性的脚印和可能是手掌印的图形，共同构成了这幅图画。最为有趣的是左下角的第二幅狩猎图景，[17]在岩画中，一个头上戴有动物犄角的人已经非常接近一头北山羊，他用箭直接刺穿了动物的身体，而这个猎物是由从另一个方向来的猎狗发现的。这个头上戴有动物犄角的人表现出了史前人类的另一个特点。在这个人的头顶上，第二个大型动物正向左移动。这幅狩猎图景的左边是另一幅不寻常的情景：[18]七个人正在用筏子运送原木。这个地区至今仍在使用这种用一段结实的原木来渡河的方法。而弄明白古人是如何用原始的石器工具来准备这样一段原木的，将是一桩十分有意思的事情。在同一块砾石的右边还有两幅狩猎的图景：[19]较低的那幅画显示，两个头戴已被折弯的犄角的猎人正试图抓住几头北山羊和3头捻角山羊，但似乎只打中了其中一头；另一幅是群猎的生动场面（图1），画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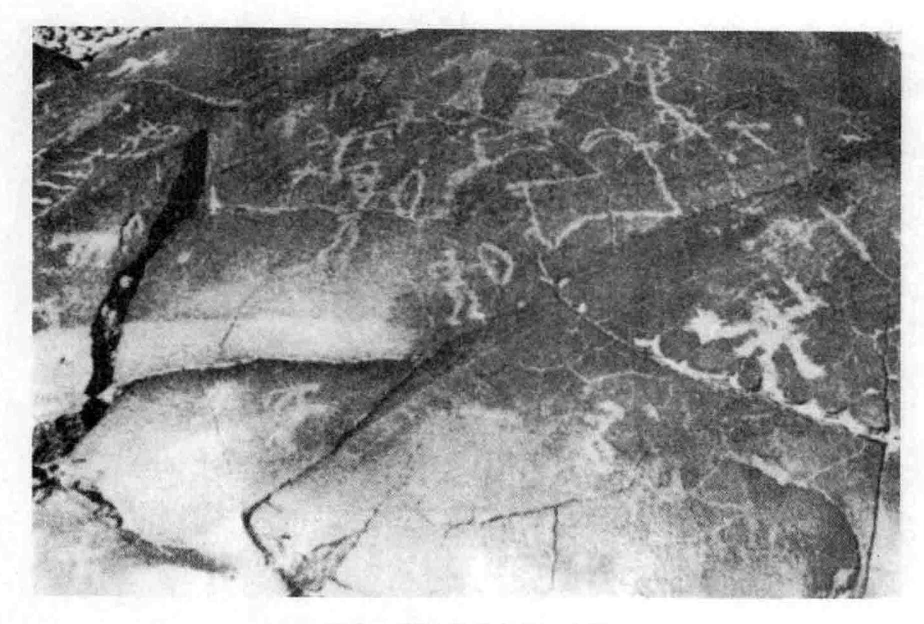


图1　吉拉斯的岩画：群猎图，史前时代

有戴犄角状突起饰物的，岩画中至少有两头北山羊，其中一头颇为肥壮，几乎看不见它的腿，两个人手持弓箭忙碌着，而其他的人正在朝它们扔石头，也许他们还持有磨成薄片的石头工具，在他们之间的一些点也许代表的同样是石器工具。这是群体狩猎的现实主义表现，中间带犄角的饰物显得非常奇特，它一定具有某种图腾的意味。无论如何，这个场面提供了许多关于史前狩猎的信息。

这块大砾石上的图画介绍了史前人类狩猎的几种类型，表现了人们带小孩、被蛇咬的社会生活经历。同时，木筏的使用反映出了一种不同的渡河技术。另外，带犄角的冠和带犄角的神灵使我们能更多地了解史前人类头脑中的宗教观念。最有意思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不仅体现在一起拖运原木上，还表现在一起狩猎上，这表明人类在共同的社会生活过程中走向了更加团结，这一点在围猎北山羊的画面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画中好几个人都加入了围猎，所有人都在协同合作。

这种合作的行动也见于另一块砾石上的岩画。这块石头是被远远地移到东边的。实际上这里有两块砾石，现在都着上了蓝色，因此很



图 2　吉拉斯的岩画：手印



图 3　吉拉斯的岩画：手拉手的欢乐的人们

难把它拍摄下来。一块石头上有几个手掌印（图2），另一块刻有围着一个大圆圈的人，这个大圆圈可能代表一个大陷阱，猎物被赶到了陷阱中。从画面上不能清晰地看到动物，但第一个圆圈刻画得很清晰。这看上去像是通过把动物赶入陷阱来捕获猎物的一个例子。第一号圣墓（Ziarat Ⅰ）[20]的另一块砾石上表现的是两个或三个一组的人手拉着手，好像在舞蹈（图3）。第二号圣墓[21]的一块砾石上也刻有相似的群体舞蹈的人像。但第一块石头上的画面最值得注意，画中，人的身体由顶点交会、底线相对的两个三角形构成，在交会处有两个圆点，各在身体一侧，最后画有一条曲线，也许是表现从两边连接两个底的手。在顶端是一个半圆的头，腿没有画出来。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用几何线条来表现人体的方法。这种方法也见于第二号圣墓的另一块砾石上，画中表现了一个有手有脚的现实主义人像，腿与向外张开的脚是分离的，手半张开，从肘部弯下来。头是半圆形的，而身体由两个三角形构成。同一块砾石上还有一个手掌印和一个脚印。这种表现人体的特殊的技巧似乎在一个晚近的时期内非常流行。在发现了更多岩画的编号为吉拉斯Ⅴ的地方，在一块砾石上的晚近佛教雕刻之下，刻有早期人像。画中有姿态不一的5个人，左端的两个人是用几何图形构成的。左边那个人的构成很有意思，在这个例子中，躯干连同腿由两个顶点相交、底线垂直的等腰三角形构成，较低的部分构成了腿，上部则构成了头顶，由一根水平线连接起来。头发向上竖立。在三角形交会处的四个圆点显得很神秘。右手也是由交会于一点的两个三角形构成，但底线是水平的。上面那条线的中间部分是弯曲的，以表示头的形状，另有一条附加的简单的线条表示手。第三个人的身体是通体凿刻的，由一个三角形构成，三角形的底部代表人的肩，它承受着一个圆形的头，且从肩部呈倾斜状引出一条线表示手，腿是一个向下的三角形的其他两边的延伸部分，但画得很粗，在较低的那端附有呈水平的脚。第四个人像非常简单，用一条线勾勒出人的手、腿和头。最后一个人的身子是通体凿刻的长方形，宽宽的肩上是一颗有角的头，手倾斜着向下垂，腿和脚呈走路的姿态。用五种不同的方式来描绘五个人物的目的和用意不甚明了。如果将这五个人像置于附近的岩画中的手印和

脚印的背景中考察，我们也许可以更好地领会它的深层含义，但却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无论如何，这里发现的史前岩画是神圣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些史前艺术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对手印和脚印的描绘——这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史前人类也有的特点。所有的证据可归结如下：[22]手印和脚印普遍见于印度河两岸吉拉斯的几乎每一个发现有岩画的地方。在稍高于祭石的（Altar Rock）的编号为特尔班Ⅲ的地方，也发现了一组有手印和脚印的岩画。这块表面已变成蓝色的砾石裂为三块，岩画见于左边的那块上。中间的那块有六个手印，在顶部中间偏右的地方有一个动物，可能是狗，在一只脚印的后面。一只脚是通体凿刻的，手也是，手指清晰地表现出来了，其他的脚只勾勒出了轮廓。那只小动物也是通体凿刻的。在我们去往第一号圣墓的路上，有一块石头上有两个通体凿刻的脚印，再往前，另一块砾石上刻有两个脚印，一大一小。在到达一号圣墓后，我们又在靠河的高高的河岸上发现了一堆砾石，两块大大的砾石上刻有古老的岩画。其中一块砾石有朝东和朝西两面，在朝东的这一面上，除人像外，左下方还有一只脚印的轮廓，中间有同样大小的三个脚印和三个手印。三个手印中，一个是通体凿刻的，两个是线条勾勒的。右边是两只脚印的轮廓。在第二号圣墓，我们发现了第二个集中的古老岩画群。首先我们发现一块砾石上刻有公牛和其他图像。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两个通体凿刻的手掌印，两只手的手腕都被刻得直直的，左手的手指叉开。我们还发现了一只脚印的轮廓，五个脚趾都很清晰，从画面可以看出这是晚期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找到了另一块砾石，画面中央两只狗正在追逐三只捻角山羊。在顶端有一只宽大的手印的轮廓，手指却较小。在左边有一只脚印的轮廓，有两根水平的线，可能是将脚趾与脚底分开。另一块砾石的两面都刻有岩画，一面刻有两个人狩猎的场景，顶部有一个通体凿刻的手印，手腕呈圆形，两只勾勒出了轮廓的脚印，两只脚印的中间都有一根水平的线将脚底分开。在另一面，除晚期的印迹外，我们发现了五个手印和一个通体凿刻的脚印。另一块巨大的砾石上有好几幅图景，顶部有一双脚印的轮廓，后来被填上了水平的线条，其

中一只还有一根垂直的线条。一块砾石上刻有伸展着双手的很大的人像，[23]在人像的左边有几个手印的轮廓。跨过一条小河（Das）之后，我们见到了另一块巨石，其上刻有一个手印，左边的一只动物旁边还有一个脚印。再往前，一块砾石上刻有圆圈和一个手印。附近的一块石头上有一面刻有一只脚印。再跨过两条干涸的小溪后，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发现了一处古代粟特文铭文（Sogdian inscription），一块砾石上刻有后期的手印和一个脚印。印度河左岸也有同样的情况，在那里的几块砾石上也发现有手印和脚印。这些手印和脚印一直沿用到历史时期，它们几乎从不单独出现，而总是与狩猎和其他的仪式场景一起出现，这表明这些印迹在史前人类的生活中有它们各自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些印迹本身并不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因此我们有理由假设它们起到了一定的仪式的作用，或者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这些古代的岩画也试图描绘神、人同形同性的神灵。在这种描绘中，面部不能用固有的形式来表现，只有头部是构想好了的。在吉拉斯V之前，从原始人类的几何形式发展而来的艺术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在第一号圣墓我们见到了最简单的绘画，呈长方形的粗糙的人体轮廓，顶部是圆形的头，手在身体两侧，拳头紧握，腿直立，在膝关节和踝关节处有一凹陷，小腿弯曲，两脚并拢，但用一根结实的细线连结在一起以分开或向侧面伸出。在两腿之间的一条线可能是代表男性器官。在这个人物的身体上，后来又画上了一只小鸟，一个人正从右边向它射箭。在同一个地点还发现了另一个这样的人像。最近，在印度河左岸、吉拉斯以西20公里、正好位于喀喇昆仑高速公路之下的一个新地方，发现了更多类似的例子。更为重要的是第一号圣墓的一块双面的石头上发现有另一个神人同形的图像。这个图像（图4）造型独特，主体部分由两个顶点相交的三角形构成，这两个三角形又围在一个方块之中。在三角形的交会处，有四个圆点。竖立的头发用身体顶部的垂直线条来表现，脸部根本没有表现出来。两只手都被凿实，五指分开。一条蛇从右手手臂蜿蜒而上。在躯干下，两条勾勒出了轮廓的腿呈锥状向下，且与青铜时代的陶器上的两腿相连的形式相似。连在一起的双脚撇向外面，看上去像一只船。神灵的两面性表现得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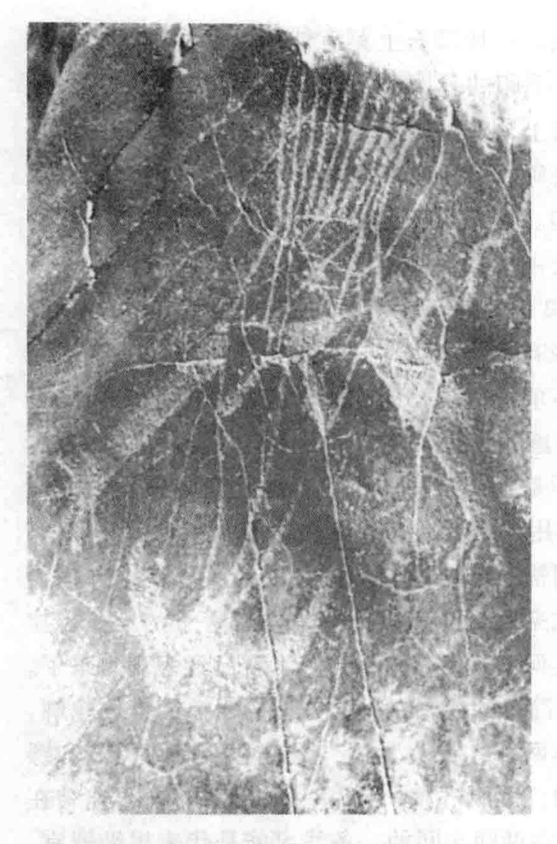


图 4　吉拉斯的岩画：蛇神或河神

他与蛇在一起，因此可能是蛇神。同时，像船一样的脚表明他与水有着关联，他又可能是水神。然而，它与这个地区的其他神人同形的刻像在技术和技巧上有着相似性，这表现了源于史前时代的这种观念的延续性。唯一不同的是用竖立的头发来代表头部（其解释见下文）。这个图像的年代可根据连接在一起的腿的形式来判定，这种形式也见于青铜时代的陶制小雕像上。它来自于犍陀罗雕刻文化，在早期历史时期的恰萨达（Charsada），它被称做是“巴罗克式女士”（Baroque ladies）。它发展为大号的人像，其结构更加复杂，形式怪异，他的确是一个提婆（Deva①）[24]——身体又有点方，是通体凿刻的，头发竖立在头上，手伸向两边，腿和脚及脚趾都完全表现出来了，脚分开，撇向一边，但又用线系在一起。他缠着腰带。最初这是一个男性的肖像，但后来又画上了乳房，下面又添上了一条尾巴，膝部周围又标上了五六个点。这样一个巨人形象没有丝毫后期佛教或印度教的特征，它显然表现了史前人类心目中的神灵观念。手和脚的精巧构造说明它的年代也许在很晚近的时期，但身子和头都没有刻画出来。与之最接近的比较物是

① 梵语词，即天神。——译者

丹格里（Tangali）[25]的岩画，那里的头像是由一个发散的球形构成的，而这里只有竖立的头发。

对于同样的比较的材料，卡尔·耶特马尔教授却作出了不同的评价：

> 然而有一个显著的特例：奥库诺依德（Okunoid）传统。它很明显地包围着西伯利亚南部和蒙古的几种文化。通过永久性的雕刻和有装饰图案的史前巨石，人们只是模糊地了解了其中的一部分，至于其他的——奥库涅夫（Okunev）文化——是记载在包含有刻着典型铭文的石板的墓穴中。这些文化的起始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二千纪之初，并且持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用现实主义方法描绘的带角的牛和羊在这些石板上占有重要的作用，但奥库诺依德艺术的主要内容是表现人的头部，或者是表现扭曲的人像。塞尔（Ser）称之为Mascoids，Mascoids有一些奇怪的特点：宽宽的条纹（可能是表示文身［tatooing］或身体绘画），前额上的“第三只眼睛”，辐射状的头发，带有大大的角的复杂的头饰。有时这种Mascoids是极端程式化的人物形象的一部分，大部分是女性（?）……因此我们在这里也许发现了奥库诺依德传统的分支。必须要提及的是神秘莫测的奥库诺依德部落肯定和东西方文明有关。作为牧人，他们越过了广阔的区域。人们又开始关注印度河沿岸的一个新地点的岩刻和铭文。当这些游牧部落从复杂的农业社会的边缘推进到位于大喜马拉雅山脉西端后部的印度河河谷的这一部分时，他们已经形成了刻制岩画的习惯。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是制造铭文的高手。这里的浑圆而光滑的岩石和砾石，以及其黑亮的光泽，给艺术表现提供了极好的材质。后来侵入或旅行到这里的人们，也承袭了这种早期的岩刻传统。[26]

迄今为止描述的岩刻，表现了与史前人类生活相关的人物的故事，

其年代难以确定。然而，在印度河上部阶地的编号为吉拉斯Ⅲ的地方，又有另一种类型的岩刻，其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纪。那时候，印度河的阶地的最低处尚在使用中。在这个较高的阶地，除后来历史时期的雕刻外，我们还发现有动物的图像，大多是成群的动物。有两三块砾石上刻画着羊群，[27]清楚地表明这些动物已经被驯化了。在岩画中，它们或者正被赶往新的草场，或正立于围栏旁边。这边画的是公羊和母羊正在互相推挤，而在另一处小羊羔又离群了，那边又有一条眼镜蛇正与一头母羊面对面地对峙。整个画面栩栩如生地表现了游牧民的生活。在另一个地方表现了一群鸟儿，母鸟正在喂着雏鸟，还有立在枝头的小鸟。

在这些雕刻中表现出来的唯一武器是一种简单的弓。它用一根垂直的线条来表现，右边一支箭在其中间。在箭头的一端，似乎有一个削成薄片的石英的点。另一处岩画中的弓由一根曲棍构成，上有一根筋做的弦来推动箭。在吉奇的岩刻中，出现有刮削器，表明对皮革的刮削。

这些岩刻延续了这个地方史前的传统，但同时，它也偏离了新的社会经济潮流。其中最重要的人类学证据是吉拉斯的岩刻对于牧养羊群的刻画。牧养羊群的习惯反映出当时人类过的是一种畜牧生活。而新的家养动物的方式一定引起了其他的社会变化。但因年代久远，缺乏可靠的证据，因此，具体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猜想，不管这种新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是何时被引进到这一地区的，它一定伴随着许多其他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与食物生产的进程是相联系的。如果能从这一地区发掘出更多的证据，将这一地区的历史发展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重构食物生产过程的演变历史。

同时，这一地区已经发现了一些不同类型的、反映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的历史的考古资料。虽说杜齐（G. Tucci）[28]教授已将这个民族称为“达尔德人”，并从图书馆搜集了一堆与之相关的资料，但因为他们距离现在毕竟已经十分久远，因此他们至今仍未真正为人们所知。在与奇特拉尔相邻的地区，G. 斯塔古尔（G. Stacul）[29]教授从这些人

所居住的巴卡玛格（Bakamak）村发掘出了一些史前的墓葬，他这样描述这个地区：

> 这个多小山小丘的地带是整个河谷中最为集中的耕作地，灌溉渠纵横交错，密密麻麻地呈网状分布。整个地区向着满是砾石的河岸呈缓缓倾斜之势，河水不断侵蚀着河岸，冲出一道高高的、陡峭的悬崖。一股小小的湍急的水流也制造出了与之相当的侵蚀效果。这条小溪在首府南面6公里处汇入奇特拉尔河，它冲出了一道真正的峡谷，从而给分别位于小溪两岸的诺科罗姆里（Noghorumri）和巴卡玛格（Bakamak）划清了界线。

从这个地方发掘出来的古墓中，有一座墓是由四块石板构成的。在墓室的黏土地面上躺着一副骨架，但保存得不太完好。骨架是右侧的，靠近胸部的地方有一个铁质箭头，脚部有一个打破了的罐子。在山上巴拉希萨尔（Bala Hisar①）所在的位置，发现了更多的墓葬。墓室中有一些装有尸骨的大坛子。发掘者在那里共发掘出了6个陶制器皿、一枚大铜钉、一个铁质箭头，还有7颗红玛瑙珠子。通过这些考古挖掘活动，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奇特拉尔出土的随葬品与斯瓦特、迪尔和西北边境省其他地区的墓葬品关系极为密切。

第二个邻近地带在戈尔班德（Gorband）河谷，那里也发掘出了一些墓葬。戈尔班德河谷靠近海拉伊（Kherai）村，离卡洛拉（Karora）约6英里。这些墓穴是长方形的，墓室的四壁由垂直竖立的四块石板构成，顶部覆盖着一块或几块厚厚的石板。墓室中，在靠近尸骨的头和脚的地方放着一些罐子。有两个墓穴中还发现了螺旋形的金丝耳环。斯塔古尔博士[30]将这里发现的陶罐与拉达克的列城[31]附近墓葬中发掘出的陶罐进行比较，通过A. H. 弗兰克的精确鉴定，确定它们为达尔德文化的制品。他将这些物件的年代判定为达尔德文化的第一时期，亦

① 波斯语词，意为“高处的围墙（或堡垒）”。——译者

即公元前二千纪的中期。

很早以前，吉泽尔和亚辛河谷中已经发现过这种类型的墓葬，吉泽尔和亚辛河谷通过北边的一条路线与奇特拉尔直接相连。毕达尔夫首次对这些墓葬进行描述，他写道：

> 在沃尔希古姆（Woorshigoom）河谷和科（kho）河谷中发现了大量十分古老的不同寻常的石桌，石桌的直径约3英尺，① 由一些巨大的石块构成，石块平坦的一面朝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约3.5英尺高的圆圈。这些石块上放上了较为平坦的石块，上下尺寸差不多，上面的石板较下面的稍稍伸出几英寸。中间堆满了小石子和渣石，不知这是否是当初制造这些石桌的本意所在。当初运送和安放这些石桌，一定花费了巨大的劳力。当地传说这些石桌都是古时候巨人的杰作。在杰希（Chashi）和亚辛发现的石桌是好些张桌子聚集在一起的，而在这两个地方与沃尔希古姆河谷上部之间的地方发现的石桌却是一张一张分散着的……保存得最好的一圈石桌是在靠近古比斯、由河流会合冲击而形成的一块舌状土地上发现的。瓦因（Vigne）提到，在阿斯托尔时曾听说过这些石桌圈，他们很可能都在墓堆中。[32]

在亚辛，至今仍可见到散布于田野之间的凿成长方形的石块。然而，在一位名叫伊斯哈克（Ishaq）的当地村民的果园里，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石头圈（图5），直径约33英尺，边上有40块竖立的石块，在中间位置，大概正在主墓穴之上，有一个由一些围绕着大石头的小石块做成的盖板。南边有三块大石头标示出通往这个墓穴的主入口。这座由巨石造成的墓室似乎与毕达尔夫所见是相同的。在果园围栏之外，主人还发现了许多其他的墓坑，墓坑中有人的骨架、铁刀、手镯、脚镯、珠子和罐子等物。显然，这种墓坑与奇特拉尔出土的是相似的。

① 原文如此。据查约翰·毕达尔夫原书，应为30英尺。——译者



图5　亚辛：巨石文化时代的石圈，公元前1千纪。

但是，这个大的圆形石墓看上去十分坚固，可以猜想，墓主一定是一位首领，而其他墓坑的墓主可能就是平民。而究竟如何，还有待于未来的发掘考证。

在达丽罗河谷已经发掘出了许多叫做“戈斯”（Kos）的设防城镇，有些城镇有着巨石的城墙。[33]意大利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很大的储藏罐。达尼教授对初步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总结：[34]

> 好几个地方都报告有古墓遗址，但人们只对正位于老城旁边的一座小丘上的下马尼基亚尔（Manikyal Payin）遗址进行了探测。这是一片墓地，当地的老百姓过去曾从那里的一个墓穴搬走了一些大罐子作日常之用。经考察发现，有一座墓穴中埋葬着一个球形骨灰瓮，里面装有烧过的骨头和骨灰，瓮上盖有一个石盖。这是一个火葬的例子。骨灰装在瓮中，最后将骨灰瓮埋在人工挖掘的坑里。——这是从斯瓦特的犍陀罗地区、迪尔、巴乔尔和白沙瓦河谷[35]等地了解到的墓葬类型，但在犍陀罗尚未发现这样的骨灰瓮。球形骨灰瓮的顶

部有一个厚厚的平平的边缘，上面压印着星星及其他图案。它的底部是小小的圆盘。完整的这种类型的骨灰瓮是在一所房子中发现的，在同一个墓坑中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的较小的罐子，其中有一个是打破了的竖立的碗的碗脚——这是犍陀罗墓葬文化中的陶器的一种。所有的罐子都是红陶。尽管在仪式上，这些墓葬呈现出许多与犍陀罗墓葬相似的特点，但是要准确判定其年代却非易事，这还有待于对这里进行更彻底的考古挖掘。但无论如何，这些墓葬都告诉人们，至迟在公元前一千纪，有一个民族慢慢进入了这一地区。在吉奇也发现了类似的陶罐的碎片。[36]

这些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墓葬证实了它们与奇特拉尔和戈尔班德河谷中的墓葬的关系，并进一步将它们与犍陀罗的类似的墓葬、塔克西拉的哈梯亚尔（Hathial）山丘上的实物发现相联系。这一地区时不时报告的许多零零散散的发现[37]应该置于这样广阔的文化联系的背景上加以考察。

卡尔·耶特马尔教授[38]对位于达丽罗河谷的马尼基亚尔村和古玛里（Ghumari）村中——早在这一遗址被发现以前，人们就在它附近发现了一些墓葬——发现的青铜或黄铜的斧子、勺子、叉子和杆子作了一番描述。在这些物件中，有七件笨重的生了铜绿的把上凿孔的斧子，其长度为6至16厘米，用来砍东西的锋刃长9.7至11厘米。这些斧子不同于印度河文明的斧子，而类似于在强胡达罗（Chanhudaro）发现的后哈拉巴的斧子。在同一河谷中还发现了一柄带耳斧子，它可以与库拉姆河谷的沙洛赞（Shalozan）发现的斧子相比较。莫卧儿博士（Dr. Mughal）将它们的年代判定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后250年。他进一步说道："这种带耳斧子在类型上是与地中海地区、欧洲、跨高加索地区、伊朗北部地区发现的斧子相似的。"耶特马尔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出现了西方类型的带耳斧子，这表明有少数高加索人进入了大草原，并向东进入了帕米尔，然后到达了兴都库什和喀

喇昆仑地区。

1940年，在伊希戈曼河谷伊米特（Imit）附近一座用于居住的山丘上发现了一个古希腊风格的青铜角状杯，杯子的较低部位刻画了一匹马的身子和腿（这构成了角状杯的基座），以及一个老人的头、胸和手臂。这个复合图案表现的是希腊神话中人首马身的怪物，画面上的这个怪物正叉开两腿，双手举着一只北山羊。后面杯形的部分支撑着一个倒立的锥形器皿。可以肯定，这个角状杯的创作灵感源于希腊文化。伊希戈曼河谷中出土的另一个器皿是奥雷尔·斯坦因爵士发现的，[39]这是一个双耳大锅，锅的前部有一个马头形的突起，在形式上，它与在帕米尔东部发现的器皿大致相似。

如果将这些零零星星的发现放到这一地区大规模的墓葬发掘的背景之中来考察，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反映了外来民族的新动向。这些外来人口至少包括两个阶层：平民和葬在圆形石墓中的以头领为首的贵族。那些墓穴中的陶器和用来处理巨石的工具一定是这些人带过来的。此外，在他们的墓葬中还发现有青铜器、铁器和由不同种类的宝石制成的珠子。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该地区墓葬中对陶器的广泛使用。要知道，直到最近，那里的人们用得最多的器具仍是用木头或石头制成的。这些新的文化物质用品（图6）的使用反映出这一地区文明进程的新潮流——这是与石刻艺术所表现的东西有很大不同的另一类文化生活。这些舶来品的引入至少有两条途径：一条是横越帕米尔，直接或间接地穿过奇特拉尔而来；另一条从斯瓦特和印度河科希斯坦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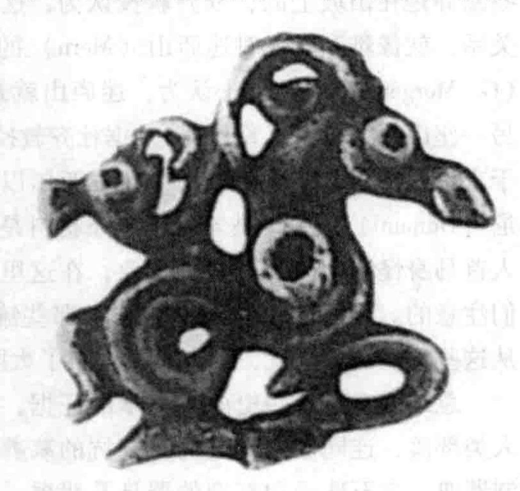


图6　甘迪亚河谷：造型似北山羊的青铜马，公元前1千纪。

在吉泽尔和亚辛发现的墓葬可能是帕米尔类型的，而见于达丽罗河谷与吉拉斯的则是斯瓦特类型的。迄今为止，吉尔吉特、罕萨和纳格尔都没有发现这种类型的墓葬。

关于这些外来人口的社会宗教活动，我们可以作出一些推断：似乎他们在进入这一地区后，很快便分散到了一条条水源充足、田地开阔的河谷之中，如吉泽尔、亚辛和达丽罗河谷，以及发现有类似墓葬的阿斯托尔，因为那里灌溉比较便利。然而，这些人并不见得是在同一次入侵潮流中涌入的，他们有可能是分不同的部落群体，一批一批地进入的，各个部落群体分别占据了不同的河谷。我们发掘的墓葬物品的文化差异或许就根源于这些部落之间的差异。我们还发现，圆形石墓的数量很有限，这表明这个社会在头领的统治之下，形成了一定的组织结构。

至于这些人的宗教信仰，从这些墓葬习俗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三种不同的倾向：土葬、火葬和埋葬尸骨碎片，但具体情况还有待于考古发掘。用物品陪葬的做法表明人们相信死后的生活。大多数墓葬都在河边，这表明一些典礼仪式是与水分不开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有些墓葬是在山坡上的，杜齐教授认为，这与人们对山的崇拜有着密切关系，就像雅利安人对迷庐山（Meru）的深深崇拜一样。摩根施迪恩（G. Morgenstierne）博士认为，迷庐山就是奇特拉尔的蒂里奇米尔峰，另一座山是凯拉希（Kailash）。据杜齐教授的说法，一条凯拉希山脉位于吉尔吉特东北，罕萨以南，布尼亚尔以东，它的最高峰据说是杜玛尼（Dumani）或拉卡波希。第二条材料是我们提到的青铜器上古希腊人首马身怪物中出现的马的形象，在这里，向前伸出的马头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最后，我们还不能忘了那些罐子上的星星和太阳的图案。从这些象征图像出发，杜齐教授得出了太阳崇拜的观念。

总结现有的这些史前人类学的证据，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兴的人类部落，连同他们先进的石墓坑的墓葬文化、青铜和铁器工艺、陶制器皿、宝石珠子和新型的器具及武器，突然出现在这一地区。很明显，他们也将马匹和最重要的生产食物及家养动物的方式方法带到了这里，而最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引入了社会经济秩序结构，他们组织的

社会至少包括两个阶层，即头领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另外，从一些可靠的证据，我们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地区与跨帕米尔地区，甚至是西面和南面横越兴都库什和喜马拉雅的地区有着文化上的联系。

注 释

[1] P. H. L. 埃格蒙：《地理学家托勒密和达尔德人：亚历山大在布奈尔，奥尔诺斯的问题和迪尔塔（Dyrta）的达尔德人》，J. C. A，第7卷，第1期，1984年7月，第73—124页。

[2] Y. A. 谢尔：《中亚古代岩刻》，莫斯科，1980年。

[3] 同上，第83页，插图19。

[4] 同上，第86—87页，插图21、22。

[5]《新中国建立以来新疆的考古发展与成就》，J. C. A，第7卷，第1期，1984年7月，第60—61页。

[6] A. H. 弗兰克：《印度西藏的古物》，加尔各答，1914年，第62、105页，插图XLIV，《西藏的历史、民间传说和文化》，德里再版，1978年，第33—35页。

[7] H. D. 桑卡里亚：《印度、巴基斯坦史前史和原始史》，浦那，1974年，第303页；B. K. 塔帕尔：《对印度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思考》，J. C. A，第7卷，第1期，1984年7月，第195页；B. M. 班代：《克什米尔斯利那加县的布尔扎霍姆的一块石头上刻画的新石器时代的狩猎场景》，《亚洲观察》，第XIV卷，1971年，第134—138页。

[8] 《西方和东方》，第27卷，第1—2期，1977年，第92—93页。

[9] 纳齐尔·艾哈默德·汗：《哈梯亚诺甘道（Hathiano Kandao）的岩石雕刻》，J. C. A，第6卷，第2期，1983年12月，第59—62页。

[10] A. 杜兰：《边界的确立》，卡拉奇再版，1977年，第58页。

[11] 约翰·毕达尔夫：《兴都库什的部落》，第15页。

[12] 卡尔·耶特马尔：《兴都库什的宗教》，美因茨，1975年，第306、307、314页。

[13] A. H. 达尼：《吉拉斯的史前石刻》，载《伊朗研究》，莱顿，1982 年分册，第 65—72 页。

[14] A. 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伊斯兰堡，1983 年，第 2 章。

[15] Y. A. 谢尔：同上引书，第 83 页，插图 19。

[16] A. 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第 36—40 页。

[17] 同上，第 31 页，图 14。

[18] 同上，第 33 页，图 16。

[19] 同上，第 29 页，图 12、13。

[20] 同上，第 39 页，图 22。

[21] 同上，第 41 页，图 24。

[22] 同上，第 26—30 页。

[23] 同上，第 51 页，图 32。

[24] 同上，彩图 11 及第 24 页。

[25] Y. A. 谢尔：同上引书，第 114 页，插图 43 及 ff.

[26] 卡尔·耶特马尔：《上印度河河谷的岩画艺术和早期历史，1981 年探险队的初步报告》，载《中亚研究特刊》，1982 年，第 298—302 页。

[27] A. 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第 37、51 页。

[28] G. 杜齐：《关于斯瓦特的达尔德人及相关问题》，《西方和东方》，第 27 卷，1977 年，第 9—103 页。

[29] G. 斯塔古尔：《奇特拉尔河谷的主要墓葬发现》，《西方和东方》，第 19 卷，1969 年，第 92—99 页。

[30] G. 斯塔古尔：《海拉依附近戈尔班德河谷（西巴基斯坦的斯瓦特）发现的一个古代墓葬群的记录》，《西方和东方》，第 16 卷，1966 年，第 261—274 页。

[31] 见 A. H. 弗兰克：《印度西藏的古物》，第 1 部分，加尔各答，1914 年，第 71—74 页，插图 XXVIIIa。

[32] 约翰·毕达尔夫：《兴都库什的部落》，第 57—58 页，参见卡尔·耶特马尔《兴都库什的宗教》，第 212—213 页。

[33] 比较 S. 杜萨：《达丽罗的人种学调查》，J. C. A，第 8 卷，第 1 期，1985 年 7 月，第 179—191 页。

[34] A. 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第 60—62 页。

[35] A. H. 达尼：《迪玛尔格尔和犍陀罗的墓葬文化》，见《古代巴基斯坦》，第 3 卷，白沙瓦，1967 年—1968 年。

[36] 米安·萨依·格玛尔：《吉拉斯地区（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陶器收藏》，J. C. A，第 8 卷，第 2 期，1985 年 7 月，第 139—160 页。

[37] M. 拉菲克·莫卧儿：《喀喇昆仑地区的史前和历史发现的重要性》，J. C. A，第 8 卷，第 2 期，1985 年 12 月，第 213—235 页。

[38] 卡尔·耶特马尔：《1958 年探险队在自由克什米尔发现的喀喇昆仑的青铜斧》，P. A. P. S，第 105（i）卷，1961 年，第 98—104 页。

[39] 奥雷尔·斯坦因：《兴都库什地区考古记录》，J. R. A. S，1944 年，第 5—24 页。

第五章　早期历史

早期人类

史前史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基石。因为没有书面证据可供参照，史前史没有保存任何个人或人类种群的名称。总之，这是关于生存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早期人类的历史，是他们最早开发了该地区的资源并且留下了一种对后续历史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传统。虽然未来的发现可能会提供这些人群的生活、劳动的详细情况，但根据目前的证据，我们将他们称为“岩石艺术人”（People of Rock Art）。因为他们留下了该地区最早的岩刻作品。虽然《西部西藏史》（A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伦敦，1907 年）的作者 A. H. 弗兰克根据自己获自西部西藏的证据想把这些“岩石艺术人”看作是达尔德人的同类，但正如下文所示，他们一定远远早于后者，而后者却很可能模仿他们的艺术并将其传给西藏人。“岩石艺术人”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建立在狩猎和食物采集之上的。基于一种集体合作精神，他们联合起来猎取动物并且很可能发展了其社会生活。我们确切地了解到，在较晚的历史阶段，这些“岩石艺术人”有了家庭生活的观念，在家庭中，妇女和孩子各司其职。在他们掌握游牧生活方式之前（这需要一些人来负责放牧），他们定居的场所，看起来似乎局限于巨石掩体、山间窄路或干涸的深

谷等能保护他们不受寒风吹袭的地方。虽然不懂造船术，但他们利用木筏或圆木来横渡印度河，而这种方式沿用至今。与此同时，至少其部落首领已开始用兽皮来御寒。另外，有时他们也会建起芦苇做的栅栏来保护家庭储备，而除了这种芦苇栅栏，没有其他建筑痕迹。在宗教信仰方面，他们似乎敬畏大山，所以可以推断某种对大山的崇拜构成了其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许多大型人工岩刻表明，曾出现过一个魔鬼般的部落首领，他能够战胜毒蛇、克服印度河的巨大危险以及穿越高山。至于其政治组织，我们很难得出任何结论。然而，他们同紧邻的族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贸易和其他交往，这表明他们非常喜欢易货贸易，并用开采的矿物来换取所需的有用物品。正是这些“岩石艺术人”被认为是该地区的土著，他们是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最早的山地人。

巨石建造者

这些早期的山地人面临着其他人类种群的移居和进入，后者带来了改进的巨石建造技术和坑式墓葬的宗教仪式。正是这些外来者引入了巨石切割术，并且可能开始在山坡上建造有防护墙的住所。这种沿着山坡和河边的定居方式暗示了一种基于生产性经济的全新生活体系，它包括发展梯田，利用冰川融水甚至河水；通过开凿渠道来进行灌溉。另外，泉水对定居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不了解他们种植什么谷物，但是随着冶金术的广泛应用，铜、铁、青铜、金、银甚至宝石，被大量用于制作工具和日常用品，这表明经济活动范围非常宽广，人类劳动不仅用于物品生产和运输，同时也用于为少数特权阶层服务。只有在这段时期才能谈论到剩余，而只有在剩余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想象得到建造巨石圈和防护墙所需的资源。在这段时间里，马、牛等家畜得到广泛应用的可能性很大。但上述应用必定很有限，而且可能限制在该地区负责引入新生活方式的人手中。他们可以轻易地被分成至少两个亚群：第一亚群与奇特拉尔并可能还与跨帕米尔地区有直接联

系，而第二亚群与斯瓦特和更远的印度河科希斯坦有联系。我们在第一亚群中发现了巨石圈的存在，而正如在吉拉斯和达丽罗所证实的，第二亚群只有坑式坟墓，但在此期间他们建造了堡垒。就这段史前时期而言，与这两个亚群相比，在东方特别是在吉尔吉特、罕萨和纳格尔，存在着至今仍是未知的第三地区，这可能是缺乏研究的缘故。然而，第一亚群生存的北部地带与该第三地区的地理连接方式表明，北部文化影响为这个东部的亚地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生活体制。巨石的存在表明，在第一亚群中存在一种基于部落首领权威的政治制度，这也为稍后产生的君主传统找到了深厚的根基。另一方面，在第二亚地区举行的普通坑式丧葬仪式暗示了一种基于部落平等主义体制的生存模式。正如我们从后来的历史中所了解的，这或许因为部落共和制度具有的旧传统对该地区的人民有更大的吸引力。但无论这种或这些体制是什么，新的人类种群的进入肯定导致了对当地土著人的征服行动并利用他们的劳动力资源为新移民服务。但土著人的岩石雕刻术和宗教实践活动并未消失。可能是由于这两种生存方式相互影响，共同延续下来。虽然主题变化多端，但只有这个假定才能解释石刻上对家养牛群、羊群的描画和该艺术传统在早期历史中的连续性。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土著人对后来者文化生活的影响。

达尔德人

杜齐教授认为这种新进入者类似于达尔德人，[1]并试图利用可得到的考古学和文学资源来重建其历史。但杜齐教授著文时并未获得来自该地区的证据，故其文章注释大量运用了从斯瓦特[2]和迪尔[3]的坟墓中收集到的考古学证据。根据从该地区得到的新证据，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始终没有统一形式的种群，而当该证据被放在该地区的语言学谱系[4]中进行检验时，事实就比较清晰了：虽然所有这些语言产生于同一达尔德语系（它从根本上讲与印欧语系相关），我们仍要面对这些后来移入者的多种语言。卡尔·耶特马尔教授在第三章里提到两个主要

的社会种群——欣人和雅希昆人，这是两个难以准确定义的术语。约翰·毕达尔夫写道："罕萨人和纳格尔人属于被欣人称作雅希昆，而他们内部却自称为博里希（Boorish）的种姓。"[5]换言之，毕达尔夫愿意把雅希昆人看作是罕萨及纳格尔地区讲布鲁沙斯基语的民族，而把欣人看作是吉尔吉特、吉拉斯及其他地区讲希纳语的民族。但是正如富斯曼教授在第二章里巧妙争论的那样，我们不可能把讲某种语言的人认定为某一种族或社会群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希纳语远不同于布鲁沙斯基语，同样，这两个社会种群即欣人和雅希昆人也有很大区别。当目睹到新种群（在这里被称为达尔德人）的进入时，我们难道不应该注意到在这一史前时期已经开始产生差异了吗？答案难以确定。我们又怎么解释在这些种群中存在的差别（dichotomy）？对此，目前尚没有明确的答案。许多学者如卡尔·耶特马尔教授试图用早期布鲁沙斯基人曾拥有更广的地理栖息范围和讲希纳语的种群后来对该地区的强行占领来解释，但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何时发生的，目前有关该问题的证据也很不清晰。由于缺乏轮廓清晰的实质性证据，我们只能给出达尔德人的一般画像。[6]不过，今天北部地区的人们已经不用"达尔德人"这个名词来称呼自己了，这只是外国人强加给他们的名词。第一个想要进入该地区的欧洲人是G. T. 瓦因，他在1835年试图获准前往，[7]但未能成功。20年后，G. W. 雷特奈尔博士[8]成功地进入了吉尔吉特，他第一个谈论达尔德人并创造了Dardistan（达尔德斯坦）这个名词。

我们通过希罗多德（Herodotus）了解到阿黑门尼德人（Achaemenians）对达尔德人的征服行动，它是大流士（Darius）帝国超越喀布尔扩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谈到大流士对总督的重新安排和各总督进献的贡品时，希罗多德写道："萨塔巨达伊人（Sattagydians）、健达里欧伊人（Gandarians）、达迪卡伊人（Dadicae）和阿帕里塔伊人（Aparytae）加起来是第七地区，他们要缴纳170塔兰特。"①[9]我们发现这里有四个种群，分居在四个地区，受同一总督管

① 缴纳物品为金粉，1塔兰特约30公斤。译文参阅王以铸译《希罗多德历史》，第23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北京。——译者

辖。在稍后列举薛西斯（Xerxes）在多里司科斯（Doriscus）——色雷斯（Thrace）的一条狭长海岸——的军队时，希罗多德再次将上述四者包括在一起并指出："健达里欧伊人和达迪卡伊人的将领是阿尔塔巴诺斯（Artabanus）的儿子阿尔杜庇欧斯（Artyphius）。"[10]①

在这里，达迪卡伊人与健达里欧伊人联系紧密，甚至在同一军队中服役。他们在其他资料来源里的提法是"代尔达埃"（Derdae）或"达尔达埃"（Dardae）。埃格蒙（Eggermont）教授已对全部资料来源作了详细比较并注释说：

> 在普林尼（Pliny）的信息里可以发现上述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下一个是更为强大的部落安达拉埃（Andarae），它拥有许多村庄和30个用墙和塔防御起来的城镇，他们为国王提供100，000名步兵、4000名骑兵和1000头大象。达尔达埃国出产数量巨大的金子，萨塔埃国（Satae）出产大量的银子。安达拉埃和达尔达埃表示一对地理名字，与希罗多德所使用的健达里欧依人和达迪卡伊人相对应。对其余来说，伯廷哲（Peutinger）地图在段落12.5中出现了"安德莱－印地"（Andre Indi）的名字，它代表毗邻东方海洋的世界的更东部边缘。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从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611年—546年）继承的是该地图的后期仿制图。达尔达埃与托勒密的描述有关："在斯伐斯杜斯（Suastus）的来源下面是斯伐斯代奈（Svastene），在印度河下面是达拉达埃（Daradae），在它们之上是群山。"因此，斯瓦特河谷、犍陀罗和达尔德平原在其光辉历史里应该是从属于波斯帝国的一个确定组成部分。[11]

希罗多德也讲述了这些人获取金子的故事并谈论起那些神秘的蚂蚁：[12]

---

① 参阅王以铸译《希罗多德历史》，第49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北京。——译者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印度人部落，他们接近卡斯帕杜罗斯城（Caspatyrus）和帕克杜耶斯人（Pactyes）的国家，居住在其他印度人部落的北部地区，生活方式非常接近于巴克特里亚人。因为印度该部分地区是沙漠，所以他们比其他任何种族都好战并从中派出取金的人。在沙漠中生存着一种大蚂蚁，比狗小但比狐狸要大。波斯国王有一些这样的大蚂蚁，它们是被猎人在我们谈论的这块土地上捕获的。它们栖息在地下，并像那些外形相似的希腊蚂蚁一样在挖洞穴时掘起沙堆，而在这些沙堆中充满了金子。……印度人到有金子的地方去，他们用袋子装满沙子，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然而正如波斯人所说的，那些蚂蚁会闻出他们的气味并迅速追赶，它们是如此的迅速以至于世界上没有其他动物可以与之相比。如果印度人不是在蚂蚁聚集时便开始逃跑，那么没有一个单独采金的人可以逃脱。……根据波斯人的说法，这就是印度人获取其大部分金子的方式，其他一部分金子通过采矿获得，但为数不多。①

斯特拉波（Strabo）、[13]普林尼[14]和其他人也讲述了有关代尔达伊（Derdai）或达尔达伊（Dardai）的相似的故事。故事肯定有所夸张，但其核心部分还是有几分真实的。该地区一定就在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因为直至今天，索尼瓦尔人（Soniwal，意为“金人”）仍在河边淘洗金砂。我们或许可以把从克什米尔经过德沃萨依高原——一个寸草不生的荒漠（参见第一章）可以到达的范围，最远限制在巴尔蒂斯坦。在这里有一个开阔的环绕斯卡杜的沙漠平原。在斯卡杜地区以外，如果一个人沿着印度河并经过位于甘切（Ganche）的克尔门，他就可以到达奥尔丁和图尔迪，作者在此地被告知，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分界线附近存在着巨大的、被印度河穿越的蚁丘沉积堆，它们很可能就是西方古典作家用夸大方式提及的蚁丘，过去就是在这里获取大量金

① 译文参阅王以铸译《希罗多德历史》，第240—24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北京。——译者

子的。[15]

就代尔达伊（Derdai）地区而言，斯特拉波引用了麦伽赛因斯（Megasthenes）的话并写道："在代尔达伊地区东部居住着一个巨大的印度人国家，而在山里有一个周长达3000节（Stadia①）的高原，在其下面是金矿。"[16]甚至在梵语文学里也提到达尔达人同克什米尔人、犍陀罗人、乌罗萨人（Urusa，即今哈扎拉县人）和古胡（Kuhu或Kubhu，即喀布尔河）有密切联系，例如我们在《梵卵往世书》（Brahmānda Purāna②）、《风神往世书》（Vāyu Purāna）和《鱼往世书》（Matsya Purāna）中获得的信息：

Daradāmścha Sa Kashmīrān Gandhārān Aurasān Kuhūn。③[17]

然而此时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政治组织，但可能会令人吃惊的是某种类型的国家已开始形成。当阿黑门尼德的资料来源提到给予他们第七个州的管辖权时，很可能代尔达伊（Derdai）的政治组织已经接受阿黑门尼德享有最高君主权。由于这个政治变化过程，我们看到了该地区两个更进一步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代尔达伊人被招募到阿黑门尼德的军队中并参与了波斯人对希腊人的战争；第二个改变是金矿生产带来了经济的迅速繁荣。以金币形式支付税收和把黄金用于其他经济活动这两种模式在西方古典来源中都得到了良好的传播及应用。正如下一章将要讲述的，用黄金支付贡品的习惯在该地区保留下来甚至被与其有关的克什米尔当地人所接受，直至20世纪。

就黄金贸易而言，最重要的是两个结果：首先是政治方面，它影响采矿的制度、管理和黄金流通的规则和条例。整个过程必然导致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也正是这种利益追求使阿黑门尼德人来到这个遥远的地方。稍后我们将看到同样的诱惑是如何吸引强大的贵霜政权在这个延伸到拉达克的黄金矿区行使管理权的。其次是当地人经济生活的繁荣。这个从生产食物起步的地区一下子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并通过黄金流通与国际市场相接，结果导致金本位基础上的黄金快速流通。

① 古希腊长度单位，约合180米。——译者

② 转写中有关字母上的符号是据原著第一版添加的。下同。——译者

③ 此句在原著中没有译文。——译者

很难说这对普通人的生活会有多大影响，但它很快导致穿过该地区的国际路线的开通，该路线与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和更远的中亚西部以及整个里海地区相连。虽然目前仍然缺乏重现这段历史的证据，但正是这种新政治经济活动的不断积累，才为随后的历史时期积蓄了能量。

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

在1930年由罕萨的米尔和K. C. I. E.①穆罕默德·纳齐姆·汗（Muhammad Nazim Khan）爵士编制的吉尔吉特、罕萨和纳格尔三个统治家族的18代谱系[18]中记载了下列事情：

> 在伟大的亚历山大死于巴比伦之前，他把自己征服的国家托付给四个将军管理，而他们在其死后宣布独立。其中之一名叫巴克特里亚（Bakhtaria），他属于雅利安人种，后来在突厥（Turkey）结婚并定居。当他的军队在回程路上经过罕萨时，5名士兵因患病被留在当地，并最终使它变成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是：霍加·阿拉伯（Khwaja Arab），定居在格尔米特（Galmit）；蒂塔姆（Titam）和库罗（Qhuro），定居在巴尔迪特（Baltit）；迦库（Ghaghu），定居于格尼希（Ganish）；森（Shen），定居于印地（Hindi）。目前居住在罕萨的许多部族都是这5名士兵的后裔。前四个雅利安士兵在他们自己之间通婚，但最后一个被尊称为多姆（Dom）的人的后裔从事铁和其他金属冶炼的职业。从很早的时候起，罕萨的统治者便与纳格尔、斯卡杜、吉尔吉特、亚辛、萨里科尔、布尼亚尔等地的统治家族有关系。罕萨的统治家族是伟大的亚历山大的后裔，其成员至今在锡格楠、达尔瓦兹（Darwaz）、巴达

① Knight Commander of Indian Empire 的缩写，意为“印度帝国二级爵士”，是英国国王给予的一种称号。——译者

克山等地仍可以找到。[19]

这就是流传在该地区没有确凿历史史实的虚构故事。然而在朝着印度河进发的几次战斗中，亚历山大与“山地印度人”在某地举行的会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亚历山大前去征服的地区是属于阿黑门尼德帝国的。吉尔吉特地区也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亚历山大为什么没有前去占领它呢，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大问题。但是当我们审阅那些有关哈扎拉地区的统治者阿比萨瑞斯（Abisares）的转移行动的零碎材料时，故事变得有点清晰了：亚历山大为什么局限在塔克西拉，而且除了占领奥尔诺斯（Aornos）的战斗外，他既没有向阿比萨瑞斯的权势挑战，也没有侵扰其他北部与阿比萨瑞斯有紧密联系的“山地印度人”，因这两者同他并没有直接的军事和外交关系。

奥雷尔·斯坦因先生[20]把奥尔诺斯比定为位于珀萨尔（Pirsar）的岩石，该地区距离位于印度河另一边的塔科特（Thakot）5英里远，后者有喀喇昆仑公路经过，也是北部地区居民遇见亚历山大最近的地方。埃格蒙教授喜欢将奥尔诺斯看作是布奈尔（Buner）地区的伊拉姆山（Elam），他写道：“居住在布奈尔的巴兰杜（Barandu）河谷的迪尔塔（Dyrta，即今达格尔［Dagar］）的达尔德人应被视为属于位于上印度河河谷的阿比萨拉（Abisara）王国的家族。”他实际上把达尔德人划分为两种并写道：

> 克什米尔的达拉达人（Darada）寻找黄金，而布奈尔的达拉达人进行黄金贸易。然而，就我从目前专业文章中搜集的证据而言，我喜欢把“克什米尔的达拉达人”的表述修改为“上印度河谷的达拉达人”。它可以保留克什米尔对阿比萨瑞斯部落的利益，因为其战略位置可以解释阿比萨瑞斯对直达印度河西岸布奈尔的包括瑙谢拉（Naoshera）、蓬奇（Punch）、哈扎拉在内的整个地区的统治，也可以解释他在上印度河谷的政治影响力。[21]

这种对原始古典资料来源的分析现在使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亚历山大不可能前进到吉尔吉特地区和为什么该地区不可能落入其帝国版图之内，而由阿比萨瑞斯直接控制该地区或与该地区居民有紧密联系的可能性更大。

约于公元前321年，孔雀族的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已经彻底结束了亚历山大对印度河这边的遗留权势和影响，而且看起来他一定前进到北部的哈扎拉地区。因为后来在曼塞赫拉，我们发现了其孙子阿育王镌刻在岩石上的著名的14条法令，这些石头至今仍保留在喀喇昆仑公路两边。很难说曼塞赫拉地区向北延伸了多远，H. C. 雷乔杜里[22]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位于Divyavadana的通道，在那里，阿育王征服了斯瓦萨国（Svasa），即佉沙国（Kha'sa）。奥雷尔·斯坦因[23]依靠克什米尔编年史，把佉沙部落定位于克什米尔的拉乔里（Rajuri）附近，而邦加德·莱文（Bongard Levin）[24]则认为佉沙位于邻近塔克西拉的区域。在《摩诃婆罗多》中，[25]蚁金被称为是佉沙和其他一些部落赠送的，他们居住在迷庐山（Meru）和曼达拉山（Mandara）之间、赛洛达河（Sailoda）旁边。根据梵文戏剧《罗刹婆与指环印》（Mudrarakshasa），旃陀罗笈多·孔雀的军队包括摩罗耶盖杜（Malayaketu）联军，它由来自佉沙、摩揭陀、犍陀罗等地的男人组成，[26]这为孔雀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来自《摩诃婆罗多》关于佉沙和蚁金的联系的证据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当时应该位于吉拉斯地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许多公元5世纪的岩刻，[27]其中提到了Khasarajagana，即佉沙统治者的部落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至少从孔雀王朝时期至公元5世纪，佉沙部落已定居于吉拉斯地区并在此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另一个关于北部地区的参考资料是中国的取经者玄奘提供的。在写到关于瞿萨旦那（Ku-sa-tanna）即和阗时，他说：

> 当阿育王驱逐那些在塔克西拉蒙骗拘浪拏的官员时，这些人及其家族已经定居在瞿萨旦那西部地区的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与此同时，被放逐的一位中国皇子定居在瞿萨旦那东

部。塔克西拉流亡者推举其中之一为王，而中国皇子也自称为王并想凌驾于塔克西拉王之上，但未成功。①[28]

关于阿育王时期塔克西拉流亡者及他们在和阗定居的文献在塔克西拉和孔雀王朝时期的那个城市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通道，该通道一定经过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虽然我们对孔雀王朝时期该地区的情况知之不多，甚至也不了解稍后来自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取代其在印度河河谷统治权的情况，但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该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帝国有联系。由于阿育王的传教士进行的传教活动，佛教在此时传入该地区的可能性很大。

西徐亚—帕提亚人

希罗多德在其著作的第四卷中给出了公元前一千纪时散布在欧亚大草原上的西徐亚人（Scythians）的详尽历史，阿黑门尼德君主大流士征服了他们并将其中亚领土并入自己的帝国。这些西徐亚人发展的本民族文化和艺术，[29]通过被发掘的洞穴为世人所广泛了解。这些西徐亚人的一支定居在阿富汗南部，即所谓的萨加斯坦（Sakastan）或锡斯坦（Seistan）。后来在公元前 1 世纪和公元 1 世纪这段时间里，他们进入印度河三角洲地区并因此被称为印度西徐亚人。[30] 坎宁安（Cunningham）最早提出关于塞种人进入巴基斯坦南部并沿着印度河进入旁遮普的活动的观点，而如珀西·加德纳（Percy Gardner）提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西徐亚人（也就是塞种人）通过喀喇昆仑通道首先进入克什米尔和旁遮普，然后向印度河流域和北印度扩散。但 J. N. 巴纳吉（J. N. Banerji）博士认为第二条路线是不可能的，他写道：

---

① 见《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十二，“瞿萨旦那国”条，原文为：“无忧王太子在呾叉始罗国被抉目已，无忧王怒谴辅佐，迁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间。迁人逐牧，至此西界，推举酋豪，尊立为王。当是时也，东土帝子蒙谴流徙，居此东界，群下劝进，又自称王。”关于两王之争，《大唐西域记》称“旦日交战，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斩其首。东主乘胜，抚集亡国，迁都中地，方建城郭。”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1 版。——译者

> 这个假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该地区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绝不适于整个民族的迁移。事实上，该路线主要为朝圣者和旅行商队使用。《前汉书》（The Tien-Han-Shu）中提到塞王曾向南进入罽宾，魏国（公元220年—264年）的史书《魏略》里也描写了塞人穿越悬渡（即悬空的通道）的情形。根据查文奈（Chavanne）的解释，这是穿越亚辛河谷的Bolor路线，旅行者从瓦罕到印度河或更远的克什米尔和乌仗那就使用这条路线，法显进入印度也是走的这条路线。[31]

中文记载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塞王及其子民的迁移路线，但迄今为止并没有考古学证据可以用来详细说明这件事以及塞王是否真的走过这条路线。

新近在吉拉斯找到的证据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32]有一条传统道路可以沿着瓦赫吉尔（Wakhjir）河从塔什库尔干到达小帕米尔并进入瓦罕。在这里，博罗吉尔山口提供了进入南面达尔科特山口的主要入口，而沿着后者可以进入开阔的亚辛绿地。在经过勘探的地面上可以发现许多考古学遗迹。从亚辛出发，可以通过吉尔吉特直接抵达吉拉斯。在吉拉斯Ⅱ的遗址，我们发现了几幅属于西徐亚人时期的佉卢文岩刻和岩画。

其中一幅岩画用公元前1世纪佉卢文的叙述风格描绘了名叫瞿波达萨（Gopadasa）的当地罗阇及其两个儿子瞿波达萨·阿克沙布陀罗（Gopadasa Akshaputra）和瞿波达萨·巴拉布陀罗（Gopadasa Balaputra）投降的场景。投降仪式在坐在椅子上的西徐亚国王莫加（Moga）即毛伊斯（Maues）的面前举行，画面非常生动，在佛教窣堵波旁边第一排和第三排画着西徐亚人的战马和骑兵，中间是战胜的国王，他坐在欧式风格的高脚椅上，穿着高筒靴的士兵站在前方，最后一个士兵用绳子绑着肥胖的失败国王的右腿，将他拖着向前走，第三排画着正苦苦哀求的王子，其面前站着一个带着尖顶帽的西徐亚士兵。[33]西徐亚国王被明确称为莫加罗阇，显然是他带领西徐亚骑兵来到此地并打败当

地罗阇，从而在该地区树立起自己的权威的。

从相同地方获得的另一条佉卢文铭文[34]也证明了莫加罗阇权威的建立和巩固，它共有6行，但其中一些字迹被水的印迹和后来的雕刻所破坏。该铭文谈到卡卡（Kaka）建造了沙摩陀罗（Samudra）或沙摩陀罗色那（Samudrasena）窣堵波，而卡卡据说是大莫加（Moga Mahataka）的总督（Kshatrapa）瞿沙密陀罗（Ghoshamitra）的儿子。假设的王室头衔Mahataka证实了莫加王的统治地位，而由他任命的该地区总督也证明了其权威的巩固和牢靠。卡卡、瞿沙密陀罗、沙摩陀罗色那这三个名字显然是当地印度人的名字，可以把它们与失败者的名字瞿波达萨、阿克沙布陀罗和巴拉布陀罗相比较，因此看起来莫加王是用一群当地人来替换另一群当地人，不过他们似乎都是佛教追随者。沙摩陀罗[35]这个名字与佛教僧侣的名字萨玛纳·戈玛（Samana Goma）一起在另一个地方再次出现。与此类似，瞿沙密陀罗这个名字在印度教神祇巴拉提婆（Baladeva）像（图7）旁边再次出现，卡卡[36]这个名字也在该岩刻的另一面再次出现。在岩刻的同一面上我们发现了三行佉卢文铭文，[37]铭文中提到由大莫加的总督西塔拉卡（Sidhalaka）建造的建筑物，也提到一个读作5乘以20也就是100的日期，显然该日期与莫加王朝有关。这里我们找到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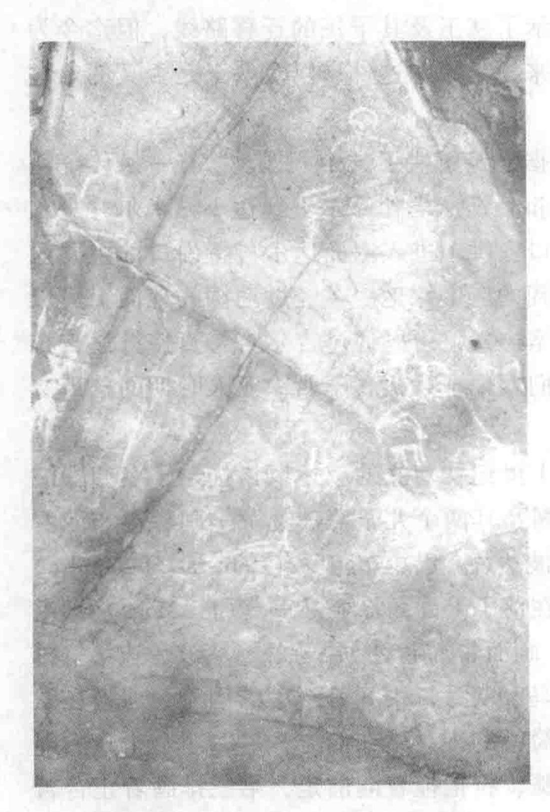


图7　吉拉斯Ⅱ的岩画：上方为佛陀像，左边为巴拉提婆和窣堵波。

个被大莫加任命的总督，后来我们得到另一个西徐亚统治者的名字玛哈塔·拉维卡（Mahata Lavika），他与莫加王的关系如何尚不清楚。这里我们也发现两个西徐亚人的名字——奥尼伐斯陀罗（Onivastara）和帕拉奥纳（Pharaona），它们与某些建筑物联系在一起。窣堵波旁边的另一长段铭文提供了建造者的名字巴哈埃（Bahae）和另一个统治者的名字伐达依达·绍（Vataida Sao，Sao 意为“王”），但最后这段文字的原始写法暗示了随后的历史时期，头衔 Sao 被统治者采纳，也说明他属于贵霜时期（见下文）。

从吉拉斯获得的丰富的、具有公元前 1 世纪佉卢文风格的铭文使莫加王有着显著的重要性，而在来自塔克西拉的铜板铭文中，[38] 他在第 78 年被授予完整的王室头衔玛哈拉亚（Maharaya）和玛哈密塔（Mahamita，或 Mahata），使其为人们所了解。丘格夏（Chuksha）的总督名叫里亚卡·古苏拉卡（Liaka Kusulaka），他的儿子巴迪卡（Patika）为释迦牟尼建造了窣堵波并在塔克西拉修建了一座僧伽蓝。毫无疑问，在吉拉斯和塔克西拉找到的铭文中提到的莫加·玛哈塔是同一个人。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在两地发现的 78 和 100 这两个日期所指示的具体年代，但显而易见它们是指莫加王的统治时期。



图 8　吉拉斯Ⅱ的岩画：窣堵波前的佛教徒和一名手持水钵的朝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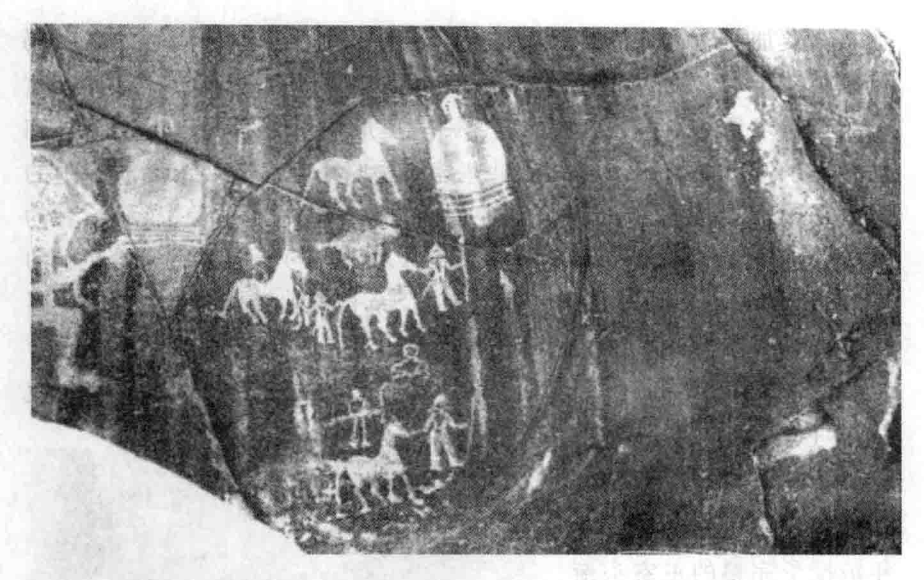


图9 吉拉斯的岩画：窣堵波前的西徐亚士兵，公元前1世纪。

西徐亚人来到北部地区，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发展和改革运动。我们第一次明确知道该地区在何时与塔克西拉地区建立有政治联系，也了解到该地区出现了独立的总督（Kshatrapa）。这两个地区的的联系必然会带来新的贸易关系，我们也发现朝圣者和佛教僧侣（图8）进一步发展了它们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我们在吉拉斯岩刻中发现的窣堵波图形似乎借鉴了塔克西拉的窣堵波，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实际存在的窣堵波。另一方面，刻在岩石上的许多马（图9）和牛暗示了一种全新的运输方式，大量的牲口也增加了该地区的繁荣程度。首先是到达该地区的佛教僧侣引入了佉卢文并用犍陀罗俗语传播佛教，这些活动进一步培育了与塔克西拉及犍陀罗其他地区紧密的文化联系。

很难说清西徐亚人的统治延续了多久，但假定在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至少有两代国王和总督是合理的。西徐亚人被属于冈多法勒斯（Gondophares）集团的帕提亚人（Parthians）所取代，其留在犍陀罗的铭文和钱币非常出名。在位于吉拉斯地区的布多加赫（Butogah）河与印度河交汇点的冈多法勒斯岩石上发现了这个统治者的一条佉卢文铭文，铭文读作 Vitaspa Priyati Gendavharasa Raja，意即

“受到 Vitaspa（一位伊朗神祇）喜爱的冈多法勒斯王”。但在印度河另外一边的特尔班平原上找到的一条铭文，只提到 Vicharati Dhamikasa，意为“Dhamika 的”，也就是指那些云游四海或统治国家的虔诚者。在这里，Dhamika 通常是对统治者的称谓，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然而就在这块岩石的另一面刻着几幅图画，展现出当时的动物、双轮战车和其他一些全新的图案，这些图案一定借鉴了同时期的伊朗人的艺术造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身着典型民族服装、手持武器的帕提亚士兵的画像。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及内容的根本变化揭示了一个来自伊朗的新职业种群的进入，同时我们在岩刻艺术里也发现了一些西方古典主旨，这再次指明是帕提亚人引入了这些新的艺术手法。这种联系看起来是由帕提亚人事隔几十年后重新建立起来的。早期阿黑门尼德人曾在该地区以黄金的形式征税，但看起来对这里没有产生任何可察觉到的文化影响。然而在帕提亚人时代，岩刻艺术的古老传统通过与伊朗艺术的许多新特点相结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方式。所以，在西徐亚人之后的帕提亚人时代，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开始与西方世界建立相互联系。

一场历史性大灾难

当我们勘查完该地区的岩刻和铭文后，不能忽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它们在不同地区时间分布上的巨大差异。虽然目前搜集到的证据无法提供最终答案，但毫无疑问能给我们以提示。在吉拉斯地区，从史前时期到公元 1 世纪初的西徐亚人时期，岩刻连续不断地被发现，这段时期长达数千年。事实上，西徐亚人时期的岩刻位置最低，位于编号为吉拉斯Ⅱ的区域的河边，而帕提亚人时期的岩刻位于编号为特尔班Ⅱ的较高处和冈多法勒斯岩石上。然后发生了突如其来的中断，只有吉拉斯Ⅱ的婆什色伽（Vajheshka）岩刻（见下文）例外，但它也是被刻在岩石上最高处的。维马·伽德庇塞斯铭文（见下文）位于距婆什色伽铭文 8 英里远的一处高地上。如果不考虑这两处贵霜铭文，

那么在吉拉斯的整个贵霜时期完全没有发现岩刻和铭文，这种记载的完全缺失暗示这段时间在该地区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自然或人文变化。在人文方面，我们发现了转向吉尔吉特和罕萨地区的迁移活动。贵霜时期的佉卢文铭文现集中在吉尔吉特以西大约25英里的阿拉姆桥，[39]距吉尔吉特河与印度河的交汇处不远，而在罕萨地区的灵岩上也发现了贵霜时期的铭文和岩刻。[40]两处发现都位于河边，一处位于吉尔吉特河左岸，另一处则同样位于罕萨河左岸。奇怪的是，这段时期印度河河岸完全荒芜了，这种位置变换看起来与帕提亚人时期的一场大洪灾相关。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爵士[41]特别提到了公元30年帕提亚人时期发生在塔克西拉地区的一场强烈地震，看来同样的灾难也降临在吉拉斯地区并导致印度河水突然泛滥，河边的石头无法利用。印度河水位在西徐亚人时期降低，然后洪水导致水位迅速升高，从而打开了在河边雕刻的通路。为什么河水会在西徐亚人时期下降？这肯定是因为印度河上游某处发生了堵塞，就像19世纪来自南迦帕尔巴特的泥石流和冰川突然导致的堵塞一样。接着，堵塞物突然崩坍，释放出来的洪水使印度河水迅速上涨。我们可以断定是某种自然现象导致了这一灾害的发生。由于这个自然现象发生在公元1世纪中叶，与塔克西拉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的时间大体相同，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个事件是有关联的。因此，为什么在贵霜时期整个吉拉斯地区实际上已被放弃而人类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吉尔吉特和罕萨就变得容易理解了。直至公元4世纪，吉拉斯地区才恢复了正常生活，但即使在这一时期，发现的铭文和岩刻也位于高处。在编号为吉拉斯Ⅱ的地方可以找到有关这场可能是地震导致的印度河洪水和山崩的证据，在那里的岩画上面和雕刻用的巨石前面，水的印迹清晰可见。这些巨石从上方跌落，平躺在地面上，看起来它们似乎最初悬于顶端，构成某种隐蔽场所，佛教徒们就是在此雕刻石头并留下纪念的。这场历史性的大灾难一定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经济变化，随着进一步的发掘，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其具体情况。

大贵霜时代（公元1世纪—3世纪）

我们是从汉文文献中了解到早期贵霜历史的，最初的资料来源于张骞。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134年派遣他出使月氏国，十多年后他抵达该国，接着到达其属国大夏。大夏分成五个翎侯（叶护）：休密，即瓦罕；双靡，即奇特拉尔；贵霜，在奇特拉尔和巴达克山之间；肸顿，即巴达克山；高附，即喀布尔山谷。其他资料则用都密替代高附并将其位置放在喀布尔以北靠近卡菲里斯坦的某个地方。因此，大夏国包括瓦罕、巴达克山、奇特拉尔、卡菲里斯坦和它们之间的地区。后来，贵霜在库朱拉·伽德庇塞斯（Kujula Kadphises）的领导下变得强盛起来，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并为大贵霜帝国奠定了基础。[42]贵霜王朝终结了残存的希腊政权，也结束了帕提亚人在中亚、喀布尔河河谷和印度河河谷的统治，它拥有吉尔吉特地区的北部、西部和南部，所以不难理解它也进入了这一地区。

作为库朱拉·伽德庇塞斯王的继承人，维马·伽德庇塞斯王是最先将贵霜王朝的势力扩展到该地区的。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有关他的两条铭文。在吉拉斯X[43]的一块石头上，我们发现了用当时的佉卢文镌刻的名字Uvimadasakasa（尤维马达萨卡萨），没有一个王室头衔可以与它联系在一起，但是它的发现地几乎变成了发现后来统治者名字岩刻的重要基地。毫无疑问，这个特殊名字是把不熟悉的名字Vimakadaphasa翻译成佉卢文的尝试。第二条铭文发现于罕萨灵岩，[44]上面写道：

……Maharaja Uvimma

Kadhatphrisa……

意即"Uvimma Kadhatphrisa大王"，Kadhatphrisa这个名字显然代表的是伽德庇塞斯。在铭文下面是身着典型贵霜服装的国王站立画像（图10），它刻在岩石的东面一个类似壁龛的结构里，不同时期的北山羊则占据了画像下方的主要位置。左边跃起的北山羊图像肯定是早期

雕刻的，因为它与前边的另外一只山羊相比显得非常暗淡、模糊，那只山羊却长着珠状的羊角并向右奔去，就在它的正下方，刻着一个身着典型贵霜长袍、戴着尖顶帽站立的人，他左手放在腰上，右手稍微向上伸出。这幅人物像的雕刻时间晚于北山羊，完全符合维马·伽德庇塞斯时代硬币上的贵霜贵族形象。在其左右两边是两只长着弯角的、正朝他跑来的北山羊；另外，他左边还有一只独特的、长着向上弯曲长牙的大象正在行礼。[45] 在罕萨的岩石Ⅳ①[46] 的平面上刻着另外一个贵霜贵族的画像，他前面站着一个骑兵，右边正对4只面朝左方的北山羊。虽然贵族和骑兵是用不同手法雕刻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早于旁边的北山羊，但都是用深切线镌刻而成。贵族身着典型贵霜服装，双手放在腰上，头部显得模糊但仿佛戴着一颗宝珠；骑兵站在他面前，好像在传达消息。这个贵族看起来不像国王，因为他的手势完全不同于我们从硬币上了解到的贵霜国王。



图10　罕萨的岩画：贵霜王立于中央，四周刻画着动物。

① 罕萨灵岩的考古编号。——译者

关于同一国王及其形象的另一块铭文[47]发现于拉达克的一个村庄卡拉策（Khalatse），位于贸易路线上的列城下方52英里处。在那里，A. H. 弗兰克发现了另外几条铭文。该铭文读作：

Sam　1　100　20　20　20　20　4　[1　1　1]

Maharajasa Uvima Kavthisasa

意为"187（或184）年，乌维玛·卡乌希萨（Uvima Kavthisa）大王的（统治时期）"

在所有三条铭文中，对同一统治者名字的拼法有三种。而在罕萨和卡拉策壁龛里发现的统治者画像非常重要，因为它提示我们该统治者在马土腊（Mathura）的代瓦库拉（Devakula）的身份和地位。显而易见，维马·伽德庇塞斯王在这个严酷地区进行漫长的征服活动决不仅仅是为了扩张领土，他从吉拉斯、吉尔吉特和罕萨进攻卡拉策显然是因为卡拉策位于出产黄金的蚁丘所在地。因此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维马决心要占领黄金的原产地，尤其当我们意识到是他最终建立了贵霜金币制度。帕斯卡尔·恰托巴底亚耶（B. Chattopadhyay）根据搜集到的货币写道：

> 伽德庇塞斯二世即维马·伽德庇塞斯，也就是中国史书所称的阎膏珍，在印度建立贵霜统治并发行了许多不同种类的金币、银币和铜币，而在他之前的两个世纪里在塔克西拉只发现过少量金币、两三枚幼克拉蒂德斯（Eucritides）币、一枚米南德王币，另外一枚的金属性质不明。金币在贵霜王朝之后的笈多王朝仍继续使用，可以说事实上是伽德庇塞斯二世率先在北印度引入了金币制度，其原因在于印度、罗马帝国和中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活动导致对黄金的大量需求，而罗马帝国通过商贸活动流入印度的黄金数量巨大。普林尼在公元一世纪曾提到印度和罗马之间繁荣兴旺的贸易活动，并哀叹罗马贵族为满足对进口奢侈品的需求而使大量黄金从罗马流入印度。伽德庇塞斯及其子孙把流入印度的罗马金币熔化后重新铸造。[48]

来自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黄金增加了金币的数量，从而使维马·伽德庇塞斯为金本位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金本位制度的实行为该地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结构，而且可以肯定从该地区到中国的货物运输量的增加与这种变化有关联。这条路线一定非常受欢迎，因为我们发现佛教徒就是沿着同一线路抵达中国并传播佛教的新形式的。维马在该地区统治了多长时间不得而知，但根据汉文《后汉书》，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他的统治范围：

> 丘就郤（即伽德庇塞斯一世）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49]①

B. N. 穆克吉（B. N. Mukherjee）[50]追溯了贵霜统治者的整个家谱并指出继承维马王位的是迦腻色伽一世，他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对始于何时有很大争论。[51]在罕萨发现了很多贵霜时期的铭文，其中之一[52]提到迦腻色伽的名字，读作：Gushana devasa maharayasa……Kanishkasa Samghe dana，意即“贵霜大王迦腻色伽陛下致僧伽的礼物”；第二条铭文[53]给出了另一位贵霜统治者的名字 Maharaja Devaputra Huvi（shka）；第三条铭文[54]则把他的名字记录为 Gushana Maharaya Huv（ishka）。在这里，这些铭文清楚地证明了贵霜统治的连续性。从吉拉斯Ⅱ，[55]我们找到另一位贵霜统治者的纪录，读作：

Vaeshkasa Kaisha（ra）sa
rajatirajasa
devadevasa

意为“众天之天、王中之王、恺撒伐杰什卡的”。

来自吉拉斯的这条有着夸张头衔的伐杰什卡的铭文解开了迦腻色伽一世继承人的难题。除了伐杰什卡在该地区拥有权力而且像其儿子迦腻色伽二世一样拥有“恺撒”头衔的事实以外，目前的证据不能为

① 译文参阅《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1页。——译者

现有理论提供新的支持。我们也发现了其他古老的佉卢文铭文。在吉尔吉特的阿拉姆桥，富斯曼找到了标志日期从 9—89 的一些铭文，他认为这些日期属于公元 78 年开始的迦腻色伽纪年，因此它们代表从公元 87 年—167 年。[56] 在罕萨发现的那些铭文的日期标志为 7—91，如果它们同样属于迦腻色伽纪年，那么就表示从公元 85 年—169 年。虽然我们还不能理解婆苏提婆这个名字的意思（因为许多铭文无法理解），但可以确定他像我们所知道的众贵霜总督（Kushana Kshatrapas）和大总督（Mahakshatrapas）一样统治过这里。

我们发现有三条关于"总督"（Kshatrapa）的古老铭文[57] 标注了日期：关于佛陀密陀罗总督的第 30 条铭文的日期标为 70 年；关于达摩罗克希达总督的第 34 条铭文的日期标为 83 年；关于普依拉卡达罗总督的第 21 条铭文的日期标为 91 年。下面是我们从铭文中了解到的总督名单：

普依拉卡达罗（Bhuilakadala）、佛陀密陀罗（Budhamitra）、佛陀跋摩（Budhavarma）或佛陀维汝玛（Budhaveruma）、丘格夏（Chuksha）、达摩罗克希达（Dharmarakshita）、埃纳达（Enada）、凯尤（Kaiu）、霍西拉密陀罗（Khosilamitra）和努萨卡（Nuusakha）。铭文中仅提到三个大总督：第 20 条铭文记载了大总督托依霍拉（Dhoihola），他是努萨卡之子。第 48 条铭文给出了第二个大总督的名字，其开头字母是 Kha，他是佛陀维汝玛之子。如果佛陀维汝玛和第 46 条铭文中的佛陀跋摩总督是同一个人，那么这里的 Kha 和第 46 条铭文中的 Khudu 可能是同一个人。第 52 条碑文给出了 Kshatrapa-putra Kaiu 的名字，根据第 5 条铭文，他是埃纳达之子。从第 52 条铭文的意思来看，虽然其父亲的名字不得而知，但 Kaiu 显然是总督的儿子并且当过总督。不过第 55 条铭文说 Kaiu 是大总督之子（Mahakshatrapa-putra），因此埃纳达首先是总督，接着成为大总督。在这部分我们找到了两至三代总督和大总督。所有大总督都有一个非梵语名字，即埃纳达、托依霍拉和霍杜（Khudu），但总督中却有佛教名字，如佛陀密陀罗、佛陀跋摩和达摩罗克希达，这充分表明了该地区的管理模式。从西徐亚人时期到大贵霜统治的结束，总督管辖制度在该地区一直保留下来。事实上当引

入地区管辖的总督负责制度时，它更可能是阿黑门尼德管辖实践的延续。正如我们在早期历史中所看到的，西徐亚人统治者莫加清除了当地罗阇而委任了自己的总督；同样，贵霜王也委任了自己的大总督和总督。

头脑中有了这些背景知识，我们就能重新检验富斯曼获得的佉卢文铭文。他在三条铭文[58]中都给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No. 5. 1 Dhamanaputro Neiu（Sa……）du.

No. 5. 4 ……Dhamputro Neiusa（tam）du sa

20 + 20 + 20 + 20 + 4 +4 +1

这个名字看起来像在罕萨铭文中给出的努萨卡（Nuusakha），虽然他父亲的名字不得而知，但他除了本身是总督外，同时也是大总督托依霍拉的父亲。如果这种识别方法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可以在吉尔吉特和罕萨这两个地区发现的铭文之间建立起某些联系。由于它们都使用迦腻色伽纪年，这更加支持我们这个论点。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些普通的佛教僧侣名字，例如罕萨铭文和靠近吉尔吉特的阿拉姆桥铭文（No. 6. 9）中提到的佛陀色那（Budhasena），他是一个比丘（僧侣），被称作佛陀跋摩布陀罗（Buddhavarmaputra，即佛陀跋摩的后裔）。与此类似，我们在这两个地方又发现了达摩色那布陀罗（Dhamasena putra）这个名字，它在阿拉姆桥铭文中被称作克谢玛色那（Kshemasena），但在罕萨铭文中达摩色那（Dharmasena）的父亲叫做纳图武（Nathuvu），他所处年代是7年（即78 + 7 = 公元85年），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三代僧侣。

富斯曼研究了铭文中分属于两个人的两种王室头衔，他把铭文 No. 8 恢复为 Yuvarajana Vasudharivarmana Sabradi 4 + 4 + 1 bhavesi，然后将其译为“9年，王子今天在这里成为 Vasudharivarman（土地保护神）的法定继承人”。

可惜，这种拼读和翻译与他最初的拼读不符，他最初的拼读接近于原始记录，但需要某些修正。起初他把第一个单词拼作 Pujavajana，但他的誊本和照片清楚地显示这个单词应拼作 Pusavasi，与我们在罕萨发现的佉卢文铭文 No. 6 中的 Posavasa 相同，这种拼法是正确的。这条

铭文中没有提到王室头衔。

其次，福斯曼的铭文 No. 5.7 非常重要。铭文中提到了 Daradaraya，即达拉达国王，其名字为迈瑞克素（Merekhisu）。如果名字拼读正确，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个独特发现，因为迄今为止只有这条当地铭文提到了吉尔吉特地区的达拉达国王，不过我们知道当地人不用 Darada 来称谓自己。我们仅在卡兰纳的《诸王流派》和其他梵语文献中找到了 Darada 这个名字，但正如奥雷尔·斯坦因爵士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名字指的是克什米尔西北边界的古雷兹人。这一证据引起了人们对拼法的巨大怀疑，富斯曼指出两行铭文的混乱给他带来的困难，在重新研究岩刻之后，我发现在第一行的开头和末尾有几个字母被富斯曼忽略了，第一行应该拼作：

Theudorena Roshami（Yena）

第二行应拼作：

Bhajrusara Chuksha putra（sa）……-ga-pi　i　oja

从富斯曼的照片可以看出第一行的许多部分已经消失，所以它似乎与第二行没有什么联系，因此这两行必须分开拼读和理解。我没有发现这两行的字母有任何重合，所以我分开拼读它们，而根据我的拼法并没有找到 Darada-raya 这个词。事实上，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单词 Theudor（或 Theudoras），它是一个曾出现在斯瓦特的名字。[59] 另外我们在罕萨的铭文 No. 10 中发现了 Roshamiya（或 Roshimiya）这个名字。我们还在罕萨岩刻中发现了一个名字 Chuksha（丘格夏），他被称为总督（Kshatrapa）。虽然阿拉姆桥铭文的拼写不清晰，但它似乎提到过 Chukshaputra 的遗物，却没有提及同时期吉尔吉特地区的任何国王。包括吉尔吉特在内的整个地区的统治权在贵霜王朝手中，所以难以解释该地区此时会存在另外一个达拉达王。

目前的证据清楚地表明，贵霜王朝不仅征服了整个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和拉达克地区，而且也在此建立了牢固的统治，但其统治中心似乎不在吉拉斯或吉尔吉特。如果罕萨岩刻有意义，那么其统治中心一定位于罕萨的某个地方，而那里就是控制远至东南角的拉达克和西至科希斯坦的广大区域的中心。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贵霜王朝在迦

腻色伽时期向北到西藏和新疆的扩张活动，[60]迦腻色伽曾组织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最远抵达葱岭。玄奘在谈论迦毕试（即今巴格拉姆［Bagram］，阿富汗的杰里卡尔［Charikar］附近）时指出：

> 闻诸先志曰：昔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故质子三时住处，各建伽蓝。今此伽蓝，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中夏。其后得还本国，心存故居，虽阻山川，不替供养。故今僧众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兴法会，为诸质子祈福树善，相继不绝，以至于今。[61]①

后来，迦腻色伽罗阇遭遇到某些在中国将军班超帮助下发生的起义活动，并失去了他在中国西部的一部分领土，[62]但也建立起与中国的直接交流和联系渠道。著名的丝绸之路也开始投入使用，它的一条支线很可能经过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而佛教传教士正是沿着这条支线从犍陀罗到达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和其他中国地区的。贵霜帝国与中国之间还存在着使团往来的交流活动。[63]陈寿（公元233年—279年）编撰的汉语文献《三国志》曾提到大月氏国王波调派遣的特使在癸卯日，即公元230年1月26日，到达魏国宫廷。② 波调王通常被认为是贵霜王婆苏提婆。正如在铭文中提到的，该地区在这段时期建造了许多佛教寺院和窣堵波，吉尔吉特此时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但这需要进一步的发掘工作来证明。

这段时期的经济成果只能依靠现有贫乏的材料进行推断。首先是该地区建立了大总督和总督领导下的、稳定的行政管理体制，就像汉语文献所说的那样，他们鼓励农业生产并从世界其他地方引进新的水

---

① 译文参见《大唐西域记校注》第一卷“迦毕试国”条，第138—139页。——译者

② 见《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原文为“太和三年冬十二月癸卯，大月氏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译者

果和农作物；其次是贵霜王朝黄金产量的急剧增加，为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国际贸易提供了部分黄金并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只有这个假设成立，我们才能理解这里佛教寺院的繁荣兴旺。许多铭文都提到作为当地交流工具的佉卢文和犍陀罗语的普及流行。除吉拉斯以外的几个新中心在该地区迅速发展，它们很可能通过贸易路线一方面与拉达克和西藏相连，另一方面则与中国相接。由于犍陀罗位于帕米尔高原西部，这种联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佛教显示出与克什米尔有很深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说贵霜时期为当地居民加强国际交往、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传播佛教信仰及知识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它不断结出丰硕的果实，而且其影响力也扩散到邻近的北部和东部地区，长达数世纪之久。贵霜王朝使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并使该地区持续繁荣，为期远远长于其统治时间。

后贵霜王朝时代

据穆克吉的研究，贵霜王朝统治的终结如下：

> 在萨珊人至少占领了一部分贵霜领土之前，婆苏提婆二世看起来似乎是迦腻色伽一世家族最后一个已知的统治者。根据《泰伯里史》（Al-Tabari）的叙述，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Ⅰ）接受贵霜王的投降是在其打败阿尔德旺王（King Ardwan，即帕提亚国王阿尔塔巴努斯五世［Artabanus Ⅴ］）一段时间之后，而根据 S. H. 塔基扎德赫（S. H. Taqizadeh）的计算，这场对阿尔德旺王的战争发生在公元 224 年。后来的统治者贵霜沙（Kushanshah）沙普尔一世（Shapur Ⅰ）——当时他显然是作为其父亲阿尔达希尔一世的代表治理贵霜帝国——所发行的一组青铜钱币可以证明，在公元 224 年—242 年——即沙普尔一世就任国王的时期——萨珊王朝至

少占领了贵霜帝国的一大部分领土。[64]

在沙普尔时期，萨珊帝国包括图兰（Turan①）、马库兰（Makuran）、帕拉丹（Paradan）、印度和贵霜王国，并一直抵达巴希基布尔（Pashkibur）、卡什（Kash）、索格特（Sogd）和沙什（Shash）地区。理查德·弗赖伊（Richard N. Frye）认为，贵霜王国的疆域包括帕米尔山区和今天的塔吉克斯坦，[65]而萨珊帝国的统治肯定向东延伸到巴基斯坦北部。萨珊人似乎是沿着帕米尔高原进入该地区的，因为他们就是沿同一方向前进到索格特（即撒马尔罕）、沙什（即塔什干）和卡什（即喀什噶尔）。看起来，这种新联系似乎在该地区引入了来自中亚的新文化趋向，其结果是我们在此发现了两种新的书写方式：第一种是撒马尔罕人镌刻的粟特文，其数量较多；第二种是巴克特里亚草书。一些铭文由私人、商人、朝圣者和旅游者所刻，他们从一个地区前往另一个地区，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和中亚之间通过该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活跃程度。

不幸的是，我们不了解萨珊帝国在这一地区的管理体制。然而，我们知道一位萨珊王子曾被任命为喀布尔地区的总督，他作为最高领主来管辖贵霜王国，这由 Vuzurg Kushana Shahan Shah 即“大贵霜的王中之王”铸造发行的钱币所证实。换言之，年长的贵霜统治者作为萨珊帝国的臣属继续维持其统治，而且看上去运转良好。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这一时期真正统治者的名字。从发掘出的钱币得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些地区的附属国的统治者被称为小贵霜（Little Kushanas），有时也称作寄多罗贵霜（Kedar Kushanas）。[66]尽管迄今为止在吉尔吉特地区从未发现过钱币，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里是由某位贵霜王管辖并保障从中国途经此地前往中亚路线的安全。

粟特铭文的外观及对铭文的尝试性拼读，[67]给予我们许多关于来

① 此地为邻近俾路支斯坦的卡拉特（Kalat）。下文马库拉即马克兰（Makran）；帕拉丹邻近奎达（Quetta）；印度系指信德；Pashkibur 又拼为 Pushkabur（普什卡布尔），即白沙瓦；Kash 为喀什噶尔或乞史（Kesh）；Shash 又译“者舌”，即塔什干（Tashkent）。参见《中亚文明史》第三卷，A. H. 达尼和 B. A. 李特文斯基所撰第四章“贵霜—萨珊王国”，第 80 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年。——译者

到此地的新民族的信息。D. N. 麦肯齐（D. N. Mackenzie）对罕萨岩石[68]上的一条铭文暂作了如下的拼读和翻译：

Wishta（sP），son of Athfiy（a）（of）Tashar（?）

意为：Wishta 是 Athfiy（a）的儿子，来自 Tashar。

地名 Tashar，或叫 Tushar，又叫 Tukhar，在帕米尔高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理学术语，而那父子俩的名字则含有外来的波斯语的新成分。吉拉斯地区发现了两条以上的粟特铭文，但发现数量最多的地方是夏迪亚尔，它正好位于面对达丽罗河口的印度河左岸，那些铭文就刻在一个巨大的、由石头雕成的窣堵波旁边的岩石上。粟特铭文在这段时间里大量集中在夏迪亚尔，暗示它同撒马尔罕的联系和交往在不断发展，同时也说明经过达丽罗河谷的线路开始转向。因为任何经由帕米尔或奇特拉尔从撒马尔罕来的人都必须利用达丽罗河谷这条线路，所以它在萨珊时期变得非常流行。在夏迪亚尔发现的铭文，从公元 4 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 6 世纪。西姆斯·威廉斯（Sims Williams）博士认为粟特铭文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而在此地发现的佉卢文铭文和婆罗谜铭文或多或少也可能产生于这段时期。

年代早的岩刻看起来似乎是一种附带两条佉卢文铭文的新型窣堵波，[69]大概刻于公元 4 世纪初。第一条铭文意为：

“吉霍达尔哈（Jikhodarkha）的女儿非常虔诚地信仰宗教，她建造了这个最好的窣堵波。”

第二条铭文的意思是：“查克舒（Chakshu）的礼物受到萨萨（Sasa，或 Saka）的喜爱。”

上面提到的名字都是塞人的名字，但是这种新型窣堵波和赠与者的服饰暗示他们来自外部地区。在佉卢文铭文中我们还发现了三个塞人的名字，即西伐贾哈玛（Sivajakhama）、达贾布陀罗·罗舒贾（Dajaputra Rushuja）和卡塔巴萨（Kadhapaasa）。但粟特铭文却包含了许多帕提亚人名、中部波斯人名和西伊朗地区人名，如许多常见的名字：萨桑（Sasan）、巴巴克（Papak）、沙布尔（Shapur）、格尔迪尔（Kartir）以及特殊的帕提亚人名纳里萨夫（Narisaf），而种族名称用于人名的有匈奴（Hun）、印度和贵霜。几乎所有的铭文都很短，通常仅

由一个人名构成，再附加一个教名。西姆斯·威廉斯博士翻译了一条长铭文：“我，纳奈温达克（Nanevandak）是纳里萨夫的儿子，在第十天来到这里，并从圣地格尔特（K'rt）的神灵那里恳求恩惠……我可以高兴地回家”。根据西姆斯·威廉斯的理解，格尔特可能是圣地夏迪亚尔的名字，该铭文清楚地证明了其发现地夏迪亚尔的宗教性质。对粟特铭文中的名字的暂定解释非常有趣。西姆斯·威廉斯认为，具有“英雄”风格的名字很受欢迎，如一些名字后缀以 Xsro（意为权利、统治）、Ox 及其同义词 mrty（意为男人），此外还有 sp（马）、myw（虎）、rzm（战斗排列）、SP'O（军队）、wnwn（胜利）和 xns（强壮），等等。最常用的神名是 Nane 和 Wakhush（u），即 The Oxus，这个神名显然是指乌浒河地区，该民族来自那里。另外，我们在从 Xwrmz to't 和 mzt'kk 中找到了 Ahura Mazda（阿胡拉·玛兹达[①]）这个名字。据他认为，神 Mithra[②] 不是被命名的，而是具有一个公认的名字 Baga[③]，即“神”。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紧接着伊朗人进入该地区之后，伊朗神也引入了该地区。

应该提到的是人们从两个以上的不同方向进入该地区。第一个方向为中国佛教朝圣者所使用，他们沿着这条线路向前抵达犍陀罗和印度以寻找佛教经典，一位著名的佛教徒法显在公元 400 年来到这里。法显俗姓龚，但现在被称为“释”（Shih）或“释子”（Sakyaputra）。他是武阳人，属山西省平阳郡。他在其他一些佛教徒的陪同下于公元 399 年从长安出发，在 14 年后返回南京，并在一位印度僧侣佛驮跋陀罗的协助下译出多部佛经。在去英吉沙的路上，他沿着塔里木盆地到达和阗，然后顺着葱岭向下进入以达丽罗山谷闻名的小国陀历，并描述了它的情况：

> 度岭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国名陀历。亦有

① 原为古代波斯多神崇拜中的一个通常神祇，后为琐罗亚斯德教尊为最高神。——译者

② Mithra 为古伊朗重要神祇，是契约、战争、审判、生命的神祇，又同火及太阳有关，为伊朗-雅利安神话中三大主神之一。Mithra 与吠陀神话中的 Mitra 同源，汉译密特拉或密斯拉。——译者

③ 古波斯语词，印度-伊朗人称呼神或主的三个集合名词之一。——译者

> 众僧，皆小乘学。其国昔有罗汉，以神足力，将一巧匠上兜率天，观弥勒菩萨长短、色貌，还下，刻木作像。前后三上观，然后乃成。像长八丈，足趺八尺，斋日常有光明，诸国王竞兴供养。今故现在。
>
> 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险阻，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絙过河。[70]①

法显生动地描述了这条路线以及去往印度河所遇到的困难，与此同时，他提到了在此地非常流行的小乘佛教和弥勒菩萨的高大木像，后者在随后几个世纪里成为有巨大吸引力的圣物。

在公元5世纪的铭文中提到的两大转变，即佉卢文书法转变成公元5世纪的笈多婆罗谜文，以及从俗语转变成混合梵语，证明了另一个对该地区施加影响的方向是旁遮普。在犍陀罗地区没有发现这种类型的婆罗谜文体，但从保存在拉合尔博物馆的肖尔戈德（Shorkot）铭文[71]中，我们可以对其有所了解。该铭文的记载日期是笈多83年，也就是公元402年。这种婆罗谜文具有三角形状的顶部标志，这一特征可以从刻在夏迪亚尔窣堵波的台阶上的名字帕迪拉（Bhadila）观察到，同样也可以从吉拉斯铭文中找到它。[72]在吉拉斯我们找到几个名字，包括古拉贾亚（Kulajaya）、帕迪拉、阿迪·索摩维巴拉（Adi Somoviprah）和斯利·苏特玛旃陀罗（Sri Sudamachandra）罗阇，最后一个是王族名字，但我们对其一无所知，在吉拉斯以西15英里远的托尔（Thor）地区可以发现更多类似的名字。看来在公元5世纪初，印度人的影响力就已经到达这里，并从本质上改变了当地文化的特征。从此以后，婆罗谜文保留了书写规则，梵语则成为文化交流的媒介，佛教仍然保持其统治地位。然而，我们现在已开始从犍陀罗地区直接获取艺术思想，并在吉拉斯的特尔班平原发现了几座佛像雕刻，从艺

① 译文参见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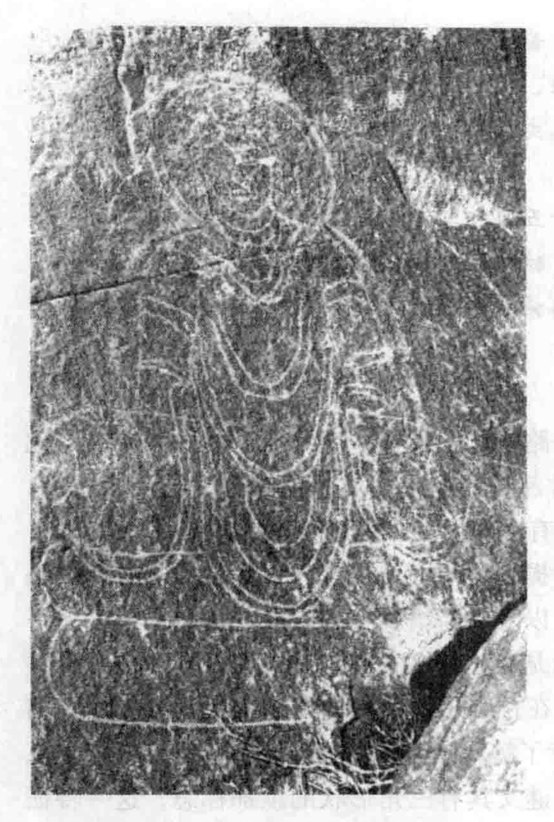


图11　吉拉斯的岩画：打坐的佛陀，展示了犍陀罗文化的影响。

术形式上讲，它们是从同时代的犍陀罗艺术中派生出来的（图11）。因此，公元5世纪早期标志着渗透了犍陀罗艺术的佛教文化的全新复兴，也标志着印度文化在语言和书写方面的浸透，更标志着对反映外部影响的众多艺术形式的采纳，印度的影响与犍陀罗趋向的结合提醒我们注意笈多王国与寄多罗贵霜王国的关系。[73]因此，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公元4世纪末和5世纪初，萨珊王国在该地区的实力大为削弱并开始向印度转移，从而引入了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元素。正是寄多罗贵霜王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导致在下一历史时期匈奴人①控制了这个国家。

公元5世纪—6世纪的匈奴霸权

我们难以阐述匈奴人的民族同一性，其历史已经为一些学者所争论过。[74]因为他们在历史上分布广泛，从中国直至欧洲，所以很难说存在一个统一的匈奴民族，通常认为他们由几个种族分支组成。在其霸权统治之下，一些中亚部落加入其中，以分享征服活动带来的利益。

① 即嚈哒，亦常称作“白匈奴”。——译者

匈奴人的好战行为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并影响了中国、中亚、南亚、萨珊伊朗和罗马帝国的历史。不同国家对他们的称呼都不相同，例如中国历史称其为匈奴，《阿维斯陀》中称其为 Hyon，欧洲历史称其为 Hun，波斯称其为 Ephthalite 或 Chionite，粟特称其为 Xun，花拉子模称其为 Hwn，亚美尼亚称其为 Hon，梵文中称之为 Huna，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献称之为 Heyatel、Hayatalah 或 Heiathel。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匈奴人的纪录出现在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公元前一千纪时他们被记载为北方的野蛮人并统称为荤粥（Hsun-yu）。在秦汉时期，这些北方游牧民族被称作匈奴。为保护中国不受这些北方“野蛮人”的突然袭击，秦始皇（于公元前246年登基）修建了长城。尽管受到抵抗，匈奴人仍然与汉帝国展开激烈的斗争，他们日益强大，势力范围东抵日本海，西至伏尔加河地区。伟大的匈奴统治者冒顿（Mo-tun）感到非常骄傲，因为他是所有弓马娴熟的民族的领导者。[75]

准确地说，我们是从公元5世纪后半叶的岩刻上发现这种类型的骑士的，这些岩刻分布在从科希斯坦到喀喇昆仑的整个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以及从兴都库什到拉达克和西藏。他们骑在马背上，能在奔驰的骏马上站立，擅长从马上射箭、在马背上游戏，大步跨越墓碑或者古迹。他们可以在夏迪亚尔、吉拉斯、吉尔吉特、罕萨、斯卡杜等许多地区以及许多岩石和小路上被看到，他们的马背伤痕累累。匈奴人迅速扩展到该地区，不仅与早期寄多罗贵霜王国发生冲突，还把势力延伸至吐蕃和中国边境。

一些专家认为，寄多罗贵霜是大匈奴的一个分支。[76]而事实上，西徐亚人、贵霜人和匈奴人都是由同一种族演变而来的，他们都与大突厥部族有关联，[77]匈奴正是从寄多罗人攫夺走权力的。入侵者被称为白匈奴，他们也同波斯的萨珊诸王进行战争。虽然难以弄清其征服活动发生的准确年代，但我们可以断定在公元5世纪中期，白匈奴已经深入到恒河流域中部。在那里，他们败于塞建陀·笈多（Skanda Gupta）之手，[78]不过他们在印度河流域建立起了延续三代的王朝。因此可以清楚地断定在公元5世纪中叶之前，匈奴人就已经成为喀布尔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主宰并建都于白沙瓦。

在科斯马斯·因迪科普柳斯特斯（Kosmos Indikopleustes）写的西方古典文学中可以对匈奴人有所了解，他在公元6世纪中叶是这样描述的："印度河把印度与匈奴王国分开，在铭文中印度国被叫做Euilat①（Havillah），那里有高纯度的黄金，有红宝石和玉石。"[79]文献中对黄金的叙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指向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而早期的希罗多德和其他古典文学家就曾提到过那里的黄金。值得重视的是这个国家名叫Euilat，它可能与Hayatala（人们对匈奴的称呼）一词有关系。科斯马斯·因迪科普柳斯特斯再次提到这个国家并写道：

> 白匈奴占领了印度以北很远的高原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国王据说带着不少于2000头大象和许多骑兵去打仗，印度也在其版图之内并且缴纳贡品。[80]

该文献直接证明了匈奴统治者征服了这个以盛产黄金出名的国家并从该地区收取贡品，匈奴统治者名叫果拉斯（Gollas），此人通常被认作是第三个匈奴王米希拉库拉（Mihirakula）。[81]北魏太后于公元518年派遣一位使臣宋云前去拜会这位匈奴统治者，宋云是敦煌人，在洛阳崇立寺比丘惠生的陪同下从敦煌到达和阗，然后沿着法显走过的路线翻越葱岭。他生动地描写了匈奴国王：

> 至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罗国。土地亦与乌场国相似。本名业波罗国，为嚈哒所灭，遂立敕勤为王。治国以来，已经二世。立性凶暴，多行杀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国中人民，悉是婆罗门种，崇奉佛教，好读经典，……王有斗象七百头，一负十人，手持刀楂，象鼻缚刀，与敌相击。王常停境上，终日不归，师老民劳，百姓嗟

① 《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作Evilat，汉译"埃维拉特"。［法］戈岱司编，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译者

怨。宋云诣军，通诏书。王凶慢无理，坐受诏书。[82]①

这段关于米希拉库拉国王的描述说明他非常残酷而且也不信奉佛教，而瓜廖尔（Gwalior）铭文也证明了这一点，[83]在铭文中，国王说他自己崇拜湿婆。另一方面也清楚地说明在其王国里居住着许多佛教徒。一份关于犍陀罗国毁灭的文献意味着寄多罗人早期统治的瓦解，但它与佛教寺庙的毁坏无关。佩里奥特和查文奈斯把第一个统治者的名字敕懃（Lae-lih 或 Lae-lin）修正为特勤（Tigin），这是一个突厥语名称，意为总督。中国人最初也用它来称呼犍陀罗王，因为他们认为犍陀罗是位于乌浒河谷的嚈哒国的一个行省。Tigin 这个名字被进一步确认与硬币上所刻的 Thujana 或 Thujina 以及《诸王流派》中提到的 Tunjina 等同。在对照所有这些证据之后，阿特莱伊·比斯瓦斯（Atreyi Biswas）[84]得出结论：

> Thujina（Tunjina 或 Tigin）是托拉马纳（Toramana）的父亲而且也是第一个嚈哒首领或特勤，他在犍陀罗永久建立了白匈奴或嚈哒国并把帝国拓展到克什米尔地区。我们可以将他的年代确定在公元465年，因为他生活在宋云到访（公元520年）之前相当于两代人的时候。

宋云进一步描述了这个白匈奴附属国的详细情况，并生动地描写了其国王、王后和一些风俗习惯：

> 十月之初，至嚈哒国，土田庶衍，山泽弥望。居无城郭，游军而治。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夏则迁凉，冬则就温。乡土不识，文字礼教俱阙。阴阳运转，莫知其度。年无盈闰，月无大小，周十二月为一岁。受诸国贡献，南至牒罗，北尽敕勒，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贡。王居大毡

① 译文参见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317 页。——译者

帐，方四十步，周回以氍毹为壁。王著锦衣，坐金床，以四金凤凰为床脚。见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诏书。至于设会，一人唱，则客前；后唱，则罢会。唯有此法，不见音乐。嚈哒国王妃亦著锦衣，长八尺奇，垂地三尺，使人擎之；头带一角，长三尺，以玫瑰五色珠装饰其上。王妃出则舆之，入坐金床，以六牙白象四狮子为床，自余大臣妻皆随。伞头亦似有角，团圆下垂，状似宝盖。观其贵贱，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为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器用七宝。诸国奉献，甚饶珍异。按嚈哒国去京师二万余里。[85]①

宋云的叙述不仅呈现出一幅当时匈奴社会生活的画卷，也说明其统治了广阔的疆域并从邻国征税。实际上，匈奴控制了中国和波斯之间的整个区域。因此毫无疑问的是，当时的人们，包括佛教徒、旅行者和商人，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自由往来。但是在匈奴与伊朗萨珊帝国和罗马帝国发生战争的时候，古丝绸之路肯定遭受了不利影响。同样，因为他们不信佛教，佛教寺庙肯定丧失了许多从早期统治者手中获得的捐赠。即使这样，当地居民仍然继续信奉佛教，而且慷慨地向佛教徒施舍，这已被下面来自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证据所证实。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整个帝国所有地区的文化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文化纽带，这导致了我们在吉拉斯地区岩刻上发现的克什米尔艺术对其的影响，在中国和远东的佛教艺术中也发现了吉拉斯岩刻的影子。

宋云以后的史料令人颇为困惑，或者说后来的作者混淆了他曾经提到过的地理位置。这些史料叙述的中心点是葱岭，而它必定与阻挡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山是同一座山。葱岭向西延伸到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既然宋云曾写道：“汉盘陀国正在山顶，……世人云是天地之中。”[86]那么这片高原就有重要意义，而喀喇昆仑山脉也正是从这里向西南延伸的。当进入钵和国（与钵露罗国不同）时，宋云

① 译文参见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第 194—197 页。——译者

仍然处于这两座山脉之中，他接着描述了嚈哒和波知（Po-sse）这两个国家，它们的某一部分肯定接触到葱岭，所以在这里加上了关于它们的叙述。宋云最后穿过葱岭抵达赊弥，他说：

> 土地峣峭，民多贫困。峻路危道，人马仅通。一直一道，从钵卢勒国向乌场国，铁锁为桥，悬虚而度，下不见底，旁无挽捉，倏忽之间，投躯万仞，是以行者望风谢路耳！[87]①

这段叙述给出了葱岭之后的三个地名，即赊弥、钵卢勒、乌场。乌场国即今斯瓦特；而赊弥国应该位于高山之下，也就是位于东部的罕萨和西部的奇特拉尔之间；钵卢勒国可以被认为介于上印度河河谷的吉尔吉特、吉拉斯和达丽罗之间。遗憾的是，宋云并没有详细谈论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而仅仅提到在该地区旅行遇到的困难。他把该地区包括在嚈哒帝国之内。当另一位中国佛教徒玄奘在公元629年—645年旅行到这里时，嚈哒[88]在该地区的统治已经又延续了几百年。强大的匈奴在这段时间控制了整个克什米尔地区，阿特莱伊·比斯瓦斯给出了其边界：

> 克什米尔王似乎拥有一个巨大的帝国，它分为很多行省，由不同的国王独立管辖行省内部事务。……克什米尔帝国包括喀布尔河谷、斯瓦特河谷和克什米尔山区，并向东南延伸至奇纳布河边的奢羯罗。如果克什米尔王领有斯瓦特、喀布尔河谷和班努的话，其帝国很可能扩展到格尔代兹（Gardez）。格尔代兹铭文中提到的金加拉（Khingala）可能就是克什米尔王金基拉（Khinkhila），他也是乌仗那国的领主。

阿特莱伊·比斯瓦斯的观察不仅谈到这个巨大帝国，也正确指出了当时存在的管理系统和制度。各地区都存在几乎独立的国王，这说

① 译文参见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7页。——译者

明旧的总督管辖制度已经被抛弃，这套行政管理制度事实上具有分权的性质，每个地区实际上只受当地国王（被称作罗阇）的统治。匈奴的这种新安排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模式，对土地及其产出实行一种新的分配制度。大部分产出保留在罗阇手中，罗阇是对当地统治者的称呼，它至今仍使用于旁遮普的丘陵地区。在旁遮普和拉贾斯坦发现的拉其普特（Rajput）似乎是从罗阇派生出来的，它们均与土地所有权相关。当时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看起来也发生了类似变革，在那里也发现了罗阇这个称谓（见下文），但其土地制度却用欣人和雅希昆人使用的当地术语来表述。欣人从这一时期以后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似乎是在匈奴帝国统治下的有利环境中发展起来，并成为一个强盛的社会经济阶层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此时的这种新社会结构必定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些行省，导致经济快速发展；其次，在匈奴帝国强大的保护伞下，各民族可以在各地区之间自由往来。从地方语言学历史的角度看，操布鲁沙斯基语的民族和拉达克地区操希纳语的民族之间的包容和融合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而从文学角度看，我们在整个地区发现的婆罗谜铭文则表现出笈多王朝晚期的文体风格。

玄奘访问了北部地区的这两个地方并把它们取名为“达丽罗河谷”和“钵露罗国”，他把乌仗那国的首都定位于第一个河谷并谈到那里出产丰富的黄金和芳香的郁金。正如早期的中国佛教徒法显所叙述的那样，玄奘也提到了弥勒菩萨的高大木像。关于钵露罗国，他写道：

> 钵露罗国周四千余里，在大雪山间，东西长，南北狭。多麦豆，出金银，资金之利，国用富饶。时唯寒烈，人性犷暴，薄于仁义，无闻礼节。形貌麁弊，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语异于诸国。伽蓝数百所，僧徒数千人，学无专习，戒行多滥。[89]①

① 译文参见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299页。

宋云使用的地理术语钵卢勒与玄奘使用的钵露罗略有不同，但所有专家都认为它们是指同一个地方 Bolor。很难说这个术语使用了多久，至少从公元 5 世纪人们就开始使用它了。中国和阿拉伯人谈论 Bolor 时，根本不用 Darad（Darada-desh）这个词，Darad（或 Dardai）只在希腊语和梵语文献中使用。看上去这几个词指的是同一地区或是其同一部分。因为该地区周围不同的统治者与当地人有不同的联系，所以产生了不同的称谓。梵语文献依赖克什米尔和北方民族的联系，所以文献里提到北部边界通道即达拉（Dara①），或是住在那里的居民，而希腊人也许是从梵语文献中获取其资料的。另一方面，中国人来自更远的北方，他们早在公元 5 世纪就提到过这个国家并将其拼作钵卢勒，阿拉伯人大概也是从相同的资料来源中推导出自己的术语的。

在公元 5 世纪—7 世纪这段时间，我们从铭文中获得了几个当地罗阇的名字，他们似乎是在匈奴帝国的保护伞下行使统治权的。

（1）第一类铭文[90]来自达丽罗河谷谷口处的夏迪亚尔和吉拉斯Ⅱ。这些属于公元 5 世纪的铭文提到佉沙罗阇格纳（Khasa-raja-gana），也就是对佉沙罗阇们的部落（或国家）的称谓。我们找到下列名字：吉伐瓦尔玛（Jivavarma）或吉伐瓦尔玛·贾贾（Jivavarma jaja）、伊湿伐罗瓦尔玛·托里卡（Isvaravarma Dhorika）、热卡瓦尔玛·派达卡（Reukavarma Pedaka）、毗湿奴玛杰纳·尼达卡（Vishnumajna Nidaka）、亚萨南迪瓦尔玛·托里卡（Yasanandivarma Dhorika），以及莱瓦迪（Revati）的兄弟汗达伐尔玛·伐杜卡（Khandavarma Vatuka）。而在吉拉斯Ⅷ，我们得到维拉瓦尔玛·贾贾（Viravarma Jaja）的附加名字。这些名字一定是广泛分布于吉拉斯地区的佉沙部落罗阇（首领）的名字，该地区大致相当于汉语中的达丽罗。中国佛教徒根本没有给它们命名，但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由于那些佉沙罗阇的铭文产生于这一时期，而且正是他们帮助了佛教的发展。奥雷尔·斯坦因爵士[91]从巴克托尔迪尼（Pakhtordini）和奇特拉尔的马斯图季那里发现了两条铭文，铭文给出了吉瓦尔玛纳（Jivarmana）和吉瓦尔玛罗阇（raja

① 亦为波斯语词，意为“山口”、“峡谷”。——译者

Jivarma）的名字，但很难说他们是否与在夏迪亚尔发现的吉伐瓦尔玛相同。

（2）我们仅仅在吉拉斯地区的特尔班桥边上找到维罗索摩纳格拉（Vira Somonagara）这个城市名字，这显然是该城的旧名。在吉拉斯Ⅸ，除了其他人之外，我们发现了加贾（Gaja）罗阇诸子的名字：斯利达萨（Sridasa）、达摩巴拉·苏拉（Dharmapala Sura）、达塔·斯利拉玛（Datta Srirama）、玛达施瓦罗（Madashvara）、旃陀罗巴拉（Chandrapala）、吉纳斯巴拉（Jinaspala）、马赫尔久纳（Makharjuna）、米塔尔久纳（Mitharjuna）、斯利·鸠摩罗色那（Sri Kumarasena）、塔兰加色那（Tharangasena）和马图色那（Madhusena）。我们还发现了两位国王的名字：赛兰德拉罗阇（Sailendraraja）和斯利·苏达玛·旃陀罗罗阇（Sri Sudama Chandraraja）。[92] 以“色那”结尾的名字看起来与他们有某种联系。这两个国王在谱系上处于王中之大王瓦伊斯拉瓦纳·色那（Vaisravana Sena）之上，[93] 他们也拥有因陀罗·帕塔拉卡（Indra Bhattaraka）和萨克拉·帕塔拉卡（Sakra Bhattaraka）的头衔并自称为“萨德罗—达玛纳”（Satru-damana），即“敌人的毁灭者”。他追溯家谱至其曾祖父哈里色那（Harishena）、祖父克德加·维尔亚色那（Khadga Viryasena）和父亲尤瓦·斯利色那（Yuva Srisena）。下一个人萨姆普加色那（Sambhogasena）似乎是他的儿子，他的王室大臣被称作纳罗提婆色那（Naradevasena），军队指挥官称作维斯巴密陀罗（Vispamitra），他的老师称作楼陀罗·斯利（Rudra Sri），定居在西尔瓦塔（Silvata）毗沙耶（Vishaya①），这很可能就是吉拉斯地区。因为铭文用的是公元7世纪初的华丽字体，他看起来是在匈奴统治衰退时期声称自己拥有权力的。从字体看，他似乎与曲女城的曷利沙伐弹那（Harshavardhana）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使用同一种字体书写和签名。在其后不久，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名叫阿摩罗僧诃（Amarasimha）的强有力的统治者，在他的吉奇（Gichi）铭文中，他拥有许多宏大的头衔，如僧诃维罗（Simha-vira，狮的力量）、玛哈加贾帕蒂（Mahagajapati，

① 古代行政单位，意译作“县”或“地区”。——译者

大象王)、帕塔拉卡大王(Bhattaraka Maharaja，勇敢的大王)，以及王中之大王(Maharajadhiraja)。与他相反，我们找到一位朴实的统治者僧诃提婆罗阇(Raja Simhadeva，图12)，他在吉拉斯雕刻了几座佛教窣堵波和几幅画像。



图 12　吉拉斯的岩画：手持油灯礼拜的国王僧诃提婆

(3) 在罕萨，我们发现了另一组统治者或酋长，[94]其中一些有罗阇的称号而另一些则没有。最早的一个统治者名叫玛尤罗(Mayura)，他儿子叫哈里卡罗(Harikala)，玛尤罗被巴拉密陀罗(Balamitra)所消灭。与巴拉密陀罗词根相同的另一个人的名字叫僧诃密陀罗(Simhamitra)，他的父亲僧诃提婆(Simhadeva)后来也遭到失败。然而最重要的人物是迦叶波提婆(Kasyapadeva)，他拥有王室头衔摩诃罗阇纳(Maharajna)，并自称为维兰卡(Viranka，英雄)，他也被称为罗纳僧诃(Rana Simha，战争之狮)。所有这些统治者大都处于公元5世纪—6世纪，此时匈奴显然已经征服了这一地区，而他们被提婆·斯利·旃陀罗·维克拉玛迪蒂亚(Deva Sri Chandra Vikramaditya)所消灭(见下文)。

(4) 在巴尔蒂斯坦的希格尔河谷，专家们成功地破解了一条公元5世纪的婆罗谜文铭文(尚未公布)，铭文中提到孙迪·纳拉巴蒂

(Sundi narapati，孙迪王）和毗沙耶巴蒂（Vishayapati，地区长官）。在斯卡杜以北20英里处从戈尔（Gol）去哈伯罗的道路上，我们发现了一些公元5世纪左右具有婆罗谜文特征的佛教记录和窣堵波岩刻，而在更远的尤戈（Yugo）也发现了类似的文字，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王室铭文。

（5）最后我们在罕萨找到了一条汉文铭文（图13），已故的马雍教授[95]鉴定为："大魏使谷巍龙今向迷密使去"。根据马雍教授的考证，迷密一名仅在北魏时期（公元386年—556年）使用过。汉语文献中提到迷密也曾派使团去朝觐北魏皇帝，作为回应，北魏于公元444年—453年间（即宋云出使之前70年）派人出使迷密。在古典阿拉伯语传统中，迷密（Mi-mi）与梅莫尔格（Maymurgh）系指同一国家，位于撒马尔罕东南。Maymurgh一名曾出现在粟特铭文中，其领土覆盖上泽拉夫善（Zarafshan）河谷，首都很有可能是喷赤干（Panji kent）。因此，中国使节谷巍龙从北魏的代都（即今大同）出发，前往喷赤干或迷密，途经罕萨并且在岩石上留下了这条铭文。该使团肯定是沿着所谓的"罽宾道"——汉代丝绸之路南线的一条支线，经由星峡尔（Shimshal）穿过巴基斯坦地区的，实际上它开始于距乌秅国1340里远的皮山国。据马雍教授，"罕萨一词很可能即由乌秅演变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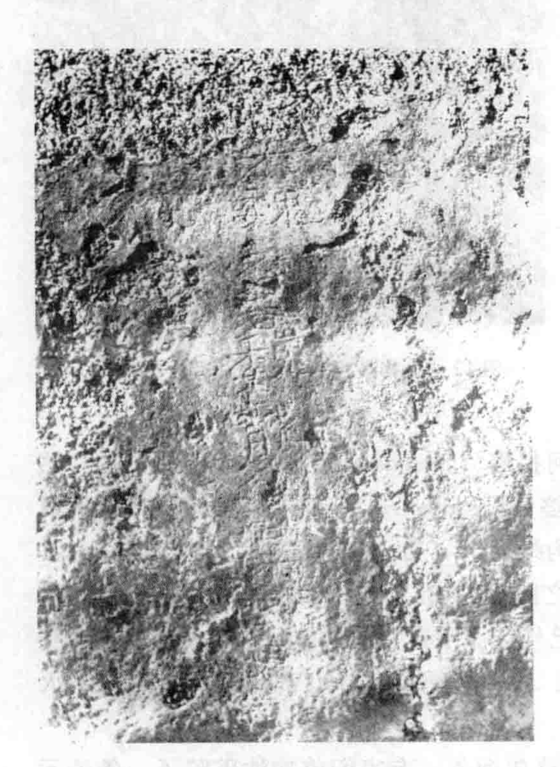


图13　罕萨：中国大魏使谷巍龙的汉文铭刻，公元444年—453年间。

沙希和达尔德人时期

我们很难确定匈奴帝国崩溃和格尔戈达（Karkota）人开始统治克什米尔的具体年代，[96]匈奴最后一任统治者名叫俞提什提腊（Yudhishtira），他继承了在喀布尔铭文中提到的纳伦德拉迪蒂亚·金基拉（Narendraditya Khinkhila）的王位，并统治了大约24年或40年，因而其统治应在公元670年或657年左右结束，[97]然后就被克什米尔地区格尔戈达王朝的建立者杜尔拉帕·瓦尔塔纳（Durlabha Vardhana）所取代。很难说清楚北部地区的情况，因为我们看到不同河谷有不同的当地罗阇，而且我们也将在下面给出仅限于吉尔吉特地区的真实状况。同时，邻近地区的四大发展活动也影响了该地区的历史。第一是被称作杜罗什卡（Turushka，即梵语文献中之Mleccha，蜜利车）人的突厥人从北部的转移活动；第二是中国唐朝势力的兴起；第三是阿拉伯人向中亚和帕米尔地区的渗入；第四是吐蕃人经由拉达克、巴尔蒂斯坦、吉尔吉特和亚辛向北和向西前进至瓦罕。[98]中国人先后阻止了突厥人、阿拉伯人和吐蕃人向其领土的扩张活动，接着顺理成章地与吉尔吉特和克什米尔地区的统治者建立了联盟关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得双方互派使节。中国军事策略的目的也在于保证上印度河河谷的路线不受侵犯，因为中国要利用该路线前往乌浒河谷。在这场争夺贸易路线控制权的国际竞赛中，中国不得不向克什米尔派遣远征军并寻求当地统治者的帮助和合作。因此，打败吐蕃人的胜利为中国军队和克什米尔军队共同分享，但吉尔吉特的统治权却似乎没有改变，它仍然被一个自称巴托拉沙希（Patolashai）的王朝所掌握。

中国唐代编年史曾提到一个名叫Tu-lo-pa①的“印度国王”，“他在公元627年—649年间的某一年控制了从中国到罽宾即喀布尔河谷的通道。”奥雷尔·斯坦因爵士[99]将其与格尔戈达王朝的建立者杜尔拉帕·

① 此系奥雷尔·斯坦因转引自坎宁安的《中印度钱币》（Coins of Med India），汉文原文待考。——译者

瓦尔塔纳（Durlabha Vardhana）认作是同一个人。这种推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该克什米尔国王所处的年代是不确定的，而且他控制上印度河河谷通道的可能性较小。另外，在整理该地区的历史时我们被一些难题所困惑。一些专家围绕从《诸王流派》中找到的 Darad（或 Dard）这个术语来构建其历史，它暗示达尔德人控制了从克什米尔边境到吉尔吉特和亚辛的整个地区。[100]但《诸王流派》关于该问题的论述[101]非常清楚，它提到达拉达人及其城市达拉特布里（Daratpuri），也曾单独谈起过蜜利车人和杜罗什卡人。[102]奥雷尔·斯坦因爵士认为达拉特布里系古雷兹，[103]并把达拉达王国定位于吉申甘加河谷。当杜齐教授谈起这些达拉达人时，他这样评论："后来，卡兰纳把达拉达人称为蜜利车人，这意味着他们及其统治者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信奉伊斯兰教的。"[104]这样的评论几乎无法被证明是正确的。蜜利车人和杜罗什卡人是达拉达人的联盟，他们在《诸王流派》中是被分别论述的。因此在下面的内容中，这两个地区的统治者被相互分开。

与此同时，从吉尔吉特铭文、中国编年史、阿拉伯文文献和卡兰纳写的《诸王流派》这四个不同来源搜集资料是非常重要的。

希努贝尔（O. V. Hinuber）教授搜集了石刻资料，[105]其中大多数记录称统治者为巴托拉沙希（Patola-Shahi），仅霍杜尔村的一条铭文拼写为巴洛拉沙希（Palola-Shahi），希努贝尔正确地论证了这两个名称是同一个词，只不过发音不同。另一方面，摩根施迪恩（Morgenstiene）[106]指出 Palola 是一个达尔德部落的名字。富斯曼[107]记录了 4 条刻于公元 5 世纪—6 世纪的婆罗谜文铭文，它们是在阿拉姆桥（吉尔吉特）发现的，铭文中有 Palola 一词。第一条铭文提到 Sri Palalojo Hastibhro，意为"Hastibhro 是 Sri Palalo 的子孙"；最后三条铭文提到佛教僧侣的到来，其名字拼作巴洛拉贾伊（Palolajai），或巴洛拉乔（Palolajo），或巴拉腊（Palala）。这些铭文明确提到 Palola 或 Patola（部落）这个名字至少从公元 5 世纪以后就已经出现在吉尔吉特地区了。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该部落的某个人在匈奴时代已成为罗阇。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108] Bolor 这个地理名称，它可能与 Palola 或 Patola 有联系。很有可能的是，该部落进入[109]巴尔蒂斯坦地区后，不

仅使佛教，还使后笈多时代的婆罗谜文和梵语得到广泛传播，也让Bolor这个名称开始在该地区使用。

从一页佛教徒手稿上，我们发现了巴托拉提婆·沙希·伐杰拉迪蒂亚南迪（Patoladeva Shahi Vajradityanandi）这个名字。吉尔吉特的一份王室抄本提供了一个捐赠者的名字斯利·提婆·沙希·苏兰德拉·维克拉玛迪蒂亚·南达（Sri Deva Shahi Surendra Vikramaditya Nanda），[110]他的王后叫萨米德维·德拉伊劳克雅·德维·帕塔里卡（Samidevi Trailokya Devi Phattarika）和毗诃里（Vihali）。另外一份玛哈玛尤里（Mahamayuri）的手稿提供了巴托拉·沙希·沙哈努沙伊·斯利·纳瓦·苏兰德拉迪蒂亚·南迪·提婆（Patola Shahi Shahanushai Sri Nava Surendraditya Nandi Deva）这个名字，[111]他的王后叫阿南加德维（Anangadevi）。在一个青铜像的底架上刻着第四个统治者的名字"王中之大王帕拉米斯瓦腊·巴托拉·沙希·斯利·阿里雅·南迪·维克拉玛迪蒂亚·南迪·提婆（Maharajadhiraja Paramisvara Patola Shahi Sri Arya Nandi Vikramaditya Nandi Deva）"，时间标记是某个不明纪年的90年。在霍杜尔铭文上发现了第五个统治者，名叫斯利·巴洛拉·沙希·苏兰德拉迪蒂亚·南迪（Sri Palola Shahi Surendraditya Nandi）。

关于这些统治者的最重要的铭文[112]是在伊希戈曼的哈屯发现的，其年代标为47年，铭文提到帕拉玛帕塔拉卡·王中之大王·帕拉米斯瓦腊（Paramabhattaraka Maharajadhiraja Paramisvara）的繁荣统治。至于巴托拉·提婆·沙希·斯利·纳瓦·苏兰德拉迪蒂亚·南迪·提婆，据说出生于史诗英雄帕噶达塔（Bhagadatta）的家族，属于勃特没（P'o-t'o-mo）统治之地。吐火罗斯坦和马格罗布拉（Makarapura）显然是同一个地点，马格罗僧诃（Makara-Simha）就是在那里把铭文刻在伊希戈曼河岸边上的，他拥有很多头衔，如Mahagajapati（大象王）、Mahamatya（首席大臣）、Mahasamantadhipati（封地的伟大君主）和Giligitta Saramgha（吉尔吉达的军队统帅）。这位大臣属于甘久迪（Kanchudi）部落，这可能指坎巨提（Kanjut），这个名字后来用于罕萨地区。他不仅在莱旺索玛拉（Revan Somala）森林中建造了一个城市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还在查特—希喀姆卡河（Chat-shkamka，即伊希戈

曼河）中修建了一条直达哈屯村的水坝，该山村位于哈奈萨拉（Hanesara）地区，即汗索拉（Hansora），是伊希戈曼河谷的旧名，在那里发现了许多铭文。从经济角度看，铭文讲述了通过修建水坝向该地区引水，并使得城市中心得到发展。从行政管理角度看，铭文提到了税收区“毗沙耶”一词，我们以前曾在吉拉斯和希格尔河谷（巴尔蒂斯坦）发现过该词，同时在首席大臣马格罗僧诃手中还有其他一些职务。在手稿和目前的铭文中提到的纳瓦·苏兰德拉迪蒂亚·南迪·提婆这个名字显然是指同一个统治者。

在另一条年代标为6年的丹尤尔铭文（尚未发表）中，有帕拉米斯瓦腊·斯利·阇耶曼加拉·维克拉玛迪蒂亚·南迪·提婆·玛哈巴塔拉卡（Paramesvara Sri Jayamangala Vikramaditya Nandi Deva Mahabhattaraka）这个名字，并提到Rajaputra（王子）或伟大的儿子，他的名字很可能是旃陀罗；该铭文同时也提到另一个名字散迪维格拉希卡（Sandhivigrahika，主管战争与和平的大臣），他是该铭文真正的镌刻者。铭文的意思似乎是指对上印度河河谷的征服，它没有使用巴托拉·沙希这个家族名称。最后一个统治者的名字是在罕萨灵岩上发现的，[113]他叫作提婆·斯利·旃陀罗·维克拉玛迪蒂亚（Deva Sri Chandra Vikramaditya），时间是某个不明纪年的143年，同样这里也没有使用巴托拉·沙希这个家族名字。

这样，我们从手稿和铭文中找到七个（巴托拉沙希）统治者的名字，他们都拥有伟大的称号“王中之大王”和“帕拉米斯瓦腊”，这使他们看起来在匈奴王朝末年实际上已经独立于匈奴君王，因此他们所处的年代应该在公元7世纪左右。我们从铭文中得到4个年代，即6、47、90、143，但其纪年不得而知。这些数字可能既不是指君王即位的纪年，也不是指洛基加（Laukika）纪年，而是指始于公元606年的曷利沙纪年（Harsha）。如果假定正确，那么最后的已知年代是公元749年—750年。

奥雷尔·斯坦因爵士[114]概括了对了解吉尔吉特地区历史有重要意义的中文资料。保持上印度河河谷和乌浒河之间交通路线的畅通，以及防止吐蕃的侵略，对中国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为达到这一目的，在

公元713年—755年间唐玄宗统治时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勃律（Polu）的统治者名叫没谨忙，据说在其统治早期曾效忠于中国皇帝，而中国皇帝把他的国家设置成一个名叫绥远的军事地区。吐蕃人的主要兴趣在于获得一条经过该地区入侵中国突厥斯坦的通路，中国在和阗、库车、喀什噶尔、哈喇沙尔已经建立了四个防守要塞。公元722年，吐蕃已从没谨忙手中夺取了9个城镇。然而，借助中国军队的帮助，他又收复了这些城池。在15年后即公元737年，吐蕃对勃律发动了新一轮进攻，这次中国采取从帝国中央进行牵制的战略，使吐蕃人在库库淖尔（Kuku-Nor）遭到惨败并收复了勃律。奥雷尔·斯坦因爵士进一步叙述了该地区的历史：

> 没谨忙死后，由其儿子难泥和麻号来（麻来兮）继续在小勃律地区的统治，关于任命后者职务的皇室法令至今仍存在于查文奈斯所摘录的条目中。他似乎死得很早，他的继承人苏失利之被吐蕃人通过和亲所拉拢，并在其国家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因此编年史作者认为，小勃律地区西北超过20多个王国（即小山国）转而臣服于吐蕃人，不再向中国缴纳贡品。

奥雷尔·斯坦因爵士接着描述了中国军队的四次远征活动，公元747年，高仙芝率领军队进行了第四次远征并彻底击败了吐蕃人。他评论说：

> 根据编年史记载，凯旋的将军带着俘获的小勃律王苏失利之及其王后胜利地回到帝国首都。皇帝宽恕了勃律王并使其成为一名皇家卫士，也就是让他体面地流亡并安全离开其国土。小勃律也变成中国的一个军区并改名为归仁，守卫士兵大约为一千人。高仙芝引人注目的远征活动在所有邻近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体现在《唐书》的有关记载中：“于是拂菻（叙利亚）、大食（塔吉［Taji］或阿拉伯人）诸胡七

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①[115]

吐蕃人通过拉达克进入巴尔蒂斯坦，他们在靠近斯卡杜（图 14）的门特尔和其他地区留下了许多铭文[116]和佛教刻像。虽然铭文中没有提到国王的名字，但吐蕃人在该地区引入了藏文和佛经并最终占领了



图 14　斯卡杜附近门特尔的刻于巨石上的佛陀坛城，公元 8 世纪。

巴尔蒂斯坦。从吉尔吉特的岩刻佛像（图 15）中也能感受到其影响。由于奇特拉尔的统治者勃特没（P'o t'o-mo）加入到其中并觊觎吉尔吉特，吐蕃人受此诱惑，再次进行了远征活动。他们推进到亚辛并通过达尔科特山口和博罗吉尔山口进入瓦罕，在那里对吐火罗斯坦——大概是巴达克山——的叶护（突厥）统治者构成了威胁，突厥统治者受到吐蕃人和向中亚渗透的阿拉伯人的包围。吐蕃人的西进活动可能将其与阿拉伯人联系在一起，在阿拉伯文献中可以找到证明其胜利的资料。吐火罗斯坦的统治者在公元 749 年向中国皇帝求助，结果导致具有高丽血统的高仙芝将军率军远征，他在公元 750 年通过博罗吉尔山

① 译文参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252 页。

口和亚辛进入吉尔吉特，打败了吐蕃人，并用素迦（Su-chia）取代勃特没在奇特拉尔的统治地位，接着经过罕萨返回中国。但在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逻斯（Talash）战役中被阿拉伯人彻底击败，导致中国在西域国家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使该地区被后来的野心家所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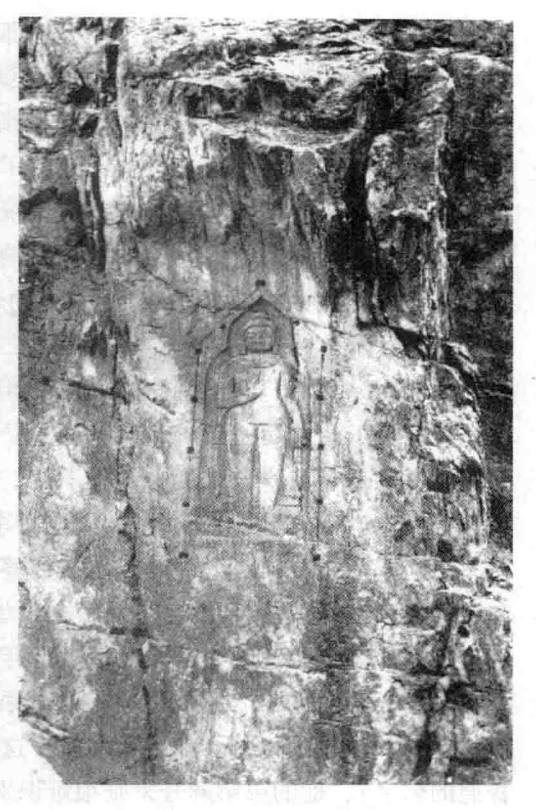


图15　吉尔吉特：卡尔加的佛陀立像，公元8世纪。

克什米尔统治者木多笔（Mu-to-pi）[117]与高仙芝这次进军活动联系紧密，并为其提供了必须的物品。他被认为与拉利达迪蒂亚·穆克塔皮陀（Lalitaditya Muktapida）是同一个人，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曾派人出使中国，双方达成共识，认为对彼此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吐蕃和阿拉伯人的入侵。正如我们所知，在这次远征中，中国军队起了主导作用。但在公元751年后，拉利达迪蒂亚·穆克塔皮陀似乎发动了一场旨在征服世界的军事行动，他声称在北部地区打败了甘蒲阇人、吐火罗人、博塔（Bhautta）人和“喝葡萄酒的达拉达人”。据中国佛教徒悟空（公元759年—763年①）的叙述，奥雷尔·斯坦因爵士

① 原文如此。据聂静洁：《唐释悟空生平考》（载《欧亚学刊》第八辑，中华书局，2008年），悟空原名车奉朝，公元751年参加以中使张韬光为首的唐朝使团出使罽宾，757年27岁时因病于犍驮逻国出家，法名“法界”，此后在印度巡礼和学习，并在西域译经，最后于790年回到长安，受赐法名“悟空”，于812年逝世。——译者

把吐火罗斯坦看作是巴达克山，并提到那些面向喀布尔河谷和上印度河河谷的突厥部落。拉利达迪蒂亚的大臣坎库纳（Cankuna）很可能来自吐火罗斯坦，这个名字源于中国的职衔 tsiang-Kiun，意为"将军"。对突厥军队的胜利在克什米尔地区留下了一个古老传统，据阿尔·比鲁尼所言，在那里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庆祝活动以纪念这场胜利。在论述突厥人及其入侵印度河河谷的历史之前，值得我们去做的是把吉尔吉特统治者的中文名字同他们在铭文中的名字进行比对。

希努贝尔教授把中文名字苏弗舍利之泥（看来就是苏失利之）还原为 Surendraditya（苏兰德拉迪蒂亚），但据汉语文献，他是吉尔吉特巴托拉沙希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而罕萨岩刻表明最后一个统治者是斯利·提婆·旃陀罗·维克拉玛迪蒂亚，其最后年代为公元 749 年—750 年。这个年代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将军高仙芝在吉尔吉特和罕萨的行军时间非常相合，因此可以断定，提婆·斯利·旃陀罗是吉尔吉特和罕萨地区巴托拉沙希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根据同一汉语文献，吉尔吉特地区统治者没谨忙在公元 722 年被吐蕃人打败并因此向中国皇帝求助，我们很难把他与任何一位梵语文献中已知的国王等同。然而，他的一个儿子和继承者名叫难泥，这肯定是南迪（铭文中一个极普通的名字），他的弟弟麻号来则很难识别。如果比较这两个证据，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统治者：

(1)阇耶曼加拉·维克拉玛迪蒂亚·南迪　6 + 606 = 公元 612 年
(2)伐杰拉迪蒂亚·南迪
(3)维克拉玛迪蒂亚·南迪
(4)苏兰德拉·维克拉玛迪蒂亚·南迪
(5)纳瓦·苏兰德拉迪蒂亚·南迪　47 + 606 = 公元 653 年
(6)南迪·维克拉玛迪蒂亚·南迪　90 + 606 = 公元 696 年
(7)没谨忙　公元 722 年
(8)难泥(没谨忙之子)
(9)苏失利之　失败于公元 750 年
提婆·斯利·旃陀罗·维克拉玛迪蒂亚　143 + 606 = 公元 749 年

这是吉尔吉特沙希统治者的第一个系列，在他们统治时期，佛教非常兴旺，许多佛教徒的工作结合在一起，难以区分。此前我们已了解到巴洛拉贾伊（Palolajai）是佛教僧侣。

我们从吉拉斯[118]恢复了沙希统治者的另一个系列，他们与上面提及的沙希似乎毫无关联。从古文字学角度看，刻在窣堵波下方的铭文年代大约为公元9世纪—10世纪，比窣堵波晚。该铭文提到沙希·斯利·伐杰拉苏罗（Shahi Sri Vajrasura）和两个王子（rajaputra），他们分别叫作僧诃苏罗（Simghasura）和伐亚格罗苏罗（Vyaghrasura）。我们同时也找到吉基西拉（Gikisila）这个名字，据说他是内阁的首席大臣和大象王。这样一种联系紧密的叙述表明该系列的沙希曾在吉拉斯统治过一段时间。虽然国王和王子的名字是梵文，但该大臣的名字不是，这说明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血统。

在后巴托拉沙希时代，我们在罕萨灵岩找到了另一个系列的统治者的名字，[119]它们是用经过发展的婆罗谜文刻写的。岩石上刻有三个部族首领画像，可能表示的是具有某个不同种族血统的国王，它们类似于新疆回纥族的画像。首领之一（图16）梳着长辫子，名叫维吉·萨吴拉·斯利·罗德拉达萨（Vigui Savra Sri Rudradasa），其头衔为斯利·萨哈兰卡（Sri Saharanka，Shah 的标志）和尤塔僧诃（Yuddha-simha，战争之狮）；第二个首领的名字是鸠摩罗（王子）·楼陀罗·斯利·查德拉巴莱索比亚（Kumara Rudra Sri Chdrapresupya）；第三个首领名字模糊地拼作查德拉·耶萨·斯利·普利亚（Chdra Yasa Sri Priya）；第四个首领名叫拉姆巴里·丹达·拉克希达·卡德里（Lambari Danda-rakshita Khadri）。他们的权力似乎超过当地统治者尼尼亚·毗湿奴·伐尔玛（Ninya Vishnu Varma）和帕德拉·毗湿奴（Bhadra Vishnu），这些新征服者称自己为 Mahesvara Prarisya，即“为马海斯瓦拉（湿婆神）所宠爱的”。

在罕萨发现的最晚的一条铭文[120]提到一位新国王，名叫罗阇拉姆达萨（Raja Ramudasa）。他拥有“德拉哈—古纳僧诃”（Trakha-gunasimha）的头衔，即“突厥贵族之狮”。他还自诩为“萨布赫亚提婆·瓦姆萨”（Sabhyaadeva-vamsa），即“高贵的神族”，并最终成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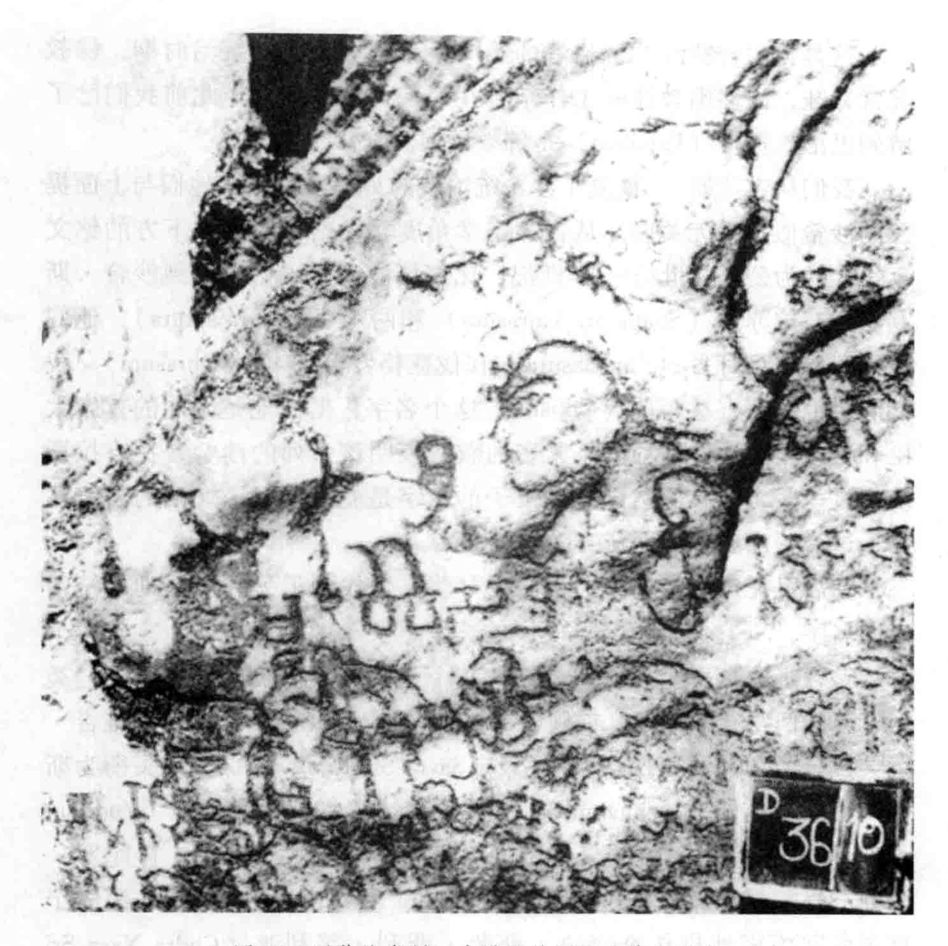


图 16　罕萨的岩刻：有辫子的国王头像和铭文

占领了许多山区。在征服活动中，他似乎宣称两种主权标志，即王室的伞盖和蝇拂。从古文字学角度看，年代在公元 9 世纪—10 世纪的铭文明确讲述了突厥人对该地区的征服活动。《世界境域志》[121] 里可能有关于突厥人的参考资料，其中提到博罗尔·沙（Bolor Shah）是太阳的子孙。

公元 8 世纪下半叶巴托拉沙希王朝崩溃后，突厥人的入侵活动是该地区历史的新现象。铭文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没有使用“沙希”这个头衔，同时他们看上去不信奉佛教，而且也很难说他们与犍

陀罗地区的突厥沙希有什么联系。但是，突厥人同时占领这两个地区，必定与发生在中亚的新的历史现象有密切关系，即这些前穆斯林突厥人被赶往兴都库什南部去寻找新的容身之地并建立自己的新王国。

现在我们讨论另一个在梵语文学中叫作达拉德代萨（Daradadesa，达尔德人之地）的地区，关于其疆域，奥雷尔·斯坦因爵士写道：

>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吉申甘加河谷在萨尔迪（Sardi）正上方变成一条狭窄的、有人居住的峡谷，在其尽头是达尔德人的领土。他们居住在上吉申甘加，而其附庸国似乎构成了一个单独的小王国，编年史通常称之为达拉德代萨（Daraddesa）。达尔德统治者拥有印度名字，不止一次地试图入侵克什米尔。
>
> 达尔德人的城镇达拉特布里（Daratpuri）大概位于今古雷兹（Gurez，地图标为 Goorais）附近。古雷兹是纳瓦布（Nawab①）们的主要居住地，他们在被锡克人征服之前一直统治着该地区。蜜利车人的首领曾两次被描写成达尔德罗阇们的北方盟军，他们可能统治着远至印度河的其他达尔德部落，而后者很早便信奉了伊斯兰教。[122]

奥雷尔·斯坦因爵士在这里区别了两个不同的地区，其中北部地区的历史已经在上文叙述过了，现在我们讨论上吉申甘加河谷的历史。《诸王流派》把那里的人记述为达尔德人，上面已经引述了关于他们的第一份文献资料，拉利达迪蒂亚·穆克塔皮陀声称：

“他的高贵不允许他容忍达拉德人（只是）不停地喝葡萄酒，正如早上的太阳不能容忍峡谷中的草木发光一样。”[123]

他同时也宣称萨希（Sahi，或 Shahi）和其他王子的职位很高。[124]在乌特波罗（Utpala）统治者桑卡拉跋摩（Sankara-Varma）时期（公元 883 年—902 年），印度沙希首领拉利亚·沙希（Lalliya Shahi）的疆

① 意为“王公”。——译者

域据说“在达尔德人统治者和杜罗什卡人统治者之间”。[125]后来桑卡拉跋摩在远征北部地区（北帕塔）时去世。[126]接着在洛哈罗（Lohara）王朝统治者阿南塔（Ananta）时期即公元1028年—1063年，达尔德首领阿卡拉曼格拉（Acalamangala）与某些蜜利车酋长组成联盟入侵克什米尔。某个诗人把这些蜜利车酋长称之为塞种人，而奥雷尔·斯坦因爵士则称其为穆斯林，他们很可能是吉尔吉特地区的突厥统治者。达尔德统治者据说失去了脑袋。[127]后来在曷利沙（Harsha）统治时期（公元1089年—1101年），我们又听到关于那些蜜利车酋长[128]的消息。当时曷利沙试图夺取杜格塔迦塔（Dugdhaghata）堡垒，该堡垒守护着通往吉申甘加河谷达尔德人领土的山口。卡兰纳写道：

> 曷利沙在那里受到著名的达拉德统治者维迪亚陀罗·萨希（Vidyadhara Sahi）的殷勤款待，并随着时间推移增加了一些追随者。曷利沙在达拉特布里过冬，然后继续发动攻势。克什米尔人与达拉德士兵一起并肩战斗，后者推倒巨石并因为有堡垒的掩护，使敌人很难取胜，[129]于是曷利沙国王不得不撤离杜格塔迦塔堡垒。在乌卡拉（Uccala）时期我们了解到“达拉德国王名叫贾格达拉（Jagaddala）”，[130]后来苏萨拉（Sussala）国王（公元1112年—1120年）接待了“达拉德统治者马尼塔拉（Manidhara）”。[131]在阇耶辛哈（Jayasimha）时期（公元1128年—1149年），达拉德国王[132]耶输陀罗（Yasodhara）去世，他对克什米尔王来说非常重要，在他死后大臣们想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中一个名叫维达西哈（Viddasiha）的大臣“骗取了王后的喜爱，由于耶输陀罗之子尚未成年，他巧妙地掌握了王权。”维达西哈遭到了另一位大臣巴尔尤卡（Paryuka）的反对，巴尔尤卡支持耶输陀罗的另一个儿子并得到克什米尔国王的援助，但后者不理会其首席大臣散贾巴拉（Sanjapala），却顺从萨贾（Sajja）之子斯林格拉（Sringara）的建议，而事实证明斯林格拉未能增加克什米尔王对达拉德国的兴趣。维达西哈和巴尔尤卡调和了彼此间

> 的矛盾，并共同努力来拯救整个国家和杜格塔迦塔堡，接着维达西哈干预克什米尔的内政并鼓励勒塔纳（Lathana）篡夺王位，从而导致了一场严重的叛乱。雄心勃勃的达尔德人期待着山上的冰雪融化以利于骑兵通过。萨尔哈纳（Salhana）之子波贾（Bhoja）也参与了这场叛乱，他决定与达拉德人并肩战斗并使用经过马图玛蒂（Madhumati）河岸的路线。但当他处于困境时，我们读到："当维达西哈获得波贾进军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前往北部地区召集许多酋长，蜜利车的酋长们从靠近喜马拉雅山的山谷前进，他们目睹了古贝拉（Kubera）的妻子的轻率举动，在那些住人的山洞里回响着基纳拉斯城（Kinnaras）的歌声，他们也了解到炎热的沙漠也有寒冷的一面，他们快乐地沐浴在山风中。他们加入达拉德国王阵营，其作战马匹漫山遍野、到处都是。"[133]我们也被告知："骄傲的达拉德军队骑着装有金鞍的骏马从山谷中冲下来与敌人作战，害怕遭受杜罗什卡人侵略的人们团结一致，并且认为整个国家被蜜利车人所蹂躏。"[134]但是卡兰纳告诉我们："他阻止了骑着装有金鞍的战马的敌军，就好像一场山洪扑灭了熊熊的森林大火。"

克什米尔得救了，阇耶辛哈继续其统治，直至公元1149年—1150年，而维达西哈却死了。

引自卡兰纳的大段文字把达拉德人的历史带进了公元12世纪中叶，它清楚地表明达拉德王国范围限于上吉申甘加河谷，蜜利车人和杜罗什卡人占据了距其很远的北部地区，而克什米尔王国与他们毫无联系。因此他们可以归类为北方俱卢人，这是一个使用于该历史时期的神话术语。他们应该被称作杜罗什卡人，即突厥人，但我们很难讲清楚为什么用蜜利车来称呼他们。欧洲学者认为该术语可能暗示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但这不是必须条件，蜜利车在这里很可能代表信仰非印度教的民族。与北部地区的中世纪历史（参见第六章）相关的问题是这种宗教是什么、突厥人如何碰巧来到这里，等等。

注 释

[1] G. 杜齐:《斯瓦特的达尔德人及相关问题》,《东方与西方》,第27卷,1977年,第9—103页。

[2] C. S. 安东尼尼和G. 斯塔古尔:《斯瓦特的史前人类坟墓》,罗马,1972年。

[3] A. H. 达尼:《迪玛尔格尔和犍陀罗墓葬文化》,见《古代巴基斯坦》,第3卷,白沙瓦,1967年—1968年。

[4] G. 富斯曼:《达尔德人和卡菲尔人的语言学谱系》,第2卷,巴黎,1972年。

[5] 约翰·毕达尔夫:《兴都库什的部落》,第30页。

[6] 同上,见第8页的参考资料。

[7] G. T. 瓦因:《在克什米尔、拉达克和斯卡杜的旅行》,伦敦,1892年;该文献被毕达尔夫和沙·拉伊斯·汗在《吉尔吉特史》一书中引用。

[8] G. W. 雷特奈尔:《1866年、1886年和1893年的达尔德斯坦》,新德里再版,1978年;他首先从西方古典文献中引用证据并把Derdae或Dardae识别为梵语中的Darada。

[9] 希罗多德:《历史》,G. 劳林逊和E. H. 布莱克尼校订,伦敦,1945年,第3卷,第91节,第256页。

[10] 同上书,第7卷,第66节。

[11] F. H. L. 埃格蒙:《地理学家托勒密和达尔德人:亚历山大在布奈尔、奥尔诺斯的问题和迪尔塔的达尔德人》,J. C. A,第7卷第1期,1984年7月,第102—103页。

[12] 希罗多德:《历史》,第3卷,第102—105节,第259—261页。

[13] J. W. 麦克林德尔:《古典文学中描述的古印度》,新德里再版,1979年,第51页,关于掘金蚁的所有参考资料详见脚注1。

[14] R. C. 马章达尔:《关于印度的古典文学描述》,加尔各答,

1960 年，第 342 页。

［15］阿瑟·尼夫少校：《克什米尔、拉达克、斯卡杜和拉合尔旅行指南》，第 18 版，第 113 页，在上述地区他谈到过卡拉尔和甘加姆村庄之间的旧金矿。

［16］J. W. 麦克林德尔：同上引书，第 51 页。

［17］为埃格蒙所引用，同上引书，第 100 页，它们在 H. H. 威尔逊编辑的《摩诃婆罗多》，第 9 卷，第 53—54 页和《毗湿奴往世书》中提到过，加尔各答，1961 年，第 157—158 页。

［18］原始手稿保存在吉尔吉特地区公共图书馆，洛里默出版了手稿摘要，见 I. 马勒·斯代勒莱克特编：《关于达尔德斯坦（巴基斯坦）的人种学材料——来自 D. L. R. 洛里默的遗作笔记：传说 I，罕萨》，格拉茨，1979 年，第 290—303 页。

［19］同上，第 303 页。

［20］奥雷尔·斯坦因：《沿着亚历山大抵达印度河的足迹》，伦敦，1929 年，第 13 章。

［21］F. H. L. 埃格蒙，同上引书，第 103 页。

［22］H. C. 雷乔杜里：《古代印度政治史》，加尔各答，第 6 版，1953 年，第 298、304、309 页。

［23］奥雷尔·斯坦因：《卡兰纳的“诸王流派”》，德里再版，第 1 卷，第 47 页。

［24］G. M. 邦加德·莱文：《印度的孔雀王朝》，新德里，1985 年，第 83 页。

［25］U. N. 科夏尔引用自《印度的完整历史，孔雀王朝和斯塔瓦哈纳斯（Stavahanas）》，马德拉斯，1957 年，第 434 页。

［26］同上，第 4 页。

［27］A. 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第 58 页。

［28］沃特斯·托马斯：《玄奘的印度游记》，德里再版，1973 年，第 2 卷，第 294 页。

［29］塔玛拉·塔尔布特·拉伊斯：《西徐亚人》，伦敦，1972 年。

［30］范·洛惠泽恩－德·黎乌：《西徐亚人时代》，莱顿，1949

年，第7章；K. 沃尔顿·多宾斯：《塞人和巴列维人的铸币及铭文》；《印度—伊朗边境的政治编年史和地理学》，公元前130年到公元后70年，A. N. U. 的博士论文，1972年。

［31］K. A. 尼拉甘塔·萨斯特里：同上引书，第191页。

［32］A. D. H. 比瓦尔：《塔克西拉的毛伊斯：关于其抵达路线和政治忠诚》，J. C. A，第7卷第1期，1984年7月，第5—15页。

［33］参见A. 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第96—98页，第72—74页的彩图。

［34］同上书，图78（疑指彩图7和彩图8——译者）和第100—102页；该铭文使用的语言有相当缺陷，因为其意义令人非常困惑。在许多早期版本中如《吉拉斯》中，我把瞿沙密陀罗误认为卡卡的儿子，而在仔细思索后我认为正好相反，卡卡是瞿沙密陀罗的儿子。卡卡与沙摩陀罗色那的关系不清楚，但显然他所处年代较早，因为他的骨灰很可能埋在已建好的坟墓里。

［35］同上书，第80页。

［36］同上书，第85页。

［37］同上书，第87页。

［38］S. 戈诺：《铭文集的含义：佉卢文铭文》，加尔各答，1929年，第28—29页。

［39］G. 富斯曼：《吉尔吉特的铭文》，B. E. F. E. O，1978年，LXV分册，第52—54页。

［40］A. H. 达尼：《罕萨灵岩》，J. C. A，第8卷第2期，1985年12月，第5—124页。

［41］约翰·马歇尔爵士：《塔克西拉》，第137页。

［42］详见B. N. 穆克吉的著作《阿格里巴的一份资料：对印度帕提亚人历史的研究》，加尔各答，1969年，第110—113页。

［43］A. 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第66、73页的彩图。

［44］A. H. 达尼：《罕萨灵岩》，J. C. A，第8卷第2期，1985年12月，第19、27页。

[45] 同上，第9页。

[46] 同上，第14页。

[47] S. 戈诺：同上引书，第79—81页；第4幅图见普朗·戈帕尔·保罗1986年的论文《克什米尔的早期雕刻作品》。

[48] 帕斯卡尔·恰托巴底亚耶：《贵霜时代——货币研究》，加尔各答，1979年，第36—37页。

[49] 引用自A.K. 纳拉因著：《印度与希腊》，牛津，1957年，第131页。

[50] B.N. 穆克吉：《贵霜谱系》，加尔各答，1967年，第2章。

[51] 参见A.L. 巴沙姆编辑的《关于迦腻色伽时期的论文》，莱顿，1988年。

[52] A.H. 达尼：《罕萨灵岩》，第25页。

[53] 同上，第24页。

[54] 同上，第25页。

[55] A.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第113、114页。

[56] G. 富斯曼：同上引书，第31页。

[57] A.H. 达尼：《罕萨灵岩》，第20—21页，在这里引用的所有数字请参考该文。

[58] G. 富斯曼：同上引书，第16、17、30页。

[59] S. 戈诺：同上引书，第4页。

[60] S. 戈诺：同上，ixxi－ixxxii页。

[61] 塞缪尔·比尔：《西域记：西方世界的佛教记载》，德里再版，1969年，第56—58页。

[62] K.A. 尼拉甘塔·萨斯特里，同上引书，第237—238页。

[63] B.N. 穆克吉：《贵霜谱系》，加尔各答，1967年，第86—87页。

[64] 同上书，第89页。

[65] 理查德·N·弗赖伊：《波斯传统》，克利夫兰，1963年，第205页。

[66] 参见 R. C. 马章达尔和 A. S. 阿尔特卡：《瓦喀塔卡—笈多时代》，贝那勒斯，1954 年，第 19—22 页。

[67] H. 胡姆巴克：《有关（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的粟特铭文的普通和比较考古学成果》（德国考古研究所），Bd. 2，1980 年，第 201—228 页；尼古拉斯·西姆斯·威廉斯：《关于上印度河的粟特铭文的初步报告》，《巴基斯坦考古学》第 10—22 期（1974 年—1986 年），卡拉奇，1986 年，第 196—202 页。

[68] A. H. 达尼：《喀喇昆仑公路沿线人类文明遗迹》，伊斯兰堡，1983 年，第 81 页。

[69] A. 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第 70 页。

[70] 塞缪尔·比尔：同上引书，xxix－xxx 页。

[71] 参见 A. H. 达尼：《巴基斯坦社会杂志》，第 9 卷第 1 期，1964 年 6 月，第 14 页。

[72] A. 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第 72 页。

[73] K. A. 尼拉甘塔·萨斯特里：同上引书，第 252 页。

[74] 所有参考文献详见阿特莱伊·比斯瓦斯著：《匈奴人在印度的政治史》，德里，1973 年，第 220—236 页。

[75] W. M. 麦高文：《中亚古国史》，1939 年，第 103 页。

[76] 阿特莱伊·比斯瓦斯，同上引书，第 2 章。

[77] 同上，第 1 章。

[78] 同上，第 49—52 页。

[79] J. W. 麦克林德尔：《古典文学中描述的古印度》，新德里再版，1979 年，第 165 页。

[80] 同上，第 163—164 页。

[81] 阿特莱伊·比斯瓦斯：同上引书，第 74 页，脚注 5。

[82] 塞缪尔·比尔：同上引书，xcix－c 页。

[83] D. C. 西尔卡尔：《与印度文明史有关的铭文选》，加尔各答大学，1942 年，第 400—402 页。

[84] 阿特莱伊·比斯瓦斯：同上引书，第 55 页。

[85] 塞缪尔·比尔：同上引书，xc－xcii 页。

［86］同上，xc 页。

［87］同上，xclll 页。

［88］参见阿特莱伊·比斯瓦斯给出的完整论据，同上引书，第135—138 页。

［89］塞缪尔·比尔：同上引书，第 135 页。

［90］A. 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第 58 页。

［91］奥雷尔·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 1 卷，第 37—41 页。

［92］A. 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第 72 页。

［93］同上，第 74—78 页。

［94］A. H. 达尼：《罕萨灵岩》，J. C. A，1985 年 12 月，第 34—38 页。

［95］马雍：《罕萨灵岩关于大魏使的汉文铭文》，《巴基斯坦考古学》，第 10—22 期，1974 年—1988 年，第 201—221 页。

［96］D. C. 西尔卡尔：《印度铭文》，1963 年，第 44 页。

［97］阿特莱伊·比斯瓦斯，同上引书，第 134 页。

［98］奥雷尔·斯坦因爵士在其文章《穿越帕米尔和兴都库什的中国探险活动》中根据汉语文献资料对整个情形作了一个完美概括，《地理学》杂志，第 9 卷，1922 年，第 131 页。

［99］奥雷尔·斯坦因：《卡兰纳的“诸王流派”》，第 1 卷，第 87 页。

［100］参见 G. 杜齐教授：同上引书，第 74—75 页。

［101］奥雷尔·斯坦因：《卡兰纳的“诸王流派”》，第 1 卷，第 281 页，第 339—340 页。第 2 卷，第 192、224、226、227、228 页。

［102］同上，第 224 页，第 8 篇，第 2843 联。

［103］同上，第 339 页，脚注 912。

［104］参见 G. 杜齐教授：同上引书，第 74 页。

［105］O. V. 希努贝尔：《北巴基斯坦的王室铭文》，J. C. A，第 8 卷第 1 期，1985 年 7 月，第 59—67 页。

［106］G. 摩根斯迪恩：《伊朗—达尔德语》，威斯巴登，1973 年，第 242 页。

［107］G. 富斯曼：同上引书，顺序号码是 23.3、26.3、27.2 和 27.6。

［108］参见第 1 章讨论“钵露罗”一词出处的部分。

［109］比较 G. 杜齐：同上引书，第 73 页。

［110］N. N. 杜塔和沙尔玛：《吉尔吉特手稿》，第 1 卷，德里，第 2 版，1984 年，前言，第 40 页。

［111］G. 杜齐：同上引书，第 72 页。

［112］N. P. 杰格拉瓦尔迪：《巴托拉提婆的哈屯铭文》，第 30 卷，1953—1954 年，第 226—231 页。

［113］A. H. 达尼：《罕萨灵岩》，J. C. A，第 8 卷第 2 期，1985 年 12 月，第 35—37 页。

［114］奥雷尔·斯坦因：《古代和阗》，牛津，1907 年，第 1 卷，第 7—17 页。

［115］奥雷尔·斯坦因：《公元 747 年中国远征帕米尔和兴都库什》，《英国地理学刊》，第 59 卷第 2 期，1922 年，第 129—130 页。

［116］J. D. 邓肯：《夏季穿越西部西藏的旅行》，伦敦，1906 年，第 295—305 页。

［117］奥雷尔·斯坦因：《卡兰纳的“诸王流派”》，第 90 页。

［118］A. 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第 84 页。

［119］A. H. 达尼：《罕萨灵岩》，J. C. A，第 8 卷第 2 期，1985 年 12 月，第 50—51 页。

［120］同上，第 54 页。

［121］V. 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卡拉奇再版，1980 年，参见突厥那一部分。

［122］奥雷尔·斯坦因：《克什米尔古代地理研究》，它作为《卡兰纳的“诸王流派”》的附录出版，第 2 卷，第 435 页，第 4 章第 1 节。

［123］《卡兰纳的“诸王流派”》，第 4 篇，第 169 页。

［124］同上，第 4 篇，第 143 联。

［125］同上，第 5 篇，第 152 联。

［126］同上，第 5 篇，第 214—215 联。
［127］同上，第 7 篇，第 167—177 联。
［128］同上，第 7 篇，第 911—920 联。
［129］同上，第 7 篇，第 1171—1197 联。
［130］同上，第 8 篇，第 209—211 联。
［131］同上，第 8 篇，第 614 联。
［132］同上，第 8 篇，第 2450—2470 联。
［133］同上，第 8 篇，第 2761—2764 联。
［134］同上，第 8 篇，第 2842—2843 联。

第六章 中世纪史

引 言

在公元6世纪、7世纪和8世纪，吉尔吉特仍属巴洛拉（Palora）、巴托拉（Patola）或巴洛尔（Balol）家族统治，其国王被称作巴托拉·沙希（Patola Shahi）。他们保护佛教，倡导各种佛教艺术，与中国唐朝的皇帝和克什米尔的统治者——先是匈奴，后来是格尔戈达人，保持着友好的外交关系。他们的国家可能有自己的名称，但中国人的记述称这个国家为Pa-lo-rai，而穆斯林的记载则称其为Bolor。中国人所称的大勃律（Great Bolor）和小勃律（Little Bolor），指的分别是巴尔蒂斯坦和吉尔吉特。对这两个地区使用的是同一个地理名词，很明显说明中国人必须与这两个地区的同一个民族打交道。除了所谓的达尔德人扩张到巴尔蒂斯坦外，我们目前还没有证据证实巴托拉·沙希曾经统治过那里。

公元8世纪左右，吉尔吉特周边的国际政治出现了新的变化。阿拉伯人进入了中亚地区，先后占领了撒马尔罕、塔什干、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等地，在该地区的非穆斯林突厥人中掀起了很大的动荡。吐蕃人也经由巴尔蒂斯坦和吉尔吉特进入了这一多事之地。克什米尔著名的格尔戈达统治者拉利达迪蒂亚·穆克塔皮陀及时利用了这种局面，

小心翼翼地与中国人保持着友好关系。巴托拉·沙希成了一个危险的职位。这时候，突厥人向唐朝皇帝寻求保护，中国人迅速穿过小帕米尔去救援突厥人和巴托拉·沙希。吉拉斯的岩石上刻的突厥王子从撒马尔罕逃亡图，说的就是当时的情形。[1]唐朝的马匹和中国文字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被刻到了吉拉斯的岩石上。[2]公元750年前后，吐蕃人被打败，中国人在吉尔吉特重新确立了巴托拉·沙希。但是，公元751年阿拉伯人在对中国的怛逻斯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可惜的是，这一胜利的全部结果现在已很难知晓。

因为这一事件的影响，中国人在西域的地位被削弱了。然而，由于伊斯兰哈里发权力结构的变化，阿拉伯人地位的上升并没有得到巩固，巴尔蒂斯坦的权力落到了吐蕃人手里。在斯卡杜附近的门特尔，[3]可以看到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镌刻的大量喇嘛教岩画和藏文。最后一位在罕萨灵岩[4]上刻下藏文的巴托拉·沙希是斯里·提婆·旃陀罗·维克拉玛迪蒂亚（Sri Deva Chandra Vikramaditya）。紧随其后的是特拉卡（Trakha，突厥）统治者，[5]还有三位突厥首领[6]也被刻在这块岩石上。尽管拉利达迪蒂亚·穆克塔皮陀宣称他在喜马拉雅北部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在这块圣石上却没有任何关于克什米尔统治者的记述。从这些资料可以明显看出，在吉尔吉特地区的权力争夺中，被逐出泛帕米尔地区的非穆斯林突厥人结束了拉利达迪蒂亚·穆克塔皮陀的统治，开辟了新的历史进程——这保持了他们在整个中世纪的强大地位。吉尔吉特的中世纪史，讲的就是突厥国王如何向不同地方扩张，又如何融入了这一地区的。

不幸的是，这一地区的中世纪历史并没有被完好地记载下来。原始资料极为贫乏，仅在民间传说中保留了一些对往事的记忆。借助搜集到的部分民间传说，人们对其进行加工整理，来重构当时的历史情形。就像对近代一些事件的陈述那样，尽管充满了各种细节的说明，但仍不免有所夸张。因此，人们对早期历史的回想重构依然处于一种含糊不清的状态之中。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告诉我们，权力是通过一种怎样的方式从早期的统治者转移到中世纪的国王手中的。我们也不了解，那些新征服者信奉的宗教究竟是什么。现有的历史回忆说的是那

些统治者已经信奉伊斯兰教很久以后的事，时间要晚得多。这很容易使人们认为，他们一开始就是穆斯林。民间传说也只提到了早期统治者所信奉的佛教和新国王所信奉的伊斯兰教这两大宗教。这种过分简单化的观点看来并非是真的。就像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按照传统的说法，中世纪吉尔吉特最早的统治者与阿拉伯人进犯时萨珊王子阿祖尔·贾姆希德（Azur Jamshed）[7]的流亡有关。如果这种说法有一些真实的成分，那么吉尔吉特中世纪的统治者至少在开始时信奉的是琐罗亚斯德教。另一些证据来自许多遗留的“拉伊桑的拱北”（Gumbad-i-Raisan）[8]——一种将尸骨挖出再进行合葬的方式。直到19世纪，信奉了伊斯兰教的统治者仍然遵守着这种古老的风俗。将死者的尸骨挖出，随后再加以合葬的做法属于琐罗亚斯德教的仪式。更为重要的是该地区伊斯兰教出现[9]的历史证据。对此，我们可以引用的最早文献是两段阿拉伯文字，[10]它们隐隐约约地提到了哈里发阿巴斯时期（公元813年—833年）伊斯兰教在瓦罕、钵露罗和吐蕃的传播情况。但是，如果像《世界境域志》[11]一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当地的统治者都是太阳神的信奉者，这些文献也就没有什么历史真实性了。阿尔·比鲁尼（Al Biruni）[12]也将当地统治者称为“帕塔瓦尔央”（Bhattavaryan），即“英勇的斗士”，而这种称呼通常为非穆斯林国王所用。鉴于大量此类事实，很难接受后来传说中的看法，即这些统治者一开始就是穆斯林。下面将考察这些统治者是如何接受伊斯兰教的。

关于中世纪统治者的第二个问题是他们的种族关系。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表明，那种认为他们源于亚历山大大帝或是其他希腊人后代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当地传说也根本没有提到他们的祖先是突厥人。吉尔吉特的统治者自己认为他们源于塔拉汗（Trakhan）[13]王朝，可突厥语中却没有Trakh一词。该词源于吉尔吉特统治者托拉·汗（Torra Khan）的名字。与此类似，巴尔蒂斯坦的哈伯罗统治者被称为叶护，这是突厥语对统治者的称谓，但却没有任何关于他们是突厥人的回忆，尽管有一种习惯看法[14]认为其中的一些人来自叶尔羌。斯卡杜的统治者称自己为“默格本”（Makpon，或Maqpon）——这可能是藏族的称谓，意思是“部落首领”——但他们的祖先却是一个名叫

伊卜拉欣（Ibrahim）的克什米尔年轻人。同样的，本属于僧金·阿里（Sangin Ali）家族的奇特拉尔统治者将自己的祖先追溯至莫卧儿皇帝巴布尔的一个儿子，但人们却更多地根据僧金·阿里的孙子[15]穆赫塔里姆·沙·格多尔（Mohtarim Shah Kator）的名字将他们称之为格多尔·沙。诸如此类的各种事例，只是为新上台的统治者认祖归宗而在事后所做的一种尝试。虽然这些统治者与当地人并不相融，但要给人一种他们是属于当地人的印象。因此，他们讲当地的语言，参加当地的各种节日和仪式。事实上，这些统治者的一个重要做法即是把王子送给当地的部落首领，让他们连同自己的孩子一起抚养。这样，未来的王子就会对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有了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在那些一同玩耍长大的人中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

统治家族与部落寡头

根据现有的民间说法，主要的统治家族可以归结到两个地区。第一是吉尔吉特分区（Gilgit sub-region），包括吉尔吉特、纳格尔、罕萨、布尼亚尔、亚辛、吉泽尔甚至奇特拉尔，也包括戈尔（Gor，戈赫尔阿巴德）、吉拉斯、达丽罗、丹吉尔、哈尔班和科希斯坦（包括贾尔戈德、巴坦和戈拉伊）。第二是巴尔蒂斯坦地区，包括斯卡杜、哈伯罗、希格尔、隆多、阿斯托尔、卡拉策、图尔迪，直至格尔吉尔和德拉斯，最后这两个地方现属印控克什米尔。尽管我们确实听到过这两个分区之间有过通婚关系，甚至还发生过战争，但它们的历史却有些不一样。巴尔蒂斯坦的历史，一方面与拉达克和西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莫卧儿的记载中它被称为小西藏（Tibbat-i-Khurd），另一方面从莫卧儿皇帝阿克巴开始，它又与克什米尔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吉尔吉特分区的历史则与巴达克山和喀什噶尔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只是偶尔与克什米尔的历史有关。莫卧儿的历史书中很少提到这一分区，只是在谈及莫卧儿王朝的援助情况时，才会看到这一地区（尤其是纳格尔）的一些流亡统治者的情况。上面所提到的那些部落与普什图语地区的部

落在本质上几乎完全不同，他们讲的是希纳语，其中有些还操科希斯坦诸语言。众所周知，在历史早期，除了佉沙人（Khasas）中唯一的"加纳"（Gana，部落政府）外，他们基本上一直都处在君主独裁统治之下。因此，他们是如何拥有这些部落特征的，便成了难解之谜。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这些地区的清真寺附近有好几处用于"吉尔加"（Jirga①）会议的木制讲台。但是，除此之外，这一部落的风格特征与普什图部落似乎并不一样。尽管我们对这些部落的历史知之甚少，但其中一些对其邻近统治者的历史形成，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在英国统治期间得以为人所知，而没有成为亚吉斯坦（Yaghistan，即"未知地区"）。

现将各统治家族的历史依据群体的不同分列如下：

A.（一）吉尔吉特的塔拉汗（Trakhan）家族
（二）纳格尔的玛格罗特（Maglot）家族
（三）罕萨的阿亚希（Ayash）家族

B.（一）奇特拉尔的格多尔（Kator）家族
（二）亚辛和马斯图季的胡什瓦格特（Khushwaqt）家族
（三）布尼亚尔的布鲁沙依（Burushai）家族

C.（一）斯卡杜的默格本家族
（二）隆多、阿斯托尔、格尔德赫夏（或卡拉策）和图尔迪的罗阇家族
（三）希格尔的艾玛贾（Amacha）家族
（四）哈伯罗的叶护（Yabgu）家族

本章我们将考察直至约19世纪中期的历史。当时，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亡，次大陆的历史来到了一个全新的转折点。英国以殖民力量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权，面对沙皇和中国的领土要求，英国极力在这个地区为其帝国划定一条新的边界。

① 决定部落重大事务的部落代表会议，有时亦以此形式裁决部落内部或部落之间的纠纷。——译者

A（一）吉尔吉特的塔拉汗家族

这是中世纪吉尔吉特分区的主要统治者。下面我们将看到，纳格尔和罕萨的统治者都由他们延伸而来，亚辛、布尼亚尔和奇特拉尔的统治者也和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西部的戈尔（戈赫尔阿巴德）、吉拉斯、达丽罗、丹吉尔、哈尔班和巴希格尔（Bashgal，即努里斯坦）部落区在历史上也与他们有着联系。巴尔蒂斯坦的历史虽然在一些方面与吉尔吉特保持有联系，但它所起的作用却是独一无二的。

在整个中世纪，吉尔吉特一直是这一地区的首府。赫希默杜拉·汗[16]的说法——这一城市原先叫作萨尔江（Sarjan）或萨尔干（Sargan），后来被改称为吉里特（Gilit）——是错误的。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看到，这一城市原先的名字就叫吉尔吉特，当地人可能约定俗成地将它念成了吉里特。从哈屯岩刻[17]和其他一些记载中我们了解到，萨尔干是一个官方的称谓。

由于赫希默杜拉·汗书中的这一部分是根据他过去所做的不完整的笔记，在勒克瑙写成的，没有作进一步的复核，所以对吉尔吉特历史的记述[18]显得过于简略，而且有些错误。书中给出的年代完全出自想象，关于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传播情况的结论也经不起其他证据的验证。因此，在使用其材料时需格外小心。吉尔吉特统治者的后裔，沙·拉伊斯·汗在搜集了其家族的所有材料后，用乌尔都文写了一部《吉尔吉特史》。[19]该书称颂了他的祖先，但对吉尔吉特邻近地区的统治者却没有什么好话。下面的叙述主要依据该书。不幸的是，它有些片面，读起来像是一部塔拉汗家族的赞美诗（Prasasti）。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应参照当今欧洲学者的著作来核实其中的一些事件。

沙·拉伊斯王朝

关于吉尔吉特最后一位佛教统治者的名字，当地人没有什么分歧，都称其为斯里·巴达德（Sri Badad）或斯里·巴达特（Sri Badat）。对此，洛里默[20]从历史方面给出了两种解释。赫希默杜拉·汗则认为，他与吉尔吉特附近卡尔加（Kargah）谷口的佛像和布尼亚尔的佛像（图 17）——可能是布布尔（Bubur）的佛像，现收藏于吉尔吉特助理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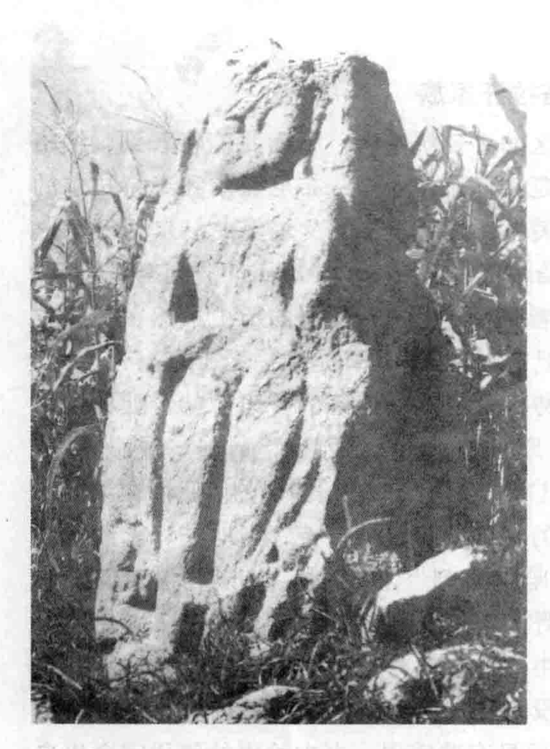


图 17　布布尔的雕有佛陀立像的锥体花岗石，公元 8 世纪。

察总监阿里・艾哈默德・江（Ali Ahmad Jan）家中——有关。但这种联系没有任何根据，因为这些藏族风格的佛像很可能是藏族人占领吉尔吉特的时期雕刻成的——在斯卡杜附近的门特尔也发现了类似的雕像。

赫希默杜拉・汗[21]还谈及一位名叫阿加尔特姆（Agartham）的吉尔吉特统治者。据说，他死于驻巴尔蒂斯坦拉姆戈伊（Lamkoi）的一位驻扎官阿布德加莫（Abudgamo）之手。杀死阿加尔特姆之后，阿布德加莫和他的儿子斯里・巴加尔特姆（Sri Bagartham）侵占了吉尔吉特。他死后，斯里・巴加尔特姆成功地登上了吉尔吉特的王位。数代之后，斯里・巴达特成了吉尔吉特的国王，据说其王宫就在吉尔吉特南面不远的山上。虽说他是一位佛教徒，但却极为残忍，因此，当地人民都想除掉他。这一朝代被称为沙・拉伊斯（Shah Rais）。

另一方面，洛里默认为沙・拉伊斯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是格萨尔（Kiser，或 Giser），其子为巴加尔特姆，其孙为阿古尔・特姆（Agur Tham）。沙・拉伊斯王朝最后一位国王的儿子是斯里・巴达特。洛里默进一步补充道："阿古尔・特姆将自己的女儿放在了他在吉尔吉特河中部的一块巨石上所建的堡垒中。当今的人们仍将这块巨石称为阿古尔・特姆之石。"

洛里默的解释源自吉尔吉特的传说，沙・拉伊斯・汗的历史著作

也是这样记载的。但沙·拉伊斯·汗在其书中补充道，格萨尔是拉达克罗阇的儿子；他在征服了吉尔吉特后，委任其子巴加尔特姆作为国王；巴加尔特姆的儿子是阿加尔特姆，其孙子为斯里·巴达特。

传说中的历史听起来比现实更为浪漫。然而，由其他历史材料形成的说法也讲得通。本书上一章中给出的梵文岩刻就提及了吉尔吉特的巴托拉·沙希王朝。该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是伐杰拉迪蒂亚南迪，随后继任的统治者都有维克拉玛迪蒂亚的头衔。对巴加尔特姆这一传统的名字，人们可以将其看作 Bagra 或 Vajra。“特姆”一词当然就是 Thum，在当地语言中指统治者。这样，Bagartham 和 Vajraditya 两个词看起来就是一个词，是一样的。第二位统治者阿加尔特姆也可以被看作一个通用的称谓 Vikrama，即 Vakram，或 Vakr，或 Agar。传说中只保留了一位统治者的名字，但文字记载却提到了不止一个。根据罕萨灵岩[22]上的文字记述，这一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是旃陀罗·斯里·提婆·维克拉玛迪蒂亚（Chandra Sri Deva Vikramaditya），他应该就是 Sri Badad。根据文字记载，Sri Badad 为人所知的最后时间是公元749 年。

权力的转移

赫希默杜拉·汗在书中还谈到了阿祖尔（Azur），他是塔拉汗家族的“拉伊斯”（Rais①）。据说，他在包括胡斯劳·汗（Khusro Khan）和沙姆谢尔（Shamsher）在内的三个儿子的陪伴下从斯卡杜侵入罕萨和纳格尔，又从罕萨和纳格尔侵入吉尔吉特。斯里·巴达德（Sri Badad）据说就是被沙姆谢尔用箭射死的。后来，沙姆谢尔成了吉尔吉特的国王，与斯里·巴达德的女儿努尔·巴赫特（Nur Bakht）结了婚。在传说中，阿祖尔一家一开始就是穆斯林，但赫希默杜拉·汗认为这不是真的。不过，他注意到传说中在沙姆谢尔当政期间（他提出的年代是公元 1120 年—1160 年），出现了六位穆斯林圣徒。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赛义德·沙（Sayyid Shah）、布里亚·瓦里（Burya Wali）、赛义德·苏丹·阿里（Sayyid Sultan Ali）、赛义德·沙·瓦里（Sayyid Shah

① 意为首领。——译者

Wali)、赛义德·沙·阿夫扎尔（Sayyid Shah Afzal)、赛义德·沙·阿赫塔尔（Sayyid Shah Akhtar）和赛义德·米尔·伊卜拉欣（Sayyid Mir Ibrahim)。

在洛里默的两种解释中，斯里·巴达特（或斯里·巴达德）生来就是一位天神，并有一个名叫努尔·巴赫特的女儿。后来他染上了吃人肉的恶习，这使人们极为憎恨。在丹尤尔山（Danyor Koh）上还有其他具有天神血统的家庭，其中就有阿祖尔·贾姆希德和他的两个兄弟。努尔·巴赫特的奶父也住在丹尤尔。当阿祖尔·贾姆希德被他的兄弟遗弃后，努尔·巴赫特的奶父接纳了他。后来，阿祖尔·贾姆希德被引见给国家元老和努尔·巴赫特。努尔·巴赫特一见倾心，与他秘密结了婚。斯里·巴达特在火灾中丧生后，阿祖尔·贾姆希德成了吉尔吉特的国王。

沙·拉伊斯·汗同意洛里默对吉尔吉特历史的解释。在他笔下，阿祖尔·贾姆希德是伊朗自瑙谢尔旺（Nausherwan）传下来的一位基扬王子（Kiyani Prins)。伊朗国王被阿拉伯人击败后，王子逃亡到吉尔吉特寻求保护。在丹尤尔，王子遇到了斯里·巴达德的首相。首相联合其他四位大臣——欣人部落的阿尔德明（Ardmin)、雅希昆部落的沙尔贡（Sharokun)、欣人部落的布达斯（Bodas）和王室部落的卡贾特（Khachat)，让阿祖尔·贾姆希德与努尔·巴赫特可敦（Nur Bakht Khatun）结了婚。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但这个孩子被放在一个木箱里，沿吉尔吉特河漂走了，因此斯里·巴达德并不知道有这个孩子出生。接下来，斯里·巴达德被杀，阿祖尔·贾姆希德登上了王位。[23]

关于阿祖尔·贾姆希德的传说并没有被任何已知的历史记录所证实，但权力从佛教徒手中转移到突厥统治者手中却是被文字所确证了的。按照传说中的说法，权力的继承是通过血缘关系而不是征服完成的。这种政治继承学说贯串了吉尔吉特的整个中世纪。

塔拉汗王朝及其早期统治者（第一阶段，至公元977年）

根据赫希默杜拉·汗的说法，塔拉汗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是沙姆谢尔，但沙·拉伊斯·汗认为是基扬王朝的沙·阿祖尔·贾姆希德。沙·拉伊斯·汗还谈到了沙·阿祖尔·贾姆希德统治下塔拉汗王朝自公元

643年—659年间共16年的繁荣昌盛：疆土从包括巴希格尔（Bashgal）的奇特拉尔到北部的帕米尔，从巴达克山到班迪布尔（Bandipur），包括吉拉斯、达丽罗、哈尔班、丹吉尔、巴希卡尔（Bashkal）、乌舒（Ushu）和卡拉姆（Kalam）等部落区。公元659年，沙·阿祖尔·贾姆希德在五位大臣面前把王位交到努尔·巴赫特可敦手中后离开了。

努尔·巴赫特可敦在位9年（公元659年—668年）。幸运的是，她早年所生的儿子在克什米尔一个叫古杜斯（Gudus）的珠宝商家里找到了，珠宝商为他起了个名字叫卡尔克（Kark）。公元668年，努尔·巴赫特可敦把王位传给爱子，卡尔克（或Garg）罗阇成了吉尔吉特的新国王。阿祖尔·贾姆希德走后再也没有回来，但他的儿子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吉尔吉特的王位。罗阇卡尔克的模样很像他的外祖父斯里·巴达德。他在位55年，死于公元723年。他的儿子绍·马立克（Sau Malik）罗阇在40岁时继承了王位。绍·马立克正义善治，在位70年，于公元793年去世。根据沙·拉伊斯·汗的说法，正是在绍·马立克统治期间，伊斯兰教由赛义德·沙·阿夫扎尔（于公元725年到达吉尔吉特）从巴达克山传入这里。但是，只有王室接受了伊斯兰教，普通百姓依然是非穆斯林。绍·马立克罗阇有许多王后，但没有子嗣。后来在赛义德的祈祷下，沙·贝古姆（Shah Begam）王后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沙·马立克，又被称为格里特·卡里卡（Glit Kalika，也许是Glit即Gilgit的Kalika或Malik）。这个孩子的全部教育都来自赛义德。格里特·卡里卡（或马立克）有一个名叫巴里·汗（Bari Khan）的奶兄弟，后来担任了亚辛的收税员，当时亚辛的实际统治者是格里特·卡里卡的姐夫沙·法尔迈希（Shah Farmaish）。这样，在亚辛建立了国家，修建起堡垒。

上面的说法与赫希默杜拉·汗的解释完全不同。沙·拉伊斯·汗也谈到了公元700年至800年间鞑靼（Tatar）对吉尔吉特的侵略。巴里·汗利用在亚辛新建的堡垒，一面进行防御，一面向吉尔吉特求援。沙·马立克带着他的军队向达尔科特进军，追击鞑靼人。战斗中，他的坐骑受伤而死，王子本人也失去了知觉。鞑靼人抓住了王子，将其带回塔什干关押了8年。8年后，他从塔什干逃脱，返回了亚辛和吉尔

吉特，他的父亲和百姓为之欢欣鼓舞。

其他任何史书上都没有记载鞑靼人对吉尔吉特的入侵，但对中国人公元750年的入侵抑或是后来阿拉伯人在哈里发艾尔·马蒙（Al-Mamun）时期的征服却有一个模糊的记忆。从目前的资料看，很可能是后者——希吉来历199年/公元814年—815年发生的阿拉伯人对吉尔吉特的征服。实际上，正是喀布尔·沙（Kabul Shah）的这次征服使他与这一地区的统治者结成同盟。第一章中引述的阿拉伯文铭文[24]谈到了阿拉伯人在Bukhan（瓦罕）和Bilor（Bolor）的胜利以及对Khaqan山地和Tibet山地统治者作战的胜利。看来在这次征服发生时，突厥人已经成了吉尔吉特的统治者。尽管年代无法完全确定，但上面提到的罗阇绍·马立克王朝发生的事件也许已经说到了阿拉伯人入侵的情况。[25]这次入侵第一次将伊斯兰教带到这里。

根据沙·拉伊斯·汗的记载，罗阇绍·马立克统治时期是一个黄金年代。当时的疆土西起奇特拉尔，东至坎巨提（罕萨），南至德拉格巴尔（Tragbal）和班迪布尔，北边越过了博罗吉尔，直达巴达克山。正是在这一时期，吉尔吉特人接受了伊斯兰教——此前国王们敬奉的是火神，平民百姓则是佛教徒。巴希格尔（卡菲里斯坦）的百姓都将罗阇绍·马立克当作精神领袖（“神”）。

110岁时，罗阇绍·马立克将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在随后的12年中，他致力于宗教事务。格里特·卡里卡（或马立克）于35岁登基，公元793年至878年在位。在此期间，鞑靼人再未入侵，天下太平。格里特·卡里卡子女甚多，但全都死亡了。70岁时才有了儿子丹·马立克（Deng Malik）。丹·马立克学习各种艺术和宗教知识，70岁时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于公元879年—932年间当政。他有许多女儿，但只有一个儿子，名叫胡斯劳·汗（Khusro Khan）。胡斯劳·汗于37岁时继承王位，公元932年—997年在位。他喜欢马球和打猎，与巴达克山的一位公主结了婚，于102岁时去世，生有一子海达尔·汗（Haidar Khan）。

赫希默杜拉·汗并没有提到塔拉汗王朝的这些统治者，因而疏忽了吉尔吉特和巴达克山在历史上的密切联系。海达尔·汗结婚后，这

种联系通过友好条款牢固确立下来。巴达克山公主的到来必然导致吉尔吉特的某些社会变化，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得到更多的这方面的信息，尽管在下一时期它所带来的一切影响会被注意到。必须注意的是，这一统治家族不像通常所想的那样来自巴尔蒂斯坦，而是很可能来自北部的巴达克山。第二，伊斯兰教首次在这一地区出现，也来自巴达克山，而不是巴尔蒂斯坦。吉尔吉特与巴达克山之间的这些联系与我们所了解的各种资料非常相符。目前，我们还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吉尔吉特与巴尔蒂斯坦或南部其他地区相联系的历史事件，所提到的德拉格巴尔和班迪布尔很可能只是一种拘于传说的说法。

塔拉汗王朝的第二阶段（公元977年—1241年）

海达尔·汗罗阇在公元977年30岁时继承王位。他身体强壮，有着杰出的管理才能。但斯里·巴达德和罗阇卡尔克（Kark或Garg）已作为吉尔吉特历史上的典范人物矗立在人们心中，时时走进人们的记忆，史家也经常将自己所处时代的统治者与他们进行比较。海达尔·汗亦不例外。在他当政期间，他与坎巨提（罕萨）首领、自己的堂兄沙·哈德姆（Shah Hatam）或沙·特姆（Shah Tham）罗阇有过一次战斗。沙·特姆起先由胡斯劳·汗罗阇派去管理纳格尔和罕萨，在海达尔·汗在位的第19年，他宣布独立，随后遭到海达尔·汗的出兵征讨。战败后，哈德姆·汗（沙·特姆）经由希斯帕尔冰川逃到了巴尔蒂斯坦（参见本章“希格尔的艾玛贾家族”一节）。海达尔·汗在位60年，于公元1057年90岁时去世，其唯一的儿子努尔·汗（Nur Khan）系沙·巴努（Shah Bano）王后所生。

努尔·汗罗阇于公元1057年35岁时继承王位。他是一个极为虔诚的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宗教事务上，而将政务交给大臣们管理。他对政务的漠不关心导致了大臣之间的权力争斗，同时也使国家陷入了困境。面对这种局面，努尔·汗罗阇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力量进行整治。在102岁时，他让位于31岁的儿子沙扎达·沙·米尔扎（Shahzada Shah Mirza）。他先是代表父亲做了三年国王，在努尔·汗于公元1127年105岁时去世时，沙·米尔扎，又称米尔扎一世，正式即位，一直到公元1205年。为重整政务，他撤掉了过去的一些地方官员

（Amil）和大臣，任命了一些新的官员。他于109岁时辞世，31岁的儿子塔尔托拉·汗（Tartorra Khan）接替了王位。塔尔托拉·汗罗阇有两个王后，一个来自王室家族，另一个来自达丽罗。第一位王后沙·贝古姆（Shah Begam）生王子沙扎达·托拉·汗（Shahzada Torra Khan），第二位王后生王子沙·拉伊斯。沙·贝古姆王后去世得早，沙扎达·托拉·汗在霍杜尔河谷由当地酋长的妻子喂养长大。沙·拉伊斯在达丽罗有七个舅舅；他们与沙·拉伊斯的母亲一起，希望沙·拉伊斯能成为下一任罗阇。但塔尔托拉·汗罗阇更偏爱托拉·汗，任命他做自己的继任者。这导致了达丽罗王后和她的兄弟们的不满，他们邀请罗阇去达丽罗打马球，密谋除掉罗阇和王子。但塔尔托拉·汗罗阇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将达丽罗王后的七个兄弟全部杀掉。达丽罗王后十分悲伤，但她再次密谋，毒死了109岁的罗阇，于公元1236年登上王位，在位五年，成为吉尔吉特历史上第二位女王。即位后她决定杀掉王子托拉·汗，但托拉·汗的奶父——霍杜尔部落的酋长，把他送到汗贝里（Khanberi），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把他藏了起来。由于一直抓不到他，女王认为他必定不在人世了。随后，她开始进行各种准备，打算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沙·拉伊斯。但就在这时，她死了——很可能是被毒死的。女王的骤死在两兄弟之间引发了一场争夺王位的战争。最终，人民接受托拉·汗作了罗阇——这一事件反映了人民的力量。

对塔尔托拉·汗的这段历史，赫希默杜拉·汗给予了不同的记述，甚至连年代也不一样。但是，他只注意到从塔尔托拉·汗到达丽罗女王再到托拉·汗的王位继承关系，既没有谈到塔尔托拉·汗的另一位王后，也没有提及兄弟间的王位继承之战。

塔拉汗王朝的第二个阶段时间很长。这一时期，当地人民的力量以及他们的首领成为活动的中心。这些首领来自不同的河谷，参与当地的管理。其中的一些还负责照管王子，把他们带到自己家中。这样，这些吉尔吉特未来的国王熟悉了当地的情况，同时也得到了奶父和奶兄弟们的全力支持。这种瓜葛为吉尔吉特的政治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纳格尔和罕萨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特殊的关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我们第一次听到罕萨的统治者经由希斯帕尔逃到巴尔蒂斯坦，开辟了与巴尔蒂斯坦的新联系。

塔拉汗王朝的第三阶段（公元1241年—1449年）

按照沙·拉伊斯·汗的解释，塔拉汗（正确讲，应是托拉·汗）王朝这个称谓源于托拉·汗的名字。在他之前，这个王朝被称为“基斯拉”（Kisra）或“基扬尼”（Kiyani）。托拉·汗在任期间，他的堂兄沙·拉伊斯·汗罗阇及其追随者离开了吉尔吉特，去巴达克山国王塔杰·莫卧儿（Taj Moghal）那里避难。对塔杰·莫卧儿的统治历史，赫希默杜拉·汗和沙·拉伊斯·汗没有什么分歧，可惜的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历史记录对此加以证实。

沙·拉伊斯认为，在塔杰·莫卧儿统治期间，巴达克山的疆域大为拓展：北边包括了突厥斯坦的大部分地区，西部涵盖了包括赫拉特城（Herat）在内的整个地区，西南延伸至奇特拉尔的边界。据说，塔杰·莫卧儿是伊斯玛仪派信徒，热衷于伊斯玛仪派的传播。他以盛大的仪式接纳了沙·拉伊斯·汗罗阇，并给了他一个体面的职位。由此，沙·拉伊斯及其追随者接受了伊斯玛仪派的教义，沙·拉伊斯还成了塔杰·莫卧儿的女婿。数年后，沙·拉伊斯罗阇说服了塔杰·莫卧儿去入侵吉尔吉特，为此他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塔杰·莫卧儿的军队先是攻克并吞并了奇特拉尔，接着占领了亚辛、戈赫—吉泽尔和布尼亚尔，然后向吉尔吉特进军。托拉·汗除了接受伊斯玛仪派的教义、同意塔杰·莫卧儿提出的条件外，别无选择。于是，沙·拉伊斯成了奇特拉尔的统治者，奇特拉尔的拉伊斯王朝由此建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伊斯玛仪教派在纳格尔和罕萨传播开来，塔杰·莫卧儿在朱迪亚尔（Jutial）建立了“莫卧儿塔”（Moghlai tower），在托尔（Thol）附近开辟了另一条通往罕萨的道路。

要确定塔杰·莫卧儿的身份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巴达克山的历史上并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国王。另一方面，蒙古人在成吉思汗时期对中亚的征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塔杰·莫卧儿当政时期的领土几乎与察合台——成吉思汗四个儿子之一——相同。上文中所犯的唯一错误是把塔杰·莫卧儿说成是一个热诚的伊斯玛仪派信徒。实际上，当

时的蒙古人是佛教徒。在朱迪亚尔和托尔有许多所谓的“塔”——实际上是佛教窣堵波。[26]这一事实表明国王很喜爱这种纪念碑。因此，当时入侵吉尔吉特的很可能是一位蒙古首领，而这次入侵不过是蒙古人领土扩张的一部分。所以，国王的称号应当被纠正为 Tajdar-i-Moghal①之类的称呼。但纳西莱·胡斯劳（Nasir-i-Khusrau）的著作表明，当时伊斯玛仪派已经在巴达克山传播开来。不过，没有证据表明伊斯玛仪派于此时被引入了这一地区。

随后的事情，赫希默杜拉·汗和沙·拉伊斯·汗的论述就不同了。按照赫希默杜拉·汗的说法，在托拉·汗的儿子绍·马立克罗阇执政期间，塔杰·莫卧儿对吉尔吉特发动了第二次侵略战争，绍·马立克罗阇被俘后关押于巴达克山。实际上,赫希默杜拉·汗没有区分出绍·马立克一世与二世，因而混淆了在绍·马立克二世期间发生的这些事件。沙·拉伊斯·汗认为，塔杰·莫卧儿返回后，吉尔吉特的统治者托拉·汗又恢复了什叶派信仰。对此，奇特拉尔统治者沙·拉伊斯·汗很不高兴，便向塔杰·莫卧儿报告了此事。塔杰·莫卧儿又独自入侵了吉尔吉特。托拉·汗罗阇全力以赴进行抵抗，但他在准备期间便去世了，时年 56 岁。他的儿子，24 岁的绍·马立克二世继承了王位，开始了他长达 70 年（公元 1275 年—1345 年）的统治。父亲死后，绍·马立克二世将军队从吉尔吉特堡垒调往戈拉布尔（Golapur）和吉尔吉特河两岸，直达亚辛和达尔科特山口，迎战塔杰·莫卧儿的进攻。虽然沙·拉伊斯·汗也带领奇特拉尔的军队伴随了这次侵略，但他并没有加入到战役中去。经过 8 年的战争，塔杰·莫卧儿被击败，吉尔吉特的军队获胜，他们进入了吉泽尔地区，甚至到了奇特拉尔的边界。绍·马立克二世惩罚了与侵略者站在一起的当地人，这一高压政策造成了吉泽尔人与吉尔吉特人之间的仇恨。

可以将塔杰·莫卧儿对吉尔吉特的两次入侵同克什米尔遭受的两次侵略进行比较：第一次是在公元 1319 年前后萨哈提婆（Sahadeva）王朝时期，杜尔贾（Dulcha）或祖尔久（Zulchu）——可能是一位佛

① 意为“莫卧儿王”。——译者

教徒，入侵了克什米尔。第二次是乌德亚迪蒂亚（Udayaditya）王朝时期（公元1323年—1338年），乌尔迪尔（Urdil）或乌尔旺（Urwan），抑或是阿贾尔（Achal）的入侵。[27]第二次入侵据说是“突厥”军队于公元1326年进行的。[28]据《哈桑史》的记述，[29]当第一次侵略发生时，克什米尔人跑到吉尔吉特避难。实际上，这次侵略是由蒙古人从喀布尔发动的。沙·拉伊斯·汗说，绍·马立克二世与克什米尔的贾姆希德·苏丹（Jamshid Sultan）是同时代人，他帮助后者反抗阿富汗的统治者。实际上，绍·马立克二世在位时间很长，是包括萨哈提婆及其王后戈达拉尼（Kota Rani）、乌德亚迪蒂亚、沙·米尔和贾姆希德·苏丹在内的许多克什米尔统治者的同时代人。如果是他提供了帮助的话，必然是抵抗杜尔贾或祖尔久侵略的那一次，据说那时克什米尔难民逃到了吉尔吉特。蒙古人在该地烧杀掳掠，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

公元1326年的第二次侵略应被视作克什米尔历史上的里程碑，因为它导致了沙·米尔的出现和克什米尔独立的穆斯林苏丹国的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吉尔吉特的塔拉汗家族开始向南方寻求支持和帮助。幸运的是，南边的两个地区在蒙古人侵略的时候救了他们。自那时起，吉尔吉特和克什米尔两个地区的统治者结下了亲密的关系。

公元1345年，罗阇绍·马立克二世的儿子、40岁的吉里斯·汗（Chilis Khan）罗阇继承了父亲的王位，直至公元1359年退位。在克什米尔，与绍·马立克二世同时代的是强大的苏丹希哈布·乌丁（Shihabuddin，公元1354年—1373年）。他向北扩张到了巴达克山，似乎吉尔吉特也要向他俯首称臣。但征服没有继续下去，据吉尔吉特的资料记载，吉里斯·汗王公与苏丹希哈布·乌丁——沙·拉伊斯错误地将他当成沙·米尔——互相联络，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吉里斯·汗在任期间，吉尔吉特与突厥斯坦、巴达克山、克什米尔及阿富汗等周边国家的商业贸易活动十分活跃。他与奇特拉尔国王沙·拉伊斯·汗的女儿马立加·哈希姆·贝古姆（Malika Hashim Begam）结了婚。接替沙·拉伊斯·汗王位的是他的儿子沙·江（Shah Jan）。有一种说法认为，吉里斯·汗的大女儿与沙·江的儿子沙赫扎达·汗（Shahzada Khan）结了婚。公元1359年，40岁的罗阇费尔道斯（Firdaus）继承

了父亲吉里斯·汗的王位，在位一直到1397年。由于他对宗教事务的虔诚，被人们称为第二个努尔·汗。他当政期间，从克什米尔引进了大量的工匠和艺人。在他们的帮助下，罗阇费尔道斯奠定了吉尔吉特大堡垒的基础，这座堡垒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费尔道西亚堡（Qila-i-Firdausia，图18）。大堡垒内有一个小堡垒和漂亮的花园，小堡内是居住区、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这座宅邸被称为“画城”，其中还有一个七层的塔——在来自戈赫尔阿巴德的士兵的保卫下，王室的财宝就存放在这座塔内。罗阇费尔道斯还修建了一座由40根立柱架构起来的大厅，内设宝座，称为Nilo Takht（蓝宝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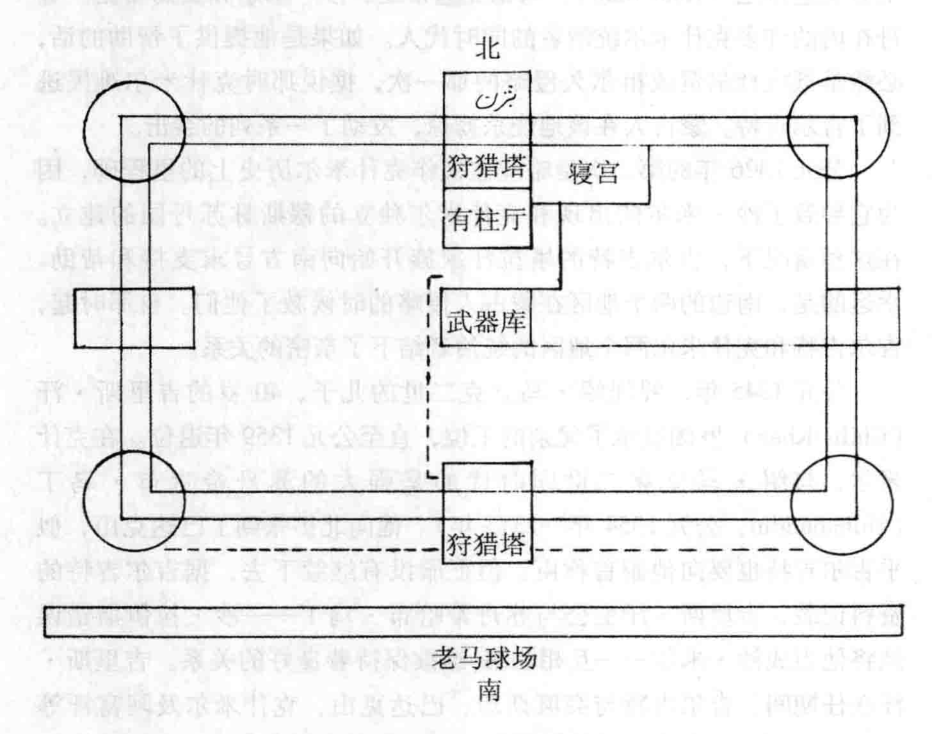


图18 吉尔吉特：费尔道西亚堡平面图

奇特拉尔（Chitral）被划为一个独立的邦，吉尔吉特下辖七个被称为“玛克苏”（Maksu）的行政区，因而被称为“七个玛克苏之国”。第一个“玛克苏”包括切萨尔（Chesar）地区，即上欣地区（Shin

Bala）和从米纳班（Minapen）和印地（Hindi/Hini）村到诺默尔（Nomal）的下欣地区（Shin Payin）；第二个“玛克苏”是吉古玛克苏（Jigu Maksu），包括沙格尤特（Shakyot）村到马纳瓦尔（Manawar）之间的地区和希乌达斯（Shivdas），首府吉尔吉特就位于这个“玛克苏”；第三个“玛克苏”包括巴格劳特（Bagrot）和哈尔毛希（Harmaush）；第四个“玛克苏”包括萨依（Sai）河谷和本吉；第五个“玛克苏”包括戈尔（戈赫尔阿巴德）和吉拉斯；第六个“玛克苏”包括达丽罗和哈尔班河谷；第七个“玛克苏”包括丹吉尔。每一个“玛克苏”都要派卫兵去守护吉尔吉特大堡垒的7个以它们的名称命名的棱堡。费尔道斯罗阇与斯卡杜的统治者特姆·戈里·特姆（Tham Gori Tham）及其儿子斯里·戈里·特姆（Sari Gori Tham）是同时代人。

罗阇胡斯劳·汗二世在30岁时继承了费尔道斯的王位，于公元1397年至1422年在位。据说，他曾在城中微服私访，在了解到官员们的暴政后对百姓所受的苦难进行了补偿。他将费尔道西亚堡主入口处的五层塔加高了两层，把从国外进口的各种武器装备存放在那里，因此这座塔被人们称为“胡斯劳·汗的狩猎塔”（Khusro Khani Shikar），由来自达丽罗河谷的士兵保卫。保卫王宫和王室财宝的是来自戈尔（戈赫尔阿巴德）的士兵。

胡斯劳·汗二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罗阇马立克·沙（Malik Shah），又名罗阇沙二世，另一个是杜拉·沙（Dula Shah）。马立克·沙罗阇在35岁时继承了王位，自公元1422年至1429年在位。较小的杜拉·沙当了军队总司令和国王的首席顾问。杜拉·沙的儿子里利·格希布尔（Lili Gashpur）长得一表人材，由于他有着一张红玫瑰般漂亮的脸庞，在希纳语中被称为玛尔江（Marjan）或卢祖姆（Luzum）。他与国王的女儿舒莫尔·加斯（Shumul Gas）结了婚。杜拉·沙死后，他接任了其职位。他的双胞胎儿子——一个叫贾姆希德，另一个叫萨希布·汗（Sahib Khan）——在出生时背部连在一起，后被妥善分开，健康长大，但两个人却成了死对头。贾姆希德王子非常强壮活跃，但萨希布·汗却十分瘦弱，常向慈爱的爷爷抱怨贾姆希德。因此萨希布·

汗被人们称为“吉尔基斯”（Girkis），在布鲁沙斯基语中意为“老鼠”，而贾姆希德则得了一个“玛格罗特”（Maglot）的绰号，在希纳语中，这个词指的是“雄猫鼬”。

贾姆希德王子被托付给了沙罗特（Sharot）村的村长莫卧儿·贝格（Mughal Beg）——后来成了他的奶父——寄养，萨希布·汗则在戈拉布尔村中长大。马立克·沙罗阇打算把罕萨和纳格尔这两个地方赏赐给两个王子。但他们两个都希望得到罕萨，因为该地与东部的突厥斯坦有着直接的贸易往来。这件事最后委托给了巴格劳特（Bagrot）河谷的奥斯汗达斯（Oskhandas[1]）的一个名叫哈尔贾·玛莫·辛格（Harcha Mamu Singh）的人，由他作为中间人来裁决。结果，萨希布·汗，即吉尔基斯（Girkis），赢得了哈尔贾·玛莫·辛格的偏爱，最终得到了罕萨，纳格尔则给了贾姆希德即玛格罗特（Maglot）。吉尔基斯把格奈希村赏给了哈尔贾·玛莫·辛格，并任命他作自己的大臣，贾姆希德则将自己的奶父莫卧儿·贝格招纳过来作了大臣。这个故事为罕萨和纳格尔两个土邦的形成以及它们之间永无休止的对抗提供了一种神话解释。

上面所勾画的历史与沙·拉伊斯·汗的解释一致，但与赫希默杜拉·汗的说法稍有不同。在这一时期，同克什米尔苏丹之间的关系被牢牢确立下来。虽然我们听说了大艾米尔赛义德·阿里·哈姆达尼在克什米尔，但未获得他在吉尔吉特的任何信息。我们也知道，克什米尔的工匠到了吉尔吉特（图19），但却没有任何关于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在吉尔吉特传播的资料，虽然大艾米尔在巴尔蒂斯坦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塔拉汗王朝的第四阶段（公元1449年—1561年）

这一时期以沙·马立克二世的儿子托拉·汗二世即位开始。托拉·汗二世于公元1449年登上王位，一直统治到公元1479年。他在位期间，继续保持了与克什米尔的良好关系。沙·拉伊斯·汗甚至注意到，吉尔吉特统治者还向克什米尔统治者提供过军事援助。托拉·汗

---

① 疑即下文之Oshkardas，汉译“奥希卡尔达斯”。——译者



图 19　丹尤尔:赛义德・沙・苏丹・阿里夫的修道院(Dargah)及克什米尔风格的塔

二世非常喜爱克什米尔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为此他从克什米尔引进了大批工匠，让他们在基希劳特区（Mohalla Kishrot）定居下来。沙・拉伊斯・汗注意到的第二点是朝臣们对托拉・汗这个名字的嗜爱。根据他的说法，这一名字的继续使用导致了后来对塔拉汗这一王朝名字的接受——它似乎特别昭示了这一王朝的突厥根源。接替托拉・汗二世的是吉里斯・汗二世，他于公元 1479 年 54 岁时即位，一直统治到公元 1497 年。他在位期间，国家太平，与周边国家的商业贸易十分兴旺。他的儿子绍・马立克三世于公元 1497 年 28 岁时继承了他的王位，直至公元 1522 年。他曾周游整个国家，解除了百姓疾苦，因而很受百姓欢迎。

吉尔吉特的第二十二位统治者是罗阇沙・拉伊斯・阿扎姆（Shah

Rais Azam)。他于公元 1522 年 40 岁时即位，统治至公元 1561 年。他曾制定了一个巡游国家的年度计划，该计划如下：

> 1. 在首都吉尔吉特住三个月，在此期间，巡游古雷兹、阿斯托尔、吉尔吉特和布尼亚尔，还去过罕萨和纳格尔两次；
> 2. 冬季三个月住在吉拉斯的拉诺依（Ranoi），巡游各部落区；
> 3. 然后经巴特莱特（Bathret）河谷去丹吉尔，再走访乌舒（Ushu）、卡拉姆、巴希格尔等地，最后去奇特拉尔；
> 4. 在奇特拉尔住三个月，巡游杰格曼塞拉埃（Chakman serai）周围的所有地方和博罗吉尔。

奇特拉尔当时的统治者是沙·纳西尔（Shah Nasir），他是奇特拉尔的第十一任统治者和沙·拉伊斯的后裔。这两位统治者就这样彼此取得了联系。从奇特拉尔出发，沙·拉伊斯·阿扎姆到了亚辛，又到了戈赫—吉泽尔的周边地区和伊希戈曼，最后回到吉尔吉特。

沙·拉伊斯·阿扎姆的第一位王后是奇特拉尔统治者沙·纳西尔的女儿佐哈拉·可敦（Zohra Khatun），萨希布基兰（Sahebqiran）王子即她所生。她的其他许多孩子都死在亚辛，而且全都埋在了亚辛的“拉伊桑的拱北”。就在亚辛及邻近地区，佐哈拉·可敦王后和萨希布基兰王子继承了王位。沙·拉伊斯·阿扎姆的第二位王后是纳格尔统治者和堂兄弟罗阇巴拉·沙（Balla Shah）的姐妹马立加·希姆斯·可敦（Malika Shams Khatun），掌管布尼亚尔、阿斯托尔、古雷兹和各部落区的苏丹·米尔扎（Sultan Mirza）王子即她所生。

巴拉·沙罗阇有两个兄弟，一个是赛夫·汗（Saif Khan），另一个是吉·汗（Ji Khan）。后来，吉·汗造反成功，占据了纳格尔。巴拉·沙和赛夫·汗先是去杰尔特（Chalt）避难，然后经阿斯托尔逃往克什米尔。沙·拉伊斯·汗错误地将这一情况说成是莫卧儿王子沙·贾汉到克什米尔访问。实际上，克什米尔当时执政的是卡齐·查克（Kazi Chak）的儿子格齐·汗（Gazi Khan），据说他曾征服了吉尔吉特和达

拉杜（Daradu）。[30]克什米尔的波斯编年史家总是分别提到吉尔吉特和达拉杜这两个地方，因此它们看来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无论如何，按照沙·拉伊斯·汗的说法，因为他们在克什米尔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纳格尔的这两个逃亡者得到了克什米尔的军事援助。借此，他们返回了纳格尔，夺回了王位，将吉·汗赶了出去。吉尔吉特国王沙·拉伊斯·阿扎姆收留了吉·汗和他的随从，让他们在亚辛定居下来，因此布鲁沙斯基语成了亚辛的通用语言。另一方面，那些克什米尔军人的后裔在哈尔毛希定居下来，他们的后代现在挂有“贾拉尔”（Jarral）的头衔。但这些定居史并没有被任何其他资料所证实。

巴拉·沙王公于53岁时去世。吉尔吉特统治者沙·拉伊斯·阿扎姆的大臣弗拉古（Falaku）前往纳格尔，任命巴拉·沙的儿子罗阇达乌德·沙（Daud Shah）——又名罗阇杜特（Dut）——做了国王。罗阇达乌德在135岁的高龄上去世，王位由40岁的阿里·达特·汗（Ali Dad Khan）罗阇继任。在罕萨，哈里特姆（Haritham）继承了他父亲沙·马立克罗阇的王位。

罕萨罗阇哈里特姆想占有纳格尔，但表面上他显得很喜爱罗阇阿里·达特·汗。在霍贝尔（Hoper）人带着阿里·达特·汗罗阇去希斯帕尔打猎时，哈里特姆罗阇勾结当地的两个大臣向纳格尔发动进攻，阿里·达特·汗逃到了巴尔蒂斯坦。在巴尔蒂斯坦的军事援助下，他从哈里特姆手中夺回了纳格尔。后来，罕萨罗阇哈里特姆的王位由沙巴兹·汗（Shahbaz Khan）罗阇所取代，纳格尔的王位在阿里·达特·汗死后由罗阇格玛尔·汗（Kamal Khan）继承。

在沙·拉伊斯·阿扎姆统治的后期，有一个叫沙·布里亚·瓦利（Shah Burya Wali）的圣人带着两个仆人阿布尔·哈桑（Abul Hasan）和僧格·阿里（Sange Ali，下面将给出另一种解释）从伊斯法罕（Isfahan）经克什米尔到了纳格尔。在他的影响下，纳格尔人接受了伊斯兰教，格玛尔·汗罗阇也将自己献给了赛义德。后来，阿布尔·哈桑留在纳格尔继续传教，沙·布里亚·瓦利则离开纳格尔去了吉尔吉

特。沙赫扎达·米尔扎成了他的门徒。赛义德·萨希布[1]从吉尔吉特又去了奇特拉尔，当时沙·拉伊斯·阿扎姆正在那里，他以极大的敬意欢迎赛义德的到来，并给了他很高的荣誉。赛义德老死奇特拉尔后就埋葬在那里。看来正是因为他的到来，什叶派伊斯兰教才在世界的这个地方得以传播。随后，僧格·阿里也成了沙·拉伊斯·阿扎姆的座上客。由于奇特拉尔统治者沙·拉伊斯·纳西尔没有子嗣，他死后，沙·拉伊斯·阿扎姆便让僧格·阿里管理奇特拉尔（关于僧格·阿里的另一说法参见本章“亚辛和马斯图季的胡什瓦格特家族与布尼亚尔的布鲁沙伊”一节）。后来，沙·拉伊斯·阿扎姆于80岁时故去，就葬在奇特拉尔。他死后，在吉尔吉特的小儿子沙·米尔扎罗阇邀请其兄萨希布基兰做了吉尔吉特的国王，自己则去过一种修道士的生活。

在这一时期，克什米尔继续影响着这一地区，这一地区的内部斗争开始初露端倪。纳格尔的统治者先是向克什米尔而后又向巴尔蒂斯坦寻求军事援助。同时，或许是受沙·布里亚·瓦利的影响，什叶派在这一地区传播开来。僧格·阿里王朝在奇特拉尔扎下了根。

塔拉汗王朝的第五阶段（公元1561年—1635年）

罗阇萨希布基兰，也被人们称为胡斯劳·汗（Khusro Khan），于公元1561年登上王位，在位一直到1567年。他执政期间，罕萨的罗阇沙·贝格（Shah Beg）蔑视吉尔吉特国王的权威。作为吉尔吉特国王的支持者，纳格尔的罗阇沙·格玛尔请缨打击沙·贝格。沙·贝格战败，他的军队被完全击溃（参见本章“罕萨的阿亚希家族”一节给出的另一说法）。上任的第二年，僧格·阿里在奇特拉尔造反，打算进攻吉尔吉特。总司令兼大臣肖曼（Shoman）率军前往与僧格·阿里作战，僧格·阿里战败，但并没有被完全制服（下面的奇特拉尔史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萨希布基兰死后，他的异母兄弟、纳格尔统治者的孙子苏丹·米尔扎二世（Sultan Mirza Ⅱ）于1567年继承了王位，在位至1600年。他生性平和，与斯卡杜统治者迦齐罗阇（或迦齐·米尔）关系十分友好。当国王带着两个年轻的儿子阿里·谢尔·汗（Ali Sher Khan）

[1] 这是对沙·布里亚·瓦利的尊称。——译者

和阿里·海达尔·汗（Ali Haidar Khan）去巴格劳特（Bagrot）和哈尔毛希旅行时，奇特拉尔统治者僧格·阿里再次入侵了吉尔吉特。吉尔吉特国王直接前往斯卡杜，向他的朋友迦齐罗阇求助。不幸的是，迦齐罗阇在一个月前死了。但他的儿子阿里·谢尔·汗率军直达奇特拉尔，打败了僧格·阿里的军队，僧格·阿里再次逃走。关于米尔扎·汗罗阇的情况，除一点外，赫希默杜拉·汗认同沙·拉伊斯·汗的解释。他认为，米尔扎·汗罗阇在逃到斯卡杜后接受了什叶派教义，此后，什叶派教义才在吉尔吉特得以传播。前面我们谈到，什叶派教义是布里亚·瓦利影响的产物。吉尔吉特第二十五位国王是阿里·谢尔·汗。他于公元1600年39岁时即位，直到1632年退位。

阿里·谢尔·汗与其叔父萨希布基兰罗阇的女儿马立加·努尔·贾玛尔（Malika Nur Jamal）结了婚。由于他们所生的孩子全都夭折，阿里·谢尔·汗便从巴尔玛斯（Barmas）村收养了一个漂亮的婴儿。此后第二年，马立加·努尔·贾玛尔王后生下了儿子可汗·米尔扎（Khaqan Mirza）——后来被称作米尔扎三世，由达丽罗河谷中萨米格尔（Samigal）的居民穆萨米·哈拉里·贾希代罗（Musammi Kharali Jashtero）养大。马立加·努尔·贾玛尔王后偏爱自己的儿子，但国王依然对养子关爱有加，于是她心生嫉妒，终于设法杀死了养子，将尸体掩埋在吉尔吉特的阿姆贾里（Amchari）。阿里·谢尔·汗国王惩罚了王后和参与这次谋杀的大臣，将他们赶出了政府部门。这一举措给国家带来了一些麻烦，那些被遣散的官员联合起来反抗国王，并煽动邻国攻打吉尔吉特。

索布尔（Sopur）和班迪布尔的马立克率先侵犯吉尔吉特。在这种情况下，吉尔吉特的国王向罕萨统治者阿亚舒·汗（Ayasho Khan）二世的儿子苏丹·汗（Sultan Khan）[30a]和纳格尔统治者沙·格玛尔（Shah Kamal）求救。这两个地区全军出动，救了吉尔吉特。在镇压了当地的反叛后，阿里·谢尔·汗继续向敌军的逃窜地本吉进军。最后，班迪布尔的统治者被杀，他的士兵经达什金（Dashkin）逃到阿斯托尔后被沙·格玛尔全部歼灭。阿里·谢尔·汗回到吉尔吉特后，吉尔吉

特又受到了沙·阿拉姆（Shah Alam）之子、布尼亚尔的瓦利（Wali[①]）布鲁希（Burush）罗阇的进犯。这位瓦利是亚辛统治者沙·胡什瓦格特（Shah Khushwaqt）的孙子。趁着吉尔吉特处境艰难，沙·胡什瓦格特把他的孙子派往那里。沙·格玛尔与穆辛（Musing）和图布（Tubu[②]）率领的吉尔吉特军队一道前往布尼亚尔，围攻谢尔堡（Sher Qila）。罗阇布鲁希被俘，后来被杀，但他的军队得以从谢尔堡逃脱。穆辛和图布这两位主将受到嘉奖，被任命为大臣。与此同时，贾汉吉尔·巴达赫希（Jahangir Badakhshi）罗阇通过伊希戈曼侵犯吉尔吉特。罗阇沙·格玛尔紧接着去了伊希戈曼，在那里打败了罗阇贾汉吉尔。在摧毁了贾汉吉尔罗阇的避难所杰杜尔甘德（Chaturkand）堡后，沙·格玛尔罗阇将俘虏杀死，然后回到布尼亚尔。

此间，亚辛罗阇胡什瓦格特——僧格·阿里一世的孙子和穆赫塔里姆·沙（Mohtarim Shah）的弟弟——借助他的另一个孙子巴德沙（Badshah）之子马立克·阿曼（Malik Aman）的军队再一次进犯吉尔吉特。沙·格玛尔又前往亚辛迎敌。几场战斗之后，他击溃了亚辛的军队。胡什瓦格特罗阇和马立克·阿曼双双逃到奇特拉尔，向穆赫塔里姆·沙·格多尔一世（Mohtarim Shah Kator Ⅰ）求救。穆赫塔里姆·沙是僧格·阿里一世的孙子，也打算攻打吉尔吉特。沙·格玛尔迅速前往奇特拉尔，打败了穆赫塔里姆·沙。收到奇特拉尔人的投降书后，沙·格玛尔经由斯瓦特和印度河河谷回到了吉尔吉特。为表彰沙·格玛尔的功绩，阿里·谢尔·汗国王把切萨尔（Chesar）——又名希纳基（Shinaki）——的土地作为封地赏给了他。希纳基从米纳班（Minapen）村开始，包括了印地（Hindi）、马永（Mayun）和哈拉斯布（Haraspu）沙漠。穆萨米·道拉特（Musammi Daulat）被封为纳格尔的瓦齐尔。沙·格玛尔的指挥官久玛尔·辛格（Chumar Singh）进入吉尔吉特宫廷任职，并赏给他朱塔尔（Jutal）和布达斯村的土地。

阿里·谢尔·汗让儿子可汗·米尔扎与弟弟阿里·海达尔·汗的女儿米赫尔·帕尔瓦尔（Mihr Parwar）公主结了婚。这对年轻的夫妇

---

① 此处的 Wali 系该地统治者的称号。——译者

② 据蒙希·穆罕默德·阿齐兹乌丁《奇特拉尔史》，应为 Tulu。——译者

生了一个女儿，叫贾瓦尔·可敦（Jawar Khatun）。不幸的是，孩子一生下来，她母亲就死了，抚养她的是沙罗特（Sharot）村的穆萨米·瓦齐尔·贝格（Musammi Vazir Beg）。7 岁时，她被许配给巴尔蒂斯坦统治者阿里·谢尔·汗·恩金的三儿子沙赫扎达·艾哈默德·汗（Shahzada Ahmad Khan），16 岁时结婚，被送往斯卡杜。1632 年，吉尔吉特统治者阿里·谢尔·汗去世；他死时，吉尔吉特有五位瓦齐尔：贾拉尔（Jarral）部落的穆萨米·阿卜杜拉（Musammi Abdullah）是首相，其次是穆萨米·舒德里（Musammi Shudri），其余大臣的名字不详。

阿里·谢尔·汗死后，他的弟弟阿里·海达尔·汗于公元 1632 年继承了王位。当时，阿里·海达尔·汗正在为王子可汗·米尔扎寻找一个女仆。亚辛统治者胡什瓦格特罗阇有意让他的女儿担当这个差使，便建议海达尔罗阇来亚辛看看。但就在阿里·海达尔·汗罗阇与他的两个大臣阿卜杜拉和舒德里前往亚辛时，可汗·米尔扎的奶父哈拉里·贾希代罗（Kharali Jashtero）带着王子去了达丽罗。在亚辛，阿里·海达尔罗阇中了胡什瓦格特的圈套，和他的两个大臣一起被监禁起来。与此同时，另一个谋划正在进行。阿卜杜拉的弟弟拉舒（Rasho）假装与胡什瓦格特站在同一边，乞求返回吉尔吉特，为胡什瓦格特争取吉尔吉特的人民。拉舒离开后，计谋泄露。胡什瓦格特将阿里·海达尔·汗王公和他的两个大臣处死，并决定攻打吉尔吉特。这在吉尔吉特引起了极大的恐慌。拉舒把这一危险告知了吉尔吉特人民。此时，可汗·米尔扎继续留在达丽罗，他任命拉舒为首相，同时任命贾瓦尔·可敦王后的奶父穆萨米·贝古（Musammi Begu）作另一个大臣。这样，瓦齐尔拉舒作为可汗·米尔扎罗阇的“苏丹代理人”（Naib-as-Saltanat），在 1632 年—1633 年间在吉尔吉特统治了六个月。

上述历史主要基于沙·拉伊斯·汗的解释，赫希默杜拉·汗的解释不完全，他只谈到拉舒的情况，对再早一些的情况没有涉及，在一些事件的细节上也稍有不同。

根据沙·拉伊斯·汗的解释，拉舒以移交吉尔吉特的名义把亚辛统治者胡什瓦格特罗阇骗到了吉尔吉特。当胡什瓦格特到了吉尔吉特后，拉舒趁他不备，集中吉尔吉特的全部兵力打败了他。胡什瓦格特

设法逃脱，直接去了奇特拉尔首领——他的侄子和穆赫塔里姆·沙·格多尔一世的儿子——僧格·阿里二世那里。瓦齐尔拉舒在人们的极度喜悦中返回吉尔吉特，随后又去了达丽罗，把胜利的消息报告给了王子可汗·米尔扎，将他带回吉尔吉特，让他坐了王位。

可汗·米尔扎是吉尔吉特的第二十八位统治者。他于31岁时登上王位，公元1632年—1635年在位。他在任期间，拉舒继续担任首相，穆萨米是负责布尼亚尔的大臣。除他们外，还有其他五个瓦齐尔。可汗·米尔扎上任后的第三个月，胡什瓦格特和僧格·阿里两人向布尼亚尔进军，准备再次攻打吉尔吉特。在瓦齐尔拉舒的建议下，吉尔吉特的军队在巴亚尔吉（Bayarchi）山口展开防卫作战，甚至连可汗·米尔扎罗阇也亲自参加了战斗。最后，敌军被彻底击溃，胡什瓦格特逃往亚辛。为推翻阿里·谢尔·汗的统治，胡什瓦格特根据早先的计划组织了一个大联盟——其中包括吉尔吉特内部的反对派，第二次进犯吉尔吉特。当时唯一与阿里·谢尔·汗站在一边的是纳格尔统治者沙·格玛尔。吉尔吉特内部的反对派怂恿可汗·米尔扎与沙·格玛尔作对，收回他父亲阿里·谢尔·汗让与沙·格玛尔的切萨尔。这一做法导致了可汗·米尔扎与沙·格玛尔之间的争吵。当可汗·米尔扎前往纳格尔占领切萨尔时，沙·格玛尔奋起迎战，混战中，可汗·米尔扎被砍掉了脑袋。据说，沙·格玛尔为此十分不悦，但已无可奈何。由于可汗·米尔扎没有子嗣，沙·格玛尔又是最近的亲戚，瓦齐尔拉舒以“苏丹代理人”的身份邀请沙·格玛尔作吉尔吉特的国王，但被拒绝了。在极度紧张的形势下，瓦齐尔拉舒只好以沙·格玛尔的“苏丹代理人”的名义继续统治吉尔吉特，尽管沙·格玛尔本人待在纳格尔。吉尔吉特的这种统治从1635年一直持续到1642年，尽管为平定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达丽罗人在可汗·米尔扎的奶父哈拉里·贾希代罗带领下找沙·格玛尔报仇。但这次只到达尼尔特（Nilt）的行动没有任何结果，瓦齐尔拉舒仍然以沙·格玛尔的名义在吉尔吉特保持着有力的统治。

沙·拉伊斯·汗的上述解释看起来非常天真，其中还掺杂了作者的个人好恶：谈到亚辛、奇特拉尔甚至罕萨统治者时满是指责之词，

而说起纳格尔甚至斯卡杜的统治者时，却颇有同情之意，仅仅因为后两者是通过与吉尔吉特统治家族成员之间的婚姻关系而成功地使他们的后代获得了王位。和先前的历史一样，这些事件表明了纳格尔和斯卡杜之间的亲密联盟关系。但吉尔吉特的王位并不是如此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占据的。瓦齐尔拉舒以“苏丹代理人”的身份建立起了他在吉尔吉特的统治，并持续了将近十年。另一方面，借着奇特拉尔亲戚的支持，亚辛统治者一面忙着调整部署，一面设法引起索布尔和班迪布尔统治者对吉尔吉特的注意。索布尔和班迪布尔这两个地区或许就是我们今天在克什米尔的波斯文史书中所看到的达拉杜国（Daradu）。很可能，达拉杜统治之后就是克什米尔的统治。这样，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统治者的两大分支：第一大分支是亚辛统治者及其同盟，第一大分支是纳格尔统治者及其同盟。吉尔吉特位于亚辛和纳格尔之间，其统治者也分为两派：一派是成功夺权并以“苏丹代理人”身份当政的瓦齐尔拉舒，另一派的领导人姓名不详。

塔拉汗王朝的第六阶段（公元 1635 年—1800 年）

由于没有注意到此间发生的许多事件，赫希默杜拉·汗未能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给出一个清晰的陈述。沙·拉伊斯·汗的解释对纳格尔统治者过于偏袒，理解时需倍加谨慎，但聊胜于无。在本节的最后，我们将给出一个批判性的评价。

这一时期瓦齐尔拉舒作为沙·格玛尔罗阇的“苏丹代理人”开始执政。现在还不清楚沙·格玛尔不坐吉尔吉特王位的原因，似乎当时的情形不利于他去吉尔吉特。但胡什瓦格特罗阇在吉尔吉特有自己的支持者，他不会对吉尔吉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保持沉默，准备联合奇特拉尔统治者继续对吉尔吉特发起突袭。事实证明，瓦齐尔拉舒更为强大。在发现无法将瓦齐尔拉舒赶下台后，胡什瓦格特找到了另一个方法，即让沙·格玛尔来掌握吉尔吉特的实权，然后再设法通过联合行动把瓦齐尔拉舒从吉尔吉特赶出去。但这一计划也未能成功。

为了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瓦齐尔拉舒想出了另一个策略。他到了斯卡杜（当时执政的是艾哈默德·汗），打算将可汗·米尔扎罗阇的女儿贾瓦希尔（贾瓦尔）·可敦公主——已经在斯卡杜结了婚——

带回吉尔吉特，由她来做吉尔吉特的国王，自己则继续以“苏丹代理人”身份执掌朝政。但很快贾瓦希尔·可敦就发现了瓦齐尔拉舒的企图。她亲自前往各地接见百姓，了解他们的疾苦。可一到巴格劳特和萨奈加尔堡（Sanekar）就被围困起来，此时她向人们证实了自己的才干。她断然拒绝了瓦齐尔拉舒在萨奈加尔提出的与她成婚的建议，向他发起突然袭击。混战中瓦齐尔拉舒被杀，他企图成为吉尔吉特合法统治者的美梦最终破灭。

贾瓦希尔·可敦女王（Malika）担起了政府的责任。她穿男性化的衣服，骑马，以自己的名字发布指令，采取各种措施改善人民福利，开通国内道路，并重建了与纳格尔的友好关系。在达丽罗的劳力资助下，拓展了从朱迪亚尔（Jutial）河到费尔道西亚堡的古运河，土地的灌溉面积比过去的古尔吉诺代（Gulchinote）村和纳格拉尔（Nagral）地区更为宽广。作为回报，她将汗贝里的牧场赐给了达丽罗的哈拉里·贾希代罗。接下来，吉尔吉特的接班人问题成了她关注的中心问题。在诸多建议中，年轻寡居的她最终同意了与纳格尔罗阇沙·格玛尔的长子费尔道斯·汗（Firdaus Khan）罗阇结婚。在弟弟沙·拉希姆·汗（Shah Rahim Khan）的照顾下，费尔道斯·汗罗阇离开纳格尔到了吉尔吉特，和他的妻子生活在一起。他们生有一子，名叫吉·汗（Ji Khan）或哈比布·汗（Habib Khan）。费尔道斯罗阇以“苏丹代理人”的身份执掌朝政，但吉尔吉特人却不喜欢他的到来，因此他不得不舍弃妻子和孩子离开了吉尔吉特。吉尔吉特的政务由贾瓦希尔·可敦继续管理，直到她的儿子长到十七八岁。公元1670年，她将王位让于儿子吉·汗。

吉·汗于公元1670年—1689年在位。关于他的婚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首先是亚辛的胡什瓦格特罗阇，他把早先被沙·格玛尔杀死在谢尔堡的布尼亚尔罗阇布鲁希的小女儿许配给了吉·汗。这次婚姻为吉·汗带来了一个儿子沙·纳杰姆（Shah Najam）或阿杰姆（Ajam）。但王太后贾瓦希尔·可敦却不情愿这次婚姻。她促成了吉·汗罗阇与斯卡杜统治者沙·穆拉德（Shah Morad）的女儿的婚事。第二次婚姻也生了一个儿子沙·玛尤尔（Shah Mayur）。在吉·汗的婚姻

上，纳格尔统治者的反应也不迟缓，沙·拉希姆·汗的一个女儿成了吉·汗的第三个妻子。这次婚姻又为吉·汗带来了一个儿子戈里特姆（Goritham）。

这三重婚姻关系使吉尔吉特的政治更为复杂。贾瓦希尔·可敦不断地将吉尔吉特的情况传达给斯卡杜统治者沙·穆拉德。另一方面，胡什瓦格特罗阇想方设法要看到他的外孙沙·纳杰姆继承吉尔吉特的王位。沙·穆拉德派出了由侄子、希格尔统治者伊玛目·古力（Imam Quli）带领的军队。沙·纳杰姆与联军交战，最终连同他的支持者一起被俘，被押往斯卡杜。他被赦免，而他的支持者被处死。但他的奶兄弟将吉·汗罗阇毒死在吉尔吉特，同时也杀掉了沙·玛尤尔。这一事件使得沙·穆拉德再次从斯卡杜出兵，惩处了杀害其外孙沙·玛尤尔的凶手。这样，贾瓦希尔·可敦于公元1689年再次登上王位，一直统治到1705年。戈里特姆由她看管起来。她在位的第十一年上，胡什瓦格特王公去世，他的儿子沙·阿拉姆（Shah Alam）罗阇继承了王位。后来，她也在50岁时去世。

她死后，沙·戈里特姆罗阇于公元1705年登上王位，一直执政到公元1800年。他所受的教育来自于赛义德·沙·苏丹·阿里夫（Sayyid Shah Sultan Arif）。赛义德·沙·苏丹·阿里夫死后埋葬于丹尤尔的达尔加（Dargah）。他即位的第二年，罕萨首领沙·胡斯劳·汗去世。他的儿子罗阇萨利姆（Salim）三世在吉尔吉特的瓦齐尔索米尤（Somiyu）的帮助下继承了王位。一些年后，罗阇萨利姆也死了，罗阇迦曾弗尔（Ghazanfar）继承了他的王位。吉尔吉特的瓦齐尔吉古·玛克苏（Jigu Maksu）前往罕萨参加了加冕仪式。迦曾弗尔继位的第十年，纳格尔的拉希姆·沙罗阇去世。瓦齐尔贝古（Begu）去纳格尔参加了拉希姆·沙罗阇的长子罗阇格里姆·汗（Karim Khan）的登基仪式。后来，格里姆·汗罗阇离开纳格尔，去了巴尔蒂斯坦，将纳格尔留给了弟弟巴布尔·汗（Babar Khan）；当时，巴布尔·汗已通过杀害自己另外三个兄弟而壮大了自己的势力。45岁时，沙·戈里特姆罗阇与纳格尔罗阇雅瑟尔·汗（Yasar Khan）的女儿马立加·胡桑·阿拉（Malika Husn Ara）结了婚。他政绩优良，慷慨宽大，严谨勤学，是一

个忠实的什叶派信徒。在真主保佑下，他于75岁时有了女儿纳西布·贝古姆（Nasib Begam），95岁上有了儿子穆罕默德·汗（Muhammad Khan），又名罗阇·汗（Raja Khan），随后又有了第二个儿子沙·阿巴斯（Shah Abas）——两个儿子都由赛义德·艾米尔·沙（Sayyid Amir Shah）教导。在大臣索米尤死后，贾拉尔部落的毛拉·贝格（Mulla Beg）受封成为瓦齐尔。这位瓦齐尔逐渐拉近了与国王的关系，在国王年老时掌握了国家大权。在基本隐退的情况下，国王任命毛拉·贝格作了儿子穆罕默德·汗的"苏丹代理人"。后来，国王同意将穆罕默德·汗派往纳格尔，由他的叔叔阿祖尔·汗（Azur Khan）罗阇照料。这样，毛拉·贝格控制了整个国家的权力。进而，他在纳格尔离间得逞，穆罕默德·汗被迫逃往巴尔蒂斯坦。通过这种方式，毛拉·贝格在戈里特姆国王老弱不堪时一步步获得了权力。但在进一步暗示斯卡杜统治者对抗穆罕默德·汗时，毛拉·贝格遭到了怒斥。斯卡杜统治者写信坚决支持年迈的戈里特姆罗阇，这样穆罕默德·汗得以继续留在斯卡杜。

这时，苏莱曼·沙（Sulaiman Shah）已登上了马斯图季的王位，他的兄弟马立克·阿曼也正在亚辛执政。苏莱曼·沙打算趁毛拉·贝格阴谋夺权的时候浑水摸鱼。他先是到了吉尔吉特，发誓与戈里特姆罗阇一起，赢得了戈里特姆的好感，接着又让自己的妹妹穆萨拉玛·可敦（Musallama Khatun）与戈里特姆的小儿子沙赫扎达·阿巴斯（Shahzada Abas）结了婚，随后密谋杀害了老国王戈里特姆。当时，国王的大儿子穆罕默德·汗已经在斯卡杜待了五年，与斯卡杜统治者的女儿订了婚。获知此事后，他决定返回吉尔吉特。

上述历史基于沙·拉伊斯·汗的解释，当然存有偏见。可以明确的是王室对吉尔吉特权力的持续争夺。这一时期，吉尔吉特大臣毛拉·贝格与马斯图季和亚辛的苏莱曼·沙开始出现。毛拉·贝格掌握了权力，迫使戈里特姆隐退；苏莱曼·沙亦步亦趋，借着为戈里特姆服务而杀死了他，也参与到吉尔吉特的权力争夺中来。在他们两个相互竞争时，王位的真正继承人穆罕默德·汗却在斯卡杜避难。看来斯卡杜统治者必须敦促穆罕默德·汗前去夺回王位。因此，我们发现穆

罕默德·汗回到了吉尔吉特。

塔拉汗王朝的第七阶段（公元1800年—1825年）

这一时期以毛拉·贝格关押沙赫扎达·阿巴斯王子、谋杀罗阇戈里特姆，彻底篡权开始。毛拉·贝格掌权不到三个星期，苏莱曼·沙就侵占了吉尔吉特，但吉尔吉特的百姓却不支持他们两个。毛拉·贝格与他的支持者一起被杀。与苏莱曼·沙妹妹结婚的沙赫扎达·阿巴斯王子软弱无力，吉尔吉特的权力完全落到了苏莱曼·沙手中。为返回吉尔吉特，穆罕默德·汗做了充分的准备，其中首要的是争取各方的支持。他从斯卡杜去了古雷兹，又从那里去了阿斯托尔。在追随者的建议下，他决定前往戈尔（戈赫尔阿巴德），首先赢得吉拉斯、达丽罗和丹吉尔部落的支持。当苏莱曼·沙在吉尔吉特执政快六个月的时候，他又取得了萨依河谷的支持。有了从各部落征募的军队，他开始为赢得吉尔吉特民众的支持做准备。另一方面，苏莱曼·沙在奇特拉尔统治者——沙·阿夫扎尔（Shah Afzal）的儿子沙·纳瓦兹（Shah Nawaz）的帮助下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吉尔吉特人民不喜欢苏莱曼·沙，支持穆罕默德·汗。在挺进到朱迪亚尔时，穆罕默德·汗的军队与苏莱曼·沙的军队发生了战斗。苏莱曼·沙大败，逃往亚辛。穆罕默德·汗欢欣鼓舞地回到吉尔吉特，占据了费尔道西亚堡。公元1802年，他在吉尔吉特加冕，一直统治到1822年。他将毛拉·贝格的所有支持者都送上了绞刑架，毛拉·贝格的儿子巴莱戈希（Bar-i-Gosh）也被从纳格尔带回处死。当时，他的大臣是瓦齐尔·索玛依亚·古拉姆（Vazir Somaiya Ghulam），另一位大臣是科玛尔（Khomar）村的首领瓦齐尔·乌德曼（Vazir Utman）。

穆罕默德·汗执政的第三年，瓦齐尔·乌德曼带着礼物前往斯卡杜，代表穆罕默德·汗感谢斯卡杜统治者艾哈默德·沙的支持与帮助。斯卡杜统治者的女儿与瓦齐尔·乌德曼一起返回吉尔吉特，和穆罕默德·汗成了亲，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儿子沙赫扎达·胡斯劳（Shahzada Khusro）。负责王子的宗教教育的是吉尔吉特的赛义德·艾米尔·沙和纳格尔的赛义德·萨夫达尔·沙（Sayyid Safdar Shah）。吉尔吉特的赛义德给王子起了另一个名字叫阿斯迦尔·阿里（Asghar Ali）。照例，

穆罕默德·汗罗阇每年都在吉尔吉特庆祝努鲁兹节。在努鲁兹节上，人民载歌载舞，颂扬塔拉汗家族。努鲁兹节的最后一天，人们在兰金堡（Rangin Hisar）的开阔草地上举行庆典（darbar），邻近地区的统治者都要前来祝贺，向穆罕默德·汗罗阇贡献礼物。

在穆罕默德·汗执政的第六年，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穆罕默德·汗罗阇决定为他避难时在纳格尔受到的冷遇向他的姨夫、当时的纳格尔统治者报仇——正是因为纳格尔统治者阿祖尔·汗对他不好，他才逃到斯卡杜。现在他强大了，他给纳格尔统治者写信，要收回切萨尔的土地，交给他的弟弟沙赫扎达·阿巴斯王子管理。他又从罕萨统治者那里夺回了马永和印地的土地，与切萨尔并在一起。沙赫扎达·阿巴斯王子在米纳班（Minapen）登上了他的宝座，并在吉尔吉特军队的帮助下坐稳了它。这一举措导致了吉尔吉特同纳格尔和罕萨之间的敌意。当时布尼亚尔的瓦利是戈里特姆罗阇晚期任命的伊扎德·汗（Izzat Khan）罗阇，掌管阿斯托尔的是沙·苏丹罗阇。在努鲁兹节上，所有这些统治者都来到吉尔吉特，一起观赏各种运动，如马球、射箭、剑术、摔跤、拔河、登山以及游泳等。

公元1805年，穆罕默德·汗罗阇的女儿沙赫扎迪·萨希布努玛（Shahzadi Sahebnuma）出生。穆罕默德·汗罗阇把她送到戈尔（戈赫尔阿巴德），由那里的首领瓦齐尔·舍戈巴（Vazir Shagopa）抚养。沙赫扎达·胡斯劳王子在十二岁上得了重病，为了他的康复，人们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在他康复后，赛义德·艾米尔·沙为他取了第二个名字阿巴斯·阿里（Abas Ali）。

为了重返吉尔吉特，苏莱曼·沙征集了各部落区的强壮男子，于1822年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为增加军事力量和所需物资，他先去了他妹夫米赫德尔·沙·纳瓦兹（Mihtar Shah Nawaz）执政的奇特拉尔，获取了足够的财富。作为苏莱曼·沙的副手，沙·纳瓦兹继续在奇特拉尔当政。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首领们保证在需要时全力支持苏莱曼·沙。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苏莱曼·沙向布尼亚尔进军，占领了谢尔堡。伊扎德·汗罗阇和布鲁希家族的其他成员接受了苏莱曼·沙的忠诚。这样，谢尔堡成了他的司令部，他的军队从吉尔吉特

河两岸一直部署到戈拉布尔和加古奇。有了这些准备，他决定入侵吉尔吉特。

穆罕默德·汗罗阇决心捍卫他的领土。他从巴尔戈和沙格尤特（Shakyot）出发，沿吉尔吉特河两岸向谢尔堡进军。几次交战后，占领了戈拉布尔。在向下一个目标谢尔堡进军时十分困难，因为谢尔堡非常坚固，几乎不可能攻下。面对这种情形，穆罕默德·汗罗阇希望能得到罕萨和纳格尔的帮助。但罕萨统治者迦曾弗尔罗阇是苏莱曼·沙的女婿，拒绝给予帮助。纳格尔统治者阿祖尔·汗罗阇也拒绝了他的请求。拒绝的原因尽管不同，但从穆罕默德·汗罗阇过去与这两位统治者的关系能够猜到是为什么。这时候，苏莱曼·沙命令其军队的一翼从辛戈尔（Singol）村突袭吉尔吉特军队。但穆罕默德·汗的领导才能挽救了这种局面，来犯的敌军被击败。苏莱曼·沙想到了向罕萨和纳格尔求助。通过与诺默尔的驻扎官格里多（Glito）和哈希姆（Hashim）的和解，穆罕默德·汗也开始增强自己的实力。当时，格里多和哈希姆在代表领主（Jagirdar）赛义德·贾拉里·艾尔·侯赛尼（Sayyid Jalalli al-Husaini）管理欣巴尔（Shinbar）。他们带了三千人（其中两千人来自欣巴尔，一千人来自切萨尔）在黑夜中沿一条小溪进入谢尔堡，与苏莱曼·沙的军队展开激烈战斗。这一突然的攻击把苏莱曼·沙的军队打懵了。苏莱曼·沙罗阇经伊希戈曼撤退到亚辛。穆罕默德·汗罗阇乘胜前进，但到了加古奇便无力再向亚辛进军了。此时返回吉尔吉特，做好充分的准备后再侵入亚辛可能是一个更为明智的做法。

苏莱曼·沙罗阇又开始重整旗鼓，并得到了罕萨和纳格尔提供支援的保证。实际上，这两个地区的统治者已决定进攻吉尔吉特，尽管纳格尔统治者阿祖尔·汗罗阇的儿子苏丹·阿拉夫·汗（Sultan Alaf Khan）并不同意这个入侵计划。他通过年迈的瓦齐尔哈罗（Vazir Hallo）向父亲求情，试图说服他不要参与反对穆罕默德·汗的军事行动。但阿祖尔·汗罗阇没有接受儿子的意见,反而去会见了沙赫扎达·阿巴斯，向他保证由他取代穆罕默德·汗做吉尔吉特的国王。按照这个策划，苏莱曼·沙在一个选定的日子向吉尔吉特进军。与此同时，

罕萨和纳格尔统治者也向吉尔吉特发起进攻。

罕萨统治者占领了诺默尔，纳格尔统治者攻占了费尔道西亚堡，苏莱曼·沙则击溃了吉尔吉特的军队，占领了兰金宫（Rangin Mahal）。穆罕默德·汗被俘后被押往亚辛监禁起来。他的弟弟沙赫扎达·阿巴斯登上王位，自公元1822年—1825年在位。由于阿巴斯罗阇是苏莱曼·沙的妹夫，便有意让苏莱曼·沙做他的“苏丹代理人”。这样，苏莱曼·沙成功地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统治着从吉尔吉特到奇特拉尔的所有土地。

在妹妹穆萨拉玛·可敦王后的影响下，苏莱曼·沙获取了阿巴斯罗阇的完全信任。阿巴斯罗阇不顾瓦齐尔乌德曼的建议，把所有权力都交到了苏莱曼·沙手中。瓦齐尔乌德曼密谋把苏莱曼派到亚辛去巡游，然后在那里杀掉他。但苏莱曼从国王手中获得了一纸命令，剥夺了他首相的职位，从而最终战胜了他。后来，他以带阿巴斯罗阇见他哥哥穆罕默德·汗为借口，与阿巴斯罗阇一起去了亚辛。在亚辛，这两兄弟都被处死，埋葬在早先沙·拉伊斯·阿扎姆被埋葬的地方——奇特拉尔的“拉伊桑的拱北”。这样，苏莱曼·沙于1825年成为吉尔吉特的统治者。

穆罕默德·汗罗阇的两个孩子沙赫扎达·胡斯劳王子和沙赫扎迪·萨希布努玛公主生活在科玛尔村他们的奶父、前瓦齐尔乌德曼家里。为保护他们免受苏莱曼·沙的报复，乌德曼带着他们离开科玛尔去了纳格尔。但苏莱曼·沙派了一队人马到了纳格尔，从阿祖尔·汗罗阇那里带回了王子。在路上，王子被杀死，他的头颅被与前瓦齐尔乌德曼一起送到了苏莱曼·沙罗阇那里。就这样，吉尔吉特王室的所有男丁都完了，王室幸存的唯一成员是沙赫扎迪·萨希布努玛——在苏莱曼·沙罗阇的看管下，她几乎疯了。

为免受哥哥阿祖尔·汗罗阇的报复，吉·汗罗阇从纳格尔逃到他的岳父苏莱曼·沙罗阇那里寻求保护，当时，苏莱曼·沙已经开始负责这个国家的治理。苏莱曼·沙逐渐地在从吉尔吉特到奇特拉尔的所有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权威。虽然纳格尔的阿祖尔·汗罗阇是他的朋友和盟友，但他的女婿吉·汗却希望成为纳格尔的统治者。在苏莱曼·

沙罗阇与罕萨统治者迦曾弗尔罗阇联合行动下，阿祖尔·汗罗阇的一部分军队成了吉·汗罗阇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阿祖尔·汗罗阇只好将王位让于他的弟弟吉·汗罗阇。瓦齐尔哈罗的位置被瓦齐尔道尔多（Vazir Doltu）取代，阿祖尔·汗罗阇和他的儿子阿拉夫·汗则交给了苏莱曼·沙罗阇。苏莱曼·沙罗阇把他们送到迦曾弗尔罗阇那里，想借迦曾弗尔之手杀了他们。但迦曾弗尔罗阇非但没有杀他们，反而将他们保护起来。在罗阇阿祖尔的请求下，他们父子被带往纳格尔的沙叶尔（Shayar）村，但在路上他们被杀掉了。与此同时，迦曾弗尔·阿里罗阇侵入纳格尔，想把吉·汗赶下台，苏莱曼·沙罗阇也前去与他联手行动。但吉·汗罗阇击败他们的侵略，大获全胜。

在长期的外交和军事斗争中，早期的相互残杀一直在继续。吉尔吉特罗阇的职位总是一个闲职。在老百姓和瓦齐尔们的支持下获得王位，但却得不到邻近地区统治者的支持。亚辛罗阇苏莱曼·沙与罕萨和纳格尔统治者，以及帮助他杀掉吉尔吉特罗阇穆罕默德·汗及其弟弟阿巴斯·汗的支持者结成了一个大联盟，成为这一地区最强大的统治者。随着穆罕默德·汗的儿子沙赫扎达·胡斯劳被杀，吉尔吉特王室不再有男丁存在。纳格尔的情况也有了进展。吉·汗罗阇在他的岳父苏莱曼·沙罗阇的帮助下，从他的哥哥阿祖尔·汗罗阇那里夺取了王位。阿祖尔·汗罗阇和他的儿子阿拉夫·汗被废处死。这样，吉·汗罗阇掌握了纳格尔的权力，成为他岳父的竞争者。

塔拉汗王朝的第八阶段（公元1825年—1840年）

公元1825年，吉尔吉特王室唯一幸存的成员萨希布努玛女王在吉尔吉特加冕，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开始。布尼亚尔的瓦利阿扎德·汗（Azad Khan）罗阇被任命为她的摄政王。在苏莱曼·沙被纳格尔的吉·汗罗阇打败后，阿扎德·汗控制了整个吉尔吉特。后来，苏莱曼·沙被俘，并在谢尔堡被处死，他的侄子、马立克·阿曼（Malik Aman）的儿子戈赫尔·阿曼（Gohar Aman）[31]成了亚辛和马斯图季的统治者。苏莱曼·沙先被埋葬于加古奇，后来，他的尸体被运回亚辛，戈赫尔·阿曼把他埋葬在自己的家族墓地中。再后来，阿扎德·汗罗阇把他的女儿（确切地讲，是他的妹妹）嫁给了巴达克山的一位王子，同时还从

吉尔吉特派去大量男女作为仆人。这一举动激怒了吉尔吉特的民众。

这时，塔希尔·沙（Tahir Shah）罗阇在纳格尔执政，一些吉尔吉特人求他把阿扎德罗阇赶下台。塔希尔·沙罗阇先派他的小儿子格里姆·汗（Karim Khan）带着军队去了吉尔吉特，他自已在将纳格尔的政务交给长子西甘达尔（Sikandar）罗阇后也随即前往。战斗在费尔道西亚堡前面开始。阿扎德·汗罗阇提出要与塔希尔·沙罗阇进行个人决斗。1828 年，阿扎德·汗罗阇在决斗中被杀死。格里姆·汗罗阇与 27 岁的萨希布努玛女王结了婚，塔希尔·沙罗阇取代了阿扎德·汗罗阇成为摄政王。萨希布努玛女王选择与她的丈夫一起住在戈尔（戈赫尔阿巴德），1828 年，他们生下了儿子穆罕默德·汗二世。在布尼亚尔，布鲁希家族汗·巴哈杜尔（Khan Bahadur）罗阇的儿子纳杰姆·汗罗阇做了瓦利。他想入侵亚辛，但塔希尔·沙建议他不要这样做，应该同戈赫尔·阿曼和平相处。

塔希尔·沙罗阇重新任命哈罗（Hallo）做纳格尔的瓦齐尔，任命古贾尔·沙古尔·阿里（Gujar Shakur Ali）为吉尔吉特的瓦齐尔。按照纳杰姆罗阇的意愿，贝古（Beku）被任命为布尼亚尔的瓦齐尔，舍戈巴（Shagopa）被任命为戈尔（戈赫尔阿巴德）和吉拉斯的瓦齐尔，任命贾巴尔·汗为阿斯托尔的瓦利，一个来自达丽罗的人受命治理达丽罗、丹吉尔和哈尔班。在五年的和平治理后，塔希尔·沙罗阇病倒了。在他生病期间，戈赫尔·阿曼罗阇从亚辛向吉尔吉特发动进攻，但在路上就被纳杰姆罗阇打败并击退了。罕萨的迦曾弗尔罗阇收买了纳格尔人，连瓦齐尔哈罗都与他站在一边，心平气和地反对被派往吉尔吉特的西甘达尔罗阇。最终，罗阇西甘达尔的位置被阿祖尔·汗罗阇的孙子、迦曾弗尔罗阇的外孙、苏丹·阿拉夫·汗罗阇的儿子拉希姆·汗（Rahim Khan）罗阇所取代。现在，进攻吉尔吉特的方式很清楚。先是戈赫尔·阿曼王公进犯，但被布尼亚尔的纳杰姆罗阇再次打败。拉希姆·汗罗阇被杀死在纳格尔。正当西甘达尔罗阇准备前往纳格尔时，他在诺默尔听到了塔希尔·沙罗阇于 1836 年去世的消息，因而返回了吉尔吉特。

1836 年，西甘达尔罗阇作为萨希布努玛的摄政王（即“苏丹代理

人”）掌管了吉尔吉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840年。首先，古雷兹的马立克，名叫迪拉瓦尔·马立克（Dilawar Malik，沙·拉伊斯·汗错误地将他当成Raja Malik），在戈赫尔·阿曼的怂恿下前来进犯吉尔吉特，他的军队都已经进了费尔道西亚堡，但最终，西甘达尔罗阇在纳格尔军队的帮助下打败了侵略军。战争中，有些吉尔吉特人也与侵略者站在一起。

通过侵略部落区，继而又通过对米赫塔尔·穆赫塔里姆·沙·格多尔二世的儿子沙·阿夫扎尔二世统治的奇特拉尔的侵略，戈赫尔·阿曼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在占领了奇特拉尔后，戈赫尔·阿曼又与各部落区的人联起手来。在拉赫马特（Rahmat）瓦齐尔的建议下，戈赫尔·阿曼决定先杀掉布尼亚尔的罗阇纳杰姆。为此，他命令马希古力·汗（Mashkuli Khan）去射杀纳杰姆罗阇，结果马希古力·汗成功地完成了任务。通过马希古力·汗，戈赫尔·阿曼控制了布尼亚尔。西甘达尔罗阇决定前去争取马希古力·汗，除掉戈赫尔·阿曼。在争取到马希古力·汗后，西甘达尔罗阇派他去亚辛杀掉戈赫尔·阿曼。但在那里，马希古力·汗被伊萨·巴哈杜尔（Isa Bahadur）杀死。就在伊萨·巴哈杜尔打算将布尼亚尔收归自己控制的时候，戈赫尔·阿曼把他赶走了。伊萨·巴哈杜尔跑到吉尔吉特向西甘达尔罗阇求助。但就在此时，瓦齐尔哈罗与戈赫尔·阿曼联合起来。在西甘达尔罗阇离开巴格劳特时，瓦齐尔哈罗设计抓住了他。戈赫尔·阿曼罗阇趁机攻占了吉尔吉特。西甘达尔罗阇在巴格劳特被打败，后来与他的儿子一起被杀。

听到哥哥西甘达尔罗阇的死讯，格里姆·汗罗阇非常悲伤。当时他正与他的妻子萨希布努玛和儿子穆罕默德·汗二世住在戈尔（戈赫尔阿巴德）。他决定在吉拉斯、达丽罗、丹吉尔和哈尔班等地招募军队，攻打吉尔吉特。但在布尼亚尔的伊萨·巴哈杜尔建议下，他去了克什米尔，向锡克人请求军事援助。萨希布努玛女王仍留在戈尔（戈赫尔阿巴德）。这一请求开辟了吉尔吉特历史的新篇章。

这一时期的历史围绕着萨希布努玛这个人物展开，她在父亲被谋杀后，几乎疯了。纳格尔统治者如何占领吉尔吉特又怎样让他的儿子

与萨希布努玛结了婚，均无详细记载。但亚辛王室无疑构成了对吉尔吉特的压力。由于苏莱曼·沙和戈赫尔·阿曼强烈的个性，吉尔吉特落入了他们的手中，吉尔吉特人的忠诚也被分化了。但有势力的贵族和瓦齐尔乌德曼倾向于纳格尔。当地百姓的支持保全了这种局面，纳格尔统治者成为“苏丹代理人”，以萨希布努玛的名义执政。当戈赫尔·阿曼重新壮大并占据了吉尔吉特后，萨希布努玛的丈夫格里姆·汗罗阇逃往克什米尔向锡克人请求军事援助。这一地区王室间的相互残杀在北部地区引入了第三股政治力量。但是，在格里姆·汗罗阇请求军事援助时，这一点并没有被人们预期到。或许格里姆·汗罗阇从来都没有意识到锡克人会留下来，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因为以前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至于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将在下一章进行考察。

A （二）纳格尔的玛格罗特家族

沙·拉伊斯·汗对这一家族起源的叙述，在塔拉汗王朝第三时期的历史中已经提及。从那里，我们得知贾姆希德，即里利·格希布尔（Lili Gashpur）的双胞胎儿子之一，如何得到了玛格罗特（Maglot）这一称号并最终被赐予纳格尔的领地。基于米尔·纳齐姆·汗对《罕萨史》（Tarikh-i-Hunza）的解释，洛里默就同一史实所作的解释稍有不同。[32]手稿的乌尔都文本保存在吉尔吉特公共图书馆，其波斯文译本已由哈吉古特拉杜拉·贝格（Haji Qudratullah Beg）出版。[33]根据沙·拉伊斯·汗的解释，玛格罗特的王宫在吉尔吉特统治者罗阇马立克·沙——即罗阇·沙二世，亦即罗阇胡斯劳·汗二世之子——的时期（公元1422年—1449年）就已建成。玛格罗特是里利·格希布尔的后裔，据说里利·格希布尔是吉尔吉特统治者的弟弟杜拉·沙（Dula Shah）的儿子——杜拉·沙可能与洛里默说的沙·道拉特·沙（Shah Daulat Shah）是同一个人。在洛里默的解释中，道拉特·沙被说成是马立克·沙的父亲——据说他有五个儿子，其中之一便是拉利·特姆（Lali Tham，可能与里利·格希布尔是同一个人）。根据沙·拉伊斯·汗的解释，马立克·沙仅一子，被称之为托拉·汗二世（Torra Khan Ⅱ），可能与洛里默说的塔拉汗是同一个人。如果综合考虑到这些变

化，那么世代因袭的谱系图就清楚了。纳格尔王宫也许在公元1440年左右奠基。这段历史的第三种史料也可以在沙·拉伊斯·汗的手稿[34]中得到，第四种史料则是由于尔根·弗伦布根（Jurgen Frembgen）先生——他于公元1500年左右住在玛格罗特——搜集的传说。[35]所有这些史料都已被用来重建这一历史。

弗伦布根简要记录了纳格尔的早期传统，并表明纳格尔人与巴尔蒂斯坦人交往的可能性。这种接触可能是通过希斯帕尔冰川通道建立的。后来这一地区被斯里·巴达德（Sri Badad）的祖先征服，塔拉汗统治者又从他那里继承了这一地区。在玛格罗特统治者的第一时期，建立了一个大的防卫村，名为莫戈戈特（Muko-Kot）或纳格尔汗（Nagar Khan）。纳格尔的国王们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894年，此后该地被摧毁，他们往上迁移。玛格罗特让沙罗特（Sharot）的莫卧儿·贝格当他的瓦齐尔，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阿祖尔·贾姆希德（Azur Jamshed）。他与大臣一起密谋刺杀罕萨的统治者吉尔基斯（Girkis）。另一方面，罕萨统治者也有一个针对纳格尔统治者的相同的计划。但最终，罕萨统治者被玛格罗特的瓦齐尔莫卧儿·贝格刺杀。现在玛格罗特希望成为纳格尔和罕萨两地的统治者，但罕萨的人民并不接受他。在纳格尔，玛格罗特之后是沙·马立克（Shah Malik）罗阇，他娶了吉尔吉特统治者罗阇吉里斯·汗（Chilis Khan）的女儿马立加·阿赫塔尔·贝古姆（Malika Akhtar Begam），生有三个儿子，罗阇巴拉·沙（Raja Balla Shah）、沙赫扎达·赛夫·汗（Shahzada Saif Khan）和沙赫扎达·丹·马立克（Shahzada Deng Malik），还有一个女儿沙赫扎迪·沙姆萨·可敦（Shahzadi Shamsa Khatun）。他的第二个王后生了罗阇吉·汗。沙姆萨·可敦嫁给了吉尔吉特的统治者罗阇沙·拉伊斯·阿扎姆（Shah Rais Azam）。罗阇巴拉·沙在48岁时继承了罗阇沙·马立克的王位。他统治了8年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罗阇吉·汗在罕萨统治者的帮助之下篡夺了纳格尔的王位。在这场王位继承战中，沙赫扎达·丹·马立克被杀，其余两个兄弟逃离纳格尔——先逃到杰尔特（Chaalt），然后逃往克什米尔。这个事件前面已提过。他们逃亡期间，罗阇吉·汗同罕萨和希格尔的统治者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在巴尔蒂斯坦的统治者

的军事帮助之下，他取得了成功。他还从巴尔蒂斯坦引进工匠，在莫戈戈特前面建造了马球场，并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寝殿。这时，罗阇巴拉·沙在克什米尔的军事援助之下回国,并废黜了吉·汗罗阇。巴拉·沙在62岁时死去，他的儿子达乌德·沙（Daud Shah）罗阇即杜特（Dut）罗阇继位。杜特罗阇在位9年，于51岁时死去，其子阿里·达特·汗（Ali Dad Khan）罗阇在40岁时继承了他的王位。与阿里·达特·汗罗阇同时代的罕萨统治者是对纳格尔怀有野心的沙·哈里特姆（Shah Haritham）。他与霍贝尔人一起策划，引诱罗阇阿里·达特·汗到希斯帕尔冰川捕猎稀有的野鹿。与此同时，沙·哈里特姆占领了纳格尔，派人追捕阿里·达特·汗。后者取道比亚福（巴拉尔杜）冰川，与随从一起逃往巴尔蒂斯坦。在安全到达希格尔后，阿里·达特·汗罗阇在巴尔蒂斯坦的军事帮助之下，在本地人的欢呼声中回到纳格尔并赶走了沙·哈里特姆。沙·哈里特姆离去期间，他的弟弟沙·苏丹管理罕萨的事务。一个月后，沙·苏丹死去，他的中间的儿子沙赫巴兹·汗（Shahbaz Khan）即沙·布斯（Shah Bos）继位。沙·布斯拒绝把罕萨交给哈里特姆，后来被杀了。在纳格尔，阿里·达特·汗罗阇在统治了14年后死去。沙·格玛尔（Shah Kamal）罗阇在公元1559年继位。正是在他即位期间，沙·布里亚·瓦利（Shah Burya Wali）经希斯帕尔来到纳格尔，然后去了奇特拉尔。他是什叶派的信徒，据说这位赛义德曾在纳格尔传播伊斯兰教。他曾发动大战拯救吉尔吉特的历史，在上文已经提到。正是因为他的这些贡献，吉尔吉特统治者把切萨尔的土地赏给他作为领地（Jagir），切萨尔地区又称希纳基，包括了从米纳班村的戈古哈尔至印地和马永村即哈拉斯布沙漠最远端的土地。后面的这两个村庄是从罕萨夺取的。但最终沙·格玛尔没有继续他与吉尔吉特统治者可汗·米尔扎的友谊，而将其杀死。再往后，他的儿子，45岁的罗阇费尔道斯与29岁的吉尔吉特寡妇王后贾瓦希尔·可敦（Jawahir Khatun）结了婚。公元1665年，沙·格玛尔罗阇于123岁高龄去世,他的儿子沙·拉希姆·汗罗阇继承了纳格尔的王位。沙·拉希姆·汗罗阇生于公元1601年，于1665年即位，一直统治到1687年。他与吉尔吉特的关系已经说过。他十分敬爱他的哥哥费尔道斯罗

阁，但不幸的是费尔道斯罗阇不得不离开吉尔吉特去纳格尔避难。公元1675年，76岁的费尔道斯罗阇在纳格尔去世。这时，沙·拉希姆·汗帮助罕萨统治者从罗阇沙·贝格手里夺回了古贾尔（Gujal）。据说在沙赫巴兹·汗罗阇执政罕萨时，新疆边界发生了侵略战争，侵略军一直打到了巴尔迪特。这时，突厥军队决定侵略纳格尔。沙·拉希姆·汗罗阇亲自准备迎战。他将军队分成四队，一队由他自己指挥，第二队由他的弟弟努尔·汗（Nur Khan）指挥，第三队由努尔·汗的儿子沙赫扎达·哈希姆（Shahzada Hashim）指挥，指挥第四队的是努尔·汗的另一个儿子。最后，沙·拉希姆·汗打败了突厥军队。对他的胜利，贾瓦希尔·可敦大加赞赏，并派儿子吉·汗罗阇前往祝贺。沙·拉希姆·汗将女儿许配给吉·汗罗阇。沙·拉希姆·汗有五个儿子——分别为沙·格里姆·汗（Shah Karim Khan）、沙·巴布尔·汗（Shah Babar Khan）、沙·格玛尔·汗（Shah Kamal Khan）、沙·拉伊斯（Shah Rais）和沙·苏丹（Shah Sultan）——还有一个女儿戈赫尔·可敦（Gohar Khatun）。公元1687年他死后，沙·格里姆·汗继承了王位，弟弟沙·巴布尔·汗作他的代理人。由于沙·格里姆·汗忙于宗教事务，朝政实际上由沙·巴布尔·汗治理。沙·巴布尔·汗开发了一个新的农业区，建立了一个新村庄费克尔（Fikr）。他建立的第二个村庄是奥希卡尔达斯（Oshkardas）。他还开凿水渠，引冰川的水灌溉米纳班的土地。但不久，他的三个弟弟就对他产生了嫉妒。沙·巴布尔立即采取措施将他们全部杀死。沙·格里姆·汗，这位纳格尔统治者从纳格尔经希斯帕尔逃往伊玛目·古力执政的希格尔，然后又逃往斯卡杜，在那里，沙·穆拉特以宾客之礼招待了他。然后，沙·巴布尔以欣人部落的霍苏（Hosu）取代了瓦齐尔拉贾布·贝格（Rajab Beg）。后来，沙·格里姆·汗从斯卡杜返回，获得古尔米特作为封地。随后，沙·巴布尔同费尔道斯和贾瓦希尔·可敦的女儿、吉尔吉特罗阇吉·汗的妹妹佐哈拉·贾宾（Zohra Jabin）结了婚。沙·格里姆·汗也与吉·汗王公的第二个妹妹杜莱·贾玛尔（Durr-e-Jamal）结了婚。与此同时，罕萨统治者沙·贝格（Shah Beg）占领了印地和马永村。沙·巴布尔奋起反抗，击败了罕萨军队，随后加强了对苏玛亚尔（Sumayar）、

奥希卡尔达斯、沙叶尔（Shayar）、米纳班、皮辛（Pisin）、古尔米特、托尔和尼尔特等处堡垒的力量部署。随后纳格尔与吉尔吉特共享历史，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纳格尔统治者成功地使他们的子孙在吉尔吉特立足，他们也因此而成为历史关注的中心。

A（三）罕萨的阿亚希家族

前面（见本章“塔拉汗王朝的第三阶段”节）我们已经描述了吉尔基斯（Girkis）在其兄长玛格罗特统治纳格尔时，是如何成为罕萨统治者的。但这兄弟二人都觊觎着对方的地盘。据说玛格罗特和他的瓦齐尔莫卧儿·贝格曾经策划了一起阴谋。更进一步的是，在一次射猎游戏中，莫卧儿·贝格射杀了吉尔基斯，于是罕萨的王位出现了空缺。吉尔基斯有一双儿女，儿子名叫玛尤尔（Mayur），因肆意妄为而被驱逐。女儿名叫努尔·比比（Nur Bibi），她继承了王位。努尔·比比的瓦齐尔是她的奶兄，名叫博多（Boto），他是乔辛格（Chaosingh）的儿子。后者成功地杀死了莫卧儿·贝格，为吉尔基斯之死报了仇。对罕萨随后的历史的认识有一个细微的分歧。根据洛里默的说法，瓦齐尔博多到瓦罕去寻找被流放的玛尤尔王子。在达尔瓦扎（Darwaza），他得知王子已经死去，但王子的儿子阿亚舒（Ayasho）同当地的米尔在一起。阿亚舒被带回罕萨加冕为王，以代替努尔·比比。古特拉都拉·贝格（Qudratullah Beg）记录了一个传闻，说当努尔·比比在位一年左右的时候，玛格罗特的儿子达拉·沙（Dalla Shah）和她有了不正当的关系，且生有一子并成为罕萨的统治者。这引起了罕萨民众的不满。另外一种说法是，努尔·比比的丈夫是逃亡到锡格楠的哈夏姆·贝古姆（Hasham Begam）的后裔，他被带回到罕萨，并且他的孩子成为那里的统治者。这个孩子名叫阿亚舒·阿里亚斯·沙·汗（Ayasho Alias Shah Khan）。洛里默认为他统治了35年，并且由他的儿子西卢姆·汗（Silum Khan）即萨利姆·汗（Salim Khan）继承王位，据说后者统治了30年。另一方面，古特拉都拉·贝格却提到努尔·比比一个名叫玛尤里特姆（Mayuritham）的儿子。据传这个儿子取代他母亲被拥立为罕萨之王。在他统治期间，达拉·沙入侵罕萨。后来遭到吉尔吉特统治

者的压迫时，玛尤里特姆逃到了瓦罕。他将女儿嫁给了瓦罕的瓦利，生了一个孩子叫做阿亚舒二世，他被拥立为罕萨之王。他与巴尔蒂斯坦的阿卜达尔·汗（Abdal Khan）之女沙·可敦（Shah Khatum）结婚。他生有7个孩子，其中包括萨利姆和哈里特姆。他的岳父阿卜达尔·汗为女儿置办的嫁妆，除了其他物品外，有一支希吉来历949年（公元1539年）的枪。斯卡杜的统治者还从巴尔蒂斯坦派遣了一些工匠，这些工匠修建了庄严的阿尔迪特堡（图20—23）和巴尔迪特堡（图24—26）。[36]在修筑阿尔迪特堡时，还开凿了一条运河，运河之水后来灌溉了它周围的土地。阿尔迪特堡内修有一座清真寺，被命名为"比比科拉斯（Bibi Ghoras）的清真寺"，或称"比比戈赫尔（Gohar）的清真寺"。清真寺附近建造了一座古罕萨风格的方塔。在这座塔上记录的修建时间是希吉来历955（公元1548）年。这座堡垒有一些供男人、女人和仆人使用的会堂和房间，以及一个供公众使用的大厅（Salam Khana）。

根据古特拉都拉·贝格的说法，在阿亚舒二世成婚之后，罕萨和巴尔蒂斯坦之间的联系增强了，阿訇和毛拉们也赶来传播什叶派教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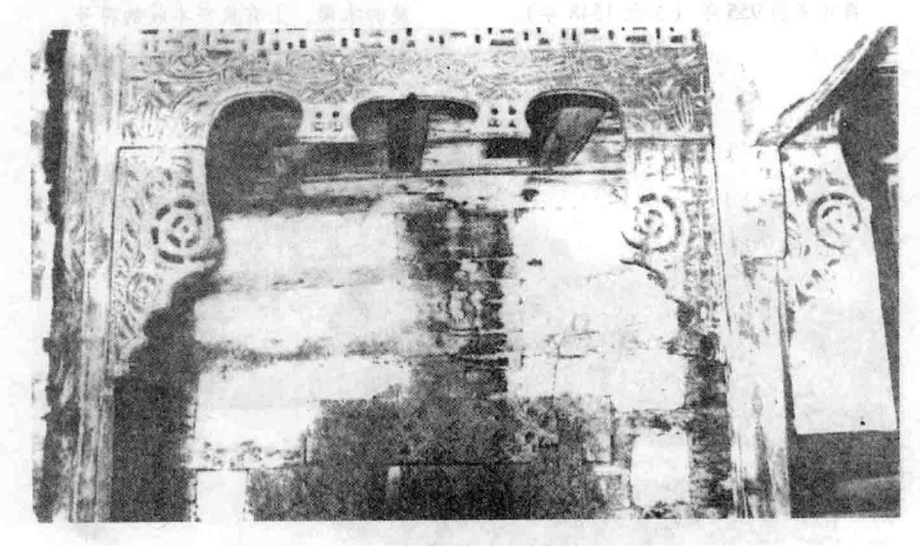


图20　罕萨：阿尔迪特堡装饰精美的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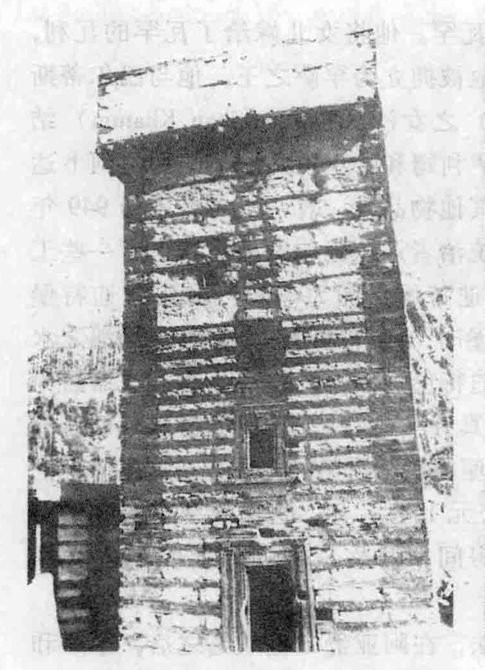


图21　罕萨：阿尔迪特堡中的高塔，希吉来历955年（公元1548年）。



图22　罕萨：阿尔迪特堡中雕刻精美的木梁，上有象征丰收的符号。



图23　罕萨：阿尔迪特堡中清真寺的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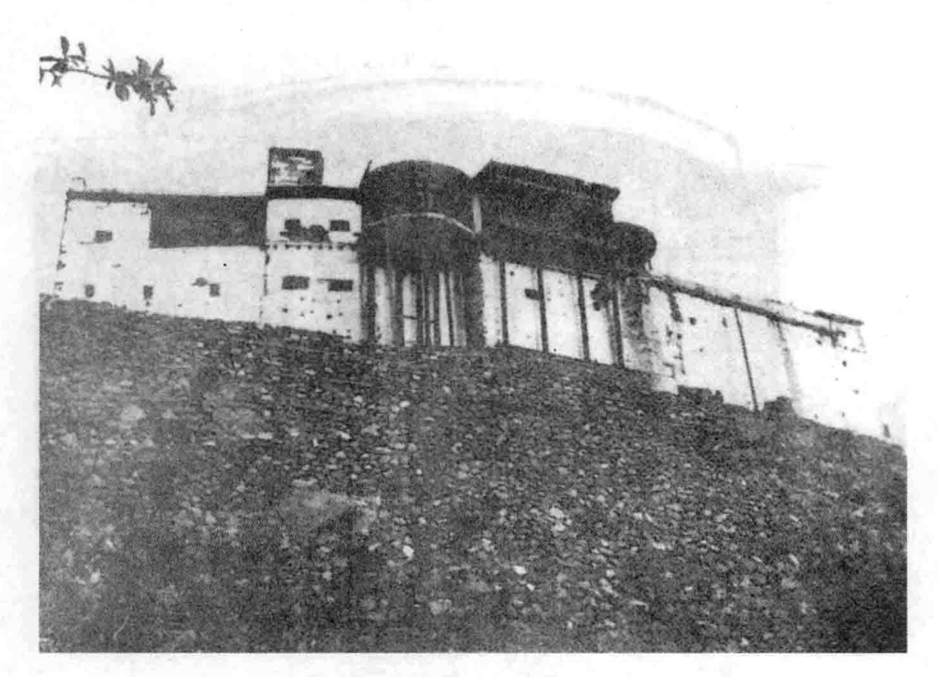


图24　罕萨：巴尔迪特堡外景



图25　罕萨：巴尔迪特堡的觐见厅，后面是清真寺的塔。



图 26　罕萨：设有王座的殿

直到此时，罕萨的居民仍是非穆斯林而且崇拜偶像，他们也尊奉一个在布鲁沙斯基语中被称为博尤（Boyo）的神祇。人们向这个神祇贡献奶酪和酥油。现在罕萨的民众接受了什叶派的教义。

在阿亚舒二世统治期间，纳格尔人入侵罕萨，屠杀了那里许多居民，其中包括哈罗伊（Kharoi）的儿子瓦齐尔古拉姆·阿里（Ghulam Ali），并且洗劫了巴尔迪特堡。阿亚舒二世在统治了 45 年后去世，王位由他的长子海达尔·汗（Haaidar Khan）继承，但若干年后海达尔·汗被迫逃亡，藏匿于纳格尔的苏玛亚尔（Sumayar）人当中。

关于阿亚舒一世之子，另一个兄弟萨利姆·汗二世的故事更多获自于古特拉都拉·贝格。[37] 据说他在成为罕萨统治者之前，曾在叶尔羌生活了 24 年。在那里，他购买了归属罕萨的土地。他后来能够抵抗突厥人对罕萨的入侵，并且征服热斯喀木。他取道吾甫浪（Oprang）长途行军，吞并塔克墩巴什、达夫达尔、埃里吉尔加（Erijilga）和瓦希久尔（Wakhijur），同时向那些地区的民众征税（见下一章）。

为了争夺王位，手足相残的战争带来了惨重的伤亡。只有两兄弟

哈里特姆和沙·苏丹幸免。就在沙·苏丹成为罕萨的统治者时，哈里特姆攻击了纳格尔的罗阇阿里·达特·汗。如纳格尔的历史所记载，罗阇阿里·达特·汗逃往巴尔蒂斯坦并带领一支军队返回。哈里特姆战败，不得不退回罕萨。但他在兄弟的帮助下重整旗鼓，再次进攻纳格尔，而这时格玛尔·汗已经接替他父亲罗阇阿里·达特·汗成为纳格尔之王。格玛尔·汗再次逃往巴尔蒂斯坦，带回一支军队，打败了哈里特姆。据古特拉都拉·贝格记载，在沙·苏丹统治时期，这个原本叫苏尔亚斯（Suryas）的山地高原，因为水的引入和土地的分配再次成为人们的居住场所。与此同时，沙·苏丹不愿再讨好哈里特姆，把王位让给了他在罕萨的儿子沙赫巴兹。哈里特姆去了克什米尔，在回到印地时被沙赫巴兹·汗杀死。

继承沙赫巴兹·汗的是他的儿子沙·贝格（Shah Beg）。据说，吉尔吉特历史上的罗阇萨希布基兰（公元1560年—1567年）时代，正是罕萨的这位沙·贝格极力反对吉尔吉特。结果，纳格尔统治者沙·格玛尔入侵罕萨，击败了沙·贝格。但是据古特拉都拉·贝格记载，纳格尔的军队被击退。在这次战争中，一个叫迦劳（Ghallo）的格奈希人因勇猛异常而受到奖赏。哈桑·沙的儿子塔兰格法（Trangfa）领导的一伙人继承了海达尔·汗之子沙·汗的事业，杀掉了沙·贝格。沙·贝格的儿子逃往丹吉尔，但在沙·汗死后，他又返回来占有了王位。那时有三个瓦齐尔：一个负责首都阿尔迪特，另一个负责巴尔迪特，第三个负责格奈希。沙·贝格的儿子执政期间，亚辛统治者进犯罕萨，但被打败。当时，纳格尔统治者也攻打希姆萨尔（Shimsal①），掠夺牲畜和庄稼，但罕萨人阻挡了纳格尔侵略军的道路，夺回了被掠去的物品。

古特拉都拉·贝格[38]记录了自胡斯劳·汗王朝以来罕萨与Khitta（新疆）政府之间友好关系和使节交流的开始阶段。米尔派他的二儿子萨利姆三世去叶尔羌开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时还贡献了一些黄金寻求保护。从这时起，每年的贡品被固定为16托拉②金粉。萨利姆

① 原文如此，疑为星峡尔（Shimshal）。——译者

② 金衡，今制1托拉（Tola）合11.664克。——译者

三世返回时，中国的大汗回赠了各种物品，如棉花、丝绸衣服、瓷器、绿茶和红茶等。贸易关系也发展起来。面对萨利姆的成就，他的兄弟米尔扎·汗心生妒意，他杀了他的父亲，结束了其35年的统治，登上了王位，把萨利姆流放到瓦罕。瓦罕的马立克款待了他。萨利姆在瓦罕待了五年。在游历了巴里黑、布哈拉和麻扎里谢里夫（Mazar-i-Sharif）后，他经伊希戈曼返回了吉尔吉特。当时统治吉尔吉特的是他姨妈的儿子、拉希姆罗阇的外甥戈里特姆。戈里特姆欢迎他的到来并把巴格劳特的一块地方给了他。在戈里特姆军队的帮助下，萨利姆打败了米尔扎·汗，成为罕萨的统治者。萨利姆有五个儿子，其中一个叫迦曾弗尔（Ghazanfar）的与米赫德尔·苏莱曼·沙（Mihtar Saulaiman Shah）的兄弟谢尔·沙的女儿比比·琪（Bibi Ji）结了婚。他的女儿巴德沙·贝古姆（Badshah Begam）则与亚辛统治者苏莱曼·沙的儿子结了婚。巴德沙·贝古姆生下胡什瓦格特二世和谢尔迪尔·阿曼（Sherdil Aman）。寡居后，她又与马立克·阿曼结了婚。在萨利姆三世死时，他的二儿子迦曾弗尔继承了王位。

米尔萨利姆·汗也派他的儿子迦曾弗尔带着每年的贡品去见叶尔羌的安班。米尔萨利姆·汗在位期间，沙·瓦利从巴达克山来到这里。萨利姆·汗死后被埋葬在古尔米特。古特拉都拉·贝格[39]还记载了沙·阿尔达比尔（Shah Ardbil）圣人从巴达克山来到这里，在他的影响下，米尔萨利姆·汗信奉了伊斯兰教。萨利姆·汗死于公元1823年，他的葬礼由沙·阿尔达比尔之子沙·侯赛因主持。

古特拉都拉·贝格列出了迦曾弗尔·汗执政期间从中国大汗那里收到的物品清单，计有如下物品：1）枪12支；2）马披6幅；3）红茶12箱；4）绿茶12箱；5）绿棉布500匹；6）白棉布500匹；7）皇室皮衣1件。

古特拉都拉·贝格[40]写道，在米尔迦曾弗尔执政的第十五年，从巴达克山请来了沙·阿尔达比尔的儿子赛义德·侯赛因，在罕萨人中传播伊斯兰教。他经博罗吉尔到了罕萨。随后，赛义德·沙·阿卜杜尔·拉希姆（Sayyid Shah Abdur Rahim）的儿子赛义德·雅古特·沙（Sayyid Yaqut Shah）也到了那里，米尔迦曾弗尔就是从他那里接受了

伊斯兰教。

洛里默在这里总结了当时该区域的占领情况：

> 那时，这个由塔克墩巴什、达夫达尔、戈贾克（Gojak）和埃里吉尔加组成的地区人口众多。那里有三位统治者，戈贾克，……穆罕默德·迦齐（Muhammad Ghazi）。自西卢姆（Silum）三世起，他们都要向罕萨的特姆（Tham）进贡。为了纪念他们的胜利，罕萨人在戈贾克建起一座建筑，并将其命名为“戈贾克巴依”（Gojak Bai）。这一地区的人被称为克尔克孜人（Kirgiz），拥有300处地产。他们的首领是一个叫布扎依（Bozai）的人，在反对罕萨人（Hunzakuts）的战役中被杀。在他受挫的地方，罕萨人建有一塔，命名为“布扎依拱北”（Bozai Gumbaz）。[41]

在对吉尔吉特更早期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已经描述了苏莱曼·沙是如何争取到罕萨的米尔迦曾弗尔和纳格尔的哈比布·汗罗阇的军事支持来抗击吉尔吉特的。后来，罕萨和纳格尔统治者联合起来，杀死了苏莱曼·沙。米尔迦曾弗尔占领了巴尔戈、诺默尔和恰伯罗特，但在后来罕萨和纳格尔之间的战争中，纳格尔统治者塔希尔·沙（Tahir Shah）占有了诺默尔和巴尔戈。再后来，戈赫尔·阿曼王公打败穆罕默德·汗，占领了吉尔吉特，米尔迦曾弗尔收回了恰伯罗特和欣巴尔巴拉(Shin Bar Bala)。米尔迦曾弗尔也派他的瓦齐尔的儿子去戈赫尔·阿曼那里与他建立友好关系。米尔迦曾弗尔与戈赫尔·阿曼的相互友好疏远了纳格尔，随后导致了将锡克人引入吉尔吉特的一系列事件。

B（一）奇特拉尔的格多尔家族

在塔拉汗家族统治的第二个阶段的历史中，我们已经知道塔尔托拉·汗（Tartorra Khan）的两个儿子由两位王后所生。其中一个是罗阇托拉·汗，他做了吉尔吉特的国王，从公元1241年统治到公元1275年。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在奇特拉尔建立了拉伊斯王朝，成了那里的统

治者。但对于他是如何成为奇特拉尔统治者的这一点却不很清楚，很有可能是通过与当时巴达克山的蒙古统治者建立的亲密同盟关系而得到了对奇特拉尔的控制权。这个王朝统治了奇特拉尔近三百年。根据《奇特拉尔王书》（Shahnama-i-Chitral）的记载，[42]这个王朝为僧格·阿里（Sang-e-Ali）或者是僧金·阿里（Sangin Ali）王朝所继承。

在拉伊斯王朝如何篡夺了偶像统治者巴赫曼（Bahman）的权力这个问题上，毕达尔夫有自己的看法。[43]卡尔·耶特马尔教授将这一变化与阿拉伯人对这一地区的入侵联系在一起，[44]当时这一地区的统治者是神圣的使者①（和平的象征）的叔叔艾米尔·哈姆扎（Amir Hamza），他获准在这里传播伊斯兰教。然而，蒙希·穆罕默德·阿齐兹乌丁（Munshi Mohammad Azizuddin）[45]不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他注意到哈里发奥斯曼（Khalifah Hazrat Usman）时代——此时阿拉伯人已到了巴达克山——的另一个传说。据说，名叫萨尼夫诺希（Sanifnosh）和伊斯纳夫塔诺希（Isnaftanosh）的两位阿拉伯领袖来到奇特拉尔统治者沙·巴赫曼的身边，使他皈依了伊斯兰教。

至于僧格·阿里（即僧金·阿里，下文将用这一写法），我们（在本章“引言”）已经注意到沙·拉伊斯·汗提出的说法。穆罕默德·阿齐兹乌丁提供了另一种不同说法。[46]根据他提供的信息，僧金·阿里是巴巴·阿尤布（Baba Ayub）的长孙，而巴巴·阿尤布又是莫卧儿大帝胡马雍的侄子，也可能是米尔扎·卡姆兰（Mirza Kamran）的儿子。巴巴·阿尤布与圣人格玛尔·沙·沙姆斯乌丁·大不列士（Kamal Shah Shamsuddin Tabrezi，和 Shamsuddin Tabrezi 圣人不是同一个人）联系在一起，他住在朗（Lon）和戈海尔（Gokher）村，他的儿子是玛黑塔格（Mah-i-Taq），玛黑塔格的儿子是胡什哈尔（Khushhal）。胡什哈尔有一个儿子叫僧金·阿里，在拉伊桑统治时期去服兵役，不久因受拉伊桑的赏识而被任命为阿塔里格（Ataliq）。僧金·阿里死于公元 1570 年。他有四个儿子，两个年龄大一些的儿子——穆罕默德·拉扎（Muhammad Raza）和穆罕默德·贝格（Muhammad Beg）被指定继承

① 指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译者

父亲的职位，一个负责政务，另一个掌管军事。僧金·阿里死后，王子却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穆罕默德·拉扎去管理。穆罕默德·拉扎任命他的儿子管理他居住的德罗希（Drosh）、亚尔亨（Yarkun）、戈莱尚（Koreshan）和德拉斯（Dras）。于是他和弟弟穆罕默德·贝格发生了争吵。贝格有六个儿子，其中两个——穆赫塔里姆·沙（Mohtarim Shah）和胡什瓦格特（Khushwaqt）——非常勇敢。他们成功地干掉了自己的伯父和两个堂兄弟。穆赫塔里姆·沙于公元1585年来到奇特拉尔，从拉伊桑统治者手中篡夺了权力——拉伊桑统治者不得不逃到巴达克山。这样，穆赫塔里姆·沙，又被称作沙·格多尔一世，在奇特拉尔建立了格多尔王朝。公元1615年，马茂德·宾·沙·纳西尔（Mahmud bin Shah Nasir）带着援军从巴达克山回到奇特拉尔。尽管一开始他俘虏了穆赫塔里姆·沙，但后来他自己被杀死了。公元1634年，拉伊桑的继承者在巴达克山统治者的帮助下第二次进攻奇特拉尔。在这次斗争中，胡什瓦格特被杀死，穆赫塔里姆·沙逃脱，后来在袭击吉尔吉特时被杀死在那里。格多尔·沙和拉伊斯统治者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很久。前者有他们在马斯图季和亚辛执政的堂兄弟帮助，后者则得到了巴达克山统治者的支持。

穆赫塔里姆·沙一世有七个儿子，其中一个是僧金·阿里二世。下文我们将要看到，他向杀死他父亲的凶手复仇，给吉尔吉特带来了一场浩劫。失去权力后，他先去了阿富汗，随后于公元1780年到了德里，在莫卧儿皇帝沙·阿拉姆手下服兵役。后来，他带着在德里设法获取的财宝返回，在斯瓦特招募士兵，先是侵犯马斯图季，然后是奇特拉尔。拉伊斯家族的统治者逃到了巴达克山。正是由于僧金·阿里二世在奇特拉尔的胜利，他的兄弟们才得以从阿富汗回到奇特拉尔，胡什瓦格特的儿子们也得以从巴希格尔（Bashgal，即努里斯坦）返回。就在再度控制奇特拉尔之后，僧金·阿里二世于公元1712年入侵吉尔吉特，将这一地区变成了废墟。沙·拉伊斯·汗根本就没有提及这次入侵，想必是它发生在戈里特姆王公统治期间。公元1745年的一天，僧金·阿里二世外出打猎时被拉伊斯家族的一个支持者杀死在打猎的地方。他的弟弟，与胡什瓦格特罗阇遗孀结婚的穆罕默德·古拉姆继

承了他的权力。但胡什瓦格特的儿子沙·阿拉姆不到两年就杀死了穆罕默德·古拉姆，自己登上了奇特拉尔的王位。僧金·阿里二世的两个儿子先后继承了沙·阿拉姆的王位。到公元1774年，这两个人都离开了人世。

此时奇特拉尔的王位发生了空缺。拉伊斯家族的支持者把沙·阿卜杜尔·卡迪尔·宾·马茂德（Shah Abdul Qadir bin Mahmud）从巴达克山带了回来。但过了一年,即1775年,沙·阿卜杜尔·卡迪尔·宾·马茂德再次被胡希瓦格特的儿子——弗拉穆尔兹·沙（Faramurz Shah）赶回到巴达克山。弗拉穆尔兹·沙征服了许多地方，据说领土的一边扩展到了吉尔吉特的边界，另一边延伸至杰迦特赛拉伊（Chaghat Serai）的边界。他在位16年。公元1790年，他在其叔叔沙·阿夫扎尔（Shah Afzal）和沙·法齐尔（Shah Fazil）的煽动下被人杀死。起初，沙·阿夫扎尔掌握王权，相安无事地统治了一段时间，王位由他的弟弟沙·法齐尔继承。沙·阿夫扎尔的三个儿子长大成年后，便发动战争反对叔叔沙·法齐尔。尽管沙·法齐尔得到了胡什瓦格特家族凯罗拉·沙（Khairullah Shah）的儿子达拉布·沙（Darab Shah）的帮助，但还是被侄子们杀死。公元1778年，穆赫塔里姆·沙二世格多尔登上了奇特拉尔的王位。此后，格多尔家族成员与胡什瓦格特家族成员之间的斗争开始了。

沙·法齐尔死后，凯罗拉·沙把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法齐尔的儿子谢尔·江（Sher Jang），并派谢尔·江去统治贝尼（Beni）。他的另一个女儿与汗·巴哈杜尔（Khan Bahadur）结了婚，他派汗·巴哈杜尔去统治马斯图季。然后他去攻打奇特拉尔，但被击败，不得不返回马斯图季。第二次进攻奇特拉尔，他取得了胜利，穆赫塔里姆·沙二世与其兄弟们逃走。凯罗拉到了德罗希，并与沙·阿夫扎尔的遗孀结了婚。任命了沙·拉扎（Shah Raza）管理德罗希、谢尔·江管理阿因（Ain）、汗·巴哈杜尔管理奇特拉尔后，凯罗拉·沙返回到马斯图季。后来，穆赫塔里姆·沙得到了阿富汗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帮助，从汗·巴哈杜尔手里夺回了奇特拉尔。在随后的同胞惨杀中，谢尔·江和凯罗拉被杀死。最终在1818年，沙·努鲁兹·汗（Shahnauroz

Khan）坐到了奇特拉尔的王位上。他任命自己的兄弟萨尔·布兰德·汗（Sar Buland Khan）管理德鲁希，穆赫塔里姆·沙管理马斯图季。就在这些事件发生时，胡什瓦格特家族沙·阿拉姆的儿子巴德沙·汗（Badshah Khan）来到布尼亚尔，成了当地的统治者。然后他向自己的女婿穆赫塔里姆·沙的统治区马斯图季进发。尽管在战争中未能夺回马斯图季，但通过和平的外交策略，穆赫塔里姆·沙同意把马斯图季移交给他，自己去了德莱胡（Trekhu）。但即便到了德莱胡，穆赫塔里姆·沙也无法安身，先是在战争中与凯罗拉的儿子达拉布·沙相遇，后来又经历了巴德沙·汗和马立克·阿曼的联合侵犯，但最终还是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与此同时，巴德沙·汗死去，马立克·阿曼和穆赫塔里姆·沙一起试图夺取布尼亚尔和瓦尔谢古姆（Warshegum）。当时布尼亚尔的统治者是沙·布鲁希（Shah Burush）。在解决了布尼亚尔的事务后，穆赫塔里姆·沙和马立克·阿曼又向吉尔吉特进发，并把他们对布尼亚尔的征服情况写信告诉了巴里特姆（Baritham，正确地说应是Goritham）。他们来到吉尔吉特，在得到戈里特姆对他们占领布尼亚尔的承认后返回了自己的国家。

这样，穆赫塔里姆·沙二世格多尔成了奇特拉尔的最高统治者，自公元1833年—1837年在位。但在得到这个位置前，他不得不和他的兄弟沙·纳瓦兹（Shah Nawaz）竞争。沙·纳瓦兹不幸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这为穆赫塔里姆敞开了即位的机会。穆赫塔里姆统治期间，占据马斯图季和亚辛的马立克·阿曼（Malik Aman）于1833年死去。马立克·阿曼有14个儿子，但只有三个能够掌权，只是他们还没有到达成熟的年龄，因此穆赫塔里姆·沙二世也完全控制了他们的领地。马立克·阿曼委托他的兄弟苏莱曼·沙（Sulaiman Shah）管理吉泽尔，另一个兄弟古瓦特·汗（Quwwat Khan）管理瓦尔谢古姆。马斯图季依然保持在马立克·阿曼的一个儿子弗莱曼（Vremen）手中。但一年后，苏莱曼·沙设法得到了马斯图季。可穆赫塔里姆·沙不愿意看到这一变动，他把马斯图季和瓦尔谢古姆都交给了古瓦特·汗。布尼亚尔也处在他的控制之下，但由布鲁希罗阇的儿子伊扎德·汗（Izzat Khan）代表他管理。按照蒙希·阿齐兹乌丁的说法，吉尔吉特的穆罕默德·

汗想赶走伊扎德·汗，于是攻打了布尼亚尔。古瓦特·汗失去权力后被杀死。就在此时，苏莱曼·沙冲进布尼亚尔为他死去的兄弟报仇。在这场激战中，苏莱曼·沙杀死了穆罕默德·汗和他的兄弟阿巴斯。随后他去了吉尔吉特，在那里统治了五年。[47]据说他对纳格尔实行了霸权。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蒙希·阿齐兹乌丁给出的时间比通常所知的时间晚了十年。按照他的说法，苏莱曼·沙是1835年占领吉尔吉特的，但沙·拉伊斯·汗却认为是1825年。

蒙希·阿齐兹乌丁也提到了苏莱曼·沙和穆赫塔里姆·沙二世格多尔之间长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奇特拉尔的统治者与布尼亚尔统治者阿扎德·汗（即伊扎德·汗）共谋，联合起来得到了巴达克山统治者的军事帮助。但苏莱曼·沙更狡猾，开始时他和穆赫塔里姆·沙二世之间有停战协议，但后来他从阿富汗寻求军事帮助。据说他以欺骗手段赢得了巴达克山的米尔，后来又杀了他。苏莱曼·沙最后在阿扎德·汗（即伊扎德·汗）手上掉了脑袋。苏莱曼·沙之死为在亚辛和马斯图季掌权的戈赫尔·阿曼的地位上升提供了机会。但在他当政前，布尼亚尔的阿扎德·汗罗阇（即伊扎德·汗）在吉尔吉特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穆赫塔里姆·沙二世于1837年死去，继承王位的是他的第五个儿子、即在面对自己兄弟塔贾莫尔·沙（Tajammul Shah）的叛乱时也能把持自己的沙·阿夫扎尔二世。但沙·阿夫扎尔二世的兄弟们和他的两个儿子——穆赫塔里姆·沙三世和米尔·阿夫扎尔（Mir Afzal）——常常给他添乱，带着从迪尔（Dir）和有时从阿富汗招募来的士兵一齐造反。统治了16年以后，沙·阿夫扎尔二世于公元1855年死去。以勇敢和慷慨而闻名的穆赫塔里姆·沙三世继承了他的王位。一年后，沙·阿夫扎尔的第二个儿子阿曼·乌尔·穆尔克（Amanul Mulk）从德拉辛（Drasin）的领地归来，在民众的同意下登上了奇特拉尔的王位，而穆赫塔里姆·沙则引退到了德罗希。正是在阿曼·乌尔·穆尔克在位期间，开始了与道格拉人的战争。

B（二）、B（三）亚辛和马斯图季的胡什瓦格特家族与布尼亚尔的布鲁沙伊

奇特拉尔的阿塔里格·僧金·阿里一世（Ataliq Sangin Ali Ⅰ）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名叫穆罕默德·贝格（Muhammad Beg），他有六个儿子。正如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弟弟胡什瓦格特奠定了胡什瓦格特王朝的基础。他设法把自己的控制范围从马斯图季扩展到亚辛，如我们在吉尔吉特历史中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在吉尔吉特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他自1640年—1700年统治着亚辛。他的孙子、沙·阿拉姆的儿子也即亚辛的第二任统治者沙·布鲁希（Shah Burush）在布尼亚尔建立了布鲁沙伊王朝（Burushai dynasty）。在苏莱曼·沙被谋杀后，正是沙·布鲁希的儿子阿扎德·汗（或伊扎德·汗）于1828年到1833年间以“苏丹代理人”的身份统治着吉尔吉特。布鲁沙伊家族在布尼亚尔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纳格尔统治者塔希尔·沙罗阇杀死阿扎德·汗（或伊扎德·汗）之后。阿扎德·汗的兄弟巴哈杜尔·汗在布尼亚尔和奇特拉尔历史上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巴哈杜尔·汗的儿子伊萨·巴哈杜尔（Isa Bahadur）在布尼亚尔和奇特拉尔持续执政，直至1860年道格拉人承认了它。当英国人试图在吉尔吉特建立以约翰·毕达尔夫为首的第一个政治代表处时，伊萨·巴哈杜尔的儿子阿克巴·汗（Akbar Khan）正在那里执政。

与他在布尼亚尔的孙子沙·布鲁希和在奇特拉尔的兄弟穆赫塔里姆·沙一世格多尔一起，胡什瓦格特罗阇在奇特拉尔和吉尔吉特之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奇特拉尔是巴达克山、瓦罕和阿富汗的近邻，所以它的历史也与这三个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胡什瓦格特占有的领土一边与吉尔吉特接壤，另一边隔着中间的山口与达丽罗和丹吉尔的部落地区相邻。在北面，他可以通过达尔科特山口和伊希戈曼边界进入瓦罕和巴达克山。他既可以干涉奇特拉尔政权，也可以向吉尔吉特推进，与那里的统治者塔拉汗展开竞争。对此，贪婪的纳格尔统治者也是虎视眈眈。胡什瓦格特选择了向吉尔吉特推进作为他将来的行动路线。他谙熟政治策略，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伟大的战士和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把总部建在谢尔堡的坚固要塞中，将孙子沙·

布鲁希安置在布尼亚尔，并以之作为前进的基地。另一位后人被他安排在位于高原上的加古奇堡垒中。有了这些铺垫，我们就可以理解亚辛未来的历史为什么会与加古奇、伊希戈曼和布尼亚尔紧密联系在一起。借助这些力量，胡什瓦格特的权位得以上升。不幸的是，现在的研究人员无法得到任何一本从亚辛统治者角度写的史书。奇特拉尔的家族史谈得更多的是两败俱伤的家族世仇而不是政治发展史，比如奇特拉尔和亚辛不仅反对吉尔吉特，而且也反对所有觊觎吉尔吉特主权的势力如纳格尔统治者、斯卡杜统治者和后来的锡克人、道格拉人。其他可得的历史解释未能十分公正地评价这个统治家族。然而，胡什瓦格特奠定了亚辛伟大成就的基础，这一点很清楚，因此值得用他的名字来纪念这个家族。通过控制吉尔吉特的历史进程，他给亚辛确定了一个新的历史角色，给只有外部力量才能阻止的、自己的继承者确立了一个新的前进方向。或者通过外交联姻，或者借助武力斗争，他对吉尔吉特内政的干预导致了对这一地区的实际占领。他的主要目标是阻止纳格尔统治者占领吉尔吉特。为此，他将吉尔吉特的贵族与民众区分开来，以尽可能争取他们当中大多数的支持。尽管他的成功未能在现有的资料中得到很好的记述，但他的继承者继续执行他的政策，成功地取得了吉尔吉特的权力。他播下的种子在他的曾孙苏莱曼·沙时代结出了果实——苏莱曼·沙成了一个从吉尔吉特到奇特拉尔这块土地上的强大统治者。这一功绩一直惠及到苏莱曼·沙的侄子戈赫尔·阿曼统治时期。戈赫尔·阿曼是中世纪这一地区产生的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者。他鄙视训练有素的锡克军队因格里姆·汗罗阇的懦弱而对吉尔吉特的入侵。在他出色的军事战略下，锡克人和道格拉人不得不逃离了吉尔吉特。通过在吉尔吉特的战斗，戈赫尔·阿曼重建了北部地区人民的荣誉和威望。尽管后来他的家族成员牺牲在道格拉人和英国人手上，但他在北部地区人民心中点燃的自由精神之火，一直激励着他们并肩英勇战斗，终于在1947年—1948年的自由之战中赶走了道格拉人。

在奇特拉尔，僧金·阿里一世的孩子们向东南进军，这使胡什瓦格特得以在马斯图季和亚辛创建政府。鉴于吉尔吉特统治者的软弱，

他把自己的孙子布鲁希罗阇安置在布尼亚尔的前进营地谢尔堡中。阿里·谢尔·汗在吉尔吉特的统治（公元1600年—1632年）末期，因为对吉尔吉特王位继承的分歧，当地人民分裂了。它给胡什瓦格特的行动提供了机会。纳格尔统治者沙·格玛尔也盯着吉尔吉特的事态发展。除了听说布鲁希罗阇准备入侵吉尔吉特外，没有人完全知道胡什瓦格特的行动。但这种准备工作不是孤立无援的，因为阿里·谢尔·汗的支持者沙·格玛尔不得不与班迪布尔、巴达克山和奇特拉尔这三个地区的统治者作战。据说胡什瓦格特派出了由他的第二个曾孙马立克·阿曼指挥的军队。沙·格玛尔在这些战斗中全部获胜，作为赏赐，他得到了切萨尔（也叫希纳基）的领地。吉尔吉特的王位仍然完整无损地保留在塔拉汗人的手中，阿里·谢尔·汗的王位由阿里·海达尔·汗继承。当阿里·海达尔·汗被胡什瓦格特抓住并死于亚辛后，斗争的第二阶段开始了。他的侄子可汗·米尔扎罗阇作了吉尔吉特的国王。可汗·米尔扎罗阇的女儿贾瓦尔（贾瓦希尔）·可敦嫁到了斯卡杜。在升任“苏丹代理人”后，拉舒被赋予了为塔拉汗挽救局面的使命。但胡什瓦格特的行动也不慢。他运用外交手段赢得了杀死可汗·米尔扎的沙·格玛尔的支持。大概就在此时，胡什瓦格特推进到了吉尔吉特。这一事件的历史不是很清楚，好像这次推进是与奇特拉尔统治者僧金·阿里二世联合进行的。这次联合行动迫使瓦齐尔拉舒去了斯卡杜，很可能在巴尔蒂斯坦的支持下把贾瓦尔（贾瓦希尔）·可敦带了回来。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沙·格玛尔再次让自己的大儿子沙·费尔道斯罗阇和寡居的贾瓦尔（贾瓦希尔）·可敦结了婚。他们婚后生下了一个名叫吉·汗的儿子。胡什瓦格特再次行动，引诱吉·汗和布鲁希罗阇的一个女儿结了婚。事实上，吉·汗还有另外两个妻子，其中一个来自于斯卡杜，一个来自于纳格尔。这种复杂的婚姻关系导致了吉·汗死后的王位继承问题。对此，胡什瓦格特扮演了重要角色。结果，贾瓦希尔·可敦不得不把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中，这是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看到自己的外交努力没有白费，胡什瓦格特罗阇在贾瓦希尔·可敦第二个任期上的第十一年即公元1700年，心满意足地死去。他在吉尔吉特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同时还把纳格尔统治者从吉尔吉

特赶走。

贾瓦希尔·可敦于公元1705年死去，沙·戈里特姆罗阇继承了她的王位。在沙·戈里特姆的长期统治期间，亚辛统治者忙于亚辛和奇特拉尔之间两败俱伤的战争，这场战争一直到苏莱曼·沙在亚辛和马斯图季变得强大起来才结束，吉尔吉特也在此期间见证了另一个瓦齐尔毛拉·贝格的崛起。苏莱曼·沙在强大之前曾被奇特拉尔统治者沙·纳瓦兹驱逐，有时还到吉尔吉特罗阇戈里特姆的王宫中避难。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他让自己的妹妹和戈里特姆罗阇的小儿子阿巴斯罗阇结了婚，并由此在吉尔吉特获得了坚固的立足之地。当时吉尔吉特的派别政治分化了人们的忠诚，有些人支持他，另外一些人支持瓦齐尔毛拉·贝格。关于戈里特姆罗阇的大儿子穆罕默德·汗在这一时期是如何被驱逐出吉尔吉特的，历史记载并不清楚。穆罕默德·汗先去纳格尔避难，因受到冷遇，又从纳格尔逃到了斯卡杜。沙·拉伊斯·汗只是因为穆罕默德·汗的被驱逐和他在纳格尔受到的冷遇就指责瓦齐尔毛拉·贝格。但穆罕默德·汗的离去也符合苏莱曼·沙的利益，因为他从中满意地看到了妹夫阿巴斯罗阇得到王位的清晰前景。然而，我们知道穆罕默德·汗在斯卡杜受到款待，当地统治者还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当苏莱曼·沙谋杀了年老的戈里特姆罗阇后，政治形势实际上已经明朗。于是苏莱曼·沙和瓦齐尔毛拉·贝格之间的权力斗争开始了。公元1800年，瓦齐尔毛拉·贝格夺权后仅六个月，苏莱曼·沙便带着补充的力量返回吉尔吉特，将他杀死并成为那里的主人，达到了胡什瓦格特瞄准的目标。1800年—1802年，苏莱曼·沙就成为从吉尔吉特到奇特拉尔这一大片领土上的最高统治者，这是他取得的第一个成就。

穆罕默德·汗罗阇在斯卡杜迅速作出反应。在取得了当地统治者的军事援助后，他决定返回。沙·拉伊斯·汗写道，他先到了古雷兹，并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但却没有提到其停留的目的。穆罕默德·汗罗阇停留在那里的时间肯定是用来争取反对苏莱曼·沙的力量的。现在，我们发现了戈尔（Gor）的穆萨米·乌特曼和穆萨米·索米亚·古拉姆这两个瓦齐尔。在他们两个的倡议下，穆罕默德童年所在部落的

人民热情款待了他。在这些联合力量的支持下，穆罕默德·汗的力量得到壮大。他开始攻打吉尔吉特，占领了费尔道西亚堡，把苏莱曼·沙赶到了亚辛。1802年—1822年间，他在吉尔吉特的长期统治并不容易。当苏莱曼·沙在亚辛作准备时，他正在与纳格尔和罕萨的统治者纠缠。最后连这两位统治者也被苏莱曼·沙争取了过去。在一次联合行动中，穆罕默德·汗被苏莱曼·沙从吉尔吉特王位上赶了下来，抓去亚辛坐牢。公元1823年，苏莱曼·沙的妹夫阿巴斯罗阇当上了吉尔吉特的国王，苏莱曼·沙再次掌握了吉尔吉特的政权。后来阿巴斯罗阇和穆罕默德·汗罗阇都被杀死在亚辛。从1825年到1826年，苏莱曼·沙第二次成了吉尔吉特最有权势的人，他的权力范围覆盖了从奇特拉尔到吉尔吉特以及从巴达克山的边界到古雷兹的边界的所有土地。这是他的第二个辉煌成就。罕萨统治者迦曾弗尔·阿里是他的女婿，纳格尔统治者是他的盟友，在布尼亚尔是他安排的阿扎德·汗（或伊扎德·汗）罗阇。

穆罕默德·汗罗阇的两个孩子胡斯劳·汗罗阇及其妹妹萨希布努玛在他之后还活着。他们成为斗争的中坚力量。胡斯劳·汗罗阇去纳格尔统治者阿祖尔·汗那里避难，但很快被谋杀。苏莱曼·沙的地位招致了人们的嫉妒。这种情况导致了他和纳格尔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在奇特拉尔和亚辛也有权力斗争，苏莱曼·沙很难面对这一新的挑战，不久就被驱逐出吉尔吉特。萨希布努玛登基成为国王，布尼亚尔的阿扎德·汗（或伊扎德·汗）罗阇成为她的摄政王。正是他杀掉了苏莱曼·沙。苏莱曼·沙的权力上升是用智慧和勇气长期斗争的结果，他的衰落更多的是因为格多尔·沙和胡什瓦格特的后代内部缺乏团结，而不是因为军事失利。他的死再次给纳格尔统治者和他在亚辛的继承者就吉尔吉特事务进行调停敞开了空间。

赫希默杜拉·汗[48]描绘了19世纪上半叶吉尔吉特的悲惨画面，他以“亚辛、布尼亚尔和纳格尔王朝的短命政府与吉尔吉特自治的终结”为题，给这段历史作了一个总结性的概述。其总结如下：[49]

> 阿巴斯·汗结束了塔拉汗王朝的统治后，吉尔吉特成了

侵略者的战场——先是被亚辛统治者苏莱曼·沙占领，接着布尼亚尔统治者伊扎德·汗在这里建立政权，随后它又陷入了纳格尔统治者塔希尔·汗的武力占领之下。塔希尔·汗死后，他的儿子沙·西甘达尔继承了这一职位。此时，亚辛的戈赫尔·阿曼出现了。他杀死了西甘达尔，在吉尔吉特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格里姆·汗（西甘达尔的弟弟）借助从锡克人那里得到的军事援助，赶走了戈赫尔·阿曼，在锡克人的霸权下在吉尔吉特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蒙希·阿齐兹乌丁[50]描绘的是一幅不同的画面：

戈赫尔·阿曼与其他民族作战，并打败了他们。因此在奇特拉尔历史上，他的名字得到了人们满怀敬意的纪念。戈赫尔·阿曼最杰出的成就是征服了吉尔吉特，克什米尔的霸权就是在此时此地兴起的。这位勇敢的米赫德尔（Mihtar）曾四次入侵吉尔吉特。在他之前，瓦尔谢古姆人曾在苏莱曼·沙时代占领过吉尔吉特。但他死后，发生了一场亚辛王位争夺战，结果失去了吉尔吉特。当戈赫尔·阿曼即位时，统治吉尔吉特的是塔希尔·沙的儿子、纳格尔统治者西甘达尔·汗。1841 年，戈赫尔·阿曼发动进攻，打败了他，在吉尔吉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甘达尔的弟弟格里姆·汗从克什米尔统治者那里寻求到援助。因此，克什米尔的摩诃罗阇经拉合尔朝廷允许派出了一千名由纳泰·沙（Natthe Shah①）指挥的士兵。部队在前往吉尔吉特途中，西甘达尔·汗被杀。纳泰·沙对取胜丧失信心，要求增援兵力。援兵到达时，他趁戈赫尔·阿曼还没有来得及增兵就把他的副手从吉尔吉特赶了出去。于是，戈赫尔·阿曼退回了马斯图季。

1848 年，戈赫尔·阿曼入侵吉尔吉特，在剿灭了当地占

① 亦作纳图·沙（Nathu Shah）。——译者

领军后征服了吉尔吉特。当克什米尔朝廷获知这一消息后，又增派了两千名士兵、四门大炮。戈赫尔·阿曼前往迎战，但面对异常猛烈的炮火打击，他逃离了吉尔吉特。于是，吉尔吉特又被摩诃罗阇的军队收复。

1852 年，因憎恨道格拉人的高压统治，吉尔吉特老百姓向戈赫尔·阿曼发出邀请。尽管吉尔吉特驻扎了大量道格拉军队，但戈赫尔·阿曼仍然以极大的勇气向吉尔吉特发起进攻，把他们从吉尔吉特领土上赶走。在这次战役中，他将 1500 名道格拉士兵连同他们的司令官普布·辛格（Bhup Singh）一起消灭在一个地方，此后这一地点也就被称作“普布·辛格的山嘴”（Bhup Singh Pari）。1856 年，克什米尔的摩诃罗阇派出一支大军再次占领了吉尔吉特，并任命伊萨·巴哈杜尔作了布尼亚尔的“塔纳达尔”（Thanedar）。1857 年，当摩诃罗阇古拉伯·辛格（Ghulab Singh）的注意力集中在德里叛乱时，戈赫尔·阿曼再次占领了吉尔吉特堡垒。摩诃罗阇古拉伯·辛格的儿子摩诃罗阇兰比尔·辛格（Ranbir Singh）派出另一支军队开往吉尔吉特。这支军队还在行进途中，戈赫尔·阿曼于公元 1860 年去世。

蒙希·阿齐兹乌丁的记述来自 1897 年他在奇特拉尔英国代表处担任蒙希①一职的经历。赫希默杜拉·汗依据的是弗雷德里克·德鲁的记述。1877 年，弗雷德里克·德鲁写了一本名叫《印度的北部屏障：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通常解释》的书。在书中，他谈到了 1825 年至 1842 年间从苏莱曼·沙到格里姆·汗的五次变化，内容如上文所说。对戈赫尔·阿曼（他写成了 Gaur Rahman，戈尔·拉赫曼），他没有什么好印象，他的叙述大多来自道听途说。以下的引文足以理解他的思维方式。

---

① 一种管理文书、帐目等类事务的职务。——译者

尽管他没有机会像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的特奥多雷（Theodore）一样大肆屠杀，但他在本性上很有可能是嗜血的。有许多传言谈及他的残暴和兽行；达尔德人通常对生命不大在意，但他的所作所为使他变得令人憎恶。至少有一次他把一个小孩抛出去，用剑在空中将其砍死……我相信这是一个事实。他们说他生病时会杀死一些人，用作献祭（niyaz）。[51]

然后，德鲁讲述了戈尔·拉赫曼（应为戈赫尔·阿曼）如何征服了吉尔吉特，又如何派“两个锡克团由纳图·沙（Nathu Shah）上校指挥。这事大约发生在1842年。当时，锡克人还没有占领阿斯托尔这个缓冲国，但已使阿斯托尔向他们纳贡；为确保沟通联络，锡克人在出发前在阿斯托尔建立了驿站。”接着他讲述了玛特拉·达斯（Mathra Das）以及他在沙罗特（Sharot）和戈尔布尔（Gulpur，应为Golapur，戈拉布尔）之间布满石头的原野上被戈赫尔·阿曼打败的故事。然而，据说纳图·沙挺身“应战戈尔·拉赫曼”。最后的结果如下：

但在他们屈服之前，谈判就开始了。奇怪的是，最终同意锡克人占有吉尔吉特，边界划定在双方军队对峙的地方——的确，这也就是通常的吉尔吉特边界，戈尔·拉赫曼把女儿嫁给了锡克指挥官纳图·沙。不仅如此，就连同在那里的戈尔·拉赫曼的盟友罕萨罗阇（迦曾·汗）和纳格尔罗阇也做了同样的事，两人都把女儿嫁给了纳图·沙。这样，和平达成了。

当然，纳图·沙没有把吉尔吉特完全交给要求援助的格里姆·汗罗阇，他们组建了一个联合政府。格里姆从分拨给他的老百姓那里获取一定的费用，但我认为，更多的税收交给了锡克政府；一小部分锡克军队（因为锡克人随后酝酿的麻烦）宁可避开斯利那加而穿过克什米尔去了旁遮普。这样，事情得到了解决。这就是摩诃罗阇古拉伯·辛格在英国人的两个协议下（协议双方分别是锡克朝廷和他自己）接受克什

米尔时的王位继承情况。[52]

在德鲁的叙述中，关于锡克人统治下的吉尔吉特的实际形势相当模糊。另一方面，1866 年正在吉尔吉特的雷特奈尔博士在他的《1841 年—1848 年达尔德斯坦编年史》中更加确切地评价了实际形势。他写道：

> 1845 年，格里姆·汗继承他兄弟的位置，担任了吉尔吉特的统治者（尽管他是伊斯兰教徒，但仍称作罗阇），支付了一部分金额，在吉尔吉特保留了纳泰·沙指挥下的部分克什米尔军队。罕萨、纳格尔和亚辛诸罗阇（戈赫尔·阿曼派他的兄弟哈里尔·阿曼到谢赫·伊玛目·乌丁那里去了）现在希望与克什米尔保持良好关系，尤其是当克什米尔代表，残暴的纳泰·沙和他同样不受欢迎的继任者阿塔尔·辛格（Atar Sing）被伊斯兰教的总督调走后。
>
> 1846 年，塔希尔·沙的另一个儿子，戈尔（Gor）的罗阇格里姆·汗，邀请纳泰·沙，在邻近吉尔吉特的巴辛（Basin）战胜了戈赫尔·阿曼。当时，古拉伯·辛格的一群官员与吉尔吉特的罗阇（瓦齐尔·辛格、兰吉特·罗易、巴赫舒、阿里·巴赫希和艾哈默德·阿里·沙，均是纳泰·沙的兄弟或堂兄弟、表兄弟）通过条约联合管理这个国家。（参见下一章）
>
> 克什米尔和它在印度河东边的属国由英国分给印度教徒古拉伯·辛格。位于印度河以西的吉尔吉特因此就从摩诃罗阇的领土中分割出去了。严格地说，吉尔吉特既不是克什米尔的属国，也不是吉拉斯的属国。[53]

雷特奈尔博士深信他在上文所提出的历史叙述。他进一步说：

> 1866 年，当我化装成一个布哈拉毛尔维，带着伊斯兰教

学习的证明书跨过克什米尔边境线的时候，我发现罕萨、纳格尔、达丽罗、亚辛和奇特拉尔各部落在奇特拉尔的领导下联合起来把克什米尔的侵略者从吉尔吉特堡垒赶走。……我的随从被各色各样没有根据的故事吓坏了，我们这个群体从大约五十人缩减到三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原因在于摩诃罗阇害怕我会发现并报告他违反了1846年签订的关于出售克什米尔给他的那个条约，这个条约以印度河作为他西边的边界。因此，在1866年，无论位于印度河另一边的吉尔吉特如何受到质疑，认为地位非法，而只要离得越远，罕萨和纳格尔就越不止一次地严厉惩罚克什米尔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侵犯的地区是自上14个世纪以来就保持着自治权的地方，正如我们在1891年11月2日的《泰晤士报》上承认的一样。[54]

雷特奈尔博士是这样描述实际形势的："当我在1866年访问吉尔吉特的时候，这里几乎没有统治者，克什米尔的侵略部队只是在吉尔吉特堡垒仅数码的范围内享有控制权。"[55]

德鲁和雷特奈尔博士各自用自己的风格描述了1846年以后的事件。德鲁继续写道：

1852年，桑特·辛格（Sant Singh）在吉尔吉特堡垒中任指挥官或塔纳达尔。数英里之外的努布拉还有一个堡垒，由罗摩·丁（Ram Din）指挥的廓尔喀团占领。普布·辛格归巴旺吉（Bawanji）和阿斯托尔的后备军掌握。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戈尔·拉赫曼察觉并驱使他利用了这个机会：突然之间，他带领一支军队包围并分隔了这两个堡垒。[56]

雷特奈尔博士在提供他的编年史时，再一次显得更为确切：

1850年——吉拉斯人对阿斯托尔的袭击给入侵吉拉斯制

造了机会。由于不是克什米尔的附属国，吉拉斯没有被包括在1846年的条约中。摩诃罗阇宣布他是根据英国政府的命令行事的(斜体字系我所加)。对王公别有用心的计划，穆扎法尔阿巴德周围的首领们大惊失色。锡克人派出一支大军，但在吉拉斯堡垒前被击败。

1851年——巴赫希·哈里·辛格（Bakhshi Hari Singh）和迪万赫里金德（Dewan Hari Chand）受命带领10000名士兵进攻吉拉斯。他们成功地摧毁了吉拉斯堡垒，并消灭了支持吉拉斯的山区部落。

1852年——受压迫的吉尔吉特人杀死了摩诃罗阇的首席官员桑杜·辛格（Santu Singh）和罗摩丹（Ramdhan）①。人民再次支持戈赫尔·阿曼，他打败并杀死了普布·辛格和罗甘乌丁（Ruknuddin），还迫使克什米尔军队越过印度河退到阿斯托尔。[57]

弗雷德里克·德鲁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结果："从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起，摩诃罗阇的领土，哈尔毛希以下以印度河为界，哈尔毛希以上即是拥有印度河两岸的国家巴尔蒂斯坦，在巴旺吉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兵力。不再往前推进似乎成了古拉伯·辛格的固定政策。"[58]

这样，在吉尔吉特人的邀请下，戈赫尔·阿曼从道格拉人手里夺回了吉尔吉特，在这里一直统治到1860年去世为止。在戈赫尔·阿曼发起的勇猛战争中，古拉伯·辛格失去了统治吉尔吉特的希望。戈赫尔·阿曼重新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再次让自由之风吹向了这一地区的人民。

C（一）斯卡杜的默格本家族

迄今为止，关于巴尔蒂斯坦早期的历史资料很少。在上一章，我们已经注意到佛教发展的两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至少从佛教自克

① 原文如此，当是上文之桑特·辛格和罗摩·丁。——译者

什米尔或吉尔吉特传入的贵霜时代就开始了。第二个时期发生在公元8世纪初吐蕃对这里的征服时，那次征服的结果是在世界的这一地区留下了许多藏文岩刻。公元751年，吐蕃人在吉尔吉特被打败。正如我们较早看到的一样，不久，在这一分区（sub-region）就发生了朝代更替——在理查德·M·埃默森（Richard M. Emerson）[59]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理查德·M·埃默森在追溯巴尔蒂斯坦自公元8世纪起国家的形成和起源时，把它与两个因素联系在一起：第一，农业发展所用灌溉技术的推广；第二，突厥（鞑靼）统治对该地区的税收以及军队的给养费。这一说法掩盖了历史事实，至少在贵霜时代国家就已开始形成，当时黄金的开采极大地扩大了该地区的经济规模。但仍未发现有关政权连续性的证据。不过，A. H. 弗兰克[60]已经谈及"达尔德人的移民"以及"公元500年—1000年前后的吐蕃—达尔德王国（Tibeto-Dard kingdoms）"。另一方面，F. W. 托马斯[61]提到巴尔蒂斯坦王朝的"匈奴血统"，并推定西藏文献中所谓的斯卡杜国王伊湿伐罗跋摩（Isvaravarman）就是匈奴的一个国王。吐蕃人涉及该地区的时间必定在其创始人松赞干布（死于公元649年或650年）对吐蕃的统一[62]之后。以承认中国人在北方的统治为代价，松赞干布的继任者对吐蕃政权的扩张持续了近两个世纪。正是为了反对吐蕃政权的扩张，克什米尔的统治者拉利达迪蒂亚·穆克塔皮陀（Lalitaditya Muktapida，公元699年—736年）才采取行动，可能还进入了这一地区。[63]除了埃默森就斯卡杜城中见到的水渠（图27）所作的含糊不清的猜测，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拉利达迪蒂亚·穆克塔皮陀对巴尔蒂斯坦的实际占领会是穆克塔皮陀的成就。与此猜测相对，我们所掌握的大量有关吐蕃岩刻以及藏族佛教在巴尔蒂斯坦盛行的证据表明，只要松赞干布王朝稳固，那么吐蕃政权就可以继续控制该地区。只有到公元9世纪末或10世纪初，这个王朝的权力解体之后，巴尔蒂斯坦才有可能出现新的政权。就像巴尔蒂斯坦现有的口头传说所证实的那样，新政权是旧政权形式的延续。当然，新政权的起源并非先天固有的，它是新种族因素移植到早期该地区佛教徒中的结果。这种移植必定与两个新的发展因素相关：第一，回纥突厥人（Uigur Turks）[64]在新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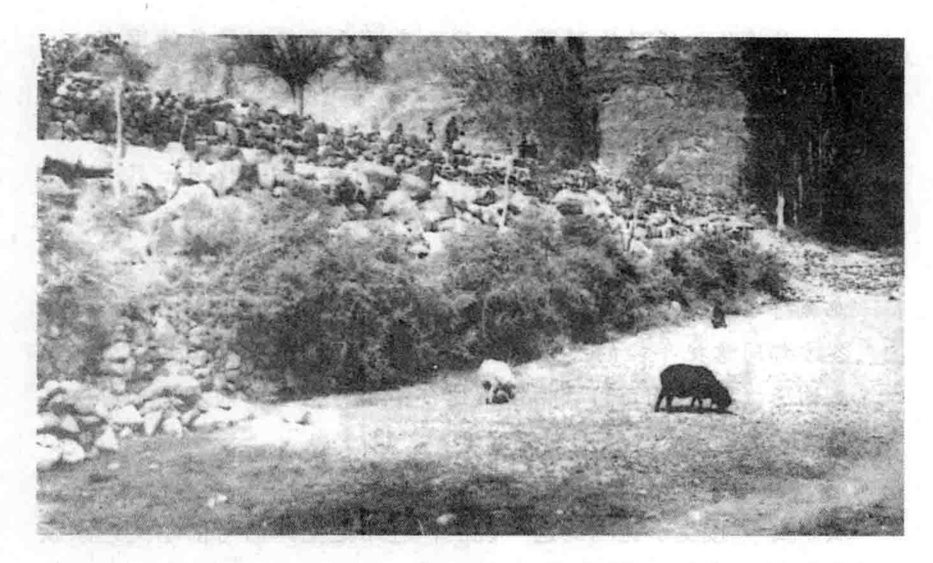


图 27　斯卡杜：中古时代用巨石砌成的水渠

势力扩张——可能是想控制从喀喇昆仑山口到印度的贸易；第二，突厥人在吉尔吉特、罕萨和纳格尔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这些家族的成员常常跨越冰川到达巴尔蒂斯坦，正如我们较早看到的那样（见本章“塔拉汗王朝的第二阶段”节）。然而，斯卡杜当地的传说也提到了一位克什米尔人，他与当地的一位公主结婚后，开始了默格本家族在斯卡杜的统治。这些零星的证据只是说明了该地区在连接克什米尔与印度其他地区以及新疆与中国其他地区上的重要性。尽管这些资料很有限，但是将贸易前景与黄金资源和农业发展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后，我们就容易理解经济基础必定会导致在巴尔蒂斯坦产生国家的形式。正是这些资源的流通以及为维持不同种族秩序而实施的各种措施使得政权得以继续发展。本书这一部分试图详细说明新王朝建立后中世纪巴尔蒂斯坦地区的政权。

王朝的起源

关于王朝起源的最早记录可以在 G. T. 瓦因（G. T. Vigne）[65] 的书中找到，书中这样写道：

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王族一度近于灭绝。最后的甲布（Gylfo）只留下一个女儿，这个国家的十二位瓦齐尔或大人物都曾向她求婚。甚至在她选定所属之后，仍可在希格里（Shikari）村的一块大石头上看到一位一手拿着金棒另一只手拿着一个装有同样金属的囊袋的托钵僧（Fakir），人们发现他总是在那里，好像那块大石头就是他的休息地和房子。很快，他赢得了非同寻常的圣名，而且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来历。各方都同意把年轻的公主嫁给他——不仅斯卡杜，而且格塔克均德（Katakchund）、伯尔戈达、图尔迪、隆多的罗阇们都把自己的家族起源追溯到他这里。

坎宁安[66]接受了瓦因的这一说法，进而把托钵僧与伯尔戈达家族的祖先默格本布迦（Bokha）看作是同一个人。另一方面，毕达尔夫[67]根据坎宁安的编年表说，“一位名叫伊卜拉欣·沙的伊斯兰冒险家篡夺了巴尔蒂斯坦的政权，建立了默格本……传统认为伊卜拉欣·沙最初从埃及经印度斯坦来到这里，当时的国教是佛教。”赫希默杜拉·汗[68]也采用了同样的传说，但在他那里，年轻的伊卜拉欣来自克什米尔，并与当地的公主结了婚。这些研究者把伊卜拉欣放到了公元11世纪初，但坎宁安和毕达尔夫却使他成了建立吉尔吉特新王朝的阿祖尔·贾姆希德的同时代人。

正如阿祖尔·贾姆希德来到吉尔吉特一样，伊卜拉欣·沙这个冒险家在斯卡杜的出现就像一个谜。两个人都与当地公主结婚，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赫希默杜拉·汗没有提供伊卜拉欣之后七代的任何资料，不过他提供了如下的家谱：伊卜拉欣—斯塔格·僧格（Istak Singe）—齐格·僧格（Zik Singe）—布鲁克·僧格（Brook Singe）—西格·僧格（Sik Singe）—特姆·戈里特姆—沙·戈里特姆。除了将布鲁克·僧格和齐格·僧格两人的位置调换外，毕达尔夫也同意这个家谱。毕达尔夫分析了这些统治者的名字，将他们分为僧格和特姆两组。第一组即僧格家族，源自希纳语；第二组源自布鲁沙斯基语。换句话说，他觉得这些名字是混合产生的。他的意思可能是，西藏地区

的统治头衔是“默格本”（意为“总指挥”）；希纳语和布鲁沙斯基语的名字对他来说意味着外部的干涉以及“继承的中断，即不是从父亲到儿子的正常继承”。即使在那时也不清楚，公元10世纪初就已衰弱的吐蕃统治是如何导致了公元13世纪初王朝发生的变化。

更早一些，在塔拉汗王朝的第二个时期已经提到，公元1016年即海达尔·汗罗阇执政的第19年，沙·哈德姆（Shah Hatam）或贾·特姆（Cha Tham）罗阇从罕萨逃出，经希斯帕尔冰川（可能在希格尔登陆）来到巴尔蒂斯坦。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的希格尔史中看到的那样，很有可能是他在希格尔建立了艾玛贾王朝。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我们便可以把戈里特姆看作是这一王朝在希格尔的第十任统治者。据说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著名的伊斯兰教圣徒大艾米尔赛义德·阿里·哈姆达尼在公元1379年前后来到希格尔。[69]与他同时期的斯卡杜统治者是沙·戈里特姆。也正是在他统治期间，大艾米尔穿越了斯卡杜（图28、29）。斯卡杜和希格尔两个王室的名字中都有“戈里特姆”，表明他们可能是同一个国王。而且，正如毕达尔夫所说的那样，希格尔的戈里特姆可能征服了斯卡杜。在正常情况下，名字中的“特姆”



图28　希格尔：艾姆巴利格清真寺侧景，为赛义德·阿里·哈姆达尼所有。



图 29　希格尔：艾姆巴利格清真寺中的木雕

部分只有在希格尔才能见到，在斯卡杜也只有两位统治者的名字有这一部分。然而，斯卡杜的默格本很快就宣布独立，而且我们发现他们使用了自己的名字和头衔。根据当地的传说，希格尔的戈里特姆接受了伊斯兰教，但斯卡杜的沙·戈里特姆没有接受伊斯兰教。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释这个传说：大艾米尔来到希格尔和哈伯罗，当地统治者从他那里接受了伊斯兰教。但他并没有到斯卡杜，因此这里的统治者没有接受伊斯兰教。可能是当地人民继续信奉佛教，同样也可能是戈里特姆被从斯卡杜赶走，政府由考考尔·僧格（Khokhor Singe）接管，就如赫希默杜拉·汗提供的家谱所宣称的那样。

赫希默杜拉·汗给出了下面的斯卡杜继承图：考考尔·僧格—戈达久·僧格（Ghotachoh Singe）—巴哈拉姆·久（Bahram Choh）—默格本布迦（Makpon Bokha）。按照坎宁安的说法，最后一位统治者的统治年代大约在公元 1500 年。也就是说，在最后一个统治者统治期间，也就是大艾米尔走访过后约 150 年，另外一位伟大的伊斯兰教传教士米尔·希姆斯·乌丁·伊拉基（死于希吉来历 932 年/公元 1525 年）为传播伊斯兰教（图 30）来到了斯卡杜。他与他的追随者进行的传教



图 30　希格尔：米尔·希姆斯·乌丁·伊拉基（逝世于公元1525年）的修道院，屋顶上建有克什米尔风格的塔。

工作的成果是伊斯兰教在该地区得以广泛传播，而佛教最终销声匿迹。从斯卡杜统治者的家谱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此后所有的名字都是穆斯林。因此，可能是布迦在米尔·希姆斯·乌丁·伊拉基的影响下接受了伊斯兰教。

也许是根据米尔·纳杰姆·乌丁·萨基布（Mir Najmuddin Thaqib）提供的证据，赫希默杜拉·汗[70]也让努尔巴赫希教派的创始人哈兹拉特（Hazrat①）赛义德·穆罕默德·努尔巴赫希（Sayyid Mohammad Nur Bakhsh）于希吉来历840年/公元1438年—希吉来历850年/公元1448年之间到了巴尔蒂斯坦。但后来的阿卜杜尔·哈米德·哈瓦尔（Abdul Hamid Khawar）[71]先生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赛义德并未到过巴尔蒂斯坦。根据未出版的《情人的馈赠》（Tohfatul Ahbab）一书中提供的证据，阿卜杜尔·哈米德·哈瓦尔先生认为努尔巴赫希教派是米尔·希姆斯·乌丁·伊拉基传入的。今天，在巴尔蒂斯坦的哈伯罗分区仍

① 一种尊称。——译者

然可以发现大量该教派的信徒。

建都斯卡杜

斯卡杜城建立的具体时间已无从得知，它在吐蕃统治时期的地位也只能靠猜测，但佛教徒（图14）在这一时期居留在萨德巴拉湖附近的门特尔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许是当时垒坝成湖，更可能的情况是当时首次挖掘了灌溉渠道。但是，离现在的广播电台不远、当时靠近斯卡杜城的地方还有一座佛教寺院，那里有一些公元6—8世纪的雕刻，现已恢复。目前公开的赤陶印章上的后笈多婆罗谜文和浮雕是吉尔吉特分区典型的菩萨与窣堵波图案。上一章我们提到，在斯卡杜北部约20英里的戈尔（Gol）附近，也有相似的岩刻。显然，这种佛教似乎是由佛教徒从吉尔吉特地区引入的。

有了这些背景材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赫希默杜拉·汗[72]要谈到达尔德人自吉尔吉特的迁移及其在这里的殖民。他提到了5个这样的殖民地：（1）格亚洛夏尔布（Gyalo Shalpo）建立了格尤尔（Gyol）或戈尔（Gol）；（2）希格尔格亚尔布（Shakar Gyalpo）建立了大希格里（Shikri Kalan）、琼达（Chaundah）和巴亚曼格布（Byamanqapu）；（3）戈尔德阿松久（Koru① Asun Choh）定居在克尔布（Kharbu）；（4）巴尔格玛尤尔久（Barq Mayur Choh）建立了巴尔格纳格（Barq Naq）居住点；（5）龙且（Lon Chhe）在紧靠着格久拉湖的印度河河谷的下游建立了定居点。正是希格尔格亚尔布家族留下了一个名叫希格里（Shikri）的女儿，她后来与伊卜拉欣·沙结了婚。这五个殖民政府只有三个幸存下来：第一个与第二个合并成一个，第三个与第四个合并成另一个。

赫希默杜拉·汗进一步记录了默格本巴哈拉姆·久（Bahram Choh）时期龙且统治者阿达德·久（Adat Choh）对希格里的入侵。巴哈拉姆的瓦齐尔金登吉里（Chandangiri）用计将阿达德·久诱入一条深沟杀死。阿达德·久的军队逃散了。就在此时，默格本巴哈拉姆的军队挺进到巴舒，将其全部占领。当巴哈拉姆的儿子布迦年幼时，巴

① 原文如此，应为Kord。——译者

尔格玛尤尔久占领了希格里。布迦的养父玛拉德姆·柴尔巴（Malatam Zerpa）救了他，并抚养他直至将他扶上王位。布迦打败了巴尔格玛尤尔巴（Barq Mayurpa）。这样，最初的五个定居政权整合成一个由默格本布迦领导的政府。根据民间传说，布迦可称是1500年左右巴尔蒂斯坦国真正的奠基者。赫希默杜拉·汗提出的巴尔蒂斯坦建国年代是公元1490年到1515年。按照他的说法，是布迦兴建了斯卡杜城，这样命名是因为斯卡杜在巴尔蒂语中指的是希格里与萨德巴拉两块高地之间的低地。据他所说，斯卡杜[73]这个名字也是为了纪念家族英雄阿斯格尔甲布（Askar-Gyalpo）。更远一些，斯卡杜这个名字可以联系到布迦将其居住地从希格里迁移到他在斯卡杜建造的最著名的堡垒（图31—34），即今天所知的克尔福久（Kharpocha）堡中这一事实。印度河从堡垒的东部和北部流过。正是在他的任期内，米尔·希姆斯·乌丁·伊拉基来到了斯卡杜。在现有的信息背景下中重新审视所有这些传说，它们都把布迦看作是巴尔蒂斯坦国的真正缔造者——他的总部在斯卡杜，住在克尔福久堡中，俯视整个平原，允许米尔·希姆斯·乌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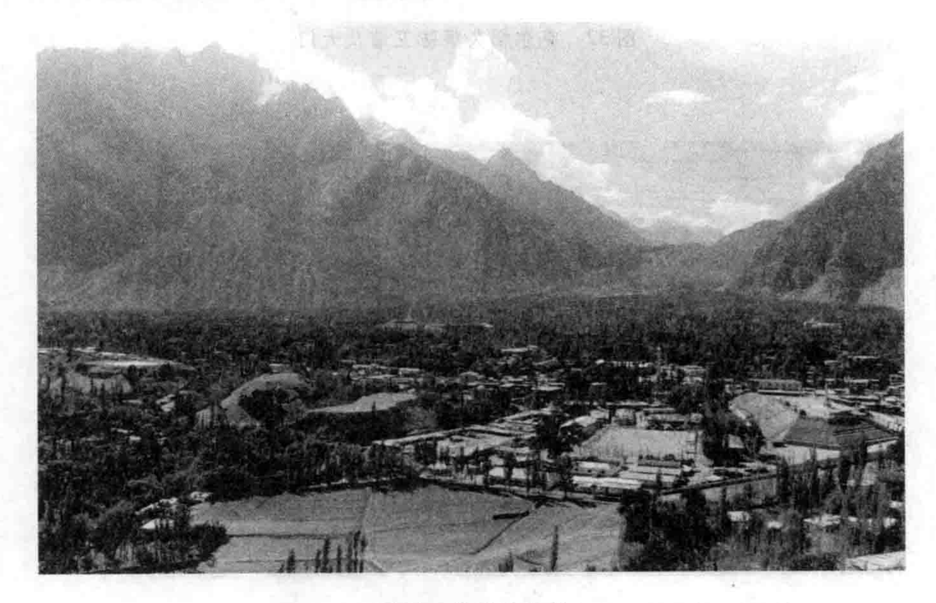


图31　俯瞰斯卡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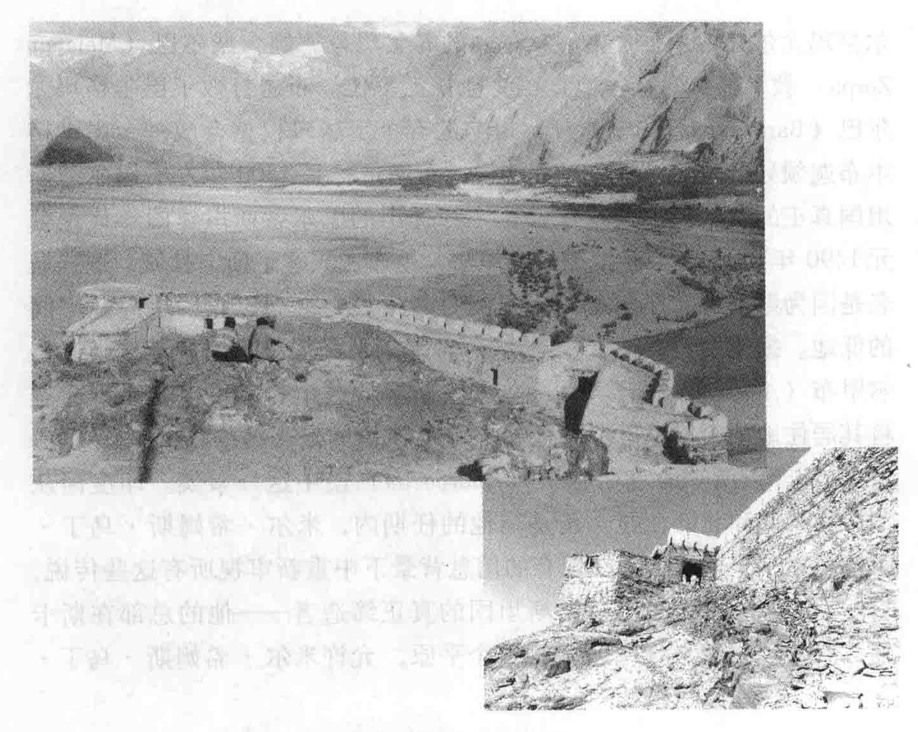


图 32　克尔福久堡防卫墙及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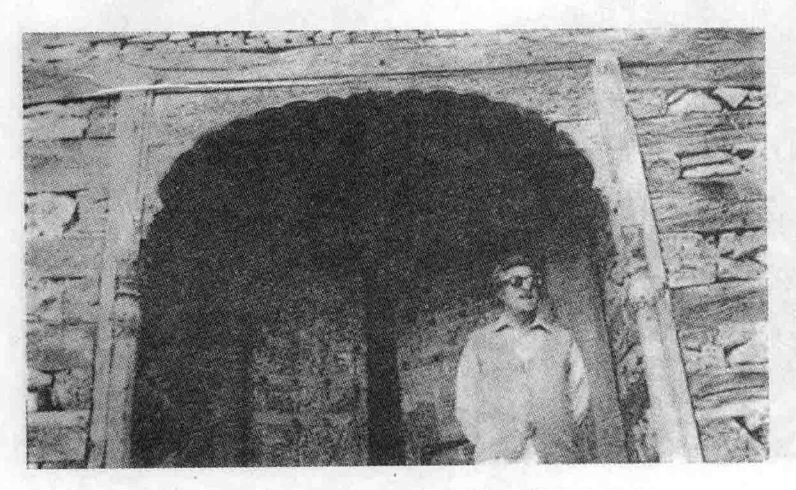


图 33　斯卡杜：堡垒的入口处，经道格拉人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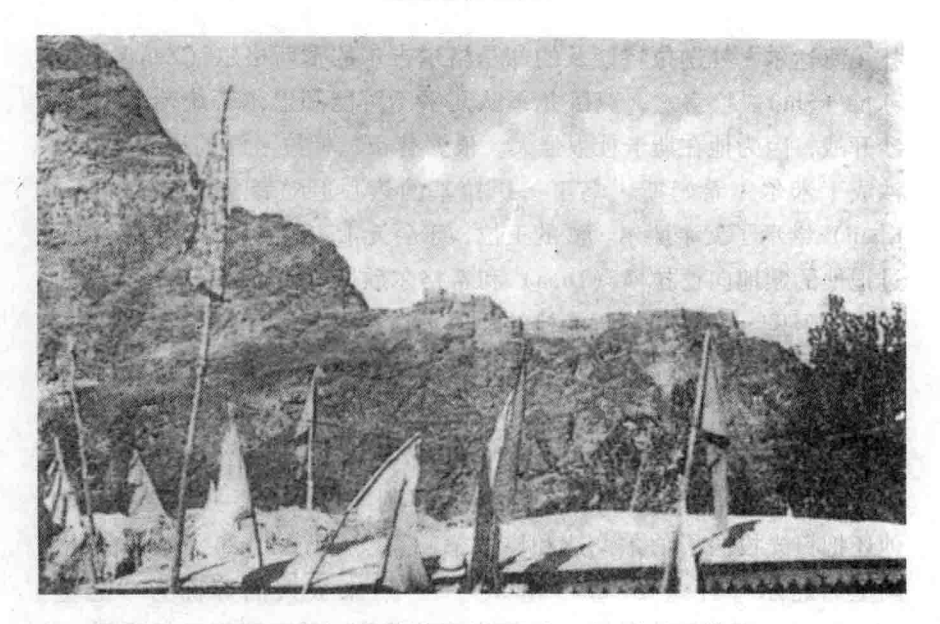


图 34 斯卡杜：克尔福久堡防御工事一角和堡墙

伊拉基传播伊斯兰教，给当地带来了新的文化基础。人们也知道从吉拉斯与克什米尔引进了人口与工匠，他们为巴尔蒂斯坦建构了新的社会经济基础。定居在巴尔蒂斯坦的克什米尔人被称为“道迦米巴”（Doghamipa）与“格纳巴”（Kanapa）。与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的文化商业联系也得以开启。斯卡杜发展成为这一地区政治权力羡慕的对象。随着后来罕萨、纳格尔、吉尔吉特和克什米尔的统治者到这里寻求政治避难，默格本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管辖。与此同时，来自喀什噶尔的蒙古人和来自克什米尔的莫卧儿人也将权力之手伸向这里。巴尔蒂国如何应对这些力量，请见下文。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巴尔蒂政权

默格本布迦为巴尔蒂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儿子谢尔·沙一世（Sher Shah Ⅰ）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基础。谢尔·沙的统治时期是公元 1515 年—1540 年，想必他见证了 1532 年中亚的莫卧儿统治者阿布·赛德·汗（Abu Said Khan）苏丹的入侵。不过，这次侵略行动基本上没有触及他的领地。虽然赛德苏丹亲自去了希格尔，但米尔

扎·海达尔·杜迦拉特谈及的却是格尔吉尔的赞斯格尔（Zanskar）与苏特（Sut）。换言之，莫卧儿军队几乎不可能和巴尔蒂统治者谢尔·沙开战，因为他在斯卡杜很强大。根据赫希默杜拉·汗的说法，谢尔·沙成了米尔·希姆斯·乌丁·伊拉基的热心追随者。阿里·汗（Ali Khan）继承了父亲谢尔·沙的王位，于公元1540年—1565年在位。通过把他的领地向德拉斯（Dras）和希格尔欣库（Shigar Shanghu）方向扩张，阿里·汗提高了斯卡杜的地位。在希格尔欣库遭受吉拉斯和阿斯托尔人的攻击时，他将其纳入了自己的领土，并在通往阿斯托尔的山口设立了哨所。阿里·汗的王位由他的儿子迦齐·米尔（Ghazi Mir）继承。迦齐·米尔于公元1565年—1595年在位，他继续实行其父的扩张政策，推翻了龙且王室后把边界扩展到斯塔格，吞并了隆多谷地。他还把目光投向了伯尔戈达和格尔德赫夏（Kartakhsha），派他的儿子阿里·谢尔·汗（Ali Sher Khan）——后来被人们尊称为“恩金”（Anchan），即“伟大的”——带领军队前往。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个地区当时处在拉达克的统治下，但那里驻扎的军队被击败，结果这两个地方被巴尔蒂斯坦吞并。接着，阿里·谢尔·汗又向苏特和布特克尔布（Budh Kharbu）进军，占领了吉格登（Chagtan）和伯希古姆（Pashkam / Pashkyum）。过了一些年，拉达克的甲布侵入苏特，杀掉了阿里·谢尔·汗派驻在布特克尔布的克本（Kharpon）。作为回应，阿里·谢尔·汗进攻拉达克，一直打到拉达克的首府。后来，签订了一项条约，将戈塔默德曲（Ghotamat Choh），即吉尔吉拉（Girgira）河定为巴尔蒂斯坦与拉达克的边界线。这样，吉尔吉拉河与格努赫（Ganukh）村一起被斯卡杜统治者占领。江央南嘉（Jamyang Namgil，或Namgyal）把自己的女儿明多格甲莫（Mandok Gyalmo）嫁给了阿里·谢尔·汗,阿里·谢尔·汗戴着胜利的桂冠回到了斯卡杜。

莫卧儿与巴尔蒂国的关系[74]始于迦齐·米尔统治时期，阿克巴于1586年征服了克什米尔之后。对此，《阿克巴本纪》（Akbarnama）[75]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由于他们不断地奉上礼物表示臣服，M. 贝格（M. Beg）去了小西藏的统治者阿里·罗易（Ali Rai）那里，毛拉·塔利布·伊斯法哈尼（Mulla Talib Isfahani）和米赫德尔·亚里（Mihtar

Yari）到了大西藏的统治者那里，并写信抚慰他们。”在另一处[76]又记载道：

> 当时发生的事件之一是 Tibet 的统治者把他的女儿送到宫廷里来了。自从克什米尔被并入这个帝国，那个国家（Tibet）的统治者就不断求饶。小 Tibet 的统治者阿里·罗易想到也许可以将其女儿送进王子的内室。皇上（H. M.）赞成这一做法。22 日，她与该国的贡礼一起被送进来。

这些引文清晰地表明了莫卧儿皇帝阿克巴与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它们两个分别以 Tibet-i-Khurd 和 Tibet-i-Buzurg 的名字出现——的统治者之间的边界关系。这种关系始于征服克什米尔之后。对这次征服，必须放在米尔扎·海达尔·杜迦拉特将其效忠的对象从苏丹阿布·赛德转向胡马雍皇帝这一背景中加以判断。情况似乎是，因为苏丹阿布·赛德进入了 Tibet 和巴尔蒂斯坦，德里的莫卧儿皇帝便想将其边界向北推进。后来，当巴尔蒂斯坦和 Tibet（实际上是拉达克）的关系疏远时，阿克巴皇帝想派军攻打阿里·罗易。我们从《阿克巴本纪》[77]一书中了解到，当阿里·罗易（原文误写为 Ali Zad）囚禁了大西藏的统治者后，招致了军事攻击。由于无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阿里·罗易只好认可了大西藏前任统治者的后代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使节被派到喀什噶尔，去进一步打探 Khata（中国）皇帝的消息。关于阿里·罗易，更多的资料于 1603 年被发现，记载如下：[78]

> 当时发生的事件之一是 Tibet 统治者阿里·罗易动乱的平息。在此之前，皇上就已得到报告，阿里·罗易通过征服大 Tibet 的统治者获取了大量黄金，变得飞扬跋扈胆大妄为，在克什米尔煽起了大规模的动乱。皇上命令拉合尔的省督古里吉·汗（Qulij Khan）出兵援助克什米尔总督穆罕默德·古力（Muhammad Quli），教训一下这个嗡嗡乱叫的小虫。据说，古里吉·汗派出了 3000 名骑兵和 500 名滑膛枪手（bargan

dozes)，由他的儿子赛夫拉(Saifullah)带领去救援穆罕默德·古力·贝格。听到援兵到来，阿里·罗易灰心丧气，不战而逃。皇家军队进军到马匹能到达的地方，然后便返回了。

这些记载清楚地证实了，在阿克巴时期，莫卧儿的统治并没有扩展到巴尔蒂斯坦。当时双方的关系十分友好，阿里·罗易还把女儿送到了莫卧儿后宫。但正如侯赛因·汗博士在巴尔蒂传说基础上特别提到的那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莫卧儿公主古尔·可敦（Gul Khatoon）嫁给了阿里·罗易。事实上，与阿里·罗易结婚的是拉达克公主。但是，莫卧儿此后的影响可以在斯卡杜的建筑物及所用的莫卧儿风格的大理石中看到（图 35、36）。即使到现在，仍可在目前的罗阇的宫室中见到大理石做成的狮子雕像、柱子和墓石。不过，这些大理石碎片可能不是阿克巴时代留下的，因为即使到了贾汉吉尔时期，巴尔蒂国与莫卧儿之间的关系仍很紧张。阿卜杜尔·哈米德·拉合里（Abdul Hamid Lahori）[79] 和穆罕默德·萨莱赫·甘布（Muhammad Saleh Kanboh）[80] 都记载说，克什米尔省督卡西姆·汗（Qasim Khan）的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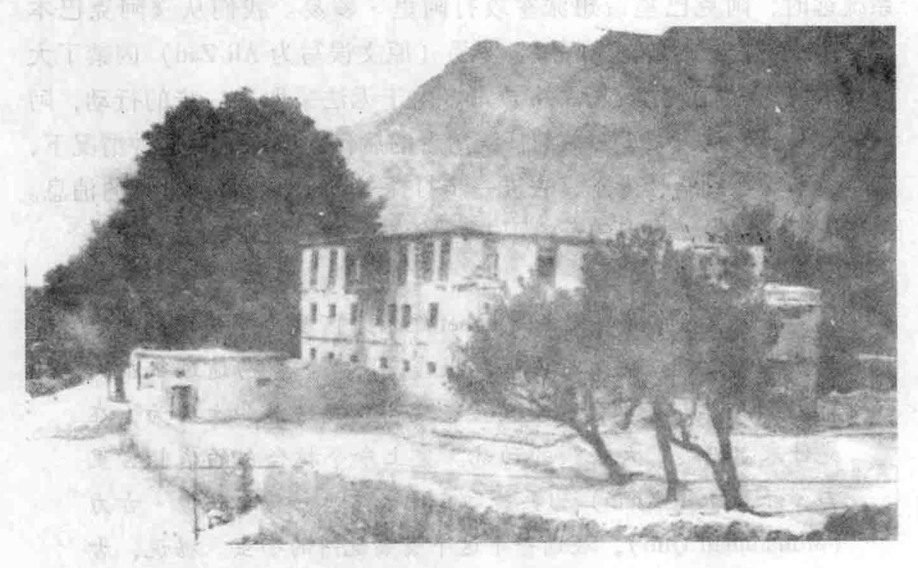


图 35　斯卡杜：罗阇的宫殿，经现代修复后的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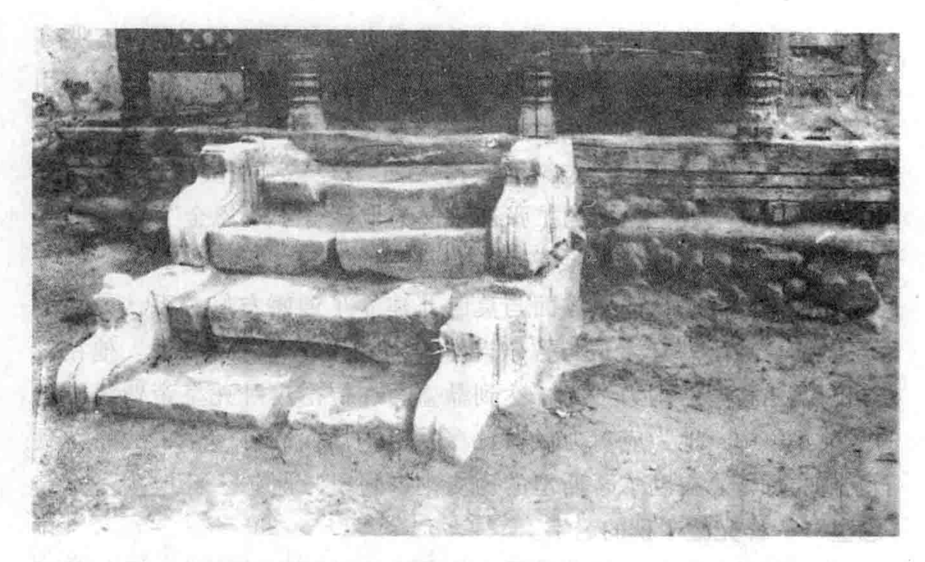


图36 斯卡杜：罗阇的官殿门前的大理石台阶

子哈希姆·汗（Hashim Khan）因讨伐 Tibet 大败而被贾汉吉尔皇帝所杀。这次入侵应发生在阿里·罗易时期，而不是在他儿子的时期。

据赫希默杜拉·汗所言，阿里·罗易全称阿里·谢尔·汗·恩金，于1595年—1633年在位。赫希默杜拉·汗提供了大量关于“阿里·谢尔·汗入侵达尔德斯坦”并将其领土扩张到哈尔毛希的细节。据说，阿里·谢尔·汗同时还从布鲁沙尔、吉尔吉特、吉拉斯与阿斯托尔带回大量俘虏，将他们安置在斯卡杜、伯尔戈达、图尔迪与格尔德赫夏。这次入侵应发生在吉尔吉特的罗阇萨希布基兰统治时期（公元1561年—1635年），如上文在塔拉汗王朝第五阶段的历史中所讲的那样。实际上，吉尔吉特统治者与斯卡杜统治者迦齐·米尔的关系很好。当奇特拉尔入侵吉尔吉特时，前者向后者求助。阿里·谢尔·汗前来援助，帮助吉尔吉特打败了奇特拉尔，同时将其领土扩张到哈尔毛希。稍后我们会看到，吉尔吉特的贾瓦希尔·可敦嫁给了阿里·谢尔·汗的第三个儿子艾哈默德·汗。

赫希默杜拉·汗也谈到了位于斯卡杜克尔福久堡下面的明多格（Mandok）堡。它由阿里·谢尔的拉达克王后明多格·甲莫所建，风格

与克尔福久堡完全不同，呈现出某种莫卧儿建筑的特征。同时，明多格王后还因建造了具有莫卧儿风格的花园和用水渠将萨德巴拉湖水引入明多格堡而闻名。这些用巨石建成的水渠保存至今。另一方面，阿里·罗易因修建了萨德巴拉湖而获得荣誉。这样，阿里·谢尔·汗在他父亲时代便已成名，他的扩张征服又为他赢得了“恩金”即“伟大的”的声名。他实行福利政策，建新楼，盖新房，显示出其建设国家的眼光。与此同时，他一方面与莫卧儿建立了通婚友好关系，另一方面还以其卓越的外交才干与吉尔吉特统治者建立了友好关系。他在位期间，巴尔蒂国的国力强大，达到鼎盛。在抗击莫卧儿皇帝贾汉吉尔的坚决斗争中，他为应对力量对比严重不平衡而制订的军事战略得到了极高的赞誉。在巴尔蒂斯坦的历史中，阿里·谢尔·汗成为一个与“恩金”一样光耀千秋的名字。

由于阿里·谢尔·汗的继承人为争夺王位而自相残杀，巴尔蒂国的强大地位未能得以保持。阿里·谢尔·汗有三个儿子：阿达姆·汗（Adam Khan），因其年龄最大而被任命为王储；阿卜达尔·汗（Abdal Khan），受命管理伯尔戈达与格尔德赫夏的财政收入；艾哈默德·汗（Ahmad Khan），管理隆多。三人中以阿卜达尔最为强大，他于1633年夺取了王位。阿达姆·汗逃往克什米尔，最后去了德里，向莫卧儿皇帝沙·贾汉寻求庇护。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阿卜达尔侵入希格尔，杀死了穆罕默德·汗的十一个儿子，并占领了它。通过与阿达姆·汗联合，穆罕默德·汗的第十二个儿子哈桑·汗（Hasan khan）也从希格尔逃到德里寻求庇护。手里有了这两个当地王子后，沙·贾汉开始悉心准备干涉巴尔蒂斯坦的事务，为父亲贾汉吉尔时期莫卧儿军队遭受的失败报仇。巴纳尔西·帕拉萨德·萨克色那（Banarsi Prasad Saksena）[81]推测，这次复仇的另一个动机是要抓住克什米尔的两个前国王哈比布·查克（Habib Chak）与艾哈默德·查克（Ahmad Chak），当时他们都在巴尔蒂斯坦寻求庇护。赫希默杜拉·汗进一步指出，阿卜达尔正在利用查克统治者在克什米尔挑起争端。克什米尔总督扎法尔·汗（Zafar Khan）奉命向斯卡杜进军。有关这次进军的细节、希格尔堡以及随后斯卡杜的两座堡垒的陷落，在穆罕默德·萨莱赫·甘

布[82]那里均有记载。阿卜达尔·汗与他的家人被俘，查克兄弟也被迫投降。公元1634年，扎法尔·汗将斯卡杜交给阿卜达尔的代理人穆罕默德·穆拉特·汗，自己迅速返回克什米尔，去镇压可能发生的叛乱。后来，为表彰阿达姆·汗的贡献，莫卧儿皇帝把斯卡杜奖给了他。阿达姆·汗本人继续留在德里，任命米尔扎·汗（Mirza Khan）作他的代理人（Naib）。故在随后的10年（公元1635年—1645年）中治理斯卡杜的是米尔扎·汗。但就在他试图宣布独立的时候，阿达姆·汗的女婿穆拉特·汗取代了他。作为阿达姆·汗的代理人，穆拉特·汗统治到1660年。在那以后到1680年，他以自己的名义在那里统治。穆拉特·汗的女儿嫁给了吉尔吉特的罗阇吉·汗（又名哈比布·汗），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83]

此时，阿达姆·汗本人同意在沙·贾汉属下效力，成为一个曼萨卜达尔（Mansabdar①），但他的领土并未成为莫卧儿帝国的一部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奥朗则布大帝时期。穆拉特·汗继续服从奥朗则布的统治，甚至在莫卧儿军队打败大西藏（拉达克）时倾力相助。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其他莫卧儿官员在这里任职，也没有发现莫卧儿的小股军队长久地占领过这里的任何堡垒。

随后，斯卡杜、希格尔和哈伯罗互相残杀。穆拉特·汗进兵格尔德赫夏，占领了由米尔扎·汗的儿子阿里·汗统辖的伯尔戈达。然后，他向图尔迪发起猛攻，最终包围了米尔扎·汗亲自防守的克尔门堡垒。经长久围困后，堡垒失陷，米尔扎·汗逃离了这个地方。格尔德赫夏落入了谢尔·汗手中，但阿里·汗逃到了哈伯罗，这又导致了对哈伯罗的战争。经过长期的拉锯战，哈伯罗堡也被攻破。接着，穆拉特·汗又向克尔布（Kharbu）和萨兰格克尔（Salangkhar）推进。就在此时，阿达姆·汗死去，穆拉特·汗从莫卧儿皇帝那里接受了同样的职位。吉尔吉特的麻烦也开始了，穆拉特·汗的女婿吉·汗或哈比布·汗罗阇也卷入其中。沙·穆拉特与希格尔的伊玛目·古力（Iman Quli）一起向吉尔吉特进军，但几乎提供不了什么帮助，吉·汗罗阇最终被

① 职位名，此处泛指“官员”。——译者

杀（参见本章“塔拉汗王朝的第六阶段”节）。后来，穆拉特·汗与伊玛目·古力之间发生了争吵。就在争吵解决的时候，穆拉特·汗死了。他死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最后，穆拉特·汗的兄弟谢尔·沙获胜，于1680年—1710年在位。继任谢尔·沙的是穆罕默德·拉菲·汗（Muhammad Rafi Khan）①，他于公元1710年—1745年在位。他的就位最终平息了格尔德赫夏统治者谢尔·汗引起的动乱。

巴尔蒂国的衰落与灭亡

莫卧儿的诸位君主并未干预巴尔蒂的自治。虽然阿达姆·汗和他的女婿穆拉特·汗自愿成为莫卧儿的曼萨卜达尔，但巴尔蒂国的领土完整并没有受到丝毫损害。不过，巴尔蒂的统治者在沙·贾汉与奥朗则布时期接受了莫卧儿君主的领主地位。巴尔蒂的衰落与其说是受到了莫卧儿的入侵，还不如说是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两败俱伤的自相残杀。莫卧儿人希望稳定它与突厥斯坦东部维吾尔地区的边界，因此，他们派军向小西藏（巴尔蒂斯坦）与大西藏（拉达克）开进，使当地统治者服从于其宗主权。这一想法看来是保持当地政权的附属地位，而不是建立一个中立（或缓冲）地带。但是，这种控制太模糊，以至于当地政权可以很自由地相互发动战争。除非其中有政权向其求助，莫卧儿对此几乎不加干预。正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当地首领之间不断的战争。在这些争战中，希格尔（下文会有详细解释）的伊玛目·古力成了最大的赢家。有关他的历史，记载于尚未出版的波斯文著作《希格尔志》（Shigarnamah）中。这部书可能写于他统治期间。

根据赫希默杜拉·汗[84]的说法，阿里·谢尔·汗·恩金之后，斯卡杜最重要的统治者是穆罕默德·穆拉特或穆拉特·汗，也被称为沙·穆拉特。他的事迹还在1894年赫希默杜拉在吉尔吉特时就在斯卡杜的民歌中被传唱。正是在他统治期间，这个国家得到了很好的治理，经济条件改善，大量石匠、珠宝商、皮革匠被从克什米尔移居斯卡杜。（图37—40）也正是在他统治期间，建筑物上开始使用大理石，克尔福久堡上建起了瞭望塔，在戈罗（Koru）还建造了新的堡垒。与西藏、

① 或译为穆罕默德·拉菲厄·汗（Mohammad Rafi' Khan）。——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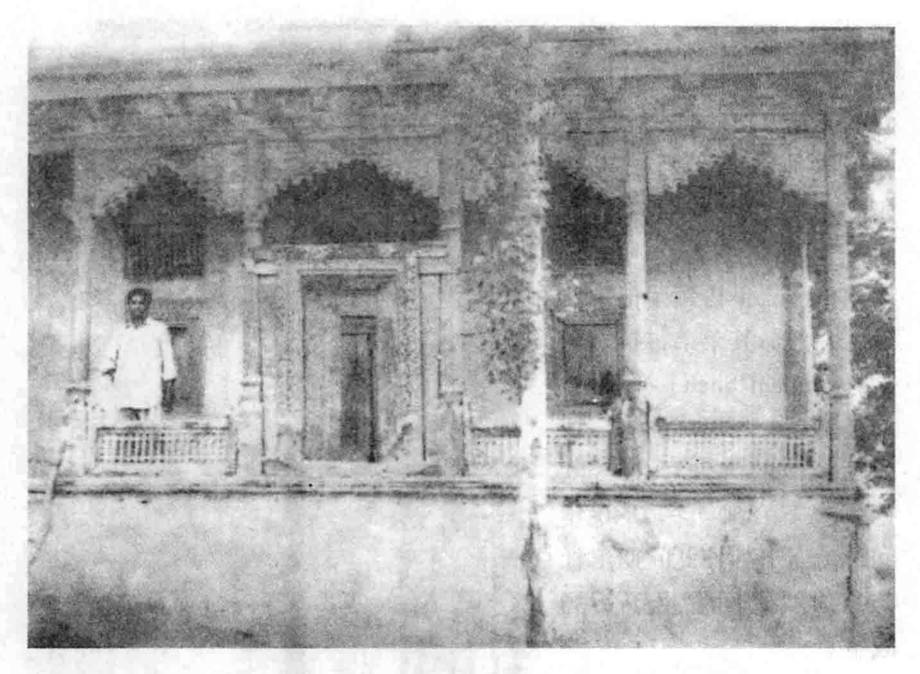


图 37　斯卡杜：特尤尔（Thayur）清真寺的精美木雕

喀什噶尔和克什米尔的交往和自由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文化发展。在赫希默杜拉・汗笔下，如同伊玛目・古力在希格尔和哈迪姆・汗在哈伯罗一样，阿里・谢尔・汗・恩金值得斯卡杜人民为之感到骄傲。

穆罕默德・拉菲・汗的王位由儿子苏丹・穆拉特（二世）继承。苏丹・穆拉特（二世）于1745年—1780年在位。在他统治期间，阿富汗统治者帖木尔・沙（Timur Shan）下属克什米尔的省督哈吉・格里姆・达特・汗（Haji Karim Dad Khan），带着由穆尔塔扎・汗（Murtaza Khan）指挥的大军于公元1779年入侵斯卡杜。他打败了斯卡杜的统治者，缴获了大量战利品。此后不久，希格尔统治者、苏丹・穆拉特的妹夫阿扎姆・汗杀死了穆拉特，将斯卡杜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1780年—1785年）。他任命穆奈巴・阿里（Monepa Ali）作他在斯卡杜的克本（Kharpon，总督）。穆拉特的小儿子穆罕默德・扎法尔・汗（Muhammad Zafar Khan）逃到了波里格（Purig，格尔吉尔）。几年后，阿扎姆・汗的妻子弗赫罗・尼莎（Fakhrunnisa）在希格尔激起叛乱。

叛乱中，阿扎姆·汗被杀。穆罕默德·扎法尔·汗顺利登基，于1785年—1787年在位。他的儿子阿里·谢尔·汗二世继他于1787年—1800年在位。阿里·谢尔·汗二世占领了伯尔戈达，并任命其弟弟古拉姆·沙（Ghulam Shah）管理格尔德赫夏。阿里·谢尔·汗死后，他的大儿子艾哈默德·沙于1800年—1840年间统治斯卡杜，此间斯卡杜与哈伯罗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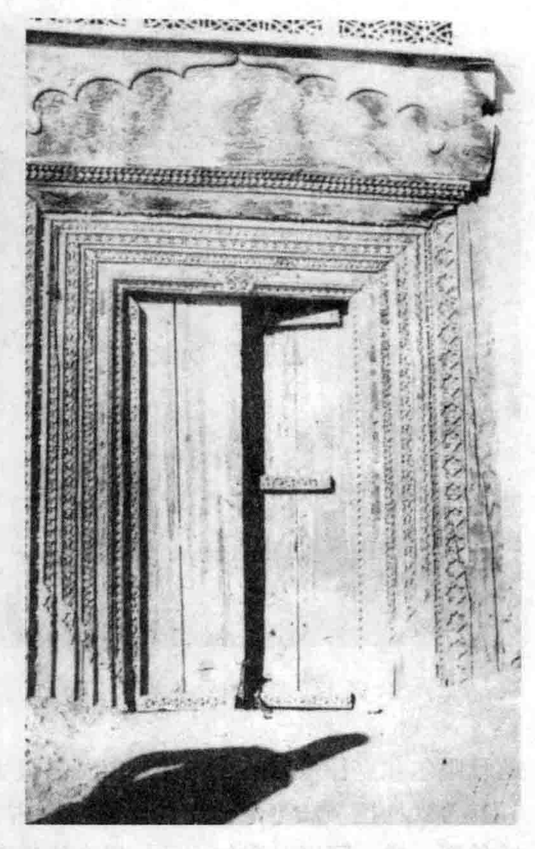


图38　斯卡杜：伊卜拉欣修道院的正门

这场战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据说艾哈默德·沙在与哈伯罗的战争中，曾在1832年—1864年间向克什米尔的锡克统治者求助。最终，哈伯罗统治者玛赫迪（Mahdi）战败被俘。根据福格[85]的记载，哈伯罗统治者被锡克人监禁起来。赫希默杜拉·汗认为福格的说法是真实的，但这经不起推敲，因为没有人会为了向邻邦扩张而向外求助的。真实的故事将在下面引用的G. T. 瓦因[85a]的解释中给出，他在此后不久访问过这一地区。锡克人的确挺进到了某些地方，但随后又不得不撤离。看来，巴尔蒂提高了自己的权威，并在德里的中央政权衰弱时履行了独立的权力。正是这个原因，侵略发生在帖木尔·沙时期；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锡克总督谢尔·辛格（Sher Singh）派兵攻打斯卡杜，不过瓦因认为，这被证明是一个失败。



图 39　斯卡杜：伊卜拉欣修道院正门的木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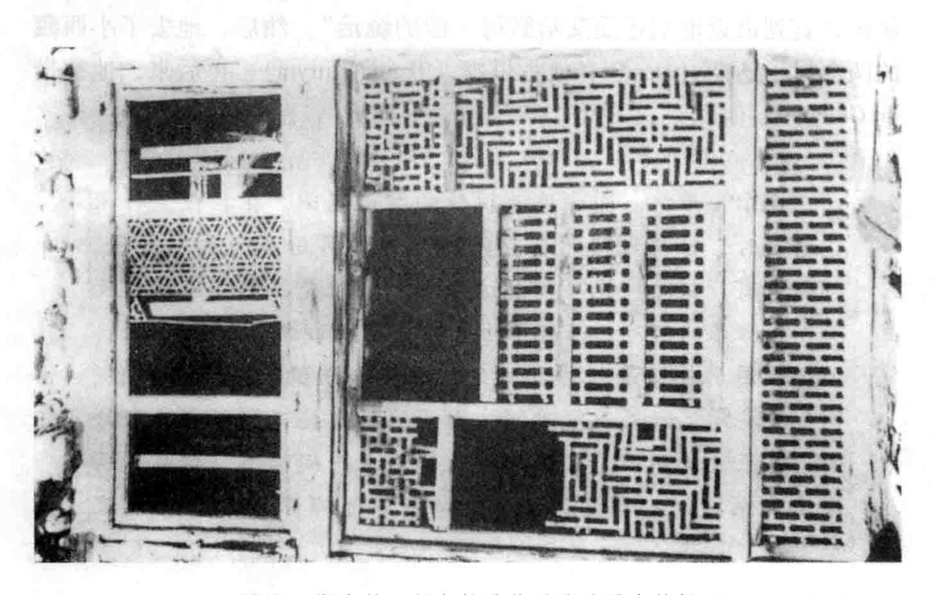


图 40　斯卡杜：伊卜拉欣修道院的雕木格栅

正是在艾哈默德·沙统治期间，这一家族因为他的第二个王后道拉特·可敦（Daulat Khatun）——希格尔的海达尔·汗的妹妹，开始了长期的不和。她废除艾哈默德·沙的长子、前妻之子穆罕默德·沙的继承权,让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阿里(Muhummad Ali)受命成为王储。这种家族纷争使穆罕默德·沙被疏远,逃到克什米尔去向锡克人求助,以获取自己的权力。正是家族纷争最终导致斯卡杜被道格拉人占领。

巴尔蒂斯坦在1835年的实际地位可以从G.T. 瓦因[86]的论述中看出来，他曾应艾哈默德·沙之邀访问了这一地区。在兰吉特·辛格的允许下，他违背克什米尔锡克总督的意愿，穿越了摩诃罗阇地区的边界。实际上，斯卡杜的罗阇们也害怕锡克人，为了对付锡克人，他们急于见到一位"英国的萨希布（Sahib①）"。在古雷兹（Gurys，正确讲应是Gurez，瓦因于1835年8月30日到达这里）后面，瓦因写道："我现在就要进入小西藏了，往后的一些日子我将告别人类居住区。"接下来，他谈到了蒂尔叶尔（Tilyl），这是"另一个山谷，有点像Gurys，它的东北部与吉申甘加河平行。"他清晰地写道，"蒂尔叶尔没有多少居民，直到最近他们还受艾哈默德·沙的统治"。然后，他去了小西藏的两个村子达斯（Das）和松古里姆（Thung-Kurym）。再后来，他被带到Godyh②。他说：

> 谢尔·辛格，即旁遮普现任的摩诃罗阇，在担任克什米尔总督时，曾与入侵的锡克人一起在8月份尽力向前开进，期望没有什么反抗就可以到达斯卡杜。但是，他们发现前面有一条狂暴的河流，河对岸的每块岩石后面都有一支火绳枪。他们试图用外交手段达到目的，但艾哈默德·沙十分狡猾，同他们拖延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他知道拖延的结果。寒冷的天气很快就到了，心寒意冷的锡克人仓促撤退，但暴风雪淹没了他们，成千数百人将生命留在了布尔济尔上面的高原上。[87]

---

① 一种尊称，意为"先生"。——译者

② 当是今地图上的古达依（Gudai/Godhai）。——译者

再往下，瓦因记载道："当我到达斯卡杜时，拉达克已经处在查谟罗阇的瓦齐尔（佐尔阿弗尔·辛格）率领的锡克人的占领之下。艾哈默德·沙的领土从丘尔巴特（Chorbut）扩张到了胡萨拉（Husara，即阿斯托尔）。沙·格多尔的国家奇特拉尔早就从小西藏独立出来了，吉尔吉特、纳格尔以及罕萨的罗阇们绝不会把他看作自己的上级。但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地区，艾哈默德·沙是哈伯罗、希格尔、基里斯、格塔克均德、图尔迪、伯尔戈达，以及劳亚尔（Royal）或隆多等地的宗主。就像希纳王子的印章一样，他的印章上也刻着下述文字：Ali Sher an dawur dadgur Kez-o-Yaft Ahmed Shah bur ada Zufur（译文：阿里，正义的真主的雄狮，经他的指引，艾哈默德·沙战胜了自己的敌人）。"[88]

这一长段引文确切地说明了1835年瓦因访问这个国家时巴尔蒂国与锡克人之间的政治形势。巴尔蒂国能够独立于锡克人，部分源于他们自身的力量，部分则要归因于帮助他们保持自由的天然屏障。

C（二）格尔德赫夏（克尔门）、隆多和阿斯托尔的罗阇们

这些小河谷中的罗阇们与斯卡杜的默格本家族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他们就是从这一大家族中分立出来的。前面提到的斯卡杜历史已经充分暗示了这些地区是如何被默格本的统治者征服的。格尔德赫夏的历史很少变化，因为该地区一边与拉达克交界，另一边与克什米尔接壤。赫希默杜拉·汗[89]就吉拉斯、斯卡杜、哈伯罗以及其他地方的移民如何形成了这些不同的居民点提出了一个传统的解释。这些定居者建立起由各个村庄首领组成的、自己的村落政府，还修建了堡垒，用以村庄的防卫。随着堡垒数量的增加，这一地区被称为"克尔门"，意为"一个有许多堡垒的国家"。它包括格尔德赫夏、图尔迪和伯尔戈达的居民点。也许当伊斯兰教在斯卡杜传播时，格尔德赫夏和伯尔戈达被拉达克的佛教喇嘛征服。此后，这两个地区就一直处于喇嘛教的控制之下，直至斯卡杜统治者迦齐·米尔就位时为止。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迦齐·米尔派长子阿里·谢尔·汗·恩金来到这里，

在征服这一地区后，将边界划定在戈达默德（Ghotamat，即吉尔吉拉河［Nala Girgira］）。上文已经提到，阿里·谢尔·汗任命他的二儿子阿卜达尔·汗管辖格尔德赫夏，任命最小的儿子管辖隆多。但格尔德赫夏的地方官员（Amil）是海达尔，海达尔死后由他的儿子米尔扎·汗担任。当阿卜达尔·汗征服了斯卡杜成为那里的统治者时，他将伯尔戈达和格尔德赫夏整合起来，委托米尔扎·汗来管理。后来，米尔扎·汗受阿达姆·汗的委托统治斯卡杜，但在他宣布独立时被沙·穆拉特废黜。公元1685年，沙·穆拉特任命他弟弟谢尔·沙作格尔德赫夏（克尔门）的统治者。他的后人一直在这里统治，谢尔·沙便成了克尔门统治家族的开创者。

谢尔·沙之后是他的儿子阿齐兹·汗（Aziz Khan），阿齐兹·汗又由萨达特·汗（Sadat Khan）继承。萨达特在任时，拉达克的喇嘛进攻克尔门，杀死了萨达特·汗和他的儿子们。但萨达特的两个小儿子阿扎姆·汗（Azam Khan）与沙·纳瓦兹（Shah Nawaz）设法逃脱。喇嘛在格尔德赫夏和伯尔戈达建立了政权。后来，当这两个孩子长大后，他们重建了自己的权威，并处死了来这里定居的拉达克人。阿扎姆·汗成了统治者，他的弟弟沙·纳瓦兹受命统治伯尔戈达，阿里·达特·久（Ali Dad Choh）受命成为军队司令。阿扎姆·汗死后，他的长子阿卜杜尔·拉希姆·汗（Abdur Rahim Khan）成为罗阇。阿卜杜尔·拉希姆·汗的王位由他的次子穆罕默德·阿里继承。继承穆罕默德·阿里王位的是他与第一位王后、斯卡杜统治者阿里·谢尔·汗二世之女所生的阿里·谢尔·汗。阿里·谢尔·汗与斯卡杜罗阇艾哈默德·沙的女儿结了婚。后来，在阿里·谢尔·汗第二次结婚时，艾哈默德·沙很不高兴，就占领了克尔门。阿里·谢尔·汗逃到拉达克避难。后来当佐尔阿弗尔·辛格征服拉达克时，阿里·谢尔·汗于1835年主动提议，帮佐尔阿弗尔·辛格在自己的领地内找到通往斯卡杜的道路，并参加了反对斯卡杜统治者的战争。

图尔迪的默格本统治者源于格尔德赫夏的阿扎姆·汗之子阿里·沙（Ali Shah）。后者的儿子艾哈默德·汗在道格拉军队到来之前一直在这里统治。

隆多一直由阿里·谢尔·汗·恩金的第三个儿子艾哈默德·汗统治，艾哈默德·汗的王位由他的第二个儿子阿里·沙继承。斯卡杜的穆拉特·沙去世时把儿子们托付给阿里·沙，希望他照顾他们，直至他们能够管理国家为止。但阿里·沙邀请了格尔德赫夏的谢尔·沙，帮他夺取了斯卡杜。后来，他又帮助谢尔·沙与哈伯罗和希格尔的统治者作战。当穆罕默德·拉菲·汗于公元1710年占领斯卡杜时，阿里·沙还在统治着隆多。他的王位由道拉特·沙姆谢尔（Daulat Shamsher）继承，再往下传给了阿萨德·乌拉·古力·汗（Asadullah Quli Khan），然后依次是穆罕默德·阿里·汗、米尔扎·汗以及他的儿子阿巴斯·汗，最后到阿里·汗二世，在道格拉人入侵时他仍在执政。

阿斯托尔被阿里·谢尔·汗·恩金征服，然后转到了艾哈默德·汗的儿子沙·苏丹手里。沙·苏丹是阿斯托尔统治家族的奠基人。其继承情况如下：

沙·苏丹（Shah Sultan）

|

阿里·贾巴尔（Ali Jabbar）

|

穆罕默德·拉扎·汗（Muhammad Raza Khan）

|

艾哈默德·阿里·汗（Ahamd Ali Khan）

|

沙·古力·汗（Shan Quli Khan）

|

穆拉特·阿里·汗（Murad Ali Khan）

|

道拉特·阿里·汗（Daulat Ali Khan）

|

沙·苏丹（Shah Sultan）

|

贾巴尔·汗（Jabbar Khan）

关于最后一位统治者，G. T. 瓦因写道：

晚上，我们受到了胡萨拉（Husara，即阿斯托尔）罗阇贾巴尔·汗的接见，第二天早上到达一座堡垒。这座堡垒位于胡萨拉河与其支流的夹角之间，由木石建成，上面建有方塔，足以抗拒土著小型武器的进攻。罗阇非常友好地欢迎我们，极为爽快地回答了我提的所有问题。他看来在36岁上下，容貌俊美，皮肤白皙，鹰钩鼻子很是突出，但毫不影响其外形。他的父亲沙·苏丹与艾哈默德·沙的妹妹结了婚，有三个孩子。在一次袭击中，他曾杀掉了迪拉瓦尔·汗（Dilawar Khan）的父亲和贝纳戈特（Benakot）的马立克（Malek），以及后来来访的贡代苏尔辛格（Gund-i-Sur Singh）的马立克。有人告诉我，艾哈默德·沙变得忌妒他了。[90]

弗雷德里克·德鲁写道：

直到这时（1842 年），锡克人尚未占领阿斯托尔这个中立国，但已使其附属于自己。在即将开拔前，他们建立了一个驿站以确保联络畅通。[91] 雷特奈尔博士提供了进一步的细节："一年后，同一位锡克将军带着3000 名骑兵和步兵被派往阿斯托尔，规定了当地物产的三分之一为贡品。他还在靠近阿斯托尔的索格尔（Sogar）村建立了一个哨所，用以存放弹药"。[92]

C（三）希格尔的艾玛贾家族

赫希默杜拉·汗[93] 在《希格尔志》[94] 一书的基础上介绍了希格尔的艾玛贾统治者的详细历史。随后，坎宁安在《拉达克史》中列出了一个谱系表。毕达尔夫也追随其后。联合委员会（Union Council①）的

① 一种地方基层政权组织。——译者

一位本地主席瓦齐尔·艾哈默德·迦兹瓦巴（Vazir Ahmad Ghazwapa）[95]写成了另一部详细的史书，该书以当地风俗传统为基础，充分利用了赫希默杜拉·汗的研究成果。两书给出了相同的谱系表。波斯文的《希格尔志》以诗歌形式写成，它的另一个名字为《希格尔的艾玛贾罗阇伊玛目·古力·汗战记》（Jangnamah Raja Imam Quli Khan Amacha Shigar）。顾名思义，这部作品极力赞美希夏姆·古力·汗（Hisam Quli Khan）之子、英雄伊玛目·古力。根据赫希默杜拉·汗的说法，这部作品写于希吉来历1166年或公元1752年。现有手稿中的注释表明，它的作者是赛义德·塔赫辛（Sayyid Tahsin），即写作《塔赫辛诗集》（Diwan-i-Tahsin）的那位诗人。

当地的传说提到了好几个定居的村落以及不同家族的统治。上文（塔拉汗王朝的第二阶段）已经谈到，最后，贾·特姆（Cha Tham）或沙·特姆（Shah Tham）从罕萨到了希格尔。虽然艾玛贾这个称谓在词源上来自中国，但它与梵文的头衔艾玛蒂亚（Amatya）[96]十分接近——Amatya 的意思是 Vazir 或“大臣”。在第五章中，我们曾提及最近在希格尔发现的梵文岩刻，就此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Amatya 或艾玛贾这个头衔。当地传说提到贾·特姆似乎是为最后一位统治者玛希杜（Mashido）效力的，因此很有可能贾·特姆就是玛希杜的大臣，如“艾玛贾”。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在适当的时候推翻了玛希杜的统治，将权力夺到自己手中。如果这一传说是正确的，那么希格尔的艾玛贾家族可以追溯到罕萨，最终追溯到吉尔吉特统治王朝的塔拉汗家族那里。

从贾·特姆到戈里·特姆，其间经历了十代人。这中间除两人外，其余的统治者的名字都以 Tham 结尾。在罕萨统治者家族中，我们也发现了这一点。早先我们说过，戈里·特姆可能征服过斯卡杜。正是在他统治时期，大艾米尔赛义德阿里·哈姆达尼来到希格尔，改变了当地统治者的信仰，并在那里传播伊斯兰教。他所建立的艾姆巴利格（Ambariq）清真寺（图 28、29），至今仍矗立在希格尔。赫希默杜拉·汗和瓦齐尔·艾哈默德都认为，大艾米尔是在戈里·特姆的儿子迦齐·特姆在位期间来到希格尔的，但提出的年代却是公元 1440 年—1470

年，此时大艾米尔已经死了。迦齐·特姆的王位由阿里·米尔继承,阿里·米尔之后是迦兹里（Chazri）。迦兹里的统治时期为公元1490年—1520年，与斯卡杜的默格本布迦是同时代人。在他的任期内,米尔·希姆斯·乌丁·伊拉基来到希格尔,并于公元1525年死在那里。米尔·穆罕默德·达尼亚尔（Mir Muhammad Danyal）续写了他的著作。据赫希默杜拉·汗所说，米尔·穆罕默德·达尼亚尔的儿子阿卜杜拉·汗成了米尔·希姆斯·乌丁·伊拉基的信徒。正是在迦兹里统治时期（公元1520年—1535年），斯卡杜、哈伯罗和希格尔的联军侵略了拉达克；由于迦兹里的才智，拉达克统治者投降了。阿卜杜拉·汗在位期间，中亚的莫卧儿统治者苏丹阿布·赛德·汗在1532年入侵了希格尔。米尔扎·海达尔错误地认为，希格尔当时是整个巴尔蒂斯坦的首都。这次战役的情况如下：

在天秤座月令（Libra）的末期，汗（即苏丹阿布·赛德）到达巴尔蒂。巴尔蒂的首领之一巴哈拉姆·久（Bahr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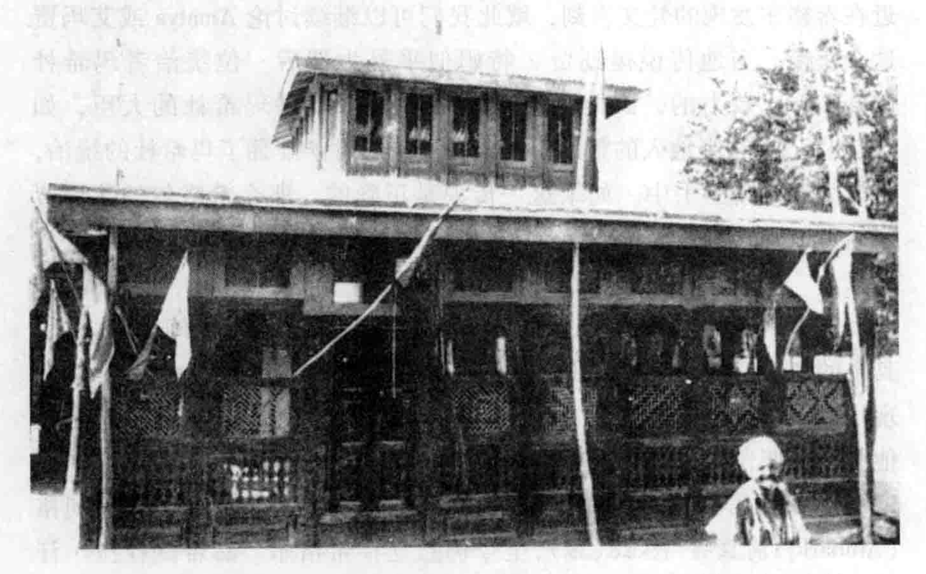


图41　巴尔蒂斯坦：戈瓦尔杜的赛义德·阿里·图西（逝世于希吉来历1080年/公元1669年）的修道院

> Chu）臣服了，恭候汗的到来。所有其他的久（Chu）都起来反抗，这是信仰异教的自然结果。在巴哈拉姆·久的引导下，汗第一次攻击就占领了全巴尔蒂的首府希格尔堡。当地所有男子都倒在攻击者的刀剑之下，而妇孺及大量财物则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目标，这个山地之国的每一寸土地甚至坚固的山谷和堡垒都被汗的军队踏在脚下。……春天开始的时候，他们撤离了巴尔蒂。[97]

奇怪的是，文中未曾提及希格尔统治者的名字。但是，据说在阿卜杜拉·汗的继承者海达尔·汗时期，开放了巴拉尔杜（Braldo）山口，与叶尔羌之间建立了大使级的交流关系。同叶尔羌的这种联系持续到穆罕默德·汗时期（公元 1632 年）。为了防卫的需要，在巴拉尔杜山口右边的巴夏（Basha）建立了一座堡垒。这种联系的益处是，叶尔羌的一些水果得以进口并被移植到希格尔。大约在公元 1600 年前后，赛义德·马茂德·沙·图西（Sayyid Mahmud Shah Tusi）和赛义德·阿里·图西（Sayyid Ali Tusi）两兄弟经萨尔托洛到达这里，在这一地区传播伊斯兰教。赛义德·马茂德·沙·图西死后埋葬在斯卡杜，其墓碑上的日期是希吉来历 1080 年或公元 1669 年。赛义德·阿里·图西死后葬于戈瓦尔杜（图 41），其墓碑上的日期是希吉来历 1081 年或公元 1670 年。他们因在特迦斯建造清真寺而闻名。（图 43、44）

上文说过，穆罕默德·汗有十二个孩子，其中十一个被斯卡杜统治者阿卜达尔·汗杀掉。唯一幸存的哈桑·汗逃到了德里，向莫卧儿皇帝寻求庇护。在莫卧儿军队的帮助下，哈桑·汗收复了希格尔，并于 1633 年—1634 年在这里统治。莫卧儿的一位塔纳达尔在希格尔任职。这样，希格尔摆脱了叶尔羌的控制，落入了莫卧儿的控制之下。哈桑·汗从德里带来了一些工匠，大理石工艺就由这些工匠带入了希格尔。哈桑·汗的儿子是古力·汗（Quli Khan），对他的事迹我们一无所知。他有两个儿子，伊玛目·古力·汗与马吉德·汗（Majid Khan）。

伊玛目·古力·汗于公元 1634 年继承了祖父的王位，其长期的卓越统治一直延续到公元 1705 年。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强大的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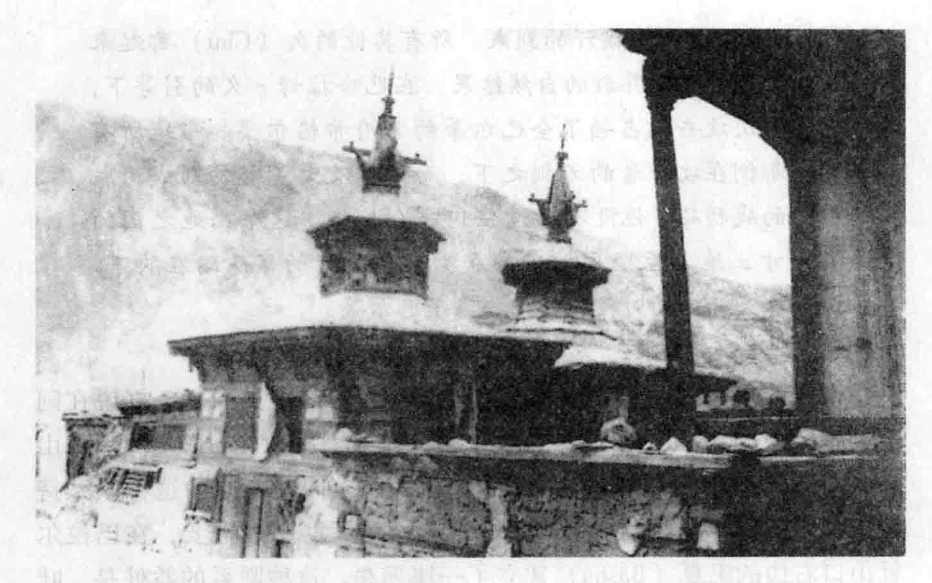


图43 特迦斯：米尔·穆罕默德·伊斯哈克之墓，他是基里斯的米尔·穆赫塔尔之子。



图44 特迦斯：米尔·伊斯哈克墓的精美装饰

实力，他极大地提高了希格尔的声望。他与斯卡杜统治者穆拉特·汗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联合起来，一面向哈伯罗与拉达克进军，另一面向吉尔吉特挺进，迎接亚辛统治者胡什瓦格特的挑战，并帮助哈比布·汗抗击他的敌人。但后来哈比布·汗的儿子被杀时，伊玛目·古力·汗没有陪同穆拉特·汗一起前往吉尔吉特。与莫卧儿的克什米尔总督的通信联系清楚地表明，当时的情况不是伊玛目·古力·汗听命于穆拉特·汗，而是两者都处在莫卧儿的统治之下。伊玛目·古力·汗的王位由儿子阿扎姆·汗继承，阿扎姆·汗在位时期为公元1705年—1784年。在此期间内，莫卧儿的势力衰退，阿富汗人入侵斯卡杜并打败了穆拉特·汗。阿扎姆·汗利用这种政治变动征服了斯卡杜，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在任期间的另一件大事是米尔·穆赫塔尔（Mir Mukhtar）和米尔·叶海亚（Mir Yahya）两兄弟的到来。因某种误解，米尔·穆赫塔尔不得不离开希格尔，去了克什米尔——他死后就埋葬在那里（图46—50）。米尔·叶海亚留在了希格尔，那里的人



图46　基里斯：米尔·穆赫塔尔之墓，18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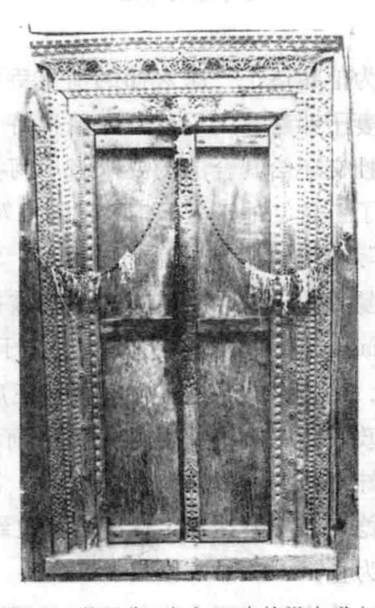


图47　基里斯：米尔·穆赫塔尔墓门上的木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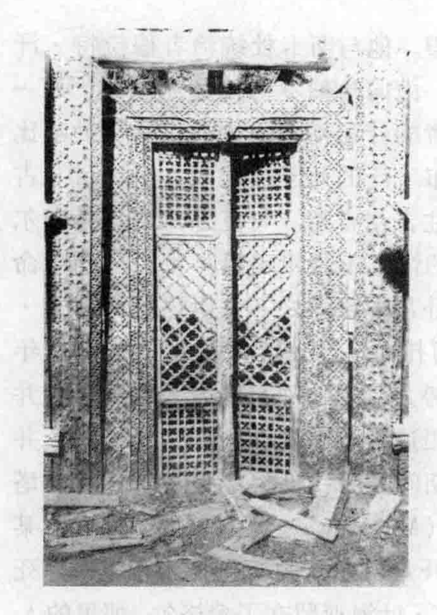


图48 基里斯:米尔·穆赫塔尔墓的木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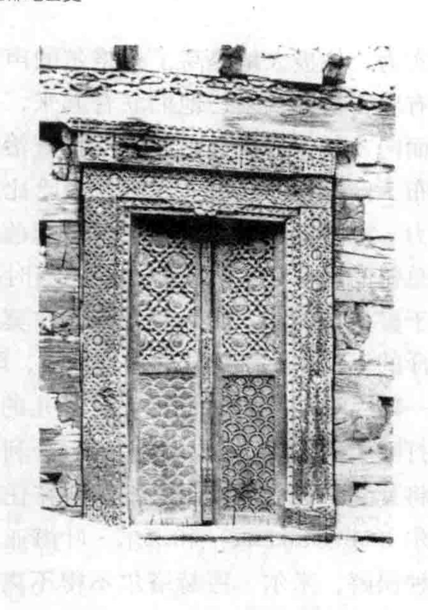


图49 基里斯:米尔·穆赫塔尔墓的木雕

们为他建造了一座宏伟的清真寺和坟墓（图45）。后来，阿扎姆·汗的妻子弗赫罗·尼莎，即穆拉特·汗的妹妹让人杀了她的丈夫，将斯卡杜交还给其合法的要求者。阿扎姆·汗被杀后，其子苏莱曼·汗继承了王位，他于公元1784年—1787年在位。但在他很小的时候，政权实际由他的瓦齐尔瓦利（Wali）掌握。后来，瓦齐尔瓦利又杀死了苏莱曼·汗，他的弟弟阿里·汗被扶上王位。阿里·汗的儿子哈辛·汗（Hasin Khan）继承了其王位，于1789年—1790年在位。他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系三位不同的王后所生，1790年—1819年间他们相继执政。1819年，海达尔·汗被确认为希格尔的统治者。海达尔·汗的妹妹道拉特·可敦，即阿扎姆·汗的女儿，嫁给了斯卡杜统治者艾哈默德·沙。海达尔·汗一直执政到1842年佐尔阿弗尔·辛格占领斯卡杜为止。

希格尔的历史清楚地显示了喀什噶尔的莫卧儿统治者与叶尔羌和德里的莫卧儿统治者之间的竞争。也许是叶尔羌的统治者进入了拉达

克、巴尔蒂斯坦和克什米尔，才促使阿克巴去占领克什米尔。当克什米尔的查克统治者从那里逃到巴尔蒂斯坦避难时，莫卧儿统治者可能也考虑到向这个方向进军。但只是在沙·贾汉统治时期，巴尔蒂斯坦才落入了他们的宗主权控制之下，也只是在奥朗则布时期，拉达克才完全臣服于莫卧儿。在莫卧儿势力衰落后，阿富汗人在帖木尔·沙的率领下向斯卡杜发动猛攻，但看来巴尔蒂斯坦摆脱了他们的控制。兰吉特·辛格统治下的锡克人也试图攻占斯卡杜，然而直到古拉伯·辛格时期，巴尔蒂斯坦一直保持着自由。这个时候，英国人已经对这一地方产生了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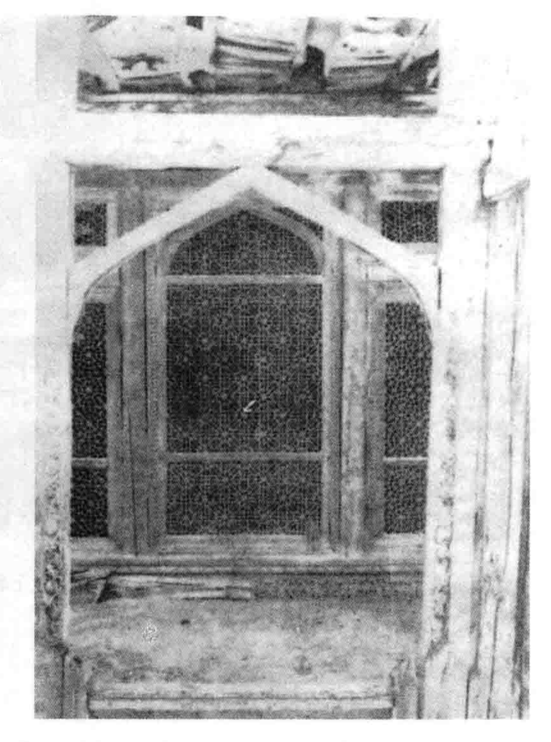


图 50　基里斯：米尔·穆赫塔尔墓的窗棂

C（四）哈伯罗的叶护统治者

叶护（Yobgu）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突厥头衔，至少在公元 6 世纪初它就在世界上我们这一地区使用了。在罕萨统治者托拉马纳·沙希（Tormana Shahi）时期（公元 500 年—515 年）的古拉（Kura）岩刻上，[98]托拉马纳·沙希被赋予了“沙·贾武乌拉”（Shah-Javuvla）的头衔，即 Javubla 王，或 Yavuga 王，或 Yobgu 王。哈伯罗统治者的这一称谓明显显示出他们的突厥血统。但是，除了坎宁安或与赫希默杜拉·汗给出的一长串谱系表，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来追溯这一王朝的早期历史。引自 A. H. 弗兰克[99]的下面这段话显示了历史学家对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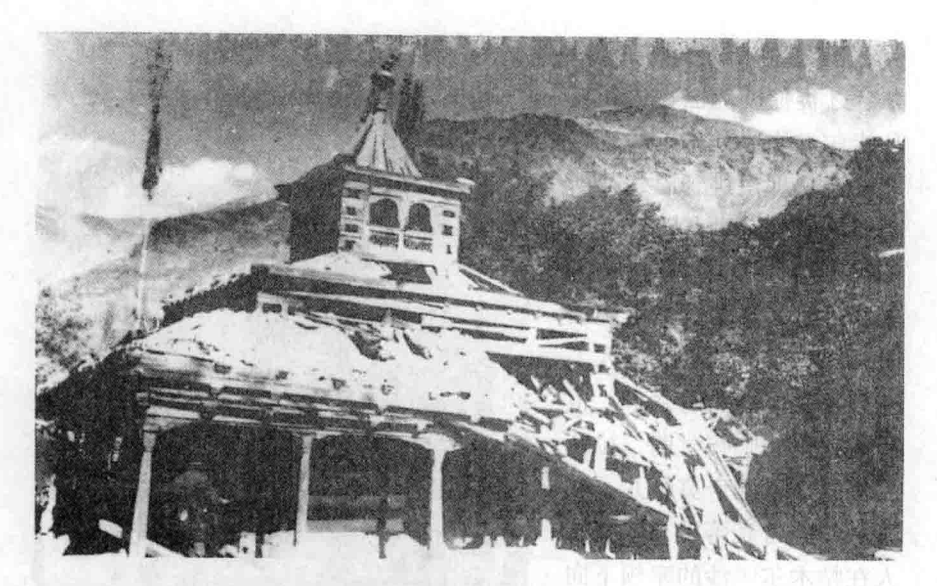


图45　希格尔：米尔·叶海亚之墓，18世纪。

问题认识的模糊：

坎宁安搜集了巴尔蒂斯坦六个默格本家族的谱系，对它们进行比较。但他发现其中没有一个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因为他们在变成穆斯林时忘记了其达尔德佛教徒祖先的西藏血统，而是尽可能地和许多穆斯林一样建立起新的家谱。最重要也许是最古老的默格本（Magspon）家族就是哈伯罗的，而其在1830年就有一份拥有67个成员的家谱。这份家谱自苏丹·西甘达尔（Sultan Sikandar）开始，随后是苏丹·伊卜拉欣和苏丹·伊斯哈克（Sultan Ishak）。西甘达尔位于家谱之首的这一事实使坎宁安怀疑伊斯兰教传入巴尔蒂斯坦的时间也许是西甘达尔时期，因为这位传统的叛逆者于1380年—1400年前后在克什米尔当政。

赫希默杜拉·汗纠正了这份含糊不清的家谱。他将贝格·门特尔（Beg Manthal，公元850年左右）置于家族的首位，在沙·阿扎姆·汗

之前列出了19代人。根据他的观点，沙·阿扎姆·汗大约在14世纪末或15世纪初接受了伊斯兰教。最近，阿卜达尔·哈米德·哈瓦尔先生令人信服地表明，伊斯兰教在这里的传授应归因于大艾米尔赛义德·阿里·哈姆达尼本人而不是克什米尔的苏丹·西甘达尔的出现。关于这位圣人的到来，关于他与当地一位佛教徒的辩论，关于他在辩论中的最终获胜以及建造吉格金清真寺——当然，它是克什米尔工匠的杰作（图51—55）——都通过口头传授在哈伯罗流传下来。

因此，很明显，在大艾米尔到来之前，当地人信奉的是佛教。许多藏文岩刻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岩刻提到了这里流行的藏族佛教形式。但是，关于哈伯罗国的建立，理查德M. 埃默森喜欢将它与公元8世纪中期中国将军的到来联系在一起。当时，吐火罗斯坦的叶护，即昆都士（Kundus）的突厥的佛教统治者，寻求中国的帮助来对抗西藏。他写道："西藏的党羽只能到巴尔蒂。这样，有理由相信，巴尔蒂斯坦讲藏语的人们早在公元750年就处在了突厥斯坦的控制之下。"[100]

这样的结论根本不可能，因为中国将军高仙芝从未到过巴尔蒂斯坦（参见本书第四章"沙希和达尔德人时期"一节）。根据奥雷尔·斯坦因爵士的说法，高仙芝到了吉尔吉特，但又经罕萨回去了。另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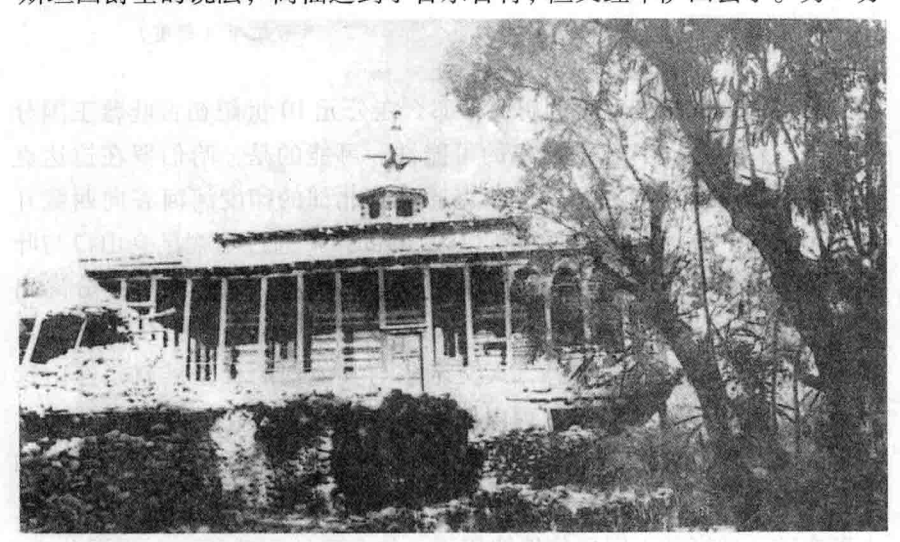


图51　哈伯罗：吉格金清真寺，属赛义德·阿里·哈姆达尼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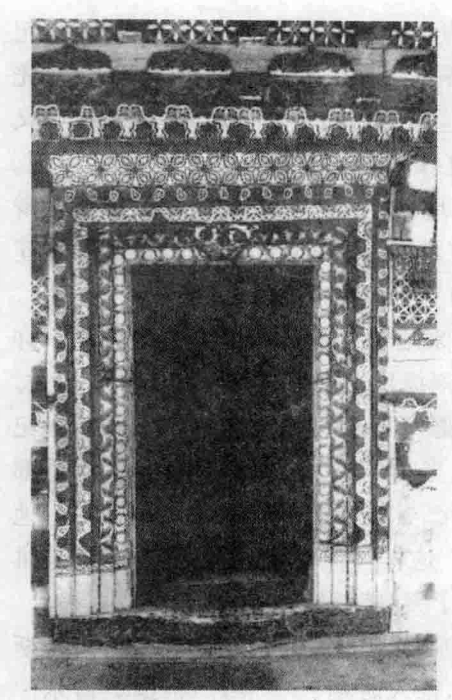


图52 哈伯罗：吉格金清真寺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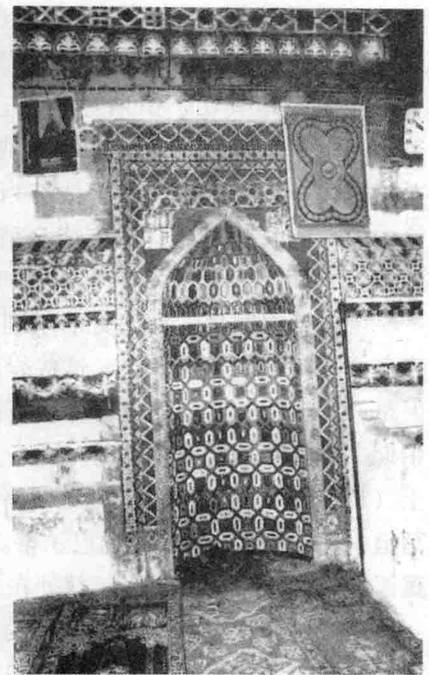


图53 哈伯罗：吉格金清真寺的米哈拉布（壁龛）

面，如果我们还记着西藏的历史，那么在公元10世纪初古吐蕃王国分裂之前，这里不会有建立国家的可能性。可能的是，哈伯罗在拉达克刚开始有国家时就存在了。拉达克通过其北部的印度河河谷向西藏开放，由上希约克河谷组成的努布拉区（Tehsil）通过喀喇昆仑山口与叶尔羌河谷联结起来。与此相似，被锡亚琴冰川从努布拉河谷中分离出来的哈伯罗也通过萨尔托洛山口与叶尔羌河河谷相连。萨尔托洛山口在中世纪一直被使用。据悉，大艾米尔与其他穆斯林圣徒就是经由这条道路到了叶尔羌。因此有理由假设，一些突厥人在这一时期从叶尔羌进入哈伯罗建立了国家。这次迁移必须同维吾尔人进入喀什噶尔和叶尔羌联系起来。赫希默杜拉·汗记载了许多关于来自各个地区的迁入者在这一地区的不同居住地的传说。他准确地记载了三个主要分支：希约克河东岸到戈尔（Gol）南部和丘尔巴特东部地区的哈伯罗；萨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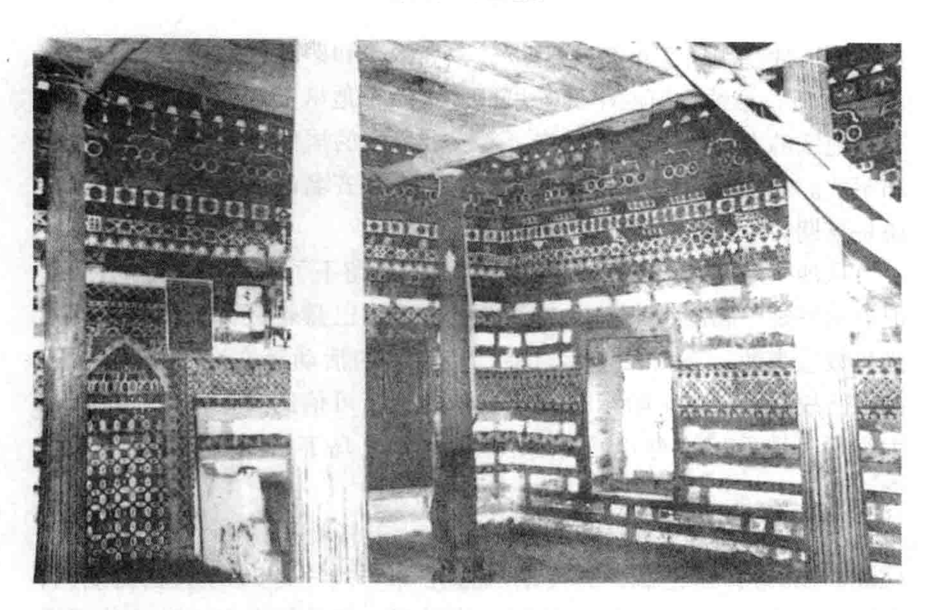


图 54　哈伯罗：吉格金清真寺内部的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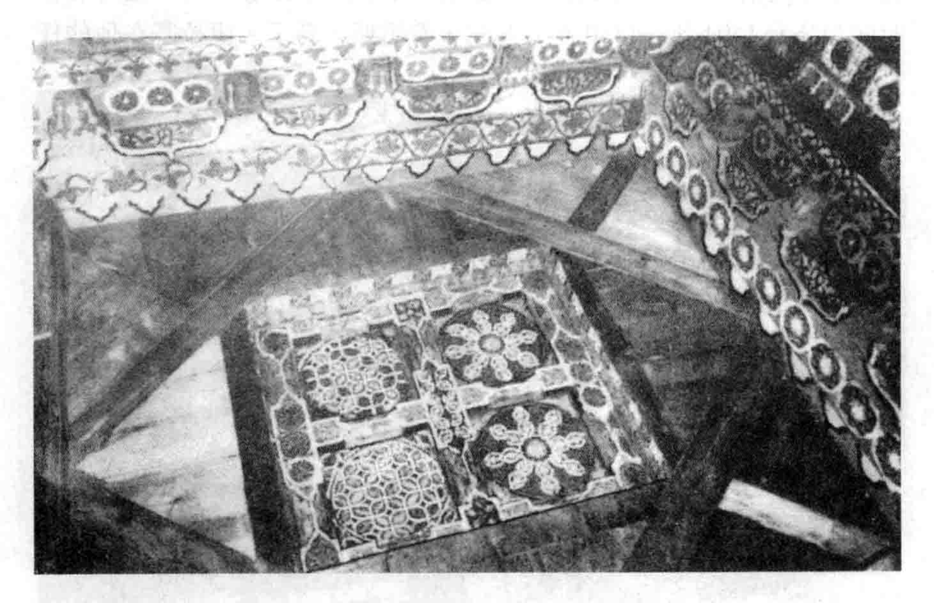


图 55　哈伯罗：吉格金清真寺天花板上的装饰

托洛脚下的特迦斯、霍谢（Hoshy）、哈尔迪和萨林格，以及巴尔迦尔（Barghar）；希约克河西岸的基里斯。第一个地区的人来自拉达克，第二个地区的人主要来自叶尔羌，第三个地区的居民主要来自吉尔吉特和罕萨。贝格·门特尔被看成是与这些地方齐名的英雄，戈里特姆据说是早期另一位重要的统治者。

从沙·阿扎姆接受伊斯兰教的时期起就留下了许多更美好的回忆，但哈伯罗是个属国，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努尔巴赫希教派信徒，他们的优势数量表明，在大艾米尔之后，传教士的活动已在这一地区展开，如果已故阿卜杜尔·哈米德·哈瓦尔的论断可信的话，这些传教活动大约是在公元1500年以后由米尔·希姆斯·乌丁·伊拉基及其追随者完成的。

沙·阿扎姆是第二十任叶护，第二十五任叶护是萨利姆·艾尔代（Salim Alde），据记载，其任期从公元1450年—1470年。在此期间，发生了大洪水，旧的定居地被河水淹没了，于是他在现在的哈伯罗镇建立了新的居住点。在他之后，最重要的叶护是巴哈拉姆，他的统治时间为公元1494年—1550年，米尔·希姆斯·乌丁·伊拉基在他的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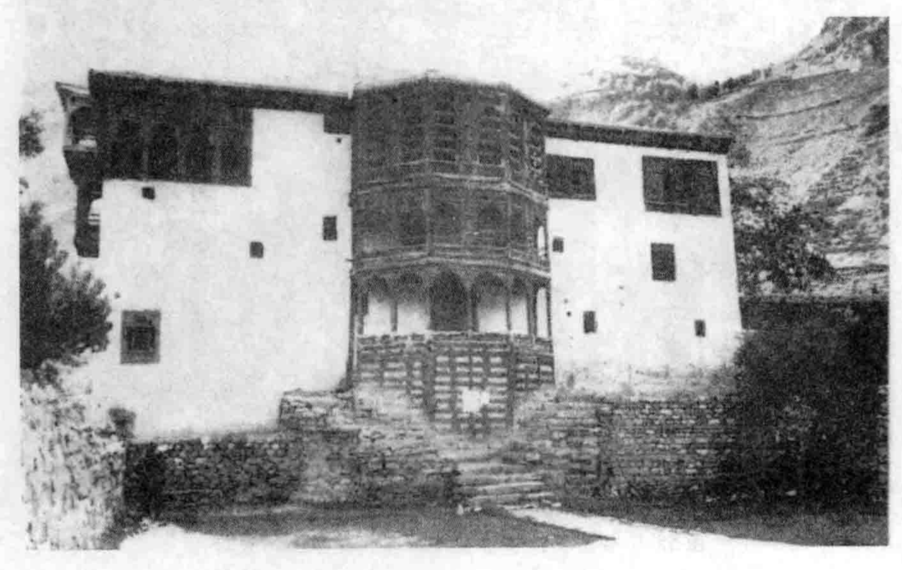


图56　哈伯罗：罗阇的宫殿，有莫卧儿风格的八角形阳台。

期内来到这里。苏丹阿布·赛德也是在这一时期入侵巴尔蒂斯坦的。如前所述，巴哈拉姆（这里也称作巴哈拉姆·久）向苏丹投降并接受了苏丹的宗主领导。同样在这一时期，也许在苏丹阿布·赛德撤回后，斯卡杜统治者攻击了哈伯罗，造成了巨大破坏，但巴哈拉姆似乎很快便恢复了权力。他娶了拉达克甲布的女儿，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叶护西卡姆（Sikam）。西卡姆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其统治起于1550年，止于1590年。在1590年—1605年间，他将王国分成三份，交由三个儿子管理。他的孙子谢尔·迦齐（Sher Ghazi）于1605年—1620年间成为这里的统治者，在谢尔·迦齐统治期内，斯卡杜的阿里·谢尔·汗·恩金联合他和希格尔的统治者入侵拉达克，其统治者江央南嘉被俘后被带到斯卡杜。后来谢尔·迦齐将女儿嫁给了江央南嘉，并与之建立了真诚的联系。她在努布拉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和一座宫殿。他的亲子叶护拉希姆·汗（Rahim Khan，统治时间为1620年—1650年）娶了拉达克统治者之女，生子二人：哈迪姆·汗（Hatim Khan）和阿扎姆·汗（Azam khan）。哈迪姆·汗与斯卡杜统治者穆拉特·汗之妹结婚，并在其父死后继承统治权，其统治时间为1650年—1715年，他是哈伯罗最强有力的统治者。他与拉达克统治者建立了友谊，并将其俘获的两个侄子巴布尔（Babar）与雅谷布（Yaqub）连同其母一起送往拉达克，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监管。穆拉特·汗将他们从拉达克营救出来，并使他们在靠近丘尔巴特的他们父亲的领地上重新执掌权力。但在穆拉特·汗死后，哈迪姆·汗再次击败了已逃到了格尔吉尔的侄子雅谷布。哈迪姆·汗变得十分强大，他攻击了斯卡杜，从斯卡杜带回的战利品中有一扇门，这扇门至今仍安装在哈伯罗的宫中（图56）。哈迪姆·汗之子德卜拉·汗（Dabla Khan）继承了他的统治（1715年—1765年），据记载，在这一时期，两个克什米尔兄弟来到了这里，一个叫赛义德·阿里夫（Sayyid Arif）的住在特迦斯，在那里建了大清真寺；他的兄弟阿布·赛义德（Abu Sayid）住在基里斯，也建立了一座大清真寺。

德卜拉·汗的儿子叶护穆罕默德·阿里·汗继承了他的王位（统治时间为1765年—1800年），他是一个能干的管理者，也是一个英勇

的战士。在统治期内，他建立了许多新定居点，他攻击克尔门，但在缔结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和约之后就撤退了。后来，在希格尔的两兄弟古力·汗与阿扎姆·汗的争执中，他支持阿扎姆·汗，并助其取得了希格尔的王位，但古力·汗在叶护叶海亚·汗时期（1800 年—1815 年）又强大起来，后者必须为阿扎姆·汗而战斗。当拉达克人入侵哈伯罗时，叶海亚·汗将他们击败，并俘获了他们的司令官。叶海亚·汗有三个孩子：道拉特·汗，马茂德·沙又名玛赫迪·阿里·汗和穆罕默德·沙，在这三个孩子中，玛赫迪·阿里·汗最为精明，他与拉达克统治者结成同盟，并在重新划定拉达克与哈伯罗边界时得到了他的帮助。在希约克河的左边，即在哈伯罗一侧，边界划定在哈纳夏山嘴（Pari Khanasha）；在河的右岸，边界划定在瑙拉卡山嘴（Pari Naulakha）与齐拉卡（Zilakha）。在这一线以上，朝向丘尔巴特的地区都归属拉达克。在拉达克军队帮助下，玛赫迪·阿里·汗击败了他的两个兄弟,将他们抓起来并送到拉达克,扣押在努布拉。后来道拉特·阿里·汗的儿子穆罕默德·阿里在斯卡杜统治者艾哈默德·沙那里寻求帮助。开始时，玛赫迪·阿里是很强大的，但最终，艾哈默德·沙成功地打败了叶护玛赫迪·阿里，并将其俘获。哈伯罗成为斯卡杜的属国。一位克本（总督）被派到那里，这位尤尔希隆·格里姆（Yulehing karim[①]）总督于 1820 年—1840 代表斯卡杜统治者对这里进行管理。但当地人民忠诚的对象却有不同，利用这种分歧，海达尔·汗帮助佐尔阿弗尔·辛格率领军队进入哈伯罗。于是，家族的纷争导致了王国的衰落——哈伯罗最终沦为道格拉的属国。道格拉人的进入将这一地区带出了中世纪历史。

结　论

北部地区的中世纪史随着 8 世纪时阿拉伯势力向中亚发展的新因

① 转写有误，据乌尔都文《查谟史》汉译。——译者

素而开始，这种发展从两个方向影响了这一地区：从跨帕米尔地区方向，它促使突厥人从巴达克山、瓦罕和新疆进入这一区域；从阿富汗方向，阿拉伯与喀布尔·沙的约定也影响了瓦罕、Bolor与吐蕃。这种种因素造成的结果是唐代中国势力进入这一区域，以对抗吐蕃人的前进。吐蕃人已经建国，其势力横扫巴尔蒂斯坦、吉尔吉特直至瓦罕。在这一阶段，克什米尔充当的只是配角。形势有利于几个小国在新的突厥王朝治下在这一地区的兴起。莫卧儿势力的挺进不仅影响到这一部分，也影响到了克什米尔，但他们只是暂时的掠夺而实质上没有占领这些地方。北部地区的藩国保持了他们的独立，并与北部、东部及克什米尔的势力建立了各种不同的关系。随着喀什噶尔与叶尔羌的新国家的出现，形势发生了变化。苏丹阿布·赛德（Abu Said）派军突袭吉尔吉特，他本人则亲自挺进拉达克与巴尔蒂斯坦，他的司令官米尔扎·海达尔·杜迦拉特此时则成功地入侵了克什米尔。在克什米尔，穆斯林苏丹的统治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社会和经济，但其军队却无法抵挡米尔扎·海达尔·杜迦拉特的入侵。也许是这股中亚势力对克什米尔事务的干预促使莫卧儿帝王阿克巴于公元1586年占领了克什米尔，并重新划定了莫卧儿的北部边界，当查克统治者逃到巴尔蒂斯坦避难时，莫卧儿人便趁势将自己的利益推进到这一地区。只有在沙·贾汉和奥朗则布时代，这一区域才为莫卧儿人控制。在拉达克的军事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莫卧儿人进入这一他们称之为大西藏（Tibet-i-Buzurg）的区域。吉尔吉特分区（sub-division）却一直未受莫卧儿势力的影响。随着莫卧儿中央势力的日趋衰落，巴尔蒂斯坦也重新获得了独立。帖木尔·沙属下的阿富汗人发动过一次偷袭，但他们仅仅是为了掠夺。克什米尔总督谢尔·辛格治下的锡克人试图入侵巴尔蒂斯坦，但也是白费心机。当地形势一直都没有发生变化，直到俄国人穿过中亚带来新的因素，英国势力也进入次大陆，才引发了新的边界问题。在英国势力进入次大陆的过程中，查谟的道格拉统治者给了英国人很大的帮助。当英国人费尽心机想获取有关北部地区、拉达克与西藏的信息时，道格拉统治者在英国人的默许下，先将其军队调遣到拉达克，然后进入巴尔蒂斯坦，最后进入吉尔吉特分区。他从当

地的内战和家族冲突中坐收渔利，并试图控制这一地区。一心想重新划定北部边境的英国，作出了许多道德和军事上的许诺，以将这一地区纳入其帝国的势力范围。这是属于现代史的新的变革，下一章将会详细谈到这个问题。

注释

[1] A. 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图10和第136页中王子用了Priyachandra之子Dharmasimha的佛教名字。

[2]同上，第223、194、195页。

[3] J. D. 邓肯：《夏季穿越西部西藏的旅行》，伦敦，1906年版。

[4] A. H. 达尼：《罕萨灵岩》，第35—37页。

[5] 同上，第54页。

[6] 同上，图4和图44。

[7] 沙·拉伊斯·汗：《吉尔吉特史》(手稿)。

[8] 在布布尔和亚辛两地可以看到这种复合式墓葬，见卡尔·耶特马尔教授第三章的注释。

[9] 赫希默杜拉·汗在其《查谟史》的第587—595页谈到，在赛义德·阿里·哈姆达尼之前，伊斯兰教还没有在这里出现。

[10] M. A. 迦夫尔：《与阿拉伯人征服喀布尔和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西北部有关的两处亡佚铭文》，第Ⅱ卷，1965—1966年，第6页。

[11] 参见V. 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卡拉奇，1980年重印本，第121页。

[12] E. C. 萨乔：《阿尔·比鲁尼的印度》，伦敦，1910年，第1卷，第207—208页。

[13] 沙·拉伊斯·汗：见上引书。

[14] 赫希默杜拉·汗：同上引书，第559页。

[15] 同上，第449页。

[15a. 穆罕默德·阿齐兹·乌丁：《奇特拉尔史》，阿格拉，1897年，第43—50页。

［16］赫希默杜拉·汗：同上引书，第678—679页。

［17］参见第五章N. P. 查克拉瓦尔迪博士给出的解释。

［18］见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六部分第一章。

［19］因书还未出版，只能参照手稿中的页码。

［20］I. 穆勒·斯特勒奇特编：《关于达尔德斯坦（巴基斯坦）的人种学材料——来自D. L. R. 洛里默的遗作笔记：传说Ⅱ，吉尔吉特；传说Ⅲ，奇特拉尔与亚辛》，格拉茨，1980年，第133—118页。

［21］赫希默杜拉·汗：同上引书，第679页。

［22］A. H. 达尼：《罕萨灵岩》，第35、37页。

［23］比较约翰·毕达尔夫：《兴都库什的部落》，第20页，他在书中将其拼作Shiri Budutt，将这一朝代称做Shahreis。

［24］M. A. 迦夫尔：《与阿拉伯人征服喀布尔和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西北部有关的两处亡佚铭文》，第Ⅱ卷，1965—1966年，第6页。

［25］另一种建构见于卡尔·耶特玛尔："Bolor——北巴基斯坦政治和种族地理的贡献"，J. C. A，第2卷，第1期，1979年7月，第48—49页。

［26］奥雷尔·斯坦因：《古代和阗》，牛津，1907年，第1卷，第19页。

［27］穆希布尔·哈桑：《苏丹统治下的克什米尔》，加尔各答，1959年，第34—37页；G. M. D. 苏菲：《多数》（Kasir），拉合尔，1949年，第1卷，第117、118页，第128—129页。

［28］R. K. 巴尔莫：《克什米尔的穆斯林时代》，第82—84页。

［29］《哈桑史》，第2卷，第167—168页。

［30］同上，第273页。

［30a］这个统治者已死去多年，因此，他不能提供帮助。

［31］这个名称有时被错误地拼作Gor Rahman.

［32］I. 穆勒·斯特勒奇特：同上引书，传说I，罕萨，第293页。

［33］古特拉都拉·贝格：《罕萨土邦古代史》，拉瓦尔品第，1962年，第1卷。

［34］这份手稿在达尼手中。手稿题为：《纳格尔与罕萨土邦史

——纳格尔土邦的玛格罗特家族与罕萨土邦的阿亚希家族的统治者》。

[35]《从人种学角度研究纳格尔的历史和文化：在一些定居点的原始印记》，J. C. A，第8卷，第2期，1984年12月，第29—38页。

[36] 古特拉都拉·贝格：同上引书，第68页。

[37] 同上，第75—76页。

[38] 同上，第90页。

[39] 同上，第140—141页。

[40] 同上，第173—178页。

[41] I. 穆勒·斯特勒奇特：同上引书，第299页。

[42] 这是未发表的波斯语诗歌手稿，以《王书》（Shahnama）的形式写成，没有标明日期，描述的是格多尔（Kator）家族的历史，其作者是当地诗人米尔扎·赛尔（Mirza Ser），米尔扎·古拉姆·穆尔塔扎（Mirza Ghulam Murataza）和蒙希·穆罕默德·阿齐兹·乌丁（Munshi Mohammad Azizuddin）曾广泛地引用它。根据古拉姆·穆尔塔扎的《奇特拉尔史》（Tarikh-i-Chitral），白沙瓦，1962年，第36页，Raisia王朝的建立者是来自巴达克山的纳迪尔·拉伊斯（Nadir Rais）。

[43] 约翰·毕达尔夫：同上引书，第149—150页；另一种说法见米尔扎·古拉姆·穆尔塔扎：同上引书，第27页。

[44] 卡尔·耶特马尔：《Bolor——北巴基斯坦对政治和种族地理的贡献》，J. C. A，第2卷，第1期，1979年7月，第49页。

[45] 蒙希·穆罕默德·阿齐兹·乌丁：《奇特拉尔史》，阿格拉，1897年，第115—116页。

[46] 同上，第40—43页；根据米尔扎·古拉姆·穆尔塔扎：同上书，第47页。僧金·阿里（Sangin Ali）通过巴巴·阿尤布（Baba Ayub）继承了赫拉特的吉莫里德（Jimurid）王朝的苏丹侯赛因（Husain）。

[47] 这个版本的历史是蒙希·阿齐兹·乌丁写的，见上引书，第90—100页，这与我们从沙·拉伊斯·汗和赫希默杜拉·汗那里了解的不同。关于吉尔吉特的历史，他们的版本要早一些。

[48] 赫希默杜拉·汗：同上引书，第687—690页。

［49］同上，第691页。

［50］蒙希·穆罕默德·阿齐兹·乌丁：《奇特拉尔史》，第115—116页。

［51］F. 德鲁：同上引书，第181页。关于为献祭而杀人的故事是一个完美的谎言，穆斯林为这种目的所杀的是动物。

［52］同上，第183页。

［53］G. W. 雷特奈尔：《1866年、1886年和1893年的达尔德斯坦》，新德里重印，文殊师利出版社，1978年，第71页。

［54］同上，附录1，第117—118页。

［55］同上，第53页。

［56］F. 德鲁：同上引书，第184—185页。

［57］G. W. 雷特奈尔：同上引书，第72页。

［58］F. 德鲁：同上引书，第187—188页。

［59］里查德·埃默森：《神授王权：巴尔蒂斯坦的政府形成和权威的研究》，J. C. A，第7卷，1984年12月，第95—134页。

［60］A. H. 弗兰克：《西部西藏史》，伦敦，1907年，第三、五章。

［61］F. W. 托马斯：《关于中国突厥斯坦的藏文文献记录》。伦敦，1935年。

［62］简短的历史见G. 杜齐：《雪域西藏》，伦敦，1973年，第23—29页。

［63］奥雷尔·斯坦因：《卡兰纳的诸王流派》，第1卷，引言，第88—89页。

［64］详情见布雷特施奈德：《中世纪研究》，“回纥人”（The Oighours），第96—100页。

［65］G. T. 瓦因：《在克什米尔、拉达克和斯卡杜的旅行》，伦敦，842年，第2卷，第251页。

［66］A. 坎宁安：《拉达克》，新德里再版，1977年，第201页。

［67］约翰·毕达尔夫：同上引书，第144页。

［68］赫希默杜拉·汗：同上引书，第449页。

[69] 阿卜杜尔·哈米德·哈瓦尔（Abdul Hamid Khawar）：《北部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载曼祖姆·阿里编：《喀喇昆仑—兴都库什》，吉尔吉特，1985年，第201页。

[70] 赫希默杜拉·汗：同上引书，第449—450页。

[71] 阿卜杜尔·哈米德·哈瓦尔：同上引书，第207—210页。

[72] 赫希默杜拉·汗：同上引书，第448—449页。

[73] 米尔扎·海达尔·杜迦拉特谈到了叶尔羌和克什米尔之间克什米尔这边的斯卡杜通道，也谈到了巴尔蒂"这个属于西藏的地区"。E. 罗斯：《中亚蒙兀儿史》，伦敦，1972年，第405、410页。但后来（第461—462页），当他入侵巴尔蒂时，他就只谈到格尔吉尔周边的赞斯格尔和苏特。另一方面，苏丹阿布·赛德只到了希格尔，并占领了这个地方。从铭文上看，似乎米尔扎·海达尔·杜迦拉特对巴尔蒂斯坦并没有完整地描述。

[74] 详情见侯赛因·汗博士：《莫卧儿同巴尔蒂斯坦和北部地区的关系，从阿克巴到奥朗则布》. J. C. A，第7卷，1984年7月，第179—190页；亚尔·穆罕默德·汗：《莫卧儿与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统治者的关系》，同上，第8卷，1985年7月，第161—169页。在其论文中，他谈到阿里·谢尔·汗的孤儿及其在莫卧儿避难的情况，这可能是以古尔·汗·阿夫里迪的《巴尔蒂斯坦史》一书为基础的。但我们没有证据证实这一点。事实上，如前所述，他是成为了孤儿的默格本布迦。

[75] H. 贝弗里奇译：《阿布·法兹尔的阿克巴本纪》，拉合尔重印，第3卷，第838页。

[76] 同上，第921页。

[77] 同上，第1091页。

[78] 同上，第1235页。

[79] 阿卜杜尔·哈米德·拉合里：《帕德沙本纪》，波斯文本，加尔各答，1866年。

[80] M. S. 甘布：《萨利赫供职纪事》（沙·贾汉本纪），拉合尔，第2卷，第193—194页。

［81］B. P. 萨克色那：《德里的沙·贾汉史》，阿拉哈巴德，1958年，第1145页；另见巴尔莫：《克什米尔的穆斯林时代》，德里，1967年，第315—317页。

［82］M. S. 甘布：《萨利赫供职纪事》，第193—200页。

［83］亚尔·穆罕默德·汗：同上引书，第165页。

［84］赫希默杜拉·汗：同上引书，第165页。

［85］福格：《克什米尔史》。

［85a］G. T. 瓦因：同上引书，第510页。

［86］同上，第7、8章。

［87］同上，第216页。

［88］同上，第354—355页

［89］赫希默杜拉·汗：同上引书，第519—521页。

［90］G. T. 瓦因：同上引书，第297页。

［91］F. 德鲁：同上引书，第182页。

［92］G. W. 雷特奈尔：同上引书，第82页。

［93］赫希默杜拉·汗：同上引书，第537—551页。

［94］18世纪的波斯语作品，至今尚未发表，作者是赛义德·塔赫辛（Sayyid Tahsin），现在作者手中。

［95］瓦齐尔·艾哈默德：《希格尔河谷领土史》，未发表的乌尔都文手稿，现在作者手中。

［96］关于Amacha头衔的讨论见F. W. 托马斯：《关于中国突厥斯坦的藏文文献记录》，第191页，伦敦，1935年。

［97］E. 丹尼森·罗斯：同上引书，第422页。

［98］D. C. 西尔卡尔：《铭文选》，加尔各答大学，1942年，第399页。

［99］A. H. 弗兰克：《西部西藏史》，第90页。

［100］理查德·M·埃默森：同上引书，第103页。

第七章 现代史

引 言

南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始于三大因素：大英帝国力量在此地区的壮大，南亚的土地革命以及欧洲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对南亚人民的冲击。随着莫卧儿王朝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央集权力量的削弱，南亚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断裂期——一个徘徊于中古与现代之间的过渡期。这是一个调整的时期——一个在英国霸权压力下进行的由旧到新的逐渐的调整时期。这一时期也恰逢英帝国的战略目标开始发生转移：从东印度公司纯粹的商业利益转向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向来是唯英国马首是瞻，无论英国殖民统治给我们带来了何种后果，南亚次大陆现代化的缘起还是要归功于它。由于年迈的莫卧儿王朝还苟延残喘了很长一段时间，南亚的现代化进程不是突变式的，而是渐进的，且这一进程也并非同时影响到整个地区。同时，从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英国海上力量逐渐壮大，显而易见，它正一步一步朝德里的中心地区迈进，然后审慎而又坚定地向西挺进，开拓领地，并同先于它进入的西方国家及沙皇俄国形成对峙。当时，几个遗留下来的突厥斯坦中古城邦已陷入俄国沙皇彀中。在这一漫长的进程中，亚洲国家的陆路贸易形式——通过古丝绸之路的贸易逐渐

转化为海上的国际贸易形式。在英国的默许甚至是扶植下，那里出现了许多藩国，从而使这新兴的宗主国的权力得到增强。英国当然给予这些时代英雄应得的报酬。其中一个名为古拉伯·辛格的人很不寻常，由于他参与了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锡克战争，因而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克什米尔封地。[1,2]古拉伯·辛格不同于锡克先人，他非常工于心计。他在北部的冒险之旅得到了英国的默许，因为他的行为正合乎英国的利益。事实上，他想从英国那里寻求的东西恰好符合即将到来的新的潮流和趋势。他的第一次冒险就是垄断了从查谟到拉达克，途经基希德瓦尔的山羊绒（Pashm）的纺织品贸易，从而增强了克什米尔地区的经济实力。他的下一步目标就是要完全控制克什米尔地区。如前所述，英国也非常愿意将此地赐给他。如果没有了拉达克的山羊绒贸易收入，克什米尔地区几乎无利可图。因而，古拉伯·辛格首先将目标指向因各种利益而纷争日起的拉达克。古拉伯·辛格发现，早在1814年—1816年的英国—尼泊尔战争后，英国已经控制了布沙希尔（Bushahir），[3]此地非常靠近拉达克，一位英国人，亨德森博士（Dr. Henderson）[4]事实上已进入了拉达克。所以，毫无疑问，古拉伯·辛格想在拉达克创业，首先要征得英国的同意。于是，他通过摩诃罗阇兰吉特·辛格的宫廷，顺利达到这一目的。老奸巨猾的英国人否认了亨德森博士的官方身份，甚至不惜牺牲他们在拉达克的商业利益，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对阿富汗的政策中能得到政治和军事支持，阿富汗因为仿效俄国的发展模式而被英国视为巨大威胁。[5]但是，英国尽管没有将拉达克放在首要考虑范围之内，仍不会完全放弃拉达克。从威廉·莫尔克罗夫特（William Moorcroft）的描述中可以详细了解当时的形势，他在1820年—1822年间一直在拉达克。他写道：

> 与拉达克，以及通过它与西藏和突厥斯坦的商业往来的情况，大体上是明晰的。拉达克盛产牛羊，因而可以提供上好品质的毛织品，非常适合精加工。还有一些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如盐，硼砂，泡碱和黄金。但他们没有制造加工业，粮食缺乏，不过英属印度地区可以供给他们充足的粮食。在

拉达克，人们应该穿俄罗斯风格的服装还是英格兰风格的，他们应该用本土的铜器、铁器，还是用从匹兹堡或伯明翰进口的铜、铁或锡镴器皿、钢铁工具和各式五金用品——完全由英属印度政府决定。如今看来，俄国带动中亚国家发展的模式无疑应受到褒奖。与之相比，我们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只能归结于我们不必要的谨慎和过分的懦弱。[6]

锡克时期的阿富汗和北部地区

在19世纪前半期甚至之后的一段时期里，阿富汗一直是英国首要的针对目标。当然，英国的醉翁之意，不在阿富汗，而是它背后的俄国。英国之所以针对阿富汗，是因为它认为阿富汗一直跟着俄国的方向前行。第一次英阿之战使英国陷入困境，为了摆脱这一困境，英国向锡克人和道格拉人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愿意给予他们一切帮助，以使其对阿富汗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1839年6月27日，强有力的锡克统治者兰吉特·辛格逝世，他的后继者们开始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此外还有锡克军事集团的政变，以及旁遮普政权和西部边防的动荡。在此乱世之中，救亡任务就由颇具指挥才能的古拉伯·辛格担当起来。对英国来说，古拉伯·辛格野心勃勃，一心寻求出头之日，因而很有希望在他们的扶植下成为此地的中流砥柱。事实确实如此，英国很愿意与古拉伯·辛格合作，并给予他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支持，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抱负。当然，作为英国的附属同盟，他所取得的任何发展最终仍须服从英国的利益。只是在当时，英国还无暇直接干涉当地的事务。英国首先要对准当前的目标——阿富汗。尽管如此，对这一地区的探索日渐兴起，不仅是英国，还有俄国。一些旅人，如威廉·莫尔克罗夫特、G. T. 瓦因（G. T. Vigne），[7] 以及约翰·伍德（John Wood），[8] 由英政府提供装备，潜入这片未知之地收集信息情报。俄国也一样，他们派出格扎赫·苏丹·乔汉·瓦利哈诺夫（Kazakh Sultan Chokhan Valikhanov，1835年—1865年）去布哈拉，后来又去喀

什噶尔，从事类似的工作。他们出版了一些文学作品，涉及许多此地的矿产资源情况。直到今天，这些作品还是宝贵的文献资料。有了这些资料的指导，英俄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他们在亚洲的竞技的下一步行动。

与此同时，以兰吉特·辛格为首的锡克人宣称自己是旁遮普和西部地区的莫卧儿王朝的继承人，命令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人民向他们效忠纳贡。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是如何在巴尔蒂斯坦遭到挫败的。根据G. T. 瓦因的叙述，斯卡杜的统治者艾哈默德·沙视锡克人为敌而欲与英国结盟，莫尔克罗夫特[9]宣称拉达克人也有此心，他的这一观点其实是想代表拉达克向英国寻求庇护，但英国人不准备接受他的建议。[10]拉达克的位置并不简单，根据M. L. 格布尔（M. L. Kapur）提供的英国官方记载，兰吉特·辛格曾为古拉伯·辛格求情。可能在此基础上，胡什万特·辛格（Khushwant Singh）[11]才让佐尔阿弗尔·辛格（Zorawar Singh）成为兰吉特·辛格的将军。格布尔写道："1836年冬，佐尔阿弗尔·辛格将从拉达克得来的贡物献给摩诃罗阇，并请求摩诃罗阇允许他向西扩张到斯卡杜，邻接中国。摩诃罗阇让他相机而动。"对当时的情形，亚历山大·坎宁安记述如下：[12]

> 甲布（藏语词，意为国王——译者）一直对来自克什米尔的锡克人对他们连绵不休的侵略感到十分焦虑，但这一地区的政权更迭太过频繁，且一直处于查谟诸弟兄派来的间谍的严密监控之下，所以甲布即使有抵抗侵略之心，也很难有所作为。而在锡克宫廷中拥有无上权力的梯央·辛格（Dhyan Singh）罗阇则坚决认为，有资格统治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的，非他的兄弟古拉伯·辛格罗阇莫属。因此，对这一地区的进驻一直推延至古拉伯·辛格巩固了在新征服的基希德瓦尔的统治地位之后。

在坎宁安的资料的基础上，A. H. 弗兰克[13]建构起有关佐尔阿弗尔·辛格1834年—1835年间在拉达克的历史，并揭示了克什米尔的锡

克统治者米汗·辛格（Mihan Singh）是如何煽动拉达克人民反抗道格拉人的入侵的。对其中的缘由，坎宁安解释如下：

> 米汗·辛格的意图无疑是想掌控途经克什米尔的所有贸易，而拉达克一旦落入道格拉人手中，所有的这些贸易往来将通过其他途径，首先要经过基希德瓦尔和道格拉的领地，由查谟去往印度。[14]

克什米尔的锡克政权和查谟的道格拉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发展，这一冲突促使他们寻求不同的解决之道。锡克统治者依靠自己，而道格拉统治者却寻求英国的支援。当克什米尔的锡克统治者谢尔·辛格（Sher Singh）入侵巴尔蒂斯坦时，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述，他与英国没有任何来往，他的入侵也以失败告终。尽管有传言说在赫希默杜拉·汗[15]的帮助下，锡克指挥官潘迪特·格奈希（Pandit Ganesh）率军取得了胜利。然后赫希默杜拉·汗带潘迪特去了阿斯托尔，他听说那里发现了水晶矿（Bilor，一种稀有的石头）。但此事证据并不确凿，也不常被提起。

在种种冲突的激发下，巴尔蒂斯坦地区拉开了夺权游戏的帷幕。G. T. 瓦因对当时形势的叙述如下：

> 他（艾哈默德·沙）有五六个儿子，最大的，我想是沙·穆拉德（Shah Murad），他死于我首次去斯卡杜之前……他的同胞兄弟穆罕默德·沙（Muhammad Shah）的才干根本无法与他相比，因而赫苏拉（Hasura）的政府对他很不信任。穆罕默德·沙滥用职权，根本没有一国之君的素质，因而他的父亲决定废除他的继承权，而立穆罕默德·阿里·汗（Muhammad Ali Khan），他另一位妻子，即希格尔罗阇之女的儿子为王。而那位已故长子和穆罕默德·沙的母亲是格塔克均德（Katakchund）罗阇的（姐）妹。按惯例，家族为斯卡杜甲布挑选的妻子就是下任君王的母亲。于是，穆罕默德·

沙因为父亲的改弦易辙而与之起了争执，随后带了两三个拥护者出走，投靠古拉伯·辛格手下的锡克中尉，就在靠近边境的波里格堡。此事发生在1835年我首次去斯卡杜之后。从那时起，穆罕默德·沙就成了古拉伯·辛格手中的傀儡，古拉伯·辛格让他沉溺于声色之娱，并许诺说，一旦得到斯卡杜，就立他为王，这令艾哈默德·汗很是苦恼。[16]

这个情节简单的故事在赫希默杜拉·汗[17]的叙述下变得一波三折起来，他说穆罕默德·沙受尽虐待，于是他私结朋党，包括克尔门的阿里·谢尔·汗。后来穆罕默德·沙被带去克什米尔，最后又去了拉合尔。在那里，他被送去献给兰吉特·辛格罗阇，据说，罗阇又把他交给了古拉伯·辛格。在这反复的叙述中，克什米尔的锡克统治者一直扮演着反面的角色，所有的赞美都给了古拉伯·辛格和他的将军佐尔阿弗尔·辛格。历史学家们为佐尔阿弗尔·辛格在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的胜利所迷惑，他们写道：在胜利的鼓舞下，佐尔阿弗尔·辛格还宣称获得了吉尔吉特的效忠。[18]

而发生在吉尔吉特的故事则完全不同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与佐尔阿弗尔·辛格完全无关。有关吉尔吉特资料的最初来源是弗雷德里克·德鲁（Frederic Drew）的口述[19]，后经赫希默杜拉·汗概括整理。当吉尔吉特事件爆发时，兰吉特·辛格已逝世，卡拉克·辛格（Kharak Singh）正在抢夺拉合尔的王位，古拉姆·穆希乌丁（Ghulam Mmohiyuddin）是克什米尔地区的锡克人罗阇。正如我们此前所述，克什米尔的罗阇很有可能是因为嫉妒而想侵犯阿斯托尔，但并没有占领它，因为在巴尔蒂斯坦，艾哈默德·沙已经向佐尔阿弗尔·辛格投降了。于是吉尔吉特面临着三方力量——亚辛的戈赫尔·阿曼，穿过阿斯托尔来的锡克先遣队，以及古拉伯·辛格在巴尔蒂斯坦的小分队。由于故事流传的版本不同，事情变得混乱而复杂。如果根据雷特奈尔（Leitner）博士基于弗雷德里克·德鲁叙述之上建构的历史资料，整个事件的脉络就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清晰起来，并揭示了随后在吉尔吉特上演的这幕争权夺利的游戏。当时（1840年）的吉尔吉特由纳格尔统

治者塔希尔·沙（Tahir Shah）的儿子西甘达尔·汗（Sikandar Khan）所统治，他的弟弟格里姆·汗（Karim Khan）和妻子萨希布努玛（Sahebnuma）住在戈尔（Gor）即戈赫尔阿巴德（Gauharabad）。对戈赫尔·阿曼来说，吉尔吉特的纳格尔统治者无疑是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然后由他来统治吉尔吉特。而这两兄弟中的一个，不知是西甘达尔·汗还是格里姆·汗，派了一个间谍潜伏在克什米尔的锡克总督身边。但整个事件究竟如何，还不是很清楚。1842 年，锡克总督派出大约1000 人的克什米尔部队，由陆军上校纳图·沙——一个来自古杰兰瓦拉的旁遮普人指挥，这一行为无疑得到了拉合尔朝廷的许可。雷特奈尔博士以编年体的形式列出了戈赫尔·阿曼和纳图·沙之战的各个细节，这场战争直到格里姆·汗战胜了他的兄弟西甘达尔·汗才结束。西甘达尔·汗在吉尔吉特被杀，戈赫尔·阿曼的兵力却未受到损伤，他只是将部队撤到亚辛以准备攻击格里姆·汗的锡克军营。雷特奈尔将此概括为：格里姆·汗只付出了很小的代价，就将克什米尔的军事力量留存在吉尔吉特堡和纳图·沙手中。而弗雷德里克·德鲁对此则另有见解，他不无夸张地写道：

> 当然，纳图·沙并没有把整个吉尔吉特完全转交给曾向他求助的格里姆·汗罗阇，而是在吉尔吉特成立了联合政府。格里姆·汗仅从分配给他管辖的那部分百姓那里收取税金，而关税则归锡克政府，一小队人马驻扎在吉尔吉特，纳图·沙回到了克什米尔。

鉴于戈赫尔·阿曼及其同盟者与锡克军队支持下的格里姆·汗之间的连年战争，在吉尔吉特出现克什米尔力量是自然而然的。正是锡克军队的出现使格里姆·汗得以保住在吉尔吉特的统治。看来格里姆·汗极其依赖锡克军队，因而甘愿向人民额外征税，以维持其开支。但锡克军队的出现并非如弗雷德里克·德鲁所认为的意味着联合政府的出现。在锡克军队保护下的格里姆·汗，从 1841 年起一直统治吉尔吉特，直到 1844 年被杀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汗二世（Muhammad

Khan Ⅱ）继位。[20]他在位期间，与戈赫尔·阿曼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最终，戈赫尔·阿曼赢得了胜利，将穆罕默德·汗二世赶出了吉尔吉特。于是穆罕默德·汗二世去克什米尔寻求庇护。此时，克什米尔已为古拉伯·辛格掌控，正是由于这一变故，服务于拉合尔宫廷的纳图·沙上校回到了斯利那加和拉合尔，转而投至古拉伯·辛格麾下。据赫希默杜拉·汗说，在吉尔吉特的锡克士兵也纷纷表示效忠于古拉伯·辛格。这些转变已清楚地表明，拉合尔宫廷支持下的克什米尔统治者管理着吉尔吉特事务，这很可能与古拉伯·辛格在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的行动有所冲突。不幸的是，结果证明吉尔吉特的事务是烫手的山芋，克什米尔统治者对此已无能为力了，于是古拉伯·辛格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吉尔吉特，接受了纳图·沙上校与其他锡克人的归顺。

而巴尔蒂斯坦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它的历史必须在 G. T. 瓦因、亚历山大·坎宁安、A. H. 弗兰克直至赫希默杜拉·汗的研究之上进行重构。我们已得知穆罕默德·沙——艾哈默德·沙的儿子是如何逃至佐尔阿弗尔·辛格处求助的。根据坎宁安的研究，我们得知，“艾哈默德·沙已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并有许多对道格拉统治者不满的拉达克人民加入，他们渡过印度河后，就毁了大桥以拖延道格拉人的行进。”[21] A. H. 弗兰克写道：“然后，佐尔阿弗尔·辛格采取了一个新策略，以阻止拉达克人密谋反抗道格拉人的统治。如果他们愿意加入道格拉军队，共创新霸业，他们也许会有所作为，因而佐尔阿弗尔·辛格决定冒险对抗巴尔蒂斯坦。”[22]赫希默杜拉·汗追溯了哈伯罗的家族恩怨，并谈到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和道拉特·阿里（Daulat Ali）投靠了佐尔阿弗尔·辛格，而他的弟弟马赫迪·阿里·汗（Mahdi Ali Khan）则统治着哈伯罗。当后者被斯卡杜的艾哈默德·沙打败后，哈伯罗收归于他的克本之下，当地的军队也收编在被称为 Sipahsalar①的海达尔·汗麾下，这些我们可从哈伯罗历史中获知。但海达尔·汗是站在道拉特·阿里·汗这边的，他秘密倒戈，投向佐尔阿弗尔·辛格，从努布拉派遣军队经由丘尔巴特与佐尔阿弗尔·辛格

① 波斯语/乌尔都语，意为总司令。——译者

的军队在西格夏（Siksha）会合。于是，不费一枪一弹，哈伯罗就落入了道格拉人手中，坎宁安如此描述这段历史：

> 佐尔阿弗尔·辛格随后向斯卡杜进军，几次突袭火攻后，艾哈默德·沙就因为缺水而投降了。佐尔阿弗尔·辛格立刻将他废除，立他的二儿子穆罕默德·沙为王，并规定每年缴纳贡赋7000卢比。但这位狡猾的统帅已从拉达克的经历中吸取经验，他不会将他新的猎物拱手送给艾哈默德·沙那不可信的儿子，于是他安排了一队心腹士兵驻扎在河岸的一个新的要塞里，以确保新王对他的忠诚。

赫希默杜拉·汗详细描述了占领后的情形：

> 佐尔阿弗尔·辛格占领巴尔蒂斯坦后，继续向当地罗阇们收取年税。帕格万·辛格被任命为塔纳达尔。为供养道格拉军队，罗阇们每尤尔（Yol）土地要交纳一克尔（Khal）土地的粮食、一布尔（bur）黄油、一担柴和盐，罗阇们还要从他们各自所征得的税收中，按每尤尔六克尔的比率缴纳粮食，供养军队。此外，还通过罗阇向地主们收取年贡，每尤尔交纳三卢比。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盖达罗塔纳达尔时期（1851年—1863年）。[23]

上述资料表明，尽管佐尔阿弗尔·辛格攻占了巴尔蒂斯坦，政府职能仍由当地罗阇们行使。之前锡克人曾在这片土地上遭到挫败，代表道格拉人的佐尔阿弗尔·辛格像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沙·贾汗和奥朗则布一样，向巴尔蒂斯坦的罗阇们征收贡赋。但总而言之，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仍是一处“边境之地”。[24]

北部地区反抗道格拉人和英国的斗争

北部地区的独立战争不仅仅是抵抗外来侵略，同时也与维护伊斯兰文化有关。那时，伊斯兰教已成为当地人民首要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资源，已故的阿卜杜尔·哈米德·哈瓦尔（Abdul Hamid Khawar）[25]先生指出，亚辛的统治者苏莱曼·沙罗阇之所以于19世纪早期成为从吉尔吉特到奇特拉尔的一方霸主，不仅因为他拥有精兵良将，还依仗他的宗教热情，他与赛义德·艾哈默德·夏希德（Syed Ahmad Shahid）有书函往来，后者力邀他参加“圣战”，共同对付锡克人。据说他已经响应，并送了一个赛义德家族的姑娘去白沙瓦与“赛义德”①联姻。

亚辛历代统治者的“圣战”精神从未消退过。他们对道格拉人的抵抗也愈演愈烈。同时，随着佐尔阿弗尔·辛格于1841年12月12日在与西藏之战中败亡后[26]，巴尔蒂斯坦出现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起义。对此我们简要叙述一下。这次起义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赫希默杜拉·汗对此事件的描述很为详尽。[27]这一事件的发起者是年迈的斯卡杜罗阇艾哈默德·沙。他曾是佐尔阿弗尔·辛格的俘虏，在佐尔阿弗尔·辛格死后被释放，他与西藏人联手，计划推翻道格拉人的统治。他派了一个心腹尤斯德隆·格里姆（Yustrung Karim）作为特使，秘密地前往斯卡杜，打算取得希格尔的海达尔·汗和斯卡杜的格里姆·贝格（Karim Beg）的支持。在此期间，他们与斯卡杜罗阇阿里·汗、哈伯罗罗阇道拉特·阿里·汗、基里斯罗阇胡拉姆·汗（Khurram Khan）和巴尔蒂斯坦其他贵族建立了同盟关系，还可能逮捕了斯卡杜的道格拉塔纳达尔帕格万·辛格，将其兵营的财物和兵器洗劫一空。后来，他们将俘虏送往尼亚里（Niyali），而其他那些未参与起义的人，如希格尔罗阇苏莱曼·汗和斯卡杜罗阇穆罕默德·沙，则被捕了。接着，海达尔·汗占领了希格尔和斯卡杜，自立为王，并完全剪除了道格拉

---

① 指赛义德·艾哈默德·夏希德。——译者

人的势力。为了镇压起义，古拉伯·辛格派出一支3000人的装备精良的部队，由基希德瓦尔的瓦齐尔·拉克伯特（Wazir Lakhpat）指挥，拉克伯特每前进一步，都遭到人民的反抗。最后，他到达了格尔吉尔。随后，在格尔德赫夏罗阇阿里·谢尔·汗的建议下，又向巴尔蒂斯坦进军。横渡德拉斯河后，他到达了欣库希格尔。在那里，巴尔蒂斯坦人筑起一座防卫塔。双方小战一番，不出几个回合，格尔德赫夏罗阇就进入了斯卡杜，包围了克尔福久堡。海达尔·汗躲到了堡内一个安全的地方。格尔德赫夏罗阇强攻不下，便打算智取，他趁天黑派人从后面攻入堡中，海达尔·汗仓皇出逃至萨尔托洛。道拉特·阿里·汗将其擒获后献给拉克伯特，后被送往查谟。克尔福久堡被烧成废墟。帕格万·辛格从尼里亚被救回，再次出任塔纳达尔，并拨给他300人，进驻新建的城堡。这时的巴尔蒂斯坦还剩下斯卡杜罗阇穆罕默德·沙、哈伯罗的道拉特·阿里·汗、基里斯的胡拉姆·汗和格尔德赫夏的阿里·谢尔·汗。在希格尔，伊玛目·古力·汗二世在其父亲苏莱曼·汗死后继位，成为罗阇。后来，隆多在一次战争中被占，阿里·汗继续他的统治，而他的儿子则被作为人质带走，同时在斯塔格驻扎了一小支部队。当初，起义蔓延至阿斯托尔时，拉克伯特就曾进军阿斯托尔，并包围了此城，贾巴尔·汗（Jabbar Khan）就藏在此处。城被攻占后，贾巴尔·汗复位。拉克伯特释放了起义军的俘虏，抓获了所有参与起义的波里格罗阇们，有巴希格姆（Pashkam）罗阇侯赛因·汗、苏特（Sut）罗阇萨拉姆·汗、德格贾（Takcha）罗阇拉希姆·汗、马尔巴（Malba）的噶伦强多南嘉、丹巴斯（Dambas）罗阇和他的兄弟贡加南嘉，还有苏特的瓦齐尔古杜斯·贝格和其他人。巴尔蒂斯坦的许多贵族被绞死。[28]

这次声势浩大的起义令古拉伯·辛格大为震惊。他立刻在好几个地方加强了军事防备，但实权仍掌握在罗阇们手中。最后一次起义于1846年在赞斯格尔爆发，由巴斯迪·罗摩（Basti Ram）带领。尽管古拉伯·辛格的将领们可以向罗阇们收取贡赋，但并未占据他们的领土。以阿斯托尔为例，弗雷德里克·德鲁和雷特奈尔都坚决认为它远在克什米尔的控制之外。

这场遍及整个巴尔蒂斯坦的轰轰烈烈的起义最终还是被扑灭了，究其原因，首先是道格拉人强大的军事实力，其次是亲道格拉的当地罗阇们的倒戈。而在吉尔吉特前线的斗争还未结束。亚辛的统治者，英勇的戈赫尔·阿曼，率领亚辛、吉拉斯、达丽罗和其他一些北部部落地区的自由斗士连连发起进攻，在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和罕萨的统治者的支持下，以及纳格尔统治者的鼓动下，战胜了敌方许多将领，他们起初是克什米尔的锡克政府派来的，后来古拉伯·辛格又派来一批。详情可从以下几处叙述中得知。其一来自雷特奈尔博士，他揭示了戈赫尔·阿曼秉承圣战精神所组织的一次典型的联合作战模式：

> 一年后，这位锡克将军（玛特拉·达斯，Mathra Das）率领3000人马，被派往阿斯托尔，意在分得占全城产出三分之一的一份贡赋。他在紧邻阿斯托尔的村庄索格尔（Sogar）设了塔纳（Thanna），并在其中建了军器库。第二年，他带领军队沿阿斯托尔河来到印度河，在本吉设立了塔纳，它在印度河这一边，位于萨依（Sai）的对面。当时本吉的统治者是杜罗（Duru），他与亚辛和吉尔吉特的统治者戈赫尔·阿曼是同盟。玛特拉·达斯还在萨依越过印度河，准备在贾尔戈德（Jalkot）建一个塔纳，但萨依已归于吉尔吉特的戈赫尔·阿曼之下，当他听说克什米尔入侵，就派人去达丽罗和丹吉尔，说服这些部落利用本吉附近的高山地形牵制锡克人，而他则取道印度河直攻萨依。他宣称既然他和他们都属逊尼教派，对锡克人的“吉哈德”（宗教战争）就是他们共同的使命（加下横线部分在原著中为斜体——译者），于是从达丽罗和丹吉尔来的5000名壮丁立刻集合，10天内到达本吉。戈赫尔·阿曼带领3000名吉尔吉特骑兵和2000名壮丁在那天下午2时攻向萨依，山地人也在那天早上到达。以下是来自亚吉斯坦的首领：来自达丽罗的有格拉希米尔、拉拉·汗·伊柴迪、皮拉·汗、穆罕默德·汗、夏依廷（Shaithing）、贾尔达尔，来自丹吉尔的有凯罗拉、曼苏尔、罗斯德米、纳雍。

> 戈赫尔·阿曼的儿子中仅来了莫尔克·阿曼（Mulk Aman，Mulk 系 Malik 之笔误）。戈赫尔·阿曼自己因病拖延了。当时参与战争的还有以下这些：从诺默尔来的 200 人，从帕格劳特（Bhagrot）来的 2000（！）人，赛格瓦尔（Sakwal）的 100 人，米诺尔（Minor）来了 200 人。他们带来了许多粮草和军火，在那天到达了尼罗达尔（Niludar）一带，距萨依县有一柯斯（Kos）的距离。在那里为进攻进行了准备——锡克军有 8000 人——战争在杰格尔戈特（Chakarkot）打响，此处离印度河有三柯斯。当时是夏天，战争在一片荒芜之地爆发。杰格尔戈特堡内的锡克人被吉尔吉特人打败了，莫尔克·阿曼带领他的骑兵冲入堡中。杰格尔戈特的村民们打开堡垒大门迎接他们。战争在堡内外持续了一天一夜，锡克人战败，大多数在战争中被杀，一些跃下堡墙，粉身碎骨。只有 100 人逃脱，渡河（印度河）到达本吉。戈赫尔·阿曼仅损失 60 名骑兵和 40 名达丽罗人和丹吉尔人，还有西尔达尔·穆罕默德·汗，一个达丽罗的希纳人。莫尔克·阿曼并没有乘胜直捣本吉，他先遣返了那些山地人，但让他们随时准备投入下次战争。随后，他回到了吉尔吉特。

雷特奈尔博士在其“吉尔吉特战争”一文中继续对此事的描述，他记述了以后发生的一些大事，“在那年春天，大约有 20000 名克什米尔军队由前将军率领进入阿斯托尔”。结果如何？“所有（10000 人）军队被击溃，仅有一队士兵逃回本吉将此噩耗告知他人。”[29]

这也许就是赫希默杜拉·汗[30]曾提到的那次战争，他说后来纳图·沙上校前去与戈赫尔·阿曼会晤，双方以外交方式达成协议，戈赫尔·阿曼还将女儿嫁给了纳图·沙。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他又进一步叙述道：纳图·沙曾因为格里姆·汗的缘故不敢轻举妄动，后来他占领了这个国家，篡夺大权，使格里姆·汗成为有名无实的君王。但这一结论并无确凿证据。他的又一推论也很不合理，说英国根据 1846 年订立的条约（见下文），将吉尔吉特交给了古拉伯·辛格。

赫希默杜拉·汗的这一结论基于弗雷德里克·德鲁的叙述。依他之见，事情经过如下：

> 在克什米尔，当吉尔吉特即将要割让给古拉伯·辛格时，纳图·沙离开了锡克人，投靠新主，并为他去夺得吉尔吉特。这并不困难。道格拉军已减缓对阿斯托尔的锡克营地的骚扰，大多数锡克士兵投靠新主，他们已所剩无几，在吉尔吉特的可能不足100人。
>
> 这一和平态势并未维持多久，罕萨罗阇发起对吉尔吉特的进攻，掠夺了五个村庄。纳图·沙被迫从罕萨河流域组织一支武装力量进行抵抗，但他的部队最后战败，他自己被杀，而格里姆·汗，这个吉尔吉特傀儡罗阇也与他同赴黄泉。[31]

而据雷特奈尔博士在1848年的记录，他对最后一事的描述则大为不同：

> 戈赫尔·阿曼的义兄伊萨·巴哈杜尔（Isa Bahadur）因同马立克·阿曼·沙的一个姬妾之间的风波而被逐出了谢尔堡——一个隶属于布尼亚尔的堡垒，布尼亚尔也是亚辛的属国。他到摩诃罗阇处要求庇护，摩诃罗阇收留了伊萨，拒绝将他交给戈赫尔·阿曼。由此，戈赫尔·阿曼派出军队，由其兄弟阿克巴·阿曼（Akbar Aman）率领，占领了吉尔吉特地区的巴尔古（Bargu）和舒卡约特（Shukayot）诸堡。罕萨和纳格尔的罗阇与戈赫尔·阿曼联手在吉尔吉特人民的支持下打败并杀死了纳图·沙和格里姆·汗，后者由于与克什米尔结交而大失民心。戈赫尔·阿曼占领了吉尔吉特和恰伯罗特堡。

这次本土势力反抗道格拉霸权的联合行动展示了一幅与弗雷德里克·德鲁和赫希默杜拉·汗的描述大相径庭的图景。此次行动的起因

可参考弗雷德里克·德鲁的另一本书，在此书中，作者谈到了1847年英国派遣的一个代表团。派遣这个代表团的目的值得进一步研究。可惜无法收集到原始资料。不过无论这一代表团曾有过何种行为，对它的评价必须以当时的具体形势为据。弗雷德里克·德鲁曾任克什米尔机构的高官，他对1846年订立的条约描述如下：

> 英国与古拉伯·辛格订立的条约中的一些行文措辞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其中“丘陵与高山之国，及它的属国，位于印度河以东，拉维河以西”。但这一地区并不包括吉尔吉特，事实上，指的应是印度河以北地区。
>
> 事实上，这些措辞完全经不起严格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推敲，理所当然包括在其中的拉达克位于拉维河的东北部与北部，以及西北部；而条约的必争之地克什米尔，也难以准确地说它是在拉维河的西面，因为它同时位于印度河的东西两方。条约的起草人并不知道也不关心如何去准确表述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于是后来，英国政府趁此空隙派来了一个代表团，驻扎在边境。在代表团的干涉下，拉达克和吉尔吉特也被当作条约中所包括之地而移交给摩诃罗阇古拉伯·辛格。孟加拉工程兵的陆军中尉万斯·阿格纽（Vans Agnew）和拉尔夫·扬（Ralph Young）来到了吉尔吉特，我不知道他们在主河谷走了多远。沿着罕萨河，他们前往边疆，然后穿越了恰伯罗特（Chaprot）。他们还致函罕萨罗阇，让他去他们那里，但罗阇拒绝了。这时（我认为是1847年）的确切分界，如上所说，是位于一个河谷的恰伯罗特以上地区，以及位于另一河谷的沙格尤特（Shakaiot①）和戈尔布尔（Gulpur）之间的地区。[32]

以上文字载于英国驻克什米尔的出版机构的出版物，因而似乎是

① 在曼祖姆·阿里教授编绘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自然与人类地理图》图—1上，标示为Shikiot，下文Gulpur标示为Gulapur。——译者

为 1846 年条约对拉达克和吉尔吉特的占有正名的。弗雷德里克·德鲁先用一招将读者迷惑，他说，严格来说（但未进行严格定义），克什米尔位于“印度河的东西两边”，却未说明印度河正东的哈扎拉县并不属于克什米尔地区，而印度河流经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它本身并不能作为依据定义任何一条克什米尔地区的分界线。之后他又谈到了代表团。对此，约翰·毕达尔夫评述道：“首次在本吉越过印度河并越过吉尔吉特的是孟加拉军队的两名军官拉尔夫·扬和万斯·阿格纽，他们于 1847 年受英政府派遣，前去报道克什米尔的西北边境。但他们的报告却未被公开。他又在脚注中补充说：有一点比较可疑，就是这些报告是否曾交给英国政府，只知道万斯·阿格纽回来后不久，就被谋杀了，这些资料也随之遗失在木尔坦。”[33]第二个进入这一地区的英国人是雷特奈尔博士，他以 1847 年为限记录道：“万斯·阿格纽到了吉尔吉特的边境杰尔特（Chalt），它与纳格尔遥遥相对，万斯与当地人交上了朋友，而他们起初以为他是带着军队来的。”[34]

这就是我们知道的所谓的“代表团”和那些“报告”的下落，正是以前两者为依据，弗雷德里克·德鲁似乎认为吉尔吉特理应移交给古拉伯·辛格。这次任务的目的——确定印度河流域的疆域，如何才能实现呢？如果最终他们确定了“部分的疆域”，那又如何在此前提下规划克什米尔的一些地区呢？如纳格尔、罕萨、亚辛、布尼亚尔、吉泽尔、吉拉斯、达丽罗、丹吉尔和甘迪亚。从另一方面看，如果真如毕达尔夫和雷特奈尔曾暗示的那样，两名军队的中尉记下了北部边境的确切位置，那结果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报告，如果保存下来的话，会对英国的下一步行动有非常大的帮助。无论如何，这次划定疆域的计划并不成功，随后的军事形势使这一计划更难实现。既然罕萨的统治者拒绝参与会晤，那这个计划就是一厢情愿的，就是独裁。正如前章所述，罕萨的统治者打败了道格拉军团，把他们赶出了恰伯罗特。事实上，恰伯罗特就是吉尔吉特、纳格尔和罕萨传统的分界线，中古时期就是如此划分的。在上一章，我们已讲述了争夺恰伯罗特的几次战役，因此，那两个英国人很可能探测过这一传统的分界地，并估测了道格拉人的势力。在那里，他们可能已经雄风不再了。

道格拉人再次入侵，从戈赫尔·阿曼手中夺得了吉尔吉特，立格里姆·汗的儿子穆罕默德·汗二世为吉尔吉特罗阇，阿曼·阿里·沙为塔纳达尔。次年，战争在吉拉斯、达丽罗、丹吉尔、哈尔班等部落地区展开。雷特奈尔博士用当地圣战者的语言详细叙述了这些事迹，但他将此看做是吉拉斯的逊尼派同阿斯托尔的什叶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无需将此看做是宗教偏见，事实上，这一隐患在当年就已埋下。那时，道格拉人于 1851 年派巴赫希·哈里·辛格（Bakhshi Hari Singh）和迪万·哈里·金德（Dewan Hari Chand）率 10000 人摧毁了吉拉斯堡，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山地部落是支持吉拉斯人的”。这次行动挑起了吉尔吉特地区的骚乱，人们杀死了两个道格拉军官桑杜·辛格（Santu Singh）和拉马丹（Ramdhan）。吉尔吉特人民强烈要求戈赫尔·阿曼立即采取行动，于是戈赫尔·阿曼派出军队开始了他最后的征战。之后就爆发了著名的 1852 年之战，沙·拉伊斯·汗对此有非常详细的描述。赫希默杜拉·汗虽然没有将列出的事迹串连起来，但他完整地描述了道格拉人当时所处的军事地位。那时吉尔吉特的指挥官是塔纳达尔桑特·辛格（Sant Singh）。[35]在离吉尔吉特大约 7 英里的瑙布拉，有一要塞，由普布·辛格（Bhup Singh）指挥下的一个廓尔喀排据守。戈赫尔·阿曼对瑙布拉和吉尔吉特发起突袭，切断了两者间的联系。普布·辛格一听说，立刻带领 1200 人取道杰格尔戈特和萨依河谷出发。他沿着印度河前行，辗转到了吉尔吉特河，当他到达一个安全的萨菲德巴里（Safed Pari①）时，在一个狭小的河谷中被戈赫尔·阿曼发现，并立刻被重重包围。戈赫尔·阿曼在此处布下人马，并从前方阻断了普布·辛格前往吉尔吉特的道路。最后，普布·辛格被迫向本吉退却。但这时他的退路已被切断，对方的子弹、箭和石头从四面八方射向被围困在谷底的普布·辛格和他的军队，普布·辛格和他的军队无路可逃，几乎全军覆没，一些投降的士兵被卖为奴隶。从此，此地被称为“普布·辛格的山嘴”。戈赫尔·阿曼终于向道格拉人报了一箭之仇，再次在吉尔吉特建立了声威。他一直独立自主地统

① 意为白山嘴。——译者

治着吉尔吉特，直到1860年逝世。弗雷德里克·德鲁也同意此结论：

当摩诃罗阇的后备军困于此种境地时，一出悲剧也同样在他的吉尔吉特和瑙布拉的军队上演，我们看到，那些军队已被重重包围，最终一败涂地……

因而，如前所述，道格拉人完全被驱逐出印度河右岸的达尔德斯坦。戈赫尔·阿曼再次统治吉尔吉特。从1852年起的8年中，摩诃罗阇的疆域，哈尔毛希以下仍然至印度河为止，哈尔毛希以上则以巴尔蒂斯坦为限，他拥有位于河流两边的这个国家。主要的军事力量集中在本吉，看来古拉伯·辛格的旧把戏已举步维艰。[36]

雷特奈尔博士不同意弗雷德里克·德鲁的最后一个结论，尽管在不屈不挠的戈赫尔·阿曼面前，任何军队都难以与之匹敌。德鲁、赫希默杜拉和沙·拉伊斯·汗都谈到了吉尔吉特从1852年至1860年的这段和平时期。但沙·拉伊斯·汗暗示道，1857年接替古拉伯·辛格的兰比尔·辛格在位时，暗中对吉尔吉特仍有所企图。雷特奈尔博士细细追索了不和的种子是如何播下的，以及军事上的胜利所无法企及的方面，他为道格拉人那些愚人耳目的手段所吸引，他逐年概括总结的记录如下：

1853年——现在，摩诃罗阇的活动限制在国境之内，留给他的疆域正如条约所述，到本吉，亦即印度河的东面为止。但他派了几个说客潜入戈赫尔·阿曼家族内部大施离间计。除了伊萨·巴哈杜尔，他还拉拢了其他两个兄弟，克里尔·阿曼（Khalil Aman）和阿克巴·阿曼（Akbar Aman），但他在迈赫塔尔·萨开（Mihtar Sakhi）处碰了钉子，尽管当时他正被流放在外。他还收买了戈赫尔·阿曼的叔父阿兹玛特·沙（Azmat Shah）。

1854年——摩诃罗阇教唆奇特拉尔的沙·阿夫扎尔

(Shah Afzal) 袭击戈赫尔·阿曼，见下。

1855 年——奇特拉尔的沙·阿夫扎尔之子阿达姆·考尔 (Adam Khor) 将戈赫尔·阿曼的势力逐出马斯图季和亚辛，将其限制在布尼亚尔和吉尔吉特。

1856 年——摩诃罗阇派了一支军队，由瓦齐尔佐尔阿韦罗 (Zoraweru) 和阿塔尔·辛格 (Atar Singh) 率领，在纳格尔的扎希德·贾法尔 (Zahid Jafar) 罗阇的支持下出兵征战，戈赫尔·阿曼亲临抗敌，他从吉尔吉特撤退，并从阿达姆·考尔处夺回了亚辛和马斯图季。

1857 年——戈赫尔·阿曼再次攻占吉尔吉特，赶走了此地的塔纳达尔伊萨·巴哈杜尔(Isa Bahadur)。之后，戈赫尔·阿曼和摩诃罗阇一直在奇特拉尔、纳格尔、罕萨等地暗中较量。

1858 年——属于沙·格多尔 (Shah Kator) 之一支的奇特拉尔的统治者沙·阿夫扎尔逝世。在克什米尔的支持下，格里姆·汗罗阇的儿子穆罕默德·汗用尽手段对付戈赫尔·阿曼。后来，穆罕默德·汗娶了戈赫尔·阿曼的女儿，两家就此修好。尼罗达尔 (Niludar) 山脉之外的吉尔吉特的萨依县仍由锡克人占据。

1859 年——巴达克山的米尔·沙 (Mir Shah) 与罕萨的罗阇迦曾弗尔 (Ghazanfar) 支持戈赫尔·阿曼攻打纳格尔，纳格尔由同道格拉人友好的扎希德·贾法尔罗阇统治，他一直想将锡克人从萨依和本吉驱逐出去。戈赫尔·阿曼的叔父阿兹玛特·沙从他的避难所奇特拉尔被驱逐出去。

1860 年——摩诃罗阇教唆阿达姆·考尔和阿兹玛特·沙去攻打戈赫尔·阿曼。他们当时正在迪尔和亲克什米尔的首领迦曾·汗 (Ghazan Khan) 在一起——阿达姆·考尔想获得亚辛，阿兹玛特·沙想得到马斯图季并打算将（布尼亚尔）的谢尔堡给伊萨·巴哈杜尔，摩诃罗阇想得到吉尔吉特。此间，摩诃罗阇和迪尔、巴达克山等国的首脑一直玩着各种阴

谋对付戈赫尔·阿曼。戈赫尔·阿曼的去世预示着摩诃罗阇将联合吉尔吉特罗阇格里姆·汗的儿子发动战争。

由于戈赫尔·阿曼久病不起，这些阴谋都有了得逞的可能。可惜，无法获得有关戈赫尔·阿曼的详细资料，从雷特奈尔博士处得到的资料也并不完整。但手头的所有资料都表明了这些外交把戏和阴谋是如何愈演愈烈的，以及周边地区，包括阿富汗、迪尔、斯瓦特、奇特拉尔和巴达克山是如何卷入其中的——英国对那里的整个地区都很感兴趣。此后，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相关新闻，雷特奈尔博士也引用了其中一部分。英国在这场纷争中扮演的各种角色，仍需通过现存的一些秘密资料推演。无论英国在摩诃罗阇的秘密行动中如何煽风点火，他们无疑给摩诃罗阇的下一步行动开了绿灯。从雷特奈尔博士的评述中可以了解这一切。但进军之途并不一帆风顺，每一步都充满了阻力，和平并不长久，直到英国在那里建立起稳定的政治机构。当时的军事局势如下。

雷特奈尔博士有关"达尔德与克什米尔战争史"的叙述是以一个沙津的达尔德人（Saziini Dard）的陈述为依据的，他曾多次参与交战。兰比尔·辛格任命德维·辛格·纳拉因尼亚（Devi Singh Narainia）上校为总指挥。雷特奈尔博士给我们描述了派遣道格拉军队背后的故事。当锡克人被戈赫尔·阿曼击败后，布尼亚尔的伊萨·巴哈杜尔和亚辛的阿兹玛特·沙逃往斯瓦特请求庇护。另一个名为苏丹（Sultan）的布霍尔杜·沙（Pohordu Shah）的前任瓦齐尔也逃入山中。戈赫尔·阿曼一死，这些人就复出，一起前往查谟投靠摩诃罗阇。摩诃罗阇对他们的忠诚甚为满意，随后拨了6000名步兵和四门炮给伊萨、苏丹和阿兹玛特·沙。他们还打算充分利用阿斯托尔和本吉的5000人，并将其武装起来。他们在阿斯托尔指派了一名指挥官来率领他们。戈赫尔·阿曼死后，由马立克·阿曼（Malik Aman）接任，他召集了达丽罗和丹吉尔的部落，命令他们立即投入战斗，否则将沦为亡国奴，他还派使者前去联合罕萨罗阇迦曾弗尔和纳格尔的沙·穆拉德的力量共同御敌。伊萨·巴哈杜尔和他的同盟从阿斯托尔出发，包围了吉尔吉特堡。马

立克·阿曼还去奇特拉尔的统治者阿曼·乌尔·穆尔克（Amanul Mulk）处寻求援助，阿曼·乌尔·穆尔克派他的侄子拉克塔尔·汗（Lakhtar Khan）率8000人前去吉尔吉特救助。围攻持续了将近一月。在围困的第27天，罕萨罗阇率领12000将士赶到。但他们袖手旁观，并不参战。除此前派出的8000名士兵，从奇特拉尔又到了6000名援兵，他们立刻参战，但吉尔吉特最终还是沦陷了。马立克·阿曼退守亚辛。

就在1860年吉尔吉特被占领后，组成了新的行政机构。据沙·拉伊斯·汗记载，德维·辛格上校完全掌握了军权，并将行政管理权赋予拉拉·贾瓦哈尔·辛格（Lala Jawahar Singh），他是首位被派驻吉尔吉特的瓦齐尔瓦扎拉特。穆罕默德·汗二世死后继位的阿里·达特·汗（Ali Sad Khan）罗阇则被剥夺了所有权力。为阿里·达特·汗管理民政事务的瓦齐尔苏尔塔努（Sultano）被免职。拉拉·贾瓦哈尔·辛格大权独揽。瓦齐尔苏尔塔努保留了阿里·达特·汗罗阇顾问一职。伊萨·巴哈杜尔罗阇再次被摩诃罗阇任命为布尼亚尔的瓦利（Wali）和领主（Jagirdar）。随后，伊萨·巴哈杜尔梦想在吉尔吉特分得一杯羹。

在这一新的权力配置下，德维·辛格上校继续征战亚辛。马立克·阿曼采纳了奇特拉尔的阿曼·乌尔·穆尔克的建议，加强防守加古奇以防锡克人的进攻。在加古奇组成了一个五个人的塔纳。5个月后，克什米尔的瓦齐尔佐尔阿韦罗派瓦齐尔穆赫塔尔（Mukhtar）带领20人前去加古奇夜袭塔纳。穆赫塔尔包围了塔纳，把那五个人抓了起来，自立为塔纳达尔。三天后，佐尔阿韦罗、伊萨·巴哈杜尔和其他人带着9000步兵和3000骑兵向亚辛进军。他们到达了杰姆格尔（Chamugar），这次突袭使马立克·阿曼逃至奇特拉尔。锡克人占领了亚辛，有人提供资料，讲述当时情形如下：

> 嗜血的异教徒伊萨·巴哈杜尔，命令士兵闯入每家每户，
> 无论性别年龄，格杀勿论，屠杀持续了五天五夜，血流成河……
> 2000名十岁以上的男人、女人、孩子和不计其数的婴儿成为

> 残忍的锡克人的刀下冤魂。——3000人（主要是妇女，还有一些孩子和老人）成为俘虏，在三天内被带往吉尔吉特。佐尔阿韦罗沿途大肆耀武扬威。他一到吉尔吉特，伊萨·巴哈杜尔和阿兹玛特·沙就挑选了1000名美貌女子，用3000名士兵押送，将她们送往查谟。[37]

随后，摩诃罗阇将布尼亚尔封给伊萨·巴哈杜尔，将亚辛给了阿兹玛特·沙，并拨给他们军队防守。但这一局势未能持续多久。锡克军队回吉尔吉特不久，阿兹玛特·沙就被赶出了亚辛，马立克·阿曼再次占领了亚辛。此后，亚辛又遭攻击。同样，为了将道格拉人从吉尔吉特赶走，亚辛的罗阇马立克·阿曼于1867年和1868年两次攻打吉尔吉特。这些战争并非是孤立的事件，它们都是紧随1866年对罕萨之战后爆发的。据弗雷德里克·德鲁记载，1866年对罕萨的战争显而易见是在纳格尔统治者的支持下发生的，但道格拉军为纳格尔人所骗而撤军，颜面大失。[38]正是道格拉军的败北壮了马立克·阿曼的胆色，他集合所有部落组成英勇无畏的联军，攻打吉尔吉特。亚辛的瓦齐尔拉赫马特（Rahmat）是联军的灵魂人物。弗雷德里克·德鲁叙述如下：

> 一两个月内，一支强大的军队侵入吉尔吉特。现在，亚辛的统治者已跨过崇山峻岭，向奇特拉尔求助，奇特拉尔的罗阇阿曼·乌尔·穆尔克带着一队人马前来相助，与亚辛和（来自吉尔吉特西北边河谷的）达尔德人包围了吉尔吉特堡，而罕萨和纳格尔人联合起来攻占了河流左岸，与堡垒相对。奇特拉尔罗阇是诸首领中最杰出的人物。

摩诃罗阇派出瓦齐尔佐尔阿韦罗和比贾依（Bijai）上校迎战。但蒙希·阿齐兹·乌丁的叙述却与德鲁的不同。[39]他突出强调了奇特拉尔罗阇的作用，并揭示了当地的一些政治问题。阿曼·乌尔·穆尔克是沙·阿夫扎尔二世的第二个儿子，他于1857年在奇特拉尔自立为王。在他统治的第三年，道格拉军在戈赫尔·阿曼死后占据了吉尔吉

特并向亚辛进军。阿曼·乌尔·穆尔克在瓦尔谢古姆（Warshegum）四周挖战壕以防守，并将戈赫尔·阿曼的儿子帕赫尔旺（Pahalwan）安排在马斯图季。起初，他曾将瓦尔谢古姆交给他的儿子马立克·阿曼二世掌管，随后又传给了米尔·瓦利（Mir Wali）。而塔杰穆尔·沙（Tajammul Shah）之子马立克·沙（Malik Shah）逃至查谟，然后又随同道格拉军一起回到了吉尔吉特。正是为了迎战马立克·沙，阿曼·乌尔·穆尔克率领一支劲旅，前往吉尔吉特。他一路上攻克了布尼亚尔，向吉尔吉特挺进，在那里展开了一场恶战。道格拉军在堡中严防死守。第二天，舒贾乌尔·穆尔克·拉扎海尔（Shujaul Mulk Razakhel）被城头打来的一枚炮弹击中身亡，之后马立克·沙乘隙出堡逃往亚吉斯坦。最后，阿曼·乌尔·穆尔克退守奇特拉尔。

弗雷德里克·德鲁记录了有关奇特拉尔堡发生的事，并谈到米尔·瓦利和帕赫尔旺。他总结道：

> 就这样，奇特拉尔、马斯图季和亚辛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对它们来说，同吉尔吉特的摩诃罗阇的将士们的关系，最好是保持距离。

到后来，巴达克山又起风波，它的统治者马茂德·沙（Mahmud Shah）在艾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Amir Abdur Rahman）从前的政策的影响下，逐渐卷入阿富汗的争端之中。于是，奇特拉尔罗阇决定与克什米尔摩诃罗阇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米尔扎·古拉姆·穆尔塔扎（Mirza Ghulam Murtaza）[40]和蒙希·阿齐兹·乌丁[41]谈到了这一友好的协定。据前一位作者所述，缔结协定事宜由迪尔的瓦利拉赫玛都拉·汗（Rahmatullah Khan）安排，协议书则取道马拉坎德至迪尔达尔（Dildar），通过米安·穆格萨尔·沙·卡卡海尔（Mian Muqassar Shah Kakakhel）送呈。对于兰比尔·辛格的这一倡议，阿曼·乌尔·穆尔克通过他的大臣阿洪德·汗（Akhund Khan）表示了赞同。蒙希·阿齐兹·乌丁概括道，1876 年，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派瓦齐尔伊纳叶特·汗（Enayat Khan）去见摩诃罗阇，第二年又派巴伊拉姆·汗·拉扎海尔

（Bairam Khan Razakhel）前去觐见，摩诃罗阇盛情款待他们，回去时还送给他们许多礼物。然后摩诃罗阇派一位名为穆罕默德·阿克巴·汗（Muhammad Akbar Khan）的大臣拟定协定条款，尼扎莫尔·穆尔克（Nizamul Mulk）王子和迈赫塔尔帕赫尔旺代表奇特拉尔罗阇，甘加·辛格（Ganga Singh）代表摩诃罗阇前往签约。签约仪式于1877年在特姆沙克（Thamshak）举行。双方就以下几项协议达成一致：

1. 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不得侵犯吉尔吉特和布尼亚尔地区。

2. 摩诃罗阇不可进攻加古奇和瓦尔谢古姆。

3. 付给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30000卢比，让他不要侵犯吉尔吉特和布尼亚尔。

鉴于俄国来势汹汹，摩诃罗阇在与奇特拉尔修好的同时，也斗志昂扬地向西部的部落地区逼进。之前，我们已看到奇特拉尔堡是如何被毁的，前去帮助奇特拉尔人的部落民众是如何被强行遣返的。1866年，瓦齐尔佐尔阿韦罗决定袭击达丽罗部落，洗劫散居的各个村庄和居民。雷特奈尔博士细述了有关“1866年与达丽罗（亚吉斯坦）之战”的情形和“达丽罗之战中的‘暴行’”。这些突袭的目的只是要将恐怖深植于部落人民心中，并进行疯狂的掠夺。他们并不想在那里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也不想把这些部落地区并入克什米尔领土。

克什米尔摩诃罗阇兰比尔·辛格的双重战略并非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而是他与英国副王（Viceroy①）长期磋商谋划后的决定。[42]利顿勋爵于1876年11月17日和18日在马托普尔（Madhopur）与摩诃罗阇兰比尔·辛格连续会晤两次，并

> 表示了他对克什米尔边境事务的忧虑，他看到摩诃罗阇周边的国家都为蛮族所占，人民只知效忠于各部落酋长，而那些酋长在任何方面都要落后于被他们所统治的人群。于是，他指出最根本的是要“将诸如奇特拉尔和亚辛这样的国家收归英国政府的像殿下一样的朋友和同盟者的控制之下，而非让

① 代表英国女王统治印度的总督的一种称号，亦译为“总督”。——译者

他们一味卷入以武力敌对克什米尔的纷争之中。通过一些山口来界定北方的领土已变得越来越重要，无疑，这些山口对军队的通行多少提供了便利。”随后，总督又解释说英国政府在1876年第二次委托毕达尔夫上尉再次视察伊希戈曼山口……其他山口、邻近及与其相接的山口，为了克什米尔地区的安全与和平，行使此事务的权利应交由摩诃罗阇或英国政府。为达此目的，有必要完全控制位于部落地区和克什米尔边境之间的所有国家。[43]

这就是“马托普尔方案”，它大大助长了摩诃罗阇的气焰，“利顿勋爵许诺给予摩诃罗阇一切他所要求的权力的结果”，便是向摩诃罗阇的军队进一步提供5000支步枪，都是斯奈德（Snider）或恩菲尔德（Enfield）出产的，以示印度政府衷心希望摩诃罗阇的国防固若金汤。[44]在这一鼓励下，摩诃罗阇开始踌躇满志地迈出第一步，与奇特拉尔罗阇订立了盟约。关于此事，上面已提及。英国则负责下一步，派遣约翰·毕达尔夫去吉尔吉特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时间为1877年到1881年。早在1873年—1874年间，他就是执行叶尔羌、帕米尔和瓦罕地区任务的成员之一。

英国政策的这一剧变为他们以后在此地区的地位埋下了伏笔。这一转变其实暗示了两种可能的结果：第一是英国政府直接吞并部落领地，第二是将这些领土交由他们的封建主，如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摩诃罗阇来支配。M. L. 格布尔的评述很是切中肯綮：

> 无论如何，它（如第二种结果）将完全颠覆英国对克什米尔的旧政策，旧政策曾要求克什米尔统治者们守住父辈留下的领土，不要向外扩张。印度政府外事部由此得出结论：英国政府的普遍意见就是确保伊希戈曼山口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方式就是授权克什米尔摩诃罗阇拓展他的疆域，直至收回亚辛，无论是用武力还是协商。[45]

M. L. 格布尔进一步认为，依照1876年—1877英国—克什米尔方案，摩诃罗阇通过与奇特拉尔缔结条约，企图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如上所述，条约是缔结了，但未涉及控制的问题。在此，M. L. 格布尔犯了一个错误，他说“奇特拉尔罗阇宣称效忠于阿富汗的艾米尔”，但条约中无任何条款显示奇特拉尔罗阇只对他的新宗主表示效忠。[46]

在亚辛和瓦尔谢古姆，经历了1862年道格拉人的野蛮屠杀后，马立克·阿曼离开此地前往丹吉尔。随后，他的兄弟，米尔·瓦利继位，继续密切监视道格拉军的一举一动，继米尔·瓦利之后是帕赫尔旺，他是迈赫塔尔阿曼·乌尔·穆尔克的侄子和女婿。事实上，帕赫尔旺属于胡什瓦格特家族，他视布尼亚尔为家族的遗产。于是在奇特拉尔和克什米尔条约签订两年后，他率军入侵布尼亚尔和吉尔吉特。他抱着坚定的信念：“将道格拉人赶出吉尔吉特。”杜兰[47]续上故事：“迈赫塔尔竭尽所能地鼓励他，承诺会帮助他，激励他前去冒险。于是帕赫尔旺开始出兵围攻布尼亚尔的主堡——谢尔堡。就在他竭尽全力投身于他的冒险事业时，迈赫塔尔悄悄召集军队占领了亚辛。”杜兰注意到，“他（迈赫塔尔）统治了整个的奇特拉尔地区，从布尼亚尔起直至卡菲里斯坦和迪尔，北至兴都库什分水岭”。

随着英国对这一地区兴趣日浓，当地罗阇们也都考虑与之建立直接的友好关系。事实上，罗阇们的这一意图早先就已显露。正是这一动机促使亚辛的米尔·瓦利向探险者海沃德大献殷勤，但他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而海沃德先生于1820年遇害。此事引起英国国内的一系列争论，大家认为应从贾拉拉巴德处夺取奇特拉尔和亚辛，将它们置于英国的直接掌握之下。此时，罕萨那边又爆发了一起大骚乱，事情缘于对邻近杰尔特的一个重要哨卡——恰伯罗特的争夺，它制约着周边地区的战略要道。

M. L. 格布尔具体描述了这一兵家必争之地：

> 1875年，纳格尔人从罕萨人手中夺得了恰伯罗特堡，但纳格尔首领在罕萨人民的敌视之下很难守住它，于是他力邀

> 摩诃罗阇出兵共同防守。毕达尔夫上尉力劝摩诃罗阇接受这一建议，于是摩诃罗阇的军队于1877年进驻。但这大大激怒了罕萨人民，以致他们不仅断然决定要夺回恰伯罗特，而且计划下一年联合亚辛、吉拉斯和达尔德人共同进军吉尔吉特。1880年，战争终于爆发，恰伯罗特的形势变得非常紧急。无疑，在英国的支持下，后来克什米尔军队还是挽回了局势。[48]

赫希默杜拉·汗[49]谈到了罕萨罗阇的这一行为以及他对吉尔吉特持续不断的进攻。攻克恰伯罗特后，他于1869年侵入诺默尔的一些村庄，抓了200人。道格拉军对此无能为力。据赫希默杜拉·汗所述，罕萨比亚辛更危险。

随着各方面的动乱日益增多，英国于1889年再次建立政治代表处，由杜兰上校负责。于是战争对象发生了转换，成为一场直接对抗英国宗主国的战争。关于此事的一些资料来源于杜兰[50]，他曾前去镇压遍及各地的骚乱。他在他的书中得意洋洋地谈到他的伟大功绩，夸耀自己重组了当地的军事机构，而且几乎扑灭了这一地区的叛乱。他自诩道：

> 我是英政府边境事务的代理人，与邻国的外部关系会在我的掌握之中。吉尔吉特地区内的统治权在克什米尔当朝者手中，军权则在克什米尔将军手中。但根据条约，没有我的许可，军队不得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形势陷于困厄……要解决这一困厄，有赖于由总督组建的未得到认可的“地下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将军和我本人。

他谈到在1889年圣诞节在吉尔吉特举行的一个“接见仪式”(Durbar)，“要彰显政府的全部目的，就要在此地设立长期的英国代表处”。但从副王兰斯多恩（Lansdowne）勋爵处得到的支持比英国政府的军事支持更为重要。在确保与克什米尔联络系统的安全以及储备了必需的粮食物资后，他打算打破他的权限，控制诺默尔堡。“此前，部

落人已将它围困了三年”。1890年，他实现了他的目标。1891年，“各处又起风波，在我看来，这一切预示着真正的危险即将来临”。这年4月，杜兰带了数门大炮和一些步兵前往布尼亚尔的加古奇，此地离吉尔吉特40英里。吉尔吉特总督和克什米尔将军也公然随行。加古奇被攻占。随后，纳格尔统治者的三个儿子之间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乌扎尔·汗（Uzr Khan）杀死了他的两个兄弟，然后准备进攻杰尔特和恰伯罗特。据与纳格尔统治者的协议，杰尔特堡由克什米尔军队驻防，恰伯罗特堡也被他们所占。但乌扎尔·汗致函罕萨统治者，希望能联手。他想挑起战争，但杜兰先他一步挽回了局势。结局用杜兰的话来说就是：“大约10天左右的前期磋商（pourparlers）后，罕萨—纳格尔派出使节来到我营中，带来了一个恰当的建议，我们谈到了时局。此刻我们进行的所有的商讨都是真诚地想要避免战争……杰尔特堡……由克什米尔精兵良将把守，粮草充足。最后的，但不是无足轻重的一点，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条通过杰杰尔山嘴（Chaichar Pari）的道路。”他宣称自己“加强了克什米尔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将其影响渗入到每一角落”。但他没有提及恰伯罗特堡的重要性。然而，杜兰深知风暴仅仅是减弱了，并没有结束。当8月份摩诃罗阇的兄弟罗摩·辛格罗阇和克什米尔军队的总司令前去视察吉尔吉特时，风波又起，形势危急。由于当时俄国已吞并了部分帕米尔地区，英国政府召回了杜兰。杜兰写道：“在我去西姆拉时，我无一遗漏地将吉尔吉特边境的所有问题仔细考虑了一遍，印度政府决定加强驻吉尔吉特特区的克什米尔军队，派出了第五廓尔喀团的200人，并运来我们本地山地连的两门炮。”他又补充道：“考虑到罕萨统治者撕毁了与我们的协定，向杰尔特堡的联合进攻也刚被阻止，部落土著有可能在秋天采取进一步行动，印度政府决定派我于10月率军前往杰尔特，在那里建一个小碉堡，修复杰尔特与吉尔吉特间的道路。”15名精选的英国军官前去助阵，更使杜兰如虎添翼。罕萨和纳格尔两国也重整军威，想一举打败克什米尔军队，重振昨日雄风。他们的策略是将杰杰尔山嘴夺到手，然后便有可能围攻诺默尔。罕萨当时的统治者是萨夫达尔·阿里·汗（Safdar Ali Khan）。据杜兰所述，他也需要倚仗北部力量，他曾派一名使节前往塔

什干与俄国人会谈。在他看来，胜利的关键是双方的军事装备。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 我有100支步枪和两门炮，第五廓尔喀团的180人是军队的主力，克什米尔警卫团的400名廓尔喀人和道格拉人，克什米尔拉古·贝尔塔布（Ragu Pertab）团的250名道格拉人，150名布尼亚尔民兵，第20旁遮普步兵团的20人小分队，我贴身的护卫队，一半配备一架加特林机枪，一半武器暂时配给布尼亚尔人，使其坚不可摧，并配备了哈扎拉山地炮兵连的一门七磅炮。

敌方军队有“四五百人，装备一般”，战争很是激烈。E. F. 奈特（E. F. Knight）对此描述甚为生动[51]，他谈到攻占尼尔特以及向纳格尔和罕萨进军的路上，每一步都有一番短兵相接的战斗。奈特列出了指挥军队的15名英国军官的名字。[52]而杜兰则受了伤，他写道：

> 我倒在一堆干草中，连续两个小时，听着枪炮声在我面前轰鸣，看着士兵们一批又一批地倒下。

最终，还是英国的调兵遣将和钢铁枪炮取得了胜利，用杜兰的话说，这最后的结局是：

> 我可以说，在处理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中没有碰到任何阻挠。萨夫达尔·阿里·汗的堂兄纳齐姆后来被立为罕萨的首领，任命胡马雍为瓦齐尔，纳格尔的老国王继续他的统治。立他的儿子西甘达尔·汗为嗣子。乌扎尔·汗回来后，王位被废，并被放逐到克什米尔，他至今仍生活在那里。萨夫达尔·阿里·汗逃至叶尔羌，在那里他靠中国人赐予他父亲的一小笔财产度日。他那凶残的瓦齐尔达杜（Dadu）在流亡途中死去。

这是罕萨军队首次遭受挫败，克什米尔军队在英国军官的指挥下一举得手，继续向米斯加尔进军，但他们没能抓到萨夫达尔·阿里·汗。此前对克什米尔的几次战争都以罕萨的胜利告终。在1848年的战争中，纳图·沙上校的军队举手投降，他自己则被杀。1866年，道格拉人再次战败。他们四处逃亡，历经艰难，才回到吉尔吉特。到后来，罕萨还占领了恰伯罗特。这些胜利曾大大鼓舞了罕萨人。在此前与英国缔结的条约中，他们同意，只要英国交付一大笔补贴，就让他们安全通过此地去往叶尔羌。杜兰指责罕萨违背了这一约定，因而才采取此次军事行动以示惩罚。但其中缘由并非如此简单。英国的进军是与他们的全球策略联系在一起的。英国想将俄国人和中国人排除于此地之外。当克什米尔军队遭到挫败，无法帮助他们达到这一目的时，英国就开始亲自动手了。因而罕萨和纳格尔是向英国人投降的，而非向摩诃罗阇投降。扬哈斯本（荣赫鹏）上尉被任命为罕萨的助理政治代表。

在罕萨的这一行动并没有结束骚乱。在印度河下游地区和亚辛，不祥之兆正在出现。印度河河谷的部落虽然被道格拉人打败，但仍坚持不懈地进行反抗——尤其是在斯瓦特的毛尔维们影响下的吉拉斯人。1892年8月30日，阿曼·乌尔·穆尔克去世后，奇特拉尔发生了争夺王位的冲突。当时，周边的一些力量也想前去分一杯羹。起先，艾米尔的第二个儿子阿夫扎尔·乌尔·穆尔克夺得了王位。英国准备与他建立联系，因此，派罗伯逊（Robertson）前往奇特拉尔。同时，曾去阿富汗寻求庇护的阿曼·乌尔·穆尔克的弟弟谢尔·阿夫扎尔（Sher Afzal）由于他的一些英勇之举而为艾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Abdur Rahman）看重，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返回奇特拉尔，废了阿夫扎尔·乌尔·穆尔克，夺取了王位。杜兰写道：

> 在他（罗伯逊）将离开本吉那天，突然奔来一名急行信使，他带来一个消息说，老迈赫塔尔的弟弟谢尔·阿夫扎尔，作为艾米尔的俘虏已在阿富汗流亡多年，现在经道拉（Dorah）山口窜入边境，突袭阿夫扎尔·乌尔·穆尔克，杀

> 死了他，自立为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情况很是不妙，但最糟糕的是他竟以宗教战争的名义向我们挑战（加下横线部分在原著中为斜体——译者）。这样，我们在当地的机构的负责人和医护人员都会有生命危险。他们正在召集军队，不日将向亚辛进军，奇特拉尔地区恰恰在我们的边境之上。[53]

奇特拉尔的问题将在后面谈到，我们进一步来研究杜兰的叙述。

> 我到加古奇的第二天，从印度河河谷传来消息，这下轮到我挨野蛮人的暗箭了。我听说罗伯逊并非如我们所愿，安全地待在本吉，而是在离本吉40英里之外的塔尔班。在那里，他曾受到袭击，也曾带了50人渡过印度河进行反击并焚烧吉拉斯。印度河河谷之乱已起，他已陷入了致命的困境中。[54]

他进而记录下在他去吉尔吉特途中，他听说驻吉拉斯的克什米尔政府机构已被推翻，他终于活着抵达吉尔吉特，但肩上中了一枪。[55]动乱愈演愈烈，当一干廓尔喀人横渡印度河时，遭到火攻，三人死亡，华莱士（Wallace）上尉受伤。经过千难万险，终于收复了吉拉斯。然而，麻烦还未结束。据杜兰所述：

> 2月，我收到可靠消息，印度河河谷诸部落正准备一起声势浩大的叛乱，印度河河谷的科希斯坦正在招兵买马，并联合达尔德人、丹吉尔和吉拉斯的力量，意在进攻吉拉斯和离它10英里的哨所。[56]

战争确实发生了，情况更糟。丹尼尔（Daniell）少校和莫伯利（Moberly）中尉指挥军队防御，吉拉斯城布下270名步枪手防守，丹尼尔带领150人发动进攻，但圣战者在各处严守。激烈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中午时分，伤亡无数，丹尼尔战死，杜兰记录了战争持续了一整天

后的最后战况，“损失了51名军官，150名士兵，敌方头领除一人外全部战死”。从杜兰处我们可获知圣战者的这次联合作战的情况：

> 我继续留在吉尔吉特以便通知罗伯逊发生了的事情，他仍在奇特拉尔，并试图探究这次事件将对边境形势产生什么影响。而在奇特拉尔，谣言四起，恐慌弥漫，有传言说印度河河谷部落联盟的这一声势浩大的进攻是要来讨还血债。第二次进攻发生在追悼阵亡将士后的第40天。罗伯逊需要军队支援吉尔吉特以西70英里远的吉泽尔，我则紧盯着吉尔吉特北面50英里的罕萨—纳格尔河谷，如我们这方遭遇不幸，可能会殃及后面的国家，且离吉尔吉特70英里的吉拉斯不堪一击。[57]

杜兰自己带了200人和两门大炮到了吉拉斯，加强了英军在吉拉斯的防守力量。但据说没有进一步的进攻发生，部落地区重归和平。但科希斯坦人是如何罢手的，对此无案可查。最后结果是英军长期占领吉拉斯，任命一位助理政治代表驻在那里。杜兰提到这一占领带来的益处时说：

> 它（吉拉斯）的位置在吉尔吉特的侧面——克什米尔大道经过此处，从而使它成为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地，驻守在那里的军队可有效抵御印度河河谷部落的入侵。而且，它使我们得以控制通往英国管辖地区的一条捷径。通过这条捷径，只要穿越巴布萨尔山口，便可从卡甘山地通往旁遮普的阿博塔阿巴德。[58]

奇特拉尔的地理位置具有国际交通枢纽的性质，谢尔·阿夫扎尔对它的占领不仅意味着艾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力量将染指此地，而且暗示俄国对此地具有直接影响。为了制约这一日益强大的威胁，英国转而采取拥护尼扎莫尔·穆尔克的计划。尼扎莫尔·穆尔克是阿

曼·乌尔·穆尔克的长子，曾从奇特拉尔逃往吉尔吉特寻求庇护。对他的意愿，英国给予了全力支持。当他前往马斯图季和奇特拉尔以赢得民众支持，并试图逐出谢尔·阿夫扎尔时，英国毫不迟疑地派来了军队。最终，英国如愿以偿地看到尼扎莫尔·穆尔克夺得了奇特拉尔的王位，在吉泽尔驻扎了军队并任命扬哈斯本上尉为驻马斯图季的政治官员。

在英国支持下，尼扎莫尔·穆尔克于 1892 年就位，但他的地位并不能轻易地为这一地区的势力所接受。在与阿富汗国王有直接利益关系的边境地区，动乱正在酝酿之中。同时，在金杜尔（Jandul）崛起了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乌姆拉·汗（Umra Khan），统治着斯瓦特、迪尔和巴乔尔之间的地区。在雄心的驱使以及尼扎莫尔·穆尔克的弟弟，阿米罗尔·穆尔克（Amirul Mulk）的支持下，他进军奇特拉尔，杀死了尼扎莫尔·穆尔克，夺得王位。这一突发变故扰乱了奇特拉尔的权力均衡。于是又开始了一系列协商。现在阿米罗尔·穆尔克处于英国控制之下。另一方面，金杜尔的乌姆拉·汗将他的势力北移，以全部控制奇特拉尔。阿富汗的艾米尔也伺机而动。而前任统治者，从奇特拉尔出逃的谢尔·阿夫扎尔则居住在喀布尔。他看到英国的势力已有所减弱，便想投靠阿富汗以有所图谋。所有这些国家间盘根错节的冲突终于导致了 1895 年著名的奇特拉尔战役。

对奇特拉尔战役[59]的一些评述普遍宣称英国的主要目的是从奇特拉尔赶走乌姆拉·汗，将王位授予它的合法继承人。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如果英国仅抱此目的，那他们就不应干涉奇特拉尔几个王子间的夺位之战。可见真情并非如此。此前，我们已经看到，英国是如何支持尼扎莫尔·穆尔克的，一旦将他扶上王位，英国便增强对奇特拉尔的控制，并安插乔治·罗伯逊爵士以实现对奇特拉尔政治的参与。后来他们还在马斯图季设置了一名政治官员，并在吉泽尔驻扎军队，从而使这些地区都处于奇特拉尔的控制之下。正是为了反抗英国的这一行为，奇特拉尔人民揭竿而起，支持阿米罗尔·穆尔克，阿米罗尔·穆尔克则借助乌姆拉·汗的力量。同时，阿富汗人想扩大他们对奇特拉尔的影响力，因而谢尔·阿夫扎尔又回来了。由于害怕谢尔·阿夫扎

尔，阿米罗尔·穆尔克别无选择，只能恳求英国收留并给予帮助。M. E. 亚普（M. E. Yapp）在乔治·罗伯逊爵士关于奇特拉尔著作的再版序言中概括了英国当时所处的形势。他写道：

> 英国于19世纪90年代前期在达尔德斯坦引发的风暴与当时发生在帕米尔的危机有关。帕米尔危机就是英俄长期外交拉锯战在帕米尔问题上的最高表现。它随着俄—阿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商而产生……既然东部边界未定，俄国就有可能通过向帕米尔的扩张从侧翼包围阿富汗，并在阿富汗与中国领土之间插入自己的地盘，这一插入将会触及英属印度的边界，可以预见两股欧洲力量将会在达尔德斯坦形成直接对抗。英国对这一威胁所持的态度偶然在两个层面上显露出来：在对外方面，英国努力谋求共识，留给阿富汗一箭之地（瓦罕），使其与中国边境相邻，从而避免英属印度与俄控地区直接相连。在对内层面上，先发制人，先于俄国对达尔德斯坦施加有效控制。[60]

国家边界问题通过双方同意商定的边界“杜兰线”而于1893年得到妥善解决，但奇特拉尔问题因为王位继承之事仍然错综复杂。早先，英国成功地让尼扎莫尔·穆尔克登上王位，将谢尔·阿夫扎尔放逐到阿富汗。如今，谢尔·阿夫扎尔在阿富汗的支持下又卷土重来，并联合了乌姆拉·汗的力量。他顺利地赢得了奇特拉尔人民的支持，他们向来反对英国军队干涉自己的国家。阿米罗尔·穆尔克带领下的奇特拉尔军队归顺了谢尔·阿夫扎尔。阿米罗尔·穆尔克也表示了对乌姆拉·汗的支持。形势一度变得十分严峻。此地在1893年杜兰线协定之后实际落入了英国宗主国手中。英国从两方面调来大批军队：一方面从吉尔吉特横越吉泽尔、马斯图季，前往奇特拉尔；另一方面经由白沙瓦和马拉坎德，穿过迪尔，越过洛哈里山口前往奇特拉尔。同时，英国又拥立阿曼·乌尔·穆尔克的另一个儿子舒贾乌尔·穆尔克，尽管那里的人民反抗英国时没有任何外来力量的帮助，但他们使英国感

到了强大的压力。参与的各方都有他们各自的目的。雄心万丈的金杜尔首领乌姆拉·汗，娶了阿曼·乌尔·穆尔克的女儿为妻。他对奇特拉尔的王位志在必得，而且像他这样的强权人物，绝不会容忍受制于英国。谢尔·阿夫扎尔是阿曼·乌尔·穆尔克的弟弟，有阿富汗艾米尔的支持，甚至还赢得当地人民的支持。由于他反抗英国并下了最后通牒——让英国人离开奇特拉尔，因而成为英国最痛恨的人。阿米罗尔·穆尔克则杀了英国操纵下的统治者尼扎莫尔·穆尔克，因而与英国势如水火。对英国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以武力解决当地的叛乱，随后立一个傀儡为王。于是他们选中了阿曼·乌尔·穆尔克15岁的儿子舒贾乌尔·穆尔克。当他于1895年9月2日被扶上王位时，亚辛和马斯图季地区沦陷。直到1914年才收复了马斯图季。这是英国政府镇压了1895年起义后采取的行动。那里发生的另一大变化就是1895年马拉坎德特区的设立，以及奇特拉尔的管理权从吉尔吉特转移到马拉坎德。正是英国的这一行为在普什图人民心中留下了伤痕。同样，杜兰线也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这些导致了1897年遍布整个边境地区的浩大起义。但到后来，北部地区已逐渐安宁，英国的控制得到进一步加强。

M. E. 亚普将英国的意图概括如下：

> 英国想在达尔德斯坦树立影响的最理想的方式，就是通过克什米尔土邦的代理，暗中操纵，且费用较低。查谟与克什米尔的道格拉土邦成立于1840年，它一方面削弱了锡克力量，另一方面是为了易于向穆斯林聚集区注入印度教派的力量，以缓冲和稀释穆斯林力量。锡克势力于1849年被瓦解，边境的外患逐渐消除，查谟与克什米尔在英国的计划中成了一个多余的角色，于是英国也就任它自生自灭。而克什米尔的统治者继续实行着他们既定的程序，将势力扩展到达尔德斯坦，到1860年，已稳固地占领了吉尔吉特这一要地。于是英国的战略专家开始以一种新的战略眼光来看待这一进展，他们看到这是一个现成的据点，将有助于英国进入达尔德斯坦。[61]

道格拉人继续在吉尔吉特与挑起战争的锡克人作战，后来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吉拉斯。雷特奈尔博士看到，在1850年，“摩诃罗阇表示他是在英国政府指挥下采取行动的”。他的这一印象并非是毫无根据的，早在1847年，两位英国少尉万斯·阿格纽和拉尔夫·扬来到这里考察边境形势。雷特奈尔博士颇有深意地评论道：“万斯·阿格纽来到了杰尔特，它位于吉尔吉特边境，与纳格尔相对，他与当地人民结下友谊，而当地人起初认为他是带着军队来的。”雷特奈尔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便到后来，道格拉人在1852年被戈赫尔·阿曼的棍棒赶出了吉尔吉特，古拉伯·辛格仍孤注一掷，选择留守阿斯托尔和本吉，据1846年阿姆利则条约（见下文），它们位于印度河的这边。

英国不得不在此背景下行事，无论他们喜欢与否，他们想染指北部地区，就必须借助克什米尔领土，因为英国没有任何与北部地区相邻的属地。离它最近的英占区是阿博塔巴德县。这可以以我们此前提到的杜兰线为依据，于是他们为即将于1892年在吉拉斯设立政治代表处而倍感欣喜。这使他们离目标又近了一步。1895年后又故伎重演，将奇特拉尔移交给英国的马拉坎德政治代表处管辖。虽然吉尔吉特于1860年在戈赫尔·阿曼死后被道格拉人占领，但他们的统治直到1866年仍不稳固。正如雷特奈尔博士所记载，他当时已在吉尔吉特。正是在1860年，吉尔吉特和斯卡杜设立了瓦齐尔瓦扎拉特。弗雷德里克·德鲁详细记载了19世纪70年代的形势，他提到了克什米尔摩诃罗阇直至布尼亚尔的独立疆域以及奇特拉尔罗阇至亚辛的疆域。19世纪70年代，英国曾派间谍前去帕米尔和瓦罕，甚至派了约翰·毕达尔夫前往奇特拉尔执行特别的政治任务。这就有必要与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建立联系。当时奇特拉尔的执政者是那个世纪最强大的统治者阿曼·乌尔·穆尔克，他的统治期从1857年—1892年。他登位时，他的弟弟谢尔·阿夫扎尔逃离奇特拉尔，前往阿富汗寻求庇护。

奇特拉尔与巴达克山在中古时期的关系，可从上一章获知。上一章已揭示拉伊斯家族的统治者依赖于巴达克山统治者，而格多尔家族的统治者很强大且与巴达克山为敌。似乎当时英国对此段历史一无所知，因而，乔治·罗伯逊爵士在没有任何相关资料为据的情况下，随

意写道：

> 首先应该扼要地指出奇特拉尔与阿富汗的政治关系态势。很有可能奇特拉尔往昔曾附属于巴达克山这个小国。巴达克山位于兴都库什以北，刚独立不久，但仍在喀布尔的艾米尔控制之下。1874 年，阿曼·乌尔·穆尔克对他北方的邻居阿富汗人起了疑心，于是，他试探性地向艾米尔建议使奇特拉尔在名义上附属于喀布尔，并让阿富汗的王储与阿曼·乌尔·穆尔克的女儿联姻。艾米尔接受了婚约却并未实践。在此试探下，迈赫塔尔很快觉察到了阿富汗的企图，于是当阿富汗人于1876 年危及他的国家时，他前往克什米尔寻求保护。后来在印度政府的赞同下，两国缔结和约，条约主要是对奇特拉尔加以保护，而克什米尔除了被认可为迈赫塔尔的宗主外一无所获。[62]

以上叙述的前面部分无疑是不正确的。格多尔家族统治下的奇特拉尔并未从巴达克山独立。阿曼·乌尔·穆尔克的女儿是与乌姆拉·汗结亲的，而非与阿富汗的王储。1874 年，阿富汗并未对阿曼·乌尔·穆尔克造成任何威胁。正如我们前面所述，以蒙希·阿齐兹·乌丁和米尔扎·古拉姆·穆尔塔扎的记录为证，阿曼·乌尔·穆尔克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曾保持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友好关系。而当时的英国则急需在奇特拉尔扶植一位与他们关系友好的统治者。因而 M. E. 亚普写道："1878 年，克什米尔统治者被劝说接受奇特拉尔人提出的效忠的请求。"但这是"表示效忠的请求吗"？首先是约翰·毕达尔夫犯了错误，说阿曼·乌尔·穆尔克同意两国开辟睦邻友好关系。约翰·毕达尔夫写道："两位罗阇（奇特拉尔和亚辛）都将马、鹰和猎犬作为贡品敬呈给克什米尔摩诃罗阇，向他表示效忠。"[63]奇怪的是他忘了记录克什米尔回赠了什么。而 H. C. 汤姆森（H. C. Thomson）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写道："1878 年，阿曼·乌尔·穆尔克由于害怕阿富汗的艾米尔的侵犯，将奇特拉尔在名义上置于克什米尔摩诃罗阇的管辖之下，他的领

地直至亚辛。”[64] H. L. 内维尔（H. L. Nevill）上尉概括了当时的真实情形：[65]

> 英国政府与奇特拉尔政府的第一次磋商发生在1877年，毕达尔夫少校被派往那里以促进英国政府与迈赫塔尔的友好关系，并试图在该地区树立起英国政府的声威，以确保我们边境的安全。不过当时并没有具体的筹划。直至1885年，与俄国的战争看来已势在必行，我们又回到此地，政治协商再次开始。当时奇特拉尔的统治者是阿曼·乌尔·穆尔克，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凭自己的力量收复了周边的许多小国，巩固了他的统治，并以铁的手腕统治着那些国家，这是确保那些东部蛮族臣服的必要手段。当时的国务部长达弗林勋爵（Lord Dufferin）派洛克哈特（Lockhart）上校前去访问奇特拉尔。他记下了这个国家的相关情况，与阿曼·乌尔·穆尔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将这一切都做得恰如其分。

内维尔的叙述使问题浮出水面。然而，他没有谈到1877年的和约，但此和约确实存在，根据蒙希·阿齐兹·乌丁所记录的，我们可提供条约的一些条款，这在随后马斯图季的助理政治代表的职能中也可看出。米尔扎·古拉姆·穆尔塔扎也详细提供并谈到了有关克什米尔摩诃罗阇伸出友谊之手的情形。继对签订“友好协定”达成一致意见后，在特姆沙克（Thanshak）召开会议。萨达尔·甘加·辛格代表摩诃罗阇，尼扎莫尔·穆尔克王子和迈赫塔尔帕赫尔旺代表奇特拉尔出席了会议。对其中条款，双方达成了协议，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不得袭击吉尔吉特，而摩诃罗阇不得干涉瓦尔谢古姆（Warshegum）地区的事务。随后双方交换礼品，克什米尔摩诃罗阇呈上现金、衣料等，奇特拉尔王子呈上马和其他牲畜。据奇特拉尔史官记载，和约只字未提宗主关系。就表面来看，也无此必要。正是出于双方的利益，两国才就此修好。事实上，英国对两国修好的愿望更为迫切。因而他们不仅说服摩诃罗阇前去缔约，还派去了几名间谍监督。奇特拉尔的这一

局势直至1892年阿曼·乌尔·穆尔克死后才有所变动。而此时，那里的强势力量是英国而非摩诃罗阇。因而在1895年，奇特拉尔从吉尔吉特特区移交给新设的马拉坎德特区管辖。

罕萨和纳格尔的军事地位应该非常明晰。虽然纳格尔的王子与摩诃罗阇的关系很友好，但罕萨的米尔却一直占着摩诃罗阇的上风，直到19世纪70年代。直到1891年—1892年间，杜兰上尉带领几位青年军官前去，才制住了罕萨的米尔。罕萨的前统治者米尔萨夫达尔·阿里·汗出逃，立米尔纳齐姆为王。这一局势也是在英国的军事干预下得以实现的，而非摩诃罗阇。于是这些国家的事务全落入了英国政治代表的掌控之中。

至于部落地区，如戈尔（Gor）、吉拉斯、达丽罗和丹吉尔，当时的形势必须按照它们各自的历史背景来理解。既然戈尔是穆罕默德·汗和格里姆·汗的强大后盾，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们与摩诃罗阇关系较好。但吉拉斯总是制造麻烦，于是1852年在吉拉斯爆发了一场大战，吉拉斯堡也被炸成废墟，但没有对它采取任何接管措施。直到1891年—1892年最终占领之后，吉拉斯才归英国的助理政治代表管辖。达丽罗和丹吉尔部落总是与吉拉斯步调一致。1866年，道格拉军洗劫了达丽罗河谷，摧毁了许多村庄，但他们无法将它置于长期统治之下。1892年，达丽罗和丹吉尔人民再次起义，英国不得不再次调兵镇压。后来通过布尼亚尔总督控制了丹吉尔。但这些地区终究是吉拉斯助理政治代表管理下的部落。印度河科希斯坦仍像亚吉斯坦那样生活（加下横线部分在原著中为斜体——译者），不喜约束，独立自主。然而吉拉斯、丹吉尔和达丽罗地区必须象征性地缴纳年贡，这一情况我们下面还将谈到，作为接受摩诃罗阇管辖的象征，虽然这要借助英国的武力才能实现。因而英国一般将这些部落地区视为特别行政区，而非克什米尔占领区的一部分。政体以部落长老组成的吉尔加（Jirga）为基础，实行世袭制。而助理政治代表则努力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

宪政体制

这一时期，北部地区的宪政体制是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动而变动的。没有任何关于克什米尔和整个北部地区之间关系性质的固定的主张，一切都从中古时期沿袭而来。唯一与克什米尔的莫卧儿王朝有直接关系的地区就是巴尔蒂斯坦，它向莫卧儿君主纳贡这一关系仅在沙·贾汗和奥朗则布在位期间维持着。阿富汗再次攻占克什米尔后，就不得不用强力前去催缴贡赋。但到兰吉特·辛格时期，巴尔蒂斯坦人就拒缴贡赋，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结果锡克军队遭受损失，空手而归。只有古拉伯·辛格的将领佐尔阿弗尔·辛格于1840年代成功地涉入了当地争夺王位之战，进驻斯卡杜。他在那里新建了一座堡垒，设立了一个军事哨所，称它为塔纳，委任了一名塔纳达尔，并提供了军事装备。但管理权仍在当地罗阇手中。他必须支付驻扎在斯卡杜的当地军队的开支。《古拉伯传》(Gulabnama) 的作者写道：

> 现在，斯卡杜的罗阇逐渐明白了现实的态势，他派了他的大儿子穆罕默德·沙（关于他的事前面已经提到）去见瓦齐尔，要求谋个一官半职。于是，瓦齐尔放弃了攻城计划，封给穆罕默德·沙“瓦扎拉特”一职，并以贡献的名义从斯卡杜罗阇和其他国家首领那里搜刮了一笔钱。[67]

当时并没有从罗阇们手中抢占领土。他们仍然作为合法持有人守护着它。直到后来发生了变故，《印度皇家地名录：克什米尔和查谟》[68]一书中有沃尔特·劳伦斯（Walter Lawrence）爵士所写的文章，现摘录如下：

> 巴尔蒂斯坦近来已被拉达克的瓦齐尔瓦扎拉特掌握。它的本土代理人是斯卡杜和格尔吉尔的区长（Tahsildar)。现今

连区长也由一名英国军官管理。后来长期受苦受难的巴尔蒂人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前任罗阇们或甲布们继续对当地人民实行统治，并从一些所得中拨出一部分赐予每家每户。

以上皇家地名录中的记述并没有说明行政沿革的整个历史过程，赫希默杜拉·汗记下了这些变革。

1889年，在克什米尔及其他地方设立土邦议会时，吉尔吉特和拉达克处在同一个瓦扎拉特管理之下。三年后，吉尔吉特和拉达克才成立了各自的瓦扎拉特。巴尔蒂斯坦被分成两个区（Tehsil）：斯卡杜和格尔吉尔。此前，当道格拉人强行干涉巴尔蒂斯坦事务时，曾在斯卡杜设立了一位卡尔达尔（Kardar）[69]，监管整个巴尔蒂斯坦。在他之下，是驻守在格尔吉尔的塔纳达尔。之后，斯卡杜的卡尔达尔依次有：帕格万·达斯（Bhagwan Das）、戈萨翁（Gosaun）、格拉姆·辛格（Karam Singh）和贾瓦哈尔·辛格（Jawahar Singh）。在他们任职期间，主要的管理权仍在罗阇们手中。盖达罗（Kedaru）在萨姆瓦特纪元（Samvat）1909年—1920年（公元1851年—1863年）年间出任塔纳达尔。正是他开始干涉罗阇们的政务。对于他是如何征收年税的并无记载，但他的收入确实大大增长了，其中可能也有摩诃罗阇的一份。继他之后是瓦齐尔劳巴吉·基希德瓦里亚（Lobaji Kishtawariya）。1875年—1885年间在任的是玛哈塔·曼加里·基希德瓦里亚（Mahatta Mangal Kishtwariya）。此后有甘加·辛格、罗易·巴哈杜尔·潘迪特·拉塔·克里山·考尔（Rai Bahadur Pandit Radha Krishan Kaul）、拉拉·坦巴特·罗易（Lala Dhanpat Rai）、赛义德·古拉姆·吉拉尼·沙（Sayyid Ghulam Jilani Shah）。之后，卡尔达尔一职被废除，斯卡杜成为一个区，由一位区长管理。如前所述，与吉尔吉特属同一瓦扎拉特管辖之下。最后，当在拉达克设立了瓦扎拉特后，巴尔蒂斯坦又归拉达克的瓦扎拉特管辖。

对巴尔蒂斯坦地区权力的篡夺纯粹依靠军事占领，在佐尔阿弗尔·辛格的干涉下，道格拉人占了斯卡杜统治者的上风。但这与克什米尔的事务无关，因为它并不属于克什米尔锡克占领区的一部分。此

前我们已看到谢尔·辛格率领下的锡克军队大败而归，巴尔蒂斯坦仍不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只有佐尔阿弗尔·辛格对此地有所染指。他帮助了一位当地的统治者，并为他夺得斯卡杜的王权，接着他在斯卡杜设置了一位塔纳达尔，而当地罗阇继续管理他们的事务。

吉尔吉特地区的情况则不同。格里姆·汗罗阇下达了命令，先头部队也已抵达吉尔吉特，锡克人自己首先发难，这势必要与亚辛的统治者戈赫尔·阿曼逐鹿此地。这场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852年，戈赫尔·阿曼终于胜利地赶走了侵略军。1860年戈赫尔·阿曼死后，道格拉军队才重新占领吉尔吉特，并按他们的意愿扶持了一位罗阇。然而，他们在罕萨和纳格尔却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军。在这样的军事形势下，我们才有必要理解这宪政主张的意义何在。

这一图景的另一面是出售克什米尔的问题，此事随着锡克人在索布拉昂（Sobraon）的投降及英国于1846年2月20日进驻拉合尔而起，据丹格（Teng）的如实记录，锡克代表帕特（Bhatt）和考尔（Kaul）[70]“表示朝廷无力支付巨额赔款，因而代之以割让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几个省以及哈扎拉和杰姆巴（Chamba）诸县给英国。”1846年3月9日拉合尔协定的起草和签署正是为了兑现这一允诺。条约包括了以下内容：

> ……摩诃罗阇将位于比亚斯河与印度河之间山地国家的所有堡垒，领土、权力和利益，包括克什米尔诸省和哈扎拉，转让给光荣的公司（Honorable Company），给予其永久统治权，以抵消一千万卢比的赔款。

随此割让之后，又与古拉伯·辛格进行了一次单独交易。这项交易于1846年3月16日在阿姆利则达成。阿姆利则条约的第一条规定：

> 英国政府将所有的山地国家以及位于印度河以东及拉维河以西的属国转让给摩诃罗阇古拉伯·辛格及其男性继承人独立拥有，其中包括杰姆巴，但不包括拉胡尔（Lahol）。根

据 1846 年 3 月 9 日签订的拉合尔条约第四条规定，这部分领土已由拉合尔政府割让给了英国政府。

之后在库卢（Kulu）、曼迪（Mandi）、哈扎拉县和索吉特格尔（Suchetgrah）诸县，以及古达斯布尔（Gurdaspur）所做的一些调整与我们无关。重要的是这两份条约有相互重复的部分，两份条约中限定的领土关系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理解。两份条约提及的任何地方都与北部地区的吉尔吉特无关，它们位于印度河的北部。

这是第二份条约的条款二：

前条所定转让给摩诃罗阇古拉伯·辛格的地区的东部边界应由英国政府指派的代表团和摩诃罗阇古拉伯·辛格在此前提下分别拟定，并于调查后在一次独立的会议上决定。

万斯·阿格纽和拉尔夫·扬正是在此条款下于 1847 年前往北部地区的吗？弗雷德里克·德鲁谈到代表团中的这两位代表，但谁在代表团中代表摩诃罗阇？这一问题已在上文全面充分地作了讨论，并揭示了这些人并未组织边界事务委员会，也无法去界定疆域。其实，他们的巡访另有其军事目的。即使我们接受他们是为界定分界线而来这一说法，上述条款也只提到了东部边界，而与北部边界无关。这由首席部长 R.C. 卡克（R. C. Kak）《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关系的性质和吉尔吉特政治特区的管辖权和领土问题的纪要》（1939 年 3 月 10 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他在第六段中声明：

代表团的出现，并没有受到任何指派，它也从未进行过划界工作。事实上，从此协定条款的措辞来看，它是否旨在划定一个明确的边界还有待商榷。它是否就是土邦在印度河以东的分界线——它实际上应当是土邦的西界，还是被称为克什米尔—西藏边界的土邦的东界——是不清楚的。从条款术语的模糊性可推断，英国政府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要转

> 让的那些领土的范围和性质。英国政府在此时所作的唯一努力就是收集有关这一领土北部边境的情报。此地于 1847 年移交，当时他们派出了万斯·阿格纽少尉去吉尔吉特，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边境首领派使臣来见他。的确，万斯·阿格纽在与罕萨和纳格尔的罗阇们建立良好的往来关系方面很失败。对此，他非常苦恼。（I. O. R. R. /W　1086/299）

正是根据这些相关资料，雷特奈尔博士明确指出，在此条约下，吉尔吉特并没有交给摩诃罗阇。至于吉拉斯，《古拉伯传》的作者对它的评论甚为明确：

> 毗迄罗摩历 1907 年（公元 1850 年），当殿下雄壮的骑兵队正在克什米尔河谷时，达尔德部落的一伙吉拉斯人在克什米尔边界那边（加下横线部分在原著中为斜体——译者）的崇山峻岭间建起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即吉拉斯堡，他们栖身于这牢固的堡垒中，并开始掠夺哈苏拉（即阿斯托尔），这是殿下庇护的领土。

这一记录明确证明了吉拉斯在那时并不属于克什米尔。换言之，依据阿姆利则条约，吉拉斯、吉尔吉特、罕萨、纳格尔，以及其他所有北部地区并没有归于摩诃罗阇名下。如我们再严格推敲一下《古拉伯传》的用语，可知连阿斯托尔也只是一片“保护之下”的领土，而非克什米尔的实际领土。还可看到属于吉拉斯地区的吉拉斯镇和许多土地位于印度河之南，而全体科希斯坦人则居于印度河以东，虽然印度河也流经此地，但它们从来不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而是亚吉斯坦。这似乎有些奇怪，但这两个地区从未归属于锡克人。所以，如果从那时的历史背景出发来正确审视这一条约，就应将当年锡克人的领地限制在查谟和克什米尔，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何那些地区不属于克什米尔了。1846 年后占据任何一方领土都不应以条约条款为凭对其施加统治，其他地区，如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也不应包括在条约的范围之内，因

为它们与道格拉的关系是基于其他的历史事件之上的，这在上面已经述及。

1846年后，道格拉军对吉拉斯率先发起进攻，《古拉伯传》中记载道：

在毗迄罗摩历1908年（公元1851年）初，当殿下到达了克什米尔的美丽河谷时，他委任骁勇善战的迪万·哈里·金德会同其他名将，如瓦齐尔佐尔阿弗尔①、维杰·辛格（Vije Singh）上校、贾瓦哈尔上校、洛金·辛格（Lochan Singh）和迪万·塔古尔·达斯（Diwan Thakur Das）等率军前去教训那些不老实的叛军。[71]

继前面一些诋毁之辞后，作者又写道：

他们将上述堡垒焚为灰烬，夷为平地。然后，迪万得意地回朝，得到了殿下的褒奖。这地区的首领们，如道莱·汗（Daur-i-Khan）、拉赫玛杜拉（Rahmat-ullah）、阿卜杜拉·汗（Abdullah Khan）和阿洪·拉尔·穆罕默德（Akhon Lal Mohammad）等被军队抓获，于是他们臣服，献上贡赋、金银和羊只，并同意送他们的儿子和贵族来做人质，并答应缴纳贡赋。[72]

这片土地被占领，被征服的人们不得不交纳贡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这就能证明是克什米尔领土的一部分了吗？前面提到的杜兰所详细描述的1891年—1892年间发生的事件，已明确表明英国再次占领吉拉斯后，已将它转为助理政治代表管辖之下的政治管区（Political district），直到1947年。

其次就是吉尔吉特本身，戈赫尔·阿曼死后，它于1860年再次被

① 原文如此，疑为佐尔阿韦罗。——译者

占领。后来战争蔓延到布尼亚尔和亚辛。在布尼亚尔，摩诃罗阇任命伊萨·巴哈杜尔为当地的总督。但摩诃罗阇在亚辛任命的罗阇阿兹默德·沙不久被逐出，亚辛又归于奇特拉尔的统治者管辖之下，他起先在这里扶植了瓦利·米尔，后又转移到帕赫尔旺。在吉尔吉特，年幼的阿里·达特·汗，即已逝的穆罕默德·汗二世的亲戚被拥立为王。赫希默杜拉·汗曾指出尽管布尼亚尔早先曾属于伊萨·汗的先祖，但曾被戈赫尔·阿曼所占。而现在布尼亚尔再次作为一片领地归还给伊萨·汗以使之成为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之间的缓冲地带。[73] 直至后来，战争还是不断。赫希默杜拉·汗记录了亚辛统治者对吉尔吉特的几次侵犯，直到1866年，奇特拉尔和罕萨统治者和达尔德部落联合作战，历尽千辛万苦才将这一态势扭转，肃清了敌军，瓦解了联盟，并产生以下三个后果：进攻亚辛，掠夺达丽罗，以及摩诃罗阇的军队从罕萨溃败。当然，整个吉尔吉特还是被长期占领了。但据赫希默杜拉·汗记载，在这里设立的瓦扎拉特至1888年后才羽翼丰满。另一面，沙·拉伊斯·汗提到1860年后吉尔吉特瓦齐尔瓦扎拉特（Wazir-i-Wazarat）一职的继位状况，从最后一位瓦齐尔苏尔塔努（Sultano）——他是阿里·达特·汗的王国代理人（Naib-Saltanat）——算起：1860年，贾瓦哈尔·辛格（Jawahar Singh）作为瓦齐尔瓦扎拉特接替他的位置。1867年，巴赫希·拉塔·克里山（Bakhshi Radha Krishan）继任，直至1873年拉拉·甘加·辛格成为瓦齐尔瓦扎拉特，他之后是拉拉·罗摩·克里山（Lala Ram Krishan，公元1876年—1880年）。1880年—1882年间是拉拉·贝利·罗摩（Lala Beli Ram）。下一个,1882年—1887年间是巴赫希·穆尔·拉吉（Bakhshi Mul Raj）。1887年—1889年间是拉拉·丁·巴特（Lala Din Pat）。在他的任期内，英国代表机构已长期设立，吉尔吉特和拉达克的瓦齐尔瓦扎拉特被赋予全新的职能。直到英国代理机构建立，军事职能才完全由摩诃罗阇的军队行使，行政职能则由当地罗阇们行使，较少受摩诃罗阇官员的干涉。现今，军事权下放给英属印度政府控制的代理机构，通过驻克什米尔的英国特别代表（Resident）行使。行政和税收则由新设的瓦齐尔瓦扎拉特管理。这一历史性的叙述清楚表明了道格拉人对吉尔吉特的所有权是通过他们的

军事占领夺得的，而不是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根据阿姆利则条约的规定获得的。

1866年战争导致的第二个后果就是达丽罗地区的风波。雷特奈尔博士记录下了这最后的结局：

> 锡克军战死约120人，逃亡的村民如今回来开始重建家园。6个月后，杜杜戈德（Samegal，萨迈格尔）的格拉希米尔（Kalashmir）、普戈奇（Phugotsh）的杜兰（Duran）、格里诺戈特（Karinokot，即Manikial，马尼基亚尔）的苏里奥（Surio）、比利奥戈特（Biliokot，即马尼基亚尔）的布尔舒·西尔达尔（Burshu Sirdar[①]）、格亚尔（Gayal）的西尔达尔，以及舒罗特（Shurot）的努尔·穆罕默德（Nor Muhanmad）前往吉尔吉特向佐尔阿韦罗表示效忠。他答道："哦，格拉希米尔，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多麻烦，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现在我要你们整个达丽罗地区每两家每年贡一头牛。"随后，他赠与了荣誉袍，将他们打发走了。如今，这些村庄还是年年纳贡，我曾提到过这些村庄的名字，它们由各自的西尔达尔为代表前去纳贡。

然而，这一形势并非是最终的。1891年—1892年，整个印度河河谷的部落地区又起风波，杜兰对此有过描述，我们此前也提到过。杜兰写道：

> 科希斯坦人从印度河河谷大量召集军队，并联合达丽罗、丹吉尔和吉拉斯之力准备进攻吉拉斯以及10英里之外的哨所。[74]

这一风波再次被吉尔吉特的英国官兵平息，部落地区被置于英国

① 此处及下文之Sirdar，当是指当地的头人或首领，亦可能是Sardar（萨达尔）之另一拼法。——译者

政治代表处的政治控制之下。就罕萨和纳格尔来说，他们从未败在摩诃罗阇手中。仅在1891年—1892年间，如前所述，杜兰上尉指挥他那次著名的战役才险胜一步，将米尔萨夫达尔·阿里·汗驱逐出罕萨，改立言听计从的米尔纳齐姆·阿里·汗，并允许纳格尔的老罗阇扎法尔继续在位，又是英国率先将两位向他们示好的王子扶上了罕萨和纳格尔的王位。正是因为英国的这一举措，罕萨和纳格尔被视为英国势力范围内的政治特区。奇特拉尔的问题在前节中已详细探讨过，并已揭示了它与克什米尔的联合协定的签订过程，但后来在1895年，新登位的舒贾乌尔·穆尔克在英国的扶持下上台，于是奇特拉尔也被移交给马拉坎德特区管辖。

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虽然克什米尔在阿姆利则条约下出卖给了古拉伯·辛格，但这一条约与北部地区毫无瓜葛。北部地区与克什米尔的关系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历史基础上的。巴尔蒂斯坦是首片被古拉伯·辛格的将军佐尔阿弗尔·辛格占领的土地，那里的罗阇们起先向摩诃罗阇缴纳年贡，后来此地才归入吉尔吉特和拉达克新设的瓦扎拉特的管辖之下。阿斯托尔起先向锡克人缴纳年贡，后来又缴给古拉伯·辛格，直至归入吉尔吉特的瓦扎拉特统一管辖。吉尔吉特被锡克军占领，但战争仍继续了一段时间，到1860年才最后被占领。此后，就在吉尔吉特设立了瓦齐尔瓦扎拉特。但当1888年—1889年英国政治代表处在此建立后，又起了变化。吉拉斯于1852年被占领，达丽罗于1866年被占领，随之开始向当地人民征收贡赋，而这些领土最终于1891年—1892年被纳入英国代表处的政治控制之下。就在这一年，罕萨和纳格尔也被英国所占，但由于它们原先独立于摩诃罗阇的统治，故而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身份。而布尼亚尔则附属于摩诃罗阇，其统治者也是由摩诃罗阇任命的。奇特拉尔则与摩诃罗阇关系友好。摩诃罗阇还控制着马斯图季的胡什瓦格特家族的领地以及吉泽尔和亚辛。1895年英国发动奇特拉尔战役后，奇特拉尔统治者也受庇于英国。胡什瓦格特家族的领地起初是独立于奇特拉尔的，但1914年后被归还给奇特拉尔的统治者舒贾乌尔·穆尔克，而他则受控于马拉坎德的政治代表。

这段历史的重构是基于客观事实之上的，相关资料都有案可查。但对19世纪的英国来说，是无法得到这些资料的，因而很多评述是基于主观臆断之上的。以A. G. 杜兰的一封信为例（No. 867/217，1891年7月22日），他是吉尔吉特的英国政治代表，致函给英国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

> 在那本书（毕达尔夫少校的著作）的第29页，提到罕萨曾向吉尔吉特的塔拉汗·拉斯（Trakhane Ras①）表示名义上的效忠，而塔拉汗·拉斯（第20页）的统治从14世纪就已开始，并一直持续到锡克人占领时期。从那时起，我认为，罕萨起先是于1842年起向锡克人缴纳贡赋的，然后当吉尔吉特落入摩诃罗阇之手时，又于1846年起向道格拉人缴纳贡赋。[75]

上述观点与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的罕萨和纳格尔历史相左。当然罕萨和纳格尔的政府是吉尔吉特政府的衍生物，但他们从未向吉尔吉特缴纳贡赋，也未归属于它。事实上，从前是纳格尔的国君们统治着吉尔吉特。他们从未向锡克人或道格拉人表示过效忠。弗雷德里克·德鲁写道：

> 罕萨和纳格尔是两个独立的罗阇制国家，彼此相对，坐落于吉尔吉特河的支流旁，河流悄悄流过堡下，纳格尔想与吉尔吉特的道格拉人缔结友好关系，而罕萨则与他们针锋相对。[76]

在另一处，他又写道：

> 纳格尔位于罕萨—纳格尔河左岸，罕萨则与它相对位于

① 原文如此。当为塔拉汗·拉伊斯（Trakhane Rais）。——译者

右岸。大约从1867年起，纳格尔就向摩诃罗阇缴纳少量贡赋，而摩诃罗阇则回赠以价值更高的礼物，因而这一交往性质只能视为馈赠，是双方渴望修好的象征。

军萨较之纳格尔更为好战，如上章所述，它对摩诃罗阇充满敌意，总是与他处于一种不太友好的关系之中。1870年，军萨罗阇派一名使者去斯利那加，以期与摩诃罗阇修好，使者受到摩诃罗阇的热情款待。我不知后来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在我看来似乎双方开始友好往来了。[77]

弗雷德里克·德鲁的版本与杜兰的完全不同。杜兰的目的是与这些国家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他的态度在他前一封颇具官方口吻的信中已表露无遗：

我们正在品尝50年来吉尔吉特的锡克和道格拉统治者对罕萨和纳格尔统治的软弱无能所带来的苦果，这一苦果表现为他们和他们的军队在罕萨和纳格尔面前节节败退以及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这些条约带来的暂时的和平是以克什米尔所受的耻辱为代价的，但却只换回它们名义上的效忠，罕萨和纳格尔的首领还未意识到如今的吉尔吉特已不同以往了，它已在他人的掌握之中。一个全新的时期来到了，现在该是他们履行诺言的时候了。

从信中可知，杜兰正准备进攻罕萨和纳格尔，之后不久他就采取了行动。因而他无视早先这两国政府的地位曾略优于吉尔吉特的道格拉政府这一事实，而宣称他们是“名义上的效忠”。弗雷德里克·德鲁则将这描述为“友好关系”并说双方“互赠礼物”。

英国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W.F.普里多（W.F. Prideaux）上校在1892年8月12日写给印度外交大臣的信（No. 2370）中也支持杜兰的观点并复述杜兰对那段历史的叙述，在结尾，他还加述道：

> 根据阿姆利则条约第九条，英国政府理应帮助摩诃罗阇以保证他的领土不受外来侵犯。值得争议的是罕萨和纳格尔并非是外来敌人，而是克什米尔的藩国（加下横线部分在原著中为斜体——译者），但在我看来，据上述条约第四条的规定：没有英国政府的准许，摩诃罗阇的国界不得单方面随意变更。因此，罕萨和纳格尔这两个充满敌意的国家应该被视为外部敌人，除非英国政府同意将他们归入克什米尔领土。他们是克什米尔的纳贡地区，但我认为他们的情形与印度的本土政府并不相似，后者是英国政府的下级联盟，通常被认为是臣国。据德鲁的描述，双方互换贡品和礼物毋庸置疑是一种互相表示友好的象征。在我看来，这与罕萨和中国的关系性质有所相似，是否应该以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不敢妄加断言，只是认为明确我们在中亚的政治地位是当务之急，也是我们行动的基础，这比研究那些封建主联盟的虚幻声明要明智得多，那些声明也许是代表克什米尔的利益而提出的。我们认为英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应该依靠兴都库什建立，这一观点也许能通过中国的事例得到认同。

在信中，普里多注意到了弗雷德里克·德鲁的叙述，但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藩国”（feudatory）。同时他又不接受罕萨和纳格尔是克什米尔的藩国这一观点，而是竭力将他们归为“外部敌人”。这种封建关系的形成必定是从道格拉人开始的，他们战败后，就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于是当双方互赠礼物时，他们受“这些国家以前是附属于吉尔吉特罗阇的”这一个错误观点的误导，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些国家归附了他们。其实，这一归附直到罕萨和纳格尔在军事上遭受挫败后才名副其实，即杜兰在英国代表处建立后于1891年—1892年进行远征之前，那些国家并未归附克什米尔。

这一转变在英国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D.W.巴尔（D.W.Barr）致吉尔吉特英国政治代表的信中有记载，信件编号为D.O. letter No.2348，1894.7.20/23。[78]他写道：

> 双方处于独立自主的平等地位，一方朝廷向另一方代表赠送荣誉袍和表示友好。以前，罕萨和纳格尔的代表（Vakil）代表他们的主公前往斯利那加进行友好访问时，被待为上宾。如今，却以使者的身份前来克什米尔上贡。他们带来的黄金是贡品而不再是馈赠，在这一新型关系下，我认为有必要只给予符合他们现在身份的回礼。我认为继续给他们从前的那些回赠是不合理的……格登（Gurdon）先生看来并未意识到形势的转变，如果您能向他解释一下，我将感激不尽。因为我认为有必要让罕萨和纳格尔的米尔准确无误地知道派使者去斯利那加的目的是进贡，而非接受荣誉袍。

此信是对罕萨的助理政治代表 B. E. M. 格登 1894 年 6 月 13 日函的回复。它明确揭示了 1891 年—1892 年英国取得胜利后的这一重大转变。将罕萨和纳格尔作为克什米尔的纳贡地，进而使它们成为藩国，这正是英国的意图。1891 年—1894 年间的短短几年内，变化是如此之大，这全是英国的意图和英国的利益使然。摩诃罗阇只是他们操纵下的傀儡。

吉尔吉特英国政治代表处的建立

吉尔吉特代表处的设立与“俄国威胁论”在中亚地区的现实化有直接关联。克里米亚战役之后的 20 年内，俄国向东开拓了 600 英里，奇姆肯特（Chimkent）于 1864 年被占领，塔什干于 1865 年被占，忽毡（Khojand）于 1866 年被占，亚尼库尔干（Yani Kurgan）于 1867 年被占，布哈拉（Bukhara）可汗统治的地方于 1868 年被置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撒马尔罕（Samrkand）1868 年被占，俄国人于 1873 年进入希瓦（Khiva）地区。至此，俄国的铁蹄已逼近印度的大门。这迫使英国政府在 1873 年与俄国政府就“关于划分英俄亚洲诸帝国的中间地带”的问题进行磋商，以期达成共识。同时，英属印度政府于 1873 年

派道格拉斯·福赛思（Douglas Forsythe）再次搜集关于奇特拉尔和亚辛间的路线，以及乌浒河河谷的情报。正是在执行这次任务时记录下了一些真实情报，于是福赛思声称：

> 我将在吉尔吉特安置一名代表，他应该具备获取这些国家真实情报的能力。对我们来说，这些国家现在还是一本未开封的书，该代表应学会与瓦罕进行交流。[79]

然而，英属印度政府并不准备直接吞并部落地区（见上文），这些部落地区是通往瓦罕的要道。于是另一招就是赋予克什米尔摩诃罗阇权力，让他跨越边境，控制这些地区的统治者。摩诃罗阇接受了这一建议，但这一接受是有条件的，“只要英国政府认为有必要，他们就可以在吉尔吉特或摩诃罗阇的其他领土上全年派驻官员和军队。”[80] 为达到这一目的，吉尔吉特代表处于1877年成立，约翰·毕达尔夫上尉被派驻吉尔吉特，担负特殊的职责。关于他的职责，以下章程规定：

> 你所要担负的特殊职责就是，你必须在殿下和他的官员许可的范围内尽你所能去为英国政府搜集有关邻国即克什米尔的边境地区的最新、最真实的情报，并提交一份报告，记录相关领地的面积及其他相关情况。你要尽量与边境集团建立良好关系，多向那些国家的官员请教，以至将他们逐渐归入克什来尔政府的宗主权控制之下。但你切不可卷入政府内部事务以及有关摩诃罗阇殿下的领土管辖权限的纠纷中。……一旦觉察到邻国有任何敌意，就有必要让政府军队进驻边境，你有权随军并给予他们帮助和指导，用你的战略眼光和作战经验指挥军队。[81]

此前，我们已讨论了毕达尔夫上尉是如何成功地掌握了奇特拉尔的事务并促成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签订和约的。他成果赫赫，但另一方面，摩诃罗阇在这些领土实行的行政管制却引

起当地人民的怨愤。M. L. 格布尔[82]详细论述了亚辛首领的不满情绪，罕萨的米尔挑起了争端，越过恰伯罗特联合亚辛、吉拉斯、达丽罗攻打吉尔吉特——这些事件前面已有描述。据格布尔的论述，正是这些事件打破了“英国想通过克什米尔控制部落地区的企图……印度政府曾希望与部落人民建立良好的关系，但结果却是与之更加疏远。”[83]格布尔的叙述是基于当时驻克什米尔特派员 F. 亨维伊（F. Henvey）的记录之上的。其记录如下：

> 这似乎……毫无疑问，在如今这持续反复骚乱的形势下，吉尔吉特这个遥远孤岛上的形势可能会在某个不幸的时刻呈现出灾难性的局面。英国政府在这一地方连起码的安全都无法得到保证，他们冲刺边境地区的开拓大业不可能在毫无直接危险的环境下进行。简而言之，吉尔吉特英国代表处的维持要以困厄和危险为代价，这与我们以前预期从那里得到的利益不成比例。在此种情形下维持这一机构，既无法为帝国政府带来利益，也无法为摩诃罗阇提供便利。

事实上，吉尔吉特代表处所谓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格布尔特别指出是毕达尔夫和亨维伊不能胜任他们在奇特拉尔的工作，完全是多余的。他们发现英国官员就他们当时的实力而言无法帮摩诃罗阇在部落地区建立声威。于是英国决定暂时撤回官员，后来又设置一个不同类型的代表处。于是毕达尔夫上尉于 1881 撤回。这一观点在里彭勋爵 1881 年 6 月 18 日的信中再次得到确证：

> 在那片地区，充斥着各种随政治形势变化而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待调解，为了两国政府的共同利益，阁下在这些问题上应完全采纳我的意见。我已派我的心腹军官亨维伊先生趁阁下在斯利那加之机前来，将所有问题呈上，以便能与阁下和总理大臣进行自由探讨，最终在双方满意的基础上决定采取何种必要的部署（加下横线部分在原著中为斜体——

译者）。

此信暗示了将会有新的部署，由亨维伊亲自参与商谈，此人的能力是副王完全信任的。新的部署与英国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的使命有关。北部地区的事务是如何影响这一部署的，这在以下外交部的 P. D. 亨德森（P. D. Henderson）的评论中表示得十分明显：

> 我们打消了在摩诃罗阇宫廷中委派一名英国代表（政治上的）的念头，已设法鼓励他维系住与那些不利于他的统治地位的跨边境政府的关系。如果在克什米尔设一位特别代表，摩诃罗阇的附属地位就会立刻明显起来，于是那些邻国会认为不值得花费精力与摩诃罗阇打交道。[84]

摩诃罗阇兰比尔·辛格于1885 年 8 月 12 日逝世之后，英国就开始根据既定的步骤实践这一部署。克什米尔行政管理上的一些沿革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据我们所见，新的部署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建吉尔吉特代表处，[85]直接原因有以下几点：

1885 年，印度政府收到情报说，两年前，“奇特拉尔的俄国人一直劝阿曼·乌尔·穆尔克（奇特拉尔的统治者）将卢德科（Ludkho）河谷出租或出售，但未有结果，如今他们却对出租一事前景看好，主动协商以每年 200 万之价出租达尔科特河谷。”局势是如何扭转的呢，杜兰对此解释道：

> 政府不可能无视这一危险。在 1886 年，洛克哈特上校已提出了一个方案，意在保卫我们边境重地的安全，但他的计划似乎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巨额开支，而我年前提出的方案则将开支缩减至一个更适宜的规模之内，以充分利用新编制的克什米尔皇家军队为基础。政府宣扬的目标，就我们所见，是监视和控制兴都库什南部的国家，以及组织一支能够在危急关头以小股部队穿越山口制止任何叛乱的军队。形势看来

很乐观。迈赫塔尔统治着整个奇特拉尔，他曾热情地接待我们的官员，他的儿子曾去过印度，对我们的实力有所了解。我们在那里建立代表处也有一段时间了。至于罕萨和纳格尔的首领们，一位俄国官员不久前访问了他们的国家，他们也刚在起兵反抗克什米尔，现在却一致要求英国代表前去视察巡访。最后，克什米尔的局势有了巨大的变化，军队正在重组，不久就会成为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团结之师。简而言之，尽管处于利顿勋爵的管辖权之下，尽管在吉尔吉特建立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代表处的尝试失败了，但仍存在许多有利因素使未来的成功并非遥遥无期。[86]

A. 杜兰于1889年4月被任命为英国代表。我们在上文已描述了他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他掌握下的各个地区。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杜兰负责与邻国的外交关系。摩诃罗阇的行政管理权逐渐被削弱，而代其行使管理权的是英国代表处，向英国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负责。到1901年，代表处全权掌握了诸政治管区（Political District）的行政管理权，英属印度政府还“针对罕萨和纳格尔提出了一项裁决，此两国尽管处于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宗主统治下，但不属于摩诃罗阇的领土”，这一裁决即时生效。根据这一裁决，克什米尔官员未经政治代表同意不得进入这些领区。1928年，形势正如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致印度调查局边境处处长的信所描述的：[87]

吉尔吉特代表处管理下的领土分三类：

（1）克什米尔土邦领地，即吉尔吉特瓦扎拉特，包括吉尔吉特区（包括本吉）及阿斯托尔的尼亚巴特（Niabat）。

（2）政治管区（Political Districats），即罕萨、纳格尔、布尼亚尔、亚辛、戈赫—吉泽尔、伊希戈曼和吉拉斯共和国。

（3）未管辖地区，即达丽罗、丹吉尔、甘迪亚（killi，基利）、贾尔戈德、沙津、夏迪亚尔和哈尔班。

这一格局后来也未改变，在1938年12月29日的一份记录中，对上述三类领土的性质明确阐释为：

> 可以看到，大家观念中的政治管辖区域罕萨、纳格尔、吉拉斯、戈赫—吉泽尔、伊希戈曼和亚辛尽管处于克什米尔的宗主控制下，但从未被认可为克什米尔领土的一部分。根据印度政府法案311（1）条之规定，罕萨和纳格尔应为印度土邦，而吉拉斯，戈赫—吉泽尔、伊希戈曼和亚辛（假定）应为“部落地区”。有人努力用特别代表官邸的记录来验明这些陈述。遗憾的是没有现成的特别资料可以支持这一观点。根据以前的文件，由于克什米尔政府在管制边境地区以确保其和平方面的无能所引发的骚乱，被视为印度帝国边防的巨大威胁，于是帝国政府决定出手干涉，建立了一处代表处，经过几番努力后，边境人民终于不再负隅顽抗，他们在那些被描述为“英国法律的保证”的允诺下，接受了克什米尔的宗主统治（加下横线部分在原著中为斜体——译者），成为帝国的属地。[88]

代表处建立后，行政区划被分为两部分：

> 第一，是摩诃罗阇统治下的吉尔吉特瓦扎拉特，辖地南至阿斯托尔和布尔济尔以北的地区，沿着阿斯托尔河直至与印度河汇合处，然后往北沿着印度河到本吉……现在，瓦扎拉特包括大片印度河右岸的赫拉毛希（Haramaush）地区。北至靠近罕萨公路的古奇山嘴（Guch Pari），远至达丽罗南面的帕尔迪（Bhaldi）山区的卡尔加河（Kargah nullah）。[89]

其次，该地名词典中还记述道：

> 一位英国政治代表驻守吉尔吉特，他对克什米尔土邦的

瓦齐尔进行某种程度的监督，并直接对印度政府负责，管理边远地区或罕萨地区的一些小邦——纳格尔、伊希戈曼、亚辛和吉泽尔，以及吉拉斯的小共和国，也与丹吉尔和达丽罗保持联系，监督那些布尼亚尔罗阇和亚辛的迈赫塔尔已特别声明占有的那些河谷。这些土邦认可了克什米尔的宗主统治，但并不是属于它的领土。他们上缴年贡给国库——罕萨和纳格尔致送金子，吉拉斯是现金（2628卢比），伊希戈曼、亚辛和吉泽尔送谷物、羊和酥油。[90]

第三个行政区是巴尔蒂斯坦。该地名词典中记载说：

巴尔蒂斯坦近来已置于拉达克的瓦齐尔瓦扎拉特管辖之下，当地代理人是斯卡杜和格尔吉尔的区长（Tahsildar），两处的区长近来（1887年）都由一位英国官员任命……前罗阇或甲布仍然继续他们的统治，从征收所得中留存固定的一部分给予每家每户。[91]

政治管辖区的年贡

政府报告[92]的开头就断言“纳贡并非是摩诃罗阇对进贡国所有权关系的证明，而只是一种岁贡。”交纳的贡赋有——

1. 罕萨：16托拉（Tola）5马沙①（Masha）黄金；
2. 纳格尔：17托拉1马沙黄金；
3. 达丽罗：4托拉2马沙黄金；
4. 戈尔（Gor）：四分之三托拉黄金和14只羊；
5. 托尔（Thor）：12只羊。[93]

来自达丽罗的贡赋总值为87/2卢比②。

① 金衡，1马沙合972毫克。——译者

② 旧制1卢比合16安那，此处当指87卢比2安那。下同。——译者

就罕萨而言，报告[94]中指出“它是中国和克什米尔的双重纳贡国。两国都视它为自己的附属国。中国声称罕萨自乾隆皇帝时期就前来纳贡，而罕萨向克什米尔称臣是以罕萨罗阇沙·迦曾弗尔去世前于1864年签署的和约为标志。”罕萨的附属国身份纯粹是名义上的，从中国这方来看，中国统治机构视罕萨为新疆的边远地区，并打算将它归入该省，但未实行。罕萨方的情况可见第一章。罕萨在1898年向中国缴纳的年贡是15米斯卡尔（Miskal）金币，合120卢比。在阿古柏伯克（Yakub Beg）占有新疆前，年贡是25米斯卡尔金币。而中国的岁礼则如下：

两匹上等丝绸，约值300卢比；

4匹普通丝绸，价值200卢比；

做10件丝绸长袍（Choga）的材料，价值80卢比；

8只中国杯子，价值10卢比；

1锭银元宝，价值160卢比；

10块砖茶，价值200卢比；

200块棉布，价值200卢比；

合计：1150卢比。①

除上述物品外，还有一些礼物赠予前来喀什噶尔进贡的罕萨纳贡使臣。正如第一章中提到的，中国政府承认罕萨米尔拥有对叶尔羌的封地（Jagir）的所有权，中国政府每年从克尔克孜和塔克敦巴希帕米尔的其他地区，包括红其拉甫和俄普朗地区征收的税赋中提出一份给罕萨，以此表示对罕萨在这些地区的权利的认可。至于热斯喀木，中国特别声明罕萨可对其行使权利并允许罕萨再次占领它。

对克什米尔来说，罕萨的属国身份也纯粹是名义上的，既然克什米尔政府没有实力制服他们所谓的这一“属国”。直到1891年的战争之后，罕萨对克什米尔的附属关系才在武力压制下真正确立，下列以摩诃罗阇的名义致1892年就位的罕萨米尔穆罕默德·纳齐姆·汗的授权书中将这一关系正式确定下来。有关就位一事有记载如下：[95]

---

① 原文为1070卢比，显系计算有误。——译者

罕萨，为了从属国地位中得到尽可能多的利益，长久以来一直对我们1892年的进驻表示认可，但它顷刻间又转向中国称臣，声称是我们侵犯了他们的领土。于是引发了中英外交大臣的争议，中国正式宣布罕萨为属国，每年纳贡1 ½ 03盎司砂金[1]。罕萨流亡首领萨夫达尔·阿里逃至叶尔羌后，中国强烈要求有行政委任权来指定继位人。由于两国指定继承人恰好相同，即穆罕默德·纳齐姆·汗，矛盾得以避免。为了避免再次冒犯中国，罕萨邀请中国代表出席他们的登基大典，但从中国政府传达的官方指令来看，中国意在主持而非仅仅出席大典，所以他们自始至终反对自己只是充当“视察者”的角色。

以摩诃罗阇的名义拟定的授权书摘要如下：

现在，在议会的一致同意和授权下，我委任你，穆罕默德·纳齐姆·汗为罕萨土邦的罗阇……

年贡数为25蒂洛（Tilloo）黄金，相当于16托拉5马沙，由你及你的继承者支付给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进一步指明的是，这份授权书授予你们的权利的有效期将视你和你的继承者们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指派的命令的执行情况而定，如罕萨与加入其中的部落地区关系的处理，国家的管理，对偷盗的防范，等等……

只要你忠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英国政府，并遵守授权书的规定，你和你的后代将享有利益，得到庇护。

纳格尔的情况

纳格尔的情形与罕萨大不相同，它从未向中国宣誓效忠。它与吉

① 据中国史籍，罕萨所贡砂金为每年1.5两。——译者

尔吉特的塔拉汗统治者的关系在前章已经谈到，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纳格尔人从未承认吉尔吉特罗阇是他们的“封建主”，这同 R. C. 卡克在他的记录中所述的一样。[96] 18、19 世纪的事实恰恰相反，当时是纳格尔的君王统治着吉尔吉特。因此，根本不存在其忠诚从吉尔吉特罗阇转向锡克人，而后又转向道格拉人的问题。正是基于一个不同寻常的条约，他们与道格拉人的关系开始明朗化，从 1870 年起，他们才开始向克什米尔进贡，送上 20 托拉黄金和两篮杏子，作为年金的回报。

条约的内容由罗阇扎法尔（Zafar，罗阇贾法尔·汗之子）和纳格尔的其他人拟定，时间大约在萨姆瓦特纪元的 1927 年（公元 1870 年），其内容如下：

1. 我们将与罕萨罗阇迦曾·汗协商，让他的儿子像他的瓦齐尔的儿子一样侍奉克什米尔摩诃罗阇，如果他不同意，我们将出兵攻打他。

2. 如有罕萨的首领（Motabir①）前来欺诈，我们将处决他。

3. 我们将要求迦曾·汗交出恰伯罗特、诺默尔等地，如果他同意，则相安无事，否则，我们将进军，用武力制服他们。

4. 我们四人——沙·穆拉德、穆罕默德·沙、米尔扎和纳德罗（Nadlu）将轮流在吉尔吉特守护。

5. 殿下和其他人员在吉尔吉特和纳格尔之间的往来将一如既往，如有任何纷争，将由我们负责。

6. （罗阇的）一位王储和瓦齐尔的一个儿子将继续为殿下效劳。

7. 假如克什米尔摩诃罗阇殿下需要兵力，我们将毫不迟疑地提供装备良好的兵力。

8. 殿下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殿下的敌人就是我们的

① 波斯语/乌尔都语词，原意为受尊敬的。——译者

敌人。

9. 作为授予贾法尔·汗荣誉袍的回报，每年将奉上以下贡物（Nazrara）：马2匹，黄金21蒂洛，杏5担。

上述物品作为贡品（Nazar），这一做法将永远有效。[97]

由于达丽罗总是拖欠年贡，摩诃罗阇于1866年派了一支先遣队对他们进行惩罚性袭击。人们没有抵抗而是逃往山中藏身，并未顺从。但从那以后，达丽罗就象征性地交纳一些金币给摩诃罗阇。[98]这在政治代表的信中有进一步记载："达丽罗的年贡一直交给政治代表并储存在国库，瓦齐尔获悉一个事实……它的总值仅87卢比12安那……"后来在1915年，勇猛的罗阇巴赫东·瓦利（Pakhtun Wali）成为丹吉尔和达丽罗的强人，他的领土包括印度河左岸的哈尔班、沙津、夏迪亚尔。1914年9月，他前去收缴哈尔班人拒交的税赋。由于害怕这位罗阇的暴力，他们向沙津、夏迪亚尔和贾尔戈特寻求帮助。最新资料证明，下印度河所有清真寺的毛拉一直倡议讨伐异教徒，鼓励人们起来战斗。[99]

有关戈尔（Gor）的贡赋情况如下：

戈尔人交纳贡赋的起源已无迹可寻，但有案可查的是在1892年，戈尔的头人接到一纸声明，由吉尔吉特总督和英国代表以摩诃罗阇的名义签署，声明书特别允诺除了年贡外，他们不需再缴其他税赋。分摊给戈尔的年贡是四分之三托拉黄金和14头羊。每年上交给土邦财政部。直至1935年行政区划变更后，又上缴给中央政府。[100]

1894年12月13日声明的部分内容如下：[101]

为了强调1892年11月3日英国代表C. B. 杜兰上校和吉尔吉特瓦齐尔瓦扎拉特以查谟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殿下的名义向戈尔人民颁布的声明，并考虑到旧声明中有许多不明确

之处，此次颁布一道新的声明，对戈尔地区的年税事宜加以确定。考虑其一直向摩诃罗阇殿下的官员和军队开放，给予在戈尔巡察的英国官员以协助，并一直遵守来自吉尔吉特的一切指令，故戈尔人民除规定的年贡外无须缴纳其他贡物，免除一切税收、粮赋、草料。特此声明不向他们征发任何无偿劳役（Karebegar）。只要戈尔人民衷心为克什米尔摩诃罗阇殿下效劳，此允诺将长期有效。

至于吉拉斯的年贡事宜，1904 年 3 月 22 日的官方文件中有记载。吉拉斯的领土包括从罗摩卡特（Ramghat）到托尔（Thor）的印度河河谷区域，即吉奇（Gichi）、布多加赫（Butogah）和凯纳尔加赫（Khinnargah）诸河谷的土地和人民。根据文件：

吉拉斯的土地是吉拉斯人民自己的财产。土地所有人各自拥有他们的地盘，在每个村庄也有专门的 Shamilat 或公有地。这些公共土地发放给佃农。佃农分为两种：（a）古贾尔人和其他外来人员，如从下印度河来的人；（b）拥有自己土地的吉拉斯人以佃农身份在公有土地上耕种者。那些外来的佃农没有土地，他们租的地往往聚在一处，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村庄和社区，坐落在峡谷之巅。此类村庄有如下几个：

布纳尔（Bunar）的巴赫劳依（Pahloi），凯纳尔加赫的达西（Dasi），布多加赫的加拉（Galla），布多加赫的杰戈尔（Chakor），霍杜尔（Hodur）的丹格巴利（Dangpari），塔格（Thak）的格亚尼亚特（Kya Niat）。[102]

以下几个村庄的 Shamilat 即公共土地由吉拉斯佃农耕种。吉尼（Gini）和丹格（Dang）本就属于吉拉斯人；塔格（Thak）的辛戈尔（Singol）部分属于塔格，部分属于吉拉斯人；巴夏（Basha）、达劳依（Daloi）、梯赫（Thih），古夏尔（Gushar）和尼阿特（Niat）部分属塔格，部分属耕种人。塔格峡谷谷顶的巴布萨尔起先也属于塔格村的

Shamilat，直到迪尤（Dew）将其划分为一个独立的社区。迪尤进行了首次粗略的人口普查，确定了每一个他认为可能有人居住的峡谷的人口数。麦克弗森（Macpherson）根据迪尤的数据制出了图表。[103]

罗伯逊（G. S. Robertson）在致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的信中描述了吉拉斯地区1892年的政治形势：[104]

> 一个如吉拉斯般独立的希纳人国家（Shinaki state）根本没有政府管理各项事务，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中央权力机关。“贾希迪尔”（Jashtir）是部落的首领，受到大家的尊敬，但他们没有任何实权……如今的吉拉斯人是那些从远古时期起便栖息于此地的人们的后裔，现此地外来移民的数量已超过他们。这些人大多是从其他部落流亡而来的。他们被迫离开印度河下游人满为患的村庄，并期望寻找新的牧场放牧，最后成为古贾尔人。
>
> 那里没有任何中央权力机构，除了杂居人群中以情感为纽带组成的小社区，对吉尔吉特政权的敌视或多或少也是此中情感纽带之一。共同的信仰、对宗教信条的狂热和好斗也是维系他们的纽带……

在1892年9月26日的电报中，他还说道：

> 卡甘（Kagan）的领主（Jagirdar）艾哈默德·阿里·沙派两位“赛义德”带了6名随从进入吉拉斯，他们正竭力煽动民众破坏卡甘和吉拉斯段公路的修建工作。

1893年7月11日致印度国务秘书的信（No. 142）中描述吉拉斯的最终局势说：

> ……吉拉斯与戈尔（Gor）一样，处于克什米尔的管辖之下。自1851年克什米尔军队进入吉拉斯起，它每年向朝廷纳

> 贡。吉拉斯人民一直承认他们是克什米尔的进贡国，但他们从未被置于有效控制之下。我们现在可以确定杜兰上校无意吞并吉拉斯，只是想对它实施有效控制，像对待罕萨和纳格尔一样，由他们独立管理内务，克什米尔官员不得干涉……在不改变吉拉斯政治身份的前提下，授权吉尔吉特的英国代表处代表朝廷的利益与吉拉斯人交涉，由此，吉拉斯的自治身份得以保留。

关于布尼亚尔和亚辛，1914 年报告曾对它们的历史做了一系列总结。[105]有些事件前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重复。以下记录再度阐释了 1877 年后的两国形势：

> ……亚辛、戈赫、吉泽尔和伊希戈曼由迈赫塔尔帕赫尔旺·巴哈杜尔（Pahlwan Bahadur）统治（见上文），他是奇特拉尔的胡什瓦格特家族的成员。帕赫尔旺·巴哈杜尔承认克什米尔对它们的宗主统治，他领取克什米尔政府的津贴，却没有履行他的义务。1880 年，他入侵布尼亚尔，亚辛在他出征时被奇特拉尔的阿曼·乌尔·穆尔克占领，而帕赫尔旺·巴哈杜尔进攻布尼亚尔受挫出逃。克什米尔朝廷同意阿曼·乌尔·穆尔克将整片地区收归旗下，并在他们的认可下，划分行政区域。

后来的历史可从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弗雷泽（S. M. Fraser）致印度政府秘书的信中窥得：[106]

> ……伊希戈曼区（District）由卡罗姆巴尔（Karumbar）河两岸的 12 个村庄组成，从源头直至左岸古奇代尔（Kuchdel）的哈姆莱特（Hamlet）村和右岸的夏久依（Shachoi）河谷。1895 年奇特拉尔归于和平时，它被设为亚辛的胡什瓦格特区，包括下设的吉泽尔和古希（Kush）两个

分区（Sub-district）。那时，伊希戈曼河谷按理说应该脱离了奇特拉尔，由代表克什米尔土邦的总督管理，印度政府通过驻吉尔吉特代表任命总督，支付薪酬。问题是这片地区尽管处于摩诃罗阇的宗主权管辖之下，却不是属于克什米尔的领土。因而在 1896 年 1 月，任命迈赫塔尔贾奥·沙·阿卜杜尔·拉赫曼·汗（Jao Shah Abdur Rahman Khan）为首任亚辛的胡什瓦格特总督时，将伊希戈曼河谷地区划出，归现任总督米尔·阿里·马尔丹·沙（Mir Ali Mardan Shah）管辖（他是瓦罕的前任统治者和奇特拉尔迈赫塔尔的岳父）。

1911 年，驻吉尔吉特政治代表对布尼亚尔的管理下达了以下命令：[107]

1. 瓦齐尔穆罕默德·纳比（Mohammad Nabi）继续担任总督西法特·巴哈杜尔（Sifat Bahadur）罗阇的瓦齐尔，薪金为每月 30 卢比。

2. 所有与古希布尔（Gushpur）有关的问题均须上呈政治代表。

3. 总督有权变更“柴明达尔”（Zamindar）享有的权利。

4. 所有细小案件均由总督审理。

5. 谋杀案要上报政治代表。

6. 涉及土地所有关系的事务须上报政治代表。

7. 朝廷的年赋为 250—175 “满”（Maund①）小麦和 75 “满”大麦。

8. 拨出 600 “满”供养穆罕默德·阿克巴·汗一家。

9. 布尼亚尔的瓦齐尔的俸禄为 136 “满” 30 “西尔”。

10. 加古奇的年赋给古希布尔的米尔巴兹·汗（Baz Khan）。

① 重量单位，1 满合 37.324 公斤。下文 1 西尔合 0.931 公斤。——译者

11. 达姆西（Damasi）的年赋给瓦利·穆罕默德·汗（Wali Mohammad Khan）。

12. 哈屯（Hatun）和格隆贾尔（Grunjar[①]）的年赋支付给罗阇西法特·巴哈杜尔及其兄弟。

13. 管理年赋的调节。

14. 粮赋为三分之二的小麦和三分之一的大麦。

15. 乌托克（Utuk）总督在古拉布拉（Gulapura）、谢尔堡、辛戈尔（Singol）、布布尔（Bubur）和格隆贾尔等5个村庄每户收取2头羊或4卢比。

16. 杰曼·阿里（Chaman Ali）总督向巴罗达尔汗（Baro Darkham）的每户收5西尔酥油，向久莫达尔汗（Chumo Darkhan）每家收取2西尔酥油。

上述命令的下达与西法特·巴哈杜尔罗阇自1901年以来在布尼亚尔的地位有关，他是穆罕默德·阿克巴·汗的第二个兄弟，后被任命为布尼亚尔的总督，直到他的侄子，穆罕默德·阿克巴·汗的小儿子成年。他的俸禄：总督一职，每月得160卢比，征税官一职，每月得津贴40卢比，还让他归还穆罕默德封给他的两处村庄。这一命令详细规定了管理规则：[108]

有必要让罗阇西法特·巴哈杜尔明确理解他的职责，他应在吉尔吉特政治代表的总体管辖下行使总督职责，现今布尼亚尔的瓦齐尔瓦扎拉特的权力仍然不受限制。而对此权限问题，我们建议朝廷应处理任何依据印度刑法可判处死刑或流放的案件，如果政治代表认为有必要，可提交“吉尔加”（Jirga），由其主持裁决；对此裁决有不同意见，由政治代表将此案情记录转呈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特别代表将这些评判及必要的意见转呈给朝廷以下达最终判决。应向西法特·

① 原文如此。本书“附录”又作Gurunjar，译作古隆贾尔。——译者

巴哈杜尔罗阇解释清楚的是他在一切事务处理上应遵照政治代表的建议，并必须停止与周边独立的部落的纷争（如达丽罗和丹吉尔）。

1935年吉尔吉特瓦扎拉特的租借

1889年吉尔吉特代表处的设置主要解决了印度政府与北部边境土邦和部落间关系的许多问题，这些部落和土邦，如我们前面所述，是自治区，在内部事务的管理上都是独立自主的。英国是如何从外部渗入其内部行政管理层面的呢？这从A. 杜兰的经历中可有所了解：

> 大体而言，我的职责是将边境的一些异常状况报告给印度的行政长官。我是英国政府驻边境代表，与邻国的外交关系由我掌握，但吉尔吉特境内事务由克什米尔总督掌控，而军权则有赖于克什米尔将军。不过没有我的允许，他不得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这是一个充满艰险的差事，除了负责我份内之事，我事实上还对整个政府和吉尔吉特地区的发展状况负责，对军队的调控和约束负责。[109]

这一机制在吉尔吉特一直运行良好，直到英国能够使此地区重归和平。此时，这一机制在原定的程序上又加以改进，代表处继续由政治代表全权负责。他通过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向印度政府负责，而吉尔吉特的瓦扎拉特由国家官员们担任。我们在前面已说明了吉尔吉特瓦扎拉特掌管的地区是印度河延伸至吉尔吉特以南的左岸地区和罕萨河流域，还包括吉尔吉特区（Tehsil）。这些地区由国家官员负责。这一特殊的政治运行体系却产生了一种“双重管理”的后果，一些官方文件曾一再指出这一情况。因而围绕此事曾进行了长期讨论，吉尔吉特政治代表吉兰（G. V. B. Gillan）少校1933年4月18日的信中就已正式提出这一观点（No. F. 3/S，1933）：

> 相反，我们的计划应将吉尔吉特及当前属于吉尔吉特瓦扎拉特辖区的更多的地区纳入代表处版图之内……如果从政治角度看，这样的设置将会去除“双重管理”和内部摩擦带来的弊端，这些弊端自代表处成立以来一直被指责为有碍特别代表和政治代表的工作。如今，朝廷也指出了这一点，这样的安排将避免朝廷的官员涉入米尔们的内部事务和未治之地的事务。对于未征服地区的危险，我们一向严加防范，如今的调整将使米尔和总督们更为满意。正是赖于他们的满意和忠诚，我们才能不费一兵一卒和巨大成本继续在边境活动；新的调整将会受当地大多数居民的欢迎而得以推行……现在，瓦扎拉特的管理费用由朝廷提供，由于印度政府和朝廷间的承担费用关系很复杂，那些未治之地应得的份额有时竟然漏掉，如罕萨和纳格尔的米尔的津贴由两大机构各承担一半，而亚辛、伊希戈曼和戈赫—吉泽尔总督的津贴则全由朝廷支付。蛮荒地带的公路、桥梁及公共设施的开支按照惯例由印度政府支付，医药卫生和教育费用全由朝廷支付。不过现在，印度政府已同意承担代表处军医的俸禄的一半和他们的津贴，他们几乎都在瓦扎拉特和蛮荒之地工作。朝廷支付税吏和侦察队的开支，但侦察队指挥官的一半俸禄和助理指挥官的全部费用由英属印度政府承担。

这一“双重管理”问题确实使政治代表倍感烦恼，他希望能废除土邦总督一职。但考虑到“俄国威胁”，英国那时又不愿改变现状。不过，现在的形势有所转变，这可从查谟和克什米尔总理科尔文（E. J. D Colvin）致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兰（L. E. Lang）的信中窥知一二。[110]

> ……当初英国皇室考虑到整个印度地区的安全问题，因而于上世纪后半期在吉尔吉特设置了代表处。如今他们的想法已大大改变了，外来势力对印度边境产生的威胁已非常微小，可以说已不存在。

科尔文的观点并不为其他人赞同，他们认为克什米尔形势仍处在关键的时刻，科尔文作为总理将面对更为复杂的问题。当时，1925 年继普拉塔普·辛格就任罗阇的哈里·辛格正面临着 30 年代初国内穆斯林挑起的重大骚乱，英国试图前去干涉[111]并趁机推行一些改革。丹格（Teng）、帕特（Bhatt）和考尔（Kaul）[112]对此评论道：

> 依据印度政府的建议，摩诃罗阇曾任命印度政府的一名官员 E. J. D. 科尔文上校为土邦总理。印度文官的数名官员也应召进入土邦的部门管理内务和财政。科尔文是一名坚定的文官，事实上，他曾被派去土邦执行过数次任务。除了负责加紧对摩诃罗阇国务的监控和稳定那里的政治局势外，他还担负着一个艰巨的任务：确保英国对吉尔吉特和其他北部边境地区的控制。亚洲地区国际关系模式的迅速变化，尤其日本入侵满洲里，已使北部边境地位变得无比重要。潜伏在边境的俄国先遣队仍严重地威胁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利益。吉尔吉特和其他周边地区仍未设防。科尔文于是说服摩诃罗阇将吉尔吉特移交给英国。

作者在此提出了影响局势的新因素：日本入侵满洲里。但此事远在远东，对此地无甚影响。另一方面，俄国的威胁也带来了新的观念体系，即中亚地区的苏维埃主义以及几个中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与北部边境密切相关的是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中亚地区新型政治体制下的管理机构必然以不同的表现方式走近处于英国直接控制下的这些地区。吉尔吉特特区无疑是在英国控制之下，但政治代表仍然饱受他职责之外的难题的困扰。针对这些难题，英国制定了新的计划，从北部地区挖取一块较安定的领土对其加以更高效的控制。为了与 30 年代早期的宪政改革协调，英国开始干预查谟和克什米尔的行政管理，为安抚穆斯林，他们提出设置一种代表政府。吉尔吉特瓦扎拉特的租借，部分是为了实践这一计划。对此观点，巴里特维纳特·戈尔·巴姆扎依（Prithvinath Kaul Bamzai）[113]有明确的阐释：

> 科尔文上校和特别代表在同一时候说服摩诃罗阇将吉尔吉特瓦扎拉特“租”给英印政府60年，并将租界地的一切行政管理权交给他们。1935年3月29日，摩诃罗阇和特别代表兰（L. E. Lang）上校签订了“租借”协议。据此协议，在领土所有权仍归查谟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殿下及永久采矿权仍归克什米尔政府的前提下，授权印度副王及总督接管吉尔吉特瓦扎拉特的民事和军务，那里没有提到吉尔吉特政治代表处的意见，是因为民事和军务管理权已在印度副王和总督手中。
>
> 一达到目的，英国立刻减轻了对摩诃罗阇的压力，准许他随自己喜好自由处置不同政见者。一直以来受科尔文上校的政府支持和鼓励的各种社团和政党首领都被告知要加强自我防范。

此处作者将“租借”与克什米尔的政治动乱联系起来并提及英国官员对穆斯林动乱的鼓动和支持，并以一种典型的印度教观点称其为地方自治，这充分表明他对此问题的分析太过主观狭隘。他没有独立分析克什米尔动乱的政治原因。克什米尔政治与“租借”无关。正如丹格、帕特和考尔所论，与之有关的应是边境问题，但英国利用了克什米尔此时的形势，实现了他们新出台的计划。当年他们趁兰比尔·辛格死后普拉塔普·辛格刚刚继位之机，于1889年在吉尔吉特设立代表处时也用过同样的手段。普拉塔普·辛格在位的最后几年，统治很不顺利。阿玛尔·辛格（Amar Singh）之子哈里·辛格继位之后，试图独揽大权。克什米尔政治动乱的根源就是独裁统治者和要求建立代议制政府的人民之间斗争的结果。在那以后，北部地区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政治动乱。

正如巴里特维纳特·戈尔·巴姆扎依所指出的，租借之事（见下文）明显关系到吉尔吉特瓦扎拉特的北边部分。此地要租给英国政府60年，那吉尔吉特代表处就显得是对它的重复占领。因而租借条款特别强调是针对租借地的规则而不适用于代表处的辖地，后者从1889年

起就已在英国控制之下了，英国已对其行使了最高统治权。摩诃罗阇相对于当地罗阇来说具有宗主身份，但领土从未属于他。[114] 租借之后，代表处的辖地得以扩大，英国在民事和军事方面的管理渗透至代表处所有新收之地。事实上，吉尔吉特代表处现已成为一个坚实完整的管理体系，一切地方权力皆由政治代表掌握。他是当地民事首脑，军事和司法权皆由他授予，克什米尔政府的干预只是名义上的，连摩诃罗阇指定下任罗阇的方式也与英政府指定印度君王继承人的方式如出一辙，这在下文可以看到。在这一新的行政管理体系下，特区机构中所有摩诃罗阇的军队和官员都被撤走，被安排到印度河南边的吉尔吉特瓦扎拉特的下部地区。甚至公路、桥梁和公共设施也转让到特区机构名下，随后的一些工程也由英国政府指定的工程师承建。双方进行转让前已有协议：租借地的财产将在租借到期时归还。

租借协议如下：

租借契约书

立约双方：甲方为英国政府；乙方为尊敬的查谟与克什米尔摩诃罗阇哈里·辛格殿下及其后裔与继位人。履行人：甲方为莱昂内尔·爱德华·兰（Lionel Edward Lang）中校；以及印度副王和总督、威灵顿伯爵（Earl of willingdon）弗里曼·托马斯（Freeman Thomas）阁下；乙方为摩诃罗阇哈里·辛格殿下携众。① 立约如下：

条款Ⅰ——自协议生效日起，印度副王和总督在任何时候皆可行使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吉尔吉特瓦扎拉特即印度河右岸以北地区的民政与军事管理权。但上述领土仍属于查谟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统治范围之内。

条款Ⅱ——鉴于上述领土仍属查谟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统治之下，每逢摩诃罗阇殿下的贝萨喀节（Baisakhi）、杜萨

① 以上诸人人名前均带有多个表示其荣誉称号或衔头的缩写，为简明起见，译文中均删除了。——译者

> 赫拉节（Dussehra）、巴胜特本贯米节（Basant Panchami①），以及生日和其他经印度副王和总督同意的重大节日，代表处应遵照当地风俗致以敬意。摩诃罗阇殿下的旗帜将全年飘扬在代表处总部。
>
> 条款Ⅲ——在正常情况下，英属印度军队不得驻扎在吉尔吉特瓦扎拉特内印度河左岸地区。
>
> 条款Ⅳ——摩诃罗阇殿下继续保有永久采矿权和勘探特许权，采矿契约在随后的商谈中拟定。
>
> 条款Ⅴ——本契约自生效之日起60年有效，在此之后终止。
>
> 本契约于1935年5月26日于查谟签字并交换文本。[115]

吉尔吉特瓦扎拉特于1935年4月1日被接管。[116]

继租借之后又将布格罗特（Bugrot）河谷的封地（Jagir）赐予罕萨的米尔，以期米尔放弃在基里克—明铁盖以上地区的所有权利。罕萨的米尔，穆罕默德·纳齐姆·汗爵士在1937年4月5日致政治代表的信中同意了此事：

> 我很高兴将不再与中国互换岁礼，以及放弃所有权利，如在基里克和明铁盖以上地区放牧，征收塔克墩巴什地区的放牧税及耕种热斯喀木土地的权利……非常高兴我的津贴每年可增加3000卢比，并赠予我布格罗特河谷的封地，只要印度政府与查谟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殿下之间有关吉尔吉特的和约继续生效。

罕萨的米尔并没有遵守他的诺言，他于1934年8月14日再次致函吉尔吉特政治代表，要求准许他派人去“叶尔羌的霍加萨巴克拉巴迪地区（Khwaja Sabak Rabti Ilaqa）的封地”向佃农征收年租。外交事务

① 这三个节日均为印度教节日。——译者

部通过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回复（D. O. no. F. 12-X 37，1938 年 2 月 19 日）说："……我们向情报员咨询了一下，他说他认为米尔的亲信如此刻去叶尔羌，不甚妥当，因为那里反英情绪正在兴起……"尽管如此，官方资料[117]显示，米尔在 1935 年没有与中国互赠礼物，也没有在 1936 年征收任何放牧税。不过罕萨米尔的这一双重关系一直维持到 1947 年。

甚至连继位问题，也不仅要征得摩诃罗阇的同意，还要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并下达传位证书予以批准。然而，穆罕默德·纳齐姆·汗阁下去世后，却没有找到任何的传位证书，仅有传给继位者的一纸文书（Kharita）。由新德里的外交事务部建议的文书，其内容大致如下：

> 经王室代表同查谟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商定，现将你先王，K. C. S. I.，K. C. I. E.，① 穆罕默德·纳齐姆·汗之位传于你，由你继承罕萨的米尔之位。[118]

在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致印度政府秘书的信中[119]，措辞稍稍改动了一下：

> 现经两位王室代表的准许和授权，查谟与克什米尔摩诃罗阇下旨将你父王，K. C. S. I.，K. C. I. E.，穆罕默德·纳齐姆·汗之位传与你，正式的继位证书将按规定程序下达。

上述两件文书显示了印度政府和土邦对他们与罕萨米尔的关系的不同理解——这一问题一直是他们通信中谈论的主题。英国政府认为克什米尔摩诃罗阇对罕萨拥有宗主权，而非主权。宗主国可接受臣国的纳贡，而当地罗阇则将纳贡视为礼物的交换，甚至认为是两国国王互表敬意，他们从不认为他们的土地是克什米尔领土的一部分。

---

① 英印殖民政府给予的称号的缩写。——译者

印度联邦成员

吉尔吉特瓦扎拉特的租借和随之而来的吉尔吉特代表处管理权的巩固与扩张的主要原因之一，是30年代早期的圆桌会议。在此会议中，通过了决定成立印度联邦的若干议案。1935年通过了印度政府法案，条款之一就是成立印度联邦，联邦之内的英属印度诸省和印度各土邦将齐心协力，共创联邦。然而，关于印度土邦加入联邦的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在此，我们密切关注的是一旦克什米尔土邦加入联邦，罕萨、纳格尔、亚辛、戈赫—吉泽尔、伊希戈曼、吉拉斯和未加以行政管制的部落地区，如达丽罗、丹吉尔、哈尔班、沙津和贾尔戈德的地位将如何界定，因为这些土邦和政治特区与克什米尔土邦并不是一个整体。[120]

至于正式的法律文件，印度政府外交事务部在1938年8月30日致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的准官方信件（No. F. 676-x/37）中曾对此阐释道：

> ……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第311（1）款对于“印度联邦”这一概念的阐释，从法律角度来看它意味着自摩诃罗阇殿下接受《克什米尔土邦加入联邦》这一协议之日起，除了以前已经确定其成员身份的地区，其他所有属克什米尔宗主统治下的地区将自动归入联邦。根据法案第24或第125款，克什米尔政府将对联邦内的克什米尔地区事务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这将导致这些特别行政区脱离当地罗阇的统治而处于克什米尔当局的支配下，这并不是印度殖民政府所期望的。
>
> 为避免产生这样的情况，印度政府宣布这些地区将依照地方法规而治，“从而由陛下或以陛下之名管理这些地区”。根据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294（1）发布的声明，这些地区将

不受联邦立法机关的执法和立法权的干涉。但这将永远取消这些地区的联邦成员资格，使其独立于克什米尔。

据法案294（1）颁发的声明所针对的问题不适用于罕萨和纳格尔，因为它们并非是“由陛下或以陛下之名管理”的。它们的情况与奇特拉尔类似，奇特拉尔也是处在克什米尔的宗主统治下，但这一宗主关系只是名义上的，奇特拉尔仍是独立的土邦。同样，克什米尔政府也不能干涉罕萨和纳格尔的内政，尽管两位米尔已接受克什米尔摩诃罗阇为他们的宗主。于是为了让罕萨、纳格尔和奇特拉尔也能依法案自动转为联邦成员，英王代表（GOWN H. E）向印度国务秘书建议，应针对法案第311条下的第一项制定一则修改条款：一旦摩诃罗阇殿下表示接受《克什米尔土邦加入联邦》这一协议，那考虑到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所有处于印度政府宗主统治之下但又不属于印度政府领土的地区将不属于印度联邦。

印度政府计划就法案第294（1）有关吉尔吉特分区(Sub-division)的条款发布一项声明，以确保其在克什米尔加入联邦过程中免受克什米尔权力机构的干扰。达丽罗和丹吉尔作为“部落地区”也不受其影响。

在一份1938年11月28日的记录中，政治部再次声明他们的立场并坚持认为这些地区“从未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在此记录的第二段，清楚分析了形势并引入了克什米尔总理的观点。他们认为：

就吉尔吉特特区的立宪情况而论……将从第44段看到克什米尔政府在1905年被告知，尽管印度政府承认这些地区受克什米尔政府的宗主统治，但他们不属于克什米尔境内的领土，克什米尔官员也无权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英国对克什米尔朝廷也阐释了前述原则即“印度政府对这些小土邦的普遍政策是让它们尽可能自治，英国官员仅在非常必要的时候才介入”。关于这个问题，再没有更详细的信息，但克什米尔

政府显然并不认为上述情况属实，他们从未以书面形式承认上述情况，尽管他们看起来似乎默认了。

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S. 威廉姆斯在他的回信[121]中详细叙述了1935年后的行政管理情况。以下这些相关资料将向我们展示真实的政治运行体系：

克什米尔政府已多年没有干涉奇特拉尔、亚辛、戈赫—吉泽尔和伊希戈曼地区的内政，总督们——这一职位并不是世袭的（除了吉拉斯，那里暂时没有总督）——管理这些地区的政务，吉尔吉特政治代表是他们的上级，他们根据《边境犯罪条例》行使司法权，只有在任命新一任总督或有必要更换总督时，才征求克什米尔政府的意见并提请他们批准……布尼亚尔作为克什米尔土邦的"封地"，处于一个不同的基点之上，而克什米尔政府并不介入"封地"的内部管理，日常事务由总督处理。谋杀案由吉尔加根据吉尔吉特政治代表的指示做出决断，不服判决者可向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上诉。

以前，这些上诉都是提交克什米尔政府做最终判决的。但随着吉尔吉特瓦扎拉特的行政权转交给了印度政府，这一运作于1936年终止，那年正值《边境犯罪条例》在布尼亚尔开始实施……

我同意这一行动……考虑到吉尔吉特下属地区及达丽罗和丹吉尔，后两个地区完全是独立的，不受吉尔吉特政治代表的任何支配……吉尔吉特政治代表对奇特拉尔、亚辛、戈赫—吉泽尔、伊希戈曼及布尼亚尔地区的管理程度已足够将这些地区归为"从而由陛下或以陛下之名管理"的地区。对此，我甚感满意。我在此要指出的是如果想在印度河流域以北地区贯彻法律法规，可利用吉尔吉特侦察军团（Corps of Gilgit Scouts），他们包括来自上述地区的人员，由中央财政支

付其开支。随着1935年吉尔吉特瓦扎拉特行政管理方式的变革，克什米尔政府“同意放弃对它的行政管理权，将其留给印度政府，印度政府从而对这一地区拥有了军事权和行政权，也就是说，位于印度河流域以北的吉尔吉特瓦扎拉特加上那里的未治之地，事实上在边境首长和总督的统治之下。”

特别代表的观点同政治部的表述相符。

吉尔吉特政治代表的观点也应在此引述以便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他在给特别代表的信[122]中写道：

……对于萨维德吉（Savidge）的信中所提的计划，我认为继续使吉拉斯、吉尔吉特分区、亚辛、戈赫—吉泽尔和伊希戈曼成为名副其实的“由陛下或以陛下之名管理”的地区是非常正确的，据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294（1）发布的声明将为此提供恰当的运作程序。

对于吉尔吉特分区来说，根据1935年3月26日英国政府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殿下签订的协议，那里的军事权和行政权由印度副王和总督掌控。

吉拉斯从未是“吉尔吉特瓦扎拉特省”的一部分，但一直由助理政治代表依照吉尔吉特政治代表的指示进行管理。克什米尔军队曾在此驻扎，但当上述第二段所提的协议实施后，军队就撤走了。

亚辛、戈赫—吉泽尔和伊希戈曼地区的管理由印度政府任命的总督担任。由于这些地区是克什米尔的藩国，因而有关总督的任命要与克什米尔土邦商议。不过这只是在第二段中提及的协议实施之前。摩诃罗阇殿下再也不关心这些地区的管理问题，一切都由政治代表定夺。尽管政治代表以教化的方式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是广泛的，新土地的开发由他的一位助理评估，但所有民事或刑事案件或一些民事纠纷的文件，无论巨细都要送交总督自主受理或批准。总督并非世袭，印

度政府可随时撤销不称职的总督的职务。总督的俸禄由政府支付，政府收取当地土地税的四分之一。伊希戈曼总督的津贴由印度政府开支，其他两国由克什米尔土邦开支。

布尼亚尔的地位要略高于其他三个政治管区（Political District），因为那里的总督之位是世袭的，这是由于布尼亚尔是克什米尔土邦的"封地"。在严格意义上的克什米尔土邦境内，多数以前曾有相当地位的领主降级到仅相当于地主的地位且不具司法权的情况很常见（如阿斯托尔罗阇）。但帝国政府对布尼亚尔的政策却不同，他们准许布尼亚尔罗阇保留民事和刑事审判权，除了那些不时发生的特殊的案件（如谋杀），已被指定由政治代表或他的助理们尽量裁决……政府也不征收布尼亚尔的土地税。克什米尔土邦却支付津贴给当地总督，他的"蒙希"(Munshi)和兵员的开支均由政府承担……尽管政治代表并不直接管理布尼亚尔事务，但尽可以大胆地认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是代表着摩诃罗阇的利益……依据法案311（1）下达的声明，应对罕萨、纳格尔与奇特拉尔一视同仁的建议看起来完全有理。我同意对达丽罗和丹吉尔不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是独立的部落地区。

在最后的信[123]中，政治代表总结道：

……从当前看来，在某些方面联邦应将特区（Agency）排除在外。

同样在这封信中，他详细考察了真实情况，并以如下态度陈述了当前形势：

……正是因为在1890年克什米尔土邦的军队不敌罕萨和纳格尔，我们才设置了政治代表处，在由英国军官指挥的印度军队的帮助下才打败了罕萨和纳格尔。吉尔吉特侦察队的

开支全由帝国政府承担，官员全是英国人，因此动用他们来对抗罕萨和纳格尔也许会给人“来自王室的军事援助”的印象。从另一方面看，将克什米尔土邦军队编入印度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代表处是最不恰当的，鉴于这个国家的情况是如此复杂，我异常怀疑土邦军队是否能在没有特别外援的情况下对付罕萨和纳格尔的顽强抵抗，而且，罕萨的米尔很有可能会得到来自新疆的援助。

上述的三个视角足以说明这些地区是以陛下的名义统治的而不属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领土。唯一没有阐释清楚的仍是有关“印度土邦”的定义。政治部致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的信[124]中对此做了如下修改：

……1935 年印度政府法案 311（1）条对印度土邦的定义带来了很多理解上的困难，近来已有一种简单明了的方法来消除这些理解上的困难……相反，现在只要用如下新的定义来取代法案 311（1）中已有的定义：

印度土邦意味着任何不属于英属印度的领土，包括一切“土邦”（State）、Estate①、“封地”或其他陛下认可的相当于“国家”的地区……如果提醒王室代表摩诃罗阇殿下所认可的克什米尔土邦是什么，他会对通信中所争论的领土问题作何反应。双方一致认可的领土有奇特拉尔、布尼亚尔、吉尔吉特瓦扎拉特自 1935 年协议后我们接管的那部分及达丽罗和丹吉尔。他们考虑给予的答复将会是奇特拉尔并非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印度土邦，吉尔吉特瓦扎拉特北部地区（当然南部地区问题在此不予讨论）和布尼亚尔——克什米尔土邦的一个“封地”，属于克什米尔，达丽罗和丹吉尔则不属于。有争议的领土还有罕萨、纳格尔、吉拉斯、戈赫

① State 的另一种拼法，亦指土邦。——译者

—吉泽尔、伊希戈曼和亚辛。对此意见不统一。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地区属于克什米尔，尽管明显由于疏漏，在法案第一目录末尾的图表中，克什米尔的人口数3646243之中还包括了这些地区的人口数（根据上一次人口普查，总共58516人）。以政治部和印度政府的记录为基础，如今王室代表对于上述的提醒给予的答复将会是：尽管所有地区都受克什米尔的宗主统治，但没有一片属于克什米尔，罕萨和纳格尔是独立的印度土邦，吉拉斯、戈赫—吉泽尔、伊希戈曼和亚辛根据法案311（1）的定义（也许）归为"部落地区"。

信中还进一步分析了罕萨和纳格尔的问题：

……交纳年贡并非是所有权的标志，而只是一种交换，继承事宜需要得到克什米尔政府的准许似乎也不是标志（比较：印度土邦的继承人也要由英国政府认可）；而1935年协议只提到了吉尔吉特省的瓦扎拉特的北部地区，与罕萨和纳格尔的地位和管理无关。

这是印度政府对上述相关地区采取的最终方案。上述意见已全面阐释了相关土邦的法律地位，借克什米尔加入联邦之机将这些地区排除在联邦之外以确保这些地区成为英国王室代表的特殊保留区域。这一举措服务于两个目的：第一，使其像部落地区那样仍为副王的特殊负责区；第二，它们具有的国家实体可使其保持对克什米尔的独立性。上述意见转呈给当时查谟和克什米尔政府总理戈巴拉·斯瓦米·阿扬格尔（N. Gopala Swami Ayyangar）。1939年3月10日，首席部长R. C. 卡克准备了一份长长的报告上呈总理办公室。在将记录转呈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时，总理加入了他自己对联邦问题的一些意见。在此问题上，他谈到："对于这一将法案294（1）项条款用于吉尔吉特特区管辖下的所有土邦从而将它们排除在联邦之外的权宜之计，我认为摩诃罗阇的政府和陛下的政府都会一致同意。"

历史性阐释和回驳

1.（a）R. C. 卡克那冗长的报告一开始对相关记录的陈述就很混乱，事实上对这些资料是一种破坏，并给正确认识这一事件制造了障碍。报告的第六段提到了在1864年条约下移交给摩诃罗阇古拉伯·辛格的那些地区的性质的模糊之处，然而，在第七段，他又说：

> 吉尔吉特在条约签订时处于锡克人的统治之下，锡克人在那里保持了一支军事力量。其中的联系可从1874年的政府报告中获悉一二。
>
> 在锡克人统治时期，纳格尔、罕萨和诺默尔于萨姆瓦特（Samvat）纪元1998年（公元1842年）时在克什米尔总督——谢赫·古拉姆·穆希乌丁（Sh. Ghulam Mohi-ud-Din）控制之下。当克什米尔移交给古拉伯·辛格时（1846年），这些地区也随之为他所占。

（b）印度政府并不接受上述论点，他们对此的回文很明确：

> 吉尔吉特的锡克军事总督纳泰·沙与罕萨和纳格尔的军队稍一交锋就打败了他们，并娶了两国罗阇的女儿，从而在那些地区建立起松散的统治机构，但这些事实并不像1874年政府报告中所述的那样，表明罕萨和纳格尔已处于克什米尔总督控制之下，旁遮普政府在1880年7月29日的公文中对1874年报告表示的认可也无法支持这一论点。

2.（a）与罕萨和纳格尔的关系经历了三个时期：（1）1846年—1870年；（2）1870年—1885年；（3）1885年—1935年。第一个时期是“普遍敌对”期。“兰比尔·辛格就位不久，纳格尔罗阇开始向土邦

交纳年贡并作为属国得到土邦的一些财政援助。”直到1870年，双方才就贸易安全和吉尔吉特的人质事宜达成一致，也使迄今仍负隅顽抗的罕萨罗阇得以“进入较为恰当的思维框架”。1870年，“履行了相同义务”的罕萨罗阇得到每年2000卢比的财政援助。罗阇同意将恰伯罗特的年税上缴给土邦。

(b) 印度政府对此的答复是：“这是对一个时期非常简要的概括，尽管困难重重，这是一个冲突逐渐调停、治理逐步开始的时期。一直以来，罕萨就要比纳格尔难对付得多。”

3. (a) R. C. 卡克的报告提到了1851年—1852年征伐后与吉拉斯的关系。吉拉斯人同意交纳年贡给摩诃罗阇并遣送人质。

(b) 印度政府的回文中对此评价道：既然克什米尔政府从未在吉拉斯建立统治，那这个国家就从未附属于克什米尔。

4. (a) 第14—19段提到了摩诃罗阇与奇特拉尔建立友好关系的功劳。

(b) 印度政府对此的反应非常简略：克什米尔政府与奇特拉尔关系的内在历程是众所周知的，无须再详述。

5. (a) 报告在有关亚辛问题上提到：“毋庸置疑，土邦在70年代晚期或多或少对亚辛及相邻地区实施了一定的有效管理。”

(b) 印度政府的回文是：“梅奥勋爵在1870年坚持亚辛不属于克什米尔国境内，克什米尔对它的征服将是一种吞并。”到了1879年，利顿勋爵对此事的评价为：

> 我们（政策）的目的在于借助克什米尔政府取得对此地区的行政和军事支配权以及有效控制兴都库什诸山口。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将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对山脉以南国家的控制……使酋长们归顺克什米尔从而服务于英国国家利益。

回文又补充道：“这一政策的下一步举措就是任命了毕达尔夫上尉。”在一段长长的引文之后得出结论：“上述摘录足以显示当时对克什米尔有效支配这些地区的地位（加下横线部分在原著中为斜体——

译者）的意见。”

6.（a）报告提到了亚辛、戈赫—吉泽尔、伊希戈曼1895年后从奇特拉尔的分裂以及摩诃罗阇将这些地区划分给向他缴纳贡奉（Nazrana）的总督们的情况。

（b）政府的回文则说这些地区自1881年—1895年间一直在奇特拉尔的直接控制下。1895年后，奇特拉尔的格多尔家族从属于胡什瓦格特的马斯图季、亚辛、戈赫—吉泽尔、伊希戈曼地区独立出来。在英国政府政策的干预下，奇特拉尔归属马拉坎德，胡什瓦格特的地区仍留在吉尔吉特特区。据称：

> 亚辛成为吉尔吉特特区内由总督负责的地区，在克什米尔政府的准许下于后来几年内分裂为亚辛、戈赫—吉泽尔、伊希戈曼三个由总督治理的地区。这一调整完全出于印度政府的意图，也是当时政策的结果。

7.（a）首席部长的报告中还有如下评论：

> 在摩诃罗阇兰比尔·辛格统治时期，土邦影响力扩大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当摩诃罗阇遵照印度政府对奇特拉尔、迪尔、巴乔尔、瓦罕、锡格楠等地区发布指令时无须参考印度政府对吉拉斯、罕萨、纳格尔、亚辛等地区事务的意见。

（b）政府的回文明确指出上述论述“完全不正确”。

8.（a）报告随后考察了摩诃罗阇普拉塔普·辛格时代的历史以及与吉尔吉特特区建立相关的一些事件。英国的“代表处直接与殿下通信联系，在重要事务的处理上听从殿下的指令，并提交相关报告给殿下……有关罕萨和纳格尔的叛乱问题。”报告又补充说前去镇压叛乱的讨伐军主要由土邦军队组成，并由土邦军官指挥。部队中仅200人是英国兵，他们被派去加强代表处卫队。

（b）政府的回文认为报告只看到了“事实无足轻重的一面，罕萨

和纳格尔是在英国军队和官员的援助下才攻克的。有400名英国兵和15名英国军官，约占部队总数的一半。”

9. 政府回文中清楚地表述了最终的结论：

> 根据印度政府1877年达成的协议，罕萨、纳格尔等小土邦并非是摩诃罗阇的盟国，而是它的藩属。有一段时期，纳格尔的统治者可能被驱逐下台，在没有通知克什米尔并在克什米尔政府参与的情形下，另一个人登上了王位。这一现象表明政府对此地的控制是多么薄弱。然而，1891年征伐之后，两个土邦终于臣服并处于克什米尔的控制之下。
>
> 确实，在1891年的战争之后，下达给两位米尔的文书的内容很宽泛，授予土邦的权力不仅在于监督两国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还要引导罕萨和纳格尔处理与周边国家及部落的关系。然而，土邦的控制权迅速被抽离，多年来，这些地区一直处在政治代表的全权掌控之下。
>
> 第33段指出，土邦的全部开支，除去从1889年再次设置吉尔吉特特区时已核定那部分之后，至今大约是三千万。这些开支包括吉尔吉特特区的费用，土邦军费以及筑路、办学和在两个土邦设立诊所的费用。看来土邦并没有很专业地列出开支情况的所有细节，或区分两大主要的开支项目——这46年来特区的费用和土邦军队的费用……显而易见大部分的开支肯定是军费，相当一部分则花费在“未治”之地上，这笔开支由印度政府和克什米尔朝廷共同承担。在1935年进行移交时，克什米尔政府给罕萨和纳格尔的米尔的拨款只付了一半，而给各地总督的却全额支付。在“未治”地区修路、建桥、修建公共设施的费用大体上由印度政府承担，但“未治”地区的医疗教育费用及通往罕萨的修桥铺路的费用则由土邦承担。
>
> 这些地区开支问题的关键在于印度政府和克什米尔政府承担的份额分配上。这一事实肯定对所谓这些领土是克什米尔土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声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上述回文通过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转呈给政治部，[126]特别代表还在信中表达了他自己的意见：

> 许多人都支持罕萨和纳格尔以及部落地区是克什米尔土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他们的观点都缺乏有力的论据。如果考虑到史实以及政治官员和印度政府几次重申的观点，再结合你上面引用的信函第四段所表达的见解，认为这些地区是克什米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似乎并不成立。它们的身份是在克什米尔宗主统治下的藩属。

经过漫长的商谈，印度政府的最终意见确定了，如果他们不打算将吉尔吉特特区置于联邦立法机构的控制下，而是将它作为由王室代表负责的特区，那就能确保政府能够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牢牢控制吉尔吉特特区。这一局势一直持续到1947年下一次宪政改革。

吉尔吉特侦察队

从更宽广的防御和外交角度来看，英国很希望将吉尔吉特特区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他们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是间接地通过扶持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逐步建立起来的。此种间接控制的方式根本上是由跨帕米尔地区的局势所决定的，当时俄国已进驻跨帕米尔地区并稳固地控制了当地人民。军事防御成为英国的首要考虑之事，于是导致了英国采取三大行动：（1）修建吉尔吉特公路，经古雷兹和阿斯托尔连接斯利那加和吉尔吉特；（2）在瓦罕建立一个由阿富汗控制的缓冲地带，以缓冲英国属地和俄国属地间的矛盾；（3）以英国领土为一方，以中国和俄国领土为另一方，在两者之间划定分界，并在卡兰达尔奇（Kalandarchi）设立了军事营垒以防守基里克山口和明铁盖山口——新的通往中国的陆地路线，就在瓦罕的东界。英国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地方首领们的控制。起先，英国是委托克什米尔摩诃罗阇和

克什米尔军队来负责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的。直到1890年，英国意识到仅靠克什米尔军队是不可能解决的。因此，杜兰上校在1891年不得不派遣英国将士前去迎战罕萨和纳格尔，并在吉拉斯和部落地区重建统治机构。随着1889年吉尔吉特特区的重建，英国从查谟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手中接管了北部边境的事务。

大约在同一时期，英国成立了帝国服务军（Imperial Service Troops），[127]这是因为“维持印度和平和整顿印度军队的重担全落在英属印度肩上，以及在本土有八千万人只交纳给帝国财政署少量的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各本地土邦大量解除民众武装而代之以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并富有凝聚力的小队常规军，他们将在英国视察官的监督下接受训练。达弗林勋爵宣称这一计划标志着英国的防御政策进入了新阶段。杜兰上校写道：

> 年前，我曾奉命充分利用新组建的克什米尔帝国服务军，以此为基础，尽可能以更适度规模制定一个组织军队的方案。政府宣扬的目标，就我们所见，是监视和控制兴都库什南部的国家，以及组织一支能够在危急关头以小股部队穿越山口制止任何叛乱的军队。[128]

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杜兰上校于1889年组建了吉尔吉特侦察队，这是在当地招募的一支军队。[129]军队由火枪队和没有武装的民兵组成。值得注意的是，火枪队在1891年征战罕萨和纳格尔时就已出现，并受雇参加了著名的尼尔特战役，并于1895年参与了解放奇特拉尔之战。之后在1913年，火枪队被解散，吉尔吉特侦察队（替代前者）随后而生。特伦奇（C. C. Trench）提出了组建侦察队的另一背景。[130]起先他谈到了1891年英国从吉尔吉特向罕萨和纳格尔的进军——在这次进攻中，当时的英国代表（杜兰上校）负伤，他被授予三枚十字勋章，给他带来了无限的荣耀。然后就是1895年解放奇特拉尔之战，最终实现了至少三边的防御系统——通往吉尔吉特的基里克山口以及通往奇特拉尔的博罗吉尔和道拉山口。特伦奇评述道：

正是为了抵抗偶发事件，当地的政治代表才在1900年建议组建一支临时的民兵队，成员都是来自奇特拉尔山区的“老练的攀岩者”。这一计划继承了柯曾勋爵的思想，依靠王家民兵来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家，直到能够成立正规军，这就是奇特拉尔侦察队的缘起。给部落精壮配置现代武器，一年培训一个月，从而拉起一张低成本的防御之网，这至少能拖延敌人的入侵。1913年成立了规模相似的吉尔吉特侦察队。

侦察队还有另外一项职责：

警察不在时，他们还要担负执法任务，逮捕凶残的谋杀犯、偷羊犯和毒品走私犯。他们还要驻守奇特拉尔的哨卡，以及西边的古比斯和卡兰达尔奇的哨卡。卡兰达尔奇哨卡有11500英尺高，是英帝国最高的哨卡，位于从中国突厥斯坦跨越基里克山口与明铁盖山口的交汇处。[131]

开始时，吉尔吉特侦察队由三个半连组成：罕萨和纳格尔各出一个连，其他则由布尼亚尔、亚辛、古比斯和吉尔吉特组成四个排，每排50人。沙·汗（Shah Khan）提供的更详细的资料如下：

1935年，土邦以租借的名义将吉尔吉特瓦扎拉特移交给英国政府。土邦军队撤出了吉尔吉特，留下来的军队则依照其他边境侦察队的模式改组成了吉尔吉特侦察军团，于是保卫这一地区的任务就交给了新组建的吉尔吉特侦察军团。和平时期，军团规模达到562人，包括指挥排。并以连排为单位进一步重组。这些连和排由这些地区的罗阇和米尔的近亲指挥，通常是他们的儿子和兄弟。由此特别委任他们为VCO（Viceroy's Commissioned Officers，副王委任的军官）。侦察队由英国军官指挥，但实权仍在VCO们手中，换言之，在当地的统治家族手中。英国对VCO们予以优待，这对当地首领来

说是无上的荣誉。军团由政治代表直接管辖。提升任何VCO都要由他在考虑整个政治大局的前提下决定。只有小部分人能从原官职升至VCO。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是如何依靠当地米尔和罗阇们的忠诚来实现吉尔吉特特区的防守的，米尔和罗阇们愿意为侦察队输送人员，证明他们是支持侦察队的。当地人民对征兵很是欢迎，这不仅给年轻人带来了就业机会，而且对他们来说在某些军事机构服务也是一种荣耀。正如沙·汗一针见血地指出的：

……这是一个引诱当地首领、米尔和罗阇们上钩的政治诱饵，他们被有意地置于文化教育之外，只是被不断地灌输英国政府是如何地礼贤下士、广开言路，授予他们副王委任军官这样显赫的荣誉。军团的VCO们披盔甲，跨骏马，随从人员前呼后拥，一派王家气派。除了英国军官，他们是最有权力的人，受到政府、公众以及同辈罗阇和米尔的敬仰。这一切大大地孕育了他们的等级意识，事实上为后来的独立运动埋下了种子。

特伦奇详细描述了侦察队的装备和训练情况：

侦察队配有.303 SMLE步枪和一些维克斯机枪以守卫哨卡。士兵们夏天的制服与南瓦齐里斯坦侦察队的一样——灰色的“玛兹里”（Mazri）衬衣，卡其布短裤，长统袜，挎子弹带，着“贾帕利”鞋（Chaplis）。他们不佩戴缠头巾(Safa)，而是代之以“戈依”（Koi），类似于一种有下垂卷边的软袋，由褐色羊毛制成，它在整个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地区都很常见，也被用来装烟草和钱。阅兵仪式上的“戈依”则是用白色羊毛制成的，上流社会的时髦人物所带的“戈依”是用野山羊腹部的毛制成的。冬天穿四层羊绒的保暖上衣和

黄褐色毛衣。吉尔吉特侦察队的徽章是绣在“戈依”上的北山羊头，饰以一英寸半宽的彩色条带，军萨各排的饰带为绿色，纳格尔排为红色，布尼亚尔为黄色，诸如此类。他们挂象征太阳的军旗。[132]

应再次强调的是吉尔吉特侦察军团是由英国组建的，英印政府承担其军费开支，并派遣英国军官前去指挥。随着1935年克什米尔土邦军队从特区撤离，侦察队成为英国政权在当地的主要军事保证。他们的薪酬比土邦军队高。查谟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同这一军团毫无瓜葛。事实上，摩诃罗阇已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所有控制，除了名义上所谓的宗主权。这一军团不仅要守卫特区前线，还要监督处理境内的治安问题。最重要的是军团带来的声威，通过他们的忠诚也传递了当地罗阇和米尔的忠诚。英国以微薄的薪酬换回来自本土的支持，成为英国强大的后盾。军团也代表当地不受束缚的社会政治力量。英国官员可自由融入军团的VCO们，参与他们的运动和活动。正是这种平等氛围形成了一条独特的纽带，使侦察队与英国官员联系更紧密，从而使当地首领们体会到共同保卫家园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英国统治的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导致了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寻求解放的热潮的出现。对获胜的英帝国来说，继续维持对广大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已不可能，他们正砸碎镣铐寻求自由。大战为他们带来了希望和向往，他们实现自由的时刻来临了。在环境的逼迫下，英国已回天无力，决定撤出南亚。但权力的交接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必须要满足人民形态各异的政治愿望。政治权力必须转交给新一代有政治抱负的人，这些交接必须以现有的历史环境为依托。这一历史环境不易把握。大英帝国政府正忙于将权力移交给南亚的政治代表。吉尔吉特特区的问题是这庞大的移交游戏中微小的一项。那里没有政治党派，长期以来，

英国一直将它作为王室代表的特别负责区。当地首领代表人民的意愿，吉尔吉特侦察队又确保了首领们的忠诚。英国撤出后，这些地区仍应再次交给当地首领吗？从形式上看，这些地区尽管位于土邦疆域之外，但仍处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宗主统治之下，除了通过1935年的契约出租的地区。

我们对现象背后发生的事所知不全。我们从未从当地居民的角度去考虑如何全面解决吉尔吉特特区问题。所有的关注都落到了1935年的租借契约上，政府认为：

> 通往吉尔吉特的山口仅在夏季时对政治部开放，因而建议契约应在1947年9月期间终止，以使王室代表机构包括两位政治代表在英国的统治终结前撤走，并给克什米尔政府一些时间设立合适的替代机构管理此地区。[133]

这一建议并未考虑当地人民的利益。英国官方仅仅关心在他们的统治终结前将英国机构安全撤回，且事事以克什米尔摩诃罗阇的利益为标准，以履行对他的应尽义务。因而他们急于废除这一契约，以便克什米尔政府能适时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英国官方忘了契约针对的只是吉尔吉特瓦扎拉特，并不包括特区的其他部分。当他们商议要撤回英国机构时，毫不关心当地人民的问题、他们的利益和他们以往的历史，英国曾因此而坚守瓦扎拉特以外的特区不属于克什米尔领土这一立场，但现在，他们将过去的历史全遗忘了，只称其为“吉尔吉特分区”（Gilgit subdivision）。有如下记录：

“依据1935年与克什米尔政府签订的为期60年的契约，吉尔吉特分区现由王室代表管理。”[134]

在此，“吉尔吉特分区”一词与以往有了不同的意味，以前条款中所说的“吉尔吉特分区”只指1935年被租借的吉尔吉特瓦扎拉特这部分。而在这里则指整个吉尔吉特特区，包括被租借的瓦扎拉特。这一词义的转换是英国官方故意而为，他们急于将他们的人全部撤走。这一文字游戏暴露了英国准备将整个特区移交给摩诃罗阇的企图，而他

们与摩诃罗阇签订的契约只是针对吉尔吉特瓦扎拉特——只占特区很小一部分，这是英国对特区人民最可恶的出卖。

英国其次关心的是“对外关系与防御层面的整个印度的利益”。备忘录第三段记载道：

> 外交事务部和国防部坚持认为提前终止契约不会对印度在外事和防御方面的利益带来损失。但尼赫鲁建议终止契约的问题应延迟到明年春天再考虑，那时克什米尔与印度联邦的关系将进一步明朗化。

在此，蒙巴顿总督权衡考虑的仍是“整个印度的利益”，就此问题，他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进行了商讨，后者急于使克什米尔与印度联邦的关系更为牢固。关于这一问题，蒙巴顿总督似乎从未咨询过里亚格特·阿里·汗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只要他觉得权力移交过程没有给印度利益带来妨碍，他就倾向于尽快废除契约，把整个地区移交给摩诃罗阇。不太清楚这是他的个人意见还是印度政府政治部的建议。他只是赞成英国首相“终止契约”。

曲解1935年的租借契约以便将吉尔吉特特区移交给摩诃罗阇之事并非一帆风顺。1947年7月3日，英国统治宣告终结，整个吉尔吉特特区移交给摩诃罗阇的代表坎萨拉·辛格准将，他于1947年8月1日担任总督管理这一地区，离之后的巴基斯坦和印度独立刚好两星期。任命摩诃罗阇的道格拉表亲为吉尔吉特总督发生在巴拉代乌·辛格·巴塔尼亚上校明确拒绝委任之后，但从坎萨拉·辛格的自述中可知，[135]对他的委任也是困难重重，因为当时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总理R. C. 卡克并不支持他。最大阻力还是来自英国，他们让当地的文武官员选择为巴基斯坦服务还是为印度服务。据坎萨拉·辛格所说，他们都选择了巴基斯坦。在明了当地官员的意见的情形下，英国政府仍决定将整个特区移交给摩诃罗阇。但移交的安全性要依靠吉尔吉特侦察队的忠诚度，他们是这一地区任何政治变革的主要军事保障。他们对摩诃罗阇的忠诚是不容置疑的。于是A. 马吉德中校指挥土邦军队的第

六营随同总督进军本吉以支持新任总督。一支新的军事力量进入此地。同时，摩诃罗阇邀请罕萨和纳格尔的米尔以及布尼亚尔的罗阇前往斯利那加商谈，可能想发表新的建议或要求扩展土邦的疆域。我们无法得知确切内容，因为这样的场合正是玩弄外交手段的时刻。首领们的任何答复都与此地区的主导政治氛围不相关，那里的文武官员都已选择了巴基斯坦，英国则是作茧自缚。坎萨拉·辛格准将在斯利那加时就听说了这些困难，他很清楚以地方总督的身份接管这一地区之后将面临的内政和军事上的许多困难，但作为一名英勇的战士，他身先士卒，勇担重任。他于1947年7月31日乘飞机前往吉尔吉特，随行的有土邦军队的总司令斯科特少将。他的就任结束了英国的统治，如今吉尔吉特人民面临的问题是接受摩诃罗阇的统治还是坚持选择巴基斯坦。对此，当地官员已做出了抉择。

英国对吉尔吉特的统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则依靠当地的军事支持——吉尔吉特侦察队，并通过编织查谟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对吉尔吉特特区具有宗主权这一名义来实现他们事实上的统治，同时他们一直坚持吉尔吉特特区不属于克什米尔领土。当1947年进行权力移交时，英国似乎仁至义尽地给了当地官员选择权，包括文官和武官，但尽管他们都选择了巴基斯坦，英国仍将整个特区交给了摩诃罗阇，不顾当地人民的意愿，也没有过问摩诃罗阇是否愿意归入巴基斯坦。因而英国在吉尔吉特的权力的移交造成了一个僵局，加速煽起了当地人民心中的仇恨之火。这源于他们的两面三刀——一种深具历史传统的把戏：骗取信任，然后过河拆桥。一开始，他们以此来对付摩诃罗阇，现在又用来抽身而退，结束他们的殖民统治。于是英国统治的结束给吉尔吉特地区埋下了动乱的种子。

附表1:派驻吉尔吉特的英国官员

	吉尔吉特特区政治负责人名字	职　务	任 职 时 间
1	约翰·毕达尔夫中校	特别任务官员	1878—1881
2	杜兰中校(A. G. A. Durand)	英国代表	1889. 7. 17—1893. 11. 1
3	布鲁斯上校(A. Mc. C. Bruce)	行使英国代表职务	1893. 11. 2—1894. 1. 26

续表

	吉尔吉特特区政治负责人名字	职　务	任 职 时 间
4	罗伯逊爵士(George Scott Robertson)	英国代表	1894.1.27—1896.9.28
5	戈弗雷中校(S.H.Godfrey)	英国代表	1896.9.29—1897.8.13
6	麦克马洪上校(Henry Mc.Mahon)	政治代表	1897.8.14—1898.9.30
7	曼纳斯·史密斯上校(J.Manners Smith)	政治代表	1898.10.1—1901.10.21
8	斯图尔特少校(W.H.M.S.Stewart)	政治代表	1901.10.22—1903.10.18
9	格登中校(B.E.M.Gurdon)	政治代表	1903.10.19—1906.10.4
10	布鲁斯少校(A.F.Bruce)	政治代表	1906.10.15—1908.4.
11	麦克弗森中校(A.D.Mac Pherson)	行使政治代表职务	1908.4.—1908.8.
12	阿米埃·迪尤中校(Armie DEW)	政治代表	1908.8.27—1911.5.29
13	麦克弗森中校(A.D.Mac Pherson)	政治代表	1911.5.30—1916.10.12
14	詹姆斯中校(E.H.S.James)	政治代表	1916.10.13—1917.5.20
15	史密斯中校(C.A.Smith)	政治代表	1917.5.21—1920.9.22
16	洛里默中校(D.L.R.Lorimer)	政治代表	1920.9.23—1924.9.20
17	戈登·洛赫中校(Gordon Loch)	政治代表	1924.9.21—1927.10.10
18	托德·斯夸尔(H.J.Todd E Squire)	政治代表	1927.10.11—1931.9.28
19	吉兰少校(G.V.B.Gillan)	政治代表	1931.9.29—1934.9.21
20	柯克布赖德少校(G.Kirkbride)	政治代表	1934.9.22—1937.10.4
21	加尔布雷思(I.W.Galbraith)	政治代表	1937.10.5—1939.6.13
22	巴蒂上尉(R.K.M.Battye)	行使政治代表职务	1939.6.14—1939.10.2
23	克赖顿少校(G.C.L.Crichton)	政治代表	1939.10.3—1942.7.8
24	科布少校(E.H.Cobb)	政治代表	1942.7.8—1945.9.5
25	培根中校(R.N.Bacon)	政治代表	1945.9.5—1947.7.31
26	坎萨拉·辛格准将(总督)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摩诃罗阇的代表	1947.8.1—1947.11.1

(上表中表示相关人员荣誉称号的缩写在译文中已被删去——译者)

附表2:斯卡杜的行政管辖

在卡尔达尔(Kardar)治下:

波里格(格尔吉尔)由一名塔纳达尔治理,亦包括在这一卡尔达

里（Kardari）即分区（Subdivision）之内。

1. 帕格万·辛格（Bhagwan Singh）

2. 戈萨翁（Gosaun,）

3. 格拉姆·辛格（Karam Singh）

4. 贾瓦哈尔·辛格（Jawahar Singh）

5. 盖达罗（Kedaro，1852年—1864年）

6. 瓦齐尔·拉克·久（Wazir Lakh Ju，1864年—1876年）

7. 玛赫塔·曼格尔·辛格（Mahatta Mangal Singh，1876年—1886年）

8. 塔古尔·甘加·辛格（Thakur Ganga Singh）

9. 罗易·巴哈杜尔·潘迪特·拉塔·克里山·考尔（Rai Bahadur Pandit Randha krishan kaul）

10. 拉拉·坦巴特·罗易（Lala Dhanpat Rai）

11. 赛义德·古拉姆·吉拉尼·沙（Sayyid Ghulam Jilani Shah）

在瓦齐尔瓦扎拉特（Wazir-i-Wazarat）治下：

1899年，巴尔蒂斯坦、拉达克和吉尔吉特瓦扎拉特被合并为一个“边境区”（Frontier district），汗·巴哈杜尔·萨达尔·穆罕默德·阿克巴·汗出任副专员或瓦齐尔瓦扎拉特，但他只担任了两年。

1901年，拉达克区（District of Ladakh）成立，包括斯卡杜、格尔吉尔和列城诸区。当时，古尔德里和自伯利（Pari）至卡罗尔的地区包括在格尔吉尔区（Kargil tehsil）内。从这时候起，斯卡杜成为拉达克区的冬季首府。

下列人员被任命为斯卡杜副专员：

1. 乔德里·胡希·穆罕默德·纳齐尔（Chaudhuri Khush Mohammad Nazir）

2. 艾尔哈吉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Alhaj Maulvi Hashmatullah Khan）

3. 拉拉·班西·拉尔（Lala Bansi Lal）

4. 瓦齐尔·费罗兹·金德（Wzir Firoz Chand）

5. 拉拉·斯利·罗摩（Lala Sri Ram）
6. 潘迪特·尼朗贾尔·拉尔（Pandit Niranjal Lal）
7. 戈德瓦尔·代吉拉摩（Kotwal Tejram）
8. 拉奥·拉丹·辛格（Rao Ratan Singh）
9. 乔德里·费兹乌拉·汗（Chaudhuri Faizullah Khan）
10. 塔古尔·特罗布·辛格（Thakur Dhrup Singh）
11. 拉拉·拉迈希·旃陀罗（Lala Ramesh Chandra）
12. 潘迪特·比夏姆巴尔·纳特·乔德希（Pandit Bishambar Nath Jyotshi，1947 年）
13. 瓦齐尔瓦扎拉特 拉拉·阿玛尔纳特（Lala Amarnath，1947 年—1948 年 2 月），为萨尔弗拉兹·汗所杀。

注 释

［1］详见 M. L. 卡布尔：《被出卖与被掠夺的克什米尔》，查谟，1968 年。作者在书中对克什米尔事件中英国充当的角色作了详细分析。

［2］详见 M. L. 卡布尔：《查谟与克什米尔土邦史》，查谟，1980 年。作者在书中建构起关于英国拉拢古拉伯·辛格为自己效力以及英国对他的野心的鼓励和支持的完整史实。

［3］同上，第 54—58 页。卡布尔博士详细叙述了英国是如何将拉达克和西藏的羊毛披巾贸易转给英属印度政府的。正是这一转向促使古拉伯·辛格在兰吉特·辛格的默许下进攻拉达克吗？

［4］同上，第 60—61 页。

［5］查尔斯·马文：《俄国进军印度》，白沙瓦再版，1984 年，第 12 章。

［6］H. H. 威尔逊：《威廉·莫尔克罗夫特和乔治·特拉贝克 1819 年—1825 年印度斯坦和旁遮普的喜马拉雅诸省之旅》，伦敦，1841 年第一版；卡拉奇再版，1979 年，第 1 卷，第 358—359 页。（此书后来更名为《莫尔克罗夫特旅行记》）。

［7］G. T. 瓦因：《在克什米尔、拉达克和斯卡杜的旅行》，伦敦，

1841 年。

［8］约翰·伍德：《乌浒河之源手记——取道印度河、喀布尔和巴达克山》，伦敦，1841 年。

［9］莫尔克罗夫特：《莫尔克罗夫特旅行记》，第 1 卷，第 418—421 页。

［10］M. L. 卡布尔：《查谟与克什米尔土邦史》，查谟，1980 年，第 58 页。

［11］胡希瓦格特·辛格：《锡克史》，牛津，1977 年，第 1 卷，第 279—280 页。

［12］A. 坎宁安：《拉达克》，新德里再版，1977 年，第 330 页。

［13］A. H. 弗兰克：《西部西藏史》，伦敦，1842 年，第 147—148 页。

［14］A. 坎宁安：同上引书，第 338 页脚注。

［15］赫希默杜拉·汗：同上引书，第 513 页。

［16］G. T. 瓦因：同上引书，第 255—256 页。

［17］赫希默杜拉·汗：同上引书，第 513—514 页。

［18］M. L. 卡布尔：《查谟与克什米尔土邦史》，第 77 页；J. D. 坎宁安：《锡克史》，1966 年再版，第 217—18 页。

［19］F. 德鲁：《印度的北部屏障》，第 182—183 页。

［20］雷特奈尔博士仅在 1849 年提及穆罕默德·汗二世。据他说穆罕默德·汗二世在 1858 年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直到格里姆·汗的就位，而根据沙·拉伊斯·汗，到 1858 年，穆罕默德二世已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21］A. 坎宁安：同上引书，第 345 页。

［22］A. H. 弗兰克：同上引书，第 155 页。

［23］赫希默杜拉·汗：同上引书，第 582—583 页（已译稿）。

［24］这一术语已被 M. K. 丹格、R. K. 考尔·帕特和桑托希·考尔恰当地运用于他们的著作《克什米尔：宪政沿革史及文件》，新德里，1977 年，第 10 页。

［25］阿卜杜尔·哈米德·哈瓦尔：同上引书，第 219—220 页。

[26] A. 坎宁安:同上引书,第 350 页。坎宁安认为佐尔阿弗尔·辛格曾败给中国大军。也可见于 A. F. 弗兰克：同上引书，第 163—165 页。

[27] 赫希默杜拉·汗：同上引书，第 361—379 页。

[28] A. H. 弗兰克：同上引书，第 168 页。

[29] 雷特奈尔博士：同上引书，第 88 页。

[30] 赫希默杜拉·汗：见上引书，第 692—693 页。

[31] F. 德鲁：同上引书，第 184 页。

[32] F. 德鲁：《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卡拉奇再版，1980 年。第 439—440 页。

[33] 约翰·毕达尔夫：同上引书，第 8 页。

[34] G. W. 雷特奈尔博士：同上引书，第 71 页。

[35] 当时的军事哨所称为“塔纳”，哨所的指挥官就是塔纳达尔。

[36] F. 德鲁:《印度的北部屏障》，第 186—188 页。

[37] G. W. 雷特奈尔博士：同上引书，第 191 页。

[38] F. 德鲁:《印度的北部屏障》，第 191 页。

[39] 蒙希·穆罕默德·阿齐兹·乌丁:《奇特拉尔史》，第 123—126 页。

[40] 米尔扎·古拉姆·穆尔塔扎：同上引书，第 128 页。

[41] 蒙希·穆罕默德·阿齐兹·乌丁：同上引书，第 131—132 页。

[42] 有关磋商情况可见 M. L. 卡布尔：《被出卖与被掠夺的克什米尔》，第 76—87 页。

[43] 同上，第 79—80 页。

[44] 同上，第 81 页。

[45] 同上，第 76 页。

[46] 同上，第 88 页。这一阐述角度事实上是基于当时英人的著作之上，如：乔治·罗伯逊先生的《奇特拉尔：一次小规模围攻》，伦敦第一版，1898 年；卡拉奇再版，1977 年，第 26 页。作者在书中说：“两国签署了和约，和约还是倾向于保护奇特拉尔的，而克什米尔除了

拥有宗主国的名誉外没有任何好处。”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最后的结论。A. 杜兰上校在他的书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边界的形成》，卡拉奇再版，1977 年，第 74 页。

［47］A. 杜兰：同上引书，第 75 页。

［48］M. L. 卡布尔：《被出卖与被掠夺的克什米尔》，第 89—90 页。

［49］赫希默杜拉·汗：同上引书，第 708 页。

［50］A. 杜兰：同上引书，第九，十章。

［51］E. F. 奈特：《三个帝国的会合之处》，卡拉奇再版，1980 年，第 18—23 章。

［52］同上，第 126—127 页。

［53］A. 杜兰：同上引书，第 274 页。

［54］同上，第 277—278 页。

［55］同上，第 269—270 页。

［56］同上，第 283 页。

［57］同上，第 286—287 页。

［58］同上，第 290 页。

［59］H. L. 内维尔上尉：《西北边境的烽火》，拉合尔再版，1977 年，第 12 章；H. C. 汤姆森：《奇特拉尔、斯瓦特和巴乔尔大事记》，拉合尔再版，1981 年，第 1 章：第 3—5 页；乔治·罗伯逊：《奇特拉尔；一次小规模围攻》，牛津再版，1977 年，第 5 章。

［60］同上，序言，第 8—9 页。

［61］同上，第 8 页。

［62］同上，第 26 页。

［63］约翰·毕达尔夫：《兴都库什的部落》，第 62 页。

［64］H. C. 汤姆森：《奇特拉尔、斯瓦特和巴乔尔大事记》，奇特拉尔章，第 2 页。

［65］H. L. 内维尔：《西北边境的烽火》，第 164 页。

［66］米尔扎·古拉姆·穆尔塔扎：《奇特拉尔史》，第 128 页。

［67］苏克提婆·辛格·切拉克（Sukhdev Singh Cherak）译：《基

尔巴·罗摩迪万的古拉伯传》，第212—213页。

[68] 拉合尔再版，1978年，第105页。

[69] 事实上，赫希默杜拉·汗用的是“卡尔达尔”（Kardar）一词，他也称他们为“哈基姆”（Hakim），但早先，他却曾称其为“塔纳达尔”，似乎赫希默杜拉·汗对术语的用法比较随意。按规矩，既然军事哨所称为“塔纳”，那掌管之人就应称为“塔纳达尔”。

[70] M.K. 丹格、R.K. 考尔·帕特和桑托希·考尔：《克什米尔：宪政沿革史及文件》，第5—7页。条约全文见苏克提婆·辛格·切拉克译：《基尔巴·罗摩迪万的古拉伯传》，德里，1977年。

[71] 同上，第386页。

[72] 同上，第388页。

[73] 赫希默杜拉·汗：同上引书，第702—703页。

[74] A. 杜兰：同上引书，第283页。

[75] I.O.R. R/2（1079/249）。

[76] F. 德鲁：《印度的北部屏障》，第165页。

[77] F. 德鲁：《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第457—458页。

[78] I.O.R. R/2（1063/25）。

[79] M.L. 卡布尔：同上引书，第73—73页。

[80] 同上，第77页。

[81] I.O.R. R/2（1086/299）。

[82] M.L. 卡布尔：同上引书，第四部分，第三章。

[83] M.L. 卡布尔：同上引书，第89—90页。

[84] 同上，第100页。

[85] 同上，第六部分，第二章。

[86] A. 杜兰：《边界的形成》，第119—120页。

[87] 1928年1月12日信函，（NO. F. 103/27），I.O.R. R/2（1067/93）。

[88] I.O.R. R/2（1086/299），12页。

[89]《印度皇家地名词典：克什米尔与查谟》，拉合尔再版，1978年，第105—106页（初版于1909年）。

［90］同上，第110—111页。

［91］同上，第105页。

［92］来自政治部，新德里，1938年11月21日，R/2（1086/229）D. O. NO. D. 1324，FED-I/38。

［93］1935年11月22日，来自吉尔吉特政治代表处，信件编号No. 202-S。

［94］1898年3月10日，信件编号No. 933，吉尔吉特R/2（1076/253）。

［95］同上，第九段。

［96］I. O. R. R/2（1086/299）。

［97］R. C. 卡克记录的备注，R/2（1086/299）。

［98］I. O. R. R/2（1071/140），信函编号1935 NO. 202-S，1935年11月22日。

［99］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致西姆拉外交秘书函，R/2（1080/264）信函编号NO. 72-G，1915年6月22日。

［100］I. O. R. R/2（1071/160）。

［101］I. O. R. R/2（1085/297）。

［102］I. O. R. R/2（1066/72）。

［103］同上。

［104］I. O. R. R/2（1079/250），信函编号，NO. 1832/375，1892年8月30日。

［105］I. O. R. R/2（1081/260）。

［106］I. O. R. R/2（1086/261），NO. 649-G，1912年8月12日。

［107］I. O. R. R/2（1080/259），1911年3月25日。

［108］I. O. R. R/2（1079/255）。

［109］A. 杜兰：同上引书，第226页。

［110］信函编号NO. PB. 356-C/D. O. 1934年9月7日。

［111］M. K. 丹格、R. K. 考尔·帕特和桑托希·考尔：《克什米尔：宪政沿革史及文件》，新德里，1977年，第二章。

［112］同上，第88页。

[113] P. K. 巴姆扎依：《克什米尔史》，德里，1962 年，第 662—668 页。

[114] 比较信件 NO. D-523，C/40，1940 年 4 月 7 日，印度政府外交事务部秘书奥拉夫·卡罗（Olaf Caroe）爵士致吉尔吉特政治代表。

[115] G. L. 考尔：《艰难时世下的克什米尔》，斯利那加，1963 年，第 210—211 页。

[116] I. O. R. R/2/1084/290 - 291。

[117] I. O. R. R/2/1085，信函编号 NO. 36，1937 年 2 月 2 日，吉尔吉特政治代表致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

[118] I. O. R. R/2（1086/301）信函编号 NO. DOF 573-X/39，1940 年 3 月 7 日，致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

[119] 信函编号 NO. F28-C/40，1940 年 9 月 20 日。

[120] I. O. R. 文件编号 NO. 25-C（2）138，1938 年，这里引用的相关资料都保存在驻克什米尔特别代表办公室。

[121] D. O. NO. F-25/C/38，1938 年 9 月 30 日。

[122] D. O. no. D-192-C/38，1938 年 10 月 31 日。

[123] D. O. no. D. 224-C/38，1938 年 11 月 14 日。

[124] D. O. no. D. 1324-Fed-I/38，1938 年 11 月 21 日。

[125] D. O. no. PB-319/39，1939 年 7 月 27 日。

[126] F. 25-C（2）/38，1939 年 8 月 31 日。

[127] A. 杜兰：同上引书，第 116 页。

[128] 同上，第 120 页。

[129] 非常感激联军（退休）上尉沙·汗惠借我他尚未出版的书稿《独立斗争史》，有关侦察队的许多资料都来自此书。

[130] C. C. 特伦奇：《边境侦察队》，伦敦，1985 年，第 13 页。

[131] 同上，第 210 页。

[132] 同上，第 209 页。

[133] 尼古拉斯·曼瑟（主编）和彭德雷尔·穆恩（编辑）：《权力的移交》，1942 年—1947 年，伦敦，1983 年，第 10 卷，第 485 页。

[134] 同上，第一段，No. 254 第二段。

[135] 坎萨拉·辛格准将:《1947 年以前的吉尔吉特》，乌尔都语译本，谢尔·巴兹·阿里·汗·巴尔贾译，拉瓦尔品第，1986 年，第 9 章。

第八章　为自由而战
（1947 年—1948 年）

战争的缘起和对此的不同阐释

吉尔吉特为自由而进行的抗争（图 57）是一独立事件，尽管也受到了当时南亚政治潮流的影响，但他们一直是独自作战而且几乎是由当地人民和驻守在那里的军人独立领导的。虽然当时驻守在吉尔吉特—本吉的克什米尔土邦军队的官兵（主要是一些穆斯林军官）充当了领袖角色，但这一抗争并非如巴基斯坦[1]和印度[2]的一些叙述者所说的那样是克什米尔战役的一部分。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土邦军队被这来自全体穆斯林的呼吁所撼动。但由于地形因素的限制，他们的行动只限于北部地区。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尽力支持吉尔吉特侦察队和当地民众，为独立而战的普遍诉求激起了所有的政治热情。查谟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的卷入又是另一回事。在河谷地区，他的统治比较牢固，但吉尔吉特却是刚从英国手中接管的边境地区。因而摩诃罗阇不得不重新建立对这一地区的权威统治，包括行政和军事。在英国的权威统治结束后，摩诃罗阇如何将他以往名义上的宗主权转变为对当地罗阇和部落人民实实在在的统摄权是一个问题。这一过渡问题，我们可从摩诃罗阇派驻吉尔吉特的最后一个总督坎萨拉·辛格准



图 57　吉尔吉特独立纪念碑与晚年的阿卜杜尔·哈米德·哈瓦尔先生

将的叙述中有所了解。[3]该叙述明确指出克什米尔权威机构没有给予总督足够的支持以巩固他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他明确表明，[4]在他抵达之前，当地的吉尔吉特侦察队和穆斯林文职官员已经一致把选票投给了巴基斯坦，而且在他抵达之后，当地官员对他并不欢迎。上述证据应使我们抛弃这一成见，以为是外来因素触发了巴基斯坦的抗争，抗争仅仅是由“一群克什米尔土邦军官发动的”，只能靠他们以战争来解决。[5]因而，认为这次抗争是由这些军官发动的一次“叛乱”是一种误断，当然它也不像这些军官有时所称的那样，是一次革命。[6]军官们只想为自己赢得威信，那里没有人民运动，也没有政治党派，因而除了共同的对巴基斯坦的强烈感情和信念外，没有有组织的公众表达体系。这正如古拉姆·海德尔·汗（Ghulam Haidar Khan）中校[7]和哈桑（Hasan）上校[8]的陈述所揭示的那样，尽管哈桑上校并不希望人民参与这次抗争。

摩诃罗阇坚信当地罗阇对他的效忠将是他统治此地的保证，因而他邀请罕萨和纳格尔的米尔和布尼亚尔的罗阇前往斯利那加商谈。显然，他们对摩诃罗阇表示了外交式的效忠。[9]坎萨拉·辛格准将也如法

炮制，他在信中满怀希望地谈到罗阇们一心追随摩诃罗阇，[10]只有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公然表示他们只属于巴基斯坦。[11]据哈桑上校称，[12]布尼亚尔罗阇甚至愿意誓死保卫坎萨拉·辛格准将。根据这番表态，罗阇们都将服从摩诃罗阇的意愿，无论他决定加入巴基斯坦还是印度。这一决定似乎不太合乎情理，记得来自这些土邦的吉尔吉特侦察队的士兵和军官们，此前都已选择了巴基斯坦，军官们也都是这些土邦的罗阇和米尔的近亲。从另一方面看，当摩诃罗阇的统治陷入危险时，他们也从未捍卫过它，除了布尼亚尔的罗阇，但他也不是全心全意的。他们并不想与巴基斯坦背道而驰，只是不敢公开说明。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捍卫摩诃罗阇，那吉尔吉特侦察队不会与其抗争，甚至驻守在吉尔吉特—本吉的土邦军队也不会取得胜利。他们的袖手旁观事实上极大地支持了自由之战。这一姿态表明英国苦心为摩诃罗阇经营的对当地罗阇和米尔的宗主权威是如何的脆弱。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纷纷拥兵自重。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也一样，他希望尽可能地拓展对亚辛甚至布尼亚尔的控制范围。事实不止于此，我们从古拉姆·海德尔中校处可知，[13]吉尔吉特的沙·拉伊斯·汗也殚精竭虑地想自立为吉尔吉特的罗阇。所有这些行为都暗示着罗阇和米尔们对东山再起都自有一番谋划，以期能重建各自王族的声威。可惜，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来源仅仅是奇特拉尔统治者的一些记录。[14]

哈桑上校和古拉姆·海德尔中校都很轻视人民在战斗中的作用，对他们概不承认。在他们看来，人民是“乌合之众”。确实，那里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众组织，他们只能以口号和标语来抒发底层人民的忧患。但他们对巴基斯坦情感上的依恋并非像某些人那样是事后炮制的，无论在推翻摩诃罗阇的总督之后，吉尔吉特自由政府的首任总统沙·拉伊斯·汗在领导国家方面有多失败，他至少肯定了人民的作用，人民一直对旧日的王族忠心耿耿。此外，人民赢得的信任和支持以及领导层对他们的再次认可证明了他们的力量。关于这一方面，一些文章多有论及。[15]

如何确定驻守在本吉的克什米尔土邦军队和吉尔吉特侦察队在此次抗争中扮演的角色，再次成为一个难题。其中吉尔吉特侦察队在吉

尔吉特、吉拉斯和古比斯都有后盾，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只要有任何一方效忠于摩诃罗阇，自由运动就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取得胜利。正是两方的联手才最终决定了这一结果。依照开始的计划，吉尔吉特侦察队先去推翻摩诃罗阇的吉尔吉特末代总督，然后前去支援哈桑·汗上校对抗印度教徒和道格拉连队。但情况有变，哈桑·汗上校带着随从离开本吉前往吉尔吉特，将他的部队留在了“普布·辛格的山嘴”，由萨菲乌拉·贝格苏贝达尔（Subedar Safiullah Beg）① 指挥。据哈桑·汗上校自述，他单枪匹马前往吉尔吉特，想看看吉尔吉特侦察队围攻总督府的结果。据说，吉拉斯侦察队去了贾格劳特，杀死了驻守在此处的一个印度教徒的排，烧毁了罗摩卡特桥和普拉塔普桥。大火之后，部落人民又开始了一场袭击，从而使驻扎在本吉的道格拉和印度教徒军队万分恐慌。于是他们放弃了军火库，各自逃命。这一散布恐慌的心理战术是穆罕默德·汗·贾拉尔（Mohammad Khan Jarral）少校的杰作。[16]土邦的穆斯林连队很长时间都没有机会作战。后来，营长阿卜杜尔·马吉德（Abdul Majeed）中校和艾赫桑·阿里（Ehsan Ali）少校在前往吉尔吉特途中再次被吉尔吉特侦察队的小分队抓获，押往萨菲乌拉·贝格苏贝达尔控制下的“普布·辛格的山嘴”。甚至坎萨拉·辛格准将也被吉尔吉特侦察队的苏贝达尔沙·苏丹（Shah Sultan）抓获，从而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抗争。当时吉尔吉特的土邦政府已被推翻，土邦在本吉的驻军逐渐军心涣散，组织混乱。这一阶段的战果事实上是依靠吉尔吉特侦察队的辛勤作战才取得的。

胜利的果实应归功于谁？克什米尔土邦军队的四位军官，哈桑上校、赛义德·杜拉尼（Sayid Durrani）上校、穆罕默德·汗·贾拉尔少校和古拉姆·海德尔·汗中校都声称自己是获得此项荣誉的不二人选，都认为在哈桑·汗上校的领导下通过自己的英勇作战才有今日的胜利。而哈桑·汗上校则声称自己一直运筹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尽管到了最后，主要的战略计划已经变更，哈桑·汗上校带着随行人员到达山嘴洋房（Pari Bangla），取代了巴拉代乌·辛格（Baldeo

---

① 苏贝达尔及下文的贾玛达尔（Jamadar）均为下级军职。——译者

Singh）上尉指挥的道格拉连，吉拉斯侦察队烧毁大桥并非是他的计策，但成功的风光仍被他一人占尽。

没有史家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吉尔吉特侦察队立言，同样，他们也没有像“土邦军官”那样受到过高等教育。对于侦察队的当地首领——少校苏贝达尔（Subedar Major①）巴布尔·汗（Babar Khan，图 58）的有关事迹，他的战友——苏贝达尔萨菲乌拉·贝格（罕萨）、贾玛达尔菲达·阿里（Fida Ali，罕萨）、贾玛达尔苏丹·菲鲁兹·苏菲（Sultan Firoz Sufi，纳格尔）、沙·苏丹（纳格尔）、贾玛达尔沙·汗（罕萨，后为空军上校），他们都曾为理想而战。巴布尔·汗和他的同僚们在夜色下召开的特别会议，他们与吉尔吉特人民私下的联络，与吉拉斯和古比斯侦察队的联系，我们只能以间接的方式获知。侦察队在抗争中的作用被土邦军官贬低了。另一方面，荣誉却给了吉尔吉特侦察队的英国首领。古玛尔·玛哈金先生（S. Kumar Mahajan）[17]记述道：“坎萨拉·辛格准将被任命为总督，但没有人想到要辞退吉尔吉特侦察队和当地民兵武装的英国军官。在这位军官的吩咐下，他们逮捕了总督及一些印度教和锡克士兵，升起了巴基斯坦国旗。”关于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少校，特伦奇评价道：[18]



图 58　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1947 年至 1948 年间吉尔吉特侦察队的领袖

① 一种地位较高的军职，为一级副王委任军官，相当于英王委任军官的少校，有相当大的权力。暂译为“少校苏贝达尔”。——译者

> 吉尔吉特的命运似乎要依靠威廉·布朗少校，……可以确知的是他年方24岁……曾在奇特拉尔和多奇（Tochi）侦察队短暂服役，在吉尔吉特侦察队待了三年。一个高瘦黝黑、像骑兵般微驼的侦察兵，他很爽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因为他喜欢在吉尔吉特的生活，喜欢当地的人们并感到一位经验丰富的英国军官将会有助于过渡时期事务的处理，使局势尽快稳定。[19]

甚至随同摩诃罗阇的总督坎萨拉·辛格准将派驻此地的更富经验的克什米尔土邦军官赛伊德·杜拉尼上校到达后，布朗仍把持着吉尔吉特侦察队的指挥权。于是布朗和杜拉尼之间开始了权力争斗，后者开始驻守吉拉斯，后来又去了卡兰达尔奇。之后我们将看到布朗如何老谋深算地赢得了坎萨拉·辛格准将的好感，在吉尔吉特革命后，又取得了巴基斯坦临时政府的信任，不仅被吉尔吉特侦察队释放，[19a]而且成为1947年12月1日在吉尔吉特成立的吉尔吉特自由政府的顾问。据哈桑上校所说，布朗和巴布尔·汗不和，布朗竭力想排挤巴布尔，但未得逞。据说在革命开始的那天，即1947年10月31日，布朗曾被囚禁，但由于古拉姆·海德尔·汗中校的求情，[20]又被释放。

确实，在1947年前，这里从未有过有名号的政治团体，因为这不被允许。不过几乎可以确定的是，随着独立日的到来，人民对巴基斯坦的感情也与日俱增。相关事实可以证明，文武官员选择巴基斯坦是当地人民情感的首次表现。然而，当时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机构带领他们实现向往的目标，除了通过吉尔吉特侦察队和当地罗阇。但当地罗阇除了奇特拉尔迈赫塔尔公开捍卫巴基斯坦外，其他人都各怀心计地玩外交游戏。[21]奇特拉尔资源丰富，这大大彰显了奇特拉尔统治者和奇特拉尔侦察队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除了对推动革命爆发起了一定的作用的沙·拉伊斯·汗外，还有一些教师和商人，如穆罕默德·阿里·巴尔巴里、艾米尔·贾汉达尔·沙，后者志愿与其他的军队，甚至与巴基斯坦联络。这些志愿者肯定为独立

事业作出了贡献，虽然哈桑上校在自传中没有提到他们的重要事迹，他只提到了穆罕默德·阿里·扎瓦尔（Mohammad Ali Zawar），他在革命开始的那天承担了巴布尔与哈桑上校之间的联络工作。

对吉尔吉特抗争的叙述版本各异，但总是渲染某一人的作用，而真相总是从多维角度才能看到。大人物确实对吉尔吉特的独立作出了贡献，但独立并非是他们放在托盘上赐给当地人民的。人民普遍要求加入巴基斯坦，但除了通过吉尔吉特侦察队和驻扎在此地的克什米尔土邦军队的穆斯林连之外，他们没有别的途径。他们联合起来推翻了土邦在这里的地方政府，成立了吉尔吉特自由政府，并选沙·拉伊斯·汗为总统。

关于这场抗争的一些著作，无论已出版的或未出版的，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部分著作都与1947年—1948年的军事行动相关，一般都是非巴基斯坦军官从他们的私人角度进行阐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抗争的策划者之一和主要领导人哈桑·汗·罗诺（Hasan Khan Rono）上校的著作，其中收集了他的一些论文和历史短评。其次是联军上尉沙·汗的“解放之研究”，也收集了他的论文，他自己也是抗争的一分子。这些文章曾刊登在《无畏》周刊（Bebak，现已停刊）上，主要描述了三位不同凡响的人物：哈桑上校，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以及沙·拉伊斯·汗。其他一些重要的资料就是古拉姆·海德尔中校的日记，他是独立战争爆发时吉尔吉特侦察队的总指挥。他的日记记录了攻占吉尔吉特以及随后在吉尔吉特建立临时政府的相关细节。首位试图撰写这一时期军事史的是西甘达尔·汗（Sikandar Khan）少校，书名为《北部地区（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的解放》。[22]

他从一个巴基斯坦穆斯林的角度进行阐述。但出版的官方的军事历史著作则题为《这次克什米尔战役，1947年—1948年》。[23]同时有两本具有可比性的著作出版：（1）《巴尔蒂斯坦一瞥》；[24]（2）《喀喇昆仑—兴都库什》一书中的若干文章。[25]前书叙述了人民在抗争中的地位，后一本书仅限于对军事行动的记叙，因而大部分内容是基于军官们的观点之上的。在后一本书中，曼祖姆·阿里（Mazoom Ali）写的文章记录了被誉为抗争英雄的哈桑上校的许多事迹。看来，所有这

些由巴基斯坦人编写的史料在印度都无法看到。坎萨拉·辛格准将的自述从修史角度来看是非常粗陋的，他的论文也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修订。F. M. 哈斯纳因（F. M. Hassnain）[26]的书仅查阅了克什米尔土邦的一些论文，从未参考保存在印度官方资料库中的英国人所做的记录。他有关吉尔吉特独立运动的叙述以道听途说的传言为依据。古玛尔·玛哈金的书对巴基斯坦人撰写的军事史作了一次很好的更正，但只包括了后期的吉尔吉特独立运动。[27]因此，要重构1947年—1948年吉尔吉特独立运动的历史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一些依然健在的参与者在访谈中总是过分夸大自己在抗争中的作用。[28]

摩诃罗阇的准备与防卫

F. M 哈斯纳因[29]仔细考察了此地行政规划的沿革。直到1901年，那里只设立了统一的边境县瓦扎拉特（Wazarat of Frontier District）——克什米尔应用于这一地区的政治术语。就在这一年，它被划分为吉尔吉特瓦扎拉特和拉达克瓦扎拉特。吉尔吉特瓦扎拉特包括吉尔吉特和阿斯托尔两个区（Tehsil）和本吉的尼阿巴特（Niabat），后者包括了哈拉毛希山脉的大片地区。吉泽尔归入亚辛和古赫（Kuh）。这些地区的司法权由吉尔吉特政治代表和他在吉拉斯、吉泽尔、古赫、伊希戈曼的助理行使。因而“仍在土邦控制下的吉尔吉特特区只有吉尔吉特和阿斯托尔两区以及本吉的尼阿巴特”。[30]1935年条约订立前，特区的形势如下：

> 包括亚辛、吉泽尔、古赫、伊希戈曼的胡什瓦格特诸区（Khushwaqt districts）尽管有各自的总督管理，其实都处于吉尔吉特政治代表的控制之下。1896年，伊希戈曼已从亚辛分割出来，由一位地方总督独立管理。接着，1905年前一直由独立总督管理的吉泽尔归入亚辛和古赫地区。但在1912年，这三个土邦的统一规制再次被打破，分成亚辛、吉泽尔和古

赫。后来，吉拉斯也成为政治特区的一个分区（Subdivision），由政治代表的助理管理。米尔统治的军萨和纳格尔土邦则一直处于吉尔吉特政治代表的控制之下，被视为摩诃罗阇领土一部分的布尼亚尔于1908年划入政治管区（Political districts），也处于吉尔吉特政治代表的控制之下。最后，用吉尔吉特的瓦齐尔的话来说，政治管区已“成为一片禁地，那里不许任何土邦的官方机构干涉，民众已忘记了查谟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土邦政府也逐渐放弃了对那片地区的任何控制。[31]

至于奇特拉尔，1914年4月2日签订的旧条约依然生效，但随着穆罕默德·纳西罗尔·穆尔克于1936年就位为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情况开始改变，F. M. 哈斯纳因总结道：“与奇特拉尔迈赫塔尔签订的新条约包括以下条款：英属印度政府每年给迈赫塔尔28000卢比的拨款，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每年拨给他8000卢比。英属印度政府甚至将他扶植为印度统治首领中的一位重要人物，鼓励他去访问海德拉巴的尼扎姆（Nizam）① 和印度其他土邦，他在那里受到款待和尊敬。自然，这些荣誉使他的思想有所转变，他开始考虑与查谟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以更平等的地位缔结新的条约关系。”[32]1939年，当迈赫塔尔访问克什米尔时，F. M. 哈斯纳因记述道：

他（迈赫塔尔）提起摩诃罗阇兰比尔·辛格曾将亚辛、吉泽尔、伊希戈曼地区赐予他的后代作为礼物，以表彰前任迈赫塔尔和他的军队在平定吉尔吉特动乱时的功绩。这些地区中只有一部分交给了他，其他的一直在吉尔吉特特区管辖下。他接着建议鉴于他对帮助土邦平定吉尔吉特动乱的理解，摩诃罗阇应像以前一样每年拨款给他，他进一步提出为了履行他的义务，他不得不供养军队，所以有必要提高拨款数额。

① 海德拉巴土邦统治者的称号。——译者

> 以上清楚表明迈赫塔尔在向摩诃罗阇索要帮助他维持法纪的报酬。迈赫塔尔还提出鉴于他的地位已不同往日，应享受11响礼炮并加封殿下的世袭名号，他应与查谟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平起平坐，新条约的签订应以此为前提。[33]

但随着吉尔吉特于1935年租借给英国政府以及1939年9月战争的爆发，新条约已不可能付诸实行。奇特拉尔迈赫塔尔依然要求对租借给英国的那部分领土享有权利，这成为1947年—1948年吉尔吉特抗争中争议的焦点。

F. M. 哈斯纳因没有指明根据1935年条约租借给英国的实际领土，第一段提到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吉尔吉特省的瓦扎拉特（后来称此为‘上述领地’［said territory］）和印度河右岸以上地区的军事和行政权”，他接着写道：“随着1935年的租借契约的废止和英国统治的终结，整个地区无论属于吉尔吉特瓦扎拉特还是吉尔吉特特区，都归入摩诃罗阇控制之下，像以往一样，他通过与瓦扎拉特和特区的米尔和首领们建立直接联系以实现他的控制”。[34]

他没有说明为何整个地区将回到查谟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却指出：

> 土邦政府匆匆开始了有关移交事宜的商谈。引起争论的是租借前的吉尔吉特瓦扎拉特，它事实上与土邦的其他瓦扎拉特的性质相同，包括了吉尔吉特区和阿斯托尔的尼阿巴特。随着土邦的跨印度河流域的领土的回归以及英国在此地区的统治的终结，已不可能从它以前的历史基点出发来处理这片土地。鉴于它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土邦政府将在未来直接实施对它的管理，直接处理与当地米尔和首领们的关系，这部分土邦领土应以总督治理的形式来处理，并称之为边境省。似乎土邦政府可能会对英国政府建立的管理体系进行调整，必要时还会进行一些改革……土邦政府已同意接管整个侦察队并接收在吉尔吉特工作的所有愿意遵守土邦法规的

雇员。[35]

土邦的如意算盘暴露出它专制的一面，这我们可从吉尔吉特文武官员一致选择巴基斯坦一事上看出。

巴尔蒂斯坦的情况则不同。[36]1840年，当道格拉军占领巴尔蒂斯坦时，将它划为一个分区（Subdivision）即“卡尔达里”（Kardari），派了一名卡尔达尔（Kardar）驻守斯卡杜。波里格也归入这一分区，在格尔吉尔派驻了一位塔纳达尔。1899年，巴尔蒂斯坦成为边境县（Frrontier district）的一部分。1901年，独立的拉达克县（District）建立，巴尔蒂斯坦并入此地。斯卡杜成为这个县的冬都，由一位瓦齐尔瓦扎拉特（Wazir-i-Wazarat）管理。该县包括三个区（Tehsil）——列城（Laiyya）、格尔吉尔和斯卡杜。瓦齐尔瓦扎拉特在斯卡杜住六个月，在格尔吉尔住三个月，在列城住三个月。他集征税官、县行政长官（District Magistrate）、县法官（District Judge），开庭法官（Session Judge）和警长（Superrintedent of Polis）于一身。事实上，他在此地还代表摩诃罗阇享受七响礼炮的待遇。道格拉军占领此地后，派驻了100名士兵，1842年独立战争后，又增加到300人。之后，从1899年开始，仅剩下50人的一个排驻守在此，由一位少校或上尉率领。在克尔福久堡部署了11个人和两门大炮。

坎萨拉·辛格在他的书的第二部分[37]提到了摩诃罗阇违背当时的总理R. C.卡克的意愿任命他为吉尔吉特总督的经过。在授职前，他是土邦的准将。准将非常希望能摆脱指挥吉尔吉特侦察队的英国军官的影响，但他没有做出决断。这一任务就留给了土邦军队总司令斯科特（Scott）少将，他将同准将一起前往吉尔吉特。他本来准备于1947年7月21日就前往吉尔吉特，但当时没有飞机，所以到31日才抵达吉尔吉特。去吉尔吉特前，他已从政治部获知所有曾服务于英国的官员都选择了巴基斯坦。土邦曾在当地任命一些文职官员，但他们仍然选择加入巴基斯坦。尽管如此，准将仍被告知将从列城调斯利·沙·德瓦·辛格（Shri Shah Deva Singh）去他那里任吉尔吉特的区长（Tehsildsr），派拉拉·汉萨·拉杰任卫生官员。他还从政治秘书希亚姆·拉尔

（Shyam Lal）处得知吉尔吉特侦察队的一些成员和一些文职官员决定出走，脱离土邦的政府机构，他们已预先筹到了旅费。然而，准将仍勒令阿斯托尔的财政助理努尔·阿里·汗（Nur Ali Khan）罗阇与驻守拉多的第五查谟和克什米尔连指挥官杜尔加·辛格（Durga Singh）上尉于1947年8月1日前来吉尔吉特向他汇报工作。7月30日晚，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和吉尔吉特侦察队的一些低级官员去见他和总司令，坦白地告诉他，他们已选择了巴基斯坦。然而，他们又提出为土邦服务的下列12项要求（见下文）。第二天，所有的文职官员又去见他，说他们已决定为巴基斯坦效力。如果增加他们的薪水，他们将为土邦效力，否则，除小部分外地官员外，他们将同时罢工。坎萨拉·辛格准将的书中提供的信息使整个问题明朗化了，并证明了当地人民对巴基斯坦的感情，从而有力地驳斥了土邦军队的穆斯林军官的观点，他们竭力宣扬选择巴基斯坦是他们首先提出的。

吉尔吉特侦察队的请愿书

致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摩诃罗阇巴哈杜尔殿下：

经由吉尔吉特军事人员首领

上呈殿下

我们吉尔吉特侦察军团谨以无上的敬意将我们的下列请求上呈殿下，恳请殿下体恤下情予以恩准——

1. 吉尔吉特侦察队请求享有与其他土邦军队同等的待遇，和其他军队一样接受正规训练，享有克什米尔政府正规军享有的一切特权和装备。为此，我们将乐意为我们驻守的所有地区效力。

2. 如果我们驻守在吉尔吉特省，殿下应慷慨地向我们支付边境津贴，当我们应召去寒冷地区服务时，应提供给我们御寒衣物。

3. 我们从1935年起就开始为殿下效力，请根据以往的服役支付给我们养老金。

4. 我们的军力日渐衰弱，因为人员太少而难以应付指派的任务，

故请求增强军力以确保每位士兵能轻而易举地履行义务。而且，吉尔吉特地区交通不畅，一旦在这一地区出现问题或动乱，军队将难以及时赶到那里平定叛乱。为了守卫这些多事之地，除了常备驻军外，还应增设季节性驻军。因此，增强军力是根本问题。对此已提供了说明。

5. 侦察队从一处哨卡转往位于这一地区的另一处哨卡时，往往历经艰险，因而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军事运输系统，可由吉尔吉特驾驶兵管理。

6. 吉尔吉特侦察队各级人员在未受到任何明确指控的情况下便可被辞退。如果有人违反了规定，请通过军事法庭进行适当调查，或依据土邦军规予以宽大处理，由税务官给予惩罚。

7. 任何印度官员在他的退休金还未达到总务处核定数额之前退职，请支付给他全额退休金。少校苏贝达尔退职后应授予他荣誉勋章。

8. 请提升有能力的侦察队成员至相应官阶。

9. 任何“纳依克”（Naik）[①] 以上的官员退休后均可免服无偿劳役。

10. 请给他们的孩子安排教育事项。

11. 所有在军队服务的职员应加封军阶，但文职人员不得加入，事实证明军队中的文职人员有害无益。所有的委派应严格遵守军事法规。

12. 随从人员不应是私人的，而应纳入公共体系。

我们恳切地希望殿下慷慨地接受我们这低微的请求。

……殿下忠诚的臣子
少校苏贝达尔穆罕默德·巴布尔·汗
暨吉尔吉特侦察队全体官员
1947 年 8 月 1 日

第五克什米尔步兵营的杜尔加·辛格上尉率领他的连队曾去本吉并占领了上部地区，后来他的连队被 9 月 1 日离开斯利那加并于 1947

① 一种低级军职。——译者

年9月10日到达本吉的哈桑·汗上尉（后为上校）的连队接替。那时奈格·阿拉姆（Nek Alam）率领的第六克什米尔步兵营C连刚到本吉不久。据哈桑·汗上校说，他很有“国会头脑”。[38]奈格·阿拉姆占领了本吉的下部地区。第六克什米尔步兵营又于9月第四周到达本吉，由阿卜杜尔·马吉德·汗·杜拉尼中校指挥。据哈桑·汗上校记载，这个营是派来与他作对的。当全营官兵抵达时，奈格·阿拉姆带着一个排被转移至斯卡杜，而该连的其他两个排在苏贝达尔穆罕默德·阿里（后为中尉）的领导下仍驻守本吉。这个营包括五个连：A连和B连是锡克和道格拉兵，分别由巴尔代乌·辛格上尉和苏克·德乌·辛格（Sukh Deo Singh）上尉带领，C连和D连全是穆斯林士兵，分别由奈格·阿拉姆上尉和哈桑·汗上尉带领。指挥连（Headquarter Company）则是混合型的，由巴尔莫特·辛格（Parmut Singh）上尉率领。后来又指派艾赫桑·阿里少校率领指挥连。营中的锡克连被派去驻守拉达克的列城。

吉尔吉特的另一支武装力量便是吉尔吉特侦察队。他们的总体意愿，我们可从坎萨拉·辛格准将处获知，前面已有论述。准将希望摆脱吉尔吉特侦察队指挥官中的英国军官，但看来一贯与他对立的土邦总理已决心留下他们，而且毫无商量的余地。C.C.特伦奇对此解释说：

> 1947年初夏，一系列重大事件相继发生，正是这些事件导致后来这惊人的局势，当时军事当局和克什米尔政府正寻访一位英国军官去帮助吉尔吉特侦察队度过艰难时期，吉尔吉特侦察队正面临独立战争和内部分裂的难关。也许他们本想找一位年龄稍长的，但那时这样的人很难找，于是重担就落到了年轻的W.A.布朗少校肩上。[39]

尽管如此，土邦政府又派了三位官员——赛义德·杜拉尼上尉（后为上校）、古拉姆·海德尔·汗中尉（后为中校）和穆罕默德·汗·贾拉尔中尉（后为少校）——进入吉尔吉特侦察队。赛义德·杜拉尼上尉

与新任总督[40]一起到达吉尔吉特，另两位随后才到。穆罕默德·汗中尉于 1947 年 8 月 8 日到达吉尔吉特，他成为侦察队的副官和军需官。10 月 15 日，他离开侦察队，被派往本吉。[41]他离开后，古拉姆·海德尔·汗中尉成为军中的军需官。

在巴尔蒂斯坦，[42]阿玛尔·纳特（Amar Nath）是拉达克和斯卡杜的瓦齐尔瓦扎拉特。瓦齐尔在格尔吉尔、拉达克和斯卡杜为飞机选择着陆场。1947 年 7 月，克什米尔土邦军队第六营 C 连一个排的 50 人，由穆罕默德·丁（Mohammad Din）少校率领，被派往斯卡杜。克里山·辛格（Krishan Singh）上尉为第二指挥。然而，穆罕默德·丁少校在斯卡杜秘密为巴基斯坦工作。真相泄露后，他于 1947 年 10 月 15 日被调走。奈格·阿拉姆从本吉调来，以接替他的位置。谢尔·姜格·塔巴少校（Sher Jang Thapa，后升为中校）随同甘加·辛格及 85 名锡克士兵从列城被调往斯卡杜。[43]塔巴（后以准将退役）成为拉达克和斯卡杜的驻军司令。塔巴计划撤军至格尔吉尔，随同行政机构一起，在那里建立起稳固的基地。但瓦齐尔瓦扎拉特不同意他的撤军计划。[44]

吉尔吉特侦察队起初的作用

吉尔吉特侦察队以往的历史，我们已在上一章论及。至于目前的形势，可从摩诃罗阇哈里·辛格的决议中得知一二：

> ……吉尔吉特侦察队几乎百分之百由穆斯林组成，有必要将侦察队逐步裁减，以便抢先一步阻断穆斯林武装反对在建政府的可能性。现在驻守在家乡吉尔吉特的穆斯林军官艾赫桑·阿里少校无意间从斯利那加一位道格拉高官处听说吉尔吉特侦察队不久将遭解散，因为他们对摩诃罗阇的忠诚受到怀疑。[45]

这一消息经格里姆·汗罗阇泄露给了侦察队，他当时驻守斯利那

加。我们得到进一步的信息说：

> 目前驻守在本吉的土邦军队第六查谟和克什米尔步兵营将向吉尔吉特侦察队营地所在的吉尔吉特军营进发，进而可以肯定的是将解除所有哨卡的侦察队的职务。这将会导致两个结局：解散军队，或者即使保留下来，也只是被降级为二等的非正规民兵团，听命于土邦军队。无论哪种结果，都意味着 VCO 们将失去他们的个人威望，失去他们曾由此享受的无上权力和特殊待遇。[46]

从印度的一些资料中无法证明摩诃罗阇曾有此意图。不过即使这一想法在初期非常普遍，那后来也一定被放弃了，既然指派了两位英国官员入驻吉尔吉特侦察队。哈桑上校在他的书中驳斥了将第六步兵营转去吉尔吉特军营的传言。[47]

然而，吉尔吉特侦察队的感受已众所周知。他们采取行动的目的并非如曼祖姆·阿里认为的仅仅是为了“加薪”。[48]西甘达尔·汗少校对他们的疑问做了如下精辟的概括：

（a）随着土邦军队的出场，吉尔吉特侦察队未来将扮演何种角色？

（b）VCO 们同土邦军队的 JCO① 们相比将具有怎样的身份？

（c）既然吉尔吉特营地的兵营属于吉尔吉特侦察队，为何要将它移交给土邦军队？[49]

保存在吉尔吉特专员办公室的记录确证了西甘达尔·汗少校的意见，[50]该记录对两大问题——政治的以及那些有关侦察队供职的问题都有提及。布朗少校 1947 年 8 月 11 日致斯科特少将的密函中仅提到了供职问题：

> 总之，我认为吉尔吉特侦察军团是民兵组织，但历史证明他们在履行职责、执行常规任务，以及参与省的事务管理

① Junior Commissioned Officer 的缩写，即“低级的持有委任状的军官”。——译者

方面，无愧于一支标准的正规军队。如果经我的劝告，有人仍不愿意继续从事这一非正规的服务，那他们大可去别处淘金。希望参加现有民兵的人很多，此时招募新兵填补空缺，相信会有很多人踊跃参加。

如我们一致同意，我将通过总督将详情转呈以便他现在就能加注自己的意见，省却一次通信往来。我热切期盼尽快对此事有一明确态度以免军心动荡。

布朗的这番建议与赋予吉尔吉特侦察队的职责相符。C. C. 特伦奇指出，正是在特罗特（Trotter）时期，吉尔吉特侦察队才从兼职转为全职，土邦军队于1935年撤出吉尔吉特转到本吉，当时随着租借之事，吉尔吉特特区已完全由英国人统治。因而，侦察队成了职业军队。[51]特罗特之后，罗西·米拉奈斯（Rosy Milanes）领导吉尔吉特侦察队，他的下级正是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C. C. 特伦奇这样描述他：

他是最具雄才大略及个人魅力的本土军官之一。大约五英尺二英寸高，魁梧，一头金发，有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举止文雅，颇具贵族气质。他是纳格尔人，姐姐嫁给罕萨的米尔为妻，于是他左右逢源，成为两个土邦的宠儿。与众不同的是他的权力来自他的声望，而非依仗权势，因而他是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C. C. 特伦奇进一步指出：[52]

第二个因素就是地下解放阵线的存在（这一消息是布朗从他的随从处得知的，而不是像众人认为的那样，是从侦察队的苏贝达尔处得知的），阵线的主要领导人表面上对巴基斯坦效忠，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真正瞄准的目标是利用时机获取完全的独立。他们建议废黜米尔和罗阇——除了侦察队外，他们是唯一的延续和治理国家的力量——其中一位策划

者发誓要将他们绞死在吉尔吉特大桥上。在阵线诸领导人中，有一位才华横溢、颇具影响力但又工于心计的人物，即侦察队前任苏贝达尔沙·拉伊斯·汗，他是吉尔吉特罗阇的亲戚，在当地侦察队和驻守本吉的穆斯林连中有众多的拥护者，但不知具体人数有多少。[53]

特伦奇文中传达的信息已清楚表明，布朗不是吉尔吉特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同时也揭示了以沙·拉伊斯·汗为领导的可能在吉尔吉特发生的地下运动。布朗是从他的随从处得到这一信息的，但它并非完全真实可信。在吉尔吉特，侦察队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据空军上校沙·汗所述，在吉尔吉特，吉尔吉特侦察队才是最初的行动者。他写道：

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和我都来自罕萨和纳格尔的王族，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总部目前八位 VCO 中的六位不是来自罕萨就是来自纳格尔，而且他们彼此之间团结一致，肝胆相照。当土邦军队即将抵达的传言四起时，我们召开了一次协商会，会议决定将我们的请求提交给坎萨拉·辛格准将。

沙·汗对请求的内容做了一番描述，是有关侦察队的服役和身份问题，据他说，坎萨拉·辛格准将接受了这些请求，但斯科特少将却对侦察队的身份不予承认。结果如何，可从沙·汗的记述中得知：

在9月的最后一周，我们又召开一次协商会。由少校苏贝达尔穆罕默德·巴布尔·汗主持。斯科特将军的态度已使我们倍感烦恼，而巴基斯坦国的建立，在克什米尔对穆斯林的屠杀以及穆斯林的起义，都促使我们揭竿而起反抗道格拉人。我们仔细分析形势后决定以武力推翻外来的统治政权，同时决定尽快加入巴基斯坦。因此，一场有计划的抗争，实质上是独立自由运动，就此爆发了。这次会议做出了上述决

定，并制定了下列行动措施：

(1) 这次独立运动将继续对本地人民保密，也对本地的米尔和罗阇们保密，尽管他们是我们的亲戚。

(2) 可将真相告知驻守前哨的VCO们，一旦赢得他们的支持，他们手下的士兵也将自动归附。

(3) 尽可能拉近与巴基斯坦政府的距离以寻求他们的帮助。

(4) 秘密与团队的穆斯林军官和驻守本吉的土邦军队联络，说服他们加入战斗。

毫无疑问，大家必须明白，这是第一次会议，此次会议中做出了解放吉尔吉特的决定，这次运动的灵魂人物有两位：少校苏贝达尔穆罕默德·巴布尔·汗和在下，如果没有我们，这次运动将烟消云散。[54]

沙·汗提供了归附他们的侦察队的详细人数。有两位VCO开始没有加入，后来也与他们并肩作战了。据他说，其次，他们与古拉姆·海德尔中尉（后为中校）取得联络，后来又联络上了赛义德·杜拉尼上尉（后为中校）和哈桑·汗上尉（后来的上校），一位特使——吉尔吉特侦察队的艾米尔·贾汉达尔·沙（Amir Jahandar Shah）被派往阿博塔巴德，致函巴基斯坦寻求援助，但未见回音。

少校苏贝达尔穆罕默德·巴布尔·汗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他在1947年初就在思考独立主权的问题，并与侦察队中的其他三人进行了探讨。据他说，以下三人在起初没有加入：

(1) 苏贝达尔阿扎姆（Azam，伊希戈曼）

(2) 苏贝达尔谢尔·阿里（Sher Ali，亚辛）

(3) 苏贝达尔贾姆希德（Jamshed，罕萨）

以下几位都表示支持这一运动，并宣誓效忠：

(1) 副苏贝达尔沙·汗（后为空军上校，罕萨）

(2) 苏贝达尔古拉姆·穆尔塔扎（Ghulam Murtaza，罕萨）

(3) 副苏贝达尔菲达·阿里（Fida Ali，罕萨）

（4）副苏贝达尔萨菲乌拉·贝格·苏丹（罕萨）

（5）苏贝达尔江·阿拉姆（Jan Alam，纳格尔）

（6）苏贝达尔苏丹·菲鲁兹（Sultan Firoz，罕萨）

（7）副苏贝达尔沙·苏丹（纳格尔）

（8）副苏贝达尔费尔道斯·阿里（Firdaus Ali，吉尔吉特）

（9）副苏贝达尔沙·扎曼（Shah Zaman，布尼亚尔）

（10）副苏贝达尔阿克巴·侯赛因（古比斯）

（11）副苏贝达尔伊斯玛仪（Ismail，纳格尔）

少校苏贝达尔穆罕默德·巴布尔·汗在文中写道，1947 年 8 月 14 日后，他通过电报局主管巴希尔·阿里（Bashir Ali）拍电报给巴基斯坦的穆斯林领导人请求帮助，但没有回音。后来，艾米尔·贾汉达尔·沙被派去找穆罕默德·阿里·真纳请求帮助，却得到如下答复：

"对你们的情况我们感同身受。愿真主保佑你们取得胜利。自力更生吧！我自己也已陷入困境。已有 140 万穆斯林同胞被杀害。我们恐怕无法为你们提供任何帮助。"

然后，少校苏贝达尔穆罕默德·巴布尔·汗提到了他起初与培根（Bacon）中校（英国政治代表）的会晤以及后来与坎萨拉·辛格准将的会晤，当时提交给他的请愿书上列出了 14 项要求，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接着，他还谈到了在坎萨拉·辛格准将的命令下进行的宣誓仪式，但侦察队在他们所提的要求未得到满足前拒绝宣誓。之后，他提到了与克什米尔土邦军队的穆斯林军官联络以及与他们结成秘密同盟的情况。[55]

侦察队首脑趁着夜色在吉尔吉特之外靠近艾姆贾里（Amchhari，瑙布拉河和朱迪亚尔河）[56]的图伯贾尔（Thup-Chhar）召开秘密会议。但没有留下有关这次会议情况的任何记载，只知道会议做出的所有决定都获得了一致通过。

人民的参与

我们在上文已引用古拉姆·海德尔的论述证实了人民要求回归巴

基斯坦的热情，在该论述中，他讲述了从古雷兹进军吉尔吉特的亲身经历。我们在上文已引用了C. C. 特伦奇有关沙·拉伊斯·汗领导下的地下解放运动的论述，以及少校苏贝达尔穆罕默德·巴布尔·汗利用穆罕默德·阿里·巴尔巴里赢得人民的支持，大力号召人民为巴基斯坦而战。当时驻守吉尔吉特的克什米尔土邦军官甚至对这场民众运动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空军上校沙·汗也没有发表任何高论。曼祖姆·阿里在讲述他的贡献时对人民的参与情况只字未提，只在不经意间透露[57]出巴布尔·汗一直与人民保持着稳定联系。曼祖姆·阿里在他的记述中竭力将哈桑·汗描述为抗争英雄，将所有创业的功劳都归于他，因而，他的记述必然服务于这一目的。只有沙·拉伊斯·汗提到了敢死者组织（Tanzim-i-Sarfaroshan，当时的革命团体）并称他自己是领导者，[57a]他还提到了驻守在不同岗位的500名志愿者。但作者在吉尔吉特做了一番民间调查，并在卡拉奇访问了穆罕默德·阿里·巴尔巴里，得到的信息却出入甚大。是否存在过敢死者组织这样一个团体，还很难说，但少校苏贝达尔穆罕默德·巴布尔·汗确实进行了一些宣传活动。根据毛尔维·拉齐乌尔·拉赫玛特（Maulavi Raziur Rahmat）——他以前是吉尔吉特一所学校的校长，现在是一家书店老板——的观点，敢死者组织除了他以外，还包括以下成员：

穆罕默德·阿里·巴尔巴里,穆罕默德·齐尔·乌拉,穆罕默德·纳金,阿里·玛达特,乔赫尔·阿里,吉拉斯的格达姆·汗,马斯特·塔依贡，蒙希·菲达·阿里，马斯特·道拉特·沙。

根据沙·拉伊斯·汗在《无畏》周刊登载的文章，乔赫尔·阿里（Jauhar Ali）是一位收发员，他被坎萨拉·辛格收买，后者许诺封他为警官。毛尔维·拉齐乌尔·拉赫玛特则坚决表示有时也在他家召开会议。对这样一个秘密团体，很难进行明确的考察和界定，除非能得到尽可能客观真实、并经得起推敲的信息和资料。尽管如此，有一点还是很清楚的，某种政治意识在人民当中已普遍蔓延。一些人已率先自发组织起来。他们的热情空前高涨，以至在革命的最后几天，聚集在马球场表达自己的意愿。有可能正是民众的呼声，才使军方领导人接受沙·拉伊斯·汗为吉尔吉特自由政府的总统。

克什米尔土邦军官联盟

土邦军官分成三队，于不同时间到达吉尔吉特地区。第一队有三名军官——赛义德·杜拉尼上校、古拉姆·海德尔·汗中尉、穆罕默德·汗·贾拉尔中尉，他们都不是本地人，但都是吉尔吉特侦察队的支持者。虽然他们与侦察队的英国指挥官威廉·布朗少校有很大的分歧，但在哈桑·汗上尉激励他们之前，他们似乎并未率先为加入巴基斯坦采取任何行动，于是他们自然视哈桑上尉为先导。第二队包括两位本地军官，他们是吉尔吉特人，但在土邦军队服务，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立过战功，他们就是哈桑·汗上尉和艾赫桑·阿里少校，但只有哈桑·汗上尉从一开始就热情拥护巴基斯坦，甚至在斯利那加向本吉进军的途中，喊出要求加入巴基斯坦的口号。艾赫桑·阿里少校很晚才来到吉尔吉特，可能对这一运动没有意识，但后来，他在巴尔蒂斯坦独立战争中立下了战功。第三队非本土军官中的奈格·阿拉姆上尉很受哈桑·汗上尉赏识，认为他很有“国会头脑”。他起初反对这一回归巴基斯坦的大业，后来被调往斯卡杜取代穆罕默德·丁少校。在那里，他开始为巴基斯坦效力，后来在隆多战役中，与一些自由斗士联手并参加了其后的所有斗争。哈桑·汗上尉列出了与他并肩作战的同僚的名单。他们是纳迪尔·阿里中尉、博斯坦·汗、穆罕默德·阿里、穆罕默德·阿明·拉托尔和道斯特·穆罕默德。哈桑·汗上尉称瓦齐尔拉舒为他的先祖（见本书第六章“塔拉汗王朝的第五阶段”及“塔拉汗王朝的第六阶段”两节），以他为起点对自己的世系作了一番追溯。

哈桑·汗上尉谈到成立了土邦穆斯林军官革命委员会，将为解放克什米尔而战，他被推选为主席。成立这一委员会是为克什米尔的武装革命服务的，因而只有下级军官加入，一些高级军官不愿加入。据哈桑·汗上尉所述，委员会的目标是一旦英国撤出，他们就推翻摩诃罗阇投奔巴基斯坦。但革命已不可能在克什米尔进行，因为秘密泄露

后，军官们被调往他处。如前所述，哈桑·汗上尉在9月初到达本吉，受阿卜杜尔·马吉德·汗·杜拉尼中校领导。在本吉，还有古拉伯·丁（Ghulab Din），他是营长阿卜杜尔·马吉德中校的贾玛达尔书记官（Jamadar Head Clerk），起初他告诉哈桑·汗上尉，他与营长和巴拉代乌·辛格上尉被邀参加于10月中旬（1947年10月15日）在吉尔吉特举行的周年庆典。这场庆典其实是一场军事表演，旨在展示摩诃罗阇军队的威力，以震慑当地人民，使他们惶恐臣服。哈桑·汗上尉记述道，他正是在这次政治会议上遇到了穆罕默德·赛义德·杜拉尼上尉、穆罕默德·汗·贾拉尔上尉和古拉姆·海德尔中尉。通过他们，他还结识了少校苏贝达尔穆罕默德·巴布尔·汗。他们一见如故，立刻结成了一个团体。据哈桑·汗上尉记载，以下几项决定就是在当时做出的：

（1）哈桑·汗上尉任第六克什米尔步兵营和吉尔吉特侦察队指挥官，并全权负责此次行动。

（2）赛义德·杜拉尼上尉是此次行动的副指挥，将在哈桑·汗上尉的指导下指挥侦察队。

（3）我们要等时机成熟，切不可轻举妄动，直到摩诃罗阇正式宣布归入巴基斯坦或是印度。

（4）如果摩诃罗阇选择了巴基斯坦，则一切行动均将取消。

（5）如果摩诃罗阇选择印度，那这一天将成为吉尔吉特和本吉独立运动开始的标志。

他们还计划囚禁吉尔吉特总督，然后，侦察队前往本吉帮助哈桑·汗上尉制服那里的印度教徒连。下一步行动，吉尔吉特地区由古拉姆·海德尔中尉领导，至于本吉地区，开始时由纳迪尔·阿里中尉领导，后来转交给穆罕默德·汗上尉。据哈桑·汗上尉所述，由于他的指挥部在本吉，而革命的中心又在吉尔吉特，所以遇到了许多困难。

哈桑·汗上尉文中还有一段记录很有意义。[58]他提到了由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组织的秘密团体，名为“圣战者”（Al-Mujahid），这一团体由10或12人组成（见上文“敢死者组织”名单），成员有村民、商人和地下工作者。据哈桑·汗上尉所述，这一团体没有起到任

何作用，反而将革命的秘密泄露给了总督。结果不久后，连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也被英国指挥官布朗上校调派到外地执行任务。

地方统治者的姿态

哈桑·汗上校根据1947年8月的《马尔丹德》报（Martand）的报道，声言罕萨的米尔（贾玛尔·汗）和纳格尔罗阇已在本月应召前往斯利那加，[59]在那里，他们声明将效忠于摩诃罗阇，并表示不论摩诃罗阇选择巴基斯坦还是印度，他们将一如既往地追随他。哈桑·汗上校还提到，尽管他、萨达尔·穆罕默德·伊卜拉欣·汗和阿卜杜尔·哈米德·汗罗阇一再警告他们，他们还是一意孤行。但坎萨拉·辛格又有另一种说法，他说罕萨的米尔在吉尔吉特向他的一些朋友打出了巴基斯坦的旗帜，随后去往罕萨。报纸公布的消息已在民众中广泛传开，但米尔立刻对此加以否定，这表明米尔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外交策略而非出自真心。坎萨拉·辛格还指出这些统治者是如何分为两派的：一派以罕萨的米尔为首，除了罕萨和纳格尔的统治者外，还包括亚辛的总督（罗阇的叔父）；第二派以布尼亚尔的罗阇为首，他们衷心效忠于摩诃罗阇。布尼亚尔的罗阇曾前去会见坎萨拉·辛格，但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不许他见，还将他赶走了。[60]

古拉姆·海德尔中校提到过一封信（其实只是一张便条），[61]是坎萨拉·辛格准将致克什米尔当局的，写于1947年10月的周年庆典之前。据此信内容，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将在庆典上赠送23匹马给罕萨的米尔作为礼物，借口是罕萨米尔的女儿就要嫁给他的儿子为妻。事实上，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是希望得到米尔的支持，共同为巴基斯坦大业奋斗。但米尔却非常狡猾地拒绝了这一馈赠，并将整件事透露给坎萨拉·辛格准将。据他所述，迈赫塔尔大肆号召反对摩诃罗阇，并想方设法与白沙瓦地区联系。他还认为迈赫塔尔应对亚辛和戈赫—吉泽尔的骚乱负一定责任（见下文）。动乱源于对亚辛、伊希戈曼、戈赫—吉泽尔总督任命上产生的分歧，因为这些地区的总督不是世袭的。英

国任命总督时，一般从胡什瓦格特家族或其他家族中挑选。胡什瓦格特家族的古拉姆·达斯塔吉尔（Ghulam Dastagir）声称自己为亚辛总督，但坎萨拉·辛格准将当时似乎并不乐意接受他的声称。他比较喜欢同布尼亚尔罗阇和罕萨的米尔保持良好的关系。

除了提到这封信外，古拉姆·海德尔中校对发生在亚辛的事件未作详细记录。事实上，没有一个巴基斯坦作者谈及亚辛在奇特拉尔迈赫塔尔的干涉下发生的骚乱。只有从印度的一些资料[62]中才得知，亚辛的革命爆发于1947年8月3日和4日，恰好是坎萨拉·辛格准将抵达吉尔吉特不久。据说英国政治代表培根中校在亚辛拘捕了一些带头起义反抗当地罗阇的人。大约有300名亚辛人赶往吉尔吉特要求释放他们的同伴。当地人民的要求得到了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的大力支持，他很希望将他的一位亲戚扶上亚辛罗阇之位，以取代与纳格尔罗阇有密切关系的现任罗阇。争斗愈演愈烈，布尼亚尔罗阇表示支持亚辛的老罗阇。后来纷争逐渐平息，“但整个地区陷于一片政治骚乱之中”。

以此为背景，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何布尼亚尔罗阇与摩诃罗阇同一阵线而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却支持那里的起义者。稍后，我们将看到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派遣他的侍卫在巴尔蒂斯坦和德拉格巴尔地区为自由而战的情况。综上所述，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是为加入巴基斯坦大业奋斗的先驱，甚至先于吉尔吉特侦察队的起义和克什米尔土邦军官的联合行动。后来，隆多和斯卡杜的罗阇也加入了自由抗争运动。[63]

围困吉尔吉特总督的军事行动方案

对于这一方案及方案实施情况的一些论述有许多矛盾之处，这些矛盾源于三大因素：首先，号称领导整个运动的哈桑·汗上校的基地在本吉，他与吉尔吉特联络的渠道只是与古拉姆·海德尔中校互通电话。其次，古拉姆·海德尔作为吉尔吉特侦察队的副官和军需官听命于英国指挥官布朗少校。他与布朗关系融洽，据他日记所载，他常常

向布朗请教许多问题。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泄露秘密。第三个因素就是吉尔吉特侦察队总是开内部会议并独立做出决定。事实上，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也试图鼓动群众，并派人送信给巴基斯坦。正是从这一渠道才获得了行动日期的相关信息，即确信巴基斯坦将会伸出援手后，他们准备于1947年11月6日[64]起兵推翻总督。准备派格达姆·汗（Qadam Khan）取道奇特拉尔前往白沙瓦，以得到援助。尽管他得到了许多财政援助，但还是去毛明·沙（Momin Shah）蒙希处借了一笔款项。当时，秘密已泄露给总督，因而格达姆·汗无法前往白沙瓦。结果，预定的行动日推迟至1947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遗憾的是无法得到其他资料以证实这一初步方案。

所有资料一致显示，行动将在摩诃罗阇做出加入巴基斯坦或是印度的决定后采取。摩诃罗阇于1947年10月26日—27日夜宣布了加入印度的决定。消息于28日传到吉尔吉特，有关人士通过电话决定了行动时刻，同时开始奏响序曲。古拉姆·海德尔中校在他的日记中概括了发生于1947年12月1日前的几件大事，提到了“一到此地，就开始了推翻道格拉统治的地下革命运动”。他提到了四位人物——他自己、赛义德·杜拉尼、哈桑·汗和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但没有详细说明行动的起源。但哈桑·汗上校在他的书中却清楚表明他们是在大会那天（1947年10月15日）才遇到并决定为推翻旧统治并肩作战的。在此之前，哈桑·汗和吉尔吉特侦察队各有自己的主张。古拉姆·海德尔中校的日记中写道：

> 我们的计划已初具雏形。我们将在侦察队的帮助下拘捕（坎萨拉·辛格），封锁（他的官邸）。既然那里没有敌对的武装力量，完成这一步并不难。致电哈桑通知他行动时间，他将于同一时刻在本吉发起进攻，消灭锡克人，在本吉建立稳固的亲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左翼。拘捕坎萨拉·辛格和消灭本吉的锡克人标志着行动第一阶段的完成。

这次军事行动仅限于诸军官参与，布朗少校不在其中。但他别有

用心地试探古拉姆·海德尔中尉对部落地区入侵吉尔吉特一事的反应，后者起了疑心，对此事三缄其口。对于布朗扮演的角色，古拉姆·海德尔中校的记载如下：

> 一天早晨，布朗突然来访。记得那天天气阴冷，我正在火炉边取暖。他告诉我，“我已向总督建议进行一次公民投票（有关加入巴基斯坦还是印度的问题），他已采纳，还征求了米尔和罗阇们的意见”。想到这有可能是个圈套——所以我只回答说很好。同时，我还感到离行动日不远了。既然我、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和JCO们领导的“……日”即将到来，我们应该有所准备。于是我写信给哈桑。他拖延了一阵才回复。当时的情景我历历在目。他在回信中说他“已整装待发，但具体的行动日期以电话通知”。我希望在1947年10月31日星期五那天开始行动，但必须要通知到他。布朗的立场是什么？（坎萨拉·辛格）告诉他米尔们已对殿下表示效忠，布朗很感焦虑。我觉得布朗倾向于巴基斯坦是在1947年10月29日——星期三——在马球比赛后，布朗接了电话，罕萨米尔用自己的方言首先与他，然后与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交谈。罕萨米尔用方言向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表明他是拥护巴基斯坦的，布朗对此很满意。但可惜坎萨拉·辛格偷听到布朗的电话。布朗接电话时，我在侦察队营地等他离开，却遇到了哈桑。他离开后，我把锡克人赶出了电话室，开始打电话。没料到坎萨拉·辛格窃听了我的电话。我与哈桑谈论了关于公民投票以及一旦结果不如意我们就采取行动之事。我一直以为他和那些印度教军官在一起。但确实，他也在电话中听到有人招唤坎萨拉·辛格快来听哈桑和海德尔谈话，哈桑还听到坎萨拉·辛格嘟哝了一句，“我来听听他们谈什么”，因此我们的谈话被打断……如果投票失败（没有选择巴基斯坦），我同时厉兵秣马，做好一切准备。星期五无论如何都要开始行动了。

1947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坎萨拉·辛格命令任何人都不得使用电话。我深感事态不妙，危险逼近，于是重新审时度势，制订计划以及下达指令。

10 月 31 日，我像往常一样晚上去侦察队营地。碰到 JCO 们和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说，(苏贝达尔)沙·拉伊斯曾被私人助理召去,私人助理告诉沙·拉伊斯说，布朗、我、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和哈桑是敌人，要将我们尽快除掉。我听了半信半疑。当时私人助理还告诉沙·拉伊斯，总督听到了布朗和罕萨米尔以及哈桑和海德尔的通话。这使我在瞬间做出了决定，凭直觉我已感到危机四伏，必须赶快行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我决定了。

星期五，下午 5 时 15 分：我离开去找布朗，不论是我，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还是布朗，都已处在极度危险之中。既然我们的目标都是巴基斯坦，那为何不并肩作战呢。于是我传令给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和 JCO 们，无论布朗参加与否，我们都得行动了。我告诉他们布朗的态度马上就会明朗。我在 5 时 15 分离开，30 分到达他的住所，他出门打欧石鸡（Chikoor）去了，猎得一只欧石鸡……他毫不在意，我告诉他沙·拉伊斯之事，终于让他下定了决心。我们喝了一会儿茶。天黑时分，我们奔向侦察队营地，路上遇到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便与他一起回去。在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的住所召开了会议，各位 JCO 都来了，我们立下誓言。军号吹响，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带领侦察队宣誓，永远跟随巴基斯坦。

古拉姆·海德尔的日记证明了两件事：其一，公民投票是布朗的主意，坎萨拉·辛格准将之所以接受布朗的建议，可能是为了等待时机。哈桑·汗上校在他的书中提到了这个公民投票方案，[64] 但不知全过程如何操作。正是在这一公民投票方案影响下,传出消息说坎萨拉·

辛格准将已写信给摩诃罗阇，宣布这一地区将在四至五天内加入巴基斯坦。哈桑对此方案嗤之以鼻，他说这些军官都被这个英国人愚弄了。其二，布朗不是自由抗争运动的领导人。事实上，据古拉姆·海德尔的日记，到后来，在1947年11月1日，一些军官想囚禁布朗，所以他到了下午4点才脱身。根据少校苏贝达尔穆罕默德·巴布尔·汗的观点，可能在此期间，布朗曾被暂时囚禁。

幸运的是我们获得了这次行动的初步方案的草稿，是古拉姆·海德尔中校执笔的。这一方案的要点如下：

（1）拘捕坎萨拉·辛格准将和印度教军官。

（2）抢占武器和军火库。

（3）接管无线电通讯设备，切断（克什米尔的）电话线，占领邮局和电报局。

（4）送信给西北边境省总理阿卜杜尔·拉卜·尼希德尔（Abdur Rab Nishtar）和卡拉奇，请求指示。请求向我们提供人员和物资援助，并传令给附近部落地区酋长，让他们不要干涉。

（5）不要惊动文职机构。

（6）派一个排前去堵截普拉塔普大桥或本吉—吉尔吉特一线。从古比斯调回一个排；再从吉拉斯调回一个排。

（7）公布革命宣言，招贤纳士。

（8）监管土邦的非穆斯林。

（9）派毛拉们去邻近地区宣传此次运动。

包围并逮捕吉尔吉特总督

坎萨拉·辛格准将写道，[65]他在黄昏时分致电本吉的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命令他率领他所能聚集的所有兵力，火速赶来吉尔吉特。但来自巴基斯坦的资料却表明，准将传令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让他派巴拉代乌·辛格率锡克连前来。正是为了阻止这个连赶去吉尔吉特增援，革命军派侦察队的一个排前去“普布·辛格的山

嘴”。看来哈桑·汗上校和古拉姆·海德尔中校的电话联络很快就被切断了，不过他们已决定采取行动，于是当机立断，抢先出手。但沙·汗坚持认为围攻吉尔吉特完全是侦察队的功劳，与哈桑·汗上校无关。巴基斯坦的文献资料中有一记录，表明哈桑·汗上校是从古拉伯·丁处得到巴拉代乌·辛格将率领非穆斯林连前往吉尔吉特的消息，哈桑·汗上校对此记录表示认同。这一消息迫使哈桑·汗去找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并向他表明他认为应该让他带领穆斯林连前去吉尔吉特取代巴拉代乌·辛格，以避免在吉尔吉特可能发生的政治骚乱。对此，上校表示同意。穆罕默德·汗上尉和纳迪尔·阿里（Nadir Ali）中尉留守本吉。天色将晚时分，他带领一个连离开本吉并火速赶到山嘴洋房。在那里，他遇到一位名为扎瓦尔·穆罕默德·阿里的信使，是艾姆吉尔（Amchair）人，从他那里得知围攻吉尔吉特之战已经打响，但那里的人民和一些侦察队士兵一听说锡克连即将赶来吉尔吉特，便惶恐起来，以致军心动摇。为了制止这一现象，萨菲乌拉·贝格和他手下的一个排被派往“普布·辛格的山嘴”。同时，据说古拉姆·海德尔中校以坎萨拉·辛格准将的名义送信给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和艾赫桑·阿里少校，让他们立刻赶来吉尔吉特开会。哈桑·汗上校声称他之所以让古拉姆·海德尔送信，是想将这两位穆斯林军官从本吉支开，因为他们的忠诚度值得怀疑。[66]在哈桑·汗上校到达“普布·辛格的山嘴”前，扎瓦尔·穆罕默德·阿里已预告了他的到来。在山嘴那里，萨菲乌拉·贝格手下的一个八人小分队，由纳格尔的哈维尔达尔贾瓦尔带领，正赶在前面，他们在路上遇到另一支队伍，便汇合在一起。哈桑命令萨菲乌拉·贝格在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和艾赫桑·阿里少校到达这里时将他们逮捕，然后押往吉尔吉特，就不用等他了。下达完命令，哈桑本人便带着副手弗尔曼·阿里（Farman Ali）骑马前往吉尔吉特。对于哈桑单独去吉尔吉特的目的，除了想当然地认为他是想亲自视察一下攻占吉尔吉特后的情况之外，没有人提到（见下文）。但是，如果上述那两个高级军官真的是危险人物，他就应该留在山嘴以确保顺利地将他们抓起来。总之，哈桑上校似乎更关心吉尔吉特的情况。从哈桑那里，我们无法得知他是如何对

付驻守在贾格劳特的印度教徒排以及他对即将赶来此地的吉拉斯侦察队下达了何种指令。

对吉尔吉特行动的了解，我们从坎萨拉·辛格准将的自述开始。据他所述，大约在午夜，100 名侦察队[67]士兵在布朗、巴布尔·汗和古拉姆·海德尔的带领下包围了他的官邸。他起先听到走廊里人声嘈杂，但根本没有料到是侦察队。他掏出手枪向其中一个房间走去，他的仆人在另一间屋子里，他被派去拿步枪。他的司机也循声带枪赶来。然后，他去了他的办公室，当他折回他仆人的房间时，突然发现大约有六七人正在推盥洗室的门，马上就要破门而入了。他朝天放了一枪，试图制止他们。对方也以枪声回应。随后，这群人中的三人冲进了旁边的房间。大约一小时后，一阵机枪声在官邸上空响起，打碎的玻璃哗啦啦往下掉，这是海德尔中尉开的枪。过了一会儿，机枪声停歇，步枪声又起，双方同时叫嚷，直至凌晨 4 点。一大清早，玛尼·罗摩（Mani Ram）区长带着一名警官赶来。他们说侦察队首脑只给他们 15 分钟时间，让他们自动投降，如若不然，就杀死所有的非穆斯林。于是准将召来努尔·阿里·汗罗阇和萨哈·德乌·辛格（Saha Deo Singh）区长商量，他们建议准将接受劝降，然后转去本吉，既然侦察队只是想解放吉尔吉特。事实上，准将在最后一刻还在期待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能赶来吉尔吉特力挽狂澜。如果这一信息确凿，那说明准将确实要从马吉德处搬救兵，所谓马吉德要来吉尔吉特的传言并非是哈桑·汗上校玩的一个把戏。

讲述吉尔吉特行动的这一个版本与巴基斯坦方面的资料口径一致。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68]于晚上 9 点到达吉尔吉特，围攻总督府，他还带着 14 个人前去找守卫那里的卫兵，询问总督在哪里。苏贝达尔萨菲乌拉·贝格和苏贝达尔沙·苏丹也同他在一起。门前窗外都布满了士兵。但他们搜寻了几处房间都没有找到总督。这时，一位士兵发现了总督，于是许多人奔去，双方开火。结果，罕萨的艾米尔·赫亚特（Amir Hayat）中枪身亡，纳格尔的舍法·阿里（Shafa Ali）受了重伤。首领下令不得再开枪。到了晚上 11 点，消息传来，全城已在控制之中。然后，萨菲乌拉·贝格奉命带领一个排前往“普布·辛格的山

嘴”，以堵截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同时控制巴森布尔杰（Bassein Burj），以免敌人从布尼亚尔和伊希戈曼方向攻来。整个晚上，准将一直在负隅顽抗。有人建议索性炸掉总督府，但少校苏贝达尔不准。接着，从“普布·辛格的山嘴”又传来捷报。大约350名吉尔吉特的非穆斯林被关入了军营。随后，革命军派副区长潘迪特·玛尼·罗摩送信给准将，让他在晨礼的呼礼声响起前投降。15分钟内，玛尼·罗摩出来说，准将想见少校苏贝达尔。然而，少校苏贝达尔却派里面的副警官——布尼亚尔的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Sultan Abdul Hamid）把准将带出来。终于，准将在清晨时分出来了。他一见少校苏贝达尔就问：“你会怎样对待我?”少校苏贝达尔回答道：“当作战俘，穆斯林决不会杀害投降之人。”准将又进屋换了衣服，当时已是早上7时半多，接着准将被押往军营，那里可保证他的安全。根据古拉姆·海德尔的日记，在那晚后他才得知哈桑·汗上校到了山嘴。他自己则守着机关枪扫射。早餐时，哈桑·汗到达他的住所。接着他们直奔总督府而去，到那里才知道坎萨拉·辛格准将已被他的私人助理和其他人劝降了。另一方面，哈桑·汗上校[69]补充说，准将一直顽抗到早晨才投降，那时，大家正在讨论是否向准将开火，他到达吉尔吉特后，全盘否定了这些计划。接着，他通过努尔·阿里和萨哈·德乌·辛格送了一封信给准将，并让他们手持一面白色小旗。准将一看到白旗，立刻挥舞着他的白手帕并举起了双手。苏贝达尔沙·苏丹将他带出来关入一间小营房。沙·拉伊斯·汗的文章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信息。[70]他说，1947年10月31日，巴布尔·汗到他家里拜访，并告诉他准将已送信给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沙·拉伊斯对巴布尔·汗说，如果他围攻总督府，总督府的守卫将不会阻拦。那里驻守了16名费尔道斯·阿里手下的吉尔吉特侦察兵，他们都与巴布尔·汗一起加入战斗。在马球场还聚集了500名志愿者。他们切断了所有通往总督府的道路。他还说他遇到了一位副区长，是印度教徒，还同他交谈了一番。接着，他就看到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和沙·汗贾玛达尔押着准将沿着他屋前的小道而去。

1947年11月1日清晨，总督坎萨拉·辛格准将的投降宣告了查谟

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在吉尔吉特统治的终结。准将对此事件还有一些补充叙述：1947 年 11 月 3 日，他签署了投降书，将吉尔吉特的一切管理权交给了吉尔吉特临时政府。[71] 据准将所述，投降书是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递给他的，他与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一起来到。签署了投降书后，在吉尔吉特侦察队营房举行了升旗仪式，所有的土邦文职官员都被召来向巴基斯坦国旗致敬。[72]

吉拉斯侦察队的行动

关于吉拉斯侦察队的行动情况，主要获自于沙·汗的叙述。对此，西甘达尔·汗少校曾逐字引述。哈桑·汗上校则提供了其中的一些细节，吉拉斯当时的罗阇穆扎法尔·乌丁（Muzaffar uddin）在与笔者的一次私人交谈中证实了哈桑的记叙。侦察队中的第一个牺牲者就是吉拉斯侦察队的苏贝达尔江·阿拉姆（Jan Alam），他起先被准将遣送回家，后来在巴布尔和布朗的支持下驻守吉拉斯。据哈桑·汗上校所述，由于吉拉斯当地的印度教徒强烈要求给予保护，穆罕默德·阿里中尉和苏贝达尔道斯特·穆罕默德（Dost Mohammad）率领下的 B 连被派往此处。这些官兵的到来不仅满足了印度教徒的要求，而且在苏贝达尔江·阿拉姆离开后，给当地侦察队以安抚，从而在后来的自由抗争运动中赢得了当地侦察队的支持。[73] 另一方面，沙·汗指出，宣传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他们散布传言，说达丽罗和丹吉尔的部落将过来开展反抗道格拉军队的圣战。穆扎法尔·乌丁罗阇与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关系密切，是这次行动的主要代表。他在吉拉斯堡垒升起巴基斯坦国旗，在吉拉斯和戈赫尔阿巴德招募志愿者向贾格劳特进军。在这片战略要地，苏贝达尔苏尼特·辛格（Sunit Singh）带领一个排驻守此处，以监视吉尔吉特和吉拉斯两地间的运动情况。沙·汗还记述道，布朗少校从吉尔吉特 JCO 食堂的操作间送信给吉拉斯的马西森（Matheison）上尉，让他带三个排立即转移。据哈桑·汗上校说，他（马西森）带了五个排离开了，他自己则在拉伊戈德（Raikot）驻足，

并派苏贝达尔谢尔·阿里带领四个排（约 160 人）去攻占贾格劳特和驻守该地的一个排。苏贝达尔江·阿拉姆则向罗摩卡特桥进发。11 月 2 日晚大约 10 点左右，谢尔·阿里的士兵突然猛攻苏尼特·辛格部，除一人跳河逃生到达本吉外，其他人全被歼灭。侦察队七排的一个小分队在纳依克纳塞布拉（Naik Naseebullah）的带领下前往罗摩卡特桥，在那里开始了一场枪战。苏贝达尔江·阿拉姆驾着皮筏从塔里吉（Thalichi）横渡印度河，智夺罗摩卡特桥，切断了道格拉军队溃逃的后路。贾格劳特和本吉之间的渡船也全被控制。[74] 事实上，船只已全被毁掉，目的在于切断与本吉的一切交通联系，以确保在这条线上不会有反攻吉尔吉特的力量。是谁负责了这次吉拉斯行动？哈桑上校在 11 月 3 日和沙·汗一起到达贾格劳特后才逐渐明白。他们去那里是为本吉的下一步行动做准备。当然，行动的指令是由吉尔吉特的侦察队司令部下达的，但古拉姆·海德尔中校的日记中并没有记录下这一指令，只是说他没有为这次行动出谋划策。如果是布朗发布的命令，那他必定在 1947 年 10 月 31 日晚决定同侦察队合作后就已下达了。据穆扎法尔·乌丁罗阇所述，他收到了来自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的指令。马西森上尉当时与他们在一起，但他没有负责此次行动，因而所有的功劳应归于吉拉斯侦察队和穆扎法尔·乌丁罗阇。罗阇是吉拉斯行动的首要代表。也许当印度教徒—锡克连开始行动的消息从本吉传来时，侦察队方面就同时采取了两项行动：其一是派苏贝达尔萨菲乌拉·贝格带一个排前去“普布·辛格的山嘴”阻止他们；其二是传令给吉拉斯侦察队，并下了三道明确指令，即占领普拉塔普桥、罗摩卡特伏击和控制渡船，唯一的目的就是阻止从本吉方向来的反攻。这些指令必定是同时由同一机构发出。由于吉拉斯路途遥远，侦察队须长时间行军才能到达塔里吉、贾格劳特和其他哨卡。所以，直到哈桑·汗经过此地去吉尔吉特时，才了解这里的情况。本吉和贾格劳特在革命中的位置被互换了——事实上，正是吉拉斯侦察队的行动才滋生了以后的整个运动。他们的行动极大地触发了本吉的道格拉军的心理恐慌，使他们觉得茫然无依，只好各自逃命。因而，在那个深夜，吉拉斯侦察队的行动直接制造了整个恐慌气氛，并带给敌人一种印象：部

落人马已大批呼啸而来，开始烧杀抢掠。另一方面，他们的行动也切断了本吉和贾格劳特的一切联络手段，同时给驻守在本吉的印度教和道格拉连的交通运输亮起了红灯。总之，吉拉斯人民所做的一切值得我们深深的敬仰。[75]

吉尔吉特临时政府

关于临时政府的成立情况，最真实而又言简意赅的记录当属古拉姆·海德尔中校的日记。他在日记中逐一记下了每日发生的情况。当沙·拉伊斯·汗提议应有一个临时革命议会（Inqilabi Council）来进行决策时，哈桑·汗上校[76]产生了一个念头，在吉尔吉特成立一个民主政府。[77]哈桑意味深长地称之为“临时政府”。[78]

古拉姆·海德尔中校记道，自从坎萨拉·辛格准将投降后，一切事务杂乱无序，令他们倍感烦恼。接着他提到了一次全体会议，与会者有布朗、哈桑、沙·拉伊斯、JCO们、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和古拉姆·海德尔。他颇有深意地写道：

> 什么都没有商定。下午4点，布朗傻乎乎地离席回去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其他人继续开会。他们想把布朗排挤出局，或拘捕他，大多数人同意了，并下达命令拘捕他。我与他们起了争执——如果布朗出局，我也退出。我不希望因为个人的自我中心主义给巴基斯坦大业带来阻力。我知道布朗是站在巴基斯坦这边的，他曾收到阿卜杜尔·加尧姆·汗（Abdul Qayyum Khan，当时西北边境省的首席部长）的信。如果我们排挤他，必定会产生轩然大波。他在米尔们中间的影响也很好，他只能成为巴基斯坦的一员。为此，他已赔上了一生。最后，我说如果不把他列为政府成员，那我也辞职。最终，会议达成了如下协议：
>
> 1. 沙·拉伊斯·汗——总统（图59）

2. 布朗——总统顾问

3. 哈桑——军务负责人

4. 本人——民政事务负责人

布朗当即被释放，没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



图 59　沙·拉伊斯·汗——1947 年吉尔吉特临时政府总统

他的日记明确记载了布朗少校一度曾被拘捕，只是因为古拉姆·海德尔中校的坚持，才将他释放，并同意他任新政府的顾问。

哈桑上校还提到了万人空巷、齐聚王家马球场的场景，人们聚集在那里聆听革命者的演讲，希望能得到令人振奋的消息。革命军保证了全城百姓的安全，包括印度教商人和官员。然后所有领导人前往侦察队阅兵场，在那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成立了一个当地政府。据哈桑上校所说，还有两位英国官员出席了会议。出席的还有罕萨和纳格尔的 JCO 们和从吉尔吉特来的一些文职官员，但没有土邦军队的代表。会议在一个密闭的房间内举行。外面，聚集着成百上千从吉尔吉特赶来的群众。此次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做出以下决策：

（1）同意沙·拉伊斯·汗出任临时政府总统。

（2）哈桑·汗上校主管军务，领导革命运动。

（3）任命赛义德·杜拉尼上尉为运动的副负责人。

（4）古拉姆·海德尔中尉为政治代表。

（5）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任军需官。

（6）罗阇苏丹·哈米德任警长。

（7）布朗少校和马西森上尉任临时政府顾问。

（8）发电报给巴基斯坦政府，让他们派一位官员出任临时政府的民政事务主管。[79]

哈桑·汗还提到了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和艾赫桑·阿里少校，他们在“普布·辛格的山嘴”被擒获。1947 年 11 月 2 日，在吉尔吉特，哈桑上校传令将他们押来劝降。但他们不愿与他合作，于是又被关入兵营。

临时政府成立的这些细节与我们从古拉姆·海德尔中校日记中得到的一些信息有些出入。后者根本没有提到革命运动，没有任何有关赛义德·杜拉尼上尉和马西森上尉的事迹，因为他们那时不在吉尔吉特。那次会议上，似乎争论很激烈，这一情况可从海德尔的日记中窥得一二：

> 1947 年 11 月 2 日：马吉德上校被捕。哈桑需要 Ration（疑为 Rifles，步枪）……他和其他的那些枪（Guns）、狙击枪和 A. Q. M. 枪。晚上，我回去了，遇到了布朗，少校苏贝达尔也在那里。我对布朗说穆斯林们随时会危及他的生命，因而让他歇在官邸中，这样比较安全。（这应该是布朗被捕以前的事）今天和哈桑了大吵了一场。他说，“海德尔，你简直把我往绞刑架上送”，我回答说，我们要么一起同意，要么就一起退出。少校苏贝达尔从中调解了一番。

读古拉姆·海德尔中校的手稿，感到他似乎对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准许他带着自己的连队前去吉尔吉特代替那里的道格拉和锡克连之事心存赞赏。但后来，他又起了疑心并拘捕了他。在艾赫桑·阿里的访谈中可以得到一些暗示，哈桑·汗有些害怕阿卜杜尔·马吉德·汗，非常希望能摆脱他。既然艾赫桑·阿里和阿卜杜尔·马吉德·汗都身居要职，那就有可能成为哈桑·汗上校在吉尔吉特蒸蒸日上的

军旅生涯中的绊脚石。因此，他有必要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就很可以理解为何哈桑·汗在11月1日只身前往吉尔吉特，而将他的连队留在了“普布·辛格的山嘴”。尽管他以捉拿总督为名为自己辩白，但事实表明，他的根本目的是想及时在吉尔吉特临时政府里揽到大权。他在文中描述一些具体情况时所持的立场更能显示他的这一野心。

临时政府的运作

关于临时政府的实际运作情况，我们所知甚少。沙·拉伊斯·汗记录道，作为政府的首脑，他命令500名侦察兵全部进驻吉尔吉特，并任命瓦齐尔古拉姆·阿巴斯（Ghulam Abbas）为区长。于是后者致函各个下属地区，征收了25000“满”麦子。古拉姆·海德尔的日记逐日记载了临时政府的管理情况：

> 1947年11月3日：清晨，哈桑·汗中校前往“普布·辛格的山嘴”。沙·拉伊斯·汗、布朗和海德尔三人召开了一次会议，并起草了文书上呈巴基斯坦和（自由）克什米尔政府。会议上核查了粮食供给和日常管理的具体情况，发现民心动荡，恐慌四起。尽管如此，政府依然执著于两大目标：（1）继续保持原来的运行机制；（2）继续亲近巴基斯坦，寻求他们的支持，同时，将所有的印度教徒转移到侦察队兵营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
> 1947年11月4日：沙·拉伊斯·汗、布朗和海德尔三人又开了一次会。并将罕萨和纳格尔地区加盟的消息电告巴基斯坦。当地官员和旁遮普人之间燃起妒火。有消息说普拉塔普桥又燃战火，锡克军前哨（在贾格劳特）被摧毁。布朗和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前往贾格劳特，布朗希望能在那里遇到马西森。

1947年11月5日：一大清早，发电报给阿卜杜尔·加尧姆·汗，要求调拨穆斯林管理官员和职员。有消息传来，本吉要塞被攻下，锡克人连夜出逃。我们的小伙子们袭击了罗摩卡特桥。最新消息，锡克人投降了。穆斯林这方一切正常，没有挑起争斗。又一消息——锡克人兵败如山倒，正整批整批地投降。今天他核查了一下财物。沙·拉伊斯·汗想成为吉尔吉特的罗阇。

1947年11月6日：下达指令给助理工程师，让他修复普拉塔普桥。再次发电报给阿卜杜尔·加尧姆·汗，让他与培根中校一起飞往吉尔吉特，以平息当地官员的勾心斗角带来的骚乱，但此事没有与沙·拉伊斯·汗总统商议。他说布尼亚尔加入巴基斯坦，就不用电报通知了。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布朗和马西森从本吉回来。本吉地区的旧有体系已经崩溃，武装力量已被收服，警官哈米德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胡马雍·贝格是最明智的人。

1947年11月7日：海德尔正在办公室，布朗和马西森也进来了。收到了阿卜杜尔·加尧姆·汗的电报，吉尔吉特问题正在商谈中。这是首次将巴基斯坦或亚吉斯坦[80]问题提上会议日程。代表巴基斯坦的问题及侦察队问题都得到了关注，但未作出任何决策。

1947年11月8日：坎萨拉·辛格致电克什米尔总理说一切安好，都得到了有效保护。巴基斯坦和亚吉斯坦问题再次在内阁提出。最后决定加入巴基斯坦。布朗和马西森希望能被派去巴基斯坦。明天，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将要离开。

1947年11月9日：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走了，从金库贷了1200卢比给他以充抵他在金库六号K. J. 保险箱的1200卢比存款。赛义德·杜拉尼和海德尔目送他离开。艾赫桑·阿里和维拉叶特·阿里负责管理。艾赫桑·阿里是主动请缨。从本吉缴获的枪支弹药、三门迫击炮和.303步枪被

送到。

1947 年 11 月 10 日：马西森任侦察队的副官和军需官。海德尔是特派员。马西森离开这里前往吉拉斯时，这两方面全由海德尔负责。缴获的枪支弹药分发到各个军营。检查了礼物箱——有衣服、三架相机和四块手表——全存入了金库，付给马西森 1200 卢比，布朗病了。本吉的锡克教徒仍没有得到妥善安置。

1947 年 11 月 11 日：看到正在移交缴获的武器装备，毫无秩序。还在本吉出售武器和军火。关于此事还没有统一的决定。民众仇视印度教徒，总想置他们于死地，内阁决定以强力制止这一行为。还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对一些问题进行磋商。沙·拉伊斯·汗从独立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并想成为吉尔吉特的罗阇。但一谈到财政问题，他就沉默不语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问题尽管没有什么危害，却显示出丑恶的一面。既然巴基斯坦对我们要求接管吉尔吉特之事置若罔闻，那就让布朗私下与培根上校联系。本吉纷争源于许多因素。如果继续为难民提供庇护，那将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如果任他们自生自灭，又怕他们散播反面言论。

1947 年 11 月 12 日：赛义德·杜拉尼和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离开本吉，海德尔继续留守。马西森想从吉拉斯金库支取一笔钱。下令给助理工程师让他前往贾格劳特负责桥梁修复工程，让桥梁任何时候都能通行。本吉的锡克教徒的情况仍然不明。布朗和马西森来到海德尔的官邸。

1947 年 11 月 13 日：阿卜杜尔·贾巴尔又储备了一些货物在仓库里。医院仓库发生盗窃事件。助理工程师还未动身去贾格劳特。命令邮局局长发电报给巴基斯坦当局，电汇一笔贷款用于邮政建设。喀什噶尔领事馆贷款之事已解决。从服装库（Toshakhana）发来了一些美国娱乐用品。打电话给古比斯总督，立刻派拉迪夫（Latif）来。在当前管理过程中，财政危机的呼声日高。支付 100 卢比给一位喀什噶尔人，作

为从吉尔吉特去本吉的往返旅资。

1947年11月14日：阿卜杜尔·加尧姆·汗处传来消息，应我们的要求，将派穆罕默德·阿拉姆（Mohammad Alam）前来协助工作。海德尔认为布朗和马西森应该退休了。他自己则应回到家乡继续为克什米尔奋斗。他还遇到了一位美国少校和他的夫人。他们从喀什噶尔来。

1947年11月15日：早上视察了监狱。看了一下囚犯的名单，以决定哪些要处决，哪些可赦免。赛义德·杜拉尼打电话来说金库六号K.J.保险箱中没有马吉德上校所说的存款。他是个骗子吗？于是让苏贝达尔穆尔塔扎去马吉德处追回1180卢比。从白沙瓦传来佳音，穆罕默德·阿拉姆将在明天上午10点飞抵吉尔吉特，可能培根上校也会来。安排为他们接风。拘捕了助理工程师，因为他不服从命令。

1947年11月16日：天气很糟糕，飞机离开白沙瓦。上午9点，所有官员骑马去机场迎接巴基斯坦代表。暴雨将起。一位侦察兵跌下马背，摔伤了头盖骨。布朗、马西森和海德尔首先到达机场。终于与穆罕默德·阿拉姆会面。暴风雨中他们策马回奔。美国人照了几张相。穆罕默德·阿拉姆在致词后被带入政治代表的官邸。

1947年11月17日：政治代表的官邸安排停当。屋顶旗帜飘扬，还安排了仪仗队欢迎。从前任总督那里拿来钥匙交给政治代表。所有的机密文件和重要记录均上呈政治代表披阅。海德尔将一切事务上报政治代表，包括吉尔吉特（沙·拉伊斯）问题并提交了相关文件，巴拉代乌·辛格上尉和一些锡克士兵在今天投降。

1947年11月18日：海德尔想离开，但政治代表要求他再留一段时间。米尔们到来，向巴基斯坦政治代表表示敬意。

1947年11月19日：与赛义德·杜拉尼进行了一次激烈争论。他说哈桑和他的连队对海德尔不满。当时还起了口角。后来他离开了。

海德尔在日记中对他在吉尔吉特时发生的一些事件做了详细描述。他提到了布朗、哈桑和其他人之间的勾心斗角。那时内阁还继续保留。某些人希望它应具有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的性质，但萨达尔·穆罕默德·阿拉姆这位强权人物，认为法律没有授予他权力接受这一建议。政治代表仍是军队和侦察队的最高统帅。同时，在1947年11月21日，哈桑·汗前往本吉全权管理那里的政务和军事，但事实上，他到11月25日才离开。布朗于11月26日前往白沙瓦，临行前，政治代表向他保证巴基斯坦会接受克什米尔土邦军官的军衔。1947年11月28日晚，一些印度教徒的商店遭劫，政治代表巡视全城，亲自了解事情的起因。然后，他命令所有的非穆斯林转移到侦察队营地，并安排人员昼夜巡逻。11月28日，吉尔吉特全城实施宵禁和144条款[①]。11月30日，阿斯拉姆（Aslam）准将从总司令部赶来，计划为吉尔吉特建立一支自由军（Azad Fouj）。阿斯拉姆觉得英国人很无能，可以让他们退休了。12月3日，阿斯拉姆回到总司令部就此事进行磋商。1947年12月8日，布朗从白沙瓦回来，带了一封信给萨达尔·穆罕默德·阿拉姆，计划再招募500名新兵加入侦察队，授予少校苏贝达尔穆罕默德·巴布尔·汗以陆军中尉军衔。1947年12月9日下午3点，政治代表举行了仪式，授予少校苏贝达尔以军衔。赛义德·杜拉尼上校坐同一飞机离开吉尔吉特。1947年12月13日，阿扎德·汗（Azad Khan）到来接任区长一职。12月23日，收到消息说阿斯拉姆准将将来接替布朗。事实上，他直到1948年1月才来。政治代表希望能更多地在侦察队中提拔官员担任行政职务。1947年12月31日，罕萨的米尔向政治代表施加压力，让他提升沙·汗。当时政治代表也在考虑提拔了巴布尔后让穆扎法尔·乌丁罗阇接任侦察队少校苏贝达尔之职。1948年1月3日，海德尔中校离开吉尔吉特前往白沙瓦。

① 英属印度时期法令中禁止民众集会的条款。——译者

本吉行动

此前，我们已对哈桑·汗带领他的连队于1947年10月31日晚离开本吉之事有过一番论述，他在晚上到达山嘴洋房——此地位于贾格劳特和吉尔吉特之间，他将连队留在这里，自己却单骑奔赴吉尔吉特，并在1947年11月1日早餐时分到达。继他之后，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和艾赫桑·阿里少校也从本吉越印度河而来，但却于1947年11月1日在“普布·辛格的山嘴”被苏贝达尔萨菲乌拉·贝格抓获，押往吉尔吉特。此时，那两座著名的大桥还毫发未损，受控于道格拉军——阿斯托尔河上的罗摩卡特桥，位于印度河南岸的本吉方向，同位于印度河北岸的贾格劳特相对；印度河上的普拉塔普桥，位于吉尔吉特河和印度河交汇处偏南方，距贾格劳特颇远。本吉和贾格劳特之间以渡船交通。“普布·辛格的山嘴”是位于吉尔吉特河北岸的一条狭窄的峡谷，与阿斯托尔河交汇后的印度河的北岸则是塔里吉地区。因此，这些地方都是本吉、贾格劳特和吉尔吉特的战略要道。克什米尔援军有可能从阿斯托尔方向朝本吉反扑过来，但须渡河，罗摩卡特桥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本吉的大军也可能赶往吉尔吉特解围，但必须跨过印度河上的普拉塔普桥或是乘渡船取道贾格劳特。随后，向吉尔吉特进军途中，还得冲破“普布·辛格的山嘴”这一关隘。于是革命军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派遣侦察队的一个排前往此地，以防守从本吉方向来的进攻。同时，调派吉拉斯侦察队前去抢夺罗摩卡特桥和普拉塔普桥，并将渡船捣毁，消灭驻守在贾格劳特的道格拉排。无论是谁策划了这次行动（见前文），无疑是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棋，虽然哈桑·汗上校和穆罕默德·汗·贾拉尔上尉对此一无所知。这些事件揭开了本吉革命运动的序幕，使驻守在那里的道格拉军人心惶惶。

本吉驻守着两个道格拉连以及指挥连，指挥连驻扎在下游营地，由巴拉代乌·辛格指挥，三个排分别驻守在罗摩卡特桥、普拉塔普桥和贾格劳特。[81]哈桑·汗上校进一步强调了本吉战略地位的重要性。[82]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本吉将是整个吉尔吉特独立运动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摩诃罗阇的军队驻守此处，并且他们的后援也可能通过布尔济尔和祖吉山口向此地进攻。因此，吉尔吉特临时政府刚成立不久，立刻就制定了进攻本吉的计划。似乎下达命令给吉拉斯侦察队让他们采取行动时，并未征求哈桑·汗上校的意见。他后来才得知此事，至于确切的命令下达的情况，他也是一无所知。据他所述，他于11月2日下午4点离开吉尔吉特（但据海德尔的日记所载，他至11月3日清晨才离开），还有萨菲乌拉·贝格、沙·苏丹、沙·汗和苏丹·阿尤布率领的四个排。他去“普布·辛格的山嘴”调遣他的火枪连，随同的还有穆罕默德·阿里中尉、苏贝达尔穆罕默德·阿明·拉托尔（Mohammad Amin Rathor）和苏贝达尔道斯特·穆罕默德。当地人民热烈响应，纷纷捐粮捐物，提供帮助。其中出了两位有胆色的人物——阿卜杜拉·汗和承包商法兹尔·艾哈默德（Fazal Ahmad）。[83]正在那时，哈桑·汗上校才得知火烧普拉塔普桥之事。此桥是通往本吉的唯一通道。于是，他决定转往贾格劳特，攻打那里的道格拉军。然而，吉拉斯侦察队抢先一步，已经在1947年11月2日晚完成了这项任务。那里已是尸横遍野，其中还有苏贝达尔苏尼特·辛格。所有的渡船都被击沉。正是吉拉斯侦察队的行动引发了剧烈交战，直到半夜12点，本吉传来的枪炮声还连绵不绝，显然是道格拉军队在还击。[84]据哈桑·汗上校所述，罗摩卡特大桥被毁是在11月2日和3日之间的夜里。[85]哈桑为烧毁大桥一事谴责布朗少校，大桥被毁使他无法去本吉。他记道，11月4日一整天，他都在苦苦思考如何渡河到达本吉。

哈桑·汗上校随后还提到了赛义德·杜拉尼上尉的归来，布朗少校曾派他驻守前哨。归途中，他在罕萨羁留了几日，并得到了米尔的书面文书，表示他同自由斗士们站在一起。[86]而代表坎萨拉·辛格总督送信给本吉的巴拉代乌·辛格上尉的正是赛义德·杜拉尼，总督希望辛格上尉能和平解决争端。[87]哈桑·汗上校对穆罕默德·汗·贾拉尔上尉在本吉领导的行动持否定态度，而将击败本吉的道格拉军的所有功绩全归于他自己。至于本吉战争的始末，我们有穆罕默德·汗上尉自己的叙述做参考（见下文）。哈桑·汗上校于11月5日带着十人

小分队用筏子渡河，随行的还有沙·苏丹和沙·汗。他的连队后来才向本吉进发。

空军上校沙·汉对此事的叙述则完全不同，他写道：

> 哈桑上尉和我带领吉尔吉特侦察队的三个排于11月3日晚到达贾格劳特，准备次日清晨向本吉发动进攻。但在11月4日清晨，看到印度河对岸飘着一面白旗。这是穆罕默德·汗和其他穆斯林士兵升起的。一位信使渡过印度河找到他们，然后回来报告说，锡克和道格拉人在11月3日晚已弃营而逃。哈桑和我渡过印度河，发现营地空无一人。穆罕默德·汗上尉和其他穆斯林士兵正在那里列队迎接我们。不费一枪一炮，本吉就和平解放了……派遣侦察队的一个排前往阿斯托尔。阿斯托尔军营区也被占领，一切都完好无损，还缴获了许多珍贵的财物。

穆罕默德·汗·贾拉尔上尉[88]叙述了本吉行动的具体情况。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于1947年11月2日离开本吉后，巴拉代乌·辛格作为下一级军官管理那里的事务。当吉拉斯侦察队进攻贾格劳特哨所时，穆罕默德·汗·贾拉尔上尉对此毫不知情。但这次行动却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本吉军队士兵来自不同民族——有印度教徒、道格拉人、锡克人和穆斯林，自哈桑·汗上校率领他的连队离开后，道格拉人和锡克人就占了上风。穆罕默德·汗连队则以印度教徒和锡克人为代表。他初到本吉，因而很有必要与当地军官建立起友谊。他的目的是想捞一笔军火。苏贝达尔穆罕默德·阿里向贾格劳特开火，但毫无效果，于是停火。巴拉代乌·辛格上尉派苏贝达尔艾姆里特·纳特（Amrit Nath）去上面的营地取武器，结果他空手而归，并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纳迪尔·阿里的连队叛变了。当穆罕默德·汗上尉前往纳迪尔·阿里处时，发现所有穆斯林士兵正坐着计划行动。结果他也加入了商谈，并向他们保证会全力支持他们。同时，他还指示纳迪尔·阿里打电话给巴拉代乌·辛格，对他说穆罕默德·汗没有参与叛

变，甚至在巴拉代乌·辛格上校来到上面的营地之前，舍菲（Shafi）贾玛达尔已带领一排士兵被派往罗摩卡特大桥。他们奉命驻守此处，发现有印度教徒靠近，即予以逮捕。就在这时，一位名叫威尔金森的美国人在前往喀什噶尔途中经过此地，结果被劝返回斯利那加。巴拉代乌·辛格上尉还致函给他，向他具体描述了那里的局势。此信上交给斯利那加的卫戍司令部。穆罕默德·汗上尉专门派了两个年轻人前去拦截此信。然后本吉的邮政局长在下午2点打电话给我，说收到了回电（见上文）。从坎萨拉·辛格处获知部落大军来袭的情况。巴拉代乌·辛格上尉希望，如果投降，他的安全能得到保障。但最终他还是惶恐难安，和其他的印度教徒、锡克和道格拉士兵一起向本吉后面的大山里逃遁。穆斯林士兵奉命前往追捕,但不得开火。当时穆罕默德·汗正殷切期待哈桑·汗上校从印度河的另一面向此地进军。他派了几个人驻守这边，并挥舞写有"真主至大"的标语。次日，哈桑·汗上校同贾玛达尔沙·汗和贾玛达尔萨菲乌拉·贝格到达本吉。本吉行动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广泛支持，村民们提供了一切情报以及逃兵的去向。

哈桑·汗上校到达本吉后，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逃亡士兵被擒获。穆罕默德·汗上尉继续向阿斯托尔进发,捉拿逃兵。古拉姆·穆尔塔扎苏贝达尔一路追赶，直至米尼马尔格（Manimarg）山谷。

哈桑上校列出了一张清单[89]，都是本吉陷落以后缴获的物资：

1. .303 军用步枪	1100 支
2. 3 英寸迫击炮	6 门
3. 2 英寸迫击炮	29 门
4. 中型机关枪	9 挺
5. 布伦式轻机枪	50 挺
6. 斯特恩式轻机枪	200 挺
7. 各种弹药	足够一营士兵 6 个月之用
8. 粮草	可维持 6 个月
9. 运输用的驴	可供一个连使用
10. 军用马匹	12 匹
11. 帐篷	可供一营士兵扎营

12. 财物　　吉尔吉特 110 万卢比，本吉有 10 万卢比，阿斯托尔有 62000 卢比

哈桑·汗[90]上校证实，他在 11 月 7 日曾派穆罕默德·汗·贾拉尔上尉带领两个步枪连前去攻打阿斯托尔，结果不尽如人意，于是他于 11 日亲自前往阿斯托尔，途中还擒获了几群敌军。在阿斯托尔，罗阇拉贾·汗和民众正在庆祝独立日。对阿斯托尔的行政管理做了一些调整，撤销了努尔·阿里罗阇区长一职。此地还有苏克德乌·辛格中尉带领下的一队逃兵，巴拉代乌·辛格尾随其后，他们正企图横渡阿斯托尔河。结果，苏贝达尔江·阿拉姆、苏贝达尔穆罕默德·阿明·拉托尔和罕萨的副苏贝达尔穆罕默德·萨达尔突然出现，于是他们被迫束手就擒。一排士兵继续逃往吉里戈德（Girikot），但被苏贝达尔沙·苏丹抓获。其他一些逃兵也陆续被擒。有消息传来，有一批吉拉斯商人订购的货物正在运输途中，并正运回古雷兹，于是想将这些货物拦截下来。古拉姆·穆尔塔扎负责此项任务，他成功地截获了这批货物。随着这批货物被截获，本吉行动走向尾声。随后，哈桑·汗上校回到了吉尔吉特。

巴赫塔瓦尔·沙和逃亡者被抓获

哈桑·汗上校宣布巴赫塔瓦尔·沙（Bakhtawar Shah）是个罪人，并下令通缉他。巴赫塔瓦尔·沙是哈尔毛希山区居民，他来到本吉向上校自首，请求宽恕他的罪行，给他自由。哈桑·汗上校宽恕了他，并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戴罪立功，那就是捉拿逃跑的那一伙锡克人，这伙人已沿着印度河逃往隆多。当他们正过曼迪的一座桥时，巴赫塔瓦尔·沙赶到，经过一阵短暂交锋，将他们一举擒获。这一伙人共有 21 人，由一位贾玛达尔指挥，他们带了一些武器弹药，向斯卡杜方向逃跑。巴赫塔瓦尔·沙出其不意的进攻使他们措手不及，纷纷就擒。接着他们被押往本吉，连同他们的枪支弹药。这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典范，巴赫塔瓦尔·沙这位具有魔鬼般胆量的人物，应该名留史册。

随着隆多山谷的最后一次行动的结束，整个吉尔吉特自由抗争运动拉上了帷幕。在此次抗争中，发生在吉尔吉特的运动和本吉的运动平分秋色，一起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吉尔吉特，侦察队成功逮捕了总督，而在本吉，土邦的穆斯林军队在哈桑·汗上校的率领下征服了道格拉和锡克军队。这两起事件结束了摩诃罗阇以往对吉尔吉特特区的统治。英国的统治和摩诃罗阇的宗主统治也同时永远终结。随着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沙·拉伊斯·汗总统地位的确立，在经过自由斗士们英勇奋斗而解放了的吉尔吉特地区，罗阇们的后裔呼吸到新鲜的自由空气。摩诃罗阇的两面三刀，从英国手中收回此地时的欺诈蒙骗，以及置人民意愿于不顾的做法激起了当地人民的怒火，失去了民心。更关键的是，发生在本吉、阿斯托尔和隆多山谷中的武装行动不仅彻底摧毁了摩诃罗阇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力量，而且还在本吉和阿斯托尔，以及沿着印度河通往隆多的整个地区树立起吉尔吉特临时政府的权威。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依赖于这些地区的英雄人物，他们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单枪匹马为解放祖国英勇奋斗。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吉尔吉特再次从外强手中夺回了自由、独立，并最终自愿加入了巴基斯坦，与南亚的穆斯林同胞们一起共享自由的果实。

巴夏上校——勇者无敌（图 60）

争取自由之路充满艰辛，而守护和巩固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果实也绝非易事。自由斗士们为前一项使命而战，而后一项使命的完成，则有赖于另一位军方人物——巴夏（Pasha）上校。他是迫于这一地区形势的压力而应征入伍的，也许是抛弃了个人的选择，参与到这项从查谟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手中解放尽可能多的北部地区的伟业中来，并尽力保护它不再受外来侵略。面对这一地区的军事形势，他的座右铭是“成功的防御来自主动的进攻”。令人感慨的是，他的祖父，萨达尔·萨玛德·汗（Sardar Samad Khan）曾为摩诃罗阇效力，帮助他赢得了亚辛一役；而出生于下一个时代的孙子，却要从摩诃罗阇手中夺回大

片地区，将它们归入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疆域。这位大无畏的叛逆者，尽管只经历了短暂的自由抗争运动时期，仍无碍于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巴夏上校——矮壮的身躯中充满了不可征服的勇气和力量，这是传承了他的先祖——西北边境省蒂拉赫（Tirah）的阿夫里迪家族的禀赋，但在他的血脉中，还奔涌着大地之血——那是狩猎生活和山野狂放之气的产物。这些地区异想天开的运动项目赋予他对大山的热爱，教给了他丰富的地理知识，很少有军事统帅能集这些素质于一身。正是他的这些禀赋和父亲拉赫玛都拉准将（Rahmatullah，也是土邦军队的一员）家中军事传统的熏陶，注定了上校将成为山区野蛮之师的统帅。那些山区将士勇猛无敌，但需要加以有效的组织，并训练他们应付捉迷藏式的战斗方式的能力，以抵抗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敌军——他们发起了一系列的突袭，从敌人那里掠得食品、衣物和武器，大大削弱了对方的力量。这位魔鬼统帅就是穆罕默德·阿斯拉姆·汗少校（1963 年退役时的军衔为准将），[91] 他于 1918 年 8 月 27 日生于查谟，家有九兄弟，1932 年奉命驻守拉多（Rattu），[92] 直到 1941 年，将近两年。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缅甸前线的肯尼迪山峰抗击日本人的英雄之一，赢得了一枚十字勋章。战后，他从土邦军队退役，以印度陆军第五师二级参谋的身份驻守兰奇（Ranchi）。最后，他选择为巴基斯坦事业而奋斗，开始了在杰卢姆河谷的冒险之旅。[93]



图 60　巴夏上校（阿斯拉姆准将）

如今，吉尔吉特终于解放，临时政府殷切期盼加入巴基斯坦，以获得庇护。但对巴基斯坦方面来说，接受吉尔吉特的加入并不是一种轻而易举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将担负起巨大的责任。巴基斯坦政府办事方式不佳，领导层与吉尔吉特缺乏切实有效的沟通。在委派了经验丰富、意志坚定的萨达尔·穆罕默德·阿拉姆·汗[94]为政治代表前往吉尔吉特临时政府统管政务后，还要选派一位军事指挥官，这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哈桑·汗上校（曾为前克什米尔土邦军上尉）那时代表临时政府把持着这一地区的军事统领权，他本来有可能继续他的统领地位，并主管防御问题，但他在巴基斯坦高层领导中的影响不大，而且长久以来未在巴基斯坦军中任职。[95]于是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穆罕默德·阿斯拉姆·汗少校，他既在巴基斯坦高层中享有盛誉，又熟知当地的地理环境，经验十分丰富。当时他正在乌里（Uri）地区作战，接到命令后，他飞离此地，卸去了巴基斯坦军中的职务，并许诺说只要他能生还，就可重返岗位。吉尔吉特之路充满艰险，处处都是武力争斗，而且，休想从巴基斯坦得到人力和军事装备上的支持。[96]他的任务是利用此地所能利用的一切人力和物资，保卫业已解放的领土。这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只有如巴夏上校那样具有非凡胆略的人物，才能担此重任。他天生就是那些居住在高山之巅的剽悍之士的统帅。他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对此，他曾向作者举过一例，有一次他愤怒到极点，甚至要逮捕萨达尔·穆罕默德·阿拉姆·汗，因为萨达尔反对他将吉尔吉特侦察队派遣到特区以外的斯卡杜去。[97]后来，通过巴基斯坦高层官员的调解，矛盾才得以化解。[98]另一件事与当局委派他前去加封那些在自由抗争运动中做出卓越贡献的英勇将领有关，其中有巴布尔·汗，沙·汗和古拉姆·穆尔塔扎，授予他们中尉之衔。

巴夏上校于1947年11月30日首次飞抵吉尔吉特[99]，此行意在考察当地的局势，[100]以便提前为政治代表实施一些政策措施提供军事保障。正如我们从哈桑·汗的叙述和海德尔的日记中读到的，由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营的指挥官同吉尔吉特侦察队的英国指挥官威廉·布朗少校之间存在着争斗，形势很难把握。而且，土邦军队的两位高级军官——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和艾赫桑·阿里少校的被捕使形

势更为扑朔迷离。英国指挥官野心勃勃，他曾于 1947 年 11 月 26 日飞往白沙瓦，很有可能得到提升。巴夏上校到来后，急于想在吉尔吉特建立一支自由军，为此目的，他会见了侦察队的全体 JCO、哈桑·汗上校、艾赫桑·阿里少校和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对于马吉德为何迟迟不伸出合作之手，而艾赫桑少校却立刻表示全力支持的原因，众说纷纭。[101]巴夏上校决定动员吉尔吉特一切可动员的人物，与他们进行磋商，提出他关于发起主动进攻的方案。计划之一是派艾赫桑前往拉达克，然后建议向古雷兹进军突袭班迪布尔。[102]不过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巴夏上校带着这一设想于 1947 年 12 月 3 日回到了拉瓦尔品第的总司令部。返回前，他做出了两大决定：首先，当巴夏接手所有事务后，将两位英国军官（布朗少校和马西森上尉）遣回；其次，派哈桑·汗上校前往吉拉斯负责军事。[103]布朗少校于 1947 年 12 月 8 日返回，不过没有得到任何提升，只是传达上面的命令，招募 500 名新兵加入侦察队，由少校苏贝达尔穆罕默德·巴布尔·汗负责此事。[104]布朗对此很是不满，尽管他自己昭告天下，愿意为独立大业效劳，但他的不满情绪还是发泄到古拉姆·海德尔·汗中校身上，导致了两人之间冷言相向，拳脚相对。这些情况稍后我们在海德尔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情况没有得到改善，直到 1948 年 1 月两位英国军官离去，巴夏上校回来接管了吉尔吉特联军的指挥。[105]上校详细讲述了在总司令部向他们请求物资援助的情况。但仅从谢尔·汗少将处得到了 4000 卢比。其中一半资金用来在拉瓦尔品第的拉贾巴扎购买羊毛毯和旧衣物，飞机在本吉上空将这些物资空投而下。他的弟弟，安瓦尔少校也赶来相助，被授予少校旅长（Brigader Major）之衔。阿兹默德·阿里上尉被任命为副军需主任，负责后勤。他的另一位兄弟，空军中校（后来的空军中将）阿斯迦尔·汗（Asghar Khan），当时是里萨尔布尔（Risalpur）军校的负责人，从 1947 年 12 月 9 日起就开始视察吉拉斯和其他地区，正是这次视察促成了空投物资。为此使用了达科他运输机、哈利法克斯轰炸机，甚至霍华德飞机。

巴夏上校回到吉尔吉特后，建立了他的司令部，将联军发展到约 2000 人，将从土邦军缴获的所有武器分发给他们，其余人受训时只能

用木枪。他组建了以下四支部队：

A 联队——前第六查谟和克什米尔步兵营，由穆罕默德·汗·贾拉尔上尉指挥，驻本吉；

B 联队——前吉尔吉特侦察队，由哈桑·汗上尉指挥，驻吉拉斯；

C 联队——前吉尔吉特侦察队，由巴布尔中尉指挥，驻吉尔吉特；

D 联队——前吉尔吉特侦察队，由艾赫桑·阿里指挥，驻吉尔吉特。[106]

这次突击视察揭示了阿斯托尔以南，布尔济尔山口至古雷兹方向，越德沃萨依高原直到祖吉山口一带的军事防御体系的空缺。敌人可通过两处山口再次进犯北部地区。鉴于班迪布尔—阿斯托尔公路和格尔吉尔—斯卡杜公路已成为摩诃罗阇统治时期最繁忙的通道，而且在邻近斯卡杜地区，敌人的力量依然强大，他们很可能纠集一些逃散部队沿着印度河直扑吉尔吉特。巴夏上校制订的方案中的当前目标是：向这些空白地带进军，在冬季前后敌人有机会反攻之前占领尽可能多的区域；拒敌人于东南和西南两个山口之外，以强大的兵力阻断他们的通道，以期敌军在次年夏季没有任何可能性重占上述已被我方占领的地区；最终消灭敌军在斯卡杜的力量，并占领整个巴尔蒂斯坦，将其并入北部地区。这一计划似乎将克什米尔和查谟主河谷之外的那些“边境”地带也囊括在内了。巴夏上校几乎不可能有从北面入侵克什米尔的意图。如果他能守住祖吉山口，那仅剩的一个入口就是拉达克，他可能会前往那里，切断它与查谟和克什米尔的联系。整个计划的意图不言而喻，即征服巴尔蒂斯坦，把疆域拓展到克什米尔门口，也许这就是巴夏上校去吉尔吉特的使命。上校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一向都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哪怕是一年中最恶劣的季节。某些人由于妒忌而谴责他，说他在他的指挥官哈桑·汗上尉陷入困境时竟坐视不理，当时哈桑·汗从古雷兹—班迪布尔地区向斯利那加进军时面临溃败的局面，但原计划并不包括征服克什米尔。[107]

根据在吉尔吉特制订的原计划，巴夏上校新组编了两支部队。第一支，他意味深长地将其命名为“虎军”，由哈桑·汗上校指挥。另一支称“北山羊军”，由艾赫桑·阿里少校指挥。虎军的任务是向德拉格

巴尔和古雷兹进军，继而进攻班迪布尔，以猛虎咆哮之势将印度军队震慑于北部疆域之外。北山羊军则像北山羊般在这片土地上腾挪跳跃，沿着印度河，穿越高山，先在隆多会战印军分遣队，继而占领斯卡杜，然后向格尔吉尔和拉达克进军，以阻止克什米尔谷地的印度军队来袭。这一期间最大的难关就是冬季恶劣的气候。大雪封堵了前进之路，只有本地区的强壮士兵才能抵抗这种严寒。但这位不畏艰难的指挥官部署指挥了每一步行动，并准备因地制宜，相机而动。北山羊军在斯卡杜受挫后，大军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在冬季向格尔吉尔进军。但巴夏上校将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吉拉姆（Chilam），并开始在布尔济尔周边的雪地里训练另一支部队。这些士兵来自罕萨和亚辛，自小生长在雪野，他们还在受训时就被要求用布裹住腿脚，踏着15英寸厚的积雪穿越德沃萨依高原，在三天内到达格尔吉尔、德拉斯和祖吉山口。另一位冰雪勇士，罕萨的沙·汗中尉指挥的部队被形象地称作“爱斯基摩军”，因为他们必须要挑战海拔12000英尺、覆盖着厚厚冰雪的德沃萨依高原，在雪峰顶上风餐露宿，并想方设法从敌人那里夺取食物、御寒的衣物和武器。正是这一攻击性行动方案的实施，才真正建立起北部地区的防御体系。在巴夏上校率领下，那些具有钢铁般体魄和无穷战斗力的将士们饱经风霜，终于在如此恶劣的气候下完成了预定计划。

在此行动方案中，[108]值得强调的是巴夏上校给他的指挥官们以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充分发挥个人的才智和主观能动性，并通过几次突袭在敌军内部制造混乱，彻底扼杀了土邦军队进攻的任何可能性。上校采取的策略与当地士兵的禀赋十分契合，他们富有山地作战经验，首先驻守在山顶，四面埋伏，然后集中火力伏击山谷的敌军。无疑，敌人不是被悉数歼灭，就是方寸大乱，各自逃命。这些行动之所以可行，还在于统帅对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能及时下达指令，派遣人员和物资增援，甚至将连队从一个地区转往另一地区。此种转移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派遣60人的一支小分队，由穆罕默德·阿里苏贝达尔带领，前往图尔戈山嘴，伏击由基尔巴尔·辛格（Kirpal Singh）上校率领的、正沿着印度河来犯的一个印度营。苏贝达尔将他的队伍分成两队，一队驻守在北边的山上，另一队驻守在南边，三人一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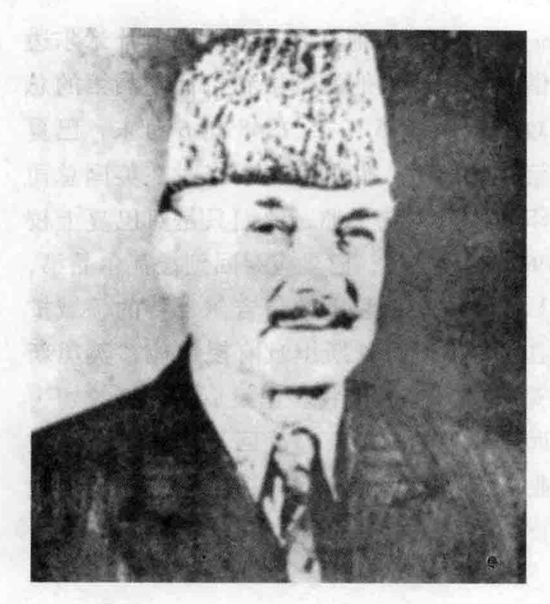
躲在分散的巨石后面，当敌人行进至山谷时，同时开火，南北夹击，仿佛山顶的所有巨石都从天而降，怒击敌军。在铺天盖地的火力下，敌人无处可逃，溃不成军。周密的计划和成功的运作促成一个完美的结局。另一个例子就是德拉斯的占领。占领德拉斯比预计时间晚，此项任务由谢尔·阿里苏贝达尔带领部队执行。这位苏贝达尔遵循古老的伊斯兰教传统，不愿以突袭的方式杀死敌人。于是他停止向其余敌军开火，而是让他们拿起武器，与他们正大光明地决一胜负。这种旧时剑客的决斗方式非常公正，不过双方武器装备应在同一等级。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他们的武器不如敌军，这使苏贝达尔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境地。结果，德拉斯久攻不下。于是上校派兵增援，从古雷兹地区的虎军调去四个排的援军，最终击败敌军，占领了战略要地德拉斯，并继续向下一个目标祖吉山口进军。指挥官的这一系列军事行动曾受到一些无知之人的批判，[109]但巴夏上校深知他这些行动的战略意义。他分散部署了爱斯基摩军，唯一的目的就是在夏季来临之前封锁穿越祖吉山口的公路，只有上校才懂得如何在不同地区用兵以实现这一目标。

在哈桑·汗上校成功地控制了古雷兹—阿斯托尔公路并驻扎在德拉格巴尔山口后，另一重要目标就是向格尔吉尔、德拉斯和祖吉山口推进，因为敌军正是沿此方向试图冲破防线，派援军前去斯卡杜解围。有鉴于此，巴夏上校下令艾赫桑·阿里少校尽快占领斯卡杜，然后沿着印度河向伯尔戈达、克尔门和拉达克进军。当艾赫桑·阿里前往斯卡杜时，巴夏上校派遣其余部队打着爱斯基摩军的旗号向格尔吉尔和祖吉山口进军，执行先前交给艾赫桑·阿里少校的任务。为此，上校从所有地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尽管那些地区的战斗还在继续。他甚至从斯卡杜调来一些部队以求尽快完成此地的任务。而且后来在斯卡杜攻陷之前，又命令艾赫桑·阿里少校将当前的任务交给旁人，火速赶到这最艰难的地区领军作战，当时敌军后援部队正向此处进军。后来，在此地区发生了数起重要战役，战果应归功于巴夏上校。他运筹帷幄，不仅封锁路线，阻拒印军，而且根据他一贯的进攻性行动策略，将士兵分散部署于拉达克各处。尽管由于印军的空中优势，没能占领他们的司令部，但上校的手下包围了首府，并一直往南推进，直

至查谟方向的巴达姆（Padam）。事实上，他已到达查谟和克什米尔边界与印度领土的交界点喜马偕尔邦，当时他发电报到拉瓦尔品第的总司令部，只说了三个词“进攻喜马偕尔邦”。到1948年6月末，巴夏上校在这六个月中取得的成就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当时在英国总司令管辖下的总司令部对占领印度领土不感兴趣，他们只是对巴夏上校取得的辉煌战绩感到欣慰。1948年7月初，巴夏应召回到拉瓦尔品第，就任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的私人秘书。巴夏上校将吉尔吉特的疆域扩展至克什米尔门口，为表彰他的功绩，巴基斯坦政府授予他“英勇新月勋章”（Hilal-i-Jurrat），后来又提升他为准将。退役后，阿斯拉姆·汗准将选择留在这个地区，远离政界的喧嚣，静静回忆他往昔的英雄岁月。此外，他还投资旅游业，在这偏远的跨喜马拉雅地带经营了数家香格里拉饭店。

哈桑·汗上校——虎军的英雄（图61）

哈桑·汗上校是一位具有多种才能的不凡之人，他一生中经历的不同角色以及作为军事指挥官和政治领袖所取得的无数荣耀，足可以写一部惊心动魄的传记。有无数关于他的著作或文章，他自己也写了许多文章，如果能搜集到这些资料，在此基础上加以研究，也许能客观地评价他个人的成败得失，忠奸贤愚。但这些文章大多以乌尔都语写成，而且缺乏史学规范，无法公正全面地展现他的个人历史。有关文章大多是歌功颂德，很少以批判的眼光去考察他行为的多维性。可以确知的是，他每到一处，都很引人注目，并以伟大领导者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无论是在纷飞的炮火中，还是在追求国家独立的爱国热情前，或是在伊斯兰教的神圣事业面前，以及在为他的人民争取政治权利时，他都是一马当先，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投入到为他人造福的事业中去。当然，他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天才，一位天生的领袖，自由斗士们的灵魂和旗帜，钢铁铸成的身躯能抵挡一切艰难险阻，而且，对他的人民，对他为之献身的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的一生，坚


图 61 哈桑·汗上校——虎军的英雄

持不懈地为他的人民而战，为他为之生、为之死的伟大理想而战。如果有谁可称之为20世纪吉尔吉特独立自由之父，那非哈桑·汗上校莫属。他逝世后，安葬在吉尔吉特独立纪念碑旁。这一荣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哈桑·汗1919年2月生于吉尔吉特，在那里接受了早期教育。1934年，从蓬奇的J. V. 中学考入高一级学校时，他首次作为全区的候选人之一面对大众。[110]他为自己是吉尔吉特罗诺家族（参看本章“克什米尔土邦军官联盟”节）的子孙而深感自豪。但他的父亲米尔扎·塔杰·穆罕默德·汗未受过教育，[111]母亲是纳格尔人。他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受到高等教育，便送他去斯利那加求学。在求学期间，父亲不幸逝世，于是瓦齐尔·米尔·侯赛因·沙将他带往蓬奇。当地的居民和他们的英雄事迹以及蓬奇地区的整体氛围给哈桑·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在他心中埋下英雄主义的火种。争取到奖学金后，他进了斯利那加的学院。还在求学期间，他就决定投笔从戎，前往查谟，应征入伍，成为英国陆军的一名印度兵。在米尔扎·法基尔·乌拉上校的建议下，他申请了王家军衔（King's Commission）。1937年，作为学员进入台拉登（Dehradun）的印度军事研究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务于第四克什米尔步兵师，亲历了缅甸战役。为表彰他在前线的英勇无畏，授予他缅甸之星纪念章、军功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对于在缅甸的英雄事迹，哈桑·汗自己有过一番详细的叙述。

从缅甸回来后，他的政治抱负开始萌芽。1947年，他在比姆巴尔

的第六克什米尔步兵团服务。6 月 18 日，克什米尔总理 R. C. 卡克来访，就餐时，他无意中透露出他正在考虑克什米尔独立问题，他还泄露了整个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将回归给摩诃罗阇的消息，并说摩诃罗阇不久将访问比姆巴尔。1947 年 6 月 21 日，摩诃罗阇哈里·辛格率法基尔·辛格（Faqir Singh）中校到访，考察哈桑·汗上校当时负责的收容从旁遮普地区流入的锡克难民的工作。摩诃罗阇对他总是心存疑虑，不太信任。哈桑·汗上校收留了锡克难民，但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他已深刻感受到摩诃罗阇对他的不信任。穆斯林士兵从缅甸前线归来后，摩诃罗阇对他们的态度甚为冷淡，对此，哈桑·汗早已觉察，并深感苦恼。在一次会议上，穆斯林军官们聚在一起谈论克什米尔的未来。哈桑·汗上校和穆罕默德·阿夫扎尔·汗（Mohammad Afzal Khan）少校都同意应该推翻克什米尔的道格拉统治。后来他们还联络到了斯利那加的穆罕默德·曼夏·汗（Mohammad Mansha Khan）上尉、穆罕默德·谢尔·基亚尼（Mohammad Sher Kiani）少校、赛义德·迦曾弗尔·阿里·沙（Sayyid Ghazanfar Ali Shah）少校和穆罕默德·丁少校，他们一致表示支持这一计划。后来还联系了穆罕默德·阿斯拉姆·汗少校，委托他在查谟接应。1946 年，革命委员会成立，哈桑·汗上校任主席，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发动革命。最终，他们决定英国人一撤出印度，就推翻道格拉人的统治。他们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成员们立下盟约，于 1947 年 8 月 14 日占领军营，开始行动。但这一计划并未付诸实施，因为上级在各区选派了一些军官驻守其他地方。正是这次调派，使哈桑·汗上校来到了本吉。

在赴本吉途中，哈桑·汗上校和他的连队举起标语拥护巴基斯坦之事被告发，还被告至坎萨拉·辛格准将处。幸好对此事进行调查时，大家都为哈桑·汗辩护，说那标语只是表达了一些宗教情绪而已。此前我们已看到哈桑·汗上校在本吉和吉尔吉特的地位举足轻重，以及在众将士的鼓舞下，他是如何投身到独立大业中去的。革命胜利后，成立了临时政府，哈桑·汗独揽了军权，随后又掌握了吉尔吉特侦察队，而且一直与英国军官誓不两立。他很怀疑英国军官的忠诚度，要不是古拉姆·海德尔·汗中校的阻拦，早就剪除了他们。古拉姆·海

德尔·汗起先与英国人关系很好，但后来也与他们对立。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他还参与行政事务，对阿斯托尔的行政进行了一些调整。巴基斯坦政治代表萨达尔·穆罕默德·阿拉姆·汗到来后，哈桑·汗强烈要求保留临时政府的内阁作为咨询机构辅佐政治代表。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他去了本吉和阿斯托尔，担起这一地区的军事重任。

可惜的是，巴基斯坦政府接管了吉尔吉特地区后，没有委任他为吉尔吉特联军指挥官。也许此时的哈桑·汗已太过政治化，[112]而政府希望有一位值得官方信赖的纯粹的军人来指挥军队。尽管如此，在众多参与革命的土邦将领中，唯独选中哈桑·汗上校领导古雷兹—德拉格巴尔地区的重大行动。关于这次战役的情况，将在下文谈到。[113]

哈桑·汗上校被选为虎军指挥官。他手下的许多军官都来自吉尔吉特和布尼亚尔，也有来自前克什米尔土邦军的。这些军官的名单，哈桑·汗都有记录。一部分士兵来自罕萨，由沙·汗指挥，是一支后备军。开始时，虎军只有 500 人，装备简陋，粮饷不足。他们被带往吉拉斯受训，在吉拉斯待了两个月后，1948 年 2 月 27 日，部队前往本吉。此时，普拉塔普桥业已修复。在本吉，他们在巴基斯坦飞机空投的物资中获得了一些御寒的破衣旧毯。3 月 3 日，他们离开本吉，撑筏横渡阿斯托尔河，附近就是已被摧毁的罗摩卡特大桥。然后，他们穿越马希金（Mashkin），于 6 日到达阿斯托尔。接着，部队从此地向古达伊和吉拉姆进军，到达布尔济尔山口之巅。山下 15 英里处是米尼马尔格。在这里，他们首次遭遇印军战斗机的轰炸，布尔济尔残余的房屋被炸毁。在米尼马尔格海拔 11500 英尺的地方建立了分区司令部。当地人民热烈欢迎部队的到来，并为他们提供食宿。3 月 9 日午后，他们离开了米尼马尔格，希望晚上能到达古雷兹。古雷兹离此处大约 25 英里，途中要穿过一条狭长的山谷和幽深的山隘。征途遥遥，他们经过了卡姆里（Kamri）、杜特格希（Dudhgahi）、杜特甘加（Dudhganga），到达古雷兹河边。古雷兹人民热情迎接他们，视他们为圣战者。部队的下一个目标是甘加尔万（Kangalwan），离此 22 英里。在那里，部队受到了村长（Nambardar）拉希姆·朗（Rahim Lone）的欢迎。部队继续前行，到达德拉格巴尔河边的一个村庄，结果这位拉

希姆·朗是印度奸细。最终，部队于1948年3月10日到达了德拉格巴尔顶峰，然后派遣沙·扎曼带领一个连为先锋，前去占领德拉格巴尔山上大约在13000英尺高处的房子。1948年3月11日凌晨占领了那里。离此9英里之下是孙德尔班（Sundarban）河谷，印度人已到此处，一个印度旅在班迪布尔扎营，其余印军正在与当地民兵和河谷的部落武装作战。虎军的主要目标是防卫德拉格巴尔山口，以免其落入敌军之手。与敌军的首次会战发生在孙德尔班下游河谷。少校苏贝达尔沙·扎曼和苏丹·阿尤布向印军司令部发起猛攻。这次进攻非常突然，以至大湖北部至肖布尔（Shopur）的整个地区被先锋队一举攻克。这是在哈桑·汗上校指挥下实施的进攻型战术。从吉拉斯到此地，虎军一路前进，势如破竹，如今已赶在了敌军前面。他们又迅速向沙格尔丁（Shakardin）山丘、维贾耶格里（Vijaygali）和迦班达巴尔（Ghabandabal）推进。此时，巴基斯坦军官带领的部落武装正从另一个方向攻来。1948年3月中旬，印军发起反攻，将部落武装击退，并集中兵力猛攻德拉格巴尔，逼退了虎军。当时，整个西部地区，包括沙尔达（Sharda）、盖尔（Kel）、杜提亚尔（Dudhial）、道巴特（Taobat）和帕格杜尔（Bhagtor），全落入虎军之手。此外，他们还向离南部将近60英里的乌莱尔（Wuller）湖北部地区进攻。1948年3月10日，虎军挑选了一支特种部队，在阿克巴·侯赛因、沙·贾汉和费尔道斯的率领下深入克什米尔腹地。当时，敌人对德拉格巴尔的进攻绵绵不绝，还出动了空中力量。到3月14日，虎军只剩下300人，与印军的两个旅对峙。司令部没有派任何援军，而且剩下的兵力中还要调一部分去其他战区（见下文）。3月14日—15日的夜里，一排伤兵撤出德拉格巴尔，转移到古雷兹。当敌军调集所有兵力来袭时，哈桑·汗上校决定将他元气大伤的部队撤退到15英里外的戈拉格巴尔（Koragbal）。但在撤退前，又与敌人进行了一番恶战，敌人费时三天，都未能占领德拉格巴尔的房子。不过，敌人在上方，而虎军在下方通往维贾耶格里的方向，地形上处于劣势。由于没有援军增援，德拉格巴尔山口落入敌军之手。哈桑·汗上校被召回拉瓦尔品第。

哈桑·汗上校取得的赫赫战功有目共睹，他在如此恶劣的气候下

率军占领了古雷兹，封锁了德拉格巴尔山口，使敌军无法进犯，甚至一直攻到班迪布尔方向的克什米尔河谷地区。同时，他的部队还调出一些兵力前去支援吉申甘加谷地。在配备精良的印军再次来袭，而且还出动了空中力量的情况下，哈桑·汗上校手下的将士们用简陋的武器顽强抵抗。当哈桑·汗看到我方伤亡过大时，决定有序地撤退。撤退前的还击如此具有威慑力，以至于敌人三天不敢进入德拉格巴尔高地。这使哈桑·汗有时间在古雷兹北部重新部署兵力，从而在丘尔班（Chorban）筑起一道防线。当战斗还在进行时，哈桑·汗便被召回。如果他有幸能得到增援，那很有可能已在克什米尔谷地抗击装备精良的印军。冬雪消融，印军正准备东山再起。此时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防御战略，这些都是哈桑·汗上校离开后的事了（见下文）。哈桑·汗上校在前线的辉煌战绩使他成为克什米尔的骄傲。他还被授予“巴基斯坦勋章”，后来又出任自由克什米尔政府的国防秘书。[114]

艾赫桑·阿里少校——北山羊军的英雄（图62）

来自吉尔吉特的艾赫桑·阿里少校（后晋升为中校），高个子，体型匀称，孔武有力，且非常谦逊，绝少宣传自己，他有着实践的智慧并且对自己的职责无限投入。[115]在他的领导下，巴尔蒂斯坦于1948年被征服。因此，作为一个真正的巴尔蒂斯坦征服者，他应被历史铭记。[116]但是著书立说者对他颇不公平，因为委派给他的任务的重要性没有被充分重视。他不仅战胜了难以克服的自然条件的困难，而且每前进一步都碰到了敌人，他必须率领他装备糟糕、缺乏训练的队伍和那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士兵进行遭遇战。他从吉尔吉特沿着印度河强行推进到斯卡杜，再到克尔门、伯尔戈达和拉达克。他缓慢但是稳健的前进打破了敌人的供给线，阻止了他们的前进，迫使他们狼狈撤退，并且结束了对方在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建立了近一个世纪的管理机器。在这次征服行动背后，北山羊军真正的人物是艾赫桑·阿里少校，他执行了整个计划，并把他的人马引向了胜利。由于他在所有

战役中扮演了艰巨的角色，巴基斯坦政府授予他“勇敢之星”（Sitara-i-Jurrat）勋章。



图 62　艾赫桑·阿里少校（后晋升为中校）——北山羊军的英雄

艾赫桑·阿里少校来自纳格尔的瓦齐尔胡达·阿曼·汗（Khuda Aman Khan）家族，1914 年 8 月 28 日出生在纳格尔的梅鲁库沙尔（Melu Kushal）村。他在吉尔吉特受完早期教育后，1927 年到斯利那加上高中，并于 1929 年成功通过十年级考试（Matriculation）。1932 年 11 月 19 日，他成为第一个得到克什米尔军队军衔的来自吉尔吉特地区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中东作战。1943 年他参加了丛林战课程，随后开始忙于训练这次课程中的其他人。1947 年在克什米尔他是退役军官，他用在斯利那加军队司令部当少校的才能担当民事联络官（Civil liaison officer）一职。他被调去接替斯卡杜的穆罕默德·丁少校。艾赫桑·阿里少校和他的家人于 1947 年 10 月 29 日抵达本吉，10 月 30 日报到上任。在这里他担任第六克什米尔步兵营的指挥连的指挥官。所有这些事件表明艾赫桑·阿里少校完全没有意识到在吉尔吉特和本吉发生的自由斗争。直到 1947 年 10 月 30 日他上任之后，他才从担任贾玛达尔军需官（Quarter Master Jamadar）一职的少校苏贝达尔穆罕默德·阿里那里得到情报，说锡克人和道格拉人的目的是要杀掉穆斯林。据他所说，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收到了坎萨拉·辛格准将发来的派一个连到吉尔吉特的电报，便找他商量。按照他的意见，为了避免流血，派出了哈桑·汗上尉和他的连队。当时他自己想和家人前往吉尔吉特，然后把他们安全地留在家里。他到达了山嘴洋房，在那里，阿卜杜尔·

马吉德·汗中校正等着他。他要离开15天，于是让巴拉代乌·辛格上尉负责本吉的事务。在去吉尔吉特的路上,他和阿卜杜尔·马吉德·汗中校在“普布·辛格的山嘴”被阻，随后被送到了吉尔吉特侦察队的营地。据他所说，他对吉尔吉特侦察队的渴望一向抱有同情。事实上，他早些时候（见本章“吉尔吉特侦察队起初的作用”节）就向他们提供了来自斯利那加的有关摩诃罗阇意图的情报。尽管他被置于监视之下，但他的服役并没有被吉尔吉特临时政府取消。作为一个地方高级军官，他本应该更好地被任用，当时也没有听说他对革命运动有什么反对意见。[117]直到巴夏上校到达吉尔吉特后，他的自愿服役才得到赏识，被安排担任北山羊军的指挥官。这个任命结束了当地所有的争执和嫉妒，为朝巴尔蒂斯坦稳固前进铺平了道路。

摩诃罗阇在巴尔蒂斯坦的地位于1947年10月确立，此前有过描述(见本章“摩诃罗阇的准备与防卫”节)。当地的行政长官拉拉·阿玛尔·纳特（Lala Amar Nath）召集了一个由当地罗阇和民众领袖参加的会议以评估政治形势，但隆多的罗阇穆罕默德·阿里·汗没有出席。[118]据报道，当巴赫塔瓦尔·沙（见本章前一节）来到隆多急急追击来自本吉的逃跑的（锡克）排的时候，罗阇从他那里得知了吉尔吉特革命的消息。他立刻派了40名志愿者去达姆布达斯（Dambodas），还布置另一帮人驻扎在哈尔布拉（Harpura）和曼迪桥之间。逃跑的排分两批到达曼迪，但他们都被俘虏，并被带回了本吉或吉尔吉特。[119]据玛哈金所说，[120]奈格·阿拉姆上尉到斯塔格营救了本吉驻军的四个受伤的锡克幸存者，并在1947年12月4日把他们移交给塔巴中校。1947年11月13日，来自阿斯托尔区（Tehsil）的达什金（Dashkin）的两个人带来了一些哈桑·汗上尉写给奈格·阿拉姆上尉的信，力劝他反抗当局，[121]但是奈格·阿拉姆将此事报告给了拉拉·阿玛尔·纳特。这次事件之后，塔巴到隆多尽可能地布置了防卫警戒哨所，因为只有吉尔吉特—隆多—斯卡杜这一线为闪电式进军提供了所有的便利条件。他选择了斯卡杜西北约20英里的策利（Tsari）作为最好的开战地点。在这里，两边是陡峭的山冈，印度河从中穿过。他指定了两个排守卫这个瓶颈——一个排由奈格·阿拉姆上尉指挥，在河对岸布防；

另一个排由克里山·辛格上尉指挥，保卫河的这一边。在那里，他们开挖战壕，以使自己的防卫更加坚固。

据报告，隆多的罗阇募集了300名志愿者，并把他们布置在印度河右岸的瓦索拉（Wasola）和左岸的哈尔戈亚（Harkoya）。作为这次行动的结果，除格尔比达斯（Garbidas）、东古达斯（Tongudas）和巴吉贾（Baghicha）之外，整个隆多都解放了。此后，他给哈桑·汗上尉发了一封信，请求军事援助。哈桑·汗上尉在复信中保证一定派人给予支援。玛哈金报告了1948年1月12日的交火。这次交火肯定是和罗阇的人打的。[122]在此期间，斯卡杜形势紧张。人们受到当地道格拉行政官的压迫，当时许多文官拒绝合作，当地商人关闭了他们的店铺。[123]他们都在等待来自吉尔吉特的武装力量的推进。[124]玛哈金报告了斯卡杜随后发生的事件："敌人的破坏在1月中旬之后开始，给我们和其他人的家庭提供饮水的溪流在拉宾德拉格尔（Rabindragarh）被切断多次，电话线杆子和电话线多次遭到破坏。"

1948年1月，组建了由艾赫桑·阿里少校指挥的北山羊军。它由穆罕默德·汗·贾拉尔上尉率领的100人的A联队和穆罕默德·巴布尔·汗中尉率领的150人的D联队组成。1月29日，北山羊军在哈尔毛希聚集。从这里开始，A联队先行，D联队尾随其后。瓦齐尔·维拉亚特·阿里被任命为巴尔蒂斯坦助理政治代表。他和隆多的罗阇保持着联系。2月4日，北山羊军到达了斯塔格。得知北山羊军已经逼近，塔巴派甘加·辛格上尉带领两个小分队准备前往隆多。但据报道，在这支武装力量中担任巡逻任务的穆斯林分子发生了内讧，破坏了整个行动，甘加·辛格上尉不得不返回斯卡杜。这些人周密部署，用计谋逮捕了奈格·阿拉姆上尉。当艾赫桑·阿里少校到达策利时，奈格·阿拉姆上尉被带来见少校，他同意合作，加入到行动中来。[125]这样，道格拉在策利的形势变得脆弱不堪，而艾赫桑·阿里少校则获得了所有关于策利和斯卡杜的敌人的重要情报。他决定在策利和斯卡杜同时发动进攻，在行动之前，他派了一个由苏贝达尔江·阿拉姆指挥的侦察排前往策利和斯卡杜之间的古姆拉（Komara），以阻挡任何来自斯卡杜的援军。进攻计划在1948年2月11日和12日之间的深夜打响。

虽然道格拉排越过了河流，但丝毫没有觉察到北山羊军的到来。由于一场意外，在策利的行动提前进行了。A 联队的一个排乘筏子渡过河流，以阻挡敌人的撤退。为了伏击任何增援部队，奈格·阿拉姆上尉的人被布置在格察拉（Katzarah）。有一个消息被传给巴布尔中尉，说 D 连的指挥官停留在距策利数英里的格尔比达斯（Garbidas），但巴布尔没有收到这个消息，他在 2 月 11 日拂晓直接前往策利。这支队伍被道格拉人发现，双方发生了交火。艾赫桑·阿里少校决定与道格拉人交战。当敌人的火力停止时，一部分人被安排在策利村庄的上方作战，以阻止道格拉人向斯卡杜撤退。艾赫桑·阿里少校留了一个排由贾玛达尔比戈（Biko）指挥，以对付这里的战事，他自己则前往斯卡杜。在策利，克里山·辛格上尉把他的人藏在一个山洞中，但是勇敢的英雄巴赫塔瓦尔·沙一直追踪着他，所有的人在试图逃跑时都被杀死了。[126] 这次行动将隆多从道格拉人手中解放出来。在这次行动中，隆多的罗阇给予了北山羊军巨大的支持。策利和斯卡杜的道格拉军队中的穆斯林现在摆脱了道格拉人的控制，他们及时的情报和支持导致了最终的胜利。对隆多的彻底征服是北山羊军前进的结果，他们得到了隆多罗阇和他的人民的全力支持。

现在摆在面前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斯卡杜。在那里，希格尔河从北边，萨德巴拉河从南边汇入印度河。城镇被一个环形山脉包围——马尔夏卡拉（Marshakala）山和希姆萨克（Shimsak）山在北，图尔戈山和塔兰卡（Thalanka）山在东边和南边。印度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宽阔的湖。在中部耸立着像攻不破的要塞一样的克尔福久山，城镇就在山脚下。起伏的山峦之上耸立着一座堡垒，俯瞰着印度河和城镇，在山腰是另一座莫卧儿时期的堡垒。艾赫桑·阿里少校在印度河右岸的古姆拉集结他的北山羊军。到 2 月 12 日，贾玛达尔比戈解决掉策利的道格拉排之后，也加入进来了。少校将他的军队分成两部分：

> 奈格·阿拉姆上尉和巴布尔中尉将在格久拉（Kachura）越过印度河并沿着河的左岸前进，以便为沿河的右岸前进的

主力队伍形成桥头堡。策利的哈维尔达尔(Havirdar①)谢尔·穆罕默德被派往斯卡杜击沉所有船只，然后到达斯卡杜下游9英里的交叉点。他还将联系斯卡杜的穆斯林，让他们在进攻打响的深夜撤出城区，在城外约3英里的松杜斯村集中。在渡过印度河之后，整个军队将在松杜斯集合并发动进攻。

当这个进攻计划准备好时，收到了有关从克什米尔前往斯卡杜的第一支增援部队的消息。玛哈金写道：

> 第一批90人的增援部队在巴尔帕特·辛格（Parbhat Singh）上尉率领下于2月10日到达。在那个夜晚，斯卡杜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人们兴奋异常。最终他们的努力有了结果，斯卡杜的印度教—锡克居民区从大屠杀中被解救出来。第二天清晨6:30，斯卡杜兵营被包围，遭到600人的进攻，我们的军队约130人。[127]

艾赫桑·阿里少校渡过印度河，等待奈格·阿拉姆上尉，但他不能确定上尉的位置，于是他继续向斯卡杜前进。据说奈格·阿拉姆上尉留在后面，准备伏击可能从斯利那加经布尔济尔而来的一支敌军。[128]奈格·阿拉姆上尉的延误的确使人气馁。艾赫桑·阿里少校的队伍包围斯卡杜兵营时，曾策划了一个计谋，打算在纳依克谢尔·艾哈默德·汗和他的8个巴尔蒂人的帮助下占领卫兵室。其他一些士兵将从窗户进入兵营，这些窗户已被贾玛达尔拉希姆·达特·汗（Rahim Dad Khan）和他手下的人打开。其他一些人将关上道格拉士兵正在睡觉的那些房间的门。这个计谋不幸被岗哨发觉了，道格拉人被惊醒了。根据另一则记述，当关上门闩的工作结束时，将发射绿色信号弹。但却错发了红色信号弹。因此，侦察队未能占领卫兵室。很快，双方开始交火。依照玛哈金的说法，副专员拉拉·阿玛尔·纳特在火炉中烧

① 一种低级军职。——译者

毁了所有的机密文件，然后冲向金库，金库建得就像一个小型堡垒。在路上，他集合了一个印度教助理警官和一个锡克警官。第六查谟和克什米尔步兵营的萨尔弗拉兹·汗（Sarfaraz Khan）从金库后的一个枪眼用轻机枪射杀了他。玛哈金先生证实道："穆斯林战友在那夜之前逃跑并加入了敌人的行列。因为一次额外的背叛，印度教士兵的房间被从外面闩上了，因此他们无法到达军械库以获得武器进行抵抗。塔巴中校明智地布置重兵把守武器库，因此它免遭劫难。"[129] 到2月11日午夜，斯卡杜几乎所有的印度教和锡克平民都躲进了兵营。塔巴给斯利那加发送了如下消息：

> 斯卡杜兵营今晨6:30被敌人包围并受到进攻，敌人装备了3英寸和2英寸口径的迫击炮、中型机枪和轻机枪，以及来复枪。一挺中型机枪、4支来复枪和两箱.303弹药被夺。伤亡情况是：敌方10人死亡，我方15人受伤。包括无线电部门的所有穆斯林士兵逃跑并加入了敌人。敌人吸纳了我们的穆斯林背叛者，他们是本吉第六步兵营的穆斯林士兵和吉尔吉特的当地人，兵力超过200人。瓦齐尔、助理警官不见了。市政工程师被杀。很多印度教和锡克难民进入兵营。金库可能被抢劫了。[130]

关于穆斯林叛逃者，玛哈金记录道："31个穆斯林包括3个无线电人员从这里逃跑了，一个公开的和两个私下的穆斯林追随者也逃跑了，8个叛逃者带着武器。3个穆斯林士兵和克里山·辛格上尉在一起。"另一方面，据报告，1948年2月13日，第二批70人的印度教士兵在阿吉德·辛格（Ajit Singh）中尉的带领下到达斯卡杜。玛哈金这样概括道格拉在斯卡杜的形势：

> 虽然斯卡杜的驻防兵力达到280人左右，但这对于建立一个环绕斯卡杜的防御带来说还是太弱了。因为所有的当地人都逃跑了，所以印度教士兵把他们的给养和水运到了各个

> 哨所。尽管印度教和锡克年轻人没有受过战争技能的训练，但他们还是尽可能地充当了步枪射手、看门人，甚至当搬运工。[131]

塔巴中校在克尔福久堡建了一个哨所，围绕兵营建了6个哨所，形成一个环状，并严格规定印度教士兵的巡逻范围为以5英里为半径的所有方向，将敌人挡在这一界限之外。更有利的是他占据着印度河这一边的位置，包括整个斯卡杜镇，并一直延伸到北边的萨德巴拉湖，南边的格姆巴斯卡杜（Gambas Skardu）也在他的控制之下。沿着印度河，他有着同格尔吉尔和拉达克的便利交通，从这个方向他得到了援兵。他指望将来有更多的援兵。除此之外，他在克尔福久堡占有一个制高点，可以居高临下地观察印度河方向，直至印度河另一边的古姆拉的情况。如果他得到了其余的援兵，就能够在古姆拉发动一场进攻，或是派他的人到格久拉湖去。

艾赫桑·阿里少校领导的穆斯林进攻队伍渡过了印度河，在松杜斯上岸，并在克尔福久堡的脚下扎营，包围了兵营。为了他们最后的进攻，他们非常依赖从道格拉阵营中逃跑出来的穆斯林士兵，这些士兵在夜晚的寂静中重新进入道格拉兵营。他们清楚敌营的所有位置。他们中的纳依克谢尔·艾哈默德和其他8个人守着大门。士兵穆罕默德·侯赛因带着两个人进到兵营内把房门闩上。当他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时，敌军的一个宪兵有所察觉，大声呼叫起来。应该发绿色信号弹的侦察员犯了错，射出了红色信号弹，因此阻止了从外面侵入的人占领军械库。这个信号唤醒了道格拉人，使他们能够拿起武器到达各自的防御位置。艾赫桑·阿里少校依赖信号是一个极大的军事失误，他原本可以等待他的另一支队伍，然后在夜深人静时发动突然袭击。这样一个奇袭的机会被艾赫桑·阿里少校丢失了。双方的交火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正午。可能交火刚刚开始或不久以后，非常熟悉克尔福久山的纳依克谢尔·艾哈默德·汗和其他8个人从松杜斯这边爬上了它的最高点，这个最高点被叫做克里东（Khari Dong，在印度人测绘的地图中，它被叫做8853点）。早些时候，艾赫桑·阿里少校就在松杜斯

这边扎营并占据了一个位置持续猛烈射击（见下文），但双方都毫无进展。艾赫桑·阿里少校无法推进到兵营，因为它被防守得很好。最后因为三个原因做出了撤退的决定：一、重组队伍，包括奈格·阿拉姆上尉和巴布尔·汗中尉的队伍，他们在听到猛烈的炮火声后刚刚赶来，但这次重组只能在印度河的另一岸进行，可能在古姆拉或是一个远的、道格拉的火力达不到的、易于和吉尔吉特联系的地方；二、动员所有来自罗阇及其人民的当地支援，以增强战斗力，因为不能再指望来自吉尔吉特的援军了；三、最后，要阻止来自格尔吉尔的沿印度河而来的克什米尔援军。这次用奇袭甚至用炮火夺取斯卡杜的失败，显示了进攻队伍在军备和人力上的弱点。艾赫桑·阿里少校希望在穆斯林的帮助下用奇袭俘获道格拉人，但他们的一个错误导致了失败。因为没有充足的兵力，所以他不能对在兵营中利用战壕掩护得很好的道格拉人发起进攻。他必须撤退，构想别的策略。

关于这批在纳依克谢尔·艾哈默德·汗的带领下爬上克里东的狙击手有很多记载。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说道，[132]以戈瓦尔杜（Kuwardo）的哈吉·穆罕默德·阿里（Haji Mohammad Ali）为名的这个狙击点至今仍为人们熟知，因为他和其他人一起曾在这里肩负责任，以阻止道格拉人从兵营中跑出来到城区或松杜斯去，他们建立了这个狙击点。另一方面，在一次私人会面中，巴赫塔瓦尔·沙宣称他自己是狙击手中的一员，他占据了一个靠前的位置以狙击克尔福久堡底下的警戒哨。官方的叙述[133]是混淆的，因为纳依克谢尔·艾哈默德·汗的角色被描述了两次，一次是在进攻中，第二次是在撤退后。两个同样的角色被描述。对证据进行考察之后，事实是清楚的，撤退之后没有人爬上狙击点。可能是在交火开始或不久以后有人爬了上去。这个高高在上的狙击点为向兵营中的敌人开火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位置。玛哈金谈到了来自这个制高点的火力，以及塔巴为什么无法夺取它。[134]

如果一个人不是站在某一个立场上去了解真正的军事情况，是很容易因为失败而谴责指挥官，而把成功的荣誉归于他们自己的。在斯卡杜第一次进攻的失败，是因为错过了奇袭的时机而不是指挥官的失

误。他的撤退行动在军事上是合理的，因为对于他来说，重组自己的力量并设法阻止敌人力量的增长是必需的。就在第一次进攻的前一天，塔巴得到了他的援兵。艾赫桑·阿里少校本想伏击2月13日到达的第二批援兵，但他得到情报太迟了，[135]伏击未能进行。后来在3月份，当他得知法基尔·辛格准将正带着350名道格拉人的强大援军赶来，便立即安排了行动（见下文）。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逼真地描述了指挥官和他的军队沮丧的画面，[136]试图说明他为何不愿意再次发动进攻，直到他受到罗阇们和斯卡杜当地人民甚至穆罕默德·巴布尔·汗的鼓励。在对交战双方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力量进行一番考察之后，任何诸如此类的误解就会平息。因为别人的错误而失去了第一次机会，艾赫桑·阿里少校固然会受到谴责，但第二次行动并没有匆忙进行。的确，斯卡杜的人民正在道格拉人手中遭受痛苦，因为在印度河的这一边，他们是强大的；因为金库被抢劫，他们有采取行动的全部理由。人们毫不怀疑必须赶快拯救他们自己，因此需要“自由军”立刻来帮助他们。但是军事指挥官不得不从印度河的另一边权衡整个形势，在发动第二次进攻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并设计新的策略。从玛哈金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知道，在2月的下半月，双方在巡逻时发生过几次小冲突。2月25日，传来法基尔·辛格准将带来一个廓尔喀连的消息。在印度河右岸的艾赫桑·阿里少校带着他在古姆拉的指挥部，可以乘船渡过他和斯卡杜之间的宽阔河面，或是从格久拉湖和现在飞机场的方向绕道而行，或是先到希格尔，然后渡河，接近另一个方向的戈尔（Gol）。如果他有足够的兵力，两种方案都可以实施。他招募了巴尔蒂士兵，但是他没有武器发给他们。在一次私人会面中，巴夏上校将这种情况告诉了作者。另一个选择是开发当地资源，使兵力能够从当地罗阇们那里得到增强。当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谈及政治会议，以及希格尔、哈伯罗、斯卡杜的罗阇们派了代表团去说服艾赫桑·阿里少校发动第二次进攻时，他没有提及增加他的兵力的事情。他们的确给了他所有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但军事潜力是令人担心的，整个兵力仅维持着第一次进攻时的数量。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谈及了人们的圣战精神，一些志愿者参加了北山羊军。另一方面

他写到了希格尔的独立，当地的锡克店主被迫歇业。当来自斯卡杜的印度教—锡克难民到来时，在穆斯林中又一次产生了恐慌。艾赫桑·阿里少校不得不派去一个由贾玛达尔伊斯玛仪指挥的排，伊斯玛仪在1948 年 2 月 12 日升起了巴基斯坦国旗。在这次行动之后，希格尔的罗阇穆罕默德·阿里·沙捐助了物资并募集了一些志愿者。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读到了一封巴布尔·汗中尉为募集 500 名志愿者，并发给他们给养以及当地的枪、剑、棍棒而写往隆多的信。在此期间，艾赫桑·阿里少校收到了来自吉尔吉特的 45 支来复枪和弹药，6 挺轻机枪，以及 4 门 2 英寸口径迫击炮。[137] 由于军事力量的增强，开辟了一条通往克里东的道路，每天都派出一批新的狙击手。

一股独立运动的浪潮席卷了巴尔蒂斯坦。许多志愿者自告奋勇地给军队传递情报，提供支持。随着这个地区元气的恢复，艾赫桑·阿里少校决定把道格拉人牵制在兵营中，将人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随着这个新的牵制策略的制定，他开始布置他的人马展开包围，并继续支持克尔福久山顶上的狙击手。有几次遭遇战是和敌人的巡逻队展开的，他们受到了沉重打击。2 月 25 日，巴布尔中尉被派往印度河另一边的松杜斯。他在那里建立了他的指挥部，结束了敌人在斯卡杜镇南边的活动。因为狙击手在克尔福久山顶上，中尉的行动是可能的。接下来的日子，穆罕默德·汗上尉和一个排部署在侯赛因阿巴德，这样便封锁了东边。西边，艾赫桑·阿里少校自己在那里。北边，在萨尔法兰加（Sarfa Ranga）建了一个哨所。这样一来，兵营在所有四个方向都被包围了。这的确给人一种艾赫桑·阿里少校将对道格拉人发动第二次进攻的印象。然而，那些被占领的阵地表明，采用的计划是把道格拉人限制在他们自己的区域内，并围绕他们建起一条链状防御岗哨。而炮火仅仅来自克尔福久山顶，即 8853 点。

玛哈金写道，到 2 月 25 至 26 日，道格拉人从所有方向被包围了，他们随时面临着大规模进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塔巴命令印度教士兵从堡垒攀上山脊进攻 8853 点。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壮举，因为山脊上没有任何可抓的东西。绳索被抛下，他们摔了下来。于是他们试图从主山脊这边爬上山，但是失败了”。[138] 玛哈金报道了 3 月初军事行动的

增加，说道，“消耗战开始了”。

尽管如此,对于艾赫桑·阿里少校来说,更令人烦扰的是法基尔·辛格准将和他的印度陆军顾问库特斯（Cootes）上校向斯卡杜进军的消息。给塔巴的指令是，他应该保持印度河大道的通畅，甚至要占领（图尔戈）山嘴。但面对艾赫桑·阿里少校的包围策略，已不可能派他的人到他的防卫线以外去了。玛哈金记录道：

> 斯利那加方面告知斯卡杜一方，增援队伍（由法基尔·辛格准将指挥）将于3月18日到达斯卡杜。但不幸的是，它在到达的前一天遇到了灾难。3月17日，斯卡杜兵营遭到敌人猛烈的炮轰和射击，以致无法和来自包围圈外的被伏击的队伍接头。不过，3月18日，从斯卡杜派出了两个虚弱的排，会见并接受了援兵。斯卡杜的排也遭到了伏击和来自三个方向的火力，但他们安全地返回了驻地。[139]

图尔戈山嘴（Thurgo Pari，印度人将Pari拼成Ipri）的伏击在斯卡杜的军事史上是值得纪念的。准将率领350人，携带弹药、给养、衣物和其他装备，这些东西由600名苦力和200匹马运送。埋伏的地点是图尔戈山嘴，这里山谷狭窄，公路经过印度河的左岸，左岸这边是高高的山脉，一次仅能通过一匹马。在峡谷的另一边，另一座高高的山脉就在纳尔布琼（Narbu-chung）村的上方。印度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急弯。奈格·阿拉姆上尉和他的排以及一些当地的志愿者占据了图戈尔山嘴最北边的位置。他也让沙·苏丹跟着他，他的人找来了很多大石头朝敌人头顶滚下去。在河的另一边，纳尔布琼村的附近，巴布尔少尉和苏贝达尔穆罕默德·阿里展开了他们的两个排。一个机关枪分队被部署在山嘴边缘，穆罕默德·汗上尉带一个迫击炮分队和一个机关枪分队占据另一头。3月16日，他们准备好了用奇袭挑战敌人。3月17日，[140]在前卫队通过之后，法基尔·辛格准将和库特斯上校都骑着马，率领着他们的士兵和其他物资进入了狭窄的山谷。午餐之后，他们开始在窄窄的峡谷中移动。当他们一进入火力范围之内，子弹从

所有方向射来，巨石从头顶滚下。这次伏击制造了巨大的混乱，很多人被杀死，一些人跳进印度河。溃败一直持续到了晚上。那些自救的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命逃跑了，留下了他们的弹药和给养。缴获的武器包括3门迫击炮、轻机枪、来复枪、布伦机枪、斯特恩式机枪、手榴弹、.303 子弹和20 台无线电台。准将和库特斯连同近135 人阵亡。副苏贝达尔伊斯玛仪被派去追击逃跑的士兵，其他人返回斯卡杜去围攻兵营。随着这次成功，艾赫桑·阿里少校征召巴尔蒂的年轻人入伍，并提供给他们在这一次行动中缴获的武器。这次重新补充力量，使艾赫桑·阿里少校能够缩小对道格拉兵营的包围圈。战斗贯穿了整个3月和4月，他们逐一地消灭哨所。1948 年4 月2 日，道格拉的形势是"敌人几乎占领了我们阵地附近和周围的所有房屋。敌人从早晨就开始猛烈射击和炮轰。切断警戒哨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已经有两天断水了。"[141]到4 月7 日，兵营被围的范围至多有1500 码①长，600 码宽。此时，艾赫桑·阿里少校得到消息，说有另一批一整旅的援兵将从斯利那加开来。于是，他不得不缩减在斯卡杜的兵力，派人去伯尔戈达。4 月29 日，他自己离开了斯卡杜，把围困的指挥权交给了穆罕默德·巴布尔·汗中尉。这场围困在1948 年持续了整个5 月和6 月。6 月12 日，巴布尔中尉自己不得不前往拉达克。于是奇特拉尔的马道尔·穆尔克上校和他带来的人马肩负起围困斯卡杜兵营的责任。6 月17 日，马道尔·穆尔克上校让一个战俘给塔巴中校带了一封信，劝他放下武器。塔巴没有投降，并把此事报告给斯利那加方面。根据玛哈金的记载，第一架 R. I. A. F. 飞机于1948 年6 月19 日飞抵斯卡杜，机关枪猛烈开火。飞机用集装箱提供了给养和弹药。从那以后，向被围困的守军提供了持续的空中支持，直至结束。后来，马道尔·穆尔克上校装置了两台加农炮，一台在南边，一台在松杜斯附近，1948 年8 月11 日起开始炮击。这些炮是他在1948 年7 月27 日得到的。炮击持续到1948 年8 月13 日。[142]当天夜里，大约200 人从兵营中经萨德巴拉和侯赛因阿巴德逃跑。1948 年8 月14 日早晨，塔巴中校、甘加·辛格上

① 码：一码等于三英尺。码本是长度单位，主要使用于英国、其前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译者

尉、巴尔赫达尔·辛格上尉、阿吉德·辛格中尉、一些JCO和另外51人投降。他们被穆罕默德·汗上尉带去见马道尔·穆尔克上校。除了那些逃跑的人，130人被俘获并被带回斯卡杜。就这样，被攻克的斯卡杜落到了圣战者手里。1948年8月14日，严格地说，在巴基斯坦诞生的一年之后，巴尔蒂斯坦独立了。最后的胜利是在奇特拉尔人的帮助下完成的，他们在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的兄弟马道尔·穆尔克上校的指挥下给了敌人最后的打击。[143]

现在，艾赫桑·阿里少校的职责增加了许多。[144]1948年6月中旬马道尔·穆尔克上校到来之后，他就卸去了在斯卡杜围攻的责任。在图尔戈山嘴的成功伏击之后,艾赫桑·阿里少校派贾玛达尔穆罕默德·伊斯玛仪·汗去追击法基尔·辛格准将部队的逃跑者。他的排占据了印度河左岸的巴吉贾，[145]不断发送情报。3月末，这个排得知敌人一个代号Z的旅，为了向斯卡杜进军以减轻当地驻军被围攻的困境，正在格尔吉尔集中。这个旅由基尔巴尔·辛格中校率领的5个克什米尔轻型步兵营和萨姆布兰·辛格（Sampuran Singh）上校指挥的7个克什米尔步兵营组成。于是，艾赫桑·阿里少校不得不削减他在斯卡杜的兵力，派出所有剩余的人在路上埋伏，迎击正在前来的敌旅。他将100人（三个排的兵力）交给穆罕默德·汗·贾拉尔上尉指挥，到伯尔戈达阻止敌人的前进。[146]后来,奈格·阿拉姆上尉和道斯特·穆罕默德·汗苏贝达尔带领更多的人也加入进来了。穆罕默德·汗上尉将他的指挥部设在杰尔格迪山嘴（Charkatipari）对面的霍东金（Hotong-Chan）的高地上。其余部队奉命占领印度河两岸的高海拔地点。4月的第一个星期，Z旅离开了格尔吉尔，4月18日抵达伯尔戈达。当巡逻队给出OK的信号时，两个连队向前行进，来到穆罕默德·汗上尉部署的第一个排的前面。这个排的一些人被敌人发现，因此双方开始交火。穆斯林伏击者从后面密集开火。敌军各营停止前进，在玛赫迪阿巴德（Mahdiabad）右边的印度河两岸挖掘壕沟，以掩护自己。战斗打响了，因为失去了班达（Pandah）的一个制高点，形势发生了严重转变。穆罕默德·汗上尉给斯卡杜的艾赫桑·阿里少校发了信号，少校不得不离开斯卡杜亲自前去处理情况。他于4月29日到达玛赫迪阿巴德。现

在，苏贝达尔道斯特·穆罕默德被派去夺回失去的山头，他设法从另一个方向智取。山头被夺回，使第一营士气大挫。然而，道格拉营的后方至今仍是自由和敞开的，可以获得萨姆布兰·辛格率领的第二个营的增援。那个营正在去图尔迪的路上。艾赫桑·阿里少校计划在格曼杜萨特古（Kamantu Satghu）和西尔蒙（Sirmun）之间伏击这支敌军。为此目的，苏贝达尔谢尔·艾哈默德·汗奉命率一个排去西尔蒙，另一部分人由军士长穆罕默德·汗指挥，部署在河的另一边。5 月 10 日，敌军约 150 人进入伏击者的火力范围之内。因为在山谷中无法进行自我防卫，敌方士兵纷纷逃命。5 月 12 日，连萨姆布兰·辛格上校也经马罗尔撤退到了拉达克。基尔巴尔·辛格上校坚持抵抗到 5 月 16 日，但形势变得如此困难，以至他既不能守在玛赫迪阿巴德，又不能撤退到南边，因为他已经获悉萨姆布兰·辛格上校的军队溃退的情况。向他敞开的仅有的一条道路是渡河到克尔门。这样，整个伯尔戈达地区于 5 月 17 日从敌人手中解放了。这次巨大的胜利为艾赫桑·阿里少校的功绩增添了出色的一笔。少校肯定要感谢他的上尉们、苏贝达尔们和圣战者，他们忠实地执行了他的指令，伏击敌人，当地人则在提供准确的消息和物资帮助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到现在，这个地区的圣战者队伍在行动策略上有了原则性的改变。因为北山羊军在巴尔蒂斯坦的崛起，遇到了斯卡杜之敌强大防卫的挑战，也遇到了正在前进的援军，这支援军自克什米尔经格尔吉尔而来。巴夏上校决定派遣另一支军队逼近格尔吉尔（见下文爱斯基摩军），以阻止敌人从这个方向前进。当格尔吉尔被爱斯基摩军占领时，基尔巴尔·辛格上校的处境非常困难。他渡过印度河向克尔门的移动是战术性的，他企图横渡印度河到达努布拉，在那里接受更多的援兵。对于艾赫桑·阿里少校来说，现在的形势是清晰的。至于斯卡杜方面，除了努布拉，援军的陆路都被封锁了，因而艾赫桑·阿里少校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副苏贝达尔瓦齐尔·谢尔·艾哈默德奉命率一个志愿者排，经哈伯罗前往努布拉。他自己则继续穷追基尔巴尔·辛格上校朝克尔门撤退的队伍，[147]跟随他的是奈格·阿拉姆上尉。穆罕默德·汗·贾拉尔上尉奉命带领三个排，由一条秘密路线前往克尔门，占据了印度

河右岸从贡杜斯（Gondos）到格尔巴滕格（Karbathang）一线。到5月19日，已经完成了伏击敌人的准备。基尔巴尔·辛格上校为了到达克尔门，不得不越过印度河上的一座索桥。休息之后，当他们准备移动时，他向士兵发表演说。这一时刻是十分适当的，因为整个敌军都暴露在伏击者的火力范围之内。射击同时开始，突如其来的袭击使敌人毫无还手之力，大量人员伤亡。这是一次完全的溃败，基尔巴尔·辛格上校只带领100人逃到了基尔赫（Girkh）和杜尔贡（Torghun）。

被派前往努布拉的排来到了哈伯罗。在那里，罗阇和他的继承人法塔赫·阿里·汗向他们表示欢迎，并提供了各种物资和给养。早些时候，一部分军队在哈维尔达尔穆罕默德·阿里·沙的指挥下被部署在这里以保卫通道。休息三天后，这个排到达了贝奥格丹（Beogdang），这是巴尔蒂斯坦前往努布拉的最后一个村庄。在努布拉有摩诃罗阇的一个连。后来志愿者被招募到这里来。哈维尔达尔古拉姆·侯赛因和军士长穆罕默德·阿里·沙被派往已被占领的乌特马罗苏戈罗贡巴（Utmaro Sukoro-Gumpha）。之后，古拉姆·侯赛因也占领了洪都尔（Hundul）并向斯戈罗（Skoro）挺进。但敌人以重兵应对他们的进攻。当无法再向前行进的时候，艾赫桑·阿里少校派遣苏贝达尔艾米尔·赫亚特带领一个排的士兵赶来增援。但即使在猛烈的交火之后，他们仍无法前进。[148]不过，即使仅仅进入努布拉的一部分地区，也促成了巴基斯坦对锡亚琴冰川的控制。

这样，艾赫桑·阿里少校率领他的北山羊军和他在巴尔蒂斯坦新招募的志愿者，越过巴尔蒂斯坦的界限向前挺进。一方面，他派他的部队直接插入努布拉，另一方面，他又派穆罕默德·汗·巴布尔中校前往拉达克。他在这里同爱斯基摩军联合起来，并成为这部分队伍的指挥官。艾赫桑·阿里少校在前往拉达克的路上经过几场激烈的战斗，成功地使用伏击战术，充分显示了艾赫桑·阿里少校训练他的士兵进行这种类型攻击战的经验。艾赫桑·阿里少校就这样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到他从敌人手里完全夺过巴尔蒂斯坦为止。正是他的成功领导才使得这整个区域能够并入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艾赫桑·阿里少校作为巴尔蒂斯坦的征服者，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干。

沙·汗中尉（后为空军上校）——爱斯基摩军的英雄（图63）

从吉尔吉特侦察队的低级军官升到巴基斯坦空军上校，勇敢而坚定的沙·汗[149]代表了罕萨的精神、威望和力量。正如罕萨不能在巴基斯坦北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中被忽略一样，罕萨高贵的家族也同样不能被忽略。从南到北，在同强大的帝国力量的政治关系中，这个家族在其所扮演的双重政治角色中保持并延续了极高的道德水平。在向双方争夺领土权和特权的过程中，罕萨的米尔家族在当地的政治中扮演着创造性的角色。在摩诃罗阇和英国人统治时期，他们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并且让人羡慕。在1947年—1948年的独立过程中，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外交活动和他们在历史上的角色一样神秘。然而他们的代表人物沙·汗，他是当时的统治者米尔贾玛尔·汗（Jamal Khan）的叔叔米尔穆罕默德·纳齐姆·汗爵士的儿子，却带领他的追随者同吉尔吉特侦察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独立斗争中去。因为血管里流着高贵的血液，他对他的罕萨人民的高昂斗志



图63　沙·汗空军上校——爱斯基摩军的英雄

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并且向他们讲述在儿童时代，罕萨人（Hunzakut）如何被训练出来以使他们尝试极度艰苦的感受，在这过程中他们翻过崇山峻岭，手脚几个小时地浸泡在罕萨河冰冷刺骨的河水里，这样他们就能够适应袭击和抢劫那些从克什米尔到叶尔羌或者是沿着丝绸之路旅行的商队（见前文第五章“大贵霜时代”节）的行动了。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后来被选为爱斯基摩军的指挥官，也就不难想象这支军队不得不涉过覆盖在冬日德沃萨依高原上的厚厚冰雪，在这位指挥官的带领下，这群同样坚强的军人翻过山顶，突袭了那些位于格尔吉尔、德拉斯和祖吉山口的敌人。就像先前罕萨人所习惯的掠夺商队的方式那样，他们以同样的风格夺取敌人的食品、衣服和武器。随着这个袭击和征服的故事的流传，沙·汗在自由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且正确地维持了罕萨和纳格尔在斗争中充当同等角色的格局。没有双方平等真诚的合作，他们就无法取得争取自由的胜利。罕萨人每一天的行动都要经过事先的讨论。沙·汗那时就已经是吉尔吉特侦察队中领导层的一员，参与秘密会议的讨论。他出现在吉尔吉特的行动中，后来还和哈桑·汗上校一起，参与了本吉的行动。他直接去了阿斯托尔，留下一个本吉人，为的是在随后的所有行动中协助他们工作。在他看来，从吉尔吉特的消失使他延误了上升为一名陆军中尉的时机。沙·汗于1925年3月21日生于格里姆阿巴德（Karimabad），1942年4月加入吉尔吉特侦察队，成为一名V. C. O。1948年1月1日，他因为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而被委以重任。1948年成功地在祖吉山口插上了巴基斯坦的旗帜，他得到了“勇敢之星”（Sitara-i-Jurrat）勋章，后来在1979年又被巴基斯坦政府授予“卓越之星”（Sitara-i-Imtiaz）勋章，并被自由克什米尔政府授予“战争之虎”（Sher-e-Jang）的称号。1958年12月，他从陆军调到巴基斯坦空军，从陆军上尉被提升为空军上校，并于1977年被任命为卡拉巴格（Kalabagh）的巴基斯坦空军基地的基地司令。他于1980年3月退休，但仍然积极参加各项探险活动。现在他正经营着旅游和饭店的生意。

巴夏上校到达吉尔吉特后，沙·汗就开始了他的英雄业绩。巴夏上校将队伍重组为三个部分——A联队由艾赫桑·阿里少校率领，B联

队由哈桑·汗上校指挥——这两人都是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军官——而第三部分C联队则由沙·汗中尉率领，这部分队伍没有经过适当的训练，也没有战争的经验。因此这最后一个联队作为预备队以加强另外两支队伍的力量。C联队于1948年1月在吉尔吉特成立，并被送到本吉接受训练，直到3月底才结束。这支队伍有四个连队：

A连即罕萨连，有三个排，由苏贝达尔萨菲乌拉·贝格指挥；

B连即纳格尔连，有三个排，由苏贝达尔苏丹·菲鲁兹（Sultan Firoz）领导；

C连亦为罕萨连，有三个排，由苏贝达尔贾姆希德·汗（Jamshed Khan）指挥，但后来被苏贝达尔古拉姆·穆尔塔扎解散；

D连为亚辛连，有三个排，由苏贝达尔谢尔·阿里指挥。

这支部队于1948年4月26日被派往吉拉姆。当时它有100名强壮的士兵。正是在这里，这支军队被命名为爱斯基摩军，也正是在这里，他们终于接到了新任务。沙·汗说道：

> 爱斯基摩军前往打击敌人的致命聚集区。它要在格尔吉尔、德拉斯和卡罗尔（Kharol）桥同时展开战斗，因此他们的力量要分成三部分，这导致了一些严重问题的出现，如指挥和领导问题、相互支援和供给问题，以及在战场上必须作出果断决定等。

因为印度河河谷一线已经被敌军用作主要供给线，所以当时需要取得这条路线的控制权。最初这是艾赫桑·阿里少校的主要任务，但他在行军的路上受了伤。他们发现格尔吉尔控制着通往斯卡杜、列城和斯利那加的路线，由此成为敌人的主要集结地。在斯卡杜甚至班迪布尔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都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敌人的交通路线在主要枢纽受到重创，格尔吉尔于是成了最重要的目标。爱斯基摩军被派往格尔吉尔、德拉斯和卡罗尔桥，以打击敌人的心脏部位。4月27日，爱斯基摩军稍作休息，为前往古尔德里（Gultari）作最后的准备。古尔德里是人类最早的居住区，与吉拉姆相距60英里。沙·汗是这样描

述当时的情形的：

> 在这整个60英里的路程中，士兵们没有任何休息的机会，因为当时没有帐篷、睡袋，而且最糟的是，没有干木头来取暖或煮食物。他们只要一停下来，就会被冻僵或被埋在大雪之下，只有不停的行军才能保证安全。从早到晚，他们没有新鲜的食物，没有药品，无法休息。他们在28日只准备了三天的食物，因为这是他们所能够携带的最大数量。三天过后就须完全靠自己的体力。在整个行军的艰苦跋涉中，甚至喝水都是不可能的，侦察队士兵们只能吞咽冰雪解渴。

爱斯基摩军于5月1日到达古尔德里。在那里，他们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5月4日军队离开古尔德里，到达库纳尔（Kunar）。在库纳尔，他们按计划完成了对敌人的进攻。

格尔吉尔具有独特的战略优势，它位于由苏罗河和瓦卡（Wakka）河汇合形成的一个河谷中，这两条河流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北侧山麓，成为格尔吉尔的南部边界。这两条河流向印度河。格尔吉尔西部的欣库河和德拉斯河注入苏罗河和瓦卡河的位置，正是重要的卡罗尔桥的所在地。这个镇的四周，被贫瘠不毛、海拔高度达16000英尺的山脉围绕着。

德拉斯镇位于以同样名字命名的一条河流的河谷中。德拉斯河和欣库河之间的北部，是一片巨大的18400英尺高的高地，整个小镇和周围地区都位于这块高地上。12英里之外是马乔依（Machoi），它的南部有一座12000英尺的高山。它西边的山坡缓慢爬升，到达顶点就是祖吉山口，高11578英尺——这山口是极其重要的交通线的瓶颈。在祖吉山口西边的脚下，是索纳默尔格镇（Sonamarg），130英里之外就是斯利那加。索纳默尔格是敌军活动的基地。

爱斯基摩军分成三部分开展行动。D连在苏贝达尔谢尔·阿里的率领下向南进入德拉斯地区；而苏贝达尔萨菲乌拉·贝格则带领A连向卡罗尔桥进发，在渡过欣库河之后到达赫尔达斯（Hardas）村，离

目标还有2英里的距离。C连在苏贝达尔古拉姆·穆尔塔扎的带领下，要向吉里斯康巴（Chilis Khamba）进军，那是一座很重要的小山丘，在山顶的指挥部里可以俯瞰卡罗尔桥和格尔吉尔格里（Kargil Garri）。D连的进攻日期定在5月10日。7日，所有三个连队就已经开始向各自的目标进发。

据所获情报，一支敌军护卫队带着20匹小马驮载的给养，要从德拉斯出发前往格尔吉尔。因此，苏贝达尔古拉姆·穆尔塔扎详细部署并抓获了那支护卫队，将它转移到卡格萨尔（Kaksar）。发生在5月9日的这次成功突袭，使给养问题变得容易了。苏贝达尔谢尔·阿里的D连，在9日傍晚已经包围了德拉斯。由克什米尔·辛格（Kashmir Singh）上尉率领的敌军连队早先占领了剩下的房子和一些相连的建筑物。考虑到敌军的增援部队有可能从马乔依和祖吉山口赶来，贾玛达尔穆罕默德·阿明（Mohammad Ameen）的一个由20名士兵组成的排被派往平德拉斯（Pindras），埋伏在那里以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在成功地包围敌人的德拉斯兵营之后，爱斯基摩军急切地等待着进攻的命令。但这事却遭到了毛尔维马南（Mannan）的干涉。毛尔维马南从阿斯托尔以来一直都在爱斯基摩军中，出于宗教的观念，他反对对敌军进行突然袭击。这位苏贝达尔派遣一位当地居民去和道格拉人的指挥官交涉，让他选择是投降还是开战。因为拥有更好的武器，这位道格拉指挥官选择了战斗。因此，这令人兴奋的大好时机就这样错过了。

贾玛达尔穆罕默德·阿明带领手下20名士兵亲自驻守在平德拉斯的隘口。敌军到达平德拉斯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当敌人进入火力范围时，爱斯基摩军的士兵向他们一通猛射。因为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遭到突然袭击，道格拉士兵们仓皇扔下武器，四散逃跑。行动过后，经检查发现有60具敌军尸体。爱斯基摩军剩下的两支连队就被留下驻守，以监视格尔吉尔和卡罗尔桥。双方的火力都集中在位于格尔吉尔北部的敌军哨所。敌军的抵抗慢慢减弱，最后在下午1点时，敌军被彻底歼灭。贾玛达尔罗斯塔姆·阿里（Rustam Ali）的一个排占领了格尔吉尔南部的一个高地，正是在那里，他开始了战斗。格尔吉尔守军的指挥部里一片狼藉。有30名士兵被打死，其余的人跟着

他们的连长从苏罗和基希德瓦尔逃走了，另一些人逃往列城。哈维尔达尔阿斯里·汗（Asli Khan）率领一部分军队追击，并抓获了一些逃跑的敌军。这样，接近克尔西（Khalsi or Khalatse，或卡拉策）桥的地区就被清理干净了。随后，一支由萨姆布兰·辛格上校率领的敌军连队从伯尔戈达逃出，在经过卡罗尔桥北部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驻守在这里的爱斯基摩军。当敌军接近他们的位置时，爱斯基摩军的士兵们就向他们猛烈开火。但这次敌军躲在大石头后面保护自己。到夜里，他们在黑暗的掩护下逃往奥尔丁。到晚上 8 点，格尔吉尔北部的所有敌人都已被消灭。卡罗尔桥和附近的其他哨所都被占领。苏贝达尔古拉姆·穆尔塔扎率领的 C 连的两个排被派去占领格尔吉尔守军的指挥部，那是早先被敌人遗弃的地方。5 月 11 日，爱斯基摩军进发到格尔吉尔。在这里，爱斯基摩军开始利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储存物品，为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做好准备。同时，苏贝达尔萨菲乌拉·贝格被派往奥尔丁滕格（Olthing Thang）去追赶萨姆布兰·辛格上校和他的残兵败将。5 月 12 日早上，他们包围了马罗尔附近的一支印度连队，敌军正在那里乘羊皮筏渡河。当萨姆布兰·辛格上校和库特斯成功渡过后，连队的其他士兵就被包围了。大约有 30 人被打死，另外 24 名士兵和两名 J. C. O、一名苏贝达尔及一名贾玛达尔投降。这样，马罗尔桥就被爱斯基摩军所控制。

北山羊军和爱斯基摩军的联合行动

在占领了格尔吉尔并彻底击败敌军的 Z 旅之后，北山羊军和爱斯基摩军在印度河河谷地区联合起来，由指挥官艾赫桑·阿里少校统率。艾赫桑·阿里少校同穆罕默德·汗·贾拉尔上尉、奈格·阿拉姆上尉及沙·汗中尉商议，制定出下一步向德拉斯和拉达克挺进的计划。穆罕默德·巴布尔·汗中尉被从斯卡杜调到格尔吉尔，并于 1948 年 6 月 14 日到达。指挥官们决定立即追击敌军，不容敌人有片刻的喘息机会。这两支队伍打算沿着不同的路线进发，北山羊军向着列城方向，而爱

斯基摩军准备强行挺进德拉斯和祖吉山口。

当时的局势是这样的：所有位于格尔吉尔、斯卡杜和吉尔吉特之间的路线都已经被控制。祖吉山口—德拉斯一线已经被爱斯基摩军占领了，然而格尔吉尔到列城的道路，虽然在卡拉策被切断，但敌军仍然可以从这里经过。他们手中的第二条路线就是从格尔吉尔出发，沿着苏罗河，在苏罗河谷分为两个方向——一条通往斯利那加，另一条通往列城。第三条路线则是从格尔吉尔出发，沿着瓦卡河，越过福多拉（Fotula）山口（高 13342 英尺）到达喇嘛尤罗（Lamayuru）和列城。[150]

在贾玛达尔罗斯塔姆·阿里指挥下的爱斯基摩军的一个排被派往苏罗河地区，而北山羊军由穆罕默德·巴布尔·汗中尉率领的一个连则沿着印度河前往列城。另外一个排正行进在从列城通往格尔吉尔的路上。与此同时，德拉斯正不断受到压力。敌人的一个增援连队试图在 5 月 12 日解救被困在德拉斯的同伙，但他们在平德拉斯就遭到了爱斯基摩军的伏击，成为他们的牺牲品。5 月 25 日，一个有山地炮兵支持的营离开索纳默尔格前往德拉斯。这支部队在 27 日攻下了祖吉山口并向平德拉斯挺进。但驻守在平德拉斯的爱斯基摩军 D 连向他们无情地开火。敌军队伍停止了行进，抵抗了一阵，最终在遭受重大伤亡之后悄悄地撤退了。沙·汗中尉带领爱斯基摩军的两个连队于 6 月 4 日到达德拉斯，以增援正在那里执行包围行动的队伍。这支新增的队伍对道格拉军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们在 6 月 5 日和 6 日的夜里仓皇逃往祖吉山口。在平德拉斯，他们同样成了驻守在那里的 D 连的囊中之物。5 月 7 日，C 连几个排的战士已经到达平德拉斯来增援，逃跑至此的道格拉军队完全被爱斯基摩军包围起来。发现自己实在无处可逃之后，这些敌人只得投降。这样，德拉斯就在 1948 年 6 月 6 日完全落入爱斯基摩军的手中。

控制了德拉斯之后，现在就剩下祖吉山口[151]还能够为敌军提供从克什米尔山谷至格尔吉尔的直接通道了。穆罕默德·汗·贾拉尔上尉奉命将吉尔吉特侦察队的 A 联队和 B 联队集结起来，夺下祖吉山口。但当时战场上的指挥官是沙·汗中尉，他在后来未出版的著作中详细

描述了这次行动。[152]6月9日，沙·汗侦察了这些地区的情况，制定出一项进攻策略。为了在前线牵制敌人，苏贝达尔谢尔·阿里的D连被部署在霍莱（Khore）地区。他们在那里一直拖着敌人，使他们忙于应战，无法分身。另外两个连队被带到敌人的背面。沿着穿过摩斯古（Musku）的路线，向博特古兰山口（Bot Kulan Pass）进发，进驻祖吉山口西北部。经过三天三夜的行军，他们翻越了覆满白雪的小道，于1948年6月14日到达古姆里河（Gumri Nala）。这个地方离敌军营指挥部只有3英里，而他们重兵把守的哨所恰恰就在古姆里河的边上。指挥官挑选了一些志愿者，派他们去摧毁这个哨所。于是，A连的贾玛达尔罗斯塔姆·汗带领另外50名侦察兵志愿者，准备捣毁这个哨所。6月17日他们到达山顶，躲在雪堑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行进到距敌人不到50码的范围内。当他们用火力包围敌人的时候，贾玛达尔罗斯塔姆·汗和他的士兵们一起射击并投掷手榴弹。50个敌人被打死。接着，他们同敌军主力营持续交火。几分钟之内，两拨印度进攻者赶到，疯狂地用机枪扫射。沙·汗带领一个排绕到南边以火力掩护。战斗停止时，这个哨所就落入了贾玛达尔罗斯塔姆·汗手中，正是在这次行动中的勇敢表现，他得到了“勇敢之星”勋章。随着这个哨所的攻克，爱斯基摩军在敌军营地周围又建立起三个新的哨所。另外还从德拉斯运来了迫击炮，迫击炮的指挥官哈维尔达尔希达叶都拉·贝格（Hidayatullah）瞄准并击中了敌军指挥部。沙·汗写道：“7月6日夜里，他们（敌人）悄无声息地撤退了。爱斯基摩军又一次像雪豹一样突袭了他们。这样，祖吉山口就在1948年7月7日解放了。”占领祖吉山口之后，又做了以下一些安排：D连被部署在主山口东部边缘的拉尔代格里（Lal Tekri），以监视从南边来的军队的前沿和侧翼；A连部署在西边驻守山口；西北方向，C连的一个排驻扎在博特古拉姆贡吉（Bot-Kulam Gunji），守卫通往德拉斯的通道，同时也为爱斯基摩军断后。对兵力的这些部署可以很好地观察索纳默尔格和巴尔塔尔地区，而且还能搜集到敌人的军事情报。因此，沙·汗中尉和他的爱斯基摩军赢得了占领这个重要山口的胜利，而且在监视敌军进一步行动方面获得了优势。沙·汗中尉确实值得在历史中记下一笔，作为爱斯基摩

军的指挥官，他带领他的士兵们在冬天的几个月里攻克了拥有良好军事装备的祖吉山口的敌军，完成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北山羊军的 D 联队，包括 50 名侦察队员，早在 1948 年 6 月 12 日就在穆罕默德·巴布尔·汗中尉的带领下离开斯卡杜，前往格尔吉尔。他们奉命向拉达克进军，并接受地区指挥官艾赫桑·阿里少校的领导。1948 年 6 月 17 日，他们开始沿着印度河东岸行进。一路上，他们占领了古尔贡（Gurkon）、达赫（Dah）、比亚玛（Biama）、哈诺达吉纳滕塔（Hanoda Chinathang）和玛尔贾（Marcha）等村庄，没有受到任何抵抗。这时，一个整营的印军在普里提·金德（Prithi Chand）中校的率领下已经接管了列城。他加强了自己的兵力，沿着印度河和喇嘛尤罗两条路线同时向前推进。他的队伍在卡拉策遭到爱斯基摩军一个排的阻击，在喇嘛尤罗也同样遭遇了北山羊军一个排的兵力。普里提·金德中校试图绕道将这两个排围困在中间予以打击。当敌人几乎就要成功包围这两个排时，巴布尔中尉及时赶到，并歼灭了那些小哨所里每一个角落的敌人。7 月 10 日，巴布尔中尉整顿了自己的部队和受到解救的爱斯基摩军，继续行进。卡拉策是安全的了。巴布尔中尉继续向列城前进，但在努尔拉（Nurla）、海弥斯（Himis）和尼莫遇到了敌人。在交火中，敌人抵敌不住，便逃走了，遗弃了大量武器、弹药、衣物和其他有价值的给养。7 月 10 日，巴布尔中尉在离列城仅几英里的尼莫（Nimu）建立了自己的指挥部。他还派出多个小分队，爬上列城周围的山头，设立了许多小哨所。列城的印军被包围了，但他们不停地从空中增援兵力。巴布尔中尉觉得自己的兵力不足以攻打列城。虽然他坚守自己的岗位一直到 1948 年的 11 月 18 日，但最后不得不退回到马罗尔，那时，印军的进攻队伍已越过祖吉山口，向格尔吉尔进发。

印军增兵，指挥官的变动和停火

在战斗的前几个阶段，就有详细情报传来，说敌人的援军正从格

尔吉尔开往斯卡杜。这支最强的援军就是Z旅。艾赫桑少校击溃了这支援军，从而切断了通往斯卡杜的道路。面临马道尔·穆尔克上校率领的奇特拉尔警卫队的不可抗拒的进击，对驻守在斯卡杜兵营中的敌人来说，投降只是迟早的事情。上文已经提到，基尔巴尔·辛格上校是如何带着他的100名残兵败将逃往克什米尔以保全自己性命的。这伙人半道停留在塔莱尔（Talel），在那里，虎军刚招募了一个排的新兵，正在那个村子里休整，他们对敌人没有任何防备。在当地村民的众目睽睽之下，那些逃跑至此的道格拉士兵将虎军这个排的新兵全部杀死。这是圣战者遭受的最惨的悲剧。[153] 1948年6月，哈桑·汗上校的虎军主力不得不从德拉格巴尔和古雷兹撤退，并在丘尔班（Chorban）建立一个新的哨所。这一点在上文已有叙及（见前文“哈桑·汗上校——虎军的英雄”节）。那时他已经派遣两个排的兵力前往格尔吉尔，他们在平德拉斯同爱斯基摩军会合。印军集中兵力对虎军展开了猛烈进攻，迫使虎军不得不后撤。因为要增派援兵前往卡姆里，印军才停止了对虎军的进一步追击。[154]

到1948年6月底，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的自由军在巴夏上校指挥下，已经完全从摩诃罗阇的军队手里夺回了这片土地，仅斯卡杜还有一些守军，但他们的末日也马上就要到来。在格尔吉尔，自由军的进攻始终处于优势。尽管他们没有占领列城，但已经包围了那个小镇，并继续向着南边的查谟推进。正是在1948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里，这个地区出现了两个基本的变化。首先是冬季的结束，冰雪正在融化，这就需要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夏季的到来有利于印军重新进入这个地区，他们因为得到空军的支援而拥有更好的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更好的武器。第二个巨大变化是，在1948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巴夏上校被M. G. 吉拉尼（M. G. Jilani）中校所取代。吉拉尼中校极富战争经验，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不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不了解当地人民，也不懂适应当地情况的作战策略，对于他将要指挥的地区来说，这些都是不利的因素。另外，士兵们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没有很好的武器装备和空中支援。在吉拉尼中校任内，确实得到了奇特拉尔警卫队和边境警察部队的增援，这使得对斯卡杜兵营的围攻变得容

易了。但不管怎样，这围攻的胜利迟早都会来到的。作战指挥的这一变化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军事目的，这将由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去评说，但其结果必然是相反的，因为决策中产生了不必要的延误。而且，无论何时作出这样的决定，它都会被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和策略去执行。迄今为止，已经实行的进攻策略和那些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的尝试，封锁其进攻和撤退的路线，使其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但是，随着敌人兵力的增强和天气的好转，这种进攻型的策略极有可能得不到任何成效。这位新任指挥官是拉瓦尔品第总司令部派来抗衡克什米尔战役中印度的行动的。对他来说，也许这种考虑在战斗中是很有分量的。不管行动中发生了什么，事实证明在这一局势的关键点，更换战略指挥官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至目前为止，北部地区的部队处于孤立的状态，他们在当地指挥官的领导下，带着当地招募的士兵艰苦地战斗。

随着指挥官的变更，制定了新的战略。在自由军占领了北部地区之后，下一步目标就是从印军手中解放克什米尔。摩诃罗阇已经从印度军队获得了支援，大大增强了他的兵力。因为印军的精力集中在西部战线，自由军如果对列城展开一次全面进攻，就会将印军的力量吸引到拉达克，西部战线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他们认为这一策略是很明智的。[155]

于是吉拉尼上校决定巩固他在古雷兹和祖吉山口的力量，集结尽可能多的部队开往尼莫以攻克列城。在尼莫会见了巴布尔中尉后，他增强了自己的兵力。与此同时，敌人正对祖吉山口发动大规模进攻。第一次进攻发生在1948年9月1日和7日，敌人的兵力有印军的两个营——第五马拉塔营（Marhatta）和第三贾特营（Jat），但这次进攻被击退了。第二次进攻在9月13和14日，也同样被击退。于是印军就在祖吉山口修建道路以开进坦克，但吉拉尼上校始终不相信他们会真的这么做。同时，巴基斯坦方面的军事领导人发生了变更，伊斯玛仪（Ismail）少校接管了艾赫桑·阿里少校的军队，而库莱希（Qureshi）少校接管了沙·汗中尉的队伍。另一方面，敌人在列城增强了兵力，这对自由军构成了很大威胁。另外，那些由穆罕默德·汗·贾拉尔指

挥的，来自蓬奇和米尔布尔的前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穆斯林士兵，接到了上级让他们撤离和休整的命令。他们被派往德拉斯，在那里一直待到送他们回家的安排完成为止。他们在1948年9月21日离开。祖吉山口建有两条防线，爱斯基摩军现在只有200人的兵力，只能守卫第一条防线，而第二条防线有两个连的战士已经被调往列城去支援北山羊军了。1948年11月1日中午12时，印军的坦克向爱斯基摩军猛烈开火，越过了第一道防线，爱斯基摩军无法阻挡。他们翻越高山到达德拉斯，另外两个排的士兵到了马乔依山口，他们在这里设防，守卫山口。1948年11月15日，敌人攻陷德拉斯，爱斯基摩军不得不撤退到古尔德里。现在，侦察队的一小股力量留下来，在库莱希少校率领下，于11月25日在靠近格尔吉尔桥的地方设下埋伏。当吉拉尼上校得知敌人已经攻陷祖吉山口之后，他只得放弃了原先进攻列城的计划，并命令他的队伍向德拉斯方向撤退。但在队伍到达德拉斯之前，他又获知敌人马上就要大规模进攻德拉斯，敌人也正穿过苏罗河谷向格尔吉尔进发，因此他决定将队伍同时从列城和格尔吉尔撤退至马罗尔地区。到12月14日为止，所有侦察队的士兵都退到了奥尔丁和马罗尔。吉拉尼上校在卡罗尔桥附近设立了防守阵地。1949年1月1日宣布停战时，侦察队还控制着与格尔吉尔、德拉斯、祖吉山口大致平行的一条线，大概在8至10英里以上。[156]

有一支叫“巴达姆队”的小分队，[157]一直冲在最前线，直至赞斯格尔。因为收不到关于停火的无线电信号，停火之后，他们继续在这个地区坚持战斗了将近六个月。这个地区，南邻甘格拉，北边是格尔吉尔和苏罗，东边与查克塘（Chek Thang）和拉萨（指我国西藏——译者）相邻，西边同基希德瓦尔接壤。巴达姆早先曾经被希格尔的穆罕默德·亚辛苏贝达尔征服过，后来被纳格尔的哈维尔达尔阿里·海德尔解放。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失去了同指挥部的联系，于是决定往回走。但在路上遇到了苏贝达尔罗斯塔姆，他们正往巴达姆方向去，于是重新集结，共同抵抗来自敌人的可能袭击。副苏贝达尔穆罕默德·阿里那时被委托带领队伍向兰达姆（Rangdam）开进。后来他也到了巴达姆，同苏贝达尔罗斯塔姆的队伍会合。在将指挥权移交给穆

罕默德·阿里之后，苏贝达尔罗斯塔姆回到格尔吉尔。指挥官常常从巴达姆派遣巡逻队去搜集关于敌人的信息。其中有一支巡逻队遭遇了敌人的猛烈炮火，不得不逃回巴达姆，但还是有几名士兵被敌人俘虏了。1949 年 1 月 7 日，敌人向巴达姆开进，并在 9 日包围了这个小村子。防守的士兵在穆罕默德·阿里的指挥下挖掘壕沟，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1949 年 3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当佛教徒们庆贺他们的盛大节日时，一个名叫西甘达尔的穆斯林从敌人那里逃了出来，并加入了穆罕默德·阿里的队伍。战斗从 1949 年的 1 月持续到 6 月。因为同巴基斯坦司令部的所有联系都中断了，这个小分队决定派三个志愿者到格尔吉尔，以取得同司令部的联系。他们历尽艰辛到了卡罗尔，向司令部报告了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队伍的情况。正是因为这个情报，拉瓦尔品第的总司令部才同印度方面取得了联系。于是被围困的穆罕默德·阿里得救了，他们回到了巴基斯坦。正是这些自由战士的精神让他们自己受了这么多的苦，他们坚持战斗到最后，绝不向敌人投降。

正是自由战士们的这种精神，鼓舞了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的人们，他们自发加入吉尔吉特侦察队，积极投身到战斗中去。他们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打败了摩诃罗阇的军队，解放了这今天被称为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所有土地。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他们的鲜血和意志支撑着这个地区的所有民众为自由而斗争。他们自愿将自己的土地加入巴基斯坦，证明了他们坚决切断同摩诃罗阇的关系、摒弃加入印度的决定的意愿。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了同巴基斯坦保持相对自由关系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

注释

[1]《这次克什米尔战役，1947 年—1948 年》，拉瓦尔品第总司令部总参谋处历史科出版。（后改名为《克什米尔战役，1947 年—1948 年》）。

[2] S. 古玛尔·玛哈金：《巴尔蒂斯坦的灾难》，新德里，1973

年，第四章；F. M. 哈斯纳因：《吉尔吉特：印度的北部门户》，新德里，1975 年，第五章。

［3］坎萨拉·辛格准将：《1947 年前的吉尔吉特》。

［4］同上，第 44 页。

［5］古拉姆·海德尔·汗中校：《我看到的吉尔吉特革命》，载《喀喇昆仑—兴都库什》，曼祖姆·阿里编，伊斯兰堡，1985 年，第 345—346 页，第 354 页。

［6］同上，第 348 页，第 351—352 页及第 360 页；赛义德·杜拉尼上校：《吉尔吉特革命——简要的回顾》，同上书，第 376 页；穆罕默德·汗·贾拉尔少校：《革命与独立战争》，同上书，第 381 页。

［7］古拉姆·海德尔·汗中校：《我看到的吉尔吉特革命》，同上引书，第 336 页。另外，少校苏贝达尔穆罕默德·巴布尔提及一个民间组织的形成，穆罕默德·阿里·巴尔巴里也参加过革命宣传，见他发表于《无畏》（Bebak）的文章，第 25 页。

［8］哈桑·汗·拉纳（罗诺）上校：《独立战争——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未刊手稿，第 22 页。

［9］关于米尔和罗阇们的效忠见古拉姆·海德尔·汗，见上引书，第 339 页。

［10］古拉姆·海德尔·汗中校：《我看到的吉尔吉特革命》，见上引书，第 339—340 页。

［11］哈桑·汗上校：《独立战争——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第 37 页。

［12］哈桑·汗上校：《独立战争——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第 37 页。

［13］古拉姆·海德尔·汗中校：《我看到的吉尔吉特革命》，见上引书，第 347 页。

［14］马道尔·穆尔克上校：《独立战争和奇特拉尔警卫队》，载《喀喇昆仑—兴都库什》，第 392—403 页。

［15］《无畏》周刊，穆扎法尔阿巴德出版，1973 年 1 月 20 日—2 月 10 日第 2 卷第 3、4、5、6 期，其中有沙·拉伊斯·汗、哈桑·汗上

校、巴布尔上尉从不同角度论述的文章。

[16] 穆罕默德·汗·贾拉尔少校:《革命与独立战争》,同上引书,第383—384页。

[17] S. 古玛尔·玛哈金:同上引书,第15页

[18] C.C. 特伦奇:《边境侦察队》,伦敦,1985年,第15章。空军上校沙·汗曾在私下明确对我说,吉尔吉特行动是吉尔吉特侦察队发动和筹划的。而布朗直至10月31日晚才被告知这一计划。巴布尔在他的文章里证实了这一观点。

[19] 同上,第269页。

[19a] 逮捕是由巴布尔执行的,参见《无畏》,第27—28页。

[20] 古拉姆·海德尔中校,《我看到的吉尔吉特革命》,同上引书,第343—344页,据他所述,布朗是被哈桑上校逮捕的。

[21] 马道尔·穆尔克上校:《独立战争和奇特拉尔警卫队》,载《喀喇昆仑—兴都库什》,第392—403页。

[22] 西甘达尔·汗:《北部地区的解放》,军事教育出版社出版,拉瓦尔品第,1975年。

[23] 见注1。

[24]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巴尔蒂斯坦一瞥》,斯卡杜,1984年。

[25] 见注5及注6。

[26] F. M. 哈斯纳因:《吉尔吉特:印度的北部门户》,新德里,1978年。

[27] S. 古玛尔·玛哈金:《巴尔蒂斯坦的灾难》,新德里,1973年。

[28] 甚至有些将士对他们当时的军衔的说法也持有异议,我从吉尔吉特收到的一封官方信函中还附有(前)空军上校沙·汗的抱怨。于是我详细参考了所有军官得到提升后的军衔。

[29] F. M. 哈斯纳因:同上引书,第四章。

[30] 同上,第107页。

[31] 同上,第107—108页。

[32] 同上，第143页。

[33] 同上，第144页。

[34] 同上，第148页。

[35] 同上。

[36]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同上引书，第61—64页。

[37] 坎萨拉·辛格准将：同上引书，第四章，第51—58页。

[38] 哈桑·汗上校：同上引手稿，第15页。

[39] C. C. 特伦奇：同上引书，第269页。

[40] 赛义德·杜拉尼上校：同上引书，第374。

[41] 穆罕默德·汗·贾拉尔：同上引书，第380—382页。

[42] S. 古玛尔·玛哈金：同上引书，第16页。

[43]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同上引书，第69—70页。

[44] S. 古玛尔·玛哈金：同上引书，第16页。

[45] A. H. 苏哈尔瓦尔迪：《克什米尔的悲剧》，拉合尔，1983年，第149页。

[46] 西甘达尔·汗少校：《北部地区的解放》，拉瓦尔品第，1975年，第25页。

[47] 哈桑·汗上校：同上引手稿，第25页。

[48] 曼祖姆·阿里：同上引书，第512页。

[49] 西甘达尔·汗少校：同上引书，第26页。

[50] 见文件C/1/47，吉尔吉特侦察队的英国指挥官与克什米尔土邦军队总司令之间的秘密信件往来。

[51] C. C. 特伦奇：同上引书，第214页。

[52] 同上，第215页。

[53] 同上，第271页。

[54] 空军上校沙·汗：《独立斗争史》，第一章。

[55]《无畏》，同上，第25—26页。

[56] 同上，见第11页沙·拉伊斯·汗的文章。

[57]《喀喇昆仑—兴都库什》，第545页。

[57a]《无畏》。

[58] 哈桑·汗上校：同上引手稿，第32页。

[59] 坎萨拉·辛格准将：同上引书，第74页，证实了这两位罗阇应克什米尔摩诃罗阇之邀于1947年七月前去斯利那加。

[60] 见前第346页（原文未说明是哪本书——译者），哈桑·汗上校声称布尼亚尔的罗阇由于害怕他而出逃。

[61] 古拉姆·海德尔中校：同上引书，第339—343页。

[62] 坎萨拉·辛格准将：同上引书，第59页；F. M. 哈斯纳因：同上引书，第153页。

[63] A. H. 达尼：《吉尔吉特侦察队的自由之战之胜利》，《穆斯林日报》，伊斯兰堡，1984年11月2日。

[64] 哈桑·汗上校：同上引手稿，第35页。

[65] 坎萨拉·辛格准将：同上引书，第67页，也可见F. M. 哈斯纳因：同上引书，第156—157页。

[66] 哈桑·汗上校：同上引手稿，第39页。

[67] 据古拉姆·海德尔中校的日记，实际数字为30人，由少校苏贝达尔穆罕默德·巴布尔·汗一人指挥，他自己则占领了哨所和电信局，劝坎萨拉·辛格准将投降落空，但那里没有进行电话联络。

[68] 详见他在《无畏》上的文章，第23—24页。

[69] 哈桑·汗上校：同上引手稿，第41页。

[70]《无畏》，第11—12页。

[71] 坎萨拉·辛格准将：同上引书，第72页。

[72] F. M. 哈斯纳因：同上引书，第157—158页。

[73] 哈桑·汗：同上引手稿，第14—16页。

[74] 西甘达尔·汗少校：同上引书，第36页。

[75] C. C. 特伦奇：同上引书，第273页，他混淆了下达到吉拉斯的和给苏贝达尔萨菲乌拉·贝格的命令，后来（第276—277页），他对整个行动的叙述与事实有所出入，而主要的战果是吉尔吉特侦察认取得的，马西森后来就离开了。

［76］哈桑·汗上校：同上引手稿，第35页。

［77］见他发表于《无畏》的文章，第12页。

［78］后来的一些作者，如曼祖姆·阿里：同上引书，第558页，才谈到“哈桑内阁”，可能是出于崇拜他或取悦于他。

［79］哈桑·汗上校：同上引手稿，第43—44页。

［80］在吉尔吉特，我通过沙·拉伊斯·汗的儿子得到一些资料（明显是伪造的），那里有一封来自达丽罗代表的请愿书，大力赞扬了沙·拉伊斯·汗作为临时政府总统所做的工作，并进一步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延续他的任期，同时表示那些部落也会效忠于巴基斯坦。

［81］西甘达尔·汗少校：同上引书，第36页，具体数字见第37页。

［82］哈桑·汗上校：同上引手稿，第45页。

［83］同上，第45—46页。

［84］同上，第48—49页。

［85］同上，第51页。

［86］同上，第53页。

［87］空军上校沙·汗的叙述则不同：“11月3日坎萨拉·辛格以军事总督的身份发电报给本吉的道格拉指挥官，命令他和他的军队一起投降，因为大势已去，整个地区已被部落武装占领。道格拉指挥官拒绝服从此命令，除非收到有总督签名的手谕。”

［88］穆罕默德·汗·贾拉尔上尉，见《喀喇昆仑—兴都库什》，第383—386页。

［89］哈桑·汗上校：同上引手稿，第55页。

［90］同上，第62页。

［91］此论述基于1984年10月17日在吉尔吉特与阿斯拉姆准将的访谈记录之上。

［92］哈桑·汗上校：同上引手稿，第64页，描述了他和他的战友在缅甸前线是如何英勇作战的，由于在某次行动中的英勇之举，他们都被授予军功十字勋章。

［93］《克什米尔战役，1947年—1948年》，第10页，也可见西甘

达尔·汗少校：同上引书，第40页。

[94] 这就是他留给我的印象，我于1984年11月14日在一个村庄中采访了他，当时他已届84岁高龄。

[95] 这自然会引起嫉妒，从哈桑·汗上校的叙述和他对其他人不屑一顾的评价就可获知。

[96] 哈桑·汗上校的陈述有些失真，他说他是作为格雷西(Gracy)将军的私人秘书被派往此地，事实上，他是在被召回后才成为私人秘书的。

[97] 萨达尔·穆罕默德·阿拉姆·汗单纯真切的期望就是自己能得到保护，以及在侦察队的军事保障下以他自己的方式统治这片土地，而巴夏上校却另有主张。

[98] A. S. B. 沙上校和巴基斯坦政府土邦和边境地区部长胡尔希德先生。

[99] 日期系据古拉姆·海德尔中校的日记，相关叙述也以他的日记为依据。

[100] 哈桑·汗上校：同上引手稿，第68ff页，他的叙述基本以自己为中心，他说巴基斯坦政治代表只在吉尔吉特特区树立自己的权威，而他则在本吉建立他的指挥部，统管阿斯托尔和赫拉毛希所有已解放的地区。他还谈到政治代表在军营中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上进行了一系列权力分配，可能是布朗少校使诈，从中作梗，以至于侦察队的指挥权仍未落在哈桑手里。可能那里有过一些权力纷争，但鉴于巴基斯坦政府对萨达尔·穆罕默德·阿拉姆·汗的支持，要说他同意这样的权力分配无疑很牵强。

[101] 根据与他的私下交谈，他并不反对自由抗争运动，只是他后来到达本吉时，并未意识到当地的一些变化。

[102] 见古拉姆·海德尔中校的日记，1947年12月1日。

[103] 见注100，哈桑·汗上校的另一观点。

[104] 布朗声称是他为巴布尔·汗争取到统率权的，但他的声明不太可信，因为事实上巴夏上校回到总司令部进行商讨，一定是巴基斯坦高层作出的决定。

[105] 日期据古拉姆·海德尔中校的日记。

[106]《克什米尔战役，1947年—1948年》，第19页。

[107] 哈桑·汗上校在他未出版的书中（见上引手稿），含沙射影地表示巴夏上校出于嫉妒而对他很不公正，当他进军斯利那加受困时，他没有派遣援军支援。曼祖姆·阿里明显是依据哈桑的见解，他与拉瓦尔品第总司令部一样，谴责巴夏上校没有给哈桑进攻的时机。

[108] 西甘达尔·汗少校：同上引书，第87—88页，对此有不同见解。

[109] 曼祖姆·阿里：《喀喇昆仑—兴都库什》，第576—577页，他的文章洋溢着对哈桑·汗的崇拜之情，仅从哈桑·汗指挥的地区班迪布尔和古雷兹来考察整个战局。另一方面，巴夏上校只是执行了整个战略以及保卫北部地区免受敌人可能通过另一条路线而来的进攻。

[110] 曼祖姆·阿里：同上引书，第513页。

[111] 对哈桑的生平的叙述以谢尔·巴兹·阿里·巴尔贾的文章《米尔扎·哈桑上校：从出生到墓穴》，载于《喀喇昆仑—兴都库什》，第431—478页，文中逐字引用了哈桑·汗上校的自述。

[112] 他的政治野心从他后来卷入拉瓦尔品第阴谋案时关于“赢得巴基斯坦”的言论中可以得知。1958年他被释放后，建立了此地区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吉尔吉特联盟”（Gilgit League），后来还加入了巴基斯坦人民党，但由于与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总理不和，再次被捕入狱19个月。最后，他加入了自主运动党（Tahrik-i-Istiqlal Party），一直任该党在自由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的主席，直到1983年11月9日猝亡。

[113] 以下叙述概括自哈桑·汗上校的著作，同上引手稿，第68 ff页，曼祖姆·阿里、西甘达尔·汗少校以及《克什米尔战役，1947年—1948年》一书对此进行了概括整理。此处试图探究哈桑·汗上校提供的一些具体细节。

[114] 曼祖姆·阿里编：《喀喇昆仑—兴都库什》，第513—514页。

[115] 这一叙述部分是基于作者进行的两次私人访谈之上的。

［116］这一说法可从以上引用的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和曼祖姆·阿里的书中读到，而在讲述他的生平事迹时，后者删去了四行半文字，见上引书，第517页。

［117］似乎只有本吉的克什米尔土邦军队中上尉以下的青年军官才参加起义，他们可能并不信任艾赫森·阿里少校，也许更多的是由于嫉妒，所以当吉尔吉特临时政府成立时，没有给他任何职务。他与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的关系如何，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们都是纳格尔人。后来在巴尔蒂斯坦战役中，巴布尔在他手下任职。临时政府中重要的职位都为土邦军官所把持——哈桑·汗上尉、赛义德·杜拉尼上尉和古拉姆·海德尔中尉，只有巴布尔谋得一个职位，而总统则由沙·拉伊斯·汗出任。在随后的权力争斗中，高层军官似乎都置身事外，随着巴夏上校的到来，情况完全变了。两位英国军官离开了吉尔吉特，赛义德·杜拉尼上尉和古拉姆·海德尔中尉也走了。其余的军官则依据他们的军衔来分配职位。艾赫森·阿里少校成为北山羊军的指挥官，哈桑·汗上尉则统领虎军。这一派遣结束了当地的一些部族争斗，土邦军队的其他军官和吉尔吉特侦察队则在后来的进攻和防御战中担负起各自的责任。

［118］S. 古玛尔·玛哈金：同上引书，第26页。

［119］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同上引书，第81—82页。

［120］S. 古玛尔·玛哈金：同上引书，第27页。

［121］同上，第27页；也可见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同上引书，第82—83页。

［122］S. 古玛尔·玛哈金：同上引书，第44页。

［123］同上，第38—39页。

［124］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同上引书，第84—87页。

［125］S. 古玛尔·玛哈金：同上引书，第47页。

［126］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同上引书，第91—92页；曼祖姆·阿里：《喀喇昆仑—兴都库什》，第588—589页；S古玛

尔·玛哈金：同上引书，第54页。

[127] S. 古玛尔·玛哈金：同上引书，第55页。

[128]《克什米尔战役，1947年—1948年》，第14页。

[129] S. 古玛尔·玛哈金：同上引书，第59页。

[130] 同上，第61—62页。

[131] 同上，第64页。

[132]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同上引书，第100—102页。

[133]《克什米尔战役，1947年—1948年》，第15页。

[134] S. 古玛尔·玛哈金：同上引书，第64—67页。

[135] 西甘达尔·汗少校：同上引书，第61页。

[136]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同上引书，第98—102页。

[137]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同上引书，第104—105页。

[138] S. 古玛尔·玛哈金：同上引书，第70页。

[139] 同上，第76页。

[140]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同上引书，第107页认为是3月19日。

[141] S. 古玛尔·玛哈金：同上引书，第89页。

[142] 马道尔·穆尔克上校：《独立战争和奇特拉尔警卫队》，载《喀喇昆仑—兴都库什》，第392—401页。

[143] 同上。

[144] 西甘达尔·汗少校：同上引书，第67—68页。

[145]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的描述略有不同，见上引书，第109—110页，他说埋伏之地是伯尔戈达的瑟尔米克，据他所述，埋伏在门格尔巴格和吉尔基迪的狭窄山谷间的伏兵分布于7公里长的路段上，那里正是两地的咽喉。他又说从斯卡杜调来200人，由穆罕默德·汗上尉和奈格·阿拉姆上尉率领。

[146]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同上引书，第116—

118 页。

[147]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同上引书，第116—118 页；西甘达尔·汗：同上引书，第93—94 页。

[148]《克什米尔战役，1947 年—1948 年》，第22 页；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同上引书，第121—122 页。

[149] 此叙述以同他的私人访谈和他尚未出版的著作为依据，大部分来自第三章。

[150]《克什米尔战役，1947 年—1948 年》，第27 页。

[151] 同上，第28—30 页；西甘达尔·汗少校：同上引书。

[152] 西甘达尔·汗曾在他的书中抄录了此段叙述。

[153] 曼祖姆·阿里：《喀喇昆仑—兴都库什》，第593—594 页；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同上引书，第117—118 页。

[154] 西甘达尔·汗少校：同上引书，第102 页提到巴夏上校亲自前往此地区进行督察，但从巴夏的个人调查中可知他根本没有去过那里。只是派去了援军。

[155] 作者从与吉拉尼的私人访谈中推断他的新策略是将所有的压力集中于列城。

[156] 西甘达尔·汗少校，同上引书，第114—115 页。

[157] 赫希默杜拉·汗："巴达姆小队"，载《喀喇昆仑—兴都库什》，第479—505 页。

第九章 结束语

达尔德斯坦或钵露罗斯坦

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讲述人类是怎样引入适合高海拔地区的生活方式的精彩故事。多年以来，虽然该地区与大陆其他部分被积雪皑皑的高山分开，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从未感到过孤单。尽管其四周都是大国，这里的人们仍然制定出自己的体制，免受大国的控制并建立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局部地区不存在统一的文化发展模式。由于山谷之间联系不便，导致文化发展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该地区另一特点是它仍然保存了一些旧文化的属性。因为地处偏僻，这里的人们保存了许多已经消亡的人类文化特征，而正是通过对这些趋向的了解，使我们可以修补周围文明地区明显存在的缺失环节。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该地区的人们从未与文明世界长期隔绝，他们一直受到亚洲历史演变的影响。但是那种认为他们仅仅处于接受方地位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与周围地区的相互作用表明彼此间存在充分的人员、物资交流，并且随着历史潮流的涨落而不断变化。然而，该地区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许多学者正试图给它命名。在现代历史研究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该地区被称为达尔德斯坦（Dardistan）。在古代史和中世纪史里，这片土地被称

为钵露罗（Bolor），而一些现代作家正是从这个名字推导出钵露罗斯坦（Baluristan）这个术语的。在这个术语被广泛接受之前，现在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这个名称将至少继续在巴基斯坦的官方文件中使用。

历史模式

雷特奈尔博士根据一个普通的名称达尔德（Dard）创造出达尔德斯坦这个术语，而钵露罗则很可能是从巴多尔（Patol）派生出来的（见第五章“沙希和达尔德人时期”节）。无论这两个术语是如何推导出来的，隐藏在它们后面的是该地区古老的历史沉淀。其他考古学资料和岩刻记录添加了许多历史细节，而旅行者的叙述和外文资料也提到该地区与周边国家的相互联系。著名的丝绸之路的支线向南延伸，许多商人和使者就是沿着这条路线到达该地区的。他们不仅为其带来了财富，也引入了新的思想观念。该地区最后一次大的变化活动是由突厥人带来的，他们在中世纪时期自称为塔拉汗人（Trakhans），在随后的一千年里统治着该地区。吉尔吉特、纳格尔和罕萨的王室家族都属于突厥这一主要血统，而奇特拉尔、戈赫—吉泽尔、亚辛、古比斯和布尼亚尔的王族则通常属于另一血统的格多尔家族；不过亚辛这一分支属于胡什瓦格特家族，布尼亚尔这一分支属于布鲁希（Burush）家族。巴尔蒂斯坦地区的故事则稍有不同。斯卡杜地区的主要王族是默格本，而哈伯罗的主要王族叫做叶护。斯卡杜家族还分为隆多、阿斯托尔、伯尔戈达、图尔迪、克尔门和格尔吉尔这几支。希格尔山谷为罕萨和巴尔蒂斯坦提供了联系通道，该地区的统治家族被称为艾玛贾。

即使其政治力量由于英国在公元19世纪和20世纪对该地区的入侵以及受到查谟和克什米尔摩诃罗阇的控制而受到削弱，这些家族直至今天仍拥有权利和威信。这些王族在早期与当地居民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且与之杂居通婚，也一直从中选拔大臣等官员。英国人实行一种新的外交策略。虽然锡克人和道格拉人利用王族间的宿怨，相继介入

这一地区，但英国的精英及其强大军队仍赋予英国在该地区最高统治权威，在其之下是秘密颁布的所谓摩诃罗阇的“宗主权”。该术语的含义很模糊，因为这样可以使英国人随意调整其拥有的权利。唯一清晰的是吉尔吉特特区直到1947年才被承认为摩诃罗阇的领土。尽管英国在其最高统治权威崩溃之前，于1947年8月1日把该地区转交给摩诃罗阇，但它并没有征询当地人的意见。所以与和平移交的目的相反，当地人发动了一场起义，打败了摩诃罗阇的军队并宣布独立，然后组成临时政府并按自己的意愿加入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也用同样方式在1947年宣布独立。虽然关于这片土地是否是克什米尔一部分的法律问题仍存在争议，但是当地人自己决定在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及部落地区这块完整的土地上抛弃摩诃罗阇的政权，明确表示自愿加入巴基斯坦以组成一个穆斯林政权并选择穆斯林的生活模式。

1947年—1948年的行政管理状况

在1949年1月1日停火时，由吉尔吉特政治代表控制的地区[1]如下：

1.（1）由吉尔吉特分区（Gilgit Sub-division，是一个确定的district）组成的吉尔吉特特区；

（2）罕萨和纳格尔土邦；

（3）吉拉斯特别分区（Sub-agency）；

（4）布尼亚尔、戈赫—吉泽尔、亚辛和伊希戈曼等政治管区（Political districts）；

2.（1）阿斯托尔的整个区；

（2）整个斯卡杜地区、拉达克县（District）的格尔吉尔区（Tehsils）的一部分和古雷兹尼阿巴特的一部分地区；

就吉尔吉特分区行政机构组成而言，政治代表由一名驻吉尔吉特的助理政治代表协助，通常包括区（Tehsil）和分区（Sub-division）的职员，包括一名区长、一名副区长和其他办事人员，另外再加上一名

率有50人的政治督察。

特区（Agency）有八所学校，其中包括一所男子中学，一所女子小学和六所男子小学。

特区拥有一所兽医院，有一名助理兽医及其下属工作人员。吉尔吉特有一所规模较大的城市医院，有一名特区外科医生、一名助理外科医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除此之外，特区还有八家诊所。

公共事务部由常驻工程师领导，其成员包括监工、蒙希和工人，他们分布于政治代表管辖的所有地区。

罕萨和纳格尔土邦由当地世袭的米尔管辖，他们在处理刑事、民事和其他讼案时接受长老委员会的帮助，该委员会由公众选举产生并得到双方当事人的同意。

吉拉斯特别分区受吉尔吉特政治代表管辖，后者在吉拉斯设置一名助理政治代表，下辖一名政治副区长、一名传令官（Raja Orderly），以及62名行使警察职能的士兵（Sivil Levies）。助理政治代表通过“吉尔加”制度来处理事务，他从由选举产生，并得到诉讼双方一致同意的长老中任命“吉尔加”的成员。

布尼亚尔政治管区由世袭的总督管辖并遵循吉尔吉特政治代表的建议，总督在部落“吉尔加”的协助下共同处理本地事务并得到诉讼双方的一致同意。

戈赫—吉泽尔、亚辛和伊希戈曼政治管区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的总督进行管理，只要他们能高效地履行职责就可以一直连任。在革命之前，总督由政治代表自行任命，而现在当地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任命行政官员。

上面第2部分包括的所有地区均受吉尔吉特政治代表管辖，他在斯卡杜设置了一名助理政治代表，下辖两名区长、三名副区长及其他工作人员，负责协助其管理斯卡杜区和格尔吉尔区；另外，还有一名区长、两名副区长和必要的工作人员协助管理阿斯托尔和古雷兹地区。

除此之外，阿斯托尔地区还拥有两座城市诊所、一家兽医诊所、一所中学和11所小学，一支警察部队和一名公共事务部的官员。同样，还有一名森林官。

斯卡杜和格尔吉尔地区也拥有三座医院、一家兽医院、一所低年级高级学校（Lower High School）、两所低年级中级学校（Lower Middle School）、30 所小学，以及必要的警察部队和一名公共事务部官员。

整个阿斯托尔均是丘陵区，由 39 个村庄组成，其中包括本吉兵营。总面积为 1632 平方英里。据 1941 年人口普查，人口大约为 17026 人。每年税收为 4 万卢比。

斯卡杜和格尔吉尔地区由 222 个村庄组成，人口 12 万，年税收 11 万卢比。

附表 3：吉尔吉特特区

	1941 年人口普查数（人）	政府管理的可通行骡马的道路（英里）	桥梁	每年道路维修费	公立学校			行使警察职能的士兵（Levies）和土邦卫队（人）	医院		上缴政府的现金税收	邮政与电报所
					中学	小学	女校		医院	诊疗室		
罕萨土邦	15341	99	17			1		35		1		1
纳格尔土邦				14874		1		18		2		
布尼亚尔政治管区	8164					1		14		1		
古比斯政治管区	8512	164	32			1		17		1	1613	1
亚辛政治管区	9989					1		10		1	1610	
伊希戈曼	4282					1		115		1	1172	
吉拉斯特别分区	15364	115	20			1		661		1	3233	1
吉尔吉特分区	22495	115	12		1	6	1	1810	1		24420	1
合计	99021	492	81	125700/-1 卢比		13	1	21180	1	8	32048	4

管理状况

（1）罕萨与纳格尔土邦　由他们的米尔管理，通常由政治代表在内部会议上来推荐，由政府供养，相当于政府控制的警察。

（2）布尼亚尔　由当地世袭的头人管理。

（3）古比斯、亚辛与伊希戈曼　由政府派遣的总督管理，总督从

特区内有名望的统治家族中选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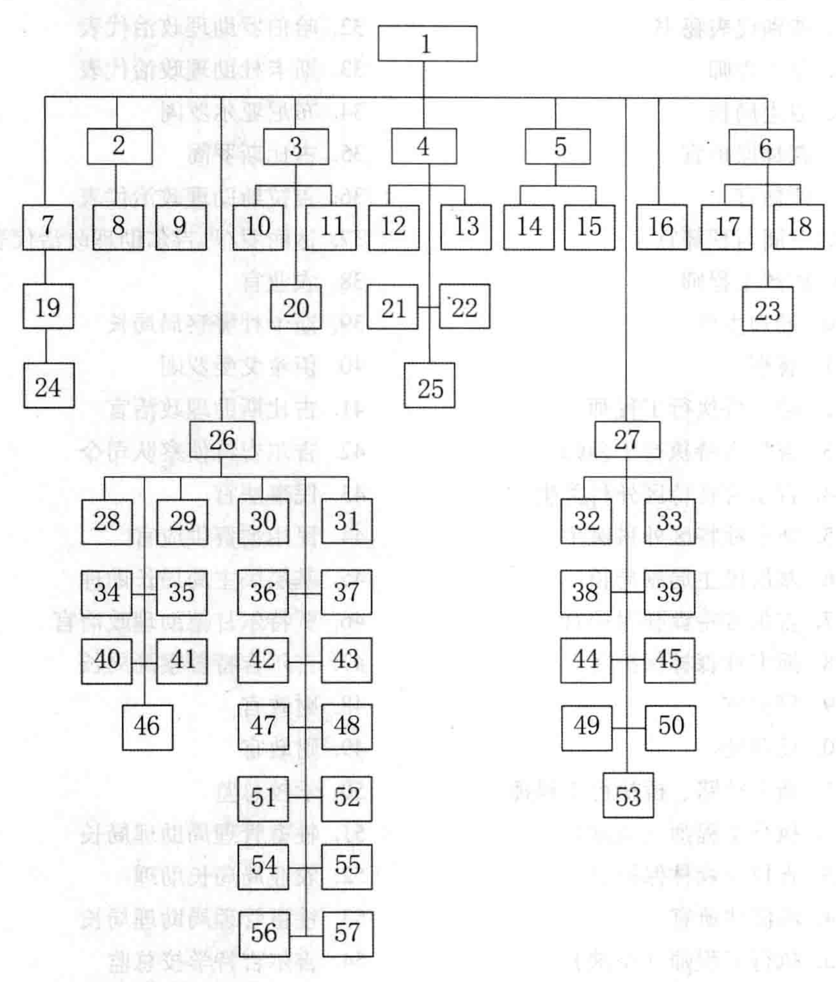
（4）吉拉斯　由政治代表通过驻吉拉斯的助理政治代表管理。

（5）吉尔吉特　由政治代表通过驻吉尔吉特的助理政治代表管理。

后来行政管理制度的变化[2]

1947 年 11 月，巴基斯坦政府应 1947 年 11 月 1 日成立的临时政府的请求，任命了一位政治代表以管理吉尔吉特地区。1948 年 4 月 6 日，为执行总督的命令，驻西北边境省的特别政治代表（Political Resident）被任命为总督在吉尔吉特地区的代表。因此，吉尔吉特特区连同诸土邦在内，被置于该特别政治代表的管理控制之下，与此同时，巴尔蒂斯坦也成为吉尔吉特特区的管辖部分。1950 年，由于管辖吉尔吉特特区的权力从西北边境省的地方行政机构转移到克什米尔事务部，在其内部设立了自由克什米尔政府的特别政治代表和首席顾问这一职位。与此相同，1950 年，北部地区的管辖权也从西北边境省总督转移给了克什米尔事务部。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的特别政治代表寻求对该地区真正的行政控制权。上述政治安排一直持续到 1952 年。这时，克什米尔事务局（Kashmir Affairs Division）的联合秘书（Joint Secretary）被委托兼任北部地区的特别代表和自由克什米尔的首席顾问。1967 年，发生了另一种变化，设立了单独的北部地区特别代表一职，总部设于吉尔吉特，拥有地方行政首脑、高级法院、《边境犯罪条例》专员和省税收专员的权力。

附表4：北部地区现行行政机构（1971年）



特别代表的职能

1. 总统的代表
2. 高级法院法官
3. 税务专员
4. 各部门首脑
5. 《边境犯罪条例》专员

政治代表的职能

1. 地方权力机构的首脑
2. 各属区长官和法庭庭长
3. 税务官
4. 《边境犯罪条例》专员（任期7年）
5. 警察总监

1. 驻吉尔吉特与巴尔蒂斯坦特别代表
2. 预算与会计局局长
3. 特别代表秘书
4. 总工程师
5. 卫生局长
6. 森林保护官
7. 评估官
8. 发展与预算官
9. 矿产工程师
10. 助理主任
11. 督察
12. 路、桥执行工程师
13. 吉尔吉特执行工程师
14. 吉尔吉特特区外科医生
15. 斯卡杜特区外科医生
16. 基层民主局副局长
17. 吉尔吉特森林保护官
18. 斯卡杜森林保护官
19. 研究官
20. 反贪处
21. 斯卡杜路、桥执行工程师
22. 执行工程师（空缺）
23. 吉拉斯森林保护官
24. 经济注册官
25. 执行工程师（空缺）
26. 吉尔吉特政治代表
27. 斯卡杜政治代表
28. 罕萨的米尔
29. 纳格尔的米尔
30. 吉尔吉特助理政治代表
31. 阿斯托尔助理政治代表
32. 哈伯罗助理政治代表
33. 斯卡杜助理政治代表
34. 布尼亚尔罗阇
35. 古比斯罗阇
36. 吉拉斯助理政治代表
37. 达丽罗/丹吉尔助理政治代表
38. 农业官
39. 斯卡杜警察局局长
40. 伊希戈曼罗阇
41. 古比斯助理政治官
42. 吉尔吉特侦察队司令
43. 民事法官
44. 民用物资供应官
45. 基层民主局局长助理
46. 贾特尔甘德助理政治官
47. 吉尔吉特警察局局长
48. 财政官
49. 财政官
50. 学校总监
51. 牲畜管理局助理局长
52. 农业局局长助理
53. 牲畜管理局助理局长
54. 吉尔吉特学校总监
55. 吉尔吉特民用物资供应官
56. 基层民主局助理局长
57. 工业助理局长

1971 年的北部地区行政管理结构

北部地区包括两大行政部分即吉尔吉特特区和巴尔蒂斯坦特区，它们由下列部分组成：

1. 吉尔吉特特区（Gilgit Agency）：

（1）吉尔吉特分区（Sub-division）

（2）阿斯托尔分区（Sub-division）

（3）吉拉斯特别分区（Sub-agency）

（4）达丽罗和丹吉尔特别分区（Sub-Agency）

（5）罕萨和纳格尔土邦

（6）布尼亚尔、戈赫—吉泽尔、亚辛和伊希戈曼政治管区（Political districts）；

2. 巴尔蒂斯坦特区（Baltistan Agency）：

（1）斯卡杜

（2）希格尔

（3）隆多

（4）哈伯罗

（5）克尔门

北部地区的全面管辖权归属于中央政府，它通过特别代表（Resident）来监督检查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别代表同时起着高级法院、《边境犯罪条例》专员和财政税务专员的作用，他还获得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特区的两名政治代表的协助。因为这些地区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特别代表在与中央政府协商的基础上监督司法权力的实施。

吉尔吉特特区

吉尔吉特政治代表是吉尔吉特特区的首脑，就特区行政机构的正

常运转对特别代表（Resident）负责。

政治代表还有以下职责：

（1）县法官及开庭法官（District and Sessions Judge）

（2）县行政长官

（3）税务官

（4）吉尔吉特特区《边境犯罪条例》专员，有权判处最高达70年监禁的严厉处罚。

（5）警署总监

（6）区委员会主席、工程和农村发展计划主管

（7）合作社事务指挥官

（8）合作社事务注册官，教育（农、牧、渔业）主管。

吉尔吉特分区（Gilgit Sub-division）是一块固定区域，其疆域的界定完成于1917年，其税收以现金和实物两种方式支付。该地区受一位助理政治代表的管理，并辅以必要的税收人员和警察。助理政治代表的职务还有：

（1）高级民事法官

（2）拥有30项权力的一级长官

（3）《边境犯罪条例》副专员

（4）一级助理税务官

（5）分区行政长官

（6）受注册法约束的注册官

（7）布尼亚尔、戈赫—吉泽尔、伊希戈曼和亚辛政治管区（Political districts）的附加区行政长官

在1947年11月巴基斯坦中央政府接管吉尔吉特特区后，重新建立了阿斯托尔分区。它像吉尔吉特分区一样也是一块固定的区域，受一位助理政治代表的管辖，而税收同样以现金和实物两种形式支付，助理政治代表还负责监督与吉尔吉特助理政治代表（A. P. A）相同的司法活动。

与前两者相反，吉拉斯特别分区（Sub-agency）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区，它每年征收的税款是不确定的。然而，作为王族的权利，每年可

以从不同部族征收3335卢比税款。吉拉斯特别分区受一位助理政治代表的管辖，辅以一名副区长、一名传令官和61名行使警察职能、帮助维持法律秩序的士兵。巴基斯坦普通法律不适用于该地区，所有发生在此地的案件由作为副专员的助理政治代表根据《边境犯罪条例》裁决。

达丽罗和丹吉尔部落地区在1951年自愿加入巴基斯坦，它们像吉尔吉特分区一样受吉拉斯的助理政治代表的管辖，协助他的有驻丹吉尔办事处的一名助理政治官、一个排的侦察队和由一名传令官领导的77名士兵。助理政治代表同时也是《边境犯罪条例》的副专员。虽然这两个地区不用交税，但当地人每年向中央政府上缴7托拉（Tola）的金粉。

罕萨和纳格尔土邦位于克什米尔西北边境的罕萨河边，它们对内部事务有自治权。所有行政、司法和立法权均归属于米尔，他通过“吉尔加”和村务委员会（Panchayat）来进行管理。

罕萨米尔每年从巴基斯坦政府获得5300卢比的津贴，并有35名由巴基斯坦政府支付薪水的士兵帮助维持法律和秩序，他同时也是行使警察职能的士兵（Levies）的首脑，并因此可每月额外获取100卢比报酬。

纳格尔的行政管理模式与罕萨相同，但当地米尔的年津贴为6000卢比，领导10名士兵并每月额外获取100卢比报酬。

吉尔吉特特区下辖四个政治管区（Political districts），即布尼亚尔、戈赫—吉泽尔（古比斯）、伊希戈曼和亚辛。前三个行政区由罗阇（即总督）管理，而亚辛则由古比斯的助理政治官通过设在亚辛的副区长进行管辖。

上述四个政治管区是不固定的，也不存在土地使用制度的记录。

布尼亚尔是一块世袭的封地，其罗阇处于吉尔吉特政治代表管理之下，但就当地内部事务而言，他是独立的。布尼亚尔有15名士兵，罗阇有权征收地方税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财产。

戈赫—吉泽尔和伊希戈曼也分别由一位罗阇管辖，虽然不是世袭的，但由特别代表任命。当地的法律和秩序由从巴基斯坦政府领取薪

水的士兵帮助维持，其中古比斯有19人，伊希戈曼有17人，罗阇是各自地区士兵的首领。这些地区由当地罗阇来征收税款，其中一小部分上缴给政府。

亚辛政治管区由古比斯的助理政治官直接管辖，他任命一位亚辛的副区长以协助管理，该地区的税款由政府征收并纳入国库。古比斯的助理政治官作为一级行政长官处理与亚辛有关的各种案件，他属下有11名士兵。

巴尔蒂斯坦特区

巴尔蒂斯坦特区（该地也被称为小西藏）包括五个主要山谷，即斯卡杜、哈伯罗、希格尔、隆多和克尔门。

整个巴尔蒂斯坦特区是一个固定的区域。它受政治代表的领导和管辖，其权力和职责类似于吉尔吉特的政治代表。它分斯卡杜和哈伯罗两个分区（Sub-division），每个分区由一位助理政治代表管辖，他们的权力和职责与巴基斯坦固定的县（District）的特别助理专员基本相同。除了履行行政管理、征税和维持法律秩序等职责外，他们也充任拥有30项权力的一级长官、高级民事法官、助理征税官、《边境犯罪条例》一级副专员，负责管理打猎、捕鱼、征税、土地开垦和登记注册等各项事务。斯卡杜有一个地方金库，由一名相当于区长级别的财政官员掌管，他同时也充任一级民事法官和一级行政长官。在1972年8月，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在北部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影响深远的变革，[3]其中较重要的有：

（1）废除了领主制度（Jagirdari system）；废除了罗阇和纳格尔的米尔制度；废除了特区制度；把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特区改为吉尔吉特与巴尔蒂斯坦县（District）；

（2）政治代表改任为副专员并为北部地区重新指派了特别代表和专员。

1972年12月，一个名为迪亚玛尔的新县（District）诞生了，它包

括阿斯托尔分区、吉拉斯分区、达丽罗与丹吉尔分区。

1974年9月，巴基斯坦总理访问了北部地区并宣布实行下列改革：

（1）废除罕萨土邦；

（2）设甘切县（Ghanche District），包括巴尔蒂斯坦的哈伯罗和克尔门两个分区；

（3）新设吉泽尔县；

由于经济原因，甘切和吉泽尔这两个县后来被废除，并且分别并入巴尔蒂斯坦和吉尔吉特。

目前形势（1985年）

北部地区包括三个县即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和迪亚玛尔，它们分别由一名副专员领导，在北部地区专员的监督下履行职责。由于北部地区缺乏资源，人们认为这三个县应立即由联邦政府分别进行单独管理，所以成立了北部地区顾问委员会，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县级和分区级的地方联合委员会（Local Union Council）。

在实施军法管制时期，北部地区作为一个单独的军法管制区（Martial Law Zone）而存在，这激起了某些关于建立一个独立省的主张和活动。咨询委员会（Majlis-i-Shura）成立后，北部地区得到了代表权，其成员也获得观察员身份。

最近几年，该地区得到了许多重大发展，有助于加快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喀喇昆仑公路的建造缩小了北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距离，有助于加速内部交流与传播，而该地区的行政管理部门也进行了改良以更好地为普通公民服务。旅游者和登山爱好者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与中国的易货贸易不断发展。虽然这些发展对人均收入的影响难以测定，但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略有增加是毋庸置疑的。该地区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据粗略估计，北部地区耕地为125000英亩，其中农作物种植面积达10万英亩。除了耕种主要农作物小麦和玉米外，该地区还种植大麦、粟、土豆、蔬菜和饲草等等。

该地区每年粮食总产量大约为100万“满”，而年食物需求量大约为150万“满”，短缺的50万“满”粮食需从外部进口，其中45万“满”由中央政府以补贴价格提供。过去不懈的努力发展创造了下列财富：[5]

教育：

1. 学位学院（Degree Colleges）：2所
2. 高等专科学院（Intermediate Colleges）：2所
3. 教育学院：1所
4. 男子高级中学（High School）：28所
5. 女子高级中学：5所
6. 公共学校：1所
7. 男子中学（Middle School）：67所
8. 女子中学：4所
9. 男子小学：306所
10. 女子小学：50所

医疗保健：

1. 医院：17所
2. 床位：537个
3. 小型诊所：94个
4. 初级救护站：59个
5. 医生：78人
6. 其他医务人员：600人

交通运输：

1. 可通行小型马的道路：185公里
2. 可通行吉普车的道路：2307公里
3. 碎石路面的道路：96公里
4. 钢筋混凝土桥：6座
5. 每日启闭的吊桥：1座
6. 悬索桥：266座
7. 溜索桥：11座

（另外，喀喇昆仑公路从塔科特至红其拉甫山口段616公里，自喀

喇昆仑公路至斯卡杜的公路240公里）

物质规划和住房：

1. 在建房屋：604幢
2. 非住宅建筑：312幢
3. 已建成房屋：86幢
4. 为15万人提供饮用水

能源供给：

1. 发电站：29座
2. 装机容量：534千瓦
3. 已经通电的村庄：45个
4. 受益人数：86000人

水利：

1. 已修建水渠：200公里
2. 灌溉面积：10800英亩

农业：

1. 种植面积：125000英亩
2. 水果示范园：30个（192英亩）
3. 水果种植面积：25000英亩
4. 苗圃：40个（78英亩）
5. 森林面积：1100平方英里
6. 兽医院：6个
7. 兽医诊所：54个
8. 家禽养殖场：2个

电话：

1. 电话交换总机：30个
2. 最大交换容量：1850部
3. 工作线路：1107条
4. 延伸线路，36条

邮政：

1. 总局：1个

2. 支局：19 个

3. 邮政所：80 个

前景展望

由于北部地区是为当地人民所解放的，他们希望能加入巴基斯坦并享有与其他民族相等的权利。如前所述，巴基斯坦政府在承认当地人民所做出的奉献及其意愿的基础上，愿意承担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稳定政府的责任。但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该地区没有一个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而且保证该地区的自由不受外部侵犯也有很大风险。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巴基斯坦和印度在 1949 年 1 月 1 日达成的停火协议使该地区保持某种程度的稳定，但尽管如此，两国在 1965 年和 1971 年发生的两次战争仍带来了防御难题。印度在 1965 年强行占领了格尔吉尔的一座小山，在 1971 年强占了巴尔蒂斯坦的丘尔巴特地区的一些村庄（面积为 254 平方英里）。1984 年，印度又对锡亚琴冰川地区发动进攻，不过这一地区至今仍控制在巴基斯坦手中。印度的这些侵略活动迫使巴基斯坦必须加强在最初停火线位置的防御力量。

至于上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解决的基础在于内部融合。该地区过去由于地理障碍而比较闭塞，但现在通过一条全天候的喀喇昆仑高速公路与巴基斯坦紧密相连，该公路从伊斯兰堡直达位于中国边境的红其拉甫山口并与中巴高速公路相接，另一头则直达阿拉伯海，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提供了方便、宽阔的通路。喀喇昆仑高速公路将成为巴基斯坦未来的“生命线”，对中国西部地区而言，它也提供了开放的历史特征并在加深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方面具备较大潜力。1947 年以前连接该地区与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阿斯托尔—班迪布尔公路只是一条非常破烂且狭窄的小路，只能通行小型马匹。现在这条高速公路使用碎石铺面，可供各种车辆通行。除了这条公路外，在印度河上还修建了几座桥梁，而通过

该公路的无数支线可以连接每个村庄。连接吉尔吉特和斯卡杜的碎石铺面公路使这两个分区变成一个地区。同样，从吉尔吉特途经辛戈尔、古比斯、吉泽尔、芬达尔（Fundar）湖和欣杜尔山口到奇特拉尔的公路可通行吉普车，它提供了一条引人注目的路径，以把不同文化的亚地区融合成一个统一的大兴都库什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诞生了这种内部融合和政治凝聚的可能性。

政治活动的框架现在已完全改变。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当地罗阇在政治上起着主导作用，彼此间的宿仇导致他们在政治上相互争论。普通百姓则支持某一王室家族。历史上，有一些家族在决定国王和大臣时起着重要作用。英国统治时期，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政治主张需得到英国的同意和支持，否则会遭到压制。通过私人查询，20 世纪 40 年代时，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试图从斯利那加前往吉尔吉特，但当他返回时却无法抵达阿斯托尔。乔德里·古拉姆·阿巴斯在独立后曾访问过这一地区，目的在于普及其穆斯林会议。虽然他是受官方邀请而去的，但却未有实质性的收获。哈桑·汗（退役）上校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创建了巴基斯坦人民党的一个分支，后来他又转而从事“自主运动”，而其他一些政党如伊斯兰促进会和穆斯林联盟等在该地区尚未开始宣传活动。另一方面，该地区的学生运动十分活跃，近年来许多学生离开该地区前往白沙瓦、拉瓦尔品第、拉合尔和卡拉奇。学生运动有两方面作用，其一是要求增加技术学院的奖学金和招生人数，其二是要求该地区在政府中拥有代表和平等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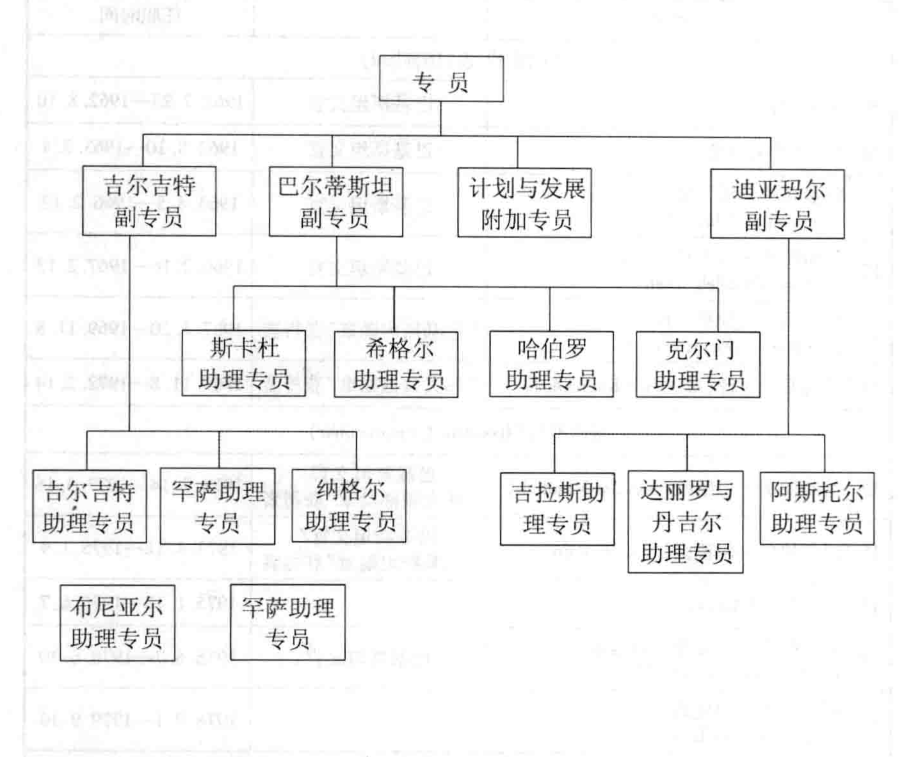
为响应人民的呼吁，巴基斯坦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吸引当地人在政府中担任代表，并于 1973 年明确许诺将在 10 年内使该地区成为一个省并拥有自己的立法议会，但是这个承诺至今仍未实现。最近巴基斯坦政府成立了另一个委员会来审核现实情况，以决定是否需要在将来采取其他措施。最近需要关注的问题如下：[6]

1. 政治地位的确定；
2. 为北部地区任命一名当地顾问；
3. 为北部地区居民保留所有北部地区的职位；
4. 享有参与当地、国家和国际事务的权利；

5. 为北部地区居民参与活动提供特别服务；
6. 在北部地区建立类似于自由克什米尔的秘书处；
7. 在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上诉权；
8. 增加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人数；
9. 为北部地区学生保留在公共教育和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招生名额；
10. 北部地区的服务水平应与联邦服务水平相当；
11. 提供外国奖学金和出国培训的便利；
12. 建立农用工业；
13. 发展采矿业；
14. 建设水力发电站；
15. 建设水渠，增加耕种面积；
16. 劝告人们减少宗教冲突；
17. 在北部地区建立社会福利部门；
18. 在吉尔吉特市区建造军营；
19. 改善北部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
20. 与膳宿条件有关的问题，如属于北部地区但在拉瓦尔品第或伊斯兰堡工作的政府公务员。

巴基斯坦政府在1974年免除了该地区的税赋，这提高了该地区的收入水平，但给中央政府带来巨大财政困难，因为其所有行政管理费用均由中央政府负担；该地区第二大收入来源是林业，特别是迪亚玛尔地区的喜马拉雅山麓，这项收入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分享；第三大收入来源是采矿业，其中一部分租赁给私营企业而另一部分则由矿业发展部管理；该地区除了农业生产和园艺外，来自江河和冰川的水资源潜能也十分巨大，如果加以正确利用，将极大增进该地区的繁荣程度；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前景也十分广阔；当然，中国与该地区的国际贸易活动同样具有吸引力。该地区可以选择多种发展道路，但需要慎重决定并听取善于引入新技术的经济学专家的意见。北部地区人民愿意全力以赴重建自己的家园，不仅要在本国内而且也要在全世界、不仅是现在而且在未来都要获得一个体面的地位。

附表 5：现行机构



附表 6：巴基斯坦政府派驻北部地区特别代表及专员

	姓名		任职时间
	特 别 代 表(Resident)		
1	莫因乌丁(G. Mueen-ud-Din)	巴基斯坦文官	1950. 6. 22—1952. 3. 2
2	格里姆(F. A. Karim)	巴基斯坦文官	1952. 4. 8. —1955. 1. 19
3	阿兹法尔(M. Azfar)	巴基斯坦文官	1955. 1. 19—1956. 11. 1
4	伊本奈·哈桑(Ibne Hassan)少校	巴基斯坦文官	1956. 11. 1—1956. 12. 24
5	哈米德(A. A. Hamid)	巴基斯坦文官	1956. 12. 24—1957. 4. 29
6	M. 尤素夫(M. Yousuf)少校	巴基斯坦文官	1957. 4. 29—1958. 11. 26
7	穆罕默德·扎曼·基亚尼(Mohammad Zaman Kiani)	巴基斯坦文官	1958. 11. 26—1960. 8. 29
8	A. H. 汗(A. H. Khan)	巴基斯坦文官	1960. 8. 29—1962. 7. 22

续表

	姓名		任职时间
特别代表(Resident)			
9	N. M. 汗	巴基斯坦文官	1962. 7. 23—1962. 8. 10
10	M. 尤素夫中校	巴基斯坦文官	1962. 8. 10—1963. 3. 4
11	阿曼乌拉·汗·尼亚齐(Amanullah Khan Niazi)	巴基斯坦文官	1963. 4. 5—1966. 2. 12
12	阿斯拉姆·阿卜杜拉·汗(Aslam Abdullah Khan)	巴基斯坦文官	1966. 2. 16—1967. 2. 13
13	哈比布·拉赫曼·汗(Habibur Rehman Khan)	“巴基斯坦勋章”获得者	1967. 3. 20—1969. 11. 8
14	马哈布卜·汗(Mahboob Khan)准将	“伟大领袖勋章”获得者	1969. 11. 8—1972. 2. 14
常驻专员(Resident Commissioner)			
15	纳斯罗姆·米纳拉(Nasrum Minallah)	巴基斯坦文官/“伟大领袖勋章”获得者	1972. 2. 14—1973. 3. 16
16	伊杰拉尔·侯赛因(Ijlal Hussain)	巴基斯坦文官/“巴基斯坦勋章”获得者	1973. 4. 12—1975. 1. 9
17	阿塔乌拉(Ataullah)		1975. 1. 10—1976. 6. 7
18	阿什拉夫·拉希德·西迪基(Ashraf Rashid Siddiqi)	巴基斯坦文官	1976. 6. 7—1978. 6. 30
19	阿卜杜尔·加尧姆·汗(Abdul Qayum Khan)		1978. 7. 1—1979. 9. 10
专员(Commissioner)			
20	空缺,由他人代理		1979. 9. 10—1980. 5,10
21	瓦齐尔扎达·阿卜杜尔·加尧姆·汗(Wazirzada Abdul Qayum Khan)		1980. 5. 11—1981. 3. 23
22	伊夫蒂哈尔·乌丁(Iftikhar-ud-Din)		1981. 3. 23—1982. 2. 18
23	代理管理(Acting Arrangement)		1982. 2. 19—1982. 6. 30
24	赛义德·贾米尔·海达尔·沙(Syed Jamil Haider Shah)		1982. 7. 1—1984. 9. 25
25	哈立德·马茂德(Khalid mahmud)		1984. 9. 25

注　释

[1] 基于保存在吉尔吉特专员办公室的官方记录，由政治代表准备，用以答复1949年3月25日的询问。

[2] 基于1971年北部地区委员会的报告，第4—5页。

[3] 基于对官方文献的个人查询结果。

[4] 引自赛义德·艾哈默德·汗先生在国家公共行政学院（位于拉合尔）发表的研究报告《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计划与发展中的问题》。

[5] 基于吉尔吉特计划与发展特别专员办公室公布的报告。

[6] 由沙·扎曼博士在1987年12月提交给巴基斯坦总统。

附录1　达尔德文化的起源

——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新发现

旧资料

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斯瓦特、迪尔、巴乔尔、白沙瓦诸河谷和塔克西拉都发现了雅利安人的坟墓和定居点。他们生活在公元前2千纪的青铜器时代和公元前1千纪的铁器时代。后来，在奇特拉尔和科希斯坦也发现了一些雅利安坟墓。因为雅利安人不断向东部山区移动，已故的杜齐教授推测他们可能属于居住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达尔德人。

一个世纪以来，尽管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不断发现零星的坟墓和陪葬物品，但缺乏对该主题的系统研究，因而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推论非常不一致。1842年，G. T. 瓦因首先开始记录有关阿斯托尔山谷古代坟墓的信息。后来，约翰·毕达尔夫于1880年报告“在沃尔希古姆（Woorshigum）和科（Kho）河谷，以及杰希（Chashi）和亚辛河谷发现了引人注目的巨大古代石桌”，他在一些地方观察到由许多大石头围成的圆圈，称之为巨石（Megalith），该术语一直沿用至今。后来一些学者如奥雷尔·斯坦因先生和卡尔·耶特马尔教授，也搜集到许多青铜器、铁器和金银器，这些物品散布于西起甘迪亚河谷、东至亚辛和

伊希戈曼河谷的宽阔的地区。耶特马尔教授公布了一只有着引人注目的造型的青铜北山羊像。众所周知，北山羊是该地区人们的宠儿。奥雷尔·斯坦因先生用图说明了两件类似于动物的青铜器，其中一件被他称为半人马（Centaur-rhyion），下面是马腿的基座而手持一个倾斜的杯子，另外还抓着一只类似于上面提到的北山羊；另外一件是一个青铜小碗，碗边有一个结实的圆把手和动物头像。它们都来自伊希戈曼山谷的伊米特（Imit）。F. H. 安德鲁（F. H. Andrews）评论说："半人马的像使人想起和阗的陶器，上面也有奇形怪状的动物头像，其脖子从古怪的小碗边上突出来。"但不幸的是，奥雷尔·斯坦因先生对这两件青铜器的年代次序作了错误的判断，他武断地宣称："整个作品反映了独特的、希腊式的灵感。"但不知何故，他又猜测："很难假定这两件青铜器能通过贸易活动进入兴都库什，因为它距离西方国家或位于近东的希腊非常遥远，因而它们在印度河河谷地势较低的地区制造出来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在这些地区矗立着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雕像，在这段时间里很容易接触到希腊艺术。"这种观点遗漏了青铜器的真正特性，因为我们在犍陀罗地区从未发现过相似的青铜器。

奥雷尔·斯坦因先生还公布了一些散落在亚辛的古代珠宝，但未能将其与亚辛的青铜菩萨像联系起来，所以将其年代确定为基督教年代的早期。这些珠宝包括戒指、耳环、发夹和一些圆形、正方形的物品，上面饰有图案。发夹的样式与最近在该地区发现的相同。幸运的是，奥雷尔·斯坦因先生自己比较了珠宝和在达丽罗山谷发现的坟墓，他在一本名为《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①] 的书中公布了这些墓葬的情况。

卡尔·耶特马尔教授补充了这些零散的发现，他进一步研究了一些铜或青铜做的斧头、匙子、叉子和棍棒，这些物品来自达丽罗河谷的马尼基亚尔（Manikyal）山谷和舒马利（Shumari）山谷。其中两件物品非常重要，一件是有柄的斧头，另一件被M. 拉菲克·莫卧儿（M. Rafique Mughal）博士称为"带有凸肩和圆顶的细柄斧"。但更具

① 应即《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于2004年出版了其汉译本。——译者

重要地位的是一把来自达丽罗的西方式带耳斧头，同古勒姆（Kurram）河谷的沙洛赞（Shalozan）发现的相似。在联系雅利安人的迁徙活动之后，几位学者对这种样式的斧头加以评述。耶特马尔教授说："带耳西式斧头出现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意味着高加索势力渗入西伯利亚大草原，并且向东推进至帕米尔高原，接着扩展到兴都库什和喀喇昆仑。所有这些发现的物品都比较零散，其所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千纪。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制造这些物品的人类不同于雕刻岩石的史前人类，后者在该地区生活了很长时间而且其石雕作品得到几位学者的充分论证，他们的种族特性不同于雅利安人，生存时代也远远早于雅利安人。另外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史前人类一直生活到雅利安人的出现。"

1980年秋季，意大利考古队在杜兰（Durand）河谷进行了一项考古调查活动，在该地区的格亚尔（Gayal）、普戈奇（Phuguch）、古玛里（Ghomeri）和马尼基亚尔等地发现了古代城堡。正如达尼教授以前提到的，有几处墓地也值得关注。考古学家在调查期间发现了一只巨大的储藏罐，而在下马尼基亚尔的古城旁边的一座小山丘上发现了一处墓地。在那里，人们以前挖出过大陶罐。在该墓地里发现了一只埋葬用的大瓮，上面是扁平的石盖，里面装着骨灰。这种骨灰瓮在犍陀罗地区从未发现过，其外形呈球状，带有一个厚实的平顶宽边（参见照片1①），上面印有星星和其他图形，其底座是圆盘形但非常小。在同一墓坑还发现了一些表面饰有绳纹的小陶罐。凭借这些发现，我们可以推断上述物品属于同一雅利安种群所有，他们通过犍陀罗墓葬文化为世人所了解。但纳齐尔·艾哈默德·汗（Nazir Ahmed Khan，他供职于巴基斯坦政府考古局）的新发现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卷，并显示出一个新的雅利安种群，该种群与现代达尔德人的祖先并无二致。

---

① 本书所附有关出土文物的照片，其编号与正文不符，致使阅读时无法参阅。现将照片重新编号，列入书后所附图版一，以方便读者参考。其中仍有与正文不能完全对应之处，望读者鉴谅。——译者

地理范围

1994年—1995年，纳齐尔·艾哈默德·汗先生首次在丹吉尔进行了考察，他在肖玛里（Shomari）发掘了三座坟墓，每一座都用巨石排成一行。1996年—1997年，他在杜兰索尔（Duran Sor）发掘了三座坟墓。该地距达伊恩（Daeen）500米，靠近吉泽尔区的伊希戈曼山谷的杰塔尔甘德（Chaturkand）。就已发现坟墓的地理范围而言，已遍及整个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从甘迪亚河谷经丹吉尔、达丽罗和格斯（Gas）到吉拉斯东部，靠近戈赫尔阿巴德（位于吉尔吉特的瑙布拉）和苏丹阿巴德（Sultanabad）而远离丹尤尔，在诺玛尔村也能看到。在再往前的一处疗养地，我们也发现了墓地。沿着吉尔吉特去吉泽尔的方向，我们来到吉尔吉特河边的希罗特（Shirot）并向前抵达布布尔（Bubur），接着我们在山脚下的峡谷里和村庄北部发现了坟墓。古隆贾尔（Gurunjar）位于数英里远的上游河岸，那里分布着许多坟墓。在上加古奇发现的坟墓里有大量的小珠子，而在哈屯附近，坟墓位于奥雷尔·斯坦因先生发现的铭文的北面，而他忽略了这些坟墓。在去往达伊恩和杰塔尔甘德的路上也散布着一些坟墓。穿过位于顶部梯田的山村就是杜兰索尔，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居民点和两排圆形坟墓，新的发掘工作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因此，现在我们知道青铜器和铁器时代的坟墓实际上分布在整个北部地区，也就是如今达尔德人居住的地方。毋庸置疑，是达尔德人的祖先建造了这些坟墓并使自己区别于那些雕刻岩石的早期人类，也区别于其他雅利安种群，后者曾到达斯瓦特、迪尔、巴乔尔、白沙瓦谷地和塔克西拉等地区，甚至还越过了杰卢姆河。

墓　地

在杜兰索尔，两排由巨石垒成的圆形坟墓分布在小山坡上，朝向

西南的一边是入口，中间是人的骨架，旁边是陪葬品，包括一柄带耳斧头、手镯、锑棍、发夹、贝壳和一些珠子、青铜器、戒指以及手工制作的陶器。

其他文物是当地居民通过非法盗墓活动得到的。鉴于政府无法阻止大规模的盗墓活动和文物向国外流失，所以政府应该出资购买一些珍贵文物以将其留在国内。这些文物与犍陀罗墓葬文化完全不同，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雅利安种群。坟墓中的贝壳是一个独特发现，它们与奇特拉尔的凯拉希女子佩戴的货贝相似。这些文物让我们第一次接触到吉尔吉特地区达尔德人的原始文化，也有助于了解现今居住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包括奇特拉尔的民族的起源。

陶　器

目前最重要的发现是一系列手工制作的新型陶器。我们从下马尼基亚尔的坟墓发现一个球形大瓮（见彩色照片 1，下同），里面装的是骨灰；在同一墓坑里还有一个小瓮（见照片 2），它们均为红色。在另一地方发现了两只长颈陶罐（见照片 3），其颈部稍微向外弯曲，其中一个陶罐的颈部有些损坏。更有重要意义的是一个无边的带把手的陶罐，它有一个嘴和水平底座（见照片 4）。另外还有一个中等大小的烹饪罐，罐边向外翻，底座为圆形（见照片 5）。接着我们发现一系列大小不同的五个杯子（见照片 6），除第二个杯子是平底的外，其他杯子都为圆底。另一组三个杯子中，两个大杯子是圆底的，第三个杯子有细长颈部和扁平底座（见照片 7）。所有这些容器都略带红色，至今尚未发现灰色陶器。

青铜容器

我们发现一个带把手的器皿（见照片 8），另一个器皿的把手类似

于一个动物的脑袋（见照片9）。上面那个器皿发现于布尼亚尔，而下面那个发现于东帕米尔的阿里柯尔（Alicur）墓地，现一并刊出，以资比较。

动物图像

陶罐上的动物图像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尽管存在着其他动物，但我们只发现了北山羊像。第10幅照片展示了一个来自甘迪亚河谷的青铜北山羊像，另外两件则来自帕米尔地区。耶特马尔教授认为它们具有西徐亚风格，出现年代很晚，但是这件青铜北山羊像与最近发现的其他北山羊像一致。最值得注意的是发簪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已经缺失。第一个发簪（见照片11）显示一个站立的男子两边各有一只鸟，第二个发簪显示出几只卧着的北山羊，第三个发簪是一个锯齿形的长棒，其末端有四个头，中间是两个动物脑袋形状的钉子，左右是两把带有北山羊形状刀把的小刀（见照片12）。另一值得注意的动物是一只卧着的狮子（见照片13），尾巴卷起。虽然狮子的脑袋和尾巴刻画得很生动，但其躯体和腿部的线条却比较简单，它是在达伊恩发现的。

其他青铜器

第14幅照片展示了一些刀子，没有刀柄，其中一把刀呈锯齿状。正如两把带有北山羊形状把手的小刀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刀具也肯定有动物形状的刀柄。我们还发现为数不多的金器（见照片15），其中显然有两件耳饰、四颗珠子、两枚戒指和四个垫片。另外还有一个长长的垂饰和两个带花纹的碎片。奥雷尔·斯坦因先生在亚辛发现的金银珠宝有戒指、发夹、单个珠子、耳垂饰物、耳朵形状的垂饰以及方形和圆形物品（照片16）。然而我们还发现了另一组醒目的耳饰（见

照片 17），包括三个设计精巧的垂饰和四个简洁的垂饰。另外还有一系列杯状耳垂饰物，上面凿有小孔（见照片 18）。

装饰品

为了修饰自己，史前人类制作了有把手的青铜镜。一些镜子是在发掘洞穴时发现的，另外一些则分散于各地，其中三面镜子（见照片 19）有着不同形状的把手。手镯（见照片 20）的样式也变化多端，其中一些刻有动物头像且镯边弯曲，另一些则比较简单。此外，我们还找到几百个坏手镯（见照片 21），同时还在一些地方发掘出各种大小的青铜戒指（照片 2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装饰品均是在坟墓里发现的，其中发簪的种类最为繁多，有几种带有装饰性的动物头像如北山羊等。我们设法找到了仅有的一件装饰发簪（见照片 23），发簪末端的每个边上都有一个角，顶端是一个由两个同心圆构成的头像，其中央是一个曲折的图形，旁边是类似十字形的图案，而侧面是一个小圆形图案。周围的主要图案是一系列与垂线相交的椭圆，从而产生一种奇妙的效果。最简单的发簪只有扁平的顶部（见照片 24），该照片也展示了一些拉长的头像。但是在第 25 幅照片里可以看见最漂亮的发簪，其顶端饰有圆形头像。所有发簪的顶端下方是圆环，其中一些发簪（见照片 26）只有简单的方形平顶而没有圆环。第 27 幅照片展示了上述两种发簪的混合物。第 28 幅照片显示出另外一种引人注目的发簪类型，其中三个发簪的圆顶部有三角形尖头，但在照片下方则是拉长的顶部。第 29 幅照片中展示了另一组圆顶发簪，这些发簪的顶部下面都有环形球茎。我们发现了几种不同长短的针（见照片 30），针眼的制作方式不太相同。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了两端都很锋利的锑棍（见照片 31），用来洗眼。第 32 幅照片展示了多种装饰品，其中一些穿有小孔但用途不明，这种类型在帕米尔高原地区也曾发现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多种边上有洞的箭头（见照片 33），或者是三角形状，或者带有曲边，这表明箭头的作用是装饰，被挂在花环下面的可能性最

大。我们也发现中空的矛头（见照片34），但许多已经损坏，可以在照片的下方看见两个矛头，它们似乎也是用于装饰的。

在装饰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在坟墓中发现的各种贝壳和无数的小珠子。虽然这些贝壳不同于奇特拉尔的凯拉希女子现在使用的货贝，但它说明当地人拥有大量的此类贝壳，而且在青铜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数量极多的小珠子说明它在男人和女人当中很受欢迎。搜集到的第一组贝壳（见照片35）有四种，其中四枚呈三角形，顶端各有一小孔；第二种贝壳呈圆形，中间有一个小孔；第三种贝壳也是圆形，一边有两个小孔；第四种的五枚贝壳形状各不相同。第36幅照片展示了一些相当大的贝壳，其顶部有两个小孔而中间有一个小孔。第37幅照片展示了所有上述几种贝壳，还包括玛瑙珠子。所有这些贝壳都呈碟状，看上去似乎是有意切割成此种形状以用来装饰的。

照片38展示了一些坏了的小容器，其中一个清楚地显示中间有两个小孔，四个中间有一个小孔的陶制轮子显然表明早期人类已了解了轮子的作用，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带有轮子的陶器。在一个小水晶盘和两个青铜盘的中间也有一个小孔。第39幅照片展示了几个珠串，是用贝壳制成的。有的为长珠串，同时该照片也展示了一些圆形珠串，有几个珠串非常小而另一些则稍大一点。这幅照片展示的珠子来自达伊恩。然而，第40幅照片展示了相当大的珠子，除了中间珠串上的柱状玛瑙珠和一个铜环外，其他珠子看上去都很长。玛瑙珠可能需要进口而且从印度河文明时期以后就变得非常普通，看来北部地区在从巴达克山进口玛瑙并运往山谷地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第二排和第三排我们发现了特别长的珠子，其中一个珠子又粗又厚，珠体上有一个大孔。

人们选择碟形贝壳以及后来扩展到多种形状的贝壳，一定有特殊的意义。这些贝壳很小，很可能是从当地的河边拾到或用其他货物交换而得，然后在当地切割成各种形状。正如我们以前所论述的，这些贝壳与现在凯拉希女子使用的货贝不同，货贝非常小而且来自海洋。然而正如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现代达尔德人的祖先使用的是另一种贝壳，与此同时他们也制作装饰性的武器，如作垂饰用的箭头、矛头和

小杯子。在斯瓦特、迪尔、巴乔尔和白沙瓦谷地发掘的成百上千的坟墓中，我们从未发现这些物品，所以它们的制造者不是曾经生活在该地区的雅利安人，而很可能是当今北部地区居民的祖先。因为这里已知的许多物品在帕米尔地区都能找到类似的物品，所以如果帕米尔人不是从该地区迁移出去的话，这或许表明它们至少与帕米尔人有一定联系。这些物品与该地区的吐火罗人可能有某种联系吗？

斧头和木匠用的工具

在该地区坟墓中发现的青铜斧和多种木匠用的工具最具价值，其中一些物品是青铜做的，而另一些是铁制品。在达丽罗河谷的马尼基亚尔发现了一柄斧头（见照片 41），斧刃稍微有些弯曲。类似的斧头在低级印度河文明社会找不到，但在最高水平的莫亨焦达罗可以找到。M. 拉菲克·莫卧儿博士评论说："类似于在达丽罗河谷发现的斧头，在后哈拉班（Late Harappan）也能找到，与位于南印度河流域的强胡达罗的丘卡尔（Jhukar）水平相同。在最近 2000 和 1000 年间，波斯的马克兰地区和南俾路支斯坦的沙希丘陵地带（Shahi Tump）也能找到可资比较的例子。"另一方面，在古勒姆河谷的沙洛赞只发现了一柄带耳斧头（见照片 42），从外形上讲，它与地中海地区、欧洲、高加索和北伊朗制造的斧头有联系。海因·盖尔德恩（Heine-Geldern）教授把这种联系归因于雅利安人的迁移活动，这种斧头通常使用于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900 年。最近从达丽罗河谷又发现一把类似的斧头，而在杜兰索尔的实际发掘中发现了另一把斧头（见照片 43 左方），第三把斧头是从当地商人手中购来的，它们都有弯曲的斧刃和加长的斧柄，每边都有耳。另一种此类型的斧头来自于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

铁器（见照片 44）是从靠近戈赫尔阿巴德（位于吉尔吉特和吉拉斯之间）的格斯村庄搜集到的，包括一个长矛头，其顶端有一条醒目的中脉，下面是空的，用以安装长长的矛柄；一些弯曲的三角形箭头，带有长柄；各种大小的直边或曲边凿子，其顶部是水平的；许多中空

的矛头；各种小刀，一些带有锯齿形刀刃，另一些则有很长的刀柄，看上去极为漂亮；各种样式的坏手镯；不同种类的发簪；许多生锈的破烂铁片或铁块，难以将其确认为工具。然而，铁器的种类包括工具、武器和装饰品，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千纪。

结论

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发现的陪葬物品和坟墓类型是独一无二的，坟墓周围是石圈或是排成一行的巨石，属于在公元前2千纪来到这里的雅利安人，而陪葬的青铜器、铁器和贝壳饰品把他们与在斯瓦特、迪尔、巴乔尔和白沙瓦谷地建造坟墓的雅利安人区别开来。碟形贝壳最有特色，它使雅利安人留在了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我们已经指明了雅利安人与帕米尔人之间的多重联系，对北山羊和狮子的喜爱也符合北部喜马拉雅地区的特点。虽然目前研究主要基于零散的物品，但却卓有成效并推导出唯一一个结论，即坟墓修建者除了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达尔德人的祖先外别无他人。然而，必须把坟墓修建者与在同一地区雕刻岩石的史前人类区分开来，后者尚处于靠狩猎为生的阶段，而前者已经定居下来并熟悉农业种植和木工技术。他们似乎是从帕米尔高原地区移居到此地的，因此看上去与北部讲雅利安语的民族有关联。另外，他们也可能与帕米尔高原地区讲吐火罗语的民族有某种历史渊源。

参考书目

1. 奥雷尔·斯坦因：《来自兴都库什地区的考古学注释：来自伊希戈曼的希腊青铜容器》，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伦敦，1944年。

2. 奥雷尔·斯坦因：《关于在亚辛发现的一件珠宝的注释》，载《印度古物》第61期，1932年。

3. 卡尔·耶特马尔教授：《来自喀喇昆仑的青铜斧：1958年在自

由克什米尔的探险结果》，载《美国哲学学会学报》，第 105 期，1961 年。

4. M. 拉菲克·莫卧儿博士：《喀喇昆仑史前人类学发现的重要意义》，载《中亚杂志》，伊斯兰堡，第 8 卷第 2 期，1985 年。

5. 塞巴斯蒂安·杜萨（Sebastian Dusa）博士：《在达丽罗进行的一项考古学调查》，载《中亚杂志》，伊斯兰堡，第 8 卷第 1 期，1985 年。

6. A. H. 达尼：《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之城》，伊斯兰堡，1983 年。

附录2　北部地区
（1986年—2000年）

阿克巴·侯赛因·阿克巴　撰

20世纪80年代，北部地区依然处于教派冲突的控制之中。1988年6月，科希斯坦、哈扎拉和迪亚玛尔的一支部落武装袭击了吉尔吉特，给其造成了极大损失。数百人被杀和受伤，上千所房屋被毁。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94年，破坏了这一地区向来十分安宁的气氛。要求给予基本权利的呼声甚高，也使得该地区处于不稳定的气氛之中。鉴于这种不稳定的情况，莫因·库雷希（Moen Qureshi）的看守政府针对北部地区宣布了一系列司法与行政改革措施。1993年，（退役）中将穆罕默德·谢菲格（Muhammad Shafiqe）被任命为北部地区行政长官（Chief Executive）。然而，由于政府的更迭，上述计划无法实施。在稍晚的1994年，巴基斯坦人民党执政时对此计划做了一些修改和强化。

以下是这一系列计划的重点：

（1）北部地区应设置行政长官一职，其地位应相当于联邦部长。克什米尔事务与北部地区部长可以行使如商务条例（Rules of Business）条款5（1）中之北部地区行政长官的所有权力。克什米尔事务与北部地区部长同时应为北部地区委员会（The Northern Areas Council）的主席。对（退役）中将穆罕默德·谢菲格的现有任命将被撤销。

（2）目前由财政司和行政司行使的北部地区之财政和行政权力应

由行政长官行使，这些权力应是北部地区商务条例的一部分。

（3）应由北部地区委员会以压倒多数票选举出一位以吉尔吉特地区为基础的副行政长官，其地位相当于一位国务部长。他应行使行政长官委派给他的权力。

（4）北部地区委员会应由24位选举出来的成员组成。此外，还应有妇女的两个席位，她们由行政长官与委员会协商提名。北部地区委员会应行使立法、财政和行政权力。

（5）应以吉尔吉特为基础设置三至五名顾问，其地位相当于省级部长，他们由行政长官与副行政长官协商后从北部地区委员会成员中选取。

（6）司法专员一职应取消，同时成立一个首席法庭（Chief Court），其组成包括：

a）由省高级法院的退休法官担任此法庭之主席，并享受由此可享有的各项利益。

b）一名省高级法院的高级司法官员或联邦政府为北部地区任命的基本工资表19级并有资格提升为20/21级的官员。

（7）首席专员一职改为首席秘书（基本工资表21级），协同其他四位秘书（基本工资表19级）共同管理北部地区的行政工作。

（8）现有的奇特拉尔侦察队的两个联队（Wing）将保留两年，并由行政长官管辖。

（9）由于北部地区委员会成员名额已由18名增至26名，北部地区委员会的选举应于1994年10月举行。

——上述（3）、（4）和（5）诸建议应于北部地区委员会选举后予以施行，其余建议应立即执行。

——财政司将于下一年度拨款6100万卢比，并在本财政年度拨出一笔额外的特殊款项用于贯彻实施北部地区的上述改革计划。

——为实施上述计划，将修正1975年的法律框架法令，同时在相关法规中作相应修改。

改革措施的加强使得教派纷争平息下来，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健康的政治活动。1994年10月进行了选举，形成了由巴基斯坦人民党和其

他政党的联合政府。皮尔·格拉姆·阿里·沙（Pir Karam Ali Shah）当选为副行政长官，其地位相当于国务部长，同时任命了五名相当于省级部长的顾问，包括古拉姆·侯赛因·萨利姆教授、巴基斯坦贾弗利亚运动（Tehrik-e-Jafria Pakistan）的赛义德·拉齐乌丁、巴基斯坦人民党的纳齐尔·萨比尔、海德尔·汗（独立人士）和阿萨德·柴迪（独立人士），但他们没有任何权力。同样，本该作为立法议会的北部地区委员会在五年期限内也未能行使立法权。

同样，被任命为行政长官和北部地区委员会主席的联邦克什米尔事务部长在四年内也没有行政权和财政权。

由三名成员组成的首席法庭已经建立，但商务条例却未被批准。首席法庭成员提出对案件进行单独听证，用以取代全庭审理。这一请求被首席法庭的主席否决，因此北部地区律师协会于1997年决定抵制首席法庭。

由于改革的原因，首席专员一职改为首席秘书，副警察总监（DIG）一职被升级为警察总监（IGP）。

1999年，联邦政府开始在北部地区征收所得税和销售税。此项决定激怒了该地区的人民，他们决定发起反抗运动。于是，产生了一个名为反税收运动（ATM）的团体。（退役）少校侯赛因·沙、阿克巴·侯赛因·阿克巴、谢尔·穆罕默德、阿夫萨尔·江和伊克巴尔博士是获得各教派民众支持的这一运动的领导者。

反税收运动于1999年4月3日发起了一场罢工。这次罢工因其在整个地区造成的停顿性影响而声名远播。在吉尔吉特的罕萨广场举行了一次大型公众集会，各政党与宗教派别的领袖、学生和贸易协会的领导人、商业和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其他公众舆论的代表在会上讲话。这是该地区史无前例的一次团结的大会，在呼吁政府取消税收的问题上表现了非凡的联合。大会的这一结果被传达给了反税收运动的领袖。

反税收运动的观点是：既然联合国对北部地区的问题尚有争议，而且人民未能享有基本权利，因而在这一地区征税就是非法的。征税法令的撤销证明了他们立场的正确性。

1999 年 5 月，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针对宪法诉状领域作出裁决。这一诉状于 1994 年由阿尔—杰哈德托拉斯（Al-Jehad trust）和哈比布·瓦哈布尔·海里（Habib Wahabul Khairi）代表地区内的进出口商人提出，内容是反对在没有对北部地区进行补偿的情况下抽取从中国到巴基斯坦的进口税，以及没有按照联合国人权宣言在巴基斯坦宪法中针对他们的权利作出规定。

最高法院指示联邦政府采取措施，行使北部地区人民的基本权利，使他们拥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并能够选举代表来管理人民。

政府应该在六个月内完成这一进程，首席法官艾吉玛尔·米安（Ajmal Mian）是五人陪审法官的首脑，他们负责听取有关北部地区地位的申诉。

艾吉玛尔·米安法官在一项指令中写道，联邦政府应当采取行政和立法措施来修订相关条例，以使“北部地区人民享有他们的基本权利……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管理该地区，并通过独立司法机构以达到司法公正”。

以首席法官为首的法庭由穆罕默德·巴希尔·贾汗吉里法官、马蒙·卡齐法官、乔德里·穆罕默德·阿里夫法官和莫尼尔·A·谢赫法官组成。

法庭建议喜马拉雅地区的居民可通过使该地区首席法庭与省高级法院平权的方法达到司法公正:“倘若首席法庭是由品德高尚、适合被提升为巴基斯坦任何高级法院法官的人来任职的话。”

“法庭权限将被扩大，包括涉及有关执行载入宪法内的基本权利的宪法申诉，以及通过保留上诉的申诉和/或通过对首席法庭判决的上诉来达到更高一级部门的权利。”

“首席法庭没有宪法权限，也没有可用来讨论针对法庭判决提出的上诉的部门。”

法庭以一句“法庭尚未决定”将北部地区应拥有何种政府这一问题搁置起来。

“我们也不能决定北部地区人民是否可在议会进行陈述，因为在现阶段，由于联合国支持下的公民投票即将进行，上述问题不是一个最

关乎国家利益的问题”，法官如此说道，“上面的问题将由议会和行政当局决定”。

在北部地区人民的基本权利问题上，裁决如下：“北部地区人民通过宪法规定的独立司法来获得公正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北部地区人民有权参与他们地区的管理，并拥有独立司法来行使基本权利。”

“北部地区人民被剥夺了宪法赋予他们的基本权利这一事实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由于“在所有意图和目的下”所有的公民法均适用于北部地区人民，因此他们都是巴基斯坦的公民。

1999 年 11 月再次进行了选举，通过成年人选举权选出了北部地区委员会的 24 名成员。穆斯林联盟政府早先建议增加委员会的席位。因此，妇女席位由两席增至五席，并且设置了五个技术席位。但后来穆沙拉夫政府又取消了技术席位。

2000 年 6 月，新的机构上马。此次设置的议长的新职位使委员会具有了议会的形式。

新政府由贾弗里亚运动（TJP）领导，并由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及独立组织组成。在 1999 年 11 月的选举中成为领袖党的巴基斯坦人民党抵制选举副行政长官和议长。贾弗里亚运动的菲达·穆罕默德·纳沙德（Fida Muhammad Nashad）成为第二任副行政长官，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PML）的萨希布·汗（Sahib Khan）当选为北部地区立法委员会的首任议长。此项结果的通告于 1999 年 10 月发布，由此，1999 年北部地区立法委员会框架（修订案）法令（LFO）、1999 年北部地区商务条例（修订案）也予以发布，北部地区上诉法庭也建立起来。

法令公布后，分权给地方当局的进程随之开始，但行政长官仍是权力的中心。甚至一项由委员会一致通过的法令也需要经过身为联邦克什米尔事务部长的行政长官的同意。立法委员会框架（修订案）法令（LFO）也为北部地区人民提供基本权利。

1999 年 12 月，克什米尔事务及北部地区部长以 1999 年销售税

（实施）法令的名义再次向该地区征税。

2000年10月，巴基斯坦律师委员会法令也推广至北部地区。同样，还颁布了建立受理上诉的最高法庭的公告。

专员/行政长官与首席秘书名单

姓名	职位	任期
伊夫蒂哈尔·乌丁(Iftikhar-ud-Din)	专员	1985—1986
阿卜杜尔·加尧姆(Abdul Qayyum)	行政长官	1987—1988
阿夫扎尔·格豪特(Afzal Kahout)	行政长官	1989—1990
艾纳亚特·乌拉·汗(Anayat Ullaha Khan)	行政长官	1990—1991
巴希尔·侯赛因·塔希尔(Bashir Hussain Tahir)	首席专员	1991
谢基尔·杜拉尼(Shakil Durrani)	首席专员	1991—1993
马茂德·汗(Mahmud Khan)	首席专员	1993
马茂德·汗	首席秘书	1994—1995
阿卜杜尔·拉迪夫·汗(Abdul Latif Khan)	首席秘书	1996—1999
桑格·玛尔江(Sang Marjan)	首席秘书	2000

缩略语与参考文献

缩略语：

Abbreviation		Meaning
A.O.	—	*Acta Orientalia*
A.P.	—	*Ancient Pakistan*, University of Peshawar.
B.E.F.E.O.	—	*Bulletin de, l'ecote Francaise d'Extreme Orient*, Paris.
B.S.O.A.S.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Dani Chilas:	—	A.H. Dani, *Chilas the City of Nanga Parvat (Dyamar).*
E.I.	—	*Epigraphia India.*
E/W.	—	*East and West ISMEO*, New Series.
I.A.	—	*Indian Antiquary.*
IOR.	—	Indian Office Library Records.
JCA.	—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JRAS.	—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Karakorum Hindukush:	—	*Karakrum — Hindukush* (Urdu), ed. by Manzoom Ali, Islamabad, 1985.
P.A.P.S.	—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SAI.	—	*Beitrage zur Sudasienforschung, Sudasien-Institute der Universitat Heidelberg.* Steiner, Wiesbaden.
SNOY, 1983	—	*Ethnologie Und Geschichte. Festaschrift fur Karl Jettmar.* SAI, 86.
ZAS	—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des Seminars fur Sprach — 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 der Universitat,* Bonn. Harrassoqith. Wiesbaden.

Abadi, Mohammad. Yusuf Husain. *Baltistan par Ek Nazar,* 1984.

Afridi, Banat Gul *History of Baltistan, Ms., Skardu,* 1968.

Ahmad, S. Maqbul & Bano, Raj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Kashmir,* New Delhi, 1984.

Ahmad, Wazir. *Tarikh-I-Sar Zamin Vadi-i-Shighar*, unpunblished Urdu manuscript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Author, 1980.

Ali, Tahir. 'Ceremonial and Social Structure among the Burusho of Hunza': in Chr. Von Furer. Harmendorf (ed.), Asian High land Societies in Anthropoligical Perspective, pp. 231-249, Delhi Reprint 1984-1981.

Amin Zia, M. *Shina Proverbs in Urdu Script*, Institute of Folk Heritage, Islamabad, 1978.

Antonini, C.S. & Stacul, G. *The Proto-historic Graveyards of Swat, Pakistan,* Rome, 1972.

Azizuddin, M. *Tarikh-i-Chitral,* Agra, 1897.

Bailey, Sir Harold, W. "An inerary in Khotanese Saka", in A.O., vol. XIV, 1936, p. 262, 1936.

Balneares, Elizabeth *Mountains of the Murgha — Zerin,* London, 1972.

Barrow, E.G. *Dardistan and Kafiristan,* Calcutta, *1885.*

Barth, F. *Indus and Swat Kohistan. An Ethnographic Survey. Studies honouring the Centennial of Universitetes Ethnografiske Museum,* Oslo 1857-1957, vol. II 1956.

———. *Political Leadership among Swat Pathan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onographs on Social Anthropology, 1959.

Basham, A.L.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ska*, Leiden, 1968.

Beal, S.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Delhi, Reprint, 1969.

Beg, Qudratullah. *Tarikh-i-Ahd-i-Atiq Riasat-i-Hunza,* Rawalpindi, vol. I, 1962.

Berger, Hermann. *Bericht uber sprachliche und Volkskundliche Forschungen im Hunzatal, Anthropos,* 55: 657-664, 1960.

———. "Die mit —ar—Erwiterten Verben des Shina". *Wiener Zeitschrift fur die Kunde Sund und Ostasiens.*, V, pp. 53-67, 1961.

———. *Zwei Erzahlungen aus dem Hunzatal,* Zeitschrift fur Kulturaustausch Jg. H.2/ 3, Institute fur Auslandsbeziehungen, Stuttgart, 1968.

———. *Das Yain Burushaski, Wiesbaden,* pp. VI + 228, 1974.

———. Etymologische Bemerkungen zu einigen suf Geister und Geisterglaube bezugliche worter im Burushaski. in: *Snoy* 29-33, 1983.

———. "A Survey of Burushaski Studies", *J.C.A.,* VIII, 1, 1985, pp. 33-37, 1985.

Bernhard, Wolfram. Beitrage der physischen Anthropologie zum Geschichtwverstandnis der ethnischen gruppen im Hindukush. in: *Snoy 1983:* 34-51, 1983.

Bertels, A.E. *Nasir-i-Khosrov i Ismailizm,* Moscow, 1959.

Beveridge, M. *The Akbarnama of Abu-l-Fazal,* Lahore Reprint, 1959.

Bidsutti, R.& Dainelli, G. *I Tipi Umani. Spedizione Italiana de Filippi nel' Himalia, Caracorum e Turchestan Cinese* (1913/14), Serie II, Vol. IX. Bologna, 1925.

Biddulph, John *Tribes of the Hindoo Koosh*, Karachi Reprint, 1977, also reprinted at Graz, 197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80.

Biswas, Atreyi.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unas in India,* Delhi, 1973.

Bivar, A.D.H. "Maues At Taxila: Problems of his arrival-routes and political allegiance", *J.C.A.* VII/1: pp. 5-15, July 1984.

Brauen, Martin. *Feste in Ladakh,* Graz/Austria, 1980,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The Oighours".

Bruce, C.G. *Twenty Years in the Himalayas,* London, 1910.

Buddruss, G. *Kanyawali, Proben eines Maiya-Dialakted aus Tangir (Hindukusch),* Munchener Studien zur Sprachwssenschaf, Beiheft B, Munchen, 1959, p. 72, 1959.

________. Aus dardischer Volksdichtung. *Indo Iranica.* Melanges presents a George Morgenstierne a l'occasion de son soixante-dixieme anniversaire; 48-61. Wiesbaden, 1963.

________. *Die Sprache uon Sau in Ostafghanistan Beitrage zur Kennitnis des Dardischen Phalura,* Munchener Studien zur Sprachwissenschaft, Beiheft M, Munchen, 1967, p. 150.

________. *"Neuiranische Wortstudien", Munchener Studien zur Sprachwissenschaft,* 32, 9-10, 1974.

________. *Khowar — A New Literary Language of Chitral (Pakistan),* Orient. Kongress, Mexico, Ms, 1976.

________. *Kohwar-Texte in Arabischer Schrift,*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e. Mainz, 1982.

________. *Neue Schriftsprachen im Norden Pakistans,* Einige Beobachtungen in. A.U.J. Assmann, Chr. Hardmeier (HRSG), Schrift und Gedachtnis. Archaeologie der literarischen Kommunikation, I: 231-244, Munchen, 1983.

________. *"Domaaki chot* "Ton." Mit Beitragen zur historischen Lautleher", *Munchener Studien Sprachwissenschft,* 42, 1983, 5-21.

________. "Domaaki-Nachtrage zum Atlas der Dardsprachen", *Munchener Studien zur Sprachwissenschaft,* 43, pp. 9-24, 1984.

________. "Linguistic Research in Gilgit and Hunza: Some Results and Prespective", *J.C.A.,* Islamabad, VIII/1: 27-32, 1985.

Buddruss, G. and Wiehler-Schneider, S. 'Wakhi-Lieder aus Hunza', *Gahrbuch fur musikalische Volk's und Volkerkunde,* Bd. 9, 1980.

Burrow, T. *The Sanskrit Language,* 3rd Ed, London, 1973.

Chakravarti, NP. "Hatun Inscription of Patola Deva', *E.I.,* Vol. XXX, pp. 226-231, 1953-54.

Chattopadhyay, B. *The Age of the Kushanas — A Numismatic Study*, Calcutta, 1979.

Chavennes, E. *Documents sur les Tou — Kine (Turcs) Occidentaux*, St. Petersburg, 1903.

Charak, Sukhdeva Singh. *Gulabnama* of Diwan Kirpa Ram, New Delhi, 1977.

Charak, Sukhdeva Singh. *Historical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in Dardistan and Ladakh*, New Delhi, 1983.

Clark, Graham, E. *Who were the Dards? A review of the Ethnographic Literature of the NorthWestern Himalaya*, Kailash, V/4: 323-356, 1977.

Crook, W. *The 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North — Western Provinces and Oudh*, II, Calcutta, 1896.

Cunningham, A. *Ladak, Physical,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1854*, London, New Delhi, Reprint, 1977.

_______.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Delhi, Reprint 1979.

Cunningham, J.D. *History of Sikhs*, 1966.

Dainelli, Gistoo *Le Condizioni delle Genti*, Spedizione Italians de Filiopi nel' Himalaia, Caracorum a Turchestan Chinese (1913/14), Serie II, Vol. III, Bologna, 1924.

_______. Le Gente e le Loro Condizioni Culturali, Spedizione Italiana etc., Vol. IX, 3-267. Bologna, 1925

_______. *Buddhists and Glaciers of Western Tibet*, London, 1933.

Dani, A.H. "Timargarha and Gandhara Grave Culture" in *A.P.*, vol. III, 1967-68.

_______. *Karakorum Highway unfolds the Romance of the Past*, Islamabad, 1981.

_______. 'Prehistoric Rock Carvings at Chilas', *Studia Iranica*, Leiden, Tome 11, pp. 65-72, 1982.

_______. *Chilas: The City of Nanga Parvat (Dyamar)*, Islamabad, 1983.

_______. *Human Records on Karakorum Highway*, Islamabad, 1983a.

________. *Guide to Karakorum Highway,* Isalamabad, 1983b.

________. "Carvings on a Thalpan, Rock' in *Peter Snony,* 1983c.

________. "The Sacred Rock of Hunza", *J.C.A.,* December 1985, Vol VIII, No. 2,p. 124.

________. "Two Royal Inscriptions from Chilas in the Karakorum Region', in *Orientalia J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Rome, 1985a.

________. *Shah Rais Khan's History of Gilgit,* edited by Professor A.H. Dani, 1986.

Dilawar, Khan. *Northern Areas, A Select Bibiolgraphy,* Islamabad, 1977.

Dilthey, Helmtraut. *Versammlungsplatze im dardo-Kafirischen Raum Dissertationshreihe des Sudasien-Institute de Universitat Heidelberg,* Wiesbadan, 1970.

Dobbins, K.W. *Coinage and Epigraphy of the Sakas and Pahlava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Politica. Chronology and Geograph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130 BC—AD. 70, Ph.D. Thesis, Unpublished, 1972.

Drew F. *The Northern Barrier of India,* London, 1877.

________. *The Jammu & Kashmir Territories,* Karachi, Reprint, 1980, also New Delhi Reprint, 197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75, London.

Duncan, J.D. *A Summer Ride Through Western Tibet,* London, 1906.

Durand, A.G. The Eastern Hindu Kush. in. William Martir Conway, *Climbing and Exploration in the Karakorum-Himalayas,* pp. 3-17, London, 1894.

________. *The Making of a Frontier. Five Years experiences and adventures in Gilgit, Hunza Nagar, Chitral and the Eastern Hindu-Kush,* London, 1899. Reprint Graz also reprinted in Karachi, 1974 and 1977.

Durrani, Col. Sayid. *'Inqilab-i-Gilgit — Ek Mukhtasar Jaizah in Karakoram Hindukush,* pp. 362-371, 1985.

Dutt, N.N. and Sharma, S. —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 Delhi, 2nd edition, 1984.

Edelman, D.I. — *The Dardic and Nuristani Languages,* Nauka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83.

Eggermont, P.H.L. — 'Ptolemy, the geographer, and the people of the Dards: Alexander in Buner, the Aornos problem and the Dards of Dyrta', in *J.C.A.* vol. VII, No. 1, July, 1984, pp. 73-124.

Elias, N. and Ross Denison. —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at,*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London, Reprint, 1972.

Emerson, Richard M. — "Charismatic Kingship: A Study of State Formation and Authority in Baltistan", *J.C.A.*, vol. VII, No. 2, pp. 95-133, 1984.

Endresen, R.T. and Kristiansen, K. — "Khowar Studies", *Acta Iranica, Hommages et Opera,* Minora, Vii, Monumentum Georg *Morgenstierne,* I, Ledien, 1981, 210-243, Pl. LVII-LX, 1981.

Fauq. — *Tarikh-i-Kashmir.*

Francke, A.H. — *A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1842, London, Reprint, 1907.

__________. —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 1914.

__________. — *History, Folklore and Culture of Tibet,* Delhi Reprint, 1978.

Francke, A.H. — "The Eighteen Songs of the Bonona Festival" in *I.A.*, 1985.

Frembgen, J. — "Ethnographical Field-Research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Nagar. 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Process of Settlement", *J.C.A.*, VII/2: 29-38, 1984.

__________. — Zentrale Gewalt in Nagar (Karakorum), SAI, 103, 1985.

Fremont, A. — *Contribution a L'etude du Burushaski,* Thesis, Paris III University, 1982.

Friedl, Erika. — *Trager Medialer Begabung im Hindukush und*

	Karakorum, Osterreichishe Ethnologisch Gesellschaft, Wien, 1965.
Friedrich, Adolf.	*Wissenschaftliches Tagebuch der Deutachen Hindukusch-Expedition 19655/56,* Ms. 900 pp, 1955/56.
Frye, R.N.	*The Heritage of Persia,* Cleeveland, 1963.
Fuchs, W.	*Hue Ch'as's Pilgerreise durch Nordwest-Intien und Zentralasian um 726,* S. 1-47. Berlin, 1938.
Fussman, G.	*Atlas Linguistique des parlers dards et Kafirs,* 2 vols, Paris, 1972.
————.	"Inscriptions de Gilgit", *B.E.F.E.O.,* Tome LXV, Paris, pp. 18-19, 1978.
Gazetteer:	*Gazetteer of Kashmir and Ladak,* 1907. Reprint Delhi, 1974.
Ghafur, M.A.	'Two lost inscriptions relating to the Arab Conquest of Kabul on the North West Region of West Pakistan', in *A.P.*, Peshawar, Vol. II, pp. 4-12, 1965/66.
Ghansara Singh (Brig.)	*Gilgit Before 1947,* Delhi, Urdu Translation by Sher Baz Al Khan Boroha, Rawalpindi, 1986.
Ghulam Haidar (Col.)	Inqilab-i-Gilgit meri nazar me' *in Karakorum-Himdukush,* pp. 335-361, 1985.
Ghulam Mohammad	*Festivals and Folklore of Gilgit. Memoir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I/7: 93-127, 1905. Reprint Islamabad, 1980.
Grahame Bailey	*The Grammar of the Shina Language,*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4.
Grierson, G. and Konow, St.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11 Vol. Calcutta 1903-1967. Reprint Delhi, 1967-1969.
Grjunberg, A. L. and Steblin-Kamenskij, I.M.	*Vaxanskij Jazyk. Testy, Solver', Grammaticeskij Ocerk,* Moskva, 1976.
Grotzbach, E.	*Bagrot — Beharrung und Wandel Einer peripheren Talschaft im Karakorum. Die Erde,* 115: 1984.
Hamid, S. Shahid.	*Karakuram Hunza, The Land of Just Enough.* Karachi, 1979.

Hasan Khan Rono (Col.) Unpublished. *Jang-i-Azadi, Gilgit wa Baltistan.*

Hasan, Mohibbul, *Kashmir Under the Sultans,* Calcutta. 1959.

Haserodt, K. *AbfluBverhalten der Flusse mit Bezugen zur Sonnenscheindauer und zum Niedraschlag zwischen Hindukusch (Chitral) und Hunza-Karakorum (Gilgit, Nordpakistan).* Mitteilungen der Geographischen Gesellschaft 96: 29—36, 1984.

————. Aspects of the Actual Climatic Conditions and Historic Fluctuations of Glaciers in Western Karakorum. *J.C.A.* Vol. VII, 77-94. 1984a.

Hashmatullah, Khan. *Mukhtasar Tarikh-i-Jammun* etc. (A Short History of Jammu & of the Area of Tibet), Part VI. Lucknow. Later reprinted in Lahore under the title of *Tarikh-i-Jammu*, 1969. 1939.

Hashmatullah Khan (D.S.P.) 'Padum Party ek naqabil-i-Faramosh dastan' in *Karakorum Hindukush* pp. 479-501, 1985.

Hassnain, F.M. *Gilgit — The Northern Gate of Indian,* New Delhi 1978.

Haughton, H.L. *Sport & Folklore in the Himalayas,* London, 1913.

Hinuber, O.V. 'Royal Inscriptions from North Pakistan', *J.C.A.* Vol. VIII, No. 1, July, 1985, pp. 59-67, 1985.

Holdich, T. *The Gates of India* (being an Historical Narrative). London. 1910.

Humbach, H. "Die Sogdichen Inschen Insch rifteen funde Vom oberen Indus (Pakistan)" *Allagemeine und vargieichende Archaeologie, Beitrage* (des Deutschen Archaeologichen Instituts), Bd. 2, 1980, PP. 201-28, 1980.

Inayatullah, S. *Report of the Northern Arean Committee,* December, 1971. See also under Report, 1971.

Ivanow, W. *Nasir-i-Khusraw and Ismailism.* The Ismaili Society, Series B. No. 5, Leiden. 1948.

Jettmar, K. Die Deutsche Hindukusch-Expedition 195/56. *Wiener volkerkundliche Mitteilungen* 4/1: 91—97, 1956.

———. *Heidnische Religionsreste im Hindukusch und Karakorum.* Wissenschaft und Weltbild 10/2: 126—131. Wien, 1957.

———. *Schmiedebrauchtum· im ostlichen Hindukusch. Mitteilungen der Anthropologischen Gesellschaft im Wien,* LXXXVII: 22-316, 1957a.

———. *Volkerkundliche forschung im Haramoshgebiet* (Gilgit Agency). *Zeitschrift fur Ethnologie* 83/2: 252—256, 1958.

———. *Soziale und witschaftliche Dynamik bei asiatischen Gebirgsbauern (Nordwest Pakistan). Sociologus,* F.F., 10/2: 120—138, 1960.

———. *Megalithsystem und Jagdritual bei den Dardvolkern. Tribus* 9:121—134, 1960a.

———. Schnitzwerke aus den Talern Tangir und Darel. *Archiv fur Volkerkunde,* 14: 87-118 (Wien), 1960b.

———.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Northwest Pakistan, *Year Book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PP. 492-499, 1960c.

———. Ethnological Research in Dardistan 1958. Preliminary Report. *P.A.P.S.* Philadelphia, 105/1/79/97, 1961.

———. The Middle Asiatic Heritage of Dardistan Islamic Collective Tombs in Punyal and Ther Background). *E &W* 17/1-2: 59—82, 1967.

———. Altentotung in Dardisan. *Paideuma* xv: 162—166, 1969.

———. Weinbereitung and Weinrituale im Hindukusch. *Festschrift zum 65. Gebursstag von Helmut Petri, hrsg. von K. Tauchmann.* S. 191—205, Koln — Wien, 1973.

———. *Die Religionen des Hindukusch mit Beitragen von Schuyler:* JONES und Mak KLIMBURG. Die Religionen der Mehschheit hrsg. V. Christel matthias Schroder, Band 4,1. Stuttgard, 1975.

———. FraGMENT EINER Balti-Version der Kesar-Sage. *ZAS* 11: 277—285, 1977.

———. Bruchen und FloBe im Karakorum. *Aus dem material Heidelberger Expeditionen.* Heidelberger Jahrbucher XXII: 59—70, 1978.

———. *Zur Kesar-Sage in Baltistan und Ladakh. Vorbericht uber die Ergebnisse einer Reise im August*, September und Oktober 1978. *ZAS* 13: 325—337, 1979.

———. "Bolor-A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tical and Ethnic Geography of Northern Pakistan", in *J.C.A.* Vol. II, No. 1, July 1979, PP. 39—70.

———. *Bolor & Dardistan.* Islamabad 1980 (Reprint), 1980.

———. Indus Kohistan – An Ethnographic and Linguistic Overview. *Kohistan Development Board News* 2nd Annual Number: 6—12. Abbottabad, 1982.

———. Kafiren, Nuristani, Darden: Zur Kalrung des Begriffssystems. *Anthropos* 77: 254—263, 1982a.

———. "Petroglyphs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Uper Indus valley. The 1981 expedition — A preliminary Report." *Zentral asiatisch Studien, Sonder Druch*, 1982, pp. 298-302, 1982b.

———. Indus-Kohistan. Entwurf einer historischen Ethnographie. *Anthropos* 78/3—4: 501-516, 1983.

———. *Zwischen Gandhara und en Seidens trassen. Felsbilder an Karakorum Highway.* Ausstellungskatalong, unter Mitarbeit von Dr. V. THEWALT und Dipl. Ing. R. KAUPER, hrsg. von der Forschungasstelle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c der Wissenschafte und dem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Mainz, 1985.

———. "Bronze Axes from the Karakorum Results of the 1958 Expedition in Azad Kashmir", *P.A.P.S.* Vol. 105, (I), 1961, PP. 98—104, 1985a.

Kanboh, M.S. *Amal-i-Saleh Shah Jahan Nama,* Lahore, Vol. II, PP. 193—94.

Kapur, M.L. *History of Jammu and Kashmire State.* 1966.

——. *Kashmire Sold and Snatched, Jammu,* 1968.

——. *History of Jammu & Kashmir State, Jammu,* 1980.

Kaul, G.L. *Kashmire Through the Ages,* Srinager, 1963.

Kaul, S. Kashmir: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Documents,* New Delhi, 1977.

Keay, John. *When Men & Mountains Meet. The Explorers of the Western Himalayas,* 1820—75. London, 1977.

——. *The Gilgit Game: The Explorers of the Western Himalayas 1865—5.*London, 1979.

Keith Miller *Continents in Collision,*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London, 1982.

Khan, Dr. Husain Moghal Relations with Baltistan and the Northern Region, From Akbar to Aurangzeb' in *J.C.A.* Vol. II, No. 1, July 1984, PP. 179—190, 1984.

Khan, Nazir Ahmad. "Rock Engravings from Hathiano Kandao", in *J.C.A.* Vol. VI, No. 2, Dec. 1983, PP. 59—62, 1983.

Khan, Shah Rais. *History of Gilgit* (Ms), Published in 1987, ed. by A.H. Dani.

Khan, Dr. Yar Mohammad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of the Mughals with the rulers of Northern Pakistan', in *J.C.A.* Vol. VIII, No. 1, July 1985. PP. 161—169, 1985.

Khawar, Abdul Hamid. "Sumali Ilaqajat men Isha't-i-Islam, in *Karakorum — Hindukush,* edited by Manzoom Ali, Gilgit, 1985.

Klimov, G.A. et. D.I. Edeiman. *Jazyk Burusaski,* Moskva, Akademi a Nauk, 1970.

Knight, E.F. *Where Three Empires Meet,* Karachi Reprin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93, 1980.

Konow, Sten.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Kharoshthi Inscriptions, Calcutta, 1929.

Kaul, Omkar N. and Schmidt, R. Laila "Dardistan revised,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ashmiri and Shina: in Omkar N. Koul and Peter E. Hook: *Aspects of Kashmiri Linguistics,* Delhi, 1983.

Kumar Mahajan, S. *Debacle in Baltistan*, New Delhi, 1973.

Lahori, Abdul Hamid. *Badshahnama*, Persian Text, Calcutta, 1866.

Leitner, G.W. *The Hunza & Nagyr Handbook,* I, Calcutta, 1889.

New Dangers and Fresh Wrongs, London, 1895.

———. *The Languages & Races of Dardistan,* London, 1876.

———. *Dardistan, in 1866, 1886 and 1893*, New Delhi, Reprint, 1978.

Levin, G.M. Bongard *Mauryan Indian,* New Delhi, 1985.

Lockhart, W.S.A. and *Woodthorpe*, R.G. *Confidential Reprot of the Gilgit Mission 1885—86.* London, 1889.

Loffler, Reinhold *Soziale Stratifikation im sudlischen Hindukusch und Karakorum.* Dissertation, Mainz, 1964.

Lohuizen de Leeuw, Von. *The Scythian Period.* Leiden, 1949.

Lorimer, DD.L.R. "Notes on the Phonetics of the Gilgit Dialect of Shina" London, 1924, 1—24, and II 177-212, 1924.

———. The Supernatural in the Popular Belief of the Gilgit Region. *JRAS* PP. 507—536, 1929.

———. An Oral Version of the Kesar Saga Hunza. Folk-Lore XLII/2: 105—140, 1931.

———. *The Burushaski Language,* 3 Vols. Oslo. 1935/38.

———. *The Dumaki Language, outlines of the Speech of the Doma or Bericho of Hunza,* Comite Internaitonal Permanent de Linguistes publications de la Commission d'Enquete Linguistique IV, Nijmegen, 1939.

———. Language Hunting in the Karakoram. London, 1939.

———. *The Wakhi Language,* 2 Vols. London, 1958.

MaCrindle, J.W. *Ancient India as described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New Delhi, Reprint, 1979.

McGovern, W.M.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Chapehill, 1939.

Majumdar, R.C. and Altekar, A.S. *The Vakatake-Gupta Age,* Banaras, 1954.

Majumdar, R.C. *The Classical Accounts of India.* Calcutta., 1960.

Manzoom Ali (ed.) *Karakorum-Hindukush,* Islamabad, 1985.

Marsh, Capt. H.C. 'Description of a Trip to the Gilgit Valley, Dependency of the Maharaja of Kashmir.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 XLV, Part I, No. 11: 119-130, 1876.

Marshall, John Sir. *A Guide to Taxila,* Karachi, 1960.

Marvin, Charles, *The Russians Advance Towards India.* Peshawar Reprint, 1984.

Minorsky, V. *Hudud-al-Alam,* Karachi Reprint, 1980.

Mohammad Khan (Major) Inqilab aur Jang-i- Azadi in *Karakorum Hindukush,* PP. 380—391, 1985.

Moorcroft, W. and Trebeck, G. *Travels in Himalayan Provinces. Hindustan & the Punjab From 1819 to 182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rachi, Reprint, 1979.

Morgenstierne, G. *Report on a Linguistic Mission to North-Western India.* OSLD, 1932.

———. "Iranian elements in Khowar", *B.S.O.A.S.* 8, PP. 658-671, 1936.

———. "Notes on Phalura, an unknown Dardic language of Chitral", *Skrifter utgitt av det Norske Videnskaps Akademi I Oslo,* II, Hist. Fil. Klasse, 1940.

———. "Some Features of Khowar Morphology", *Norsk Tidskrift fur Sprogvidenskp,* Oslo, XIV, 1947, 5—27, 1947.

———. "A Khowar Tale", *Indian Linguistics, SK Chatterji Jubilee Volume,* XVI, 163-169, 1955.

——. *"Sanskritic words in Khowar"*, Dr. S.K. Belvalkar Felicitation Volume, Banaras, 1957, 84—98, 1957.

——. *Indo-Iranian Frontier Languages, IV, The Kalasha Language,* Oslo, 1973, 1973.

——. *Irano-Dardica,* Wiesbanden, 1973, P. 242, 1973.

Mughal, M.R. "The Significance of some pre— and Protohistoric discoveries in the Karakorum Region" *J.C.A.* Vol. VIII, No. 2, December, 1985, PP. 213-235.

Mukherjee, B.N. *An Agrippan Source. A study in Indo-Parthian History,* Calcutta, 1969.

——. *The Kushana Geneology,* Culcutta, 1967.

Muller-Stellrecht, I. *Feste in Dardistan.* Darstellung and Klturgeschichtliche Analyse, Arbeiten sus dem Seminar fur Volkerkunde der 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at Frankfort S.M., Wiesbaden, 1973.

——. *Hunza und China* (1761—1891). *SAI* 44, 1978.

——. *Materialian zur Ethnographie von Dardistan (Pakistan) Aus den nachgelassee men Aufzeichnongen* von DLR Lorimer, I, *hunza,* Grez/Austria, 1979.

——. *Materialin zur Ethnographie von Dardistan (Pakistan) Aus den nachgelassemen Afzeichnongen* von DLR Lorimer, II, Gilgit, III, Chitral, und Yasin. Graz/Austria, 1980.

——. Life Patterns in Hunza *J.C.A.* IV/2: 5158, 1981.

——. *Hunza.* in: Kalus E. Muller (Ed.), *Menschenbilder fruher Gesellschaften,* PP. 388—415, Frankfurt, 1983.

——. The People of Hunza: Their Life in the High Mountain Area of Pakistan. *JCA VII/2*: 21—28, 1984.

——. Tribut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nza & China (1761-1947) *J.C.A.* VIII/1. 125—132, 1984a.

Murtaza, G. *Tarikh-i-Chitral,* Peshawar, 1962.

Narain, A.K.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57, P. 131, 1957.

Neve, Arthur, (Major) not dated. *The Tourist's Guide to Kashmir, Ladakh, Skardo,* Lahore, 18th Ed.

Nayyar, Adam. Cosmology & Colour Perception in the Astor Valley, *J.C.A. VII/2*: 69—75, 1984.

Nicholas Mansergh and Penderel Moon (ed). *The Transfer of Power* London, 1942-1947.

Nevill, H.L. *Campaigns on the North — West Frontier,* Lahore, Reprint, 1977.

Paffen, Kh., Pilewizer, W. and Schneider, H.J. *Forschungen im Hunza-Karakorum. Volaufiger Bericht uber die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en der Deutsch-osterreichischen Himalaya-Karakorum-Expedition* 1954, Erdkunde, X/1: 1-33, 1957.

Pande, B.M. 'Neolithic hunting scene in a stone slab from Burzahom, district Srinagar, Kashmir in *Asian Perspective* Vol. XIV, 1971, PP. 134-38, 1971.

Parmu, R.K. *A History of Muslim Rule in Kashmir,* Delhi, 1967.

Paul, Pran Gopal. *Early Sculpture of Kashmir,* Sneldruk Enschede, 1986.

Paxalina, T.N. *Vaxanskij Jazyk,* Moskva, 1975.

Pfeffer, G. Kin-Classification in Hunza, *J.C.A.* VII/2. 57-67, 1984.

Qamar, M. Said. "Pottery collection from Chilas Region"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J.C.A.* VII/I, July, 1985, oo. 139-160.

Rathjens, Carl. Fragen der horizontalen und Vertikalen Landschaftagliederung im Hichgebirgssystem des Hindukusch. In: Carl Troll (Ed. *Landschaftsokologie der Hochgegirge Eurasiens. Erd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 Bd. IV: 205-220 Wiesbaden.

Rathjens, C. Human Interference in the Natural Water Balance. Geomorphological Manifestations and Consequences in the Arid Areas of Afghanistan and North-West india. In. *Natural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A Biannual Collection of Recent German Contributions Concerning the Explor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Vol. 2, 20-30. Tubingen, 1975.

Raverty, H.G. *Notes on Afghanistan & Baluchistan.* 1879 Lahore Reprint, 1976.

Rawlinson, g. and Slakeney, E.H. *The History of Herodotus,* 2 Vols. Every Man's Library London, 1945.

Raychaudhuri, H.C. *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6th ed., 1953.

Report. Report of the N. Areas Committee, Dec. 1971. See Also under Inayatullah, 1971.

Rice, T. Talbot. *The Scythians,* London, 1957.

Robertson, G. *Chitral: The Story of a Minor Siege,* First Printed London, 1898, Karachi Reprint, 1977.

Ross, E. Denison. *Tarikh-i-Rashidi (History of the Moghals of Central Asia,)* (Tr. By) London. See also under Elias, 1972.

Sachau, E.C. *Alberuni's, India,* London, 1910.

Sagaster, K. The Kings of Baltistan and other Kings. Some Remarks on Balti Folk Literature. *J.C.A. VII/2* : 49—55, 1984.

Saksena, B.P. *History of Shah Jahan of Delhi,* Allahabad, 1958.

Sankalia, H.D. *Prehistory and Protohistory of India and Pakistan,* Poona, 1974.

Sastri, K.A.N.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India,* The Mauryas and Satavahanas, Madras, (ed. by), 1957.

Schmidt. R. Laila and Zarin, Mohammad "The phonology and Tonal System of Palas Kohistan/Shina", *Munchener Studien zur sprachwissen schft,* 40, 1981.

————. *Kohistani to Kashmiri,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Dardic Languages,* Indian Institute of Language Studies Patiala, 1984.

Schmitt, Erika. *Ornaments der Gandharakunst und rezenten Volkskunst im Himkukusch und Karakorum.* Dissertationareibe des Sudasien-institute der University Heidelberg, 10, Wiesbaden, 1971.

Schomberg, R.C.F. *Between the Oxus and the Indus*, London, 1935.

Schuler, S. The "Story of the Creation of Shigar" of Wazir Ahmad, *Central Asiatic Hournal 22/1-1: 102-120, 1978.*

Schweinfurth, U. *Die horizontale und vertikala verbreitung der Vegetation im Himalaya*. Bonner Geographische Abhandlunge, 20, 1957.

————. *Nagaland und die invasion der Chinesen. Aussenpolitik, Zeitschrift fur international Frage*, H—12: 853—857, 1962.

————. *Der Himalaya — Landschaftsscheide, Ruckzugsgebiet und politisches Spannungsfeld.* Geograph. Zeifschrift, 53/4: 241-260, 1965.

Schweinfurth, U. *Der Inner Himalaya - Ruckzugsgebiet, Interferenzzone, Eigenentwicklung. Geographische Zeitschrift*. Beitrage zur Hochgebirgsforschung und Zur allgemeinen Geographie. Festschrift fur Harald Uhlig zu Seinem 60. Geburtstag, hrsg. V.E. Meynen und E. Blewe u.s., Band 2: 15—14, 1982.

————. Mensch und Umwelt im Indus-Durchbruch am Nanga—Parbat (NW-Himalaya) in : *Snoy 1983*: 536-557, 1983.

————. 'Man's impact on Vegetation and Landscape in the Himalayas' in W. Hotzner and I. Ikusimea (eds). *Man's Impact on vegetagion*, PP. 297—309. The Hague, 1983a.

Ser, M. (un-published) *Shah nama-i-Chitral*, (History of Katro Family, Persian Manuscript.

Shah Khan (un-published) *History of Liberation Struggle*.

Shahrani, Nazif Mohib, M. *The Kirghiz and Wakhi of Afghanistan*, Seatle, 1979.

Sher V.A. *Petroglyphic Srednei i Centralnoi Assi* Moscow, 1980.

Shunying, M. "Development & Achievement of Archaeology in

Xingjiang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J.C.A.* VII/1: July 1986, PP. 55-72, 1984.

Sikandar Khan, Major. *Liberation of Northern Areas,* Rawalpindi, 1975.

Singh, Khushwant, *A History of the Sikhs.* Oxford, Vol. I. 1977.

Singh, S.T. *Code of Tribal Custom in the Gilgit District,* Jammu, 1876.

Sircar, D.C. *Select Inscriptions bearing on India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42.

Sloan, M.I. *Khowar-English Dictionary, A. Dictionary of the Predominant language of Chitral,* Peshawar, 1981.

Snoy, P. *Darden — Nordwestpakistan (Gilgit bezirk).* Herstellung von Felsbildern. *Encyclopadeia Cinematographics* (Ed.: G. Wolf). Gottingn E. 2.13/1959, 1960.

______. Darden — Nordwest Pakistan (Gilgit bezirk). Schamanistischer Tanz. *Encyclopaedia Cinematographica* (ed. G. Wolf). E—213/1959, 1960a.

______. *Bargrot. Eine dardische Talschaft im Karakorum.* Bergvolker im Himdukusch und Karakorum, hrsg. V.K. Jettmar, Ed. 2. Graz, 1975.

______. *Ethnologie und Geschichte,* Festschrift Karl Jettmar. *SAI,* 86, 1983.

______. Thronfolge in den Furstentumern der GroBen Scharungszone. in : *Snoy 1983*: 573-581, 1983a.

Sohnen, Renate. On Reflections of Historical Events in Balti Folk Songs. In : *Snoy 1983:* 582-601, 1983.

______. Treasures of Literary and Musical Tradition Baltistan. *J.C.A.* VII/2: 39-48, 1984.

Southall, A.W. *Alur Society,* Cambridge, 1956.

Stacul, G. "Notes on the discovery of a Necropolis near Kherai in the Gorband valley (Swat-West Pakistan". *East & West,* Vol. 16, 1966, PP. 261-274, 1966.

———. "Discovery of Protohistoric Cemeteries in the Chitral Valley (W. pakistan" *East & West)* Vol. 19, 1969, PP. 92-99, 1969.

Staley, J. *Words for My Brother. Travels Between the Hindukush and the Himalayas.* Karachi, 1982.

Stein, M.A. *Kalhana's Rajatarangini. A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Kashmir,* Vol. 1 & II, London, 1900, Delhi Reprint, 1979.

———.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Oxford, 1907.

———.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 Westernmost China.* Oxford, 1921.

———. 'A Chinese Expedition across the Pamirs & Hindukush A.D. 747',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12-131, 1922.

———. *On — Alexander's Track to the Indus,* London, 1929.

———. 'Note on a find of Ancient Jewellery in Yasin.' *Indian Antiquary* 61: 103-106, 1932.

———. From Swat to the Gorges of the Indus.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C/2: 49—56, 1942.

———. 'Archaeological Notes from the Hindukush Region, *J.R.A.S.*. 5—24, Paris III—V, 1944.

———. *Ancient Geography of Kashmir,* Calcutta,, Reprint, also reprinted as *Memoir on the Ancient Geography of Kashmir* in Kalhana's *Rajatarangini* Vol. II, P. 435, Chap. IV, 1977.

Stellrecht, I.M. See Muller-Stellrecht.

Sufi, G.M.D. *Kashmir, Being a History of Kashmir,* 2 Vols. Lahore, 1948/49.

Subrawary, A.H. *Tragedy in Kashmir,* Lahore, 1983.

Tahir Kheli, R.A.K. "Geotechtonic Evolution of Kohistan", in *Geology of Kohistan.* ed. by R. Tahir Kheli M. Qasim Jan, Peshawar, 1979.

———. *Geology of the Himalaya, Karakorum and Hindukush in Pakistan.* University of Peshawar, 1982.

Tahsin, S. *Shigarnamah,* Persian manuscript, 1800.

Teng, M.K., Bhatt, R.K.K. and Kaul, Santosh: *Kashmir: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Documents,* New Delhi, 1977.

Thapar, B.K. 'Fresh Light on the Neolithic Cultures of India' in *J.C.A.* VII/1" July 1984 PP. 195, 1984.

Thomas, F.W. *Tibetan Literary Texts & Documents Concering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35.

Historical Section of General Staff. *The Kashmir Campaign 1947—1948,* Rawalpindi.

Thompson, H.C. *A Narrative of Events in Chitral, Swat and Bajour, Chitral Campign* Sang-e-Meel, Lahore, Reprint, 1981.

Tiffou, E. & Morin, Y. Ch. "A Note on split ergativity in Burushaski." *B.S.O.A.S.* 45, 1, 1982, PP. 88-94, 1982.

Trench, C.C. *The Frontier Scouts,* London, 1985.

Tucci,G. Oriental Notes (II), An Image of a Devi Discovered in Swat and Connected Problems. E & W 14/3—4: 16—146—182, (*East & West),* 1963

———. *Tibet: Land of Snows,* London, 2nd Ed, 1973.

———. On Swat, The Dards & Connected Problems, *East & West,* 27/1-2: 9-103, 1977.

Turner, R. *A Compara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o-Aryan Languages,* 4 Vols. London, 1966/85.

Tussa, C.S.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Darel", *J.C.A.* Vol. VIII, No 1, July, 1985, PP. 179-191, 1985.

Vigne, G.T. *Travel in Kashmir, Ladah, Iskardo,* London, 1842.

Visser, Ph.C. *Zwischen Karakorum und Hindukush, Eine, Reise nach dem unbedannten Herzen Asiens,* Leipzig, 1928.

Watters. T.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Delhi Reprint, 1973.

Williams, N. Sims "The Sogd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 A preliminary Report", *Pakistan Archaeology,* nos. 10-22 (19741086), Karachi, 1986, PP. 196-202, 1986.

Wood, J. *A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is Source of the River OXUS, by the Route of Indus, Kabul, and Badakhshan,* London, 1841.

Yong, Ma. "The Chinese inscription of the Daklei' envoy on the Sacred Rock of Hunza', *Pakistan Archaeology,* 10-32 (1974-1988), PP. 201-221).

Younghusband, F.E.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London, 1896.

Zarin, M.M. and *Schmit,* R.L. *Discussions with Harig. Land Tenure and Transhumance in Indus Kohistan,* Berkeley Working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Centre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4.

译名对照表

陆水林　译编

编译说明：本对照表由原著索引增补编译而成，书中的专有名词，已尽可能收入表内。原著索引中部分专名所附的括注，依原貌放在圆括号内。部分专名有其他译法者，亦酌情收入本对照表内，以斜线/分隔，以资参考。为方便读者，编译者对少数专名加了简注，放在方括号［］内。本对照表翻译过程中，曾参考了有关学术译著和工具书，但本书专名门类较广，并涉及多种地方语言，翻译难度颇大。错讹之处，恳望读者多加指正。

A

Abbas Ali(Alias Khusro Khan),阿巴斯・阿里(又称胡斯劳・汗)

Abbas Khan,阿巴斯・汗

Abbas Raja,阿巴斯罗阇

Abbas Shah,阿巴斯・沙

Abbottabad,阿博塔巴德

Ahdal Khan of Baltistan,(巴尔蒂斯坦的)阿卜达尔・汗

Abdul Hamid Khan,Raja,阿卜杜尔・哈米德・汗(罗阇)

Abdul Hamid Khawar,阿卜杜尔・哈米德・哈瓦尔

Abdul Hamid Lahori,阿卜杜尔·哈米德·拉合里

Abdul Jabbar,阿卜杜尔·贾巴尔

Abdullah,阿卜杜拉

Abduilah Khan,阿卜杜拉·汗

Abdullah Khan Inapector,阿卜杜拉·汗警官

Abdul Qayyum Khan (Chief Minister),阿卜杜拉·加尧姆·汗(首席部长)

Abdul Rahim Khan,阿卜杜尔·拉希姆·汗

Abdur Rab Nishtar,阿卜杜尔·拉卜·尼希德尔

Abisara,阿比萨拉(王国)

Abisares,阿比萨瑞斯

Abudgamo,阿布德加莫

Abul Hasan,阿布尔·哈桑

Abu Said Khan,阿布·赛德·汗

Abu Sayid(Kashlniri),阿布·赛义德

Abu Sayid Anan (Sultan), 阿布·赛义德·阿南(苏丹[国王])

Abyssinia,阿比西尼亚

Abyssinian,阿比西尼亚人

Acalamangla,阿卡拉曼格拉

Achaemenian,阿黑门尼德(人/帝国)

Achal(Urdil),阿贾尔(乌尔迪尔)

Adam Khan(Raja of skardu),阿达姆·汗(斯卡杜罗阇)

Adam Khor,阿达姆·霍尔

Adat Choh(Lonche ruler),阿达德·久(龙且统治者)

Adi Somoviprah,阿迪·索摩维巴拉

Afghan,阿富汗

Afghanistan,阿富汗

Afridi,阿夫里迪,

Afzal Shah Of Chitral,奇特拉尔的阿夫扎尔·沙

Afzalul Mulk. 阿夫扎尔·乌尔·穆尔克

Aga Khan,阿迦·汗

Aga Khan Foundation,阿迦·汗基金会

Agartham,阿加尔特姆

Aghil Dewan(Pass),阿吉尔大坂(山口)

Ahmad Ali Khan,艾哈默德·阿里·汗

Ahmad Ali Shah,艾哈默德·阿里·沙

Ahmad Ali Shah(Skardu ruler),艾哈默德·阿里·沙(斯卡杜统治者)

Ahmad Chak,艾哈默德·查克

Ahmad Ghazwapa,艾哈默德·迦兹瓦巴

Ahmad Khan,艾哈默德·汗

Ahmad Khan (son of Ali Sher Khan),艾哈默德·汗(阿里·谢尔·汗之子)

Ahur Mazda,阿胡拉·玛兹达

Ain,阿因

Ajam Shah (alias Najm),阿杰姆·沙(又称纳杰姆)

Ajit Singh,阿吉德·辛格

Ajmal Mian,艾吉玛尔·米安

Akbar Aman,阿克巴·阿曼,

Akbar Husain (Naib Subedar),阿克巴·侯赛因,副苏贝达尔[一种军职——译者]

Akbar Khan,阿克巴·汗

Akbar(Mughal emperor)阿克巴(莫卧儿皇帝)

Akbar-nama,《阿克巴本纪》

Akhund(Lal Mohammad)Khan,阿洪德(拉尔·穆罕默德)·汗

Akjilga river(see also Ilijilga),阿克吉勒尕河(又见伊里吉尔加)

Aksaputra,阿克沙布陀罗

Alaf Khan(Sultan),阿拉夫·汗(苏丹)

Alai(Mountain range),阿赖(山脉)

Alam bridge,阿拉姆桥

Aletai,阿勒泰

Alps(mountain),阿尔卑斯山脉

Altar Rock(at Thalpan),阿尔塔尔岩石(在塔尔班)

Altit(fort),阿尔迪特(堡)

Al-Tabari,《泰伯里史》

Altekar,A. S. A. S. 阿尔特卡

Amacha,艾玛贾[汉文古籍作"阿摩支"]

Amacha dynasty of Shigar,希格尔的艾玛贾王朝

Aman Ali Shah(Thanadar),阿曼·阿里·沙(塔纳达尔[一种官职])

Amanul Mulk,阿曼·乌尔·穆尔克

Amarasimha(or Singh),阿摩罗僧诃(辛格)

Amar Nath Lala,阿玛尔·纳特·拉拉

Amar Singh,阿玛尔·辛格

Amatya or Amacha,艾玛蒂亚或艾玛贾

Amban,安班[对清朝官员的一种称呼]

Ambariq Mosque,艾姆巴利格清真寺

Amchair,艾姆吉尔

Amchari,艾姆贾里

American Major Ranson,兰森少校(美国)

American, Wilkinson,威尔金森(美国)

Amir,艾米尔(阿富汗)

Amir Abdur Rahman(Afghanistan)艾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阿富汗)

Amir Hamza(invader of Chitral),艾米尔哈姆扎(奇特拉尔的侵入者)

Amir Hayat of Hunza,罕萨的艾米尔赫亚特

Amir Hayat(Subedar),艾米尔·赫亚特苏贝达尔[一种军职]

Amir jahandar Shah,艾米尔·贾汉达尔·沙

Amin Zia,M, M. 阿敏·齐亚

Amirul Mulk(Mehtar of Chitral),阿米罗尔·穆尔克(奇特拉尔的"迈赫塔尔"[统治者名号])

夏上校)

Asli Khan, Havildar,阿斯里·汗哈维尔达尔

Asmar,阿斯玛尔

Asoka,阿育王

Assmann,A. U. H. A. U. H. 阿萨曼

Astof,阿斯托尔

Aswira,阿斯维拉

Ataliq Sangin Ali Ⅰ,阿塔里格·僧金·阿里一世

Atar Singh,阿塔尔·辛格

Atreyi Biswas,阿特莱伊·比斯瓦斯

Attock,阿托克

Aurangzeb,奥朗则布[莫卧儿皇帝]

Avesta,《阿维斯陀》

Avestic,阿维斯陀语

Ayash family of Hunza,罕萨的阿亚希家族

Ayesho,阿亚舒

Ayit Dewan(pass),阿叶特大坂(山口)

Azad Fauj,自由军,独立军

Azad Khan(Tehsildar),阿扎德·汗(区长)

Azad Khan,阿扎德·汗(参见伊兹德·汗)

Azam Khan. 阿扎姆·汗

Azam(Subedar of Ishkoman),阿扎姆(伊希戈曼的苏贝达尔)

Azar(Azur),阿扎尔(阿祖尔)

Azghar,阿兹迦尔

Aziz Khan,阿齐兹·汗

Azizuddin, Munshi,M,

M. 阿齐兹·乌丁蒙希[蒙希为一种负责文书及管理的职务]

Azmat Ali Captain,阿兹默德·阿里上尉

Azmat Shah,阿兹默德·沙

Azur Jamshed,阿祖尔·贾姆希德

Azur Khan(Raja of Nagir) ,阿祖尔·汗(纳格尔的罗阇)

B

Baba Ayub,巴巴·阿尤布

Babar Khan(of Nagir) ,纳格尔的巴布尔·汗

Babar Khan Subedar Major,少校苏贝达尔巴布尔·汗

Babar of Khaplu,哈伯罗的巴布尔

Babar(Mughal emneror) ,巴布尔(莫卧儿皇帝)

Babusar,巴布萨尔

Bacon, Lt. Col,培根中校

Bactria,巴克特里亚

Bactrians,巴克特里亚人

Badakhshan. 巴达克山[亦译巴达赫尚]

Badshah,巴德沙[①人名;②意为“王”]

Badshah Khan,巴德沙·汗

Bagartham,巴格尔特姆

Bagar Tham, Shiri(or Shri) ,希里·巴格尔·特姆

Bagcha,巴格贾

Bagram,巴格拉姆

Bagrot,巴格劳特

Bahae,巴哈埃

Bahadur Khan,巴哈杜尔·汗

Bahman Shah,巴赫曼·沙

Bahram Choh,巴哈拉姆·久

Bailey,H. W. H. W. 贝利

Bailey T. Grahame, T. 格雷厄姆·贝利

Bairam Khan Razakhel,巴伊拉姆·汗·拉扎海尔

Baisakhi,贝萨喀节

Bajaur,巴乔尔

Bakamak,巴卡玛格
Bakhshi Hari Singh,巴赫希·哈里·辛格
Bakhshi Mul Raj,巴赫希·穆尔·拉吉
Bakhshi Radha Krishan,巴赫希·拉他·克里山
Bakhshu,巴赫舒
Bakhtaria,巴克特里亚
Bakhtawar Shah,巴赫塔瓦尔·沙
Baladeva,巴拉提婆[亦译作"力天"]
Balagund,巴拉贡德
Bala Hisar,巴拉喜萨尔
Balamitra,巴拉密陀罗
Balaputra,巴拉布陀罗
Baldev Singh Pathania,Col. 巴拉代乌·辛格·巴塔尼亚上校
Baldev Singh,Capt,巴拉代乌·辛格上尉,
Balkh,巴里黑
Balla Shah,巴拉·沙(纳格尔的罗阇)
Balor,巴洛尔
Baltal,巴尔塔尔
Balti,巴尔蒂.
Balti-pa,巴尔蒂巴(巴尔蒂人)
Baltistan,巴尔蒂斯坦
Baltit(fort),巴尔迪特(堡)
Baltoro,巴尔托洛
Baluchistan,俾路支斯坦
Baluristan,钵露罗斯坦
Bamazai, Prithvinath Kaul,帕里特维纳特·戈尔·巴玛扎依
Bandipur,班迪布尔
Banerji, Dr. J. N. , J. N. 巴纳吉
Bankar,本格尔
Bannu,班努

Bawanji,巴旺吉
Bayarchi(Pass),巴亚尔吉(山口)
Baza-i-Gumbaz,巴扎埃古姆巴兹
Bazar Dara(River),巴扎尔达拉(河)
Baz Khan,巴兹·汗
Beal,S,塞缪尔·比尔
Beas(River),比亚斯(河)
Bebak,贝巴克
Bebak,《无畏》周刊
Beg Manthal,贝格·门特尔
Begug(or Beku),Wazir,瓦齐尔贝古格(贝古)[“瓦齐尔”意为大臣]
Belvalkar,S. K, S. K. 贝尔瓦尔卡尔
Benakot,贝纳戈特
Bengali,孟加拉语
Beni,贝尼
Beogdang,贝奥格丹
Berger,H. H. 伯杰
Bericho,贝里久人
Beveridge,H, H. 贝弗里奇
Bhadra Vishnu,帕德拉·毗湿奴
Bhadila,帕迪拉
Bhaldi,帕尔迪
Bhagadatta,帕噶达塔
Bhngtor,帕格杜尔
Bhagwandas,帕格万达斯
Bhngwan Singh,帕格万·辛格
Bhatt,帕特
Bhatt Ram Krishan Kaul,帕特·罗摩·克里山·戈尔
Bhatta Shah,帕塔沙/帕塔·沙
Bhattaraka Maharaja,帕塔拉卡大王[勇敢的大王]

Bhattavaryan,帕塔瓦尔央

Bhautta,博塔

Bimber,比姆贝尔

Bhoja,波贾

Bhuilakada(Kshatrapa),普依拉卡达(总督)

Bhuilakadala,普依拉卡达罗

Bhup Singh,普布・辛格

Bhup Singh Ki Pari,普布・辛格的山嘴

Bhutta,博塔

Bhutto Zulfiqar Ali,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

Biafo(glacier),比亚福冰川

Biama,比亚玛

Bibiji,比比琪

Biddulph,J,约翰・毕达尔夫

Bijai,比贾伊(上校)

Bijay Singh,Col,比贾伊・辛格上校

Biko,Jamadar,比戈贾玛达尔[贾玛达尔为一种低级军职]

Biliokot,比利奥戈特

Bira Khan,比拉・汗.

Biri,比里

Bitan,比丹

Bivar,A. D. H, A. D. H. 比瓦尔

Biyak,比亚克

Bodas,博达斯

Bokha Makpon,默格本布迦

Bokhara,布哈拉

Bokhara(Maulavi),毛尔维布哈拉[毛尔维为伊斯兰教教职]

Bolor,钵露罗

Bolor shah,钵露罗・沙/钵露罗沙

Bolurin Shah,钵露罗的沙

Butogah,布多加赫
Bonona Festival,布诺纳节
Bongard Levin, G. M, G. M. 邦加德·莱文
Bonar(das),布纳尔(达斯)
Bonar Village,布纳尔村
Borogil,博罗吉尔
Borogil(Pass),博罗吉尔(山口)
Boorish,博里希
Bostan Khan,博斯坦·汗
Bot Kulam Gunji,博特古拉姆贡吉
Bot Kulan Pass,博特古兰山口
Boto Vazir(son of Chaosingh),博多瓦齐尔(乔·辛格之子)
Boyo,博尤
Bozai-i-Gumbaz,布扎埃古姆巴兹
Brahmānda Purāna,《梵卵往世书》
Brahui,布拉灰(人)
Braldo Pass,巴拉尔杜山口
Braldu(river),巴拉尔杜/布拉尔杜(河)
Braldu valley,巴拉尔杜河谷
Britain,不列颠
British Raj,不列颠统治
British Indian Empire,英印帝国
British Offices in Gilgit Agency,英国驻吉尔吉特代表处
British Political Agency in Gilgit,英国驻吉尔吉特政治代表
Brushal,布鲁沙尔
Broad Peak,布洛阿特峰
Brokpa,布鲁克巴
Brook Singe,布鲁克·僧格
Brown Maj. William,威廉·布朗少校
Bruza(Brushal),勃律(布鲁沙尔)

Bu(o)nar,布纳尔
Burzahom,布尔扎霍姆
Burzil,布尔济尔

C

Cankuna(or Tsiang-Kiun),坎库纳(或“将军”)
Caspatyrus,卡斯帕杜罗斯
Caucasian,高加索人
Cha Tham,贾特姆
Chacnok pass,查克诺克山口
Chadra Yasa Sri Priya,查德拉·耶萨·斯里·普利亚
Chaghat Serai,杰迦特赛拉伊
Chaghatai,察合台
Chaghdor Namgyal(Raja of Dambas),强多南嘉(丹巴斯罗阇)
Chagtan,吉格登
Chaichar Parri,杰杰尔山嘴
Chak chan Mosque,吉格金清真寺
Chakman Serai,杰格曼赛拉埃
Chakarkot,杰格尔戈特
Chakor,杰戈尔
Chakravarti,N. P. N. P. 杰格拉瓦尔迪
Chak rulers,查克统治者
Chakshu,查克舒
Chak Thang/Chek Thang,查克塘
Challaj Bultum,贾拉杰布尔杜姆[地名]
Chalt,杰尔特
Chamarkand(pass),杰玛尔坎德(山口)
Chaman Ali,杰曼·阿里
Chamba,杰姆巴(昌巴)

Chilas Scouts,吉拉斯侦察队

Chilim,吉里姆

Chilis Khamba,吉里斯康巴

Chilis Khan(Raja)吉里斯·汗(罗阇)

Chiliss, 吉里斯语

Chimkent,奇姆肯特

Chinarbagh,吉纳尔巴格

Ch'in(dynasty),秦朝

Chingiz Anan,成吉思汗

Chionite, [古代波斯对匈奴(或嚈哒)的称呼]

Chirat, 吉拉特

Chitral,奇特拉尔

Chitral Scouts,奇特拉尔侦察队

Chogo Lungma(glacier),乔戈隆玛冰川

Chogri Peak(K-2),乔戈里峰

Chokhan Valikhanov,乔汉·瓦利哈诺夫

Chorban,丘尔班

Chorbat,丘尔巴特

Chuksha,丘格夏

Chulesha, 丘莱夏

Chumo Darkhan,久莫达尔汗

Col. Pasha-The Victor (see also under Aslam Brigadier), 巴夏上校——胜利者(参见"阿斯拉姆准将")

Collective tomb(Gumbad-i-Raisan),集体墓地(拉伊桑的拱北)

Colvin,E. J. D, E. J. D. 科尔文

Cootes,Col,库特斯上校

Cunningham, Alexander,亚历山大·坎宁安

Cunningham, J. D, J. D. 坎宁安

Curzon, Lord,柯曾勋爵

D

Dabla Khan, 德卜拉·汗
Dadicae, 达迪卡伊人
Dadi Juvari,达迪·久瓦里(王后)
Daeen,达伊恩
Dafdar, 达夫达尔
Dagar,达格尔
Dah,达赫
Dah Hanu,达赫—赫努
Dala,达拉
Dalla Shah,达拉·沙
Daloi,达劳依
Damasi,达姆西
Dambodas,达姆布达斯[地名]
Damot,达莫特
Dang,丹格
Dangpari,丹格巴利
Daniell, 丹尼尔少校
Danyor,丹尤尔
Darab Shah,达拉布·沙
Daradadesa,达拉德代萨[达尔德人之地]
Darada Shahi,达拉达·沙希
Daradu,达拉杜
Dard,达尔德
Darda-Lipi,达尔达手迹
Daraddesa, 达拉德代萨
Daradraya/Daradaraya,达拉达王子/国王
Darang(Das),达朗格(达斯);或 Dorong, 多隆格(河)

Daratpuri,达拉特布里
Dardic,达尔德(的)
Dardistan,达尔德斯坦
Darel,达丽罗
Darius,大流士
Darkot(Pass),达尔科特山口
Darkot Valley,达尔科特河谷
Darwaz(Darwaza),达尔瓦兹(达尔瓦扎)
Darya,河流
Dashkin,达什金
Dasi,达西
Dassu,达苏
Datong, 达东格
Datta Srirama,达塔 · 斯利拉玛
Daud Shah(alias Dut, Raja),达乌德 · 沙(又名"罗阇杜特")
Daula(Dolla), Shah,沙 · 道拉
Daulat Ali Khan,道拉特 · 阿里 · 汗
Daulat Khatun,道拉特可敦
Daulat Shah,道拉特 · 沙
Daulat Shamsher,道拉特 · 沙姆谢尔
Daur-i-Khan,道莱 · 汗
Dehqan, 佃农
Dehradun,台拉登
Delhi,德里
Deng Malik,丹格 · 马立克
Denison Ross,Sir E, E. 丹尼森 · 罗斯爵士
Deosai(Plateau),德沃萨依高原
Derdae(or Dardae), 代尔达埃(达尔达埃)
Deva,① 德瓦(吉拉斯地名);② 提婆(神)
Deva Sri Chandra,提婆 · 斯利 · 旃陀罗

Dras,德拉斯/德腊斯/达拉斯

Dras pass,德拉斯山口

Drasin,德拉辛

Dras river,德拉斯河

Drew,Frederic,弗雷德里克·德鲁

Drosh, 德罗希

Dubani,杜巴尼

Duber,杜贝尔

Dudhgahi,杜特格希

Dudhganga,杜特甘加

Dudhial,杜提亚尔

Dudukot,杜杜戈德

Dufferin, Lord,达弗林勋爵

Dugdhaghata,杜格塔迦塔堡

Dughlat, Mirza Muhammad Haidar,米尔扎·穆罕默德·海达尔·杜迦拉特

Dulcha(or Zulchu),杜尔贾(祖尔久)

Dumani,杜玛尼

Dunbawand(mountain),邓巴温德山

Duncan,D, D. 邓肯

Duncan,Jane,L, L. 简·邓肯

Duran(or Dauran),杜兰

Durand A. G. A. G. 杜兰

Durlabha Vardhana,杜尔拉帕·瓦尔塔纳

Durga Singh, Capt. 杜尔加·辛格上尉

Durrani, Col. Sayid,赛伊德·杜拉尼上校

Durr-e-Jamal,杜莱·贾玛尔

Duru, governor of Bunji,本吉总督杜罗

Dussehra,杜萨赫拉节

Dutta,N. N,N. N. 杜塔

E

F

Fakhrunnisa,弗赫罗·尼莎

Falaku(Vazir),弗拉古(瓦齐尔)

Faramurz Shah,弗拉穆尔兹·沙

Farman Ali,Naib,纳依布[副手]弗尔曼·阿里

Far East,远东

Fassat, 法萨特(山口)

Fateh Ali Khan(Yabgu of Khaplu),法塔赫·阿里·汗(哈伯罗的叶护)

Fateh Ali Khan(Raja of Khaplu),法塔赫·阿里·汗(哈伯罗罗阇)

Faqir Singh,Brigadier,法基尔·辛格准将

Fauq,福格

Ferghana,费尔干纳

Fikr,费克尔

Firdaus Khan(Raja),费尔道斯·汗(罗阇)

Fitidas, 菲蒂达斯

Forsythe,Douglas,道格拉斯·福赛思

Francke,A. H,A. H. 弗兰克

Frano,弗拉诺

Fraser,S. M,S. M. 弗雷泽

Frembgen,Jurgen, 于尔根·弗伦布根

Fremont, A, A. 弗里蒙特

Friedrich,A, A. 弗里德里克

Frontier Constabulary,边境警察部队

Frontier Crimes Regulation, 边境犯罪条例

Frye,Richard N,N. 理查德·弗赖伊

Fuchs,W, W. 富克斯

Fundar Lake,芬达尔湖

Fussman,Professor Gerard,杰勒德·富斯曼教授

G

Gajaraja,加贾拉贾

Gakuch(Gakuj),加古奇

Galla,加拉

Galmit,格尔米特

Galpur, 加尔布尔

Gambas Skardu,格姆巴斯斯卡杜

Gamot, 加莫特

Ganche,甘切

Gandhara,犍陀罗

Gandhari,犍泰里

Gandharians, 健达里欧伊人

Gandlo(nala),犍德罗(河)

Ganesh(or Ganish),格奈希(格尼希)

Ganello,格奈罗

Ganga Singh,甘加 · 辛格

Gangani,甘加尼

Ganges(valley),恒河(流域)

Garbidas,格尔比达斯

Gardez,格尔

Gardner,Percy,珀西 · 加德纳

Gas/Ges,格斯

Gas Bala,格斯巴拉(上格斯)

Gasherbrum(or Casherbrum),迦雪布鲁姆

Gas Pnyai,格斯巴因(下格斯)

Gate of Skardu in Khaplu,哈伯罗的斯卡杜之门

Gauhar(Gohar)Aman,戈赫尔 · 阿曼(亦被错拼为 Gaur Rahman)

Gauro(Gowro),戈罗/戈罗语

Gayal, 格亚尔

Gazi Khan,格齐·汗

Ghabandabal,迦班达巴尔

Ghallo,迦劳

Ghafur,M. A,M. A. 迦夫尔

Ghaghu, 迦库

Ghansara Singh,坎萨拉·辛格

Ghazri,迦兹里

Ghatachoh Singe,迦达久僧格

Ghazi Mir(Raja of skardu),迦齐·米尔(斯卡杜罗阇)

Ghazi Tham,迦齐·特姆

Ghazan Khan(Hunza ruler),迦曾·汗(罕萨统治者)

Ghazanfar Ali Raja,迦曾弗尔·阿里罗阇

Ghazi Mir,迦齐·米尔

Ghazi Tham,迦齐·特姆

Ghazri,迦兹里

Ghotachoh Singe,戈达久·僧格

Ghotamat(Nala Girgira),戈达默德(吉尔吉拉河)

Ghotamat Choh,戈达默德久

Ghizar(or Ghizr),吉泽尔

Ghizi Tham,吉齐特姆

Ghoshal,U. N,科夏尔

Ghoshamitra, 瞿沙密陀罗

Ghulam Mohi-ud-Din,Shaikh,谢赫古拉姆·穆希乌丁

Ghulam Mohiyuddin,[原文如此]古拉姆·穆希乌丁

Ghulam Muhammad(Beg),古拉姆·穆罕默德(贝格)

Ghulam Murtaza, Subedar,古拉姆·穆尔塔扎苏贝达尔

Ghulam Shah,古拉姆·沙

Ghulam Ali, Vazir(son of Kharoi),古拉姆·阿里瓦齐尔(赫罗依之子)

Ghumari,古玛里

Ghulam Haidar Khan(Lt. Col.),古拉姆·海德尔·汗(中校、上校)

Gichi(nala),吉奇(河);Gichi(Rock),吉奇(岩石)

Gidagitti,吉达吉迪

Gikisila,吉基希拉

Gilgit,吉尔吉特,

Gilgit Brigade,吉尔吉特旅

Gilgit Agency,吉尔吉特特区

Gilgit Dialect of Shina,希纳语的吉尔吉特方言

Gilgit fort,吉尔吉特堡

Gilgit Transport Road,吉尔吉特大道[简称为 G. T 路]

Gilgit Scouts,吉尔吉特侦察队

Gilgitta,吉尔吉达

Gilgit Wazarat,吉尔吉特瓦扎拉特["瓦扎拉特"为行政区划的一种称呼]

Gilit(or Gilgit),吉里特(吉尔吉特)

Gillan, Major G. V. B, G. V. B. 吉兰少校

Gini(nala),吉尼(河)

Girgira,吉尔吉拉河

Girkh,基尔赫

Girkis,吉尔基斯

Giri Kot,吉里戈德

Glit Kalika,格里特·卡里卡

Glito of Nomal,诺玛尔的格里多

Godyh,[应即古达依(Gudai)]

Gogdara,戈格达拉

Gohar Aman,戈赫尔·阿曼

Gohar Khatun,戈赫尔可敦

Gojak,戈贾克

Gojak Bai,戈贾克巴依

Gokher,戈海尔

Gokuhar,戈古哈尔

Gol,戈尔

Golapur(or Gulpur),戈拉布尔(戈尔布尔)

Gollas(Hun King),果拉斯(匈奴国王)

Gonar(nala),戈纳尔(河)

Gondophares,冈多法勒斯

Gopadasa, 瞿波达萨

Gopala Swami Ayyangar,N,N. 戈巴拉·斯瓦米·阿扬格尔

Gor(or Gauharabad),戈尔(戈赫尔阿巴德)

Gorband Valley,戈尔班德河谷

Goritham of Khaplu,哈伯罗的戈里特姆

Goritham(Raja)戈里特姆(罗阇)

Goritham of Shigar,希格尔的戈里特姆

Gorkot,戈尔戈德

Gosaun,戈萨翁

Gowro,戈罗(方言)

Grant,A. H, A. H. 格兰特

Grierson,G,格里尔森

Gryunberg,A. L, A. L. 格林贝格

Grotzbach,Erwin,欧文·格罗茨巴赫

Grunjar, 格隆贾尔[亦作 Gurunjar,译作“古隆贾尔”]

Guch Pari,古奇山嘴

Gudai,古达伊

Gudar,古达尔

Gudus,古杜斯

Gujar,古贾尔

Gujar Shakur Ali,古贾尔·沙古尔·阿里

Gujari,古杰里语

Gujhal(or Goojhal),古恰尔

H

Haba river,哈巴河
Habib Chak,哈比布·查克
Habib Khan,哈比布·汗
Habib Khan(of Gilgit),(吉尔吉特的)哈比布·汗
Haidar Khan,海达尔·汗
Haidar Khan(or Ali Haidar Khan),海达尔·汗(阿里·海达尔·汗)
Ha1dar Khan(ruler of Hunza),(罕萨统治者)海达尔·汗
Haidar Khan of Shigar,希格尔的海达尔·汗
Haji Karim Dad Khan,哈吉格里姆·达特·汗
Haji Moharnmad Ali of Kuwardo,戈瓦尔杜的哈吉穆罕默德·阿里
Haldi,哈尔迪
Hallo,Vazir,哈罗瓦齐尔
Hamlet,哈姆莱特
Han(emperors),汉朝(皇帝)
Hanoda Chinathang,哈诺达吉纳滕格
Hanosara(or Hanesara), 哈诺萨拉(哈奈萨拉)
Han-pan-to,汉盘陀
Hansora,汗索拉
Hanzel(Buddhist stupa),罕泽尔(佛教窣堵波)
Haramosh,赫拉毛希
Harappan, 哈拉班(人)
Haraspu,哈拉斯布
Harban,哈尔班
Harcha Mamu Singh,哈尔贾·玛莫·辛格
Harcho,哈尔久
Hardas Village,赫尔达斯村
Hardmeier,Chr, Chr. 哈德迈尔

Hayatallah(Heyatel), 哈亚德拉(黑亚代尔)

Hazara,哈扎拉

Hazrat Sayyid Mohammad Nur Bakhsh,赛义德·穆罕默德·努尔巴赫希[此处 Hazrat 为一种尊称,音译为"哈兹拉特"]

Hazrat Shah Sultan Arif Shah,沙·苏丹·阿里夫·沙

Heiathel,[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献对匈奴(嚈哒)的称呼]

Henderson,Dr,亨德森

Hendersen,P. D, P. D. 亨德森

Heine Geldern,海因·盖尔德恩

Henvey,F, F. 亨维伊

Herat,赫拉特

Herati(equivalent with Hariti), 黑拉帝(诃里帝)

Herodotus,希罗多德

Hidayatullah Beg,希达叶都拉·贝格

Himachal Pradesh,喜马偕尔邦

Himalaya,喜马拉雅

Hindi,① 印地[地名];② 印地语

Hindko,印德科语

Hindukush,兴都库什

Hindu Raj, 兴都拉杰(山脉)

Hindu Shahi,印度教沙希(王朝)

Hindustan,印度斯坦

Hini(or Hindi),希尼(印地)

Hinuber, Professor O. N,O. N. 希努贝尔教授

Hisham(Hisam)Quli Khan,希夏姆·古力·汗

Hiuen Tsang(Hsuan-tsung),玄奘

Hoder, 霍代尔

Hodur(village),霍杜尔(村)

Hoffman,霍夫曼

Hon, [亚美尼亚对匈奴(嚈哒)的称呼]

Ibrahim, Shah, 沙·伊卜拉欣
Ilijilga,伊里吉尔加
Iliksue,伊里克苏
Imam Quli,伊玛目·古力
Imam Quli Khan,伊玛目·古力·汗
Imamuddin,Sheikh,谢赫·伊玛目·乌丁
Imit,伊米特
Imperial Service Troop, 帝国服务军
India, 印度
Indian Federation,印度联邦
Indira Koli Pass,因地拉科里山口
Indo-pak Subcontinent,印巴次大陆
Indo-Scythia,印度—西徐亚人
Indra Bhattaraka,因陀罗·帕塔拉卡
Indus,印度河
Indus Kohistan,印度河科希斯坦
Inqilabi Council,革命委员会
Iran(Persia),伊朗(波斯)
Iranian,伊朗的
Irshad Pass,伊尔沙德山口
Isa Bahadur of Punial,布尼亚尔的伊萨·巴哈杜尔
Isfahan,伊斯法罕
Ishkoman,伊希戈曼
Islam,伊斯兰教
Islamabad,伊斯兰堡
Ismaili(faith),伊斯玛仪(信仰)
Ismail Khan,Jamadar, Mohammad,穆罕默德·伊斯玛仪·汗贾玛达尔[贾玛达尔为一种职位]
Ismail, Major,伊斯玛仪少校
Ismail, Naib Subedar,副苏贝达尔伊斯玛仪

Isnaftanosh,伊斯纳夫塔诺希

Istak,斯塔格

Istak Singe,斯塔格僧格

Isvaravarma(Dhorika),伊湿伐罗瓦尔玛·托里卡

Itakturuk, 伊塔格杜罗格

Izzat Khan(alias Azad Khan),伊扎德·汗(又称阿扎德·汗)

J

Jafar Hhan, Raja,贾法尔·汗罗阇

Jabbar Khan(Raja of Astor),贾巴尔·汗(阿斯托尔罗阇)

Jaffar Zahid Khan(ruler of Nagir), 贾法尔·扎希德·汗(纳格尔统治者)

Jagaddala,贾格达拉

Jagir,封地/领地

Jagirdar,领主

Jaglot,贾格劳特

Jahangir,贾汉吉尔

Jajmani,贾杰玛尼

Jalalabad,贾拉拉巴德

Jaldar,贾尔达尔[亚吉斯坦的统治者的称号]

Jalipur,贾里布尔

Jalkot,贾尔戈德

Jamal Khan, Mir,米尔贾玛尔·汗[米尔为王号]

Jamat-i-Islami,伊斯兰促进会

Jamat Khana,贾玛特哈纳[一种聚会的场所]

Jammu,查谟

Jammu and Kashmir state,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

Jamshed, Sbbedar of Hunza,罕萨的苏贝达尔贾姆希德

Jamshed(sultan of Kashmir),贾姆希德(克什米尔苏丹)

Jamshed(Maglot Prince),贾姆希德("玛格罗特"王子[玛格罗特系一绰号])

Jamyany Namgil(Namgyal),江央南嘉

Jan Alam, Subedar,苏贝达尔江·阿拉姆

Jandul,金杜尔

Janglo, 京格洛

Jao Shah Abdur Rahman Khan, Mehtar,迈赫塔尔贾奥·沙·阿卜杜尔·拉赫曼·汗[迈赫塔尔系王号]

Japanese(sea),日本(海)

Jarral,贾拉尔

Jarral, Major Mohammad Khan,穆罕默德·汗·贾拉尔少校

Jashtir,贾希迪尔(首领)

Jataidoto,贾塔依杜多

Jauhar Ali,乔赫尔·阿里

Jawar(or Jawahir) Khatun,贾瓦尔(贾瓦希尔)可敦

Jawahir Singh,贾瓦希尔·辛格

Jayachand,贾亚金德

Jayamangaa Vikramaditya Nandi,阇耶曼加·维克拉玛迪蒂亚·南迪

Jayasimha,阇耶辛哈

Jettmar, Professor Karl,卡尔·耶特马尔教授

Jhelam,river,杰卢姆河

Jhukar,丘卡尔

Jigu Maksu,① 吉古·玛克苏[人名];②吉古玛克苏[地区名]

Ji Khan Raja,吉·汗罗阇

Jikhodarkha,吉霍达尔哈

Jilani,Lt,Col,M. G. M. G. 吉拉尼中校

Jinnah, Quaid-i-Azam M. A. 伟大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Jinaspala,吉纳斯巴拉

Jingrut,京格罗特

Jivarma(raja),吉瓦尔玛(罗阇)

K

Kalhana,卡兰纳
Kamal Khan(Raja of Nagir),格玛尔·汗(纳格尔罗阇)
Kamantu Satghu,格曼杜萨特古
Kamar village,格玛尔村
Kamboja,甘蒲阇
Kamin(Krammin),格敏(格拉敏)
Kamri Pass,卡姆里山口
Kanapa,格纳巴
Kanauj,卡垴季/曲女城
Kandia Valley,甘迪亚河谷
Kangalwan,甘加尔万
Kangra,甘格拉/坎哥罗
Kanishka,迦腻色伽
Kanishka Era,迦腻色伽纪元
Kanjudi,甘久迪(部落)
Kanjut,坎巨提
Kanori,卡垴里
Kao Hsien-Chih,高仙芝
Kapisa,迦毕试
Kapur,M. L,M. L. 格布尔
Karachi,卡拉奇
Karakorum,喀喇昆仑
Karak Singh,卡拉克·辛格
Karam Singh,格拉姆·辛格
Kara Shahr,卡拉希赫尔
Kardar,卡尔达尔[职位名]
Kardari,卡尔达里(分区)
Kargah Valley,卡尔加河谷
Kargil,格尔吉尔
Kargil Garri,格尔吉尔格里

Keliman Su，克里满河

Kesar(or Kiser，or Giser)epic,《格萨尔》史诗

Khachat. 卡贾特

Kha-cho,卡久(统治者的王族兄弟)

Khadga Viryasena,克德加·维尔亚色那

Khairullah,海罗拉

Khaiu(Kshatrapa)，凯尤(总督)

Khalatse(or Khalsi),卡拉策(克尔西)/卡拉泽

Khalichi(Ice also Malichi)，哈利吉(马利吉)

Khalil Aman,哈里尔·阿曼

Khan Bahadur,汗·巴哈杜尔

Khanberi,汗贝里

Khandavarma(Vatuka)，汗达伐尔玛·伐杜卡

Khandud,汗杜德

Khan Dotal,汗·道达尔

Khandurd,汗杜多

Khaplu,哈伯罗

Kharbu,哈尔布

Kharchanai,卡前乃(达坂)

Khari Dong,哈里东

Kharmang,克尔门

Kharoi,哈罗伊

Kharol,卡罗尔

Kharpocha,克尔福久

Khomar,科玛尔(村)

Karpon(i. e. Commander),克本(即指挥官)

Khasa(tribe),佉沙(部落)

Khasarajagana，佉沙罗阇格纳[对佉沙罗阇国家的称呼]

Khaqan Mirza(Mirza Ⅲ),可汗米尔扎(米尔扎三世)

Khawar,哈瓦尔

Kherai，海拉伊

Khingala（or Khinkhila），金加拉（金基拉）

Khinnar（nala），凯纳尔河

Khinnargh，凯纳尔加赫

Khirghis/Khirgiz/Khirgis/ Khirgizia/Kirgiz/Kirghz，吉尔吉斯/黠戛斯

Khiva，希瓦

Kho，科（河谷）/科（人）

Khojand，忽毡

Khokhar Singe（Khokhor Singe），考克尔僧格

Khorilamitra（Kshatrapa），霍里拉密陀罗（总督），

Khosilamitra，霍西拉密陀罗（总督）

Khotanese，于阗语/于阗的

Khoten（or Khotan），于阗

Khudamo（female deity），胡达莫（女神）

Khudu，霍杜

Khunjerab（Pass），红其拉甫山口

Khurram Khan，胡拉姆·汗

Khushhal，胡什哈尔

Khushvak（q）t（Raja），胡什瓦格特（罗阇）

Khushwant Sing，胡什万特

Khushwaqt family，胡什瓦格特家族

Khusro Khan（Raja），胡斯劳·汗（罗阇）

Khwaja Arab，霍加·阿拉伯

Khwarism，花拉子模

Kilik Dawan，基里克大坂

Killi，基里

Kinnaras，基纳拉斯

Kinudas，基努达斯

Kipin，罽宾

Kiris（or Keris），基里斯

Kirpal Singh, Col,基尔巴尔·辛格上校
Kirpa Ram, Diwan,基尔巴·罗摩迪万[迪万为官职名]
Kishanganga,吉申甘加
Kishtwar,基希德瓦尔
Kisra,基斯拉(王朝)
Kiyani,基扬(王朝)
Kilik-Mintaka,基里克—明铁盖
Kilik(pass),基里克山口
Klimov,G. A. G. A. 克里莫夫
Knigt, E. F. 奈特
Koh-Ghizr,戈赫—吉泽尔
Kohistan(Pathan Kohistan),科希斯坦(帕坦科希斯坦)
Kohistani,科希斯坦语
Kolu or Koli,库卢(库里)
Komra,古姆拉
Konga Namgyal,贡加南嘉
Konow,St,St. 戈诺
Koragbal,戈拉格巴尔
Koreshan,戈莱尚
Koru,戈罗
Kos,戈斯[一种设防的城镇]
Kosmos Indi Kopleustes,科斯马斯·因迪科普柳斯特斯
Kota Rani,戈塔·拉尼["拉尼"有"王后"、"女王"之义]
Koul,Omkaar,N. 奥姆卡尔·N·戈尔
K'ri-lde gtsug-brtsan,赤德松赞
Krishan Lal,Captain,克里山·拉尔上尉
Krishann Singh,Capt,克里山·辛格上尉
Kristiansen,K,K. 克里斯滕森
K'rt(or Shatial),格尔特(夏迪亚尔)
Kshatrapa,总督

Kshemasena,克谢玛色那

Kubera,古贝拉

Kucha,库车

Kuchdel,古奇代尔

Kuh,古赫

Kuhu or Kubhu,古胡(古普)

Kuktash,古克塔什

Kuku Nor,库库淖尔

Kulajaya,古拉贾亚

Kularjak(mountain),古拉尔杰克山

Kulu,库卢

Kunala,库纳拉/拘那罗

Kunar Valley,库纳尔河谷

Kundus,昆都士

Kunodas,古诺达斯

Kun Lun(mountain),昆仑山

Kura Stone Inscription,古拉岩刻

Kurram Valley, 古勒姆/库拉姆河谷

Ku-sa-tanna,瞿沙旦那

Kush,古希

Kushana,贵霜

Kushan shah,贵霜王

Khshanshar,贵霜王国

Kuwardo,古瓦尔杜

Kya Niat,格亚尼亚特(村)

L

Ladakh,拉达克

Ladakhi(or Ludakhi),拉达克人

Lae-lih,敕懃
Lahnda,拉亨达
Lahor,拉合尔
Laiyya,莱亚
Lakhpat, Wazir,瓦齐尔拉克伯特
Lala Beli Ram,拉拉・贝利・罗摩
Lala Dhanpat Rai,拉拉・坦巴特・罗易
Lala Din Pat,拉拉・丁・巴特
Lala Hansa Raja,拉拉・汉萨罗阇
Lala Jawahar Singh,拉拉・贾瓦赫尔・辛格
Lala Khan Izzeti,拉拉・汗・伊柴迪
Lala Ram Krishan,拉拉・罗摩・克里山
Lalitaditya Muktapida,拉利达迪蒂亚・穆克塔皮陀
Lalitavistara,《拉里塔维斯塔拉》
Lali Tham,拉利・特姆
Lalliya Shahi,拉利亚・沙希
Lal Tekri,拉尔代格里
Lamayuru,喇嘛尤罗
Lambari Danda Rakshite Khadri,拉姆巴里・丹达・拉克希达・卡德里
Lamkoi,拉姆戈依
Lansdowne, Lord,兰斯多恩勋爵
Lang,L. E, L. E. 兰
Lathana,勒塔纳
Laufer,劳弗
Lauhawar,劳哈瓦尔
Lavika, Mahata,玛哈塔・拉维卡[西徐亚统治者]
Lechur nullah,莱久尔河
Leh,列城
Leitner,Dr. G. W,G. W. 莱特纳

M

Madashvara,玛达施瓦罗

Madhopur,马托普尔

Madhumati,马图玛蒂(河)

Madhusena,马图色那

Madhyantika,中际/末田地

Maglot(ruler of Nagir),玛格罗特(纳格尔统治者)

Mahagajapati,玛哈加贾帕蒂(大象王)

Mahajan,Mr,S. Kumar, S. 古玛尔·玛哈金

Mahamayuri,玛哈玛尤里

Maharajna,摩诃罗阇纳[一种称号]

Mahatta Mangali Kishtawariya,玛哈塔·曼加里·基希德瓦里亚

Mahavastu,《大事记》/《大事》

Mahdiabad,玛赫迪阿巴德

Mahdi Ali Khan(ruler of Khaplu),玛赫迪·阿里·汗(哈伯罗统治者)

Mah-i-Taq,玛黑塔格

Mahmud bin Shah Nasir,马茂德·本·沙·纳西尔

Mahmud Shah,马茂德·沙

Mahta Lavika,玛哈塔·拉维卡

Maiyan,玛依央语

Majeed Li. Col. A,A. 马吉德中校

Majid Khan,马吉德·汗

Majumdar,R. C,R. C. 马章达尔

Makarapura,马格罗布拉

Makarasimha,马格罗僧诃

Makharjuna,马赫尔久纳

Makhinuna,马基努纳

Makpon/Maqpon,默格本

Maksu,玛克苏(行政单位的名称)

Makuran,马库兰

Maqbul Ahmad，马克布尔·艾哈默德
Marathi，马拉地语
Marcha，玛尔贾
Marol，马罗尔
Marshakala，马尔夏卡拉山
Marshall，Sir John，约翰·马歇尔爵士
Marjan，马尔江
Martand，《马尔丹德》报
Marut，玛罗特人（淘金者）
Marvin，Charles，查尔斯·马文
Marshebrum，玛雪布鲁姆
Mashido，玛希杜
Mashkin，马希金
Master Daulat Shah，马斯特·道拉特·沙
Master Taiqun，马斯特·塔依贡
Mastuj，马斯图季
Mathra Das，玛特拉·达斯
Mataul Mulk，马道尔·穆尔克
Matheison Captain，马西森上尉
Mathura，马土腊/孔雀城/秣菟罗
Matsya Purāna，《鱼往世书》
Maues（or Moga），毛伊斯（莫加）
Maulai，毛拉伊［对吉尔吉特伊斯玛仪派信徒之称呼］
Maulvi Mannan，毛尔维马南［“毛尔维”系伊斯兰教之宗教职务］
Maurya，孔雀王朝
Mayaro，马亚洛［对北山羊和捻角山羊的总称］
Maymurgh，梅莫尔格
Mayun，马永
Mayura，玛尤罗
Mayuritham，玛尤里特姆

Mazar,麻扎
Mazar-i-Sharif,圣墓/圣陵
Mc Crindle,麦克林德尔
Mc Govern, W. M,W. M. 麦高文
Megalith,巨石
Megasthenes,麦伽赛因斯
Mehtar,迈赫塔尔[奇特拉尔统治者的称号]
Melu Kushal,梅鲁库沙尔(村)
Menander,米南德王
Mendi,曼迪
Merekhisu,迈瑞克素
Meru,迈罗
Mian Mudassar Shah Kakakhel,米安·穆达萨尔·沙·卡卡海尔
Mian Said Qamar,米安·赛伊德·格玛尔
Mihan Singh,米汗·辛格
Mihtar Sakhi,米赫德尔·萨希
Mihtar Shah Nawaz,米赫德尔·沙·纳瓦兹
Mihtar Saulaiman Shah,米赫德尔·苏莱曼·沙
Mihtar Yari,米赫德尔·亚里
Mi-mi,迷密
Minapen,米纳班
Minargah,米纳尔加赫
Minimarg,米尼马尔格
Minor,米诺尔
Minorsky,V,V. 米诺尔斯基
Mintaka(Pass),明铁盖山口
Mir Ali Mardan Shah,米尔·阿里·马尔丹·沙
Mir Beg Khan,米尔·贝格·汗
Mir Fateh Ali Shah,米尔·法塔赫·阿里·沙
Mir Gazan Khan,米尔·迦曾·汗

Mir Mukhtar,米尔·穆赫塔尔
Mir Najmuddin Thaqib,米尔·纳吉姆丁·塔基卜
Mirpur,米尔布尔
Mir Shah of Badakhshan,巴达克山的米尔·沙
Mir Shamsuddin Iraqi,米尔·希姆斯·乌丁·伊拉基
Mir Wali,米尔·瓦利
Mir Yahya,米尔·叶海亚
Misgar,米斯加尔
Miskal,米斯卡尔[一种金币]
Mirza Beg,米尔扎·贝格
Mirza Faqirullah, Col,米尔扎·法基尔·乌拉上校
Mirza Ghulam Murtaza,米尔扎·古拉姆·穆尔塔扎
Mirza Haidar Dughlat,米尔扎·海德尔·杜迦拉特
Mirza Kamran,米尔扎·卡姆兰
Mirza Khan,米尔扎·汗
Mirza Taj Mohammad Khan,米尔扎·塔杰·穆罕默德·汗
Mitharjuna,米塔尔久纳
Mithra,密陀罗教
Mleccha,蜜利车
Moberly,Lieutenant,莫伯利中尉
Moghlai Tower,莫卧儿塔
Mohalla Kishrot,基希劳特区
Mohammad Ali,穆罕默德·阿里
Mohammad Afzal Khan,Major,穆罕默德·阿夫扎尔·汗少校
Mohammad Akbar Khan,穆罕默德·阿克巴·汗
Mohammad Ali of Afghanistan,阿富汗的穆罕默德·阿里
Mohammad Ali Barbari,穆罕默德·阿里·巴尔巴里
Mohammad Ali Shah, Havildar,穆罕默德·阿里·沙 哈维尔达尔
Moharnmad A1i,Subedar,穆罕默德·阿里苏贝达尔
Moharnmad Ali Zawar,穆罕默德·阿里·扎瓦尔

Momin Shah,毛明·沙

Monepa Ali(Kharpon),穆奈巴·阿里(克本)

Mongol,蒙古(人)

Mongolia,蒙古

Mongols,蒙古人

Morgenstierne,G. G. 摩根施迪恩

Morin,Y. Ch,Y. Ch. 莫林

Moorcroft, William,威廉·穆尔克罗夫特

Moon,Penderel,彭德雷尔·穆恩

Mountbatten,Lord,蒙巴顿勋爵

Muhammad Akbar Khan,穆罕默德·阿克巴·汗

Mughal,莫卧儿

Mughli,莫卧里[对吉尔吉特伊斯玛仪派信徒的称呼]

Mughal Beg(Chief of Sharot),莫卧儿·贝格(沙罗特的首领)

Muhammad Murad Khan,穆罕默德·穆拉德·汗

Muhammad Saleh Kanboh,穆罕默德·萨利赫·甘布赫

Muhammad Razak Khan,穆罕默德·拉扎克·汗

Muhammad Quli,穆罕默德·古力

Mujahideen,圣战者

Mukherjee,B. N, B. N. 穆克吉

Muko-kot(or Nagar Khah),莫戈戈特(或纳格尔汗)

Muller,Stellrecht,Dr. I,I. 穆勒·斯特里奇

Mulla Beg,毛拉·贝格

Mullah Beg, Vazir,毛拉·贝格瓦齐尔

Mulla Talib Isfahani,毛拉·塔利卜·伊斯法哈尼

Munji,蒙吉语

Munshi,蒙希[一种负责管理文书、账目等事的职务,有如秘书、管家,有时与名字联用]

Munshi Fida Ali,菲达·阿里蒙希

Munshi Mohammad Azizuddin,蒙希·穆罕默德·阿齐兹乌丁

Murtaza Khah,穆尔塔扎·汗
Musallama Khatun,穆萨拉玛·可敦
Musing,穆辛
Musku,摩斯古
Mussammi Begu,穆萨米·贝古
Musaammi Daulat,穆萨米·道拉特
Musaammi Kharali Jashtero,穆萨米·哈拉里·贾希代罗
Musaammi Shudri,穆萨米·舒德里
Mussammi Somiya,穆萨米·索米亚
Musaammi Somiya Ghulam,穆萨米·索米亚·古拉姆
Musaammi Utman,穆萨米·乌特曼
Musaammi Vazir Beg,穆萨米·瓦齐尔·贝格
Muslim League,穆斯林联盟
Mu-to-pi,木多笔
Mutsjilga,木子吉里阿(大坂)
Muztagh,穆斯塔格河

N

Naib,副手/代理人
Naib-saltanat,王国代理人
Naik,纳依克[一种低级军职]
Nadir Ali Khan,Lt,纳迪尔·阿里·汗中尉
Nagar(or Nagir or Nager State),纳格尔(土邦)
Nagral,纳格拉尔
Najam Khan,Raja of Punial,布尼亚尔罗阇纳杰姆·汗
Nala Girgira,吉尔吉拉河
Naltar(or Niludar),纳尔达尔(尼罗达尔)
Nandi Vikramaditya Nandi,南迪·维克拉玛迪蒂亚·南迪
Nane,纳奈

Nanevandak，纳奈温达克

Nanga Parbat，南迦帕尔巴特

Nanjing，南京

Naoshera，瑙谢拉/瑙沙腊

Naradevasena，纳罗提婆色那

Narain，A. K，A. K. 纳拉因

Narbu-chung，纳尔布琼

Narendraditya Khinkhila，纳伦德拉迪蒂亚·金基拉

Narisaf，纳里萨夫

Naseebullah，Naik，纳塞布拉，职务为纳依克

Nasib Begam，纳西卜·贝古姆

Nasir-i-Khusrau，纳西莱·胡斯劳

Nathuvu，纳图武

Natthe Shah（or Natthu Shah），纳泰·沙（纳图·沙）

Naupura，瑙布拉

Nausherwan，瑙谢尔旺

Nava Surendraditya Nandi，纳瓦·苏兰德拉迪蒂亚·南迪

Nayum，纳尤姆

Nayyar，Dr，Adam，阿达姆·纳叶尔

Nazbarnala，纳兹巴尔河

Nazim Khan，Mir Mohammad（Mir Nazim Khan），米尔·穆罕默德·纳齐姆·汗（米尔·纳齐姆·汗）

Nazir Ahmad Khan，纳齐尔·艾哈默德·汗

Nehru Jawahar Lal，贾瓦哈尔·拉尔·尼赫鲁

Neiu（sa），奈尤（萨）

Neve，Arthur，阿瑟·尼夫

Nevil，Capt. H. L，H. L. 内维尔上尉

Niabat，尼亚巴特

Niat，尼阿特

Nilakantha Sastri，尼拉甘塔·萨斯特里

Nilt,尼尔特

Niludar,尼罗达尔(山脉)

Nimu,尼莫

Ninya Vishnu Varma,尼尼亚·毗湿奴·伐尔玛

Niyali,尼亚里

Nizam,尼扎姆[海德拉巴统治者的称号]

Nizamul Mulk,尼扎莫尔·穆尔克

Nobra(district),努布拉

Noghorumri,诺科罗姆里

Nomal,诺默尔

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西北边境省

Nunkun,嫩贡山

Nur Ali Khan,Raja,努尔·阿里·汗罗阇

Nurbakhsh, Hazrat Syed Mohammad,赛义德·穆罕默德·努尔巴赫希

Nurbakhshi. 努尔巴赫希教派的信徒

Nurbakhshi(order)努尔巴赫希(信仰)

Nur Bakht(Khatun),努尔·巴赫特(可敦)

Nur Bibi,努尔·比比

Nuristan,努里斯坦

Nuristani,努里斯坦人

Nur Khan,努尔·汗

Nurla,努尔拉

Nur Mohammad,努尔·穆罕默德

Nuusakha,努萨卡

O

Oitughrak,奥伊图格拉克

Okunoid art,奥库诺依德艺术

Okunev,奥库涅夫(文化)
Olding,奥尔丁
Onivastara,奥尼伐斯陀罗
Ophrang(or Operang),吾甫浪
Oprang Jilga,吾甫浪吉勒尕河
Oshkardas,奥希卡尔达斯
Oskhandas,奥斯汗达斯
Ossuary,[埋藏遗骨的洞穴]
Ou-K'ong,悟空
Oxus(river),乌浒河

P

Pactyica,帕克杜耶斯
Padam(Padum),巴达姆
Padmasambhava,莲花生
Pahalwan,帕赫尔旺
Pahalwan Bahadur,帕赫尔旺·巴哈杜尔
Pahloi,巴赫劳依
Pakistan,巴基斯坦
Pakistan Peoples Party,巴基斯坦人民党
Pakhli,巴克里
Pakhtordini,巴克托尔迪尼
Pakhtun Wali Khan,巴赫东·瓦利·汗[巴赫东=普什图]
Pakhtun Wali Raja,巴赫东·瓦利·罗阇
Pakuridas,巴古里达斯
Palala,巴拉腊
Palasi,帕拉西语
Palolajai,巴洛拉贾伊
Palolajo,巴洛拉乔

Pashkibur,巴希基布尔

Passu,巴苏

Pathan Kohistan,帕坦科希斯坦

Patika,巴迪卡

Patol,巴多尔

Patoladeva Shahi Vajradiyanandi,巴托拉提婆·沙希·伐杰拉迪蒂亚南迪

Patola Shahi,巴托拉沙希

Patola Shahi Shahanushai Sri Nava Surendraditya Nandi Deva,巴托拉·沙希·沙哈努沙伊·斯利·纳瓦·苏兰德拉迪蒂亚·南迪·提婆

Pattan,巴坦

Paxalina, T. N, T. N巴克萨里纳

Payik Peak,帕依克峰

Pe(a)ri,仙女

Pelliot,佩里奥特

Persia,波斯

Percy Gardner,珀西·加德纳

Peshawar(Valley),白沙瓦(谷地)

Peutiuger,伯廷哲

Phabura,帕布拉

Pha-cho,帕久[大臣]

Pharaona,帕拉奥纳

Phuguch(or Phugotsh),普戈奇

Pindras,平德拉斯

Ping-Yang,平阳

Pir Karam Ali Shah,皮尔·格拉姆·阿里·沙

Pirsar,珀萨尔

Pishin,皮欣

Plinius(or Pliny),普林尼

Poh-ho,钵和

Q

Qila-Firdausia,费尔道西亚堡

Qila-i-Panja,班加堡

Qublai-Khan,忽必烈·汗

Quddus Beg, Wazir of Sut,苏特的瓦齐尔古杜斯·贝格

Qudratullah, Beg,贝格·古特拉都拉

Qulij Khan,古利吉·汗

Quli Khan, of Shigar,希格尔的古力·汗

Qureshi, Major,库莱希少校

Quwwat Khan,古瓦特·汗

R

Rachi,拉奇[一种超自然力]

Rabindragarh,拉宾德拉格尔

Rahim Gul,拉希姆·古尔

Rahim Dad Khan, Jamadar,拉希姆·达特·汗贾玛达尔

Rahim Khan, Raja of Takcha,德格贾罗阇拉希姆·汗

Rahim Khan, Yabgu,叶护拉希姆·汗

Rahim Lone,拉希姆·朗

Rahim Shah(Raja of Nagir),纳格尔罗阇拉希姆·沙

Rahman Gul,拉赫曼古尔

Rahmatullah, Brigadier,拉赫玛都拉准将

Rahmatullah Khan,拉赫玛都拉·汗

Rahmat Vazir,拉赫玛特瓦齐尔[此 Vazir 系职位]

Rai Bahadur Pandit Radha Krishan Kaul,罗易·巴哈杜尔·潘迪特·拉塔·克里山·考尔

Raikot,拉伊戈德

Raisan,拉伊桑

Raja Bala Shah,罗阇巴拉·沙

Raja Bano,罗阇巴诺

Ranjit Singh,兰吉特·辛格
Rashid,Sultan,苏丹拉希德
Rashkam,热斯喀木
Rashkam, valley,热斯喀木河谷
Rasho(Vazir),拉舒(瓦齐尔)
Rathjens,Carl,卡尔·拉思詹斯
Rattu(Darya),拉多(河)
Ravi,拉维河
Rawalpindi,拉瓦尔品第
Ray Chowdhuri,G. C, G. C. 拉易·乔德里
Raziur Rahmat,Maulvi,毛尔维拉齐乌尔·拉赫玛特
Reukavarma Pedaka,热卡瓦尔玛·派达卡
Revati,莱瓦迪
Richard M Emerson,理查德·M·埃默森
Richard N Frye,理查德·N·弗赖伊
Risalpur,里萨尔布尔
Robertson,Sir George,乔治·罗伯逊爵士
Roman Empire,罗马帝国
Rome,罗马
Rondu,隆多
Rono famly,罗诺家族
Roose-Keppel,Sir George,乔治·鲁斯－凯佩尔爵士
Roshamiya,罗夏米亚
Roshan,罗欣
Rosy Milanes,罗西·米拉奈斯
Royal,劳亚尔(隆多)
Rudradasa,罗德拉达萨
Rudra Sri,楼陀罗·斯利
Rudra Sri Chdrapresopya,楼陀罗·斯利·查德拉巴莱索比亚
Ruknuddin,罗甘乌丁

Rumbur,鲁姆布尔

Russia,俄国

Rustam Ali Khan,Jamadar,罗斯塔姆·阿里·汗 贾玛达尔

Rustami,罗斯德米

S

Sabhyaadeva-vamsa,高贵的种族[一种称号]

Sachau,Edward,C. 爱德华·C·萨乔

Sacred Rock of Hunza,罕萨灵岩

Sadat Khan,萨达特·汗

Safdar Ali Khan,萨夫达尔·阿里·汗

Safed Pari,萨费德巴里(白山嘴)

Safiullah Beg, Subedar,萨菲乌拉·贝格苏贝达尔

Sahabnuma,Shahzadi,沙赫扎迪·萨希布努玛[公主名]

Saha Deo Singh, Tehsildar,萨哈·德乌·辛格区长

Sahadeva,萨诃提婆/偕天

Sahebnuma,萨希布努玛

Sahebqiran(alis Khusro Khan),萨希布基兰王子(又称胡斯劳·汗)

Sahebqiran,Raja,萨希布基兰罗阇

Sahib Khan(Girkis),萨希卜·汗(吉尔基斯)

Saif Khan,赛夫·汗

Saifullah(Mughal Officer),赛夫乌拉(莫卧儿官员)

Sai(nala),萨依河

Sailendrasaja,赛兰德拉萨贾

Sailoda river,赛洛达河

Saiwang,塞王

Sajja,萨贾

Saka,塞种人/塞人

Sakala,奢羯罗[今锡亚尔科特]

Sakastan,萨加斯坦

Sakra Bhattaraka,萨克拉·帕塔拉卡

Saksena Banarsi, Prasad,普拉萨德·萨克色那·贝那勒西

Sakwal,塞格瓦尔

Salam Khan,萨拉姆·汗

Salang Khar,萨兰格克尔

Salhana,萨尔哈纳

Salim Alde, Yabgu,萨利姆·艾尔代叶护

Salim(or Silum)Khan Ⅲ,萨利姆(西卢姆)·汗三世

Saling,萨林格

Salture(or Saltoro),萨尔杜莱(萨尔托洛)

Sa(o)ltoro pass,萨尔托洛山口

Samana Goma,萨玛纳·戈玛

Samangoma,萨曼戈玛

Samarkand,撒马尔罕

Sambhogasena,萨姆普加色那

Samegal,萨迈格尔

Sami Devi,萨米德维[王后]

Samidevi Trailokyadevi Phattarika,萨米德维·德拉伊劳克雅德维·帕塔里卡

Samigal,萨米格尔

Sampuran Singh,Col,萨姆布兰·辛格上校

Samudra(or Samudrasena),沙摩陀罗(沙摩陀罗色那)

Samvat,萨姆瓦特(纪年)

Sandhivigrahika,散迪维格拉希卡[主管战争与和平的大臣]

Sanekar(fort),萨奈加尔堡

Sange Ali(or Sangin Ali),僧格·阿里(僧金·阿里)

San Gimignano,圣吉米纳诺

Sangrila Hotel,香格里拉饭店

Sanifnosh,萨尼夫诺希

Sayyid Arif(Kashmiri),赛义德·阿里夫(克什米里)

Sayyid Ghazanfar Ali Shah,Major,赛义德·迦曾弗尔·阿里·沙少校

Sayyid Ghulam Jilani Shah,赛义德·古拉姆·吉拉尼·沙

Sayyid Husain(son of Shah Ardbil),赛义德·侯赛因(沙·阿尔德比尔之子)

Sayyid Jalali al-Hussaini,赛义德·贾拉里·艾尔·侯赛尼

Sayyid Mahmud Shah Tusi,赛义德·马茂德·沙·图西

Sayyid Mir Ibrahim,赛义德·米尔·伊卜拉砍

Sayyid Safdar Shah of Nagir(alias Asghar Ali Shah),纳格尔的赛义德·萨夫达尔·沙(又称阿斯迦尔·阿里·沙)

Sayyid Shah Abdur Rahim,赛义德·沙·阿卜杜尔·拉希姆

Sayyid Shah Afzal,赛义德·沙·阿夫扎尔

Sayyid Shah Akhtar,赛义德·沙·阿赫塔尔

Sayyid Shah Sultan Arif,赛义德·沙·苏丹·阿里夫

Sayyid Shah Wall,赛义德·沙·瓦利

Sayyid Sultan Ali,赛义德·苏丹·阿里

Sayyid Tahsin,赛义德·塔赫辛

Sazin,沙津

Schmidt,R. L,施米特

Scot, Major General,斯科特少将

Scythians,西徐亚人/斯基泰人

Scytho-Parthian,西徐亚—帕提亚人

Sebastian Dusa,塞巴斯蒂安·杜萨

Seistan,锡斯坦

Seo,塞奥

Sewang Namgyal(Kalon of Malba),才旺南嘉(马尔巴[穆尔贝克]的噶伦)

Seven-Maksu-state of Gilgit,吉尔吉特的“七个玛克苏之国”

Shachoi,夏久依(河谷)

Shafa Ali of Nagir,纳格尔的舍法·阿里

Shah Khan,沙·汗

Shah Khatun,沙·可敦

Shah Khusro Khan(Huza ruler),沙·胡斯劳·汗(罕萨统治者)

Shah Malik(Glit Kalika),沙·马立克(格里特·卡里卡)

Shah Mayur,沙·玛尤尔

Shah Mir,沙·米尔

Shah Mirza(Mirza Ⅰ),沙·米尔扎(米尔扎一世)

Shah Morad(Raja of skardu),沙·穆拉特(斯卡杜罗阇)

Shah Najm(see under Najam),沙·纳杰姆

Shah Nasir(ruler of Chitral),沙·纳西尔(奇特拉尔统治者)

Shah Nauroz Khan,沙·努鲁兹·汗

Shah Nawaz,沙·纳瓦兹

Shah Nawaz(ruler of Chitral),沙·纳瓦兹(奇特拉尔统治者)

Shahpur,沙布尔

Shah Rahim Khan(Rahim Khan),沙·拉希姆·汗(拉希姆·汗)

Shah Rais Azam(Raja of Gilgit),沙·拉伊斯·阿扎姆(吉尔吉特罗阇)

Shah Rais Khan,沙·拉伊斯·汗

Shah Rais of Nagir,纳格尔的沙·拉伊斯

shah Rais, Ruler of Chitral,奇特拉尔统治者沙·拉伊斯

Shah Rais(son of Tartorrakhan),沙·拉伊斯(塔尔多拉汗之子)

Shah Raza of Drosh,德罗希的沙·拉扎

Shahrani,M. Nazif Mohib,M. 纳齐夫·穆希布·莎赫拉尼

Shah Salim Khan Ⅰ(ruler of Hunza),沙·萨利姆·汗一世(罕萨统治者)

Shah Sultan(founder of Line Astor rulers),沙·苏丹(阿斯托尔王系的奠基者)

Shah Sultan of Hunza,罕萨的沙·苏丹

Shah Sultan of Nngir,纳格尔的沙·苏丹

Shah Sultan, Raja of Astor,阿斯托尔的罗阇沙·苏丹

Shardi,沙尔迪

Sharma,沙尔玛

Sharokun,沙罗贡

Sharot,沙罗特

Shash,沙什/者舌

Shatial,夏迪亚尔

Shayar,沙叶尔

Shayok,希约克

Shazin,沙津

Shayam Lal,沙亚姆·拉尔

Sheikh Ghulam Mohi-ud-din,谢赫·古拉姆·穆希乌丁

Sheikh Imam-ud-din,谢赫·伊玛目·乌丁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

Shen,森

Shengus pass,森古斯山口

Sher Afzal,谢尔·阿夫扎尔

Sher Ahmad Khan,Naik,纳依克谢尔·艾哈默德·汗

Sher Ali, Subedar of Yasin,亚辛的苏贝达尔谢尔·阿里

Sherdil Aman,谢尔迪尔·阿曼

Sher Ghazi,谢尔·加齐

Sher Jang,谢尔·姜格

Sher Jang Thapa,谢尔·姜格·塔巴

Sher Khan,谢尔·汗

Sher Khan, Major-General,谢尔·汗少将

Sher Mohammad, Hvildar,哈维尔达尔谢尔·穆罕默德

Sher Shah,谢尔·沙

Sher ShahI,谢尔·沙一世

Sher Singh, Sikh governor,锡克省督谢尔·辛格

Sher Qila(Sher Kila),谢尔堡

Sher Y. A,Y. A. 谢尔

Shie Mi,赊弥

Shigar,希格尔

Shigarnama,《希格尔志》

Shigar Shangu,希格尔欣库

Shigar Valley,希格尔河谷

Shignan,锡格楠

Shihabuddin(Sultan of Kashmir),希哈布丁/希哈卜·乌丁(克什米尔苏丹)

Shih-huangti,始皇帝

Shiite,什叶派

Shiltas(or Chilas),希尔塔斯(吉拉斯)

Shimsak,希姆萨克

Shimsal(Shmshal),星峡尔山口,星峡尔河

Shimsha Kharbu,希姆夏克尔布

Shin,欣(人)

Shina,希纳(语)

Shinaki,希纳基

Shin Bala,上欣地区

Shinbar,欣巴尔

Shin Bar Bala,欣巴尔巴拉[上欣巴尔]

Shindki(Chesar),欣德基(切萨尔)

Shing(nala),欣格河

Shingo(river),欣库河

Shin Payin,下欣地区

Shiraz,设拉子

Shirot,希罗特

Shivdas,希乌达斯

Shoman(Commander-in-Chief),肖曼(总指挥)

Shomari,肖玛里

Shopur,肖布尔

Shhorbulak Daria,肖尔布拉克河
Shorkot(inscription),肖尔戈德(铭文)
Shoto,A. Dareli,A. 达莱里·肖多
Shudri,舒德里
Shujaul Mulk,舒贾乌尔·穆尔克
Shujaul Mulk Razakhel,舒贾乌尔·穆尔克·拉扎海尔
Shukayot,舒卡约特
Shumari,舒马利
Shumul Gas,舒莫尔·加斯
shuntar Pass,雄塔尔山口
Shunying,Prof. Mu,穆舜英教授
Shurot,舒罗特
Shyam Lal,希亚姆·拉尔
Siachen,锡亚琴
Siberia,西伯利亚
Sibjaida,西卜贾伊达
Sidhalaka,西塔拉卡
Sikam Yabgu,西卡姆叶护
Sikandarabad,西甘达尔阿巴德
Sikandar(a prisoner),西甘达尔(一名俘虏)
Sikandar Khan,西甘达尔·汗
Sikandar Khan, Major,西甘达尔·汗少校
Sikandar(Raja of Nagir),西甘达尔(纳格尔罗阇)
Sikandar,Shah,沙·西甘达尔
Sikhs,锡克人
Siksha,西格夏
Silathasa(or Chilas),西拉塔萨(吉拉斯)
Silavata,西拉瓦塔
Silk Road,丝绸之路
SilumⅢ,西卢姆三世

Sogdian,粟特语

Somaiya Ghulam(Vazir),索玛依亚·古拉姆(瓦齐尔)

Somiyu(Vazir),索米尤(瓦齐尔)

Somonagara(vira),索摩纳格拉(维罗索摩纳格拉)

Sondus,松杜斯

Songtsen-gampo,松赞干布

Sonamarg,索纳默尔格

Soniwals,索尼瓦尔人

Sor Laspur,索尔拉斯布尔

Sopur,索布尔

Sri Badad(Badat),斯利·巴达德(斯利·巴达特)

Sri Bagartham,斯里·巴加尔特姆

Sri dasa,斯利·达萨

Sri Deva Shahi Surendra Vikramaditya Nanda,斯利·提婆·沙希·苏兰德拉·维克拉玛迪蒂亚·南达

Sri Kumarasena,斯利·鸠摩罗色那

Srinagar,斯利那加

Sringara,斯林格拉

Sri Palalojo Hastibhro,斯利·巴拉洛乔·哈斯迪帕罗

Sri Saharanka,斯利·萨哈兰卡[一种头衔]

Sri Simhadeva(Raja),斯利·僧诃提婆罗阇

Sri Sudamachandra raja,斯利·苏特玛旃陀罗 罗阇

Srivara,斯利瓦拉

Stacul,G,G. 斯塔古尔

Steblin-Kamenskji,I. M,I. M. 斯代巴林－卡曼斯克吉

Stein. Sir Aurel,奥雷尔·斯坦因

Strabo,斯特拉波

Stri rayya,女国

Suastus,斯伐斯杜斯

Subedar,苏贝达尔[一种军职]

Svasa(or Khasa),斯瓦萨国(佉沙国)
Svastene,斯伐斯代奈
Svastus,斯伐斯杜斯
Swabi,斯瓦比
Swat,斯瓦特
Syed Ahmad Shahid,赛义德·艾哈默德·夏希德
Syed Ali Hamadani,赛义德·阿里·哈姆达尼

T

Tagdumbash,塔克墩巴什
Tago,塔戈
Tahir Kheli, Dr. R. A. Khan, R. A. 汗·塔希尔·海利
Tahir Shah, Raja of Nagir,纳格尔罗阇塔希尔·沙
Tahrik-i-Istiqlal,自主运动
Taiban(Protecting deity),台班[一种保护神]
Tajammul Shah,塔贾莫尔·沙
Tajikistan,塔吉克斯坦
Taj Moghal,塔杰·莫卧儿
Tajik Persian,塔吉克波斯语
Tak(or Thak),塔格
Takeshar,塔盖夏尔
Taklamakan,塔克拉玛干
Tal,塔尔
Talash,怛逻斯
Talel,塔莱尔
Ta-hsia,大夏
Ta-li-lo,达丽罗
Tamil,泰米尔语
T'aug(emperors),唐朝

Tan-gali,丹格里

Tangir,丹吉尔

Tantric Buddhism,密宗佛教

Tanzim-i-Sarfaroshan,敢死者组织

Taobat,道巴特

Taotai,道台

Tapponnier,塔朋尼尔

Taqizadeh,S. H,S. H. 塔基扎德赫

Tarikh-i-Hasan,《哈桑史》

Tarikh-i-Hunza,《罕萨史》

Tarikh-i-Rashidi,《拉失德史》

Tarim,塔里木河

Tartorra Khan,塔尔托拉 · 汗

Tashkent,塔什干

Tashkurgan,塔什库尔干

Tatar,鞑靼

Taxila,呾叉始罗/塔克西拉

Telugu,泰卢固语

Teng,丹格

Teng, Mohan Krishen,莫汉 · 克里山 · 丹格

Teram Kangri Peak,特拉木坎力峰

Tethys Sea,蒂锡斯海/古地中海

Thagas,特迦斯

Thagas(mosque),特迦斯清真寺

Thak,塔格

Thakot,塔戈特

Thakurdas, Dewan,塔古尔达斯 迪万[迪万为官职名]

Thalanka,塔兰卡

Thalich,塔里奇

Thalichi,塔里吉

Thalpan,特尔班平原

Thalpa(e)n,特尔班

Tham Goritham,特姆·戈里特姆

Thamsak,特姆萨克

Thamshak,特姆沙克

Thanedar/Thanadar,塔纳达尔[官职名]

Thapar,B. K,B. K. 特巴尔

Tharangasena,塔兰加色那

Thekedar Fazl Ahmad,承包商法兹尔·艾哈默德

Theodoras,泰奥多拉斯

Theodore,泰奥多莱

Theraro,泰拉罗

The Times,泰晤士报

Thih,梯赫

Thol,托尔

Thomas,托马斯

Thomas,F. W,F. W. 托马斯

Thompson,H. C, H. C. 汤普森

Thor,托尔

Thrace,色雷斯

Thujana(or Thujina or Tunjina),图杰纳(图吉纳/敦吉纳)

Thung-Kurym,松古里姆

Thup-Chhar,图伯贾尔

Thurgo Pari,图尔戈山嘴

Tibet,西藏/吐蕃/图伯特

Tibet-i-Khurd,小西藏/小图伯特

Tibeto-Dard Kingdom,吐蕃—达尔德王国

Tieh-Lo,牒罗

Tien Shan(mountsin),天山

Tiffou,E, E. 蒂福

Tiger Force，虎军
Tigin，特勤
Tilel(branch)，蒂莱尔(支谷)
TilyL，蒂尔叶尔
Timur Shah(Afghan ruler)，帖木尔·沙(阿富汗统治者)
Tirah，蒂拉赫
Tirahi，蒂拉希语
Tirichmir，蒂里奇米尔(峰)
Titam，蒂塔姆
Titan，蒂坦
Tochi Scouts，多奇侦察队
Tohfatul Ahbab，《情人的馈赠》
To-li，陀历
Tolti，图尔迪
Tongudas，东古达斯
Tora(or Torra) Khan，多拉·汗
Toramana，托拉马纳(头罗曼)
Toraman Shahi，托拉曼·沙希(头罗曼·沙希)
Torghun，杜尔贡
Tor Khah，多尔·汗
Torwali，托尔瓦里语
Tragbal，德拉格巴尔
Tragbal Pass，德拉格巴尔山口
Trakha，突厥
Trakha-guna-Simha，突厥贵族之狮[一种称号]
Trakhane Ras，塔拉汗·拉斯
Trakhan(or Trakhane)，塔拉汗王朝
Trangfa(son of Hasan Shah)，塔兰格法(哈桑·沙之子)
Transalai(range)，德兰萨拉依山脉
Trans-Daspian，德兰斯－达斯皮央

Treaty of Amritsar(1846),1846 年阿姆利则条约

Treaty of Lahore,拉合尔条约

Trekhu,德莱胡

Trench,C. C,C. C. 特伦奇

Trotter,特罗特

Tsari,德萨里

Tsungiling,葱岭

Tubu,图布

Tucci,G,G. 杜齐

Tukharistan(or Tokhristan),覩货逻/吐火罗斯坦

Tu-lo-Pa,[中国唐代编年史提到的印度国王名,待考]

Tun-haung,敦煌

Turan,图兰

Turkestan,突厥斯坦

Turkish(tribe)突厥(部落)

Turki-Shahi,突厥沙希.

Turks,突厥人

Turner, R,R. 特纳

Tushar(or Tukhar),杜夏尔(杜哈尔)

Turushka(Turk),杜罗什卡人(突厥人)

U

Udyana,乌仗那/乌苌国

Uccala,乌卡拉

U-Chang-na,乌仗那

Udayaditya,乌达亚迪蒂亚

Uigur(Turks),回纥/维吾尔(突厥人)

Ultur(nala),乌尔杜尔河

Umra Khan,乌玛拉・汗

V

W

Wilayat Ali Wazir,维拉叶特·阿里·瓦齐尔

Williams,S, S. 威廉斯

Wilson,H. H, H. H. 威尔逊

Wood,John,约翰·伍德

Woorshigoom(or Warshegum),沃尔希古姆

Wu-cha,乌秅

Wuller Lake,乌莱尔湖

Wu-ti,武帝

Wu-Yang,武阳

X

Xerxex,薛西斯

Xinjiang,新疆

Y

Yabgu,叶护

Yabgu Raja of Khaplu,哈伯罗的叶护罗阇

Yabgu rulers of Khaplu,哈伯罗的叶护统治者

Yaghistan,亚吉斯坦

Yahya Khan,Yabgu,叶护叶海亚·汗

Yakub Beg,阿古柏伯克

Ye-po-lo,业波罗

Yangishahr,英吉沙

Yani Kurgan,亚尼库尔干

Yapp,M. E, M. E. 亚普

Yaqub of Khaplu,哈伯罗的雅谷布

Yaqut Shah,Sayyid,赛义德·雅古特·沙

Yar Mohammad Khan,亚尔·穆罕默德·汗

Z

Zanzun,象雄

Zhrafshan(valley),泽拉夫善河谷

Zarin, Mohammad,穆罕默德·扎林

Zat,种姓

Zeitu,柴杜

Ziarat,圣墓

Zik Singe, 齐格·僧格

Zilakha, 齐拉卡

Zohra Jabin,佐哈拉·贾宾

Zohra Khatun,佐哈拉·可敦

Zoji-la pass,祖吉山口

Zorawar Singh,佐尔阿弗尔·辛格

Zoraweru,佐尔阿韦罗

Zoroaster,琐罗亚斯德

Zoroastrian,琐罗亚斯德教(的教徒)/祆教(徒)

Zulchu(or Dulcha), 祖尔久(杜尔贾)

责任编辑 / 季垣垣
封面设计 / 翟跃飞

环喜马拉雅文丛

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史

13世纪一个藏族僧人的印度朝圣之旅
——恰译师曲吉贝传

ISBN 978-7-80253-602-9



定价：62.00元